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自由史论

John Acton

[英国] 阿克顿 著　胡传胜 陈刚 李滨 胡发贵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自由史论

〔英国〕阿克顿 著　胡传胜 陈刚 李滨 胡发贵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史论／（英）阿克顿（Acton，J.）著；费尔斯（Fears，J.R.）编；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8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ISBN 7-80657-252-X

Ⅰ.自… Ⅱ.①阿… ②费… ③胡… Ⅲ.自由-研究-英国-近代 Ⅳ.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2955号

书　　名　**自由史论**
作　　者　[英国]约翰·阿克顿
译　　者　胡传胜 陈刚 李滨 胡发贵
　　　　　　张华 朱珊 蒋海怒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原文出版　Liberty Classics，Indianapolis，198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20.125
插　　页　2
字　　数　458千
版　　次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252-X/I·224
定　　价　27.00元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xi

约翰·埃默里齐·爱德华·道伯格—阿克顿1834年2月10日生于那不勒斯。[①] 在他的父亲费迪南·理查德先生1837年去世后他即承继为准男爵第八和在什罗普郡的奥登海姆的家庭遗产。1869年由于对自由党首相威廉·爱华特·格拉斯顿的忠告他被擢升为贵族，成为奥登海姆的阿克顿男爵。

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850—1857)之后，阿克顿回到英国，担任自由天主教的发言人。[②] 作为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和政治上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促进个人自由、政治上的自治和不受

---

① 阿克顿传记中，格特鲁德·希姆法伯的《阿克顿勋爵：良心与政治的研究》(芝加哥，1952)仍属上乘之作。希姆法伯广泛运用了已于1903年捐献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阿克顿的文章和笔记。大卫·马修的《阿克顿勋爵及其时代》(伦敦，1968)对阿克顿生活年代的人物与事件的介绍重于对他本人的生平与思想的介绍。赫伯特·舒廷格尔的《阿克顿勋爵：自由的历史》(伊利诺斯，1976)是对阿克顿具有同情的记述。约翰·肯扬的《史家：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历史学科》(伦敦，1983)第125—143页，是最近的讨论，也是对阿克顿带有批评性的讨论，但其中也暴露出肯扬对阿克顿的著作缺少第一手资料。

自从希姆法伯著作出版以来，因为阿克顿与都林格、辛普森的通信集的出版，我们关于阿克顿的知识增进了许多。此外，希姆法伯所使用过的阿克顿在剑桥的文稿包含他的第一手研究笔记。1973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了一大箱阿克顿的通信和文稿。因此，现在似乎等待一部利用所有这些新资料的阿克顿传记的出版。

② 阿克顿在自由天主教运动中的作用是《阿克顿选集》第3卷的内容。这方面详尽的学术研究包括约瑟夫·阿尔托兹的《英国的自由天主教运动：〈随笔〉及其1848—1864年的作者群》(伦敦，1962)以及休·麦克杜戈尔：《阿克顿—纽曼关系：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困境》(纽约，1962)。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天主教的一般情况，见爱德华·诺曼的《19世纪英国天主教教会》(牛津，1984)。

约束的科学探索原则是天主教的真正性质和使命。阿克顿认为，通过这些原则的成功实施，正义的事业、天主教信仰和教会自身的利益将会得到保证。为献身于这些理想，阿克顿成为两个时间不长但却很出色的期刊《随笔》和《内外评论》的合编者与投资者。他为之写了很多随笔、书评和有关时事的文章。在《内外评论》于 1864 年停刊之后，阿克顿为《编年史》(1867—1868)和《北不列颠评论》(1869—1871)写随笔和评论。他对这 4 个期刊的贡献不仅包括对当代天主教[3] 问题的随笔，而且还有对当前的观念和事件，如欧洲大陆上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美国内战的历史研究与政治上的分析探讨。然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自由及其赖以得到保障的手段。除这些新闻活动以外，他还在下院有一个短暂的从 1859 至 1865 的自由党议员时期。[4]

对阿克顿说来教皇不会犯错误的观念是对历史真实和政治自由主义所有准则的一种践踏。他相信，天主教成为一种进步和自由力量的所有希望，被宣称教皇是宗教和人类道德良心不会犯错误的仲裁者这样一种教义所损害 他在 1869—1870 年领导反对梵蒂冈教廷关于教皇不会犯错误教义传播活动中发挥

---

③ 这些期刊的历史的较详细的讨论，见阿索尔兹和麦克杜戈尔的著作，也见下面两项成果：欧根·克拉克：《天主教自由主义与教皇绝对主义》(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65)以及盖尔·鲁恩的《1864—1871 年阿克顿圈子：〈编年史〉和〈北不列颠评论〉》(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69)。

④ 阿克顿的议员生涯是詹姆斯·奥克乌莫迪的系列论文的主题：《作为下院议员的阿克顿》，《亚力山大里亚大学人文学报》，第 5 卷(1950)；《阿克顿当选爱尔兰议员》，《英国历史评论》，第 61 卷(1946)，第 394—405 页；《阿克顿：年轻的议会活动家》，《澳洲与新西兰历史研究》，第 9 卷(1960)，第 131—139 页。

了最直接和最积极的作用。③ 随着他的自由天主教运动的失败和影响的丧失，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也告结束。他仍然留在教会；但他在天主教的知识界不再起什么作用，也不常写东西发表。他代之以从事个人的历史研究，在英国，在里维埃拉，以及在巴伐利亚的泰格斯别墅过着富有的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他与格拉斯顿保持一种密切的知识分子的和政治上的关系，他对这位首相的影响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可以见到，如格拉斯顿对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以及爱尔兰国内制度的支持。④ 作为女王侍臣，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他的学识，他道德上的正直以及社交时的典雅风度使他成为维多利亚英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870 年以后他的文字活动已很少。他 1877 年关于"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的演讲可视作范围更为广泛的《自由史》思想的起源。该书并未超出此阶段的研究和计划；但阿克顿在此过程中收集的大量材料和其他的研究仍可表明其历史学识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阿克顿是 1886 年的《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建者之一。在 1886 年至 1895 年他给此杂志提供了两篇长文和 8 篇评论文章。在这样厚实的历史学贡献基础上以及由于他

---

③ 阿克顿和梵蒂冈委员会的关系在《阿克顿选集》第 3 卷中讨论。这方面的一手材料和解释性论文收集在戴米安·麦克尔拉特的《阿克顿勋爵的决定性年代：1864—1874 年》（卢汶，1970）。阿克顿这个时期的日记已由爱德蒙·坎佩翁编辑出版，题为《阿克顿与第一次梵蒂冈委员会日志》（悉尼，1975）。除了这本资料集和麦克杜戈尔、鲁恩的著作以外，还有维克多·康齐米乌斯的《阿克顿勋爵和第一次梵蒂冈委员会》，《教会史杂志》，第 20 卷（1969），第 267—294 页。

④ 阿克顿与格拉斯顿的关系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见威廉·W.怀特：《阿克顿与格拉斯顿：他们的友谊与相互影响》（美国天主教大学学位论文，1973），以及欧文·查德威克的《阿克顿与格拉斯顿：1975 年克来顿历史讲座》（伦敦，1976）。

已具有“在世最有学识的英国人”之名望,阿克顿1895年被任命为剑桥皇家教授。[7] 他的人格,他的演讲,他作为《剑桥近代史》的组织者和主编的角色对英国的历史研究都发挥了直接的和有益的作用。在他去世后的1902年6月15日,他的有7万本藏书的图书馆,连同他毕生收集的研究资料都通过剑桥图书馆献给了历史研究。他的学生费格斯和劳伦斯出版了他的剑桥演讲《论法国革命》和《论现代史》两卷论文集,一卷信件。他的头衔被他的儿子理查德·马克西姆·道伯格—阿克顿,即阿克顿男爵第二所继承。

阿克顿的生平事迹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但它们对那些使他成为维多利亚知识界最出色和最难以把握的人物之一的复杂思想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

首先是贵族式的。阿克顿是什罗普郡一个有着很长谱系的准男爵的后裔。他们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好几代人均在大陆上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阿克顿的祖父约翰·阿克顿先生升至那不勒斯波旁王国的首相,阿克顿的父亲费迪南第六即费迪南·理查德先生与达克迪·道伯格的女儿和继承人玛丽·比宁·迪·道伯格结婚。因此她属于最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当阿克顿的父亲去世时,她再嫁而进入强大的英国辉格党贵族政治的社交领域。她的第二位丈夫和阿克顿的继父是上院的自由党领袖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伯爵是格拉斯顿亲密的政治盟友,并三度加入他的内阁。阿克顿的妻子也出生于一个在巴伐利亚和意大利都很有名的家庭。

这样的出生和家庭关系使阿克顿能过着一种有特权的和自

[7] 阿克顿的学识引自孟德尔·克来顿(《英国历史评论》的首任主编)、路易·克来顿:《孟德尔·克来顿的生平与通信》,第1卷,第275页。

由自在的生活。他身处欧洲大陆和英国社会最为珍稀的阶层之中。在晚年他也确实感到手头较紧,但从未迫使他把文字活动变成挣钱的工具。这使他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最初的文学家,也有别于现代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其对阿克顿说来是事业。他从未得到一个学院的学位。他被授予慕尼黑、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他并未按学院的方式工作。他的第一个和惟一的岗位是联合王国两个最著名的历史教授职位之一。

然而,阿克顿并不是一个贵族式的半瓶醋。他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其职业素养远过于英国其他可与之相比的同代人。[8] 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阿克顿年轻时未被允许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他代之于去慕尼黑大学,在那里他受教于天主教会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伊格纳兹·冯·都林格。在阿克顿的生涯中,没有什么比伊格纳兹·冯·都林格的影响更为重要。都林格对这位16岁的英国准男爵承担了父亲的角色。阿克顿住在都林格的家里,陪他旅行去欧洲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学者那里。19世纪的德国正是历史研究的前沿,都林格则身处一流德国历史学家之列。从都林格那里,阿克顿学会了把历史看做科学,而不是艺术。历史学家的职责只有一个: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以及对之进行的客观评价追求真理。在对档案材料重要性的评价和对历史学家的工作必须尽可能根据原始文献本身的理解方面他从根本上超越了都林格。说担任剑桥皇家教授的阿克顿置身于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列是相当公正的。他是一位在方法上领先于19世纪的大师,而他对心智史重要性的重视预示了20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发展的潜在趋势。

xv

---

⑧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阿克顿是《阿克顿选集》第2卷的主题。

从都林格那里阿克顿也学会了历史地思考——视历史为理解现实的工具。以都林格为榜样，阿克顿在历史中找到了在两个指导他毕生的原则——自由主义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实现和解的工具。

阿克顿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该词的经典意义上，他相信"自由不是一种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9] 他认为超出自身利益的必要界限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但仅仅在推进保证和促进个人自由的限度内

对于英国圣公会仰慕者的困惑，阿克顿认为他对自由的忠诚和他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信仰之间并无矛盾。在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他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都是不容置疑的。他相信基督教的启示是自由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个人的价值无可估量，其恩赐的自由超过希腊或罗马所拥有的一切。他以其直觉视教会为促进自由的重要的潜在力量。只有教会拥有一个能抵抗现代政府及其绝对化趋势的组织。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抑制和平衡，教会能够为个人自由提供广泛的保证。阿克顿认为，教皇不会犯错误论像所有的绝对主义一样不仅是不明智的，是个错误，而且是不道德的。阿克顿心目中的道德尺度与他关于自由、历史和宗教的所有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阿克顿提及道德时总是涉及自由和宗教。自由给人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的机会。真正的宗教能使人的良心和知识升华，以至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应当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

xvi

[9] 参见以下[边码]第22页。

惯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能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的竞争。"[10]

阿克顿不相信道德能与政治或公众生活相分离。为爱国主义的理由下命令谋杀的政治家与为金钱拦路抢劫杀人者同样都是谋杀犯。阿克顿认为，用同样的词对之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阿克顿主张历史有一个道德目的；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11]

阿克顿自己的一生道德色彩也同样强烈。他是那些仅通过研究其私人文献就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的研究笔记和一生所收集的资料以及对家人和朋友的信件给了我们一副阿克顿的肖像，其才智和性格非他的公开出版物所能包含。通过那些熟悉他的个人亲眼所见能看清楚其非凡才智和品格。剑桥学监和天主教主教都感受和谈到一个拥有"所有美德而无缺点"[12]者的个人魅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格拉斯顿信任他"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约翰·莫利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

xvii

---

⑩ 见以下[边码]第3－4页。

⑪ 至于伯克和这段语录请参见阿克顿在剑桥的就职演说，《历史研究》(伦敦，1895)，第63、73页。该演讲见《阿克顿选集》，第2卷。

⑫ 该引言来自奥撒·希朗的《晚年的回忆》(伦敦，1923)，第15页。

物之一"[13]。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权力走廊漫步的人仰慕这位学富五车、胸襟开阔的人，他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给人咨询，并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出一本书的微言大义。

然而那些最仰慕他的人也能感到有一种失败感在主宰着阿克顿。在一个笔记中他对自己说他的一生荒废了。[14] 这样一种失败了的使命感和荒废感我们可以从本卷前页的肖像中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中看出。

年轻时他就寻求把他的学识贡献给天主教事业。他的目标是教育普世基督徒懂得"教会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科学方面都不追求她自己的目的。如果她鼓励追求科学的目的即真理，追求国家的目的即自由，那么她将会达到。"[15] 梵蒂冈教廷终止了这一使命。当他认识到即使是他的良师和密友都林格对他关于历史的道德判断也不能够理解，更不用说同情时，他只得放弃对xviii《自由史》的构思。当阿克顿在他关于乔治·艾略特的文章以及关于曼代尔·格雷顿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世系史》所写的评论中提出关于道德以及一位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之思想时，他的仰慕者也对之感到困惑。没有人真正懂得他的思想，这样一种感觉起了很大作用，促使阿克顿不愿开始动笔撰写他的《自由史》。因为他对他的最热心崇拜者之一、首相的女儿玛莉·格拉斯顿表白过："我既没有信徒也没有同情者，因为他们从不给我鼓励和信任。"

---

[13] 格拉斯顿的观点包含在阿克顿写给他的女儿玛莉·伊丽莎白·安妮的一封信中，此外见手稿8121第22栏。莫利的论文见他的《回忆录》(纽约，1917)，第1卷，第229—235页。赫伯特·鲍的《阿克顿勋爵致玛莉·格拉斯顿信件》中"引言"(纽约，1904)第9—91页提供了阿克顿对那些熟悉其个人者影响的生动说明。

[14] 另见手稿540号，第19页。

[15] 《阿克顿—辛普森》，第2部分，第195页。

对于他没有发表更多的东西之遗憾，我们可以说，阿克顿的学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是在他已出版的随笔、演讲和评论中，在他的通信和未出版的笔记中，他留下了非常重要和具有创造性的知识遗产。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的一些学者如美国的格特鲁德·希姆法伯，英国的赫伯特·巴特费尔德以及德国的乌里奇·诺安克在利用这笔遗产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阿克顿，他的话对于亲见了欧洲物质的和道德的腐败以及具有法西斯主义政体伪装的国家专制主义的一代人具有先知般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阿克顿仍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令人信服地直接与我们说话。他对人性和政治的本性，对人类自由的意义、对那些促进和威胁人类自由的力量之深刻洞见，比一个多世纪前他撰写它们时声音更为响亮和传得久远。他的启示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位善于思考的公民都至关重要。让阿克顿再次以自己的语言对我们这代人说话，这正是编本选集的目的。

J.鲁弗斯·费尔斯

1984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自　由　史

一、古代自由史*

5

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是善行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直到在我们民族成熟收获。它是一个成熟文明的精美成果；自从那些懂得此术语含义的民族决心获得自由以来，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每一时代的进步都被自然灾害，被无知和迷信，被征服欲和安逸，被强者对权力的渴望和穷人对食物的欲求所困扰。当人民从野蛮状态、外来控制和长期的生存斗争之中苏醒时它已经阙如已久，当时对政治失去了任何兴趣和理解力的人渴望为一口燕麦粥出卖自己的生存权，而无视他们所弃之物之珍贵。在任何时代自由的忠诚之友都非常稀少，它的胜利归功于少数人，他们成功地联合了那些意见经常不同于自己的人作为援助；这种联盟总是危险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它给反对者以反对的口实，在胜利时也会引发对胜利成果的争端。对自由性质的把握是那样不确定和混乱不清，以致从来没有什么障碍是如此持久和难以克服。即使敌对势力造成了那么多伤害，错误观念所造成的还更多；但知识的扩展和 6

---

* 本文与《基督教自由史》首次作为阿克顿勋爵于1877年2月26日和5月28日在农艺大厅对布里奇诺思学院成员所作的两个演讲《古代自由史与基督教自由史》发表（布里奇诺思：C.爱迪金印刷厂），两项讲演分别为11页、12页。第2次发表于《自由史》，第1—60页；《自由与权力》，第30—87页；《历史自由的解释》，第243—299页。

法律的改善仍显示了它的进步。制度史常常也是一部蒙昧和幻觉的历史；因为其作用有赖于其所产生的观念以及将之保存下来的精神，在内容实质出现变化时形式仍可保持不变。

现代政治中有少数几个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何我论证的重点在法律领域之外。常有人说我们的宪法在1679年通过《人身保护法》时形式上已很完美。然而查理二世继位仅2年，就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之外。1789年，在凡尔赛召集三级会议之时，比自由大宪章更悠久、比我们的下院更有威望的西班牙议会在间隔几代人之后也告召开，但他们立刻请求国王不要与他们商量，以他自己的智慧对权力进行改革。公众舆论认为，间接选举是对保守主义的一种保护。但是法国革命的所有参与者都来自间接选举。有限制的选举被公认为是君主制的另一个屏障。但是由99万名选举者选出的查理十世的议会反抗并推翻了这位君主；而由25万选民选出的路易·菲利普的议会顺从地推进他的大臣的反动政策，在关键的表决中拒绝改革，对这位君主卑躬屈膝，基佐也得到129位官员的大多数投票支持。没有报酬的议会显然比大多数接受报酬的欧洲议会更加独立。但是美国派一个人自费从此地到君士坦丁堡这个费用最昂贵的首都生活一年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总统在法律上和对外似乎是华盛顿的继承者，其权力是费城制宪会议设计的且受其制约。实际上新总统并非如这位共和国之父所想像拥有不同于民主制的君主般广泛权力，因为那会让7万人的公职发生变化；50年前约翰·昆西·亚当斯仅解雇2个人。购买官职很明显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是古老的法国君主制的这种可怕实践产生了能与国王相抗衡的惟一法人团体。会毁掉一个国家的官吏腐败在俄国被当做有益于减缓绝对主义压力的因素。在此情况下说奴隶制本身是自由道路的一个阶段简直是一种夸张。因此我们今晚不必像关

7

心人们的活的思想那样细究法规、法令死的字面含义。众所周知，一个世纪以前大法庭一个法官听讼，当事人必须付三个人的钱，但是没人注意到这种暴行，直到一位年轻的律师对过去的事情及与此相关的制度的方方面面产生疑问并带此怀疑进行严格的检查。那天一线曙光照亮杰里姆·边沁清澈而坚定的心，在政治日历中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胜过很多政治家的整个任期。我们很容易指出圣奥古斯丁某段话或格劳修斯的一个句子对50人议会法案的重大影响，我们的事业归功于西塞罗与塞尼卡、文纳与托克维尔的要多于莱库古立法或法兰西第五法典。

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他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有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清善与恶的界限。超过为其福祉服务的必要界限，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影响——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斗争。在古代，国家所掌握的权力不仅来自自身，而且侵入了个人自由的领地。中世纪它的权力很小，而遭受了其他入侵。现代国家常落入这两个极端。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按此定义，自由是宗教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因此我所论述的主题是在选民[基督教]的历史中得到第一次闪光。希伯来人的政府是一个联盟，其形成不是靠政治权力而是靠种族和信仰的一致，其建立不是立基于物质的力量而是自愿的契约。自治的原则不仅实行于每个部落，而且至少在120个家族的任何一个都得到实行：在法面前既没有特权阶层也没有不平等。君主制与这种共同体的原初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撒母耳以对所有亚洲王国和许多欧洲王国所一直坚持的东西作强烈抗议和警告来抵抗。该王 8 位的建立依据一项协议：国王被剥夺了对人民的立法权，他们承

认的立法者只有上帝，他们最高的政治目的是恢复法的原初纯净，让政府符合上苍认可的神圣的理想范型。那些在反对篡位者和暴君的无尽预言中苏醒并受到鼓舞的人们经常宣称神圣的法无比高于罪恶的统治者，并从已建立的权威，从国王、祭司和王公贵族转向呼吁回复潜藏在群众中未堕落的意识之力量。因此希伯来民族的榜样阐明两条平行的路线——民族传统教义和更高律法的教义：法律的成长有其根源与发展过程，但其实质不会改变的原理以及所有政治权力都必须根据一种非人为的法律进行检验和改革的原理，循此能够赢得所有的自由。这些原理的运作，无论与之一致与否，都占据了我们行动的全部空间。

在神权之下的自由与人类专制主义权力之冲突，结果是灾难性的。公元前622年耶路撒冷作最大努力以改进和保存该国。耶和华神殿的大祭司拿出那本已被遗弃和遗忘的律法书，国王和人民都曾发誓遵守和受束于它。但是这个有限君主制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早期例子既没有延续也没有扩展：自由取得的力量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求。在公元前586年君主专制的洪水淹没了这个曾经存在而且注定会再次存在的城市，它是东方的自由圣殿，西方则将为其准备一个新的家园，那里有大海、高山和坚定的心灵为其护卫，圣洁的种子已经播下，我们都将生活在它的身影下，它伸出自己无敌于天下的臂膀，动作缓慢然而坚定地指向整个文明世界。

按照欧洲大陆那个最著名女作家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却是新的。为该普遍真理辩护是新近历史学家的骄傲。古希腊的英雄时代证明了这一点，条顿人的欧洲则是更为充分的证明。无论我们在哪里追溯雅利安人的早期生活都能发现有利于发展成自由社会的条件和辛勤劳作的文化。他们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兴趣，对外在的权威没

9

多少敬意，对国家的作用与至高地位有一种不完美感。在所有权和劳动分化不充分的地方阶级和权力也没多少分化。他们可以逃脱专制主义，因为未被多种宗教所纷扰的社会能避免迫害，直到社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文明问题的考验。总的说来，父权制时代在随着生活发展出现难题和诱惑时该形式不能抵抗专制国家的生长；有一个主权国家是例外，它不在我今天的论述范围内，以以后时代的直觉追溯其何以幸存几乎不可能。耶稣诞生600年前专制主义束缚被摆脱。在整个东方它受到祭司和军队的始终如一的支持。在西方，没有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解释者的圣书，祭司不需要太多；伴随贵族阶级的诞生国王的权力被推翻。随之而来的是数代之久的阶级对阶级的残酷统治，富人对穷人以及知识阶级对没有文化者的压迫。其支配性精神可以在贵族西奥格尼斯充满激情的诗句中发现，他是一位天才和优雅的人，公然声称渴望饮他的政治对手的血。许多城市的人民都希望僭主能减少不可容忍的暴政，以寻求从这些压迫者那里得到解救。这种补救给犯罪以新的形式和动力。暴君常常是具有惊人能力和长处的人，如14世纪意大利城市中自立为君者中的一些；但是由平等的法律和权力分享所保障的权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一个最具天赋的民族把世界从这种普遍堕落中解救出来。雅典像其他城市一样深为特权阶级所烦扰，为避免暴力任命梭伦修改法律。这是历史记载中最令人愉快的选择。梭伦不仅是雅典已发现的最聪明的人，而且是古代最有远见的政治天才；他通过温和、不流血与和平的变革拯救了他的国家，这是成功的第一步；我们的时代也以寻求建立这样一种权力而自豪。这场变革除了启示宗教外为社会的复兴做了一切。上层阶级拥有制定 10
和执行法律之权，他让他们把对所有权的关注仅仅转向财富，那

生来就使人具有特权的东西。对于那些单独拥有能够支撑公共税务和战争重负财力的富人，梭伦根据其财富需要让其分享一定比例的权力。最贫穷的等级被免除直接的税务，但也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梭伦让他们从他们之上的等级中选立执法官为他们说话，而这些官员有向他们报告之义务。这个显然很微小的让步是巨大变化的开端。它产生了这个思想，一个人应当有权挑选那些正直和智慧之人，他的未来、他的家庭、他的生命必须托付给他。这个观念完全改变了人类的权威概念，因为它是道德影响王国的开始，在那里所有政治权力都得依赖道德的力量。依靠同意的政府取代了依靠压制的政府，站立在塔尖上的金字塔终于矗立在其基础之上。通过充当每个公民自己利益的保护人，梭伦让民主的因素进入国家。他说，一个统治者的最大光荣是创造一个公众的政府。他相信没有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而提出对所有行使权力者的行为实行有警觉的控制。

众所周知，直到那时反对政治骚乱的惟一对策是权力的集中。梭伦通过分权达到同样的结果。他给平民以很多他认为他们能够运用的影响，从而可以使国家免于武断的统治。他说，民主的要义是不服从任何主人而只服从法律。梭伦认识到政治形式不是最终的和不可违背的，它们必须适应事实；为修改他的宪法而不破坏连续性或失去稳定性他又贡献很多，以致在他去世几个世纪以后安提卡的演说家仍称赞他这方面的功绩，雅典法律的全部结构都引用了他的名字。雅典法制的生长方向已由梭伦的基本教义确定，即政治权力应当始终服务于公众。波斯战争期间为民主制出力使为贵族命令效劳黯然失色，因为在爱琴海战胜亚洲人的海军舰队由较穷的雅典人指挥。勇敢地拯救这11 个国家和保存了欧洲文明的那个阶级获得了增进其影响和特权的资格。国家政务，曾经为富人所独占，现在被推翻而对穷人开

放，为确保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部分，最高权力由全体人民分享。

在古代权威崩溃之时，没有公认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权利为迅速变化中的社会制定构架。政体的不稳威胁统治原则。民族的信念开始受到怀疑，然而怀疑并未让位于理智。有一段时间公共职责及私人生活认同于众神的意志。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帕拉斯，雅典的智慧女神，以及发布来自两个最高诗坛之间的神殿之神喻的太阳神为希腊民族贡献良多，旨在保持宗教的崇高理想；但是当经过启蒙的希腊人学会把他们敏锐的理智能力用于他们所承继的信念系统时，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神的概念败坏生活并使公众的心灵退化。公众的道德不能靠公众宗教来维持。不再依靠神的道德命令，也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没有令人敬畏的、由专家来阐述的法律，没有具有神圣名望的人所讲解的教义——没有类似于遥远的东方的国师式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话仍然统治着近乎一半人类的命运。随这些衰败而开始的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推理说明事物之努力。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雅典画廊派和学院派的哲学家把口述的智慧和德行转变成一个持久和意义深远的体系，它大大减轻了后来基督教的任务。但是那个时代还没到来。

那怀疑和转型的时代是伯里克利时代。古希腊人从暧昧的神话走向明亮的科学之光，竭力用某种真理代替能力有限的权威的描述，古希腊知识界的精力也开始被之吸引，这是人类世俗历史中最伟大的运动，即使在基督教完成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以后我们的哲学乃至我们所拥有的政治知识中那些较优秀部分许多也归功于它。伯里克利是雅典政府的领袖，也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传统迅速衰落对政治领域形成压力。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领域，没有权威是不可摇撼的，这种观念呼 12

之欲出。没有能够被完全信任的领导;对于控制或拒绝人类常有罪行之手段,也没有可资利用的标准。公众倾向于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是错的,但是没有检验的办法。从实际目的的角度看人民是善恶知识的基础。因此,人民是权力的基础。

伯里克利的政治哲学包含了这个结论。那些支持财富之人为的支配地位的人,受到他坚决的打击。对于古代权力与土地相联系的观点,他提出权力应当平等普及的思想,就像对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安全一样。他对专制君主宣布,社会的一部分人应当统治全体,或者一个阶级应当为另一个制定法律。这种特权的雄心只不过用于把君主专制改为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如果伯里克利不把公民权限于纯粹雅典血统作为平衡之补偿的话。通过此标准剥夺了 1.4 万人的公民权,他们形成了我们应称之为第三等级的阶级,其人数约与更高的两个等级相等。伯里克利认为每个忽视参与公共事务的雅典人都应该受到全体公民的惩罚。没有人因财产而被排除在外,他让参加的穷人得到报酬,报酬来自国家基金;因为他支配的联邦贡赋聚集的财富超过 200 万英镑。他取得优势的手段是说话的艺术。他的统治靠劝服。一切决定都经过公开细致的辩论,一切影响都服从思想的优势。宪法的宗旨不是确立任何利益的支配地位而是防止它;给劳动者的独立地位和财产安全以同样的关心;保护富人的安全反对嫉妒,以及保护穷人反对压迫,这些思想标志着古希腊政治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几乎使那位构想它的伟大爱国者为之献出生命;充斥整个历史的是通过利用金钱、土地或数量优势打破权力平衡的努力。随之而来的一代人在诗歌和修辞方面的著作从未达到上一代人同样才能,其历史、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仍然不可超越。但伯里克利却没有继承者,没有人能够胜任从他手里传下的权杖。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原则为雅典宪法所采用，这是民族进步的重要一步。但是对那些在投票中失败的人说来就没有补偿。法律不能制止多数的胜利或将少数从数量上被超出的可怕惩罚中拯救出来。伯里克利的压倒性影响消失时，阶级之间的争斗无限制地流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杀戮降临较高的等级，较低等级不可避免地占据优势。雅典人永不安分和探索的精神促使其把握每一制度的理由和每一原则的结果，他们的宪法以空前的速度跑完从幼年到老年的过程。 13

从梭伦第一次承认平民的影响到该国的衰落间隔两代人时间。他们的历史提供了在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下民主制风险的古典范例。因为雅典人不仅勇敢、爱国和富有牺牲精神，而且他们是最有宗教意识的希腊人。他们尊重给他们带来繁荣、平等和自由的宪法，从来未对规定公民大会巨大权力的这个根本法律产生疑问。他们相当容忍各种舆论和声音；他们对待自己奴隶之仁慈曾使最开明的贵族也感到愤怒。因此他们成为靠民主制度繁荣的惟一古代民族。但是拥有无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腐蚀良心，麻木心灵，使君主丧失理智力，也败坏了灿烂的雅典民主制。少数压迫多数是不好的，但多数压迫少数更糟。因为它把潜在的权力留给群众，如果它运作起来，少数人很难抵抗。但面对全体人民的绝对意志，没有上诉，没有补救，除了背叛以外没有避难所。雅典最低微、人数最多的阶级与立法权和司法权联系起来，还部分拥有执行权。那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也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法高于国家法律——立法者则在法律之上。

随之而来的是拥有统治权的人民有权利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除了对自己有利的判断不受任何是非界限的约束。 14 在一次纪念盛会上雅典人宣布如果他们不能做他们选择的任何事将是很可怕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他们；他们决定不受

任何责任的限制，也没有什么法律能够约束他们，除了他们自己制定的。以此方式解放了的雅典人民成为暴君；他们的政府，欧洲自由的开拓者，受到古代所有最有才智者一致强烈谴责。他们试图以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方式来指挥战争，结果他们毁了自己的城邦。像法兰西共和国一样，他们把他们打了败仗的指挥官处以死刑。他们以这样不公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附属国，以致他们失去了海上帝国。他们掠夺富人直到富人密谋与公开的敌人勾结，他们也因苏格拉底的殉难而被戴上罪名。

大多数的专制统治持续了约四分之一世纪，没有任何掩饰，而国家衰落了，厌倦和绝望的雅典人终于承认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认识到为了自由、正义和法律平等有必要对民主制本身作些限制，正如对寡头政治已经做的那样。他们决定再次采取古代的方式，恢复统治权力被从富人那里拿来穷人却还没得到时曾有过的事物秩序。第一次恢复失败了，它仅因修昔底德而被人记起，修氏的政治判断从未出错，他宣布它是雅典人所曾有过的最好政府，该尝试由于具有更充分的经验和更加伟大独特的目的而获得新生。敌对的政党实现和解，并宣布大赦，这是历史的第一遭。他们决定靠赞成来统治。受到传统支持的法律被简化为一种法典：最高会议有不同意见时任何行动都是不合法的。在仍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与满足世代需要和现时观念的法令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付出很多代人心血的法律之构架独立于短暂违反的公众意志之外。雅典人的悔改来得太迟了，已救不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记取，因为它告诉我们全体人民的统治与最大多数和最强有力阶级的统治如同纯粹的君主专制是同样性质的罪恶，基于同样理由需要有防范它的制度，以及应该实行法律的永久统治以反对舆论的革命专制。

与雅典自由的兴衰相平行，罗马也忙于解决同样的问题，它有更强的创造感，也有更为短暂的成功，但最终的结局却远为悲惨。在灵巧聪颖的雅典人把辩论发展为雄辩术的地方，罗马却展开对立力量的斗争。理论政治学并不能吸引罗马人生硬而讲究的天赋。他们并不认为最聪明的方式是解一个难题，而只不过表明有了类似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遵循先例而不是左右当时的发展和精神。他们独特的品性促使他们把自己法律的起源归于先代，为想证明他们制度的连续性以及摆脱革新的主张，他们设想了罗马国王的传奇历史。他们固执于传统之劲头使他们的进步缓慢，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前行一步，同样问题一再出现。共和国的制度史从贵族与平民的较量开始，贵族声称是仅有的真正罗马人，他们想保持从国王手中得到的权力，而平民也想从中分享一份。这种在热切而永不安宁的雅典人那里只进行了一代人的争斗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开始平民被排除在城邦统治之外，他们税赋沉重，承担公务却没有报酬，直到公元前285年，他们才被承认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接下来是150年空前的繁荣和昌盛；最初的争端已达成妥协，如果不是从理论上已加以解决的话，但后来却从中产生了新的斗争，它没有结果。

由于无休止的战争服役而恶化的众多贫困家庭沦落到依附约两千富人构成的贵族的地步，这些贵族分享这个国家的巨大疆域。当这种需要变得强烈时格拉古兄弟试图通过把富人阶级在国家土地中的份额分一些给平民来缓解它。那些出生高贵的 16 古老而著名的贵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他们知道妥协的艺术。后来更为自私的贵族却不能够学会这一点。人的品性为更为严酷的争斗动机所改变。政治权力之争有所节制是英国政党斗争的一个可贵品质。但是以获取物质资料为目标的斗争进行得很严酷，如法国的国内纷争那样激烈。在一场22年的斗争之后由

富人所推动，32 万依赖官方食品供应的人愿意跟随任何允诺他们用革命得到凭借法律不能得到之物的人。

有一段时间代表古代将要消亡事物秩序的元老院强大得足以压倒每一位新产生的公众领袖，直到朱利厄斯·恺撒出现，他受一支军队的支持，这支军队为他在无与伦比的征服生涯中所领导，同时他还受到饥肠辘辘的农民的支持，他靠慷慨的赏赐赢得这些农民，他的统治艺术也高于其他任何人，他通过一系列既非暴力也非不公的手段把共和国改变成君主制。

帝国保存共和国的形式到戴克里先统治之时；但是这位皇帝的意志不受控制，就像保民官胜利后人民之所为。他们的权力是专制独断的，即使在其被广泛分享之时，然而罗马帝国对自由事业的贡献要大于罗马共和国。我这样说的理由并非指那些短暂偶发的事件，如有一些皇帝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众多机会，如涅尔瓦，塔西陀说他把君主制与自由等在其他情况下无法共处的事物结合到一起；或如其赞颂者所宣称，该帝国是完美的民主制。事实上它至多是伪装拙劣和令人憎恨的独裁专制。但是腓烈特大帝是位专制君主；他却有宽容精神和允许自由讨论。17 波拿巴家族是位专制君主；但在他 1805 年摧毁共和国之后没有任何自由派领导者如拿破仑一世那样受到大众的欢迎，拿破仑三世则在 1859 年达到他权力的高峰。同样，罗马帝国在对人类的深切关心上要领先相邻地区的宫殿不少，特别在时间上。穷人得到了他们在共和国徒劳向往的东西。富人生活得比三头执政时更好。罗马公民权扩大到行省的人民。罗马文学中较好的部分和几乎全部民法都属于帝国时代；正是帝国减轻奴役、规定宗教宽容而成为法治民族的开端，并产生了一个完美的财产法体系。被恺撒颠覆的共和制，只能算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令人羡慕地提供公民权保护，却粗暴地对待人权，而让罗马人对其

子女、债务人、奴仆，罪犯与奴隶肆意妄为。这些更深刻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没有体现在市政法的文告上，没有对之作出任何解释，而且思考这些问题的哲学也被屡屡视为叛乱与不忠。可是对于这些思想，希腊人熟烂于心。

最后，155年雅典哲学家卡尼德出现在罗马，肩负一政治使命。在公务之余他作了两次公开演讲，让他的国家那些不谙文字的征服者领略一下兴盛于雅典学派的辩论之风。第一天他讲的是自然正义。第二天他否认其存在，认为我们的所有善恶概念都来自实在法。从那次难忘的炫耀之后，这位被征服的天才就使其征服者着迷。罗马最杰出的公众人物，如西庇阿与西塞罗，专心于希腊模式，她的法学家曾接受芝诺和克律西皮斯的严格训练。

以公元前2世纪为界，那时基督教的影响隐约可见，如果我们根据其实际的立法来作出对古代政治的判断，那么我们的评价就低了。流行的自由概念是不完善的，努力实现之其标准就很宽泛。古代人对权力规则的理解好于对自由规则的理解。他们把那么多的特权集中于国家以致一个人不可能否定其立法或限制其活动。如果我可以用一个不合时宜的表述，古代的国家体制乃是政教合一。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无别；宗教、道德和政治中仅只有一个立法者，一个权威。该国家对教育，对实用科学，对贫穷和无助者或人的精神需要漠不关心，然而却声称发挥了它的全部能力和规定了它的全部责任。个人与家庭，交往与依赖是那样专注于实利，以至于统治者的权力只用于自己的目的。奴隶在其主人手中的情况如何，公民在共同体手中 18 的情况就如何。最神圣的义务也在公众优势面前消失。旅客的存在只是为了船。由于它们忽视个人的利益和人民的精神福祉与发展，希腊和罗马都损害了国家繁荣赖以为基础的关键要素，

家庭的衰落和国家人口的减少毁了它。他们幸存下来的不是他们的制度而是他们的思想，通过这些思想，特别是统治的艺术，他们——

> 人虽逝去，但权杖依存
> 从冥冥中统治着我们的精神。

的确，从他们那里几乎可以追溯到所有暗中破坏政治社会的错误——乌托邦主义、暴政与权力、无法无天与自由之间的混淆。

人原本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只有暴力，没有法律，这样一种观点要归功于克里蒂厄斯。共产主义的最粗糙形式由西诺普的第欧根尼提出。按照这位智者的观点，没有高于利己的责任，没有离开快乐的德行。法律是弱者的一项发明，旨在剥夺优秀者对其优势的合理运用。处罚错误比受错误折磨更好；没有什么好事能比作恶而用不着担心受惩罚更大，所以也没有什么恶比遭受痛苦而复仇无望更糟。正义是胆小鬼的面具；不义是世俗的智慧；责任、顺从和自我否定是欺世者的伪善。政府是专制的，可以随心所欲任性而行，臣民不能抱怨它错待了自己，但是只要他能够逃掉强迫和惩罚他总是愿意不服从。幸福在于得到权力和逃脱必要的服从；即使靠不忠和谋杀得到王位，他仍值得受人羡慕。

伊壁鸠鲁只在很少方面不同于这位革命专制主义道德标准的阐述者。他说，所有社会都建立在互相保护的契约基础之上。19 善与恶不过是方便用语，因为正义与不义的降临犹如晴天霹雳。该反对的不是犯罪过程，而是犯罪者所造成的后果。聪明人设计法律，不是为了束缚自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当它们被证明无用时就会被停止生效。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思想也表现出偏狭

之处，如亚里斯多德说，坏政府的标志是让人们随心所欲自由地生活。

如果你记得最出色的异教徒苏格拉底所知道的人的标准以及行为举止也不比各国的法律更高更好；柏拉图，他的精彩学说是那样接近基督教的期望，以致有著名神学家希望他的著作能得到禁止，以免人们赞同他的观点，而漠视更高的教义——他被承认为是对那位被谴责、遭打击、受惩罚和死于十字架的义人幻像的先知——然而却利用赋予人类的最聪明的才智提出废除家庭和弃婴；亚里斯多德，古代最有才华的伦理学家，看不到劫掠邻边人民使他们沦为奴隶所造成的伤害——而且，如果你想想，在现代人中天才人物的政治学说中罪恶与谬误也不少——那么你就会很明白多么顽固的一堆错误在阻碍着真理的道路：纯粹理性在解决自由政府问题方面像习惯法一样软弱无力；它只能是长期、多方面和痛苦的经验之果实；探寻用神的智慧教育人民珍视和承担自由之责任的方法乃真正哲学的重要内容，该哲学研究旨在

> 坚称上帝永恒
> 并证明人近神的道路为义

但是考察他们犯怎样的错误，如果我揭示的仅是他们思想未必强过行动，那么我给你关于古人智慧的概念就不完全。政治家、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提供了各种各样错误之事例，贵族文学也就在这时诞生，其中保存了政治知识的无价之宝，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展示了当时制度的缺陷。古代人意见最接近一致的是人民的统治权利，但他们又没有能力独自统治。为解决这个难题，为让大众实现对权力的充分分享而不是垄断，他们一般都采用 20

了一种混合政体理论。它们不同于我们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因为现代政体的设计旨在限制专制，而它们的发明则用来约束民主。该思想产生于柏拉图时代——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当早期的君主专制和寡头政治消失时以及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并入罗马帝国以后很久它仍然受到推重。尽管一位交出自己部分统治权力的王公会屈从有关最高力量的主张，而一位放弃自己特权的统治者也会服从理性的影响。但在任何时代均可证明用强制力量作出限制比用说服更为容易。

古代作家清楚地看到每个统治原则持续时间太久、用之过度都会产生反作用。君主制强化成暴君专制。贵族政治浓缩成寡头政治。民主制则扩张为数量统治。因此他们设想通过互相结合来限制每个要素以改变自我毁灭的自然过程，使国家永葆青春。这种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在一起的和谐为许多作家所向往，他们认为它已在斯巴达、迦太基和罗马得到表现，其实在古代，它却是从未实现的一个哲学家空想。塔西陀比其他人更聪明，他最终承认这种混合的政体尽管在理论上令人赞赏，但却难以实现，并不可能维持。他的令人沮丧的坦率之言并未被以后的经验所否定。

把古代人尚不知道的力量——基督教、议会政府和出版自由结合起来的试验经常进行，我不可能一一谈及。然而没有一个均衡的政体持续一个世纪。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取得了成功，那么一定是在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和我们自己的时代；然而我们还不知道民族的智慧能保持这种均势多久。古代人熟知联邦制的制约方式一如熟悉宪法。他们所有的共和国类型都是一个城市自己的居民通过公开的集会实现统治。对许多城市的治理据我们所知仅只有压迫的形式，如斯巴达对迈锡尼人，雅典对提洛同盟，罗马对意大利。在现代，能通过一个中心使众多的人自己

21

管理自己的力量并不存在。平等只能靠联邦主义得以保存；它更经常出现于古代而非现代世界。如果在国家几个部分中的权力分配是对君主专制的最有效抑制，那么在几个国家中的权力分配是对民主制的最好制约。权力中心和讨论的增加促进政治知识的传播，维持舆论的健康和独立。它是对少数的保护以及对自治原则的尊崇。虽然在古代有识见天才的更好成果中对之肯定有提及，但它的产生仍有其必然性，其性质在理论上探索得并不充分。

古希腊人在思索社会问题之时，他们首先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并尽力解释之、辩护之。探索，对我们说来由怀疑而引起，对他们说来则是因惊奇而激发。最杰出的早期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传播一种让有教养阶级持有政治权力的理论，以使一般建立在公众无知和强者利益基础上的政体具有令人敬畏的形式。他鼓吹权力与服从，强调责任重于强调权利，强调宗教重于强调政治；他的理论体系在扫除寡头政治的革命中被摧毁。这场革命后来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关于它的暴行我已有描述。

但是在两个时代之间，在早期毕达哥拉斯的生硬说教与普罗泰戈拉的分裂学说之间出现一位哲学家，他远离两极端，学说颇为费解，在我们时代之前可以说从未有人真正理解或懂得其价值。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其著作保存在狄安娜神庙。该书已遭破坏，如同该神庙和崇拜对象，但其碎片被学者，被神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所收集和解释，他们在世纪的重压和困厄下以认真的态度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上个世纪最有名的逻辑学家采用了他的每一个命题；大陆社会主义者中最出色的鼓动家出了一本 840 页的书纪念他的诞辰。

赫拉克利特声称群众不懂得真理，不知道一个优秀的人抵 22 得过上千人；但是他认为对现存制度不要迷信。他说，斗争是万

物之源和主宰。生命永远是运动,停下来就是死亡。没有人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河流,因为它总是在流动、消逝,从不是同一条河流。在变易之中惟一固定不变的是普遍而至高无上的理性,人们也许都没有察觉,但它为所有的人所共有。法律的维持不是靠人类权力,而是靠源于一种神圣的法。这些说法令我们想起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的政治思想宏伟大纲,从而把对我们大多数文明的现代人的最新教诲提前了,围绕它出现很多阐述与注释。不幸的是,赫拉克利特太晦涩了,以致苏格拉底都不能理解他,我也不敢说做得更好。

如果我演讲的主题是政治科学史,那么最高和最重要的位置当属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一本《法律篇》,另一本《政治学》,是我们可从中学到大多数政治原理的著作,如果我可以相信我自己经验的话。这些伟大的思想大师对希腊政制的分析及其缺点的揭露所具有的穿透力没有被以后的任何作品所超越,包括上个世纪最优秀的政治作家伯克或汉密尔顿,我们自己世纪最出色的作家托克维尔或罗切尔。但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是哲学家,他们专注的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知识的统治。他们看到任意争取自由的灾难性结果;他们的解答是,最好不要为自由而纷争,而是赞成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它谨慎地使人民幸福和繁荣。

如今自由和好政府并不相互排斥;它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走到一起。自由不是为了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国家生活中自由的增加有时会鼓励平庸,给偏见以活力,甚至会阻碍有益的立法,影响战争的能力,限制帝国的边界。如果说在23 开明专制下的英格兰或爱尔兰许多事情搞得更糟,但有些事情

管理得更好;奥古斯都和安东尼治下的罗马政府比马略或庞培时期的元老院更为开明,这个说法似是而非。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宁愿他的国家贫穷、弱小,无足轻重但自由,而不要强大、繁荣和奴役。即使当阿尔卑斯山的小国公民,其影响不出狭隘边界,也好于当其阴影笼罩了半个亚洲和半个欧洲的专制大国的臣民。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自由不是人生应当追求的全部事物的总和或替代物;它的含义确实应当加以限定,其界限则变动不居;文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权利和责任,并把越来越多的负担和限制加之于国民;一个有高度教养和知识的社会会认识到强制性义务的好处,在一个较低的阶段它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自由的进步不是模糊不清或没有限制,而是旨在达到这样的地步,在大众缺少节制之处其优越性反而彰显;一个自由的国家在发展宗教、防止恶行或减轻痛苦方面可以少做一些事,但不要在遭遇重大紧急事件之时退缩为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或作某种集权;最高的政治目标有时应当服从更高的道德目标。我的论点与所描述的这些思想并不矛盾。我们正在讨论的不是自由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我们在寻找这样一种影响,它能置专制权力于控制之下,或使权力扩散,或诉诸一种能超越所有政府的权威,对于这些影响,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考虑到。

是斯多噶学派把人类从对暴君统治的服从中解放出来,他们关于人生的明智而高尚的观点填补了古代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鸿沟。斯多噶学派看到,认为任何地方的法律都应当明智和公正是多么不可靠,一个民族的统一意志或举国赞成的东西容易出错,他们超越这些狭隘的界限,超越较低层次的法令,而寻求应当成为人生和社会存在的指导原则。他们声称有一种意志优于人们的所有意志,有一种法律支配着梭伦和莱库古的法律。24 他们的好政府试验遵从的原则能够追溯到一个更高的立法者。

那个我们必须服从，必须为之减少人间的权威乃至牺牲每一个世俗兴趣的是永恒的法，它完美而不朽，一如上帝自身，他的动力来自他自己，他统治天地万物并君临所有国家。

这个伟大的问题发现，不是政府规定什么，而是它们应当规定什么；因为任何违背人类良知的规定都没有合法性。在上帝面前，不分希腊人或野蛮人，不分富人或穷人，奴隶和他的主人一样的善，因为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的；他们都是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共和国的公民，都是我们家庭的兄弟，上帝的孩子。我们行为的真正指导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上帝的声音，他就居住在我们的心中，他知道我们的所有思想，我们对真理的所有认识乃至我们行为的所有善都要归功于他；作恶在于自己，德行则来自内在的圣灵的恩典。

那个神圣的声音是如何教导的呢，那些吸取了画廊学派的崇高伦理学的哲学家继续阐述道：按照成文法行动，或给所有人应有权益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给他们更多，应当宽厚和仁慈，献身于他人的利益，在自我否定和牺牲中寻得我们的回报，这样做的动机是出于同情而不是个人的好处。因此我们对待他人必须像希望他人这样对待我们一样，必须善待我们的敌人，并坚持一生，即使他卑鄙无耻和忘恩负义。我们必须向恶开战，但把和平留给人类，宁受惩罚也不干恶事。真正的真理，斯多噶学派雄辩地说，在于服从上帝。一个按这样的原则统治的国家其自由将远超过希腊或罗马；因为他们打开了宗教信仰自由之门，关上了奴役之门。芝诺说，无论征服还是购买，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

这些学说为帝国的伟大法学家所采纳并运用。他们说，自然法优于成文法，奴隶制与自然法相抵牾。人们没有权利任性而行随心所欲，或从他人的损失中得益。这就是古人的政治智

慧，它涉及到自由的基础，如我们所发现，其最高的发展在芝诺、塞尼卡和亚里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的著作中。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印象是，为《福音书》作了伟大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完成于使徒传道的前夜。圣奥古斯丁在引用塞尼卡的话之后惊呼："一位基督徒能比这位异教徒说得更好吗？"这些文明的异教徒在没有新教义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点，新教义的出现还有待时日。我们已经看到希腊思想领域之广阔与光彩，它已把我们带到一个更伟大王国的门槛。以后的大部分经典说的都是基督教语言，它们则与其精神相近。 25

但是所有我能够引用的古典文献都缺少三样东西——代议制政府、奴隶解放和良心自由。诚然，有人民所选出的有审议权的立法会议和城市同盟存在，亚洲和非洲都有很多这样的联盟，它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到联盟议事会。但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政府即使在理论上也闻所未闻。允许某种程度上的信仰自由与多神教的性质相一致。当苏格拉底公开声称他必须服从神而不是雅典人的意志，以及当斯多噶学派视这位智者高于法律时他们的语言就很接近该原则了。但它第一次被法律明文规定，并不是在多神教的和哲理化的希腊，而是印度的阿育王，他是最早的佛教国王，时间在耶稣诞生前250年。

奴隶制远比缺少信仰自由是古代文明长期受诅咒和谴责的地方，虽然其正当性早在亚里斯多德时期就有争议，它也受到几位斯多噶学派的含蓄否定，如果不是明确否定的话，但希腊和罗马的道德哲学，还有其实践都明确地表示支持奴隶制。但是在此方面及其他一些事情上有一些人例外，而预示着更纯洁的教规将要到来。亚里山大里亚的斐洛是这些作家之一，他的社会观最为先进。他不仅赞成自由而且赞成平等地享有财产。他相信经过纯化的有限民主制是最完美的政体，它将会逐渐扩展到

全世界。他把自由理解为对上帝的追随。斐洛并不绝对地否定奴隶制,虽然他要求把奴隶的生存条件与他天性的更高要求相比较。但是他记下了巴勒斯坦的艾赛尼派的习俗,他们把绅士的智慧和犹太人的信仰结合起来,过着纯洁的生活而不受周边文明的污染,他们第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拒绝奴隶制。他们组成了一个宗教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国家,他们的人数不超过四千。但是他们的榜样证明有高度宗教意识的人甚至在没有《新约》启示的情况下能够把他们的社会观念提升到一个怎样伟大的高度,以及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提出最强有力的谴责。

这就是我们的考察所带来的结论:在政治学和人权体系中几乎没有一个真理不被这些睿智的绅士和犹太人所把握,虽然他们没有把后来作家所不可能超越的精彩思想和高尚表现公之于众。我也许可以花几个小时向你引述自然法和人的责任的段落,它们是那样的神圣和富有宗教意识,以致它们虽然来自雅典卫城的异教剧院和罗马广场,你仍然会相信你是在倾听基督教堂的圣歌和被委以圣职的牧师的讲道。虽然索福克利斯、柏拉图和塞尼卡这些伟大的古代教师格言和公众德行的光辉榜样在所有人口中流传,但他们仍无力量改变古代文明的命运,为此耗费了那么多爱国志士的鲜血以及这样一些作家无可比拟的天才而终告徒劳。古代民族的自由毁于令人绝望和无法避免的专制主义之下,他们的活力被耗尽,这时新的力量出现于加利利,带给人类所需要的知识,以拯救社会和人类。

如果我试图指出基督教的影响逐渐渗入国家的无数渠道那就太自以为是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个注定惊世的行动将缓慢地显示出来。基督教对所有的民族宣布,它在文明的许多阶段和几乎每一种政体下都没有政治团体的性质,它的布道专注于个人,并不向公共权威挑战。早期基督教避免与政

府接触,放弃官方的责任甚至不愿在军队服役。他们珍视的不是当这个世界上一个王国的公民,他们对帝国已经绝望,它太强大了以致无法抵抗,也太腐朽了,已不能改变,其制度作为异教徒许多世纪的工作和骄傲已经得到其神祇的支持,这些神被基督徒视作魔鬼,它的手上沾满一代代殉难者的血,已无望再生,注定要毁灭。他们是那样恐惧,以致把国家的灭亡想像成教会的末日和世界的末日,没有人会想到在那些给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帝国带来耻辱和毁灭的破坏者种族中有精神的无尽未来和社会影响在等待着他们的宗教。在他们心目中政府的责任不及个人的德行和主体的责任;又过了很久他们才认识到权力在他们信仰中的分量。几乎到克里索斯托时代他们才从专注于义务到解放奴隶。

自我依赖和自我否定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它清楚地写在《新约全书》以及《国富论》中,但直到我们的时代才被承认。德尔图良为基督徒的消极服从而自豪。迈力托写信给一位异教皇帝,好像他不能够发出一个不公正的命令;在基督教时代奥泼塔特认为无论谁冒昧从他的统治中寻找缺点都会把他本人颂扬得近乎神一般。但是这种政治寂静主义不是普遍的。早期最有能力的作家奥利金谈到赞成摧毁暴政的密谋。

4 世纪以后反对奴隶制的宣言认真而且接连不断。2 世纪的牧师以一种神学的但却是异教的智慧主张自由,4 世纪的牧师则主张平等。统治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实质性的变化。民众政府已经存在,还有混合政府和联邦政府,但是没有有限政府,没有一个政府其权力的范围被外在于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定。这是哲学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没有政治家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宣称赞成一个更高权威的人的确想在政府面前设一道屏障,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它。为了抗议改造过的民主

的暴政，苏格拉底惟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死。斯多噶学派也只能向这位智者建议对政治冷淡，让未成文的法律在自己心中。但是基督说："让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让上帝的东西归上帝"，这是他在去世三天前最后一次到神殿时说的，这番话把从未享有过的神圣和从未承认过的界限给予愿保护良心的世俗权力；它们是对专制主义的否定和自由的开端。因为我们的主不仅发布此项教规，而且也创造了执行它的力量。为了在一个至高的领域保持必要的豁免，把所有政治权威减缩到有限范围，那就不要有当一名有耐心的理性主义者的期望，永远地参与和关心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制度和最有普遍意义的联合。新的法律，新的精神，新的权威，赋予自由一种意义、一种价值，它是希腊或罗马的制度或哲学所没有的，只在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之知识以后才出现。

二、基督教自由史*

29

当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中心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时，他在这个新首都的集市广场上建起一座来自埃及的斑岩柱，关于它有一个奇怪的故事。他在一个墓穴里秘密埋下7个罗马帝国的徽章，它们由维斯太神庙的贞女所授予，该神庙的火也许从不熄灭。他在顶端竖起一座阿波罗的像，代表他本人，四周有十字架的碎片；他加冕的王冠光芒四射，其光芒来自耶稣受难时使用的钉子，该钉子据信是他母亲在耶路撒冷发现的。

斑岩柱，这个皈依了的帝国留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纪念碑，仍然矗立着；曾刺穿基督身体的钉子变成异教式偶像崇拜的适当装饰，它以一位在世皇帝命名，恰好指示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帝国结构中的位置。戴克里先把罗马政府改造成东方式专制政体的企图为基督教带来最后的也是最严重的伤害。而君士坦丁，采纳了他们的信仰，但是他既不想放弃他前任的方针政策，也不想宣布热衷于贵族权力，而只不过是利用一个宗教的支持加强他的王位；这个宗教曾抵抗他的权力使世人皆惊。他还自己设 30 立了大主教，得到其绝对支持而消除了不利因素，从而巩固了他

---

* 本文与《古代自由史》首次是作为阿克顿勋爵于1877年2月26日和5月28日在农艺大厅对布里奇诺思学院成员所作的两个演讲《古代自由史》与《基督教自由史》而发表

在东方的统治。

没有人警告他发展基督教他就缚住了自己的一只手，交出了恺撒的特权。由于承认教会的自由权和至上地位，他也被要求保护其统一。他同意履行这项义务；他接受其原理；基督教徒的分离给他的继任者提供很多机会，扩展保护关系，防止从此主张倒退和减少帝国的力量。

君士坦丁宣布他本人的意志等于教会的法规。查士丁尼则认为，罗马人民正式赋予皇帝完全和充分的权力，因此，皇帝的意愿，无论通过法令还是信件，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这个拥有精致文明的帝国皈依的火热年代，古代所累积的智慧，罗马法的合理转用，乃至从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教世界所承继的全部遗产均使教会成为专制主义一个精心装饰的精神支柱。一种文明的哲学，乃至罗马的所有智慧，甚至还有基督徒的信仰与德行均不能改变古代根深蒂固的传统。超越所有这些想法和经验需要某些东西——一种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就像语言一样属于民族的素质，并随其生长而生长。这个至关重要的品质在那些具有繁华古代文明外观的国家中由于许多个世纪的战争、混乱和压迫已经耗尽，但却因压倒西方帝国的移民洪流的促成而沉淀在基督教世界的土壤里。

罗马人在其力量极盛时就发现有一个种族从未在一个君主手中失去自由；帝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以一种既含混又激烈的感情指出他们如果还未被专制力量所征服，那么未来的世界将属于这些野蛮人。他们在有国王时其国王并不主持议事会；他们有时是选出来的；他们有时被废黜；他们受束于必须按大家愿望行事的誓言。这是朴素的共和主义，它对君主制的赞同不过是一时偶发事件，而它对所有自由人共同具有的至上地位以及选举人的权威高于所有被选举人权威的牢固坚持是议会政府的久

31

远萌芽。国家的行动限于有限领域;国王是国家首脑,身边为很多随从所环绕,这些随从与其有个人的或政治的联系。他的亲兵若不服从或抗拒命令比一个妻子、一个孩子或一个士兵这样做更不能容忍;如果首领需要,随从也许会去杀自己的父亲。因此这些条顿公社认可有一个独立的政府,预示着社会的解体;对人的依赖有害于自由。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合伙的制度,但对个人安全并不提供保证。国家不可能压迫其臣民;也不能够去保护他。

条顿人向罗马文明地区大迁移的第一个结果是使欧洲倒退很多世纪,几乎比梭伦拯救雅典时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希腊人保存的古代文学、艺术和科学,还有早期基督教的所有神圣纪念物品——这些流传至今的残章断篇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观念——甚至保加利亚的农民都对《新约全书》熟烂于心;而西欧沦人这样一些统治者之手,其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写自己的名字。精确推理的能力,准确的观察力已绝迹500余年,甚至社会非常需要的科学、医学和几何学也都丢失,直到西方的教师到阿拉伯人支配的学校去求学。把秩序带给混乱,孕育一种新的文明,把敌对势力和不平等的种族融合成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武力。几个世纪的进步与这样一些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克洛维、查理曼和诺曼人威廉,他们都独断专横、霸气十足和鼓励服从。

渗透在古代社会中年代久远的异教精神除结合进教会与国家之外不可能消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出现的普遍精神产生了拜占廷专制主义。帝国的神学家不能设想基督教的繁荣能越出其边界,而主张不是国家在教会,而是教会在国家之中。在西罗马帝国迅速崩溃,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域之前,这个 32 学说很少被表述出来。马赛的牧师塞维诺声称随着罗马的瓦解

而衰朽的社会道德在异教入侵者那里存在，且更纯净更有希望。他们的皈依迅速而容易；一般都是其国王皈依的结果。

基督教早期的注意力放在普通大众，并依靠自由的原则，如今诉诸于统治者，把强大的影响力投向权力阶级。这些野蛮人目不识丁，没有世俗的知识，除了牧师的学校外没有受过教育，也几乎不需要那些宗教入门书的指导，而孩子气般地对那些满脑子都是圣经、西塞罗与圣奥古斯丁手稿知识的人感兴趣；在这个思想稀缺的世界，教会被认为远比新建立的国家更重要、更强大、更神圣。教士给新政府提供行为方式，因而免除税赋，免除地方民事法官和行政的管辖权。他们教导说权力应当由选举产生；托利多议事会完成了西班牙议会制度的框架，它存在已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制度。但是哥特人在西班牙的专制统治，以及撒克逊人在英格兰的专制统治均已结束，当时君王有贵族和高级教士所环绕，而具有自由制度的外观；兴旺发达并使其他人相形见绌的是法兰克人，他们没有生来就有的贵族，他们关于王位继承的法律一千年来成为一种顽固迷信的固定对象，直到他们治下封建制度的发展将其超越。

封建主义使土地成为万物的标尺和主宰。由于除土地产品外没有其他的富源，人们依赖领主以免饿死之虞；因此他的权力压倒国民的自由以及国家的权威。法国的谚语说，每一个男爵都是他自己土地的主人。西方国家置于地方权贵和专制君主竞争对抗的暴虐之中，这时候一次暴力场面只是证明封臣及其主人的一次优胜。

在征服时期，诺曼人毁掉了英格兰的自由，来自德意志森林的撒克逊人、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带来的蛮野之风渐渐退去。后来由城镇的产生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所推动的公众政府新要素尚未活跃起来。惟一有影响能抵抗封建等级制度的是教会的等级

33

制度；当封建化的过程威胁到教会的独立时它们就会发生冲突，如让高级教士各自向国王履行人身依附的仪式，这种仪式是条顿国家所特有的。

我们把公民自由的产生归功于那400年冲突的历史。如果教会继续支持受其施洗的国王掌权，或该斗争在一场不可分割的胜利中迅速中止，那么整个欧洲都将陷入一种拜占廷或莫斯科式的专制统治。但是两个争斗集团的目标都是绝对的权力。虽然自由不是它们斗争的目的，但它却是这样一种手段，世俗的和精神的力量通过它能够唤起民族的支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城镇市民赢得了自己的公民权，法兰西得到了她的三级会议，英格兰的议会则来自相互竞争时期；只要它持续下去它就阻止神权的产生。有一种倾向把王权当作一种承继的财产，受家庭占有的不动产法律支配。但是宗教的权威，特别是教皇职位的权威有赖于否认国王不可剥夺的授予权。在法国后来被称作高卢教会派的理论主张王室高于法律，只要身上流有圣路易高贵血液的帝王还在，王权就不会结束。但是在其他国家忠诚誓言宣誓本身就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行为良好时才得以履行；它必须与公共的法律相一致，这些法律是所有君王必须遵守的，如向约翰王宣布发动一场反对男爵的造反，以及把爱德华三世扶上王位而剥夺他父亲权力的人都求助于这句格言："*Vox populi Vox Dei*（民之声天之声）"。

提高人民神圣权利和降低王公影响的学说在得到宗教界认可以后基础更为广阔，强大得足以与教会和国王对抗。在布鲁斯王朝和金雀花王朝为苏格兰和爱尔兰所有权的斗争中，英格兰人的主张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但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拒绝接受，苏格兰议会致教皇的信件显示这种人民的学说根扎得是多么牢。谈到罗伯特·布鲁斯，他们说："我们誓死捍卫神圣的上 34

帝，捍卫国家的法律与习惯，是人民的选择使他成为我们的国王。如果他背叛他的原则，认为我们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那么我们将视他为一个敌人，是我们权利和他自己权利的破坏者，应该选别人来代替。我们关心的不是荣耀或财富，而是自由，没有一个真正的人会放弃它而活着。"对王权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很自然地会十分敬重那些经常与统治者斗争的人。格列高里七世贬低世俗权威时说，它们是魔鬼的作品；在他的时代，两党都被迫承认人民的主权，把之视作权力的直接来源。

两个世纪以后这种政治理论在属于教皇党的圭尔夫派与吉伯林派或帝国党人中得到肯定并运用。最著名的圭尔夫派作家观点是："一个不忠于自己职守的国王违背了忠顺的诺言。废黜他不算造反，因为他也是一个反叛者，人民有权利拉下他。但最好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能滥用它。为此目的，全体人民应当参与自治；其政体应当是有限的和经过选举的君主与功勋贵族以及这样一种混合民主制的结合，应当允许所有阶级通过公民选举参与公务。没有人民的决定任何政府无权征税。所有政治权威来自人民投票选举，所有法律都必须由人民或他们的代表制定。只要我们依赖于别人的意志，我们就没有安全感。"这段话是辉格党革命理论的最早阐述，它引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培根勋爵说他是学院神学家最大的天才。在西门·德·孟特福召集平民院这个非常时刻看到阿奎那所写的这些东西一定觉得很有价值；那不勒斯托钵会修士的政治主张领先英国的政治家几个世纪。

吉伯林党最有才华的作家是帕多瓦的玛西留斯。他说："法律的权威来自全体国民，没有其同意就无效力。因为整体大于任何部分，因此任何部分为整体立法是错误的；因为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束缚于另一个人制定的法律是错误的。但是服从全

35

体人民都同意的法律，全体人民实际上是自己统治自己。君主由议会所立，执行议会的意志，应当备有足以压服个人的力量，但是不能控制人民大多数。他对全体国民负责，并受法律的制约；国民任命他，分配他以职责，还必须观察他服从宪法的情况，如果他违反就解除他。公民的权利与他们所拥有的信仰无关；没有人会因为他的宗教受惩罚。"这位作家在某些方面看得比洛克或孟德斯鸠还要远，他对于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立法权高于行政权以及良心自由这些支配现代世界之原则的把握是那样坚定不移，而他生活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距现在250年。

这两位作家在所争论的话题上有这么多基本点意见一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属于敌对的学派，其中一位曾认为另一位该死。圣托马斯曾想让教廷控制所有的基督教政府。玛西留斯曾想让神职人员服从国家的法律，还想控制他们的财产和人数。随着大争辩的继续，许多事情逐渐变得清楚，而成为确定的信念。因为这些并不仅仅是超出同代人水平的先知心中所想；而且是他们将要支配实际世界的前景展望。古老的贵族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十字军打开的东方之路给工业一个大大的促动。从乡村到城市均出现一股新潮流，而在封建体系中没有城市政府的位置。当人们发现一种谋生方式，它不需要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意志，于是领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它们开始变成动产的所有者。城镇居民不仅摆脱了主教和男爵的控制，而且因自己的阶级和利益成为国家的主宰。

14世纪充满了民主制度与骑士制度之间纷争的骚乱。处在知识和文明前沿的意大利城市的民主制属于一种理想的总的说来不切实际的类型。瑞士摆脱了奥地利的统治。莱茵河流域的自由城市出现了两个长长的系列，穿过德国的心脏。巴黎的市民俘获了国王，改造国家，开始他们统治法国的惊人试验。但 36

是在所有大陆国家中比利时地方自治自由的成长最健康也最有活力，它在那渺不可考的年代就顽强地执着于自治的原则。佛兰德斯城镇所集中的资源是那样巨大，民主运动是那样广泛，以致对新的利益是否不会成功，军事贵族等级的优势地位是否转移到经商者的财富和知识那儿有着长时间的疑虑。但是里恩奇、马赛尔、阿特维尔德及那个时期不成熟民主制的其他捍卫者徒劳一生。中产阶级的动乱展现了下层正在受苦的穷人的需要、感情和希望；法国和英国可怕的暴乱引起一种反作用，它妨碍权力的重新调整达几个世纪，在民主的轨迹中产生了社会革命的红色幽灵。根特的市民武装被法国的骑士所粉碎；君主制独自收获阶级地位变化之果实，这些变化还在继续，并打动人们的心。

回顾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千年历史，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给一评价，如果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趋向于完善，但至少趋向于达到对政治的真理性认识。我们所发现的是：古代人所不知道的代议制政府几乎已很普遍了。选举的方法很粗糙；但是不经付钱阶级同意任何税都不合法原则——也就是说，税与代表权不可分——不是作为某个地区的特权，而是作为所有人的权利得到承认。菲利普·德·考明斯说，没有人民的同意世界上没有一个王公能征到一便士税。奴隶制几乎在所有地方绝迹；绝对权力肯定比奴隶制更加不可容忍，更属于犯罪。反抗的权利不仅被允许而且被宗教法规升华为一种责任。其至人身保护法的原则与所得税方法也为人所知。古代政治学争论的是一种置立于奴隶制之上的专制国家。中世纪的政治果实在于国家的制度，在此制度中权力受限于强大阶级的代表权，受限于特权的联盟，受限于责任高于受命之人的有关知识。

在关于实现被认为善的事物方面实际上几乎做了一切。但

37

是伟大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是，16 世纪如何使用中世纪储存的财富？该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是曾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影响之衰颓。在印刷发明 60 年之后，欧洲出版了 3 万本书，但还没有人印希腊文的《圣经》。在那时每个国家都视信仰统一为第一要务，人们认为人的权利、邻里的责任以及统治者对他们的责任均随其宗教而变；社会并不承认对一个土耳其人或犹太人，一个异教徒或异端分子，或一个崇拜邪恶的人像对一位正统的基督徒一样有同样的义务。由于优势宗教在变弱，国家声称为自己利益有按例外原则处置自己敌人的特权；政府的目的就能证明所使用的方法的正当性；这个思想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得到系统的加工。他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很认真地为扫除意大利明智政府的障碍而焦虑。对他说来理智最伤脑筋的障碍是良心；如果政府听任自己被那些平庸的观念所妨碍，就不可能施行为成功完成某困难计划必须热心使用的权术。

他的厚颜大胆的学说在以后的年代里受到身居高位者的承认。他们看到在关键时候好人难得有力量行善，而是让位于那些抓住该谚语含义的人：你不敢打破蛋就不可能炒鸡蛋。他们认为公共道德不同于私德，因为没有政府甘愿受辱，或认为仁慈好于公正。他们不可能规定差别或划出例外的界限；否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行为除了上苍在这个世界上所成功宣布的公正以外还有其他的标准。

马基雅维里的教导几乎不能通过议会政府的检试，因为公众讨论至少需要显示有好的信念。它通过压制有强烈宗教意识的国王的良心和削平善恶来给专制主义以大大推动。查理五世为谋杀一个敌人提供 5000 克朗。费迪南一世和费迪南二世，亨利三世和路易十二，每个人都阴险地致他最强有力的臣民于死地。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亚特都试图对对方下同样的事。为 38

专制君主战胜一个更好时代的精神与制度铺设道路的不是孤立的邪恶行为，而是一种对罪恶进行沉思默想的哲学，道德感被彻底扭曲，以致出现从斯多噶学派改革异教道德以来从未有过的道德滑坡。

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奴隶制的长期斗争中多方面为自由事业服务的神职人员，如今已与王权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有一些按宪法模式改革教会的尝试，它们都失败了，但是它们使僧侣和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分权制度这个共同的敌人。在法国和西班牙、西西里与英国，强大的王权能迫使灵界就范。法国的绝对王权在随后两个世纪一直受到12位红衣主教的追捧。西班牙的王权通过重建和擅用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而几乎一举得到同样的效果。这种裁判所虽已逐渐过时，但现在却成为他们实行君主专制有效而可怕的武器。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欧洲的变化，从玫瑰战争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到对暴政低声下气、纵容默许，这种暴政是亨利八世统治及他同时代的王权的标志。

当宗教改革运动于维滕堡兴起之时，专制浪潮潮流急转直下。人们希望路德的影响能抗住专制主义的洪流。因为他到处遇到教会与国家的联盟，他自己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也控制在罗马教廷的充满敌意的高级教士手中。他也的确害怕世俗的敌人甚于害怕精神的敌人。德国大主教希望新教控制在罗马教廷的充满敌意的高级教士手中的要求能够得到承认；教皇本人徒劳地要求皇帝实行一项安抚性政策。但是查理五世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并企图伏击他；巴伐利亚公爵杀死并焚烧他的信徒。但城市的民主派一般站在他一边。对革命的恐惧仍深藏在他政治思想的最深处。圭尔夫派牧师已把使徒时代的消极服从放到脑后，其解释具有中世纪的特点，这是路德不同意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度转向；但他政治学说的实质仍充分保留下来，路德

39

派政府成为僵化停滞的堡垒，路德派作家经常谴责产生于宗教改革第二阶段的大众文学。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在把自己的事业与政治混合在一起方面比德国人更大胆。苏黎士与日内瓦是共和国；它们政体的精神影响到茨温利和加尔文。

茨温利确未回避撤换讨厌的地方行政官这种中世纪观点；但他死得太早了，导致具有新教政治特征的行为没有深入或未能持续。加尔文虽然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但他仍声称人民不适合自己统治自己，宣布群众集会是一种应当废止的权利滥用。他希望一种选举的贵族统治，备有惩治手段，不仅惩治犯罪，而且惩治邪恶和错误。他认为严酷的中世纪法律已不足以满足时代之需要；他赞成使用最难以抵抗的武器，即把审判程序交到政府手中，其拥有严刑拷打犯人的权利，不是因为他们有罪，而是因为他们的罪不可能得到证实。他的教诲虽然未想促进民众体制，但它对与君主制相联系的权威仍充满敌意，以致他的法文版《法律概要》(*Institutes*)中表述的政治观点已有所缓和。

宗教改革所直接产生的政治影响小于预期。大多数国家都很强大而足以控制它。一些国家通过紧张的活动堵住将要决堤的洪水。另一些国家以完美的技巧使之为己所用。那时只有波兰政府听其自然。苏格兰是宗教改革战胜政府抵抗的惟一王国；爱尔兰则是它尽管有政府支持也未能成功的仅有例子。但几乎在其他任何场合，到处游说的王公和那些对立者都会利用热心、忧虑和激情作为增强权力的工具。人民为了保持他们的信仰给他们的统治者每一种所需要的特权，所有的目标旨在区分教会与国家，防止它们权力滥用的手段在严重的危机中被统统抛弃，这样的工作已有数代。残酷行为的出现，宗教感情常只是工具，政治则是动机。

40

狂热通过群众表现出来，但群众也很少狂热。归于狂热的

罪行多是冷漠政治家的策划。当法国国王同意杀死所有的新教徒时，他是受到来自他自己官僚的压力。没有地方公众自发采取这个行动，许多城市以及所有省的地方法官都拒绝服从。宫廷的动机与纯粹的狂热相距甚远，以致王后立即要求伊丽莎白对英国的天主教徒干同样的事。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把近百名胡格诺派信徒送上火刑柱，这些信徒不过热情而勤奋地宣传德国新教而已。尼古拉斯·培根是镇压英国群众的几名大臣之一。然而当胡格诺派过来避难时他如此厌恶，以致用简短的方式提醒国会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对待落入手中的法国人方式。约翰·诺克斯认为苏格兰的每一位天主教徒都应该被处死，没有哪个信徒的性格比之更为严厉或更为残酷。但是他的忠告无人听从。

所有贯穿宗教冲突的政策均出自上层之手。当最后的宗教改革家去世时，宗教不再去解放人民，而代之以谴责暴君的罪行。加尔文布道和贝拉明演讲，但马基雅维里是主宰。在该世纪结束前有三个事件发生，它们标志着一个重大变化的开始。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使大多数加尔文主义者相信对暴君造反的合法性，[①] 他们开始拥护温切斯特主教所倡导、诺克斯与布坎南所接受的学说，该学说是他们通过在巴黎的老师从中世纪的学校学来的。它的采用乃是由于对法国国王的反感，很快在实践上用于反对西班牙国王。反叛的尼德兰通过一个正式的仪式罢黜了菲利普二世，宣布在奥兰治公爵领导下独立。奥兰治公爵曾经并继续被称为海军上尉。他们的榜样很重要，不仅因为一个宗教的臣民罢黜了另一个宗教的君主，而且因为它以共和制代替了君主制，并迫使欧洲的公法承认这个已完成的革命。

41

① 参见波耐特：《论政治权力》。

与此同时，法国的天主教徒起来反对亨利三世这位最卑鄙的暴君，以及他的继承人纳瓦尔的亨利，他作为一个新教徒对抗民族的大多数，用剑和笔为同样的原则而战。

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相互答辩的书可以装满很多书架，其中包括有文字以来最有理解力的法学论著。几乎所有的书都受到一种缺陷的损害，该缺陷使中世纪的政治文献大为减色。如我所显示的，那些文献极为出色，其对人类进步的贡献非常之大。但是从圣伯纳德去世到托马斯·莫尔先生《乌托邦》出版，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服从于教皇或国王的利益。那些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人总是想以法律影响天主教或新教。诺克斯威吓他所谓"可怕的女子团"，因为王后求助于群众，玛丽安娜对暗杀亨利三世者表示称赞，因为这位国王与胡格诺派信徒结盟。我相信，有权利谋杀暴君的信念最先是由沙利兹伯里的约翰在基督徒中传授的，他是12世纪最著名的英语作家。接着由罗吉尔·培根再次确定，培根是14世纪最著名的英国人，在他的时代有巨大影响。没有人把政治很认真地设想成一种关于正当和不正当的法律，或试图找出一套应当妥善持有的原则，就像所有宗教改革一样。胡克的《教会政府》在我提及的著作中几乎可以说超群独立，每一位有思想的人读之都十分钦佩，视之为我们语言中最早和优秀的古典散文。其他人的著作虽然没多少幸存，但它们都有助于将有限权力和有条件服从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从理论时代传给后来的数代自由人。甚至布坎南和布歇的粗暴歪曲也成为联结希尔德布兰德与长期国会以及圣托马斯与埃德蒙·伯克争论的传统链条的一环。

人们应当明白政府不存在神圣的权利，专制政府是对神圣权利的违背，这些无疑是医治使欧洲倍受折磨的疾病之良药。[42] 但是虽然对这个真理的理解可以变成一种有益的破坏因素，但

它对进步与改革仍不能提供多少帮助。对暴政的抵抗并不意味着有能力建设一个法治政府作为代替物。绞刑柱也许是个有用的东西，但犯人因悔过自新而活下去更好。能在政治中区分善恶以及使国家值得延续的原则尚未发现。

法国哲学家沙朗是最少受政党精神所腐蚀、最少为某种特殊事业的热情所蒙蔽的人之一。在一段几乎逐字引自圣托马斯的论述中他谈到我们对所有法律都必须与之一致的自然法的服从；他确定自然法不是通过宗教之光的显现，而是根据普遍理性的声音，这种声音乃上帝对人类意识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格劳修斯划出了真正政治学科的界限，在收集国际法材料的过程中他必须超越国家法规和教派利益而追求一种包容全人类的原则。他说，即使我们猜想上帝不存在，法律原则依然垂之久远。他这些不准确的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是这些法律的发现必须独立于启示之外。从那时候以来政治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与原则和良心相关的科学，因而在所有其他事情上意见不尽相同的人和民族能够在同一种法律的制约下和平共处。格劳修斯自己并未想过运用他的发现，因为他承认统治权可作为一种终身权利无条件享有。这个学说因而没有立即产生效果。

当坎伯兰与蒲芬道夫展示他自己学说的真正意义时，每一原有的权威，每一占优势的利益都惊恐万状。没有人愿放弃靠力量或技巧所得来的利益，因为他们虽然不与摩西十诫相矛盾，却与一部尚未产生的人类法相矛盾，对于这部法，格劳修斯尚未写之，更没有有识之士赞同。显然所有了解政治科学事关良心而不是能力或权术的人都必然视他们的对手为无原则的人，他们之间的争论永远包括道德问题，但不可能为善良动机所主宰，这种动机使宗教纷争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几乎17世纪的所有伟人都拒绝革新。18世纪格劳修斯的两个思想——有一些

43

政治真理，每一国家和每一利益集团必须坚持否则就会垮台；社会是由一系列真实的和假定的契约所编织的网络——在其他人手中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当王权通过法律不可逆转和持续不断的运作而压倒所有敌人和所有对手时，它变成了一种宗教。其古代的对手，男爵和主教也摇身一变，成为支持者站在它一边。在整个大陆代表自治省和特权阶级的会议最后一次召开后就停止了；人民已满意地学会敬重国王为他们统一的建设者，繁荣和强盛的促进者，正统教义的捍卫者和才智之士的雇佣者。

波旁家族的权力夺自一个反叛的民主政府，斯图亚特家族也是个篡位者；他们都持有这样一种理论：国家形成于勇气、谋略以及与王室家庭的适当通婚；因此国王优先于人民，他是其制造者而不是其产品，其统治不依赖于同意。神学以消极服从来加强神授王权法。英国圣公会最博学的神职人员乌舍尔大主教和法国最有才华的波修特宣称对抗国王是一项罪行，国王有权压制其臣民的信仰。哲学家们也认真地支持神学家。培根把他的全人类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强大君主的身上。笛卡尔建议他们镇压所有能够抵抗他们权力的人。霍布斯则教导说权力总是正确的。帕斯卡尔认为改革法律或建立一种与现实力量相反的理想正义是荒谬的。甚至身为共和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斯宾诺莎也给予国家对宗教的绝对控制权。

君主制的魅力超过人的想像，它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粗陋精神。听说查理一世被处决，有人竟震惊致死；同样的事情发生于路易十六和恩格金大公身上。绝对君主制的典型土壤在法国。黎塞留认为如果人民受到善待就不可能压服他们。这位首相断言如果没有任意逮捕和流放权法国就不可能得到治理；要保持稳定，牺牲上百个无辜的人也在所不惜。财政大臣声称要求国王守信践诺是煽动叛国罪。一位与路易十六有密切关系的 44

人说即使对王权有一点点不服从也是一桩当诛的死罪。路易把这些概念推向极端。他坦率地承认国王受一项法律用语的约束并不比一句恭维话更多;臣民所拥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他不能合法地拿走。沃邦元帅为人民的悲惨状况所惊骇,建议废除现存的所有税而代之一种相对较轻的税,国王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保留了所有的旧税而强加了新的。他以现在人口的一半养活一支 45 万人的军队;几乎是后来拿破仑皇帝向德国进攻兵力的两倍。与此同时人民在春季挨饿。费奈隆说,法国是一所巨大的医院。法国历史学家相信一代人中有 600 万人死于贫困。也许很容易找到比路易十四更野蛮、更恶毒、更可恶的专制君主,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用权力造成更大的痛苦和犯下更大的错误;他对他的时代最著名人物所发出的赞赏标志着卑鄙的专制主义使欧洲的良心堕落到最低限度。

那个时候的共和国统治常与不光彩恶名相对较少的君主制和解。波兰是一个由一些分裂力量所组成的国家。贵族所谓的自由,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否决议会法令和迫害他庄园上农奴的权利——在那分裂的时代他们拒绝放弃这些权利,因此证实了一位修道士多年前的警告:"你们将被毁灭,但不是由于侵略或者战争,而是由于你们穷凶极恶的自由。"威尼斯则在遭受相反的过度集权之苦。它的政府最精明能干,极少犯错误,如果不是自作聪明介入别人事务,把激情和未曾察觉的蠢行视作理所当然的话。但是贵族的最高权力交给一个委员会,从该委员会又交到一个十人议事会,从十人议事会又交到三个国家审判官。大约公元 1600 年这种高度的集权变成一种骇人听闻的专制。我已经指出马基雅维里所提供的非道德理论满足了建立专制王权的需要;威尼斯的寡头专制同样需要寡廉鲜耻来反对良心的反抗。一个与马基雅维里才具相当的作家也尽其所能提

45

供论证,他分析了贵族阶级的需要与谋略,并让其明白最安全的就是毒药。迟至一个世纪以前尊贵的威尼斯元老院议员们甚至仍为公共利益雇佣杀手,而且像菲利普二世和查理九世一样不知愧疚。

瑞士的州特别是日内瓦给法国革命前的舆论以深刻的影响,但是它们没有参与开始让法律统治的早期运动。这份光荣在众多的国家中只属于尼德兰。他们赢得它,不是因为其政府形式——其政府是有缺陷和不稳定的,因为奥兰治党人经常密谋反对它,杀害了两名最著名的共和派政治家,威廉三世本人也密谋得到英国的帮助以实现王袍加身——而是因为新闻自由,它使处在受压迫的最黑暗时刻作为压迫者牺牲品的荷兰处于有利地位,而得到全欧洲的关注。

路易十四曾下令每个法国的新教徒应当立即放弃他的宗教。这项法令终止于詹姆斯二世即位那一年。新教难民则像他们的祖先一个世纪以前那样行动。他们宣布臣民对破坏他们之间契约的统治者有罢黜权。除法国外所有大国均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派奥兰治家的威廉远征,这是一个更为光辉时代的开端。

英格兰的解放应归功于把大陆上这些事物史无前例地结合起来,而不是靠她自身的力量。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最后是长期国会,他们为摆脱斯图亚特王朝滥用权力所作的努力均告失败,其原因不是君主制的抵抗,而是共和国的无用。国家与教会均被扫除;新的制度在最有能力的统治者治下诞生,这位统治者在一场革命中脱颖而出。到处是政治思想竞争的英格兰至少产生两位作家,他们在许多方面看得和我们今天一样深远和清楚。但是克伦威尔的宪法已经被历史翻过;哈林顿与利尔本有一段时间受到嘲笑,然后被忘记。人民承认其努力失败,放弃其目

标,急忙热心于做一个不称职国王的臣民,而没有有效的契约。

如果英格兰人民所实现的只不过是从到处都有的君主专制压力下得到一些减缓,那么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就太多了。他们背信弃义,冒犯议会和法律,密谋杀死查理国王,弥尔顿还下流地使用拉丁文小册子向世界论证此行为的合法性。他们让世界相信共和党人对自由与权力一样具有敌意,而且首鼠两端。所有这一切都帮了保皇党人,使得他们的成就在复辟时代一扫而光。如果没有什么能补偿政治生活中必然和经常产生的这个缺点,那么英国就会走其他国家的老路。

有个古老的笑话描述英国人讨厌玄思,说我们的所有哲学都由一个包含两个问句的简短问答所组成:"心是什么? 不是物。物是什么? 不是心。"惟一接受的是诉诸传统。爱国者也习惯于说他们采取古代的立场,不会让英国的法律发生改变。为了实施他们的论点他们发明了一个故事,说宪法来自特洛伊,罗马人同意保留而不作改变。这些寓言无助于反对斯特拉福德;以前的神谕应答有时与大众的事业相反。在崇高的宗教问题中它是明确的,17 世纪乃至 15 世纪的实践都显示出对不宽容的支持。由于王室的命令,人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四次更换信仰,其容易程度曾给劳德大主教留下深刻印象。在一个已经依次禁止了每一种宗教并听任对罗拉德和阿里乌派施以多种刑罚以及反对奥格斯堡和罗马的国家,割下一名清教徒的耳朵似乎不可能有危险。

但是一个更为自信的时代来到了。人们决心放弃会通向断头台和枷锁的老方式,而让他们祖先的智慧和国家的法律服从一种不成文法。宗教自由一直是君士坦丁与瓦伦提尼安一世时代伟大的基督教作家的梦想,一个在帝国从未完全实现的梦想。当野蛮人发现统治信奉另一种宗教的文明人已经超出他们的治

术之能时，信仰的统一只能由血缘法以及比法律更残忍的理论来加以强化。但是从圣亚大纳西与圣安布罗斯以降至伊拉斯谟与莫尔，每一时代都能听到最诚挚的人为代表良心自由所作的抗议，宗教改革前的和平时期充满了它将要发生的征兆。 47

在接下来的混乱中人们很高兴以特权或妥协的方式得到宽容，但却不愿意更广泛地运用这个原则。索西诺斯第一个以教会与国家应当分离为理由要求实行普遍的宽容。但是索西诺斯也消除了对他自己理论的疑虑，因为他严格地提倡消极服从。

宗教自由是新产生的公民原则，公民自由是信仰宗教的必要条件，这个思想是17世纪留下来的发现。在弥尔顿与泰勒、巴克斯特与洛克的名字因对不宽容作有偏向的谴责而出名的很多年以前，在独立的教团就有人热心而认真地领悟了这个原则。他们想以之限制国家的权威，从而使教会的自由得到保障。那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即将自由神圣化并与其上帝相联系，教导人们珍视别人的自由如同对己，捍卫它们是为了热爱正义与宽容而不只是为要求一项权利。这些思想都是上两个世纪进步中伟大而善良事物之灵魂。宗教方面，纵然有世界范围内不信神情绪的影响，但在使这个国家站在自由的前沿方面，其贡献不少于任何清晰的政治观念。这是1641年运动中最深刻的趋势，也是经历1660年反动而保存下来的最强大的动力。

辉格党的最伟大作家伯克与麦考莱作为现代自由的先驱，一直是革命时期政治家的代表。但把这样一种政治传统追溯到下列人物未免使人难堪：阿尔杰农·悉尼是法国国王收买的特务；罗素勋爵，至少像专制君主一样反对实行宗教宽容；沙夫茨伯里，其双手沾满无辜者因泰特斯·果茨的伪证而流的血；哈利法克斯，坚持认为该密谋必定会受到支持，即使它是假的；马尔伯勒，把远征消息透露给法国人，致使其战友阵亡；洛克，其自由

概念只有财产保护而无精神自由，其至赞成奴役与迫害；甚至还有艾迪生，他认为只有他的国家才能享有投票再征税的权利。笛福断言从查理二世时代到乔治一世时期他不知道有一个政治家真正持有某一党派的信仰；领导攻击以后的斯图亚特家族的那些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使进步的事业倒退一个世纪之久。

48

人们怀疑存在着这样一个秘密协定：路易十四许诺，如果查理二世上台后铲除圣公会，他就出兵协助他摧毁英国议会。有人提议无论詹姆斯何时即位，大部分王室特权和圣职授予权都应转移到国会。与此同时，对非国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限制应当废除。如果哈利法克斯以其出色的能力加以支持的《限权法案》获得通过，赞成君主制的宪法就会在17世纪提出来，远早于实际上的19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但是詹姆斯的敌人在奥兰治亲王领导下，宁愿要一个近乎专制的新教国王，而不要一个天主教徒的立宪国王。计划失败了。詹姆斯成功地获得权力，但该权力在他谨小慎微的手中实际上失控，掀翻他的暴风雨已经在海面上聚集。

1688年革命第一次给大陆专制主义以真正的打击，从而抑制了法国的优势。在国内它减少异议，净化司法，发展国家的力量与资源，并通过《嗣位法》从根本上确认王位为人民赠礼之地位。但是它并未引入或决定任何重要的原则。辉格党与托利党能够在一起工作，两党之间的根本问题均未涉及。国王的神圣权利已经确立，用笛福的话说，是地产所有者的神圣权利。他们的支配权在中产阶级的官方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权威下延续了70年。甚至休谟也没超出其思想疆界；他关于自由与财产之间联系的狭隘唯物主义观点甚至迷惑了福克斯的更为宽广的心灵。

政府权力的分离应当根据其本性而不是根据阶级分工，这

个思想为孟德斯鸠所吸收并作了天才的发展，洛克是英国制度在国外领土上长期统治的始作俑者。他的抵抗学说，或如他最后所名之，诉诸上帝学说，在世界史上极其关键的时刻支配着查塔姆伯爵的判断。我们的议会制度堪称一项发明，在若干个革命派的驾驭之下，它迫使选民、诱导立法者投票反对自己的信念；对选民的胁迫则以他们代表的堕落为回报。大约到1770年情况几乎恢复如前，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回复到革命曾想对之加以矫正的状态。欧洲似乎没有能力变成自由国家的家园。从美洲开始，人应当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国民因国家的行为应向上帝负责；这些朴素的思想——该思想长期深藏在思想家的孤独心灵里以及拉丁文的对开本中——突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君临这个它们命定要改造的世界，其旗帜就是人的权利。英国议会是否有向其殖民地臣民征税的宪法权利，是很难从法律字面上说清楚的。一般的推论多站在权力一边；这个世界相信，至高无上的应当是合法统治者的意志，而非臣民的意志。几乎没有哪个作家敢大胆地走得这么远，竟说在极端的场合可以抵抗合法的权力。但是，美洲殖民地人民之大胆前进，不是为了得到利益，而是为了逃避其他英国人所同意遵守的法律。他们显得那样敏感，以致康涅狄格州的“蓝色法律”禁止人们步行到离妻子只有10英尺远的教堂。所提议的税额一年仅1.2万镑，很容易承受。但是爱德华一世与他的枢密院为何不让英格兰征税的理由也是乔治三世和他的议会为何不应向美洲人征税的理由。争端包含一个原则，即政府的控制权。此外，它还包括这样的结论：由一次受嘲笑的选举所产生的议会没有正当的权利统治没有代表的民族，它呼吁英国人民收回此项权力。我们最好的政治家看到不管法律如何，民族的权利才是关键。在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演说中，查塔姆告诫美洲人要坚定。卡姆登勋爵，即后来 49

的大法官说："征税与代表权是不可分割的。上帝把它们联结在一起。没有能把它们分开的英国国会。"

50 从这次危机的组成要素中，伯克建构了世界上最崇高的政治理论。他说："我不知道如何起草一份反对全体人民的诉状。人类的自然权利确实是神圣的。如果有什么公共标准被证明对之起有害的影响，那么就必然应该起而攻之，即使根本不可能立有什么反对它的信约。只有至高无上的理性优于各种形式的立法和行政，只有它应当发号施令。"于是，一百年以前欧洲政治中的那种适时沉默和踌躇不决终于以此方式打破了；该原则被牢牢确立，即一个民族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它不能控制的权力摆布。美国人把它作为他们自己新政府的基础。他们还做得更多；因为他们不仅让所有的国家权力服从公共意志，还对公共意志加以限制。这些限制是英国的议会不愿忍受的。

在法国革命期间，垂范已久的英国亦无法与美国的影响抗衡。美国制度安排明智地防范民主对自由的侵害。当路易·菲利普成为国王时，他向老共和党人拉法夷特保证说，他在美国所见使他相信没有政府能够做得像共和国那样好。有一段时间，约 55 年前，门罗总统任职时期，人们仍称之为"美好情感时代"，那时斯图亚特王朝流传下来的大多数不合时宜的东西已被革除，更晚一些的分离动机尚未活跃。旧世界麻烦之原因——公众无知、赤贫、穷富之间的强烈对比、宗教纷争、公共债务、常备军和战争——几乎不为人所知。没有其他时代或国家如此成功地解决这些伴随自由社会成长的问题，时间并未带来进一步的进步。

我已经到达我自己时代，但是我的任务几乎还没开始。在我已谈到的时代，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但是从《独立宣言》以来，或者更公正地说，从西班牙人剥夺他们的国土，建立

他们自己的新政府以来，惟一仅知的自由形式，共和国与立宪君主制，其影响已遍及世界 令人感兴趣的是考察美国对宗主国的反抗而取得独立；了解迅速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怎样启发人想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治理国家的艺术；路易十六在承认专制主义没有益处，即使它强制使人幸福之后，如何吁请人民去做他力非能及的事，因此把他的权杖交给法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并对他们自己经历的可怕回忆惊恐万状，而竭力告别过去，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孩子从这个世界上的王族中获得解脱，从一群死者中拯救活的，直到世界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机会被断送，因为争取平等的激情使自由的希望落空。 51

我希望已经向你们显示，审慎地拒绝那些为君主专制或寡头专制铺平道路的道德准则，标志着要求无限权力的民主精神的到来——其主要捍卫者之一就曾声称，为了摧毁宗教，不惜败坏人的良知；一个开明与宽容的鼓吹家竟希望最后的国王将被最后的牧师的肠子绞死。我还将试图解释亚当·斯密的劳动是所有财富之母学说以及国家实质上由财富生产者所构成的结论之间的联系，西耶士正用它颠覆了古老的法国。我还想阐明，卢梭关于社会契约是平等伙伴之间自愿联系的定义导致马拉在短暂而不可避免的进程中宣布，根据自我保存的法制，穷人不受导致他们不幸与死亡的契约条款的约束。我还想说，他们与社会为敌，有权通过消灭富人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那种主要传自法国革命的僵硬的平等学说，与公开承认不成熟的经济科学一起，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重新唤起了改造社会的观念，该观念一直是艾塞尼派信徒和早期基督徒以及教父、精通教会法规者、托钵僧的远大抱负；宗教改革的最著名先驱伊拉斯谟以及它的最出色的牺牲者托马斯·莫尔先生的远大抱负；最受欢迎的大主教费奈隆的宏大理想。但在流行 40 年之后，它已经沾

染上了嫉妒、仇恨和血腥味，如今已是潜藏在我们道路上的最危险敌人。

5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说了这么多我们先辈的蠢行，揭示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所引起的无意义骚动，使共和国的罪行与君主专制一样多之后，指出这场革命没有合法性，冠以革命称号的帝国主义也只是对同样暴力和错误的伪装之后，为让我的演说不在没涉及一点意义或道德的情况下被打断，我希望谈谈谁论述了那被认为构成真正自由国家的法律，以及它们处在什么样的联系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在发展、进化和连续性名义下并给其他科学一种新的更深刻方法的发现如何解决稳定和变化的古老问题及确定与思想进步相关的传统权威；由詹姆斯·麦金托什关于宪法不是制作的而是生长的说法所表述的理论，习俗与民族的政治品格而非政府的意志是法律的创造者理论；因此作为自己组织制度源泉的应当长期为其健全以及形式与精神的和谐一致负责的国家，被最纯粹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与正在进行的革命，被尼布尔和马志尼独一无二的合作所制作出来，从而产生了民族性的思想，它远不同于自由的思想，而支配着当代的运动。

我不想在没有给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事实以足够注意的情况下就得出结论，即为人类从权力桎梏下解放作出那么多艰苦奋斗、那么多思考与忍受一直是我们国民的工作，也是其他土地上的人民之工作。我们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反对任意妄为和受外来财力所控制的君主，反对特殊身份的人，反对十足暴政的王朝。然而我们的历史上傲慢专横的特权十分突出。征服者第一代诺曼人就被迫承认英国人民的权利，虽然程度较低。当教政之争延伸到英国时，我们的教士学会把自己同公众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除了少数以外，英国的学院派作家特点是既无外国神学家的僧侣精神，也无法国特有的君主主义偏见。传自那腐

朽帝国的民法是专制权力的共同支柱，在英国被排除在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这个国家从来不允许有宗教法庭，也没完全接受使用酷刑，而正是酷刑的使用给大陆的王室带来许多恐怖气氛。中世纪末期国外的作家已承认我们的优越，并指出这些原因。从那以后，我们的绅士仍然拥有地方自治的手段，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教派分立促进宽容。对公共法的困惑教会人民最好的保护是独立判断和诚实正直。

所有这些解释都停留在表面，就像保护我们的海洋一样显而易见。但是它们不可能始终只是一个原因的后继结果，它们必然存在于坚持不懈、温良节制、个性意识和男子汉的责任感这样一些共同的民族素质之中，它们使英国人具有高超的劳动技巧，使之能够在其他人无法生存的荒芜地带繁荣昌盛。它（虽然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为光荣浴血奋战，但从未看过有5万英国士兵的军队打仗）使拿破仑在滑铁卢撤走时惊呼："从克雷西战役以来总是如此。"

因此，如果过去有骄傲的理由，那么在未来更有希望。在其他国家担心他们的邻里或觊觎他们邻国的财产之时，我们的优势却在增加。同过去相比也有一些失常和缺陷，但不可容忍的较少，如果丑陋可耻的事不是更少的话。

但是我的目光专注于天主之光所照亮之处，我不能用过于沉重的笔调谈论信仰自由，有了它你和我方可以度过那沉闷阴郁和令人心碎的进程，通过此进程人们才能达到自由；由于那指导我们的光仍未熄灭，那把我们带到自由国家前列的事业仍具有力量；未来的故事动笔于过去，现在有的将来还会存在。

三、欧洲民主政治史*

基佐与梅特涅的欧洲距法国与统一的德国有普选权的时代差不多30年；当时一名奥地利的政府部长参加了受谴责的1848年造反；此刻的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利亚海，均受马志尼党人统治；从皮尔的鲁莽中退却的政治家们把英国的选区增加了一倍。如果这位宣称民主的进步经常不断和难以压制之法则的哲学家活到老年，他一定会为自己预言的实现吓一大跳。通过这些年的革命性变化，托马斯·厄斯金·麦比其他任何英国人都更密切、更经常地处在公共事务的中心。这段时间他主要在下院，像克努特一样坐在那里看潮涨潮落。没几个研究欧洲民主的历史学家能比他有更好的准备。他长期研究由最著名会议所产生的公众政府在其权力巅峰时的机制，然后写出其历史，并把其方法晓之于世界。

这样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仍无人尝试是毫不奇怪的。民主是一个巨大的潮流，有很多源泉汇入其中。其发展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这些因素有许多已由经济理论，特别是经济法所说明。推动的力量有时是学说，有时是事实，错误则像真理一样强大有力。大众的进步一段时间由立法决定，另一段时间则

---

* 本文是作者对托马斯·厄斯金·麦的《欧洲民主政治：一个历史的研究》(伦敦：龙曼斯，1877)的评论，发表在《评论季刊》，第145卷(1878年2月)，第112—142页

由一本书、一项发明或一桩罪行决定；我们可以把其影响追溯到 55
希腊哲学和罗马法、蛮族的习俗与教会法，以及抛弃教会法规的改革家和抛弃宗派之见的哲学家。景观在变化，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在欧洲生活最停滞的时期，新的世界积累了改造旧世界的力量。

能自始至终、从显到微细致把握的历史也许很有价值，但对和平与和解并无贡献。没什么发现比揭思想源流老底更令人生气的了。尖锐的定义和无情的分析将去除掩盖社会分裂的面具，使政治争端过于激烈而难以妥协，使政治联盟太过脆弱而难有效力，使政治事务因陷入社会和宗教纷争的激情而趋于恶化。厄斯金·麦先生为所有站在我们范围广泛的宪法范围内的人写作。他的判断不走极端。他从理论讨论转向依据制度之光检查他的主题。他相信法律主要依赖的是社会条件，而非不受现实支持的概念和争端。他甚至声称不信任洛克的影响，不太关心探询民主自治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独立派的理论或贵格会教徒的平等观。至于民主制度怎样受到社会契约论，或幸福是所有政府的目的、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等等学说的影响，他一概不关心。因为他总是脚踏实地，用大量的、严经筛选的事实，去显示健全的理智、有益的经验而不是教条的戒律，所以，所有读他书的人都只会获益，不会感到被冒犯。

虽然他并不主张反复灌输道德说教，但他在导言中仍阐述了他的指导思想。的确，那些不能认识到该书每一章告诫的人读了也白读。厄斯金·麦先生相信现代进步的趋势是提高大众的素质，增加他们对工作的参与和享有人类文明成果的份额，增进舒适和教育，还有自我尊重和独立性、政治知识和权力。把它们视作普遍的历史法则，就像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所概括的那样，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加上必要的时间和地点限制，它就是

非常有说服力的。另一个由更为广泛的归纳所支持的结论是，民主制像君主制一样在一定限度内有益，超过限度则有害；它是自由的最诚挚朋友，或是其最无情的敌人，这要看它是混合的还是纯粹的。关于宪政的这种古老且初级的真理，从教皇时代到1874年革命一直受到多种难忘的且富有启发性的例证的强化。那场革命使瑞士联邦转变成一种不合格的、直接受全体人民声音支配的民主制。

自由与民主之间的显著差别已引起许多作者的关注，但很难作严格的划分。奴隶制经常与民主政体联系在一起，以致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很久以前宣称奴隶制为民主国家所必需。南方邦联的哲学家推广这个理论极为热情。奴隶制的运作很像一种有限公民权，它使权力维系于财产，并阻遏社会主义这种成熟民主制的病症。最明智的希腊僭主佩里安德阻止使用奴隶；伯里克利声称从手工劳作中解放出来正是雅典人与众不同的特权。在罗马，随确立政治平等而来的是李锡尼立即征收释奴税。指责英国把奴隶制强加于美洲的批评在《独立宣言》中被仔细删除；法国国民议会在宣布《人权宣言》之后宣称并不推及殖民地。废奴的争论使每个人都熟悉伯克的说法，人们发现自由的代价是做奴隶的主人。

从雅典人的最好时期，从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时起，民主与宗教迫害之间便维持一种奇特的亲和关系。宗教战争与革命所发生的血腥行为应归咎于生活在雷蒂亚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原始社团中人的狂热；6个民主的小镇只有一个容忍新教徒，那还是在一场几乎延续了两个世纪的斗争之后。1578年，15个天主教省因根特的激烈偏见而加入进反叛的尼德兰；弗里斯兰省的民主政府在该国最难以忍受。在美洲的上流移民保护宽容和反对他们民主制的邻居，其在罗得岛和宾夕法

尼州的胜利不是政治的成果而是宗教的成果。法兰西共和国走 57 向毁灭乃是因为宗教自由这一课对它说来太难了而未能掌握的确，在18世纪，君主制国家对它的理解要好于自由民主国家。黎塞留在建立波旁王朝专制时仍承认该原则；勃兰登堡选侯在成为专制者时也这样做；克拉伦登下台以后，豁免天主教的观念已与查理二世颠覆宪法的阴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一个强大到足以蔑视公众感情的政府是不会顾及似是而非的异端的，因为它有能力惩罚；而对于异端，防范要好于惩罚。但是一个完全依赖舆论的政府将寻求某些保障，它规范舆论、努力控制那形成它的力量，同时也得为容忍受过教育的人民有时敌视公共机构而担惊受怕 当格兰特将军在犹他州与多妻制作斗争时，他发现必须把绅士风度束之高阁；最高法院判定该举动为非法，有关囚犯必须释放。甚至杀人犯李在1875年也被一个摩门教的陪审团宣告无罪。

现代民主制度所遇到的许多问题过于隐晦和多变，以致没有比托克维尔从美国当局或根据他自己观察所得到的更多材料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理解它所激起的希望与恐惧为何总是难分难解，确定在什么样条件下才能得到人民进步和自由国家之幸福，没有比追随厄斯金·麦首先开辟的道路更好的方式了。

在不可一世的专制国家中，在家长制的、军事的和天赋神权的君主中，曙光随以色列人从摆脱束缚的解放开始升起，伴随着神人之约他们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活。部落分裂成更小的共同体，在他们宣誓遵守的法律之下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没有公共权力实施强制。他们自己统治自己而没有一个中央权威、一个立法机构或居支配地位的牧师团 这样一个具有原始社会形式的政体实现了某些发达民主制的理想，抵抗征服和无政府的长期危险达300多年。因立法权力的缺位，因他必须服从约束其臣

民的同一种法律，因长期诉诸先知作为人民道德意识的保护者，因潜在的被罢黜可能性等等，君主本身就受到限制。后来，随着宗教和国家机构的衰微，同样的思想出现，且具有强大活力。这些思想与这样一些人有特殊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严格禁欲、自我否定状态，拒绝奴隶制并共享其财产；他们组成一个完美的共和国之缩影。但艾赛尼派随城市和神庙而凋零，很多代以后，希伯来人的榜样更适用于权力而不是自由。宗教改革之后，新的教派与天主教时代以来的教政传统完全决裂，并寻求重新建构一个高于习俗的权威，令人再次想起建立在自愿协约、自治、联邦主义和平等基础上的自由联邦，在其中选举优于继承权，君主只是坏蛋的标志。他们认为这样的民族才是自己的理想：信一种宗教，听从摩西而不是立法者，服从上帝而不是国王。在此之前政治思想一直受异教经验的指导。

在希腊人中，作为发现共和的最勇敢先锋，雅典是惟一兴旺繁荣的民主国家。它经受了希腊社会共同遭遇的变化，但它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应付了它们，从而展示了非凡的政治天才。对立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几乎到处产生压迫和流血，在他们那里却变成一种真诚追求自由的斗争。雅典政制在明智政治家的领导下成长，并无多少来自于下层的压力。而那些政治家主要受政治理性而不是公众舆论的支配。他们避免了暴力和剧烈的变化，因为他们改革的进度领先于公众的要求。梭伦的法律开始深入人心而不是靠强制力。他缔造的民主制不是让人民成为行政官员，而是让他们成为权力的源泉。他让政府不是同地位或出身而是同土地相关联；他规定土地所有者的政治影响力视他们负担公务的份额而定。对于那些既不提供武装也不交税因而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下层阶级，他给予他们选择和责问他们的统治者、肯定或拒绝立法行为和法庭判决的特权。虽然他指

责埃里奥珀格斯对他的法律有所保留，但他仍同意可按需要对它们作出修改；他心中第一位的理想是全体自由公民的统治。59 他对大众因素的让步是很狭隘的，但这些让步受到仔细的辩护。他未进一步产生必须把全体人民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思想。但是他承认他的主张将被进一步的发展所取代。他向民主制仅迈出了一步，但却是一系列发展的第一步。

波希战争使贵族统治的雅典变成一个海上国家，它发展了一种新的财富资源、一种新的利益类型。那个提供了许多船只和拯救了国家独立并建立了一个帝国的阶级，是不能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梭伦的政治影响应当与政治贡献相称的原则打破了它从中被构想的形式，他的宪法精神的重要性语言难以描述。第四等级被允许参加公务，为使其候选人恰如其分地得到他们的份额，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名额上均不占明显上风，许多公职的任命由抽签决定。雅典人的共和国思想是以非人身的法律统治代替人治。平庸是对自称有超人能力者的防范，现存秩序之威胁不是来自普通公民，而是来自特别有名望的人，如米尔泰厄迪兹。雅典人把他们的宪法尊崇为诸神的礼物，一件神圣的、不能随便改变的东西；诸神是他们权力的源泉和依据。他们需要有一个法典，这样执政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便不能对不成文法作任意的解释。一项良好而权威的立法是民主制度的一个胜利。

所以这个保守的精神就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这场废除了贵族特权的革命由阿里斯泰迪兹促发，由伯里克利完成，没有人责备他们向多数人谄媚。他们使所有自由的雅典人与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号召他们不分阶级，管理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梭伦威胁那些表现出不关心党派斗争的人都将失去公民权，伯里克利则宣布每一个忽视尽自己那份公共责任的人都是社会的无用成员。利用财富未必不公，穷人未必接受富人的贿赂，他在他们

60 当陪审员时让国家发给报酬。他们人数的优势也应公正对待，他把公民权限制于双亲都是雅典人的人；因此他剥夺了四千多名有混合双亲的人出席公民大会的权利。这个大胆的举措使得在那些被证明具有完全雅典公民身份的人中分配来自埃及的谷物之做法得到接受，并使第四等级与不动产的所有者实现某种平等。伯里克利或埃菲阿尔蒂兹——似乎他们的所有改革均在460年即埃菲阿尔蒂兹去世那年进行——是第一个领悟了政治平等概念的民主派政治家。这个使全体公民平等的举措也许产生了一种新的阶级不平等，人为的、出于土地的特权可能让位于更具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但是伯里克利认为一部分人被要求遵守法律，而另一些人则独享立法权，这是不可容忍的；他有能力在30年的时间里保持均衡，靠社会的普遍同意进行统治，这种同意是通过自由辩论取得的。他保持人民主权的统一；但是他把公民的立法提案交给一个复议庭，并对任何方面被发现不合宪法的提案人施以处罚。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是代议制之前出现的最成功的共和国；但是它的辉煌伴随着他的生命而逝去。

从特权的优势或人数的优势产生的自由之威胁是那样显而易见，以致出现这样的思想，财富的平等是惟一防止阶级利益冲突的方法。哲学家菲力阿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建议以不同的对策拉平穷富之间的差别。梭伦努力抑制地产的发展；伯里克利不仅通过让富人置于一个他们不占优势的大会控制之下来加强公众的力量，而且用这些力量改善群众的条件和能力。只要联邦的贡品充斥国库，那些为别人福利交税的人之不满就很容易忍受。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增加了国库的紧张，并使雅典失去其附属地。平衡被打破了；一个阶级制定政策、另一个服从政策的做法受到欢迎，不仅迎合穷人的利益，而且还由于这样一种
61 理论的发展：财富和贫穷都会产生坏公民，中产阶级则是最易受

理性指导的阶级，使他们居优势地位，既能够压制平均线以上的人又能提升平均线以下的人。这个理论变得与民主制度不可分割，并包容了一个能独自毁灭民主制的力量。这对雅典是很致命的，因为它迫使少数人背叛国家。雅典民主制的光荣不在于他们避免了他们理论的更坏的后果，而在于两次驱逐篡权的贵族之后，他们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约束。他们宽恕被他们击败了的敌人，停止为出席公民大会的人付薪，通过让法规高于人民来建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他们把属于宪法的东西与一般的合法行为区分开来，决定任何行为只有宣布与宪法一致才为合法。

那种使雅典共和国毁灭的因素，展示的是伦理与政治的联系，而不是民主制的内在缺陷。一个人口 50 万但只有 3 万全权公民，实际上只由约 3000 人参加的公民大会统治的国家，几乎不能说是民主的。雅典自由的短暂胜利和迅速瓦解属于一个没有固定是非标准的时代。无处不在的知识活动动摇了对神的信任，而神是法律的给予者。从普罗泰戈拉关于没有神灵的怀疑到克里蒂厄斯法律没有神圣性的论断只是迈出小小一步。如果神学中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的东西，那么伦理学中也没有确定无疑的东西，道德义务也就不存在了。人的意志，不是神的意志，是生活的主宰，每个人以及每群人都有权去做他们有手段去做的事。暴政没有错，否认它给自己所提供的享受是伪善。智者的学说没有给权力提供限制，也没有给自由提供保障。它激发雅典人呼吁，他们愿意干的事不能受到阻拦。有些演说家，如阿森纳戈拉斯与尤菲马斯，则提出民主制可以惩罚那些并无错误的人，有利的事即使错了也无妨。苏格拉底之死即是他们激怒的反应。

苏格拉底的信徒受到后人的注意。它们反对政府处死最好的公民之证据珍藏在基督教自己为影响人的舆论而完成的作品

62 中。希腊以它的哲学统治世界，希腊哲学中最响亮的声音是对雅典民主制的抗议。虽然苏格拉底嘲笑凭运气选择执法官的做法，柏拉图欣赏有血腥味的暴君克里蒂厄斯，亚里斯多德认为西拉梅尼兹是比伯里克利更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正是一个更纯粹制度的首批奠基人，并是未来共和国的立法者。

苏格拉底方法的基本点实质上是民主的。他促使人们把所有东西都交给不断提问的检验，自己不要听从权威、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结论；判断是非对错，不要根据别人的意志或感觉，而要根据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理性和良心。他宣称权威经常是错的，无权让人沉默或强行让人信服。他解放了人的思想，但没有解放人的行为。他的崇高之死显示国家的迷信不受他对统治者的蔑视所干扰。

柏拉图没有他老师的爱国精神，对世俗权力也无他老师般的敬意。他认为如果不值得尊敬任何国家的命令都不必服从；他鼓励公民蔑视他们的政府，如果它们不是被有智慧的人统治的话。他给予哲学家的精英统治以无限制的特权。但是没有政府愿作此试验，他寄望于专制主义只能是空想。当岁月的推移使他从共和国的迷梦中惊醒时，他对神圣政府的信念使他对人类自由的不容忍稍减。柏拉图不愿再忍受一个民主政体；但是他要求所有现存的权威都要在一个超级法庭面前证明自己的行为之正当性；他希望所有的宪法都应彻底地改造，他满足了希腊民主制的最伟大需要，即确信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神的意志，所有世俗权威，除那个想像的国家的权威以外，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他的作品的巨大活力在于让人类经常看到大众政府可能有的危险；但是它也保存了对政治理想的信仰以及根据一个神圣的标准判断世间权力的观念。

在《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谴责民主制为最坏的政府，即使

有财产资格的限制。但在晚年他写《政治学》时作了引人注目的 63
让步，虽然很勉强。为了保持法律，即理性与若干代习惯的统治，为限制选择和变化的领域，他设想最好的状态是：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应居支配地位；一个人不应服从另一个人；所有人都应当发号施令，所有人也都应当服从。他建议权力应当在上层与下层间进行分配，上层根据其财产，下层根据其人数，但中产阶级应居权力核心。他认为如果贵族制与民主制能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并相互制约，就没有人对打扰肃穆庄严、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政府感兴趣。为让两个原则相统一，他甚至允许更穷的公民参与公务并为他们履行公职付酬；但是他强迫富人承担自己那份责任，通过选举而不是抽签任命执法官。他对柏拉图的放肆言论愤愤不平，他对事实含义的感知与他的意志相抵牾，他成为一种复兴的、有限的民主制之先知式提倡者。《政治学》对当今世界人们说来是他最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在古代却没取得什么影响。西塞罗以前的时代从无人提及它。它再次失踪很多世纪，阿拉伯的注释者也不知其存在。在西欧第一个发现它的是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公众要素的渗透正在改造封建主义的时刻，《政治学》有助于从专制理论中解放政治哲学，并以自由的方式确立之。

苏格拉底学派的二代学者为人民在未来的统治做的比所有希腊政府宪法都多。他们维护良心反对权威，使二者都受制于更高的法律；他们提出一种混合体制学说，终于压倒专制主义而流行。他们还必须与极端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上百个军团的主人作斗争。但是他们的自由观以适中为基础，而不是以正义为基础。他们的立法偏向希腊公民，并没意识到把同样的权利扩展到外邦人和奴隶。没有这个发现所有政治学科都停留在传统中。该发现属于芝诺的追随者。

他们的神学沉思贫乏而隐晦，使得斯多噶学派把宇宙政府不是归结于诸神的不确定的设计，而是归结于自然的确定法则。此法则优于宗教传统和国家权力；每个人都可以从一个守护神那里获悉它，而该守护神既不会睡觉也不会出错。所有人都受自然法的统治，所有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和同一上帝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也都有义务相互善待。人类共同体即蕴涵所有人共有的权利与责任之存在，它们既不是法律所赋予的，也不可能被法律所剥夺。斯多噶学派对那些随时空变化的制度并无敬意，他们理想的社会类似于一个普遍的教会而不是一个实际的国家。在权力与良心的每一次冲突中，他们宁愿要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指导；用埃比克泰特的话说，他们尊重神法，而不是那使人痛苦的亡者之法。他们关于平等、博爱和人道的学说；他们对抵抗公共权力的个人主义之保护；他们对奴隶制的拒斥，对民主制狭隘性的补救，对原则与同情心之希冀，所有这些使他们在古希腊人中受到批评。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宁愿要一种混合的政体而不要纯粹的公众政府。克律西皮斯认为使神与人都高兴是不可能的；塞尼卡宣称尼禄治下的人民堕落而无能，对于充分的自由除了破坏它的能力以外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他们崇高的自由观，即除了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外没有其他特权的思想，保存在国家的法律中，并在罗马的衡平法中得到净化。

在多利安人的寡头和马其顿的国王们粉碎希腊的自由之时，罗马共和国也衰微了，不是因为自己的敌人，对它说来已没有征服不了的敌人，而是因为它自己的罪恶。它摆脱了许多曾活跃于古希腊、导致不稳定和分化瓦解的因素——热情敏捷、哲学思考、独立的信念、追求不切实际的典雅和美。它令人惊讶地以很多细微的发明防止多数人的统治乃至立法。宪法之争一再发生；进步是如此缓慢，以致改革在能够实际生效前常得经过多

年的投票。他们认可父亲、主人和放高利贷者的权力，这就像东方的奴性一样，与自由的精神很不协调。罗马市民沉迷于奢华的权力之中；他们特别担心每一可能会减少其稳稳享受寡头政治的变化。那种把苛严和专断的贵族统治转变成模范的共和国，以及从共和制的废墟上建立所有专制主义原型的因素，在于这样的事实：罗马共和国将两种状态合而为一。宪法是各个独立团体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遵守契约的义务是自由的持久保障。平民通过保民官得到了自治和平等的统治权，保民官是罗马人治国才能特有的出色而果断的发明。把权力赋予保民官——弱者的保护人——在理论上并不怎样，实践上却难以抵挡。他们并不统治，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整个政府。平民取得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进展，既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劝服，而是靠退出；以类似的方式，保民官运用设置障碍的手段，克服了国家的所有权力当局。通过把公共事务延搁5年，李锡尼建立了民主的平等。防止滥用职权，每个保民官都有否决他的同僚行动的权利。由于他们独立于他们的选举者，他们便永远属于最聪明和诚实的十个人。这是人类所设计出来的保护少数的最有效工具。在公元前287年给大会协调立法权的霍滕西亚法之后，保民官停止了代表少数人的事业，他们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65

创造两个有统治权的立法机构在同一社会并存，很难找到比这样一种安排更加没有哪怕是表面上的道理或更不给人以希望。然而它有效地制止了多个世纪的冲突，把罗马带进一个长期繁荣和伟大的时代。人民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分离，即类似于国家的那种人为的分离。在公民大会使用其特权和通过一项反对元老院的法律之前50年时光已经流过。波利比厄斯未能发现建筑物矗立在那里时已经有一道裂缝。似乎已经完美和谐，他判断不可能存在更为完美的混合政府例子。但就在这幸福的

岁月里，那致使罗马自由毁灭的因素也在充分发展；长期战争状态带来了三个变化，它们是终局的开端——格拉古的改革、穷人的武装以及罗马普选权给予意大利人民。

在罗马人开始他们的国外征服战之前他们就拥有一支77万人的军队。从那时起公民的战争耗费就接连不断。由4—5亩的小型不动产聚集在一起的地区，曾经是罗马社会的理想单位以及军队和国家的主要支柱，现在则到处都是成群的牲畜和奴隶。民主统治的实质已经殆尽。土地改革政策的目标是在公共领域之外重建这个农民阶级，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的家族数代所拥有并对之进行买、卖、继承、分割、劳作和改进的土地之外，建立农民阶级。曾长期休眠的利益冲突以贵族和平民斗争中未见的激烈而再兴。现在的斗争围绕的不是平等权利而是一个服从的问题。社会民主要素的恢复不打败元老院就不可能实现；这次危机终于暴露了未受控制或未达和解的分权制度的危险与机制缺陷。格拉古领导的公民大会拥有立法权；惟一的宪法制衡是诱使保民官阻止该程序。因此，保民官奥克塔维斯用他的否决权加以干预。保民官的权力是最神圣的、不受质疑的权力，因为它建立在社会两个组成部分的契约基础之上，并是他们统一的奠基石。它的使用与人民意志相悖，这个权力用于阻止民主制之保存所依赖的改革。格拉古使奥克塔维斯被罢黜。虽然不是不合法，但毕竟是前所未闻之事，它对罗马人说来似乎是渎神的行为，国家的支柱也因之动摇，因为它是民主统治的第一次重要展示。一个保民官可以点燃这个火药库和背叛这个城市，但在他任期结束前他不能受到斥责。但当他运用人民所授予的权力反对人民时，他的魔力就消失了。当平民担心被压迫时，保民官作为被压迫者的捍卫者而设立。在民主制的力量强大无敌时，他们便不得再干涉弱者。他们是被人民选来抵御贵

66

族政治的。他们若成为贵族的代理人和使之更加强大，那么他们就不会诞生。与一个受欢迎的、没有同事反对的保民官不同，富有的阶级没有保护。只要担任公职，他就不受侵犯，但时间只有一年。但是小格拉古再次当选保民官，贵族控告他想当国王。保民官在法律上是不可压制的，在实践上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些方面比一位皇帝不差多少。元老院像战士一样进行斗争，但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存在。他们废除土地法，他们谋杀了这位平民领袖。他们为保护自己废除宪法，投票授予苏拉超过所有君主的权力，以消灭他们的仇敌。宣布执政官高于所有法律，这个可怕观念为有严厉精神的罗马人所常见，十人团享有寡头政治的权威；但实际上他们受到两个条款的限制，即减少任期，在几个同事中分权。这两个条款每一个在罗马都很灵验。但是苏拉的任命既没有限制也没有分权。它可以一直延续只要他愿意。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他授权可以将任何人处死而不需审讯或控告。所有被他的爪牙谋害的牺牲者都因该法律的全面约束而处于不利地位

67

民主制最终被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所征服，该制度取得了持久的胜利。与贵族领袖的特权暴政相比，这种制度较有节制。皇帝是法定的共和国元首，拥有控制元老院所必需的所有权力。曾用来挫败贵族的工具足以反对财富与官僚中的新贵。保民官的权力被永久授予，没有必要产生一个国王或独裁者。元老院三次提议奥古斯都享有制定法律的至上权力。他宣称保民官的权力已经满足他的需要。它使他能够维持虚假的共和形式。这位所有罗马执政官中最受欢迎者提供了帝制的精髓，因为帝国不是篡夺的，而是欢欣鼓舞的人民以合法行为创造的，他们渴望结束流血的时代和得到慷慨赠与的谷物，其数量最终达到一年90万磅。人民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给这位皇帝。限制他被授

予的权力乃是对他们上帝的挑战，也是重开在法塞勒斯与菲利皮就有的少数与多数的争端。罗马人支持帝国的专制主义，因为它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与民主之间以及少数人利益与群众至上地位之间的初步对抗已变得显而易见。前者之友便是后者之敌。绝对权力，依据其最初的、起源于民众的假设，就像宪法自由一样具有合法性；这个得到人民和王权一致支持的教义使天空变得昏暗。

在现代政治的严格意义上，君权并不意味着具有合法性。它没有权利离开人民的意志而存在。限定皇帝的权威也是放弃他们自己的权力；但是剥夺皇帝的权威则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威。他们按自己的选择给予君权。他们按自己的选择剥夺之。革命就像君权一样合法与不负责任。民主制度在继续发展。行省不再受制于一个遥远首都的一次大会。他们得到了罗马公民的特权。提比略剥夺了罗马居民的选举功能之后很久，行省继续不为所动地享有选举他们自己行政官的权利。他们自己统治自己，就像一个巨大的自治市联邦共和国；甚至在戴克里先带来专制主义的形式与现实之后，行省会议仍对帝国的官员实行某种控制，这可以说是代议制的初步萌芽。

但是君权把其强大的力量归于受欢迎的虚构。皇帝不服从他能够加之于别人的法律，*princeps legibus solutus*，即把元首至上原则解释为他高于所有法律的限制。他的判决不能上诉。他是活的法律。喜欢在作品中称赞斯多噶学派哲学的罗马法学家以那些著名的格言把帝国特权的每一次滥用神圣化，这些格言安慰了那么多人的良心，又认可了那么多的错误；查士丁尼法典则成为仅次于封建主义的最大障碍，自由必须与之作斗争。

古代的民主，如在雅典最好的伯里克利时期，或波利比厄斯所描述的罗马，或甚至由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第6卷以及西

塞罗在《共和国》开头所理想化的那种，对公众政府问题的解决从来都是有偏袒的和不诚实的。古代政治家的目标从未超出在不同阶级间分配权力的界限。他们的自由受束于奴隶制。他们从未试图寻找一种立基于自由劳动的兴盛和活力之上的自由国家。他们从未预见到建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个更艰巨但更值得庆幸的任务。

通过打击上层阶级和富人的优势地位；阻止国家侵入属于神的领域；教导人们爱邻如己；增进平等意识；谴责刺激征服的种族自大和导致哲学家为奴隶制辩护的种族歧视学说；以及通过对人类大众而不是对统治者、从而体现舆论高于权力的演讲，向穷人讲解福音书的教会显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民主制有联系。然而基督教并没有直接地影响政治进步。共和国的古代格言被天主教派翻译成基督教语言："*Summa est ratio quae pro religione fiat*"。从君士坦丁堡兴起至衰落的1100年时间里，基督教的皇帝像异教徒一样霸道。 69

与此同时西欧被其早期家园曾是共和主义者的人占领。日耳曼公社的原始体制建立在伙伴关系而不是服从基础之上。他们习惯于共同商议处理自己的事务，服从临时的和有明确限定的权威。历史科学的最冒险的事业之一就是在德国森林生活中追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自由制度之起源。但是新的国家建立在征服基础上，日耳曼人在战争中受国王指挥。用之于高卢和西班牙的自治学说将会使法兰克人和哥特人消失在被征服人民的群体中。为建设能够延续的国家需要有活力的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地区神职人员等全部资源。结果就是封建制，与民主制截然对立、与文明共处的制度

民主制的复兴既不归功于基督教教会也不归功于条顿国家，而是归功于它们之间的争吵。结果立即随原因而来。格列

高里七世刚使教皇职权独立于帝国，这场伟大的冲突就开始了；同一个教皇任期诞生了人民主权理论。教皇党认为皇帝的王权来自人民，人民可以拿走所赠与的东西。帝党回答说没有人能拿走人民给予的东西。寻找火花来自火石还是来自偷盗均无根据。两党都反对无限制的至上地位。菲兹尼盖尔的教会自由思想并不比沙利兹伯里的约翰的政治自由思想更多。英诺森四世像约尼斯一样是完全的专制主义者。但是每个党都通过寻求城市的帮助轮番鼓励民主制；每个党都轮番向人民呼吁，而加强了宪法的理论。14 世纪的英国国会宣判罢黜他们的国王为正义之举；三级会议而不是国王或贵族统治法国；城镇的财富和自由成功地使它们从意大利中心到北海都赢得独立，并可能很快要改造欧洲社会。甚至在伟大君主的首都，在罗马，在巴黎，以及在伦敦的两个可怕时期，平民都占据了优势。但是自治城市共和国苦于不稳定的祸害。根据伊拉斯谟与布丁的说法，治理最好的斯特拉斯堡也深受长期骚乱的折磨。一位聪明的历史学家统计了意大利城市有 7000 次革命。民主制在控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平衡方面做的不比封建制更好。扎克雷的残暴以及瓦特·泰勒的造反使人们硬下心来反对平民百姓。教会与政府联手把他们镇压下去。中世纪自由最令人难忘的斗争——卡斯蒂利亚的考莫尼罗斯暴动、德国农民战争、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根特起义——均被查理五世在宗教改革之初就镇压下去。

中世纪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宪制格言库：陪审团审讯、代表权纳税、地方自治、教区独立、责任制政府。但是它们均未受到宪法的保障，宗教改革使老骨头更加老朽。路德声称是上帝把正义带给世俗权力，他让路德派教会成为政治稳定的保垒，并把神圣正义和消极服从学说作为教规传下去。茨温利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希望所有的行政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也都可以被他

们的选举者罢免;但是他很快就死了因而影响不大。宗教改革对民主制的长期行动是通过加尔文的长老派制度实施的。

长老宗的民主成份很早就有所表现。尼德兰人曾抵抗菲利普二世达15年才鼓起勇气罢黜他,加尔文主义极端分子戴维特想以全体人民的主权行动颠覆一些重要国家的优势地位,但被莱切斯特的无能与巴内菲特的完美政策所挫败。胡格诺派教徒在1572年失去他们的领袖之后,在民主的基础上重组,并开始认为一个谋杀他的臣民的国王就失去了别人服从他的神圣权利。但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与布坎南由于支持弑君破坏了他们的信誉;霍特曼的《法兰克—高卢》是该集团最认真的著作,但他在自己党的领袖成为国王时放弃了他的自由主张。那个时代民主精神最狂热的表现是从对立方开始的。纳瓦拉的亨利成为法国王位的下一个继承人,一个多世纪都没起多大作用的罢黜理论获得新的觉醒,且更有活力。国家的一半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们并不一定要服从一个他们没有选择过的国王。一个十六人委员会自己管理巴黎,在西班牙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把亨利阻挡在他的首都之外达数年之久。文学所给予的推动持续了一整代,并出版了许许多多的著作论述天主教徒选择、控制和撤除他们的执政官的权利。他们是失败方,其中大多数人残忍好杀,并很快被忘记。但是弥尔顿、洛克和卢梭政治思想中较为伟大的部分可以在耶稣会士莱修、莫利纳、玛丽安娜和苏亚雷斯的生硬拉丁文中发现,他们都是西班牙王国的臣民。

这些思想一旦对胃口,就会被罗马和日内瓦的极端分子采用;但是它们所结的果实都不持久,直到宗教改革的一个世纪之后它们才被新的宗教制度所吸收。5年的内战未能耗尽长老派的保皇热情,需要驱逐多数派才能使长期国会放弃君主制。长期国会以法律的技巧保护宪法反对王权,保护习惯反对革新,以

塞尔登与普林的所有学识确立一个过去的理想,该理想还没有清教徒的想像更可靠。独立派引入一个新的原则。对他们说来传统无权威,过去无美德。良心自由是宪法中找不到的东西,它比金雀花王朝的所有法律更使他们许多人感到骄傲。他们关于每个教区的居民应当自治的思想完全破坏了需要用来维持统一的力量,并剥夺了君主制用来伤害自由的武器。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蕴藏在他们的学说中,它在美洲扎根,并深深影响了以后时代的政治思想。在英国,教派民主十分强大,但却归于失败。克伦威尔拒绝受之束缚;最勇敢的英国民主主义思想家约翰·利尔本宣称回到查理·斯图亚特时代也比生活在护国公的剑下更自由。

72

利尔本是最早理解民主的真正条件及其在英国成功的障碍的人之一。权力平等的维持不可能同财产极不平等状况相联系,除了凭借暴力。如果权力的建立不是依据于财产,财产就会向有权者倾斜,这总是很危险的。这个保持财产必要平衡的思想由哈林顿所发展,也为弥尔顿在后来的小册子所采用,它显然对托兰德、甚至对约翰·亚当斯说来像印刷术的发明、或血液循环的发现一样重要。对于在对国王的神圣审判和处死12年之后共和党人所消灭的东西奇特再现,它至少作了真实的解释。管理极糟糕的政府不可能恢复它。当查理二世背叛宪法的企图暴露时,辉格党密谋驱逐这个屡教不改的王朝,他们的愿望并没有比威尼斯的寡头政府之下想当总督的蒙默思走得更远。1688年革命把权力限制给于那些终身享有贵族头衔的人。该时代的保守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共和主义在瑞士甚至扭曲变形,在18世纪变得像其邻居一样沉闷压抑和难以忍受。

当1769年泡利从科西嘉逃走时,至少在欧洲,民主似乎已经死亡。的确,后来有一位名声很差的人在书中为它辩护,公众

舆论的领袖人物傲慢地对待它，他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一点也不令人担心，以至于乔治三世给他一笔钱花。美洲的进步给卢梭的力量超过任何政治作家所得。斯图亚特同意把殖民地作为远离他们的教会与政府系统的避难所，他们所有殖民地中最受欢迎的是慷慨授予威廉·配恩的领土。根据他曾属于的社会之原则，新的国家必须建立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配恩在贵格派信徒中还作为一名宽容新学说的追随者被进一步注意。[73] 因此宾夕法尼亚州得享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并几乎作为自由的惟一榜样受到18世纪人们的激赏。美国主要通过弗兰克林和贵格派政治影响到欧洲的政治舆论，革命时代的狂热转变为另一时代的理性主义。美国的独立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它不仅仅是一次革命的复兴，因为没有其他的革命发端于这么细小的原因，或进行得如此温和。欧洲的君主国支持它。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断定它是正义的。它建立了一个纯粹的民主制，但它是高度完美的民主制，因为它的力量与警惕用于对付它自己的缺点和极端，而非用于反对贵族政治和君主制。很多世纪以来英国因其对抗王权捍卫自由的机制而受到赞赏，但美国对自由的保护机制似乎更值得称赞。经过令人难忘的整整一年的商议，这种机制被用于反抗它自己的主权者即人民的权力。没有别的已为人所知的民主可与之相比拟，因为它尊重自由、权力和法律。没有别的宪法可与之相比拟，因为它包含在6项清楚明白的条款中。古老的欧洲敞开其心扉记住两个崭新的观念——破坏性不大的革命可以是正义的；大范围内的民主可以是很安全的。

在美国争取自己的独立之时，改革的精神在欧洲到处扩散，明智的部长如坎普曼内斯与斯图伦塞，还有一些好心的君主，其中最开明的是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他们都试着尽其所能和用

手中权力做些事使人们快乐。几个世纪专制和难以容忍的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权力滥用只能用最有力量的权力来消除。该时代与其说是自由统治不如说是知识统治。杜尔哥，当时最有能力和最有远见的改革家，试图为法国做无天赋者在伦巴第、托斯卡纳和帕尔马正成功在做的事情。他试图以牺牲上层阶级为代价用王权为人民谋利益。上等阶级太强大了，王权孤掌难鸣；路易十六无奈放弃国内改革，转而用与英国打仗来补偿，这场战争失去了它的美洲殖民地。迅速增长的债务迫使他寻求巨大的弥补，他再次遭到特权阶级的拒绝，最后他诉诸于国家。当三级会议召开时，权力已转移到中产阶级之手，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拯救国家。他们已足够强大，因而仅凭等待便能取得胜利。朝廷、贵族、军队都不能够做任何事反对他们。从1789年2月到7月巴士底狱的陷落6个月的时间里，法国走的路像英国从莱切斯特伯爵到比肯斯菲尔德勋爵600年时间一样远。《人权宣言》，在美国的联盟于费城宣布10年之后，在凡尔赛再次发布。该联盟在大西洋两岸结出果实。对法国说来，该果实是美国思想对英国的胜利。它们更通俗、更简单、更有效地反对特权，奇怪的是，对国王说来也更可接受。新的法国宪法不允许有特权等级，不允许有议会内阁，没有权力分立，只有一次停权否决。但是美国政府特有的保护装置被拒绝：联邦制、教政分离、众议院、最高司法机构的政治仲裁。弱化行政权的措施被采用，限制立法权的东西均被摈弃。对王权有很多制约；但若王位空缺时，其余权力不应有制约。预防措施单方面针对国王。没有人考虑到有可能没有国王的意外情况。宪法表现出对路易十六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君主制的深信不疑。大会表决未经辩论，鼓掌通过一份政府组成部分名单，约是维多利亚女王政府的三倍。路易逃走时王位实际上空缺，他们把他带了回来，宁愿这个当了囚犯的国王

有名无实，而不要压根儿没有国王的现实。

滥用美国的榜样几乎是所有主要政治家的缺点，除了摩尼哀、米拉波与西耶士，仅次于之的是革命事业受到其宗教政策的伤害。美国共和国之父所上的最著名、最令人难忘的一课，应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统治。公职人员是拿薪者，国家通过他们施行自己的意志。权力服从于公众舆论，它不仅是控制者，而且是政府的原动力。耐心地等待风向，敏捷地抓住它，担心发挥了并非必要的影响，这些是早期总统的特点。一些法国的政治家也 75 有此观点，虽然比华盛顿少了一些夸张。他们希望分散政府的权力，希望听到公众情感的真实表达，无论善还是恶。内克本人和吉伦特派最有思想的布兆特梦想让法国成为联邦制。在美国，没有令人害怕的流行舆论和力量组合。政府不需要担心被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实现是以牺牲权力阶级为代价的。除贵族之外，因神职人员加入而取得至高无上地位，起初也是由受欢迎的神职人员，如西耶士、塔列朗、西瑟与拉·卢日恩领导的国民议会，为神职人员创造了一个敌人 特权的破坏不可能不触及教会。神职人员的支持帮助王权走向专制。把之交到路易和他的部长手中就等于放弃宪法的所有方针。废除之也就等于使之转向教皇。与民主原则相一致的是把选举引入教会 它包含与罗马的决裂；但约瑟夫二世、査理三世与利奥波德的法律的确这样做了。教皇不可能抛弃与法国的友谊，如果他能够帮助它的话；法国的神职人员不可能因他们对罗马的忠诚制造麻烦 因此，很多人不感兴趣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马拉急切并也许真诚的抗议持反对态度，但报复受一个世纪迫害的詹森派支持国民宪法。对之实行的强制措施导致与国王的决裂和君主制的倾覆；还有各省的造反与自由的倾覆。雅各宾俱乐部决定不应由公众舆论统治，国家也不应由强大集团来

支配。他们坚持人民的代表由人民自己来控制。他们把更高的权威归于直接的而不是间接民主神谕的声音。他们以武装力量粉碎每一个反对者，每一支独立力量，特别是教会，因它们的原因各省起来反对首都。他们以最坚决的集权对付吉伦特派盟友的分权联邦主义。法国由巴黎统治；巴黎由其市民和乱民统治。服从卢梭的原理，人民的权力不可能被代表。他们提出基本的选民高于其代表。巴黎人民作为最大的选民团体，基本选举者

76 数量最多，也拥有最大比例的统治权，因此他们设想巴黎人民应当统治法国，就像罗马人民，从群氓到参院，应当统治（当然并非不光彩）意大利乃至地中海周围的半数民族一样。虽然雅各宾派几乎不比西耶士神父或罗兰夫人更不信神，虽然罗伯斯庇尔想强迫人们信仰上帝，虽然丹东也做忏悔，巴雷勒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们还是宣布现代民主无情地痛恨宗教，这与其清教徒原型的榜样形成奇怪对照。

法国革命给自由带来如此灾难的原因是其平等的理论。自由是中产阶级的口号，平等则是下层阶级的口号。下层阶级赢得了第三等级的战斗；他们攻占巴士底狱，使法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攻占杜伊勒利宫，使法国成为一个共和国。他们有权要求回报。中产阶级在下层阶级的帮助下推倒了上层阶级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和自己的特权，以纳税为限制条件它剥夺了自己盟友的投票权。因此，对完成了革命的阶级说来，其诺言并未实现。平等对他们说来什么用都没有。那时的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社会建立在自愿的和有条件的契约基础上，人与社会的联系，如使人受制于权威的那些联系一样，有充分的理由是有期限的。从这些一般的前提中马拉逻辑地引出他的血腥结论。他告诉挨饿的人民他们同意容忍富者的邪恶、限制自己的暴力的那些条件，富人们并未遵守。听任挨饿是自杀，眼看一个人的

孩子由于富人的过错而挨饿则是谋杀。社会契约由于它所造成的错误而分崩离析。重归自然状态，在此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所能做的事。到了富人为穷人让路的时候了。由于这种平等的理论，自由熄灭于血泊中，法国人愿意为拯救生命和命运牺牲其他任何东西。

在1789年开始的那个辉煌时机过去20年之后，反动势力在欧洲到处取得了胜利；古代的制度与新制度一起玉石俱焚；甚至英国既没有对之提供保护也没有对之表示同情。自由，至少民主的复兴来自西班牙 西班牙人为着一位国王与法国打仗，而这位国王不过是法国的一名囚犯。他们自己建立一个宪法，并把他的名字冠于其上。他们有一个君主政体，却没有国王。它需要这样设计，在君主空位，有可能是永久的空位时这个制度也可以运作。因此，它只是名义上的君主制，实际由民主的力量所构成。1812年宪法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想完成政治领域最困难任务的尝试。它是毫无结果的一击。它是多年来在所谓的拉丁民族中那些流产的革命之标准。它传播了这样的观念，国王只应在名义上享有荣耀，他甚至不应履行黑格尔分配给王权的卑微功能，点缀地说我服务于人民 77

1823年加的斯省宪法的推翻是复辟的法国君主制最大胜利。5年以后，在一位明智的自由主义部长领导下，复辟沿着宪制的道路稳步前进，这时对自由党无可挽回的不信任击败了马丁纳，产生了使君主制遭受毁灭的极端保皇党内阁。在使权力从革命解放了的那个阶级转移到那些被推翻的人手中过程中，普里格那克与拉·波登内耶很高兴地与劳动者讨价还价。以普选权为手段打破知识阶级和资本的影响，是他们的一些支持者所长期热心提倡的一个思想。他们并没有分裂他们对手的远见或能力，他们1830年被联邦民主政府所击败。

七月革命的希望是同保皇党和民主主义者和解。国王向拉法夷特保证他内心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拉法夷特要法国放心路易·菲利普是最好的共和派。这个重大事件的震动波兰、比利时甚至英国都感觉到了。它给瑞士的民主运动以直接的推动。

瑞士民主制从1815年以来暂时中止。民族意志没有了表现的工具。联邦中州的权力至上；但它的治理像在神圣同盟的阴影保护下的其他政府一样效率低下。对于瑞士号召进行的全面改革没有争议，对于他们所采取的方向也没有疑问。州的数量是所有改革的障碍。在一个相当于美国一个州而人口不抵一个大城市的国家中拥有25个政府，这是没有益处的。中央权力是这个国家的明显需要。由于缺少有效的联邦权力，若干个州便组成了一个保护他们自己利益的单独联盟。当民主的思想在瑞士取得进展之时，罗马教廷站到了相反的立场，对民主生活的气息显示出顽固的敌意。民主主义的发展与教皇至上主义的发展发生了碰撞。商德同盟(Sonderbund)说出了在联邦宪法下其权利没有保障的实情。另一些人则以同样的实情来回答，商德同盟的宪法也不安全。1847年，国家主权与州主权之间爆发一场战争。商德同盟解体，一个新的联邦宪法被采用，它公开表示承担实现民主和平息罗马敌对影响的职责。它是对美国制度的错误模仿。总统没有权力，参议院没有权力。最高法院没有权力。州的主权被削弱，它们的权力被集中到众议院。1848年宪法是联邦制破坏的第一步。另一个也差不多是最终的一步是1874年所采取的中央集权制。铁路及其创造的巨大效益使州政府的位置更加难保。与教皇至上主义的冲突要求进一步采取有力行动。州权在美国战争中的破坏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1874年宪法是现代民主制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它是民主的强制力对民主的自由之胜利。它否定的不仅是联邦原则，而且也

78

是代议制的原则。它采取的重要措施已经离开了联邦立法机构服从全体人民投票的原则，其决定未经商议。该运作过于笨拙，以致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效率的。但我们相信，它使权力的存在不受其他国家法律的制约。一位瑞士法学家坦率地把这种统治制度的精神表述为政府就是民族所约定的良心。

瑞士的动力是摆脱了所有限制的民主制，还有把最大多数的最大力量见之于行动的原则。国家的繁荣昌盛防止了如法国发生的那种混乱。路易·菲利普的部长们都是些有能力有智慧的人物，他们相信如果按他们的路子走并控制公众舆论就能够使人民富强。他们行动就像明智的中产阶级命中注定由上帝来统治。上层阶级在 1789 年之前已证明不合格；下层阶级在 1789 年以来也是如此。由专业人士，由工厂主和学者领导的政府肯定是安全的，并几乎肯定是理智和务实的。钱成了政治崇拜的对象，正如以前土地、后来劳动是政治崇拜的对象。以前同马蒙特战斗的人民群众意识到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仍然受他们雇主的统治。

79

当国王抛弃拉法夷特时他不仅统治而且掌管全局。共和主义者的愤怒在巷战中找到了宣泄。1836 年当那个可怕而令人厌恶的党以更大的权力武装王权并使共和主义者沉默时，社会主义术语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托克维尔正在撰写作为他著作结语的哲学章节，但他却未能发现这个新体系注定要加之于民主制的力量。直到那时，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分开的，虽然社会主义学说受到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受到梯叶里、孔德、切沃列与乔治·桑的辩护，但它们引起更多注意的是文学上的好奇心而不是作为未来革命的原因。到了 1840 年，在秘密社会的深处，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自由党的领袖拉马丁与巴罗肤浅地议论改革时，莱德律—罗兰与路易·布朗在迅

速地为君主制、自由党以及财富的统治掘墓。他们工作得是如此出色，而被打败了的共和派通过此联合那样快地恢复他们由于一系列罪行与蠢行所失去的影响，以致 1848 年他们能够不战而胜。他们的胜利果实是普选权。

从那时起社会主义的诺言提供了民主最大的动力。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盟是法国政治中的主要事实。它产生了“社会救星”与巴黎公社；它还缠绕着共和国的脚步。它是民主精神能进入德国的仅有形式。自由失去了其魅力；民主本身仍保持着是给人民群众的厚礼之允诺。

从七月革命和杰克逊总统推动民主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以来，最能干的政治作家托克维尔、卡尔霍恩、密尔与拉勃雷以自由的名义对之作了最可怕的谴责。他们指出民主不尊重过去，也不关心未来，不考虑公众的信仰和国家的荣光，奢侈浪费和反复无常，嫉妒才能和知识，对正义冷漠但对舆论卑躬屈膝，无组织纪律，不尊重权威，反对服从，对宗教和已有的法律心怀敌意。证据确实很多，即使真正的原因还不能证明。但是我们并不能把这些征兆归之于永久的危险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正如人们可以用很多理由来反对君主制一样，一个毫无同情心的推理者同样可以推断宗教不可容忍，良心产生怯懦，虔诚只是为骗取欢心。对于那些印行在色诺芬著作中、亲见后伯里克利时代衰微者的观察，以及对于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图的观察及这些作家批评雅典共和国的不朽论著，新近的经验并不能对之增加什么。明显和公认的困难是，民主制与君主制或贵族制不同，它为维护自己不惜牺牲一切，其奋斗具有一种国王与贵族所不能有的活力与貌似成立的道理，它还践踏代表权利，消除所有的抵抗和偏离力量并以公民投票、公民复决或政党预备会议确保大多数人意志自由的实现。真正的民主原则，即没有人有凌驾

于人民之上的权力，被理解为没有人能限制或逃避其权力。真正的民主原则，即不应迫使人民去做其并不想做的事，被理解为它从不需要容忍它不喜欢的事。真正的民主原则，即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应当尽可能地不受约束，被理解为集体的自由意志不能有任何束缚。宗教宽容、司法独立、对集权的担心、对国家干涉的提防，在国家的集权力量被人民之手所拓宽之时，都成为自由的障碍而非自由的保护装置。民主不仅声称是惟一至上的东西，没有比之更高的权威，而且声称是绝对的，在其之下没有独立；它自己就是主人，而不是一个代理机构。这个世界的原有统治者已经换成一个新的统治者，他可以被奉承可以被欺骗，但不可能被收买或抵抗，对他必须交出那属于恺撒以及属于上帝的东西。必须克服的敌人不再是专制主义的政府，而是国民的自由。没有什么比费拉里的爱好更有意义了，这位卢梭以来最重要的民主主义作家列数专制的价值，并宁愿要魔鬼也不要代表社会利益的圣人。

81

老式的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概念并不能使人民群众获益。财富的增加并未解除其困顿。知识的进步使他们陷入可怜的无知状态。宗教在兴盛，但不能触及他们。社会，其法律由上层阶级独自制定的社会宣称，对穷人说来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次好是死于童年，再就是经受生活在悲惨、犯罪和痛苦之中的折磨。正如财富的长期统治肯定用于促进财富的积累一样，穷人对权力的侵入也会伴随着将之广散天下的计划。看一看以前时代人的智慧用在教育和公共健康，在安全、合作和救死扶伤以及在保护劳动者反对自利的法律方面做的是多么少，在这一代所完成的是多么多，那么就有肯定的理由相信这样大的一种变化是需要的，民主主义的奋斗力气并没有白费。自由对群众说来并不就是幸福；制度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他们寻求的是一种足

以扫除顾虑和利益竞争的障碍,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他们境遇的力量。他们的意思是那个到现时为止已经建构伟大国家和保护宗教、保障民族独立的强大之手,还应帮助他们谋生,至少赠予他们一些生活必需品。这就是现代民主众所周知的危险。这也是其目的和力量。反抗力量的威胁,那个打倒了其他暴政的武器是没有用处的。最大快乐原则实际上已对之作了确证。平等原则,除了很方便地应用于财产和权力以外,还反对人或人的集团存在对共同法律的豁免和独立于共同的意志之外;权力只是一桩契约原则,可以很好地用来反对国王,但不能用来反对主权人民,因为一桩契约包含两个参与方。

如果我们比起古人在发展和检查病症方面所做并不更多,82 但在研究此治疗方面则远远胜出。除了共和国3年的法兰西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以外——自从欧几里德时代的执政官以民主制本身所提供的解毒剂对付民主制之恶这个最著名的尝试以来——我们的时代在政治实验方面一直富有创造力。

许多对策经过试验已被放弃或归于失败。行政部门的分立是从古代的君主制向共和国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孔多塞的贡献它已在法国生根,但却被证明是缺点。

1795年宪法是一位博学牧师之作,它把公民权仅限于那些能读会写的人;1849年该条款被一些人所拒绝,他们认为这些无知的投票者会帮助他们颠覆共和国。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没有群众教育,任何民主制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多务的计划只是对基本教育的间接鼓励。

1799年西耶士向波拿巴提出一个大议事会理想,其作用应是使立法机关的行动与宪法保持一致——这是雅典的 *Nomophylakes* 与美国的最高法院所承担的功能。由这个议事会产生 Sénat Conservateur 是帝国主义最喜欢用的工具之一。西耶士

意想他的委员会还可用作一种镀了金的陶片放逐制，有权罢黜任何讨厌的政治家，让他一年沉默一千次。

拿破仑三世想剥夺未结婚者投票权的计划，剥夺了法国两个最伟大的保守阶级，即牧师与军人的权利。

在美国宪法中行政首脑应当由许多经过认真挑选的选举者选举。但从 1825 年公众候选人听任一位只有少数票的人以来，它已变成由那些宣誓代表普选权的人选举总统的实践。

部长不参加国会是美国制度最严厉的特点之一；那项需要有四分之三多数的法律竟使路易·拿破仑本人成为皇帝。大选区产生独立的代表；但是经验证明大选区所产生的小型集会能够被政府控制。

混合投票与累计投票被当做对付多数的计划遭到普遍的拒绝。但是在财产与人口之间平均分配代表权的原则从来没有公 [83] 正地进行。它被索雷引人 1791 年宪法。革命使之没有生效；它在 1817 年至 1848 年被基佐机敏地运用从而使普选权的舆论成熟。

禁止为代表付酬的宪法；否定权力分离，使立法机关有固定任期或部分更新，同一议案的几次辩论等需要有一个间隔期的制度，明显地加强了代议制的独立。瑞士的否决权有同样的影响，它只有在全体选民的大多数而不是实际投票选举的大多数反对时才将立法搁置。

间接选举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很少使用，但是它们有的是按许多有思想的政治家喜好调控的民主制。选区的范围迫使选民投票选举他们并不熟悉的候选人，这种选举并不自由。它由幕后操纵者以及政党机器所安排，而非选举人所能控制，间接选举将当事人的选择交到操纵者手中。缺点是中间选举人一般说来都太少以致不能填补投票人与候选人之间的空隙，他们选择的

代表不是因其有较好的品质，而是因为有不同的政治主张 如果中间团体由全体选民的十分之一组成，那么联系将得到保持，人民将真正被代表，选举人名单制度将被取消。

民主制一个常见的恶是大多数的暴政，或宁可说是政党的而并不总是大多数的暴政，因为政党通过暴力或欺诈成功地操纵选举。政党对大多数的替代是为了避免危险。代表权的公共制度将此危险永久化。不平等的选举并没有给大多数带来安全。平等的选举也没有给少数人带来什么。35 年前已有人指出补救是代表按比例。这是意义深远的民主，因为它增加了成千上万除了在政府否则就没有发言权的人的影响；它的设计使人更接近于这样一种平等，即没有选票被浪费，每个投票者对国会所贡献的都是他作为一个成员自己的意见。该思想最初由格雷勋爵与康西德伦特作了不同的表述。丹麦的成功榜样与密尔的热心提倡使之得以保存在这个世界的政治主张中。它随着民主制的发展而深入人心，我们也从纳维尔先生那里得知瑞士的保守党和自由党激进派联手推进它。

84

在对民主制的所有责难中，联邦主义最有效也最受欢迎；但它变得与赤色共和国、与封建主义、与阴谋家、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而威望扫地，让位于集权制。联邦制限制和约束统治权力的做法是将之分裂，只分给政府很有限的权力。它不仅是控制大多数而且是控制全体人民权力的惟一方法，它也为第二院提供了最强大的基础，从而为每一真正民主制中的自由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基佐的倒台证实了对教条主义著名格言的怀疑，即理性是统治者，而非国王或人民；它也进而使人嘲笑孔德的允诺，即实证主义哲学家将生产出政治思想，对这些思想任何人不得异议。但是把国际法和刑法放到一边，在那里有一些达成一致的办法，

在政治经济领域似乎承认强大的科学确定性。无论它在何时实现,只要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者的争论结束了,社会主义传给民主制的消极力量就会被耗尽。该争论进行得比以前更为激烈,但是它通过一个中间党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级。无论由一些一流欧洲经济学家所推动的那个引人注目的运动是否肯定能动摇他们的科学权威,或通过使其秘密失去力量来征服社会主义,它肯定被纪录在案的是作为最后和最认真的努力将证明卢梭关于民主制是神的政府、不适合人类的重要论断不能成立。

我们已经涉及集中在厄斯金·麦先生著作中的有限几个论题。虽然他比托克维尔更清楚地察觉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但他的判断并未受托克维尔的悲观情绪影响,他对进步方向的思考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自信。历史具有不可更改的逻辑,这个观念并未使他沮丧,因为他本人关心的是事实与人类而非教义,他的书是几个民主国家的历史而非民主理论史。有些论点的联系与发展阶段他未予注意,因为他的宗旨不是搞清楚这些思想的性质与联系,而是解释经验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语言和思想是自由的;每一代人只为自己立法;捐赠、不动产继承和长子继承权都将不存在;人民的统治;人民不可能犯错误;所有这些民主主义教条的起源与结果,我们或许应该不受影响地查阅其记载。当然,那些对实际的政治感兴趣的伟大群众并无这种研究古玩式的好奇心。他们想知道从那些已进行民主实验的国家能够学到些什么;但他们并不关心得知瓦丁敦先生如何修订《安西兰姆纪念》,玛丽安娜与弥尔顿,或佩恩与卢梭之间有何联系,谁发明了谚语民之声即天之声。厄斯金·麦先生不太想讨论思辨的理论问题,他把篇幅用于单纯的政治史,在论述基督教的政治行为时他的笔触有些不确定,或许这个最复杂最宽泛的问题能够难倒一位历史学家。他轻视中世

85

纪教会对刚从野蛮的异教徒中浮现出来的国家之影响，当它与专制主义和迫害联系起来时他却称赞它。他坚决认为17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解放行为，虽然它对专制主义是个促进；他很迟才认识到那股在17世纪的热情与暴力中影响到民主历史的最强大力量。美洲的遗漏在1660至1789年之间产生了一个空白，上个世纪的革命运动中留下很多东西尚未解释，这也是本书的主要问题。但是如果有些事情在设计时就有遗漏，如果实施时并不要面面俱到，那么仍可称赞厄斯金·麦，他是把民主的比较研究之材料组合到一起的惟一作家，他避免了党派倾向，他从内心赞同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并对指导它的智慧和力量抱有坚定的信念。

第二部分

英美的自由传统

四、清教革命*

在伊丽莎白去世时，英国在政治上已与大陆分离，此后即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很久以前，一些政治观察家如考明斯与福蒂斯丘就认识到这个岛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但是这些制度并不强大到足以抵抗都铎王朝，于是开创的工作又得从头再来。开始是按古代的方式，因循传统与旧例；当发现它们不那么令人信服时，又寻求新的，寻求普遍而带有革命性的原则。这些政治方针的组合与改变是我们以前时代的独特注解。

当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时，这个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是成为一个由海洋护绕的岛国。不再有敌对和好战的邻国，也没有强制的战备和集权，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外国政府的专制主义。一位英国的官员曾祝贺莫尔特克创造并领导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位元帅摇摇头，回答说德国军队是国家的一个巨大负担，但与俄罗斯的漫长边界使之成为必要。

在国内与贵族及苏格兰教会斗争处于无助状态的詹姆斯认为这样一种权力观崇高而理想，即一个君主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他根据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跟着不确定的舆论变化随波逐流。他带着对其财富和文明的期望来到英格兰，它的知识和文化那时正达到顶点，从而给

---

* 阿克顿：《现代史讲演集》（伦敦，1907），第11章。

开明的国家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受欢迎的场地。斯图亚特王朝在某些方面得益于该时代两个最强大和最流行的政治思想。从马基雅维里时起他们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按自己的目的、通过专家统治自己，而不依赖社会的力量或那些不懂国际政治、军事指挥、经济和法律复杂问题的人的希望。他们也采纳了路德新的受到赞赏的王权神圣之教义。他们一致反对詹姆斯所熟悉的来自他的教师布坎南的一种相反理论，该理论导自于诺克斯及他的中世纪老师，并被错误地引入加尔文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把之裁定为英国的法律。他们使英国国教会成为良心的拥有者及神的意志的神圣阐述者。他们有都铎王朝的成功榜样，显示一个政府既可以是专制的，同时又可以是受欢迎的；自由并非英国人心中的最高愿望。他们也有欧洲的一般趋势和共同之处，知识界也一样，是胡克、莎士比亚和培根的家园。世界上最好的哲学家、最博学的教士以及许多第一流的法学家支撑着他们的事业。他们并不一定相信无所事事的乡绅或地方的多事佬对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性的理解会好于受过培养的行政官员，而声称对行政部门的人像司法部门的人一样信任。神职人员是他们的力量，英国圣公会宣称忠于正统和消极服从，并愤怒地反对耶稣教会及其追随者。国王对君主制的赞同不可能比神职人员少；他不可能不要他们的支持；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从君主是控制者而不是被控制者这样的立场出发，显然不存在介入很深或难以对付的纯粹反对派。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是宗派主义的支柱，但还不能够从税收的回报中清楚地发现之。斯图亚特王朝很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仅比他们的对手更聪明，而且也更自由，因为清教徒一再要求对异教徒的回报应当是死亡。国王的开明与国会的开明之间的区别显然是个天主教问题

詹姆斯一世并不想搞迫害。在与两个地位非常高的人，即安德鲁斯与卡绍邦讨论时他提出旨在最终实现统一的和解观点。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君主制的提倡者和殉教者。他的妻子皈依耶稣会。他则认为刑法只是为了防御政治上的危险，而不是为了防御宗教上的危险。他希望与罗马达成一个约定，它保证对天主教的忠诚，以换取无比宝贵的宽容。教皇克莱蒙特八世奥多布朗迪对之不满，他发出指令对詹姆斯不予承认，除非他保证作出更大的让步。他说，他担心走得太远了而有利于一位异教徒。他的信仰并未公之于众，但他们开始了解凯茨比，并对他表示欢迎。一个可能不被承认的国王是一个可能被废黜的国王。当他的提议被拒绝时，詹姆斯提出一个反对这些教士的声明，该声明是对此密谋的决定性挑战。伊丽莎白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使用暴力反对众多的阴谋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要求。但是她的继承者并没有被判退位，他的论述的合法性并未被伪称反对安妮·博林之女的论点所影响。天主教有理由希望他们在新政权与新王朝开始时所得到的较好待遇将继续下去。 91

在失望之打击下，一些人认为自己已被解除了忠诚的义务，他们所剩下的只是自保的手段　他们视詹姆斯为入侵者　我们无法说出他们知道其私人生活与谈话是多么卑劣可憎，用外国公使的话说，没有人有勇气把之见诸文字　在任何集团都会有胆大妄为和充满激情之人，他们策划犯罪却伪称受更高目的的指导。我们看到他们中一些人谋杀里乔并把普雷格从窗户扔下去。但是这里的水更深　一些共犯如迪格比在其他方面并无过错，并具有令人尊敬的品质，他不应被责之以伪善。然而主要的耶稣会成员都牵连进来。他们远没有鼓励这个计划，罗马正式禁止使用暴力。但是他们并未给以危险的暗示，他们沉默的理由是虽然为救一个天主教的王公可以发一个一般的警告，但忏

悔的誓约仍绝对是反对新教徒的。

这些人全都不可救药的看法出现了 1572年的先例建立了谋杀权。该联盟的空头理论家及其同代人又增加了革命权，矛头指向其统治很少受到称赞并与新教徒对立的王公。理论家如何分裂，或者说该理论用什么样的细微例外来得到证明，无人能够准确地知晓。亲见盖伊·福克斯的这代人是难以安抚的。詹姆斯国王却不是这样。他决定保持王族与其对手的多方面区别，他很快发现忠诚的誓约没有用处。斯图亚特诸王真诚地相信议会捣乱的动机不是由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所激发，而且认为他们自己也是在从事反对残暴的压迫者的神圣事业。我们回顾结果，争端不是很清楚，刀锋也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锐利。国王与议会斗争不已的问题并不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民主制还是贵族制、自由还是抵抗或背叛自由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斯图亚特的事业很像大陆的立宪君主制，如路易十八治下的法国，威廉皇帝治下的普鲁士 如果俾斯麦在的话他会是王党的力量，克伦威尔就会遇到对手。

詹姆斯一世治下的反对派几乎无时不在，他们实际上已很重要，并预示着1621年的未来。接着平民百姓在最著名的英国法学家柯克的指导下打倒了培根，免除了斯图亚特王朝所曾有过的最有能力的枢密官。对大臣的弹劾与大臣的责任都保留了下来。

詹姆斯的统治也是殖民帝国的开端。弗吉尼亚州是贵族保王党的殖民地，他们在这探索的时代去寻找黄金；新英格兰是平民百姓和独立派的居住地，他们为躲避压迫而移居于此。他们关于人类权利并无很清晰的概念；但是这些理论在压迫者的制度下和受压迫的人中已经成熟。康涅狄格州是地方自治和联邦式的，罗得岛则是精神上的自治和宽容；从这里两种制度传向美

国，当时机来临时，来自詹姆斯一世治下的弗吉尼亚的保王党人就会超过五月花号的逃亡者。他们产生了"独立宣言"，并把宗教自由与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传到美洲。前 5 位总统中有 4 位是弗吉尼亚人。我们历史上抵抗克伦威尔的最有能力的人曾在马萨诸塞湾研究实用的政治主张。 93

斯图亚特第一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给现代世界以深远影响的第三个事件是这样一些人的兴起，这些人当我们认为他们是一个教派时称之为卫理主义者，当我们意指一个政党时称之为独立派。按他们的立场这个时代更应该叫清教改革而不是清教革命。包括独立派在内，这个宗派是英国人对路德和加尔文事业的贡献，它领先于 17 世纪的思想。大陆新教影响到英国圣公会的社区，我们的被流放教派穿过大西洋之前在荷兰与德国新教最早和最虔诚的余脉有过接触。在那里罗宾逊完成了罗伯特·布朗的体系，布朗是个不重要的和没有激情的人，关于他我们读到："布朗老爹，经证明受他的老妻殴打，特别是他没像他的妻子那样打她，而是像一位饱受折磨的老妇。"

独立派的权力与神学理论无关，而与教会政府有关。他们并不承认目的论的学说教义，而是等待新真理的到来 每个公理教会都独立自治，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参与管理，他们有合作，但是无服从。教会不是由政府或会督或长老统治，而是由它所组成的群体统治。它符合地方自治和民主制的理想、作为历史产物的制度被废除而代之以大众控制；一个设立的教会，一个与政府相联系的教会最令人厌恶，被冠以巴比伦之名。

政治后果影响久远。人民至上地位被教会体制所接受，政府不可能加以拒绝。但它的支持有强烈的偏见 罗宾逊说："我们不是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而是并驾齐驱。"他们不仅赞成自由，而且赞成平等，并拒绝过去的权威和用死人控制活人 理

性之光使人们能感受到发黄羊皮纸的至上权威。在没有国家教会的地方也不能够有权利压制良心。迫害被宣判为精神谋杀

94 路德与宗教改革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所有的教派都是自由的，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一样。独立派的战斗，如他们所表述，不是为他们的宗教，而是为良心自由，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他们的信条中没有英国人对其他民族、或独立派对其他教派的特权，所有这些都存在于他们制度的严格逻辑、他们关于教会体制教义的直接结果之中，它给他们的自由主义奠定无可估量的宗教基础。他们中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一样远，或以同样的勇气运用原则。在宽容问题上他们受到浸礼派教友的支持，在佩恩出现以后受到贵格派的支持，虽然他们的历史学家感叹它不为人所知。1641 年伦敦只有一个公理会团体，有 60 至 70 名成员。10 年前布鲁克勋爵写道：全英格兰非英国国教分子不超过 200 名。很清楚人数的迅速增长很难全部计算。独立派并未发起内战，但他们强大得足以使之结束；当他们胜利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全都烟消云散时，他们的理想却保存了下来

查理一世与他的父亲相比是个更好的人，但却是更糟的国王，他毫无见解。在权利请愿之后他自己统治一个无国会的国家，问题在于他不知以权力还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它与美国内战的问题很相像，邦联不知道打仗是为了国家权利还是为了奴隶制。我们称他为英国圣公教会的殉难者。但在他生涯的某一时刻，他是有可能以牺牲无国会的君主制为代价拯救主教制的。他受斯特拉福德与劳德控制，这二者都是强人。当查理一世必须为自己考虑和行动时，他的思想也许总是不清楚的。他忠于英国教会，但是宗教斗争使他困惑。王后的牧师中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认为《三十九条教规》可以对罗马作出友好的解释。劳德说："罗马的宗教与我们的完全一致。"这并不奇

怪，也许他应该受到怀疑，有这么多国王的大臣——温德班克、克廷顿、韦斯顿——成为天主教徒，还有一些人据传也有此事，德比伯爵在伍斯德之后被带到纽瓦克处死时，一个奇怪的骑士加入了马车队，并有一段时间骑在他的旁边。据说这是一个牧师，在此死亡时刻接受了他、宽恕了他 虽然罗马的使节与这位大主教谈判并向他提供红色的主教帽，但从未完全理解他，也不能够解释他为何如此捉摸不清。他们并不希望改变他。有一次他们甚至报告了更多的乌舍尔所希望的事情。

95

但是在宗教问题上，政治反对派并未得到国家的支持 罗马代理人与教廷使节本身就是宗教问题的一部分，并非只有主教制才是问题。考虑到以前让英格兰靠近罗马的计划受到谴责，我们一定记得，理解对手的艺术是本世纪的一项革新，为历史上所特有。过去，一个人为了说清楚他自己的意思费尽力气以得到他朋友的帮助 充斥我们新近文学的制度定义与比较还不为人所知晓，每个犯错误的人都被认为坏透了

我们不能回避三大牺牲者——斯特拉福德、劳德与查理一世——是否死得其所之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被处死是不合法的，因此是不公正的。同时，最高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总是在国会一方。但是我们除了指向更完善和更牢固的自由进步之理想以及自由人类的神圣权利以外，没有线索能够穿过现代政治错综复杂的迷团。用此测试标准来判断，此 3 个罪犯都该受谴责。这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准备看到它如何运用到几千里之外，如何运用到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特别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战争爆发时，国家分裂了，但不是势均力敌。北方和西方支持国王；但北方和西方都比南方落后，南方拥有伦敦和更多的财力。从南德文郡到亨伯的常用路线被大大简化。由于查理占据

牛津与诺丁汉，而国会拥有港口，虽然并非从普利茅斯到赫尔的所有介入地区，但也达到格洛斯特的塞汶河与默西附近的爱尔兰海。双方没有一方占上风，因为人们充满疑问，而打仗的军队总的说来太小。因此，斗争松松垮垮并且进展缓慢。长老派控制了局面，并左右着国会。起初，由于活力不足，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在蒙特罗斯统治下的苏格兰土地上产生了一个天才战士；但在英格兰，克伦威尔铁甲军以他们的组织纪律性而占优。德国写军事史的作家宣称克伦威尔是现代战争中最好的骑兵将领，是他们的腓烈特的老师并超过他，腓烈特的名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军事艺术。结果一个是压倒性的胜利，一个是毁灭性的失败。但是主要原因是一位特殊人物的天才，他所属教派迅速发展和扩散，但持续时间不超过他身后。他构造的制度被毫不费力地推翻，摧毁者没受到任何抵抗。因此，士兵比政治家更伟大。以后岁月的舆论变得对克伦威尔非常有利，这主要归功于加德纳先生。但是直到《生平》一书由费斯先生和莫利先生完成之前，我们时代对他的评价尚未出现。

96

那些把这位伟大的非国教教徒当作崇拜对象的人有些明显的缺点有待思索。赞同普赖德清洗的克伦威尔是事后的共犯普赖德上校驱逐了国会的多数派，以使少数人能够要国王的命。这是一个非法的和暴力的行为，是对法律丑陋可耻的冒犯，犯下嗜杀成性之罪。在一般情况下这样一件事将会臭名远扬。这也是一件没有远见的政治举动，激怒了的长老派人士无条件地让查理二世复位。接着，护国公在胜利时宣称看到了上帝之手，情况就好转了。人类之手是做不出这种奇迹的。它们显示天意彰彰，等等。没有比神化胜利更危险和更不道德的心理习惯了。第三，他是自由制度的死敌。现代史上几乎没有任何英国人有如此糟糕的记录。承认所有这些以后，我们并不能很随便地说

他在实际取得成功的那些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能力是没有远见或建树的。在此方面以及在此限度内，他从未被我们种族的任何人所超越，无论这里的还是美洲的。

范内和哈林顿均是造诣更深的政治思想家。哈林顿被美国人称为有印刷传媒以来最有才华的作者，因为他指出了大叛乱所以失败以及查理二世的反动随之而来的理由。他说它之失败乃是因为忽略了对王国财产的再分配。大地产构成了一个贵族社会，在它之上不可能建设民主国家。如果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国家就出现新的秩序，也就会接受平等的法律。一方面贫困在减轻，另一方面贵族将被彻底清除。胆怯的保守主义与法律上的顾虑使之成为不可能。根据自然法，政府从社会中获得形式和力量。不需要走得如此远，如所见到的克伦威尔制度，那是少数人的作品，由一位卓越和天才的人领导，在失去这个必需有的领导人时就会土崩瓦解。

97

共和制是革命道路的第二阶段，它开始于尼德兰，在美国和法国继续，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拉开一定的距离来看，该时代的价值不在于它所创造的东西，因为它除了毁灭以外没留下什么创造物，而在于它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观念财富。它给英国革命提供素材，接着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革命思想变得富有效率和精彩，它们的来源反而受到了否定，因为起初它们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理论。当它们抛开其神学渊源，翻译成政治学的科学用语时，它们就作为普遍真理而不是英国的舶来品征服与传遍这两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很少看到有什么能超越霍布斯的保守主义，或范内、哈林顿、弥尔顿以及较为清醒时刻的利尔本的自由主义。这是我们从长期国会、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所继承下来的遗产。

我们必须论述实质上属于宪制史的事件，但我们只能稍有

涉及，因为我们不能逾越已定的范围。我们的论题是，无论多么专制的君主制，即使它能够成功地越过英吉利海峡而企图在没有明显危险的情况下在英国建立，都会失败并为失败付出昂贵的代价。在此斗争过程中，思想无论怎样发展都会被证明足够强大和持久，从而实现一个具有全新结构的宪制政府。正是在这一点上民族史转变成现代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成为世界的领袖。

五、辉格党的兴起*

98

自由思想无论在这里还是在美国都产生于宗派圈子，而没有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直到它们脱离其神学根源，变成一个政党的信条。其间的过渡贯穿了查理二世的统治时期。那是政党代替教会成为政治力量的时代。

一位绅士写信提醒我独立派并未一起或全部断绝教会与国家的联系，或宣布宗教自由是一个统治原则。他们作为个人而从不作为集体行动，这样的个人所为与该制度的逻辑是一致的。在1616年的"请愿书"里他们说："我们也在《福音书》指导下否认一个国家、省和教区的教会是一个现实的、可见的和政治的教会。"约翰·罗宾逊写道："英国的教会或国教我们认为是巴比伦，我们在精神上与之分离。"1644年我们被告知："戈德温是长老宗的死敌，他公然要求对所有教派，甚至给土耳其人、犹太人、天主教徒以充分的良心自由。"小册子《独立派有什么》的作者写道，他认为追随错误的良心行事或反对之都是一桩罪恶；但是反对良心是更大的罪。违反良心行小恶的人，就已经为行最大的恶作了准备。因此他想把良心自由作为英国最重要的善。

当我说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与最虔诚的新教徒余脉接触时我指的是德国的再洗礼派。英国的浸礼会教友与贵格派都如我

* 阿克顿：《现代史演讲集》(伦敦，1907)，第12章。

99 已提及的独立派一样强烈反对宗教迫害原则。

查理二世在倒台之前只受到两个限制。其中之一是良心自由。克伦威尔并未留下一个已建立的宪制框架，他的军官们并不比他的儿子更成功。军队拒绝服从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国会，当普赖德驱逐多数派时，少数派保留下来。这个国会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法律，而是建立在暴力以及那些渴望饮国王血者的行为之上。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恢复长期国会，把权力交给长老派的大多数。他们已被驱逐，无须为近12年的失败和宪政不稳定负责。这显然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从苏格兰的蒙克到约克的费尔法克斯，还有兰伯特在纽卡斯尔集中起来会见蒙克的那支军队。它没有为自己帝国的统治权力打仗就遣散了。

值得在基佐的《理查德·克伦威尔》第2卷研究蒙克为获得理想结果而准备实行的完美政策上花些时间。因为召回被驱逐的成员就是恢复那个坚持与查理一世协商的人的权力，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是保皇党的那些人之权力。他们不是专制政府之友；但他们肯定会恢复君主制。鲁莽的保王党人的过早起义被镇压；蒙克的目标是赢得时间，直到最无观察力的人也能察觉到肯定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人感受到费尔法克斯的压力，费氏患了痛风病，但他自己能上马，并在约克郡召集了一个自由议会。在此旗帜下他于新年那天穿过了特威德河的冷流。他已经是英格兰的主人，在去威斯敏斯特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处于极端状态的共和派给他王冠，这是蒙克所拒绝的。他也拒绝了国王的提议，国王要他当大臣和统帅，就是没有金钱的慷慨赏赐，而据认为这才是这位将军所喜欢的。他知道时候一到他定会得到报答。它来得太快了。长期国会让位于制宪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它使根本法有了改变，而最终废除了国王的封建权利。在这些议案通过时，查理发布了由蒙克所提出的

布莱德宣言，王权得以和平地恢复。

100

全国都为逃脱共和派的错误领导而高兴，法码倾向于人数众多的阶级，相信国王会接受难以忘怀的教训。新政府并非胜利的君主所强加的。它是民族意志的一个表现。国会保留了控制权，并无政治上的反动。

新出现的变化并没有继续加强特权者而是加强了绅士的力量。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靠把税收加在其他阶级身上而得以从封建税赋中解脱；其成员来自城镇并遍布国家；抵抗国会军以保卫社会的军队受这些绅士的控制。新的社会秩序不是一个党派而是一个阶级的工作。占支配地位的保王党拒绝与过去的清教徒政敌分享权力，为惩罚无能的新教徒采取了一切措施。新教徒被排除在所有公务活动之外，无论在教会还是在国家甚至在自治市中。那个主要由教士所组成的阶级就这样通过宗教的考验确保了他们自己的所有政治权力。然而，他们又增加了一种政治考验。他们又强加一个赞成不抵抗的誓约。任何人不加入后来被称作托利党的一方就不可能拥有公职。这是圣公会的教义；与保守的乡村绅士联系在一起的神职人员开始统治这个国家，其基本的原则由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霍布斯所提出，他否认权利，甚至否认良心的存在。

克拉伦登是大臣；在他眼里通过压制长老派压制圆颅党人是一件很聪明和带有政治色彩的事。在教政问题上他比当时活着的任何人看得都更深；他并不相信仅建立在教会政府的安排基础上的分工神圣不可改变。乌舍尔大主教向长老派作了很大让步。巴克斯特向主教制让步。霍法德的看法提供给他，据认为他会接受。莱顿像英格兰的巴克斯特一样是苏格兰最大的清教神职人员，他接受一位主教的提议，成为格拉斯哥大主教。复辟的政府并不宽容，因为这样能够实行政治压迫。但并未用于

天主教徒。克拉伦登保证他们将从宽容中得益,后来在布莱德也对之作过允诺。此后他采取压制清教徒政策,他未能遵守诺

101 言。不合人情的局面未能持续到他下台以后。清教徒曾向王权开战,天主教徒也曾捍卫过它。当它复辟时他们自动发布了一系列的公告宣布他们的原则,应付惯常有的猜疑和责备,旨在充分得到忠诚的誓约。没有人距艾伦与帕森斯之榜样比为君主制复兴而欢呼的英国本笃会修士和爱尔兰的方济各会修士更遥远。与之相对立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迫害者的老观点已经无效。

克拉伦登倒台后又试行了一个不同的政策。对清教徒的强硬排斥给英国人留下一个邪恶陋习——他们为自己的岛国而骄傲,对外国人具有偏见——这直接导致与西班牙的对立,因为无敌舰队夺取并渡过海峡;如今又强烈地反对荷兰人,他们是危险的海上竞争对手,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至少在那时与法国人是对立的,其伟大的政治家马萨林曾与共和国建立关系,并与复辟的国王保持友谊。关于几内亚海岸的一个争端被约克公爵激化成一场争吵。公爵是一位航海家,希望靠他的专业技能加强在国内的地位,他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成功。正是这场战争结束了三国联盟前沿阵地令人难忘的变化,该联盟使荷兰、英国与瑞典联合起来反对法国。这是个受欢迎的但总的说来没有多少效果的措施;1669年英国抛弃它的盟友而转向法国。路易十四通过多佛尔条约获得了重要的外交上的成功,这是推翻斯图亚特君主制、引入现代类型的宪法体制一系列事件的第一步。

查理二世回英国后不久就公开与罗马谈判,谈判通过他的一个儿子进行,该儿子年龄比蒙默思大,是一位耶稣会士;他徒劳地想从亚里山大七世那里得到补给。后来他寻求法国的帮助。他说,除非恢复天主教,否则王朝权力的复辟是不可能的。

如果路易十四能使查理二世独立于下院，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该计划准备于1669年1月实施，阿林顿因一笔1.2万镑的贿赂而表示同意。决定通过一种足以让王权高于国会限制的武力之炫耀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路易十四提供8万镑来实行这个计 102 划，如果遇到抵抗，承诺提供一支6000人的军队，作为在英国的法国警备部队，以压制清教徒。数量远少于查理二世所望，因为法国国王的目的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他。条约的第二点是英国承诺支持法国对西班牙的任何权利要求。最后，英国得帮助她的同谋反对荷兰，以换取进一步的回报和吞并沃西伦。荷兰战争同意推迟到1672年。这就是所谓天主教阴谋之幽灵的全部内容。

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天主教的外衣下引入君主专制的阴谋，它使英国依赖于法国，不仅接受法国的金钱，而且从属于法国的军队。原先查理一世与他的大臣还没这样就上了断头台。

如果事情公之于众，无人能预见结果。图伦尼得知情况，因为如果实施打击的话将需要他；图伦尼又告诉了一位他熟悉的女士，她被证明不值得信任。国王大发雷霆，问他为何如此愚蠢。这位元帅不太习惯受到抨击，回答说他并不是被女人所愚弄的惟一男人。国王路易十四也不想将谈话继续下去。他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即使在英国为实现此协议什么也没做。他将查理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使国家反对查理，只需将秘密文本泄露。他再不可能难以对付。如果其他所有使他与他的人民分离的诡计都无效，这一个也不可能失败。许多年以后一位意大利冒险家关于路易的一本书付印，这个秘密才被揭露出来。该书受到查禁，作者因出版而被捕。但有150本流出，犯人6日后被释放。对查理说来与国会对抗是危险的。沙夫茨伯里早就了解真相，并从1673年10月被解职时起就确定了他的策

略。多佛尔条约所制定的计划是危险的，荷兰战争打响之后法国军队不会无所事事。

查理尝试进行的另一场战争达到了目的　他和他的弟弟都103 为自己的缘故想定天主教为国教。他们并未改宗，但都想在生前这样做。差别在于詹姆斯愿为他的宗教作出一些牺牲，而查理却不。他们都把恢复天主教为国教视作使王权高于法律的惟一手段。主张国王拥有权利免除国会所强加的惩罚与限制，可能更为安全。该思想早在1662年就有，10年后成熟，当时刑法与被认为是君主制保障及反对清教徒的克拉伦登偏执立法均被宣布无效。包括沙夫茨伯里在内的大臣们希望得到非国教徒的支持。这个考虑被证明为错误。异议者根据一项保证，如果他们对抗国王的提议将受到国会的赦免，因此他们拒绝接纳他们。他的宣言的目的太明显了，竟公开地表露出来　正在这时约克公爵成为一名天主教徒，虽然事实并未公开，但还是受到怀疑。大臣们向查理建议继续给予宽容以及声称有豁免权。查理屈服了，接受他的失败。他屈服乃是因为路易的建议并允诺他一与荷兰人讲和就向他提供比约定更多的法国军队。

下院通过把天主教徒排除于公职之外的《宣誓条例》加强了他们的胜利。约克公爵从他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为高级海军上将勋爵。他说，这是剥夺他王位继承权计划的开始。1673年10月曾推进《豁免宣言》的沙夫茨伯里被解除职务，成为反对派，为此目的路易送给他1万镑。他从阿林顿那里得知《多佛尔条约》的主要内容，在接下来的1月该秘密的内容在一个小册子上公开，它印在《国务短文》上。从那时起他就致力于放逐詹姆斯

1676年约克公爵把他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的消息公之于众。这看上去没有道理，以致人们认为他因法国国王的支持而很强大。他仍然忠诚于《多佛尔条约》的方针，他的兄弟已经放弃了，

他仍然等待着为恢复他的教会而组织力量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被充分理解，他的敌人沙夫茨伯里毫不留情。

1678 年 9 月他淡出政务已达 5 年，这时泰特斯·奥茨出现了。谁带他来还不清楚，还有受雇佣的证人贝德罗·丹杰菲尔德和特伯维勒。这是个危险的行当，后者为获得 600 镑作证反对斯塔福德 沙夫茨伯里不是首创者。他不会等这么多年 他在此事件中的作用是为毁掉约克公爵而发布了公开的警告。因此，从 1678 年之夏开始就有第二个阴谋，第一个在《多佛尔条约》中，由天主教顾问阿伦德尔·贝拉西斯(即历史学家贝林)和天主教的兄弟莱顿所起草 第二个是清教徒反对天主教，特别是约克公爵的阴谋，反对真正的多佛尔阴谋之义愤实际上带有政治性质。

1675 年 2 月反对派向詹姆斯二世提议，如果他抛弃路易十四，他就可以复位，当帝国的使节 1677 年抱怨说没有罗马天主教的声音时，他们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宗教，而在于自由。至于奥茨与他的同伴，其宗教以外的政治动机仍不清楚，奥茨是一个无知的人，他之得到信任只是因其发现政变预谋而引起激动和猜疑 戈弗雷是从事审讯的地方法官，他警告詹姆斯说约克公爵的秘书与此事有牵连，他的名字叫克莱曼，他有时间毁掉文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捉，他们谈到正在准备给新教徒狠狠一击，显然他也得到了路易的酬金，并请求他的忏悔神父作辩护 神父拉切斯为 30 万镑想摆脱国会，据认为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他还没有烧掉的文件中发现，那么那些已垮掉的人情况将会更糟。它显示仍在执行的多佛尔计划是危险的，就在那时那位发出警告的地方法官消失了 过了几天他的尸体在格林柏里山即现在的樱草山脚下被发现；最不寻常的一个巧合并令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是，那位悬而未定的谋杀者们名叫格林、柏里与希

尔。当然也怀疑高德福雷被谋杀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间情绪激昂。在两位耶稣会会士被处死那天，一位天主教使节写道，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拯救伦敦城所有天主105教徒的生命。沙夫茨伯里利用公众的这种情绪，提出应因詹姆斯的宗教问题而排除他的继承权。王位传给下一个继承人奥兰治公爵，这也是由该勋爵所提议。与此同时第二次《宣誓条例》把天主教议员从上院驱逐出去。詹姆斯退出议会，退出宫殿，最后退出王国。

第二次《排斥条例》所依据的不是他的宗教而是他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与法国国王的叛逆关系。反对驱逐的人提出限制王室的权力，如以前所曾有过的那样。查理宁可修改宪法而不要一个能使议会控制继承权的条例。奥兰治的威廉也强烈地反对之，因为同样这些限制可能在他妻子登基后用来对付她。挫败《排斥法案》保护《限权法案》的哈利法克斯向威廉保证这个法案不会被动用，因为他提出他的法案的惟一目的是遵照法律，防止议会对继承权的控制。

为得到能毁掉詹姆斯前景的证据，现在决心对天主教上院议员进行审讯。斯塔福德是第一个。他并没掌握那致命条约的秘密，但是该计划这时被很聪明地搁置。虽然斯塔福德勋爵是完全无辜的，奥地利大使桑伯爵还是对反对他的诉讼案罪名之重和辩护之软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尖厉的咒骂和欢呼声中被处决。阿伦德尔是第二个；他非常懂得与公爵妥协。但是该计划失败了。斯塔福德的审讯没有获得有助于排斥的任何证据；公众感情也随之出现了巨大变化。蒙默思现在走到前台。如果詹姆斯不能被驱逐，他必定让位于蒙默思，如果蒙默思具有合法性的话，国王被迫承认他。据说在一个黑箱子里有他母亲婚姻的必要证据。据说一个大主教知道有关的一切。蒙默思本

人接受这个想法。当普利茅斯公爵去世时他拒绝表现出悲伤。他说，他不会为一个不合法的兄弟悲伤。在《宣誓条例》、《排斥法案》和蒙默思的继承权之后，不屈不挠的沙夫茨伯里还有一个对策。他尝试一次反叛。当他发现不可能区分反叛和谋杀时，106 他认为自己的处境危险，就逃到国外。罗素与悉尼被处死。查理战胜了他的敌人。他的胜利要归功于法国国王，法王给他 70 万英镑，并使他在没有一个国会的情况下生存了 3 年之久。

正是在反对阴郁的令人疑窦丛生的《多佛尔条约》的斗争期间，《人身保护法》得到通过，托利党也开始成形。一般说来，由牧师和律师为首的老保王党人默认王室的特权，接受消极服从的教义，以及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意指国家的抽象概念之绝对和不可抗拒的权威。他们酷爱秩序而不酷爱压迫；他们像他们的对手一样珍视好政府，他们相信如果最高权力出了问题，好政府就得不到保障。这就是宫廷党，或众所周知的托利党。随着革命后的时间推移，他们也有很多发展。但起初他们只是保护王权和反对侵略，没有任何原创的思想。

在野派是改革派。他们是那些因赞同不抵抗的誓约而被排除在公务之外的人。他们相信长期国会摇摇摆摆地反对国王的战争是正义的，并准备最终向查理二世开战。这就是他们与托利党实质上的区别。他们害怕革命，但是在一些极端场合他们认为它是正当的。伯内特说："暴政行为并不能证明臣民的抵抗为正当，但对臣民宪法的全面颠覆能证明反抗之正当。"当伯内特与蒂洛森对罗素勋爵强调此学说时，他回答说根据此假设他看不到一个合法的宪法与一个暴政的宪法（A Turkish Constitution）有什么区别。

辉格党的历史显示出对伯内特的宽松教义的逐渐背离，该教义认为抵抗只有在受到极大挑衅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显示

出对罗素学说逐渐接近。美国革命正以此为根据。辉格党的最终目的与他们在长期国会的先辈并无二致。他们都希望安全而反对不义和压迫。内战的获胜者在共和国中寻找这种安全，他们显然失败了。很明显他们错误地废除了君主制、国教和上院。所有这些都回来了，其恢复仿佛是靠天意而非人力。

107　新近的经验使辉格党感到激动。他们认为破坏一个现实的政治力量并不科学。君主制、贵族制、主教制均可成为无害之物，它们均可以被调整、限制和保存。新政党的实质是妥协。他们认为死抱一个原则不放是个错误，走极端是个错误，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宁要抽象而不要现实，不顾及实际条件等等，这些全是错误。他们有些令人扫兴，又有些太喜欢骑墙。他们的哲学，或者说他们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总是明于事理和切合实际，但平淡、贫乏和缺少想像力。他们关注英国社会的利益，关注贸易、金融和城市，还有那些进步的要素；但他们专断，热心于私人事务，而不以国家为目的。就他们的进展而言，他们在道德方面以及在政治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渐渐超越了那个时代最低限度的需要。他们是人而不是一种教义的联盟，忠于同志的观念常常比忠于真理的观念更加强大。该制度的一般原则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以至于有著名作家认为，辉格党实质上是英国的，是与有限君主制联系在一起的非国教主义者的，并不适合推广到全世界。他们掌权的时间太久以致对他们所赖以产生的社会限制已变得不太适应。一百年以后辉格党的教义才承认普遍和科学的性质。从查塔姆伯爵和卡姆登的美国演说，到伯克 1778 至 1783 年的作品，再到《国富论》一书，以及威廉·琼斯先生的小册子，其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束缚国家的因素被克服。该原则是神圣的，并不顾及利益。罗得岛的特许证比不列颠的宪法更有价值，辉格党的政治家为华盛顿将军举杯，他们为

美国的抵抗高兴，而主张承认其独立。进步完全一致；伯克对殖民地居民的演说在逻辑上是自由原则以及高于地方法规和习俗的更高法律观念之成果，它们正是从辉格党的理论开始的。

它是英国人的最高成果，也是他们留给民族的遗产；但该学说的创始人名声极糟。他们为该信念建立了永久的纪念碑，其火焰由天主教徒在伦敦点燃。他们发明了黑箱，还有露西·沃特斯的婚姻。他们推动与激励着谋杀者奥茨，并为其提供报酬。他们宣称威尔士与这项热诚的计划有关。他们与王室谋杀案有关；那次阴谋埋葬了他们。查理二世挫败了他们，而且对他们并未心慈。当查理二世死时，纵然有《多佛尔条约》，纵然他对法国卑躬屈膝，纵然他为颠覆英国自由使尽伎俩，但是詹姆斯二世，这个主谋，依然登上王位，权力丝毫未受损。辉格党任由杰弗里摆布。 108

但是 40 年的激忿也产生了改变世界的酵母。革命者的制度保存下来了，因为国王失去了他的优势。因为英国史上一系列事件，辉格党终于控制了国家。

109

六、英国革命*

从培根下台到查理二世殒命的四分之三世纪的斗争与实验终以失败而告终；到詹姆斯二世登基时，英国政府已与大陆君主专制政体相契合。

下院不顾西摩的谏言，"全体一致"投票通过一项税收，随着贸易的发展，其数额很快接近200万镑。保留忠于王室的议会，是国王的权力，只要他愿意而且国王也无须年年召集它。他控制着选民。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程序也秘而不宣，法官会被随意解除，直至法庭全由御前法官组成。还有一支用外国金钱来维持的军队，不过此款项有可能被取消，如果需要的话　逆来顺受被大学作为校规、被教会作为信条来教诲。

詹姆斯决意成为统治者和废除宪法限制与宪法装置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佩恩在将其想法告知奥兰治的威廉时，宣称他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他一再表示想靠一支常备军以及他的法律的豁免权来实现其目的。蒙默思的造反使他拥有了这支常备军。虽然这次造反未得到排斥主义者或限权主义者的支持，虽然它被轻蔑地平息，但还是出现了一阵子危机。公认的看法是，如果造反者不泄露他们毛瑟枪队的进攻意图，而是用斧头和镰刀包围王家军队的营地，那么塞极摩尔的夜袭就会得逞，

---

* 首次发表于阿克顿：《现代史讲座》(伦敦，1907)，第13章。

王家军队就早报销了。国王利用了时局，他有了维持一支总数 110
为 1.4 万人军队的开销办法。

王室的奢靡，使查理二世一直处于经济窘迫的境况之中。皇室中有半打公爵必须提供相应的俸禄，这就迫使国王沦为一位仰赖法国慷慨施舍的人。他死后一切都改变了，而塞德利·凯瑟琳也从内厅消失了。确实，她离开得很及时，她已经有了潜在的对手。曾经是很奢侈的开销，出现了压缩的迹象。然而路易十四依然在努力向捉襟见肘的詹姆斯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就像对奢靡的查理一样，他总计给了 6 万英镑，也许是 7 万英镑，其中部分是欠款。这些钱只有在詹姆斯宣布良心自由后出现困境时才支付；如果政局平稳，就不支付。当本届议会结束时，仍未形成相关议案，路易就命令把这笔钱交还于他。1685 年的秋天，詹姆斯打算接受他的建议。他踌躇满志。他 10 月份举行的生日庆典比其哥哥查理二世的更为隆重，而西部巡回法庭的严厉审判，对他也没有不好的舆论。

他毫不遮掩他的意图，除保持一支常备军和恢复《人身保护法》外，他还要求赦免权。没有人会以为这位国王会迫害他自己的宗教。承认他的继承权即意味着《伊丽莎白法典》实际上被搁置一边。天主教徒们心满意足。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再遭受压迫就谢天谢地了。哈利法克斯这位即使不是詹姆斯最有势力、但却最为机智的大臣，赞成这一政策，而且也同意任命一定数量的天主教官员。奥兰治亲王也持同样的看法。于是，宽容受到鼓动，宗教迫害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这对路易十四没有用处，他在 10 月镇压了法国的新教教徒。而这对詹姆斯本人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并未加强他的权力。他坚持通过法律特赦以及通过他的特权来引入宽容，他坚持废除《宣誓条例》。《宣誓条例》解除了他在政府中天主教徒的支持，实是预防专制的安全

111 阀。詹姆斯因追逐绝对权力而声名狼藉，国人不相信他对信仰自由的热心是真诚的。相反，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所要求的远远超过保护其教会之明显合理的需要，实为加强他的特权；他所谓的宽容也是独裁之文饰。他公然声称他信奉这一格言：宽容是专制的必要条件。他暗中敦促路易解除禁令，并勉强同意为逃亡的胡格诺派信徒募捐。

当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一位流亡者时，他确实热诚而且持续地鼓吹宽容之情，而这么做在法国宫廷里是极为愚蠢的。那时他很可能是真诚的，因为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当他和有名的兰西搞熟后，则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兰西创建了拉·恰帕修道院，这在法国是最著名的宗教讲习所，对于波修特和圣西门一类的先生，这儿也是最好的隐遁之地。詹姆斯拜访了兰西，并和他保持通信，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保存至今的有 60 封。凡尔赛的人搞不懂在宗教中，诚信如何能与宽容共生。詹姆斯给兰西的信显示了他的信仰是很表面的，因为其时他是国王。以后是否如他们在法国所认为的那样，尚难以确定。这种交往关系很容易使人想起那个暗杀计划。

有一位来自康耐马拉的爱尔兰牧师马丁建议，在战争期间一位上帝的选民应尽力搞垮奥兰治亲王，并杀死他。他说，这也是一种合法的战争行为。路易十四对此类提议不感兴趣，为此他派出了一个名叫格兰德维尔的坏蛋，来使马丁离开那位讨厌的王子。贝里克却很欣赏这位牧师的设想，在兰敦的战斗中，他率领 200 人的骑兵队伍来到其亲兵驻地，向他们怒吼要杀掉奥兰治亲王。三年后的 1696 年，他在伦敦和谋杀计划的实施者会晤，他认为，当亲王在卫兵的簇拥下走向汉普敦宫时，无法在路上下手。在莎士比亚断壁上点起烽火，向海上发出信号，在法国船上的詹姆斯看到后，就会过来。当此计划在进一步深入之时，

贝里克抽身逃脱了，并在克勒蒙特遇上父亲，还换了马。在得知事情进展情况后，詹姆斯赶往加来。在那里他注视着北方的地平线，等待着他盼望已久的信号，同时给阿拜·兰西写了封感化的信。当谋杀计划败露后，他对凶手千恩万谢，对其罪恶勾当却毫无反省之意。 112

那一系列导致了他失去王位的事件，构成了一场三幕闹剧。首先，他试图获得英国国教徒的合作；不如意后，他就转而抨击英国国教而欲争取非国教徒。后来他又和左右自己命运的牧师发生了争吵。詹姆斯确确实实不信奉新教。森德兰向他保证，如果停止压制，两年内英国将不会有一个新教徒。两件大事搅扰得他心烦意乱。其一是查理教士新近的神学理论。大主教勃拉姆霍尔难以和法国天主教划清界线，大主教莱顿则和詹森派来往密切。蒙塔古接受了一种罗马的教义，桑代克采纳了另一种，而伊沙克·布朗却奉行第三种。布尔因其为早期的神父辩护而反对那位最富学识的耶稣会教士而受到法国教士的赞赏。一个无知和眼界狭隘的人从此一切的一切只会得出一个结论，英国国教制度无能并缺少稳定性。此外，法国的胡格诺教派也在迅速解体。路易曾夸下海口，不出几个月，他就会令80万教徒改换门庭。詹姆斯对之深信不疑。据巴里龙说，他曾反问自己，他为什么在英国未能放开手脚大干。他期盼罗马红衣主教会议讨论这一问题：英国主教是否可以留任。一些人说他们将好于那位天主教牧师，他正受到詹森派的谴责。有件事他确信无疑，即英国国教会将不再会造他的反。温切斯特大主教恳求他不要以英国国教徒的消极顺从为依靠。詹姆斯则回应说：这位主教神经错乱了。

由于他早就铁了心不怕和忠顺的英国国教分庭抗礼，故他要求赦免权。法官对此认可。历史先例也对他有利。不仅历史

支持他,未来也支持他,因为威廉三世也将步其后尘。他振振有辞地说,他的行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反对丑陋的偏见和邪念。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威廉·佩恩也支持他,并向奥兰治亲王阐[113]述其(詹姆斯)政治原则。路易十四也给他鼓劲。虽然英国天主教受到激烈反对,他的近臣——他们是法国利益的代表——或者是多弗公爵的后裔,如阿伦德尔伯爵,贝拉西斯、多弗和蒂尔康纳伯爵,都认可他坚定不移的计划。他说,几个文墨法官就会比耳聪目明的芸芸众生对天主教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设想不是一个邪恶的国王设计了迫害的计划,而是一位愚蠢的专制主义者,他在这群新人的唆使之中(其中有些才华横溢,有些德高望重),他们对他喋喋不休。因此,当那位大主教和其他6位主教,都明确反对他的《宽容宣言》时,詹姆斯将他们统统关进了伦敦塔。森德兰建议小心谨慎,他认为采取极端措施的时代还没有来到。议院中的激进分子以为,他们对待敌人太仁慈了,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

詹姆斯觉得自己赢了,因为正在这节骨眼上威尔士王子诞生了。他的政策在未来有了保证。王冠不会戴到倾心于欧洲的新教徒头上。帝国的公使说,詹姆斯的敌人偃旗息鼓了。这些人绝望之际,立刻编造起新王子的谣言。詹姆斯的机会现在来了。他可以对那曾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其命运的事件宣布大赦,不需要审判就释放被关押的7名主教,于是危如累卵的灾难就可化解了。虽然遭到森德兰、罗马教皇的使节、杰弗里以及其谋士们的反对,他决意一意孤行。他认为主教们应当受到审判、谴责然后被原宥。这样,他就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如果不这样就释放这7位主教,詹姆斯对英国国教的发难就会以失败而告终。

那一天赫伯特上将扮成一个水兵怀揣着对奥兰治亲王的邀请函。信由阿尔吉龙·悉尼起草,上有7位令人尊敬人士的签

名，他们都愿冒生命危险。其他一些人则保持沉默，因为这不是一种党派行动。当王子降生时，事情已不可避免了。在国王与国教之间作出决定之前，信没有发。信中他们向威廉保证，威尔士王子是个骗局，因此他必须赶过来，以求保护他自己的天赋权力以及英格兰的自由。在此之前，奥兰治的威廉并未参与要将王位传给其妻子，而是提出很切实的建议。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他和路易十四争斗时，英国不从中作梗。为此，他争取了哈布斯堡家族站在自己一边。关键是，如果听从朋友的劝告，他们就会一直支持他。其实自从他1687年派出达克维特起，他就一直为此在做准备，而且他还要求荷兰政府预备25艘军船和9000名士兵，以防备来自法国的威胁。

114

詹姆斯感到担心，他提醒威廉，说继承权并非绝对可靠。路易最担心白厅中出现与自己作对的有能耐的敌人，因此他祝愿安妮公主比其姐姐更得势。为加强她对其父亲的权利，他建议安妮公主应改信天主教，为此日的他送来好几本讲道的书。另一方面，詹姆斯告诉威廉，英国没有待继承的王位，只有全民的福祉——如果他即位不是竭力使自己成为统治者的话。达克维特早已策划了秘密谈判，不过在6月30日发出邀请时就停止了。

在大陆，一场更为复杂的谈判正在进行。威廉不允许他的远征显示出某种宗教战争的涵义。因为这样，他会失去与皇帝的联盟，而这正是其政策的核心。利奥波德是一位虔诚和谨慎的人，对在英国用新教王朝来取代天主教王朝这一事业，尚难以判断他的态度。要争取他的支持只有一种方法。为了取得帝国的帮助，就必须获得教皇的支持，在宗教问题上，利奥波德会追随教皇。威廉派他的一位将军——范德蒙王子——到罗马，又通过多纳伯爵，他和梵蒂冈开始接触。他声明，天主教徒将从他

那儿获得宽容，而这在詹姆斯统治下，是难以保证的。英国摆脱对法国的依赖，将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利益，而且对罗马教会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教皇表示理解并予以认可，并将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和他一齐带入“大解放者(the Great Deliverer)”阵营。在1688年革命时期，这是一次秘密的接触。作为天主教会的支持者，詹姆斯与罗马疏远了。

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奥迪斯凯奇，是一位罕见特异之人，詹姆斯说的很对，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罗马教皇没有人像他那样。他动手改革教廷，其中包括废除教廷里宗法裙带关系。通过百年的努力，他的前任们已构建起了庞大坚实的宗教家族——如鲍格才家族、路德维希家族、巴伯里家族、帕蒙菲利家族、契吉家族、罗斯皮格里奥西家族、奥尔梯里家族。这些显赫家族财富的 115 增长来自教会的腐败。而且由于其祖先最终并未作出赔偿，故裙带关系的反对者们断定他们是满意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些家族在彼岸世界的宗教中也有所见，但丁乐于在那里展示他那个时代的教皇。英诺森凭着对一种严肃道德的热情，试图来修正这位论辩家的学说，这引起了耶稣会教士的不安。在法国他被说成是詹森派信徒，而在英国，奥德米克松则称他为新教教皇。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致力于为西方的基督教的分裂寻找一种弥合。自黎塞留成为内阁大臣、格劳修斯作为作客巴黎的大使起，他就没停止过这一努力，这在两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英诺森批准了一项妥协的方案，在奉行新教的德国大学里，人们认为此方案不错。

当路易取消宽容的文告时，这位教皇并不掩饰其不快。但他最终仍被迫允许唱“感恩赞美诗”和启示录，不过，他公开反对穿着长统靴的武装使徒传教；他尤其反对法国天主教教制，在此体系之外，宗教迫害正在进行。基于多种原因，詹姆斯二世很让

他讨厌。首先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詹姆斯都是亲法国的鼓吹者。因为就像路易一样，詹姆斯在宗教问题上是位法国天主教徒。在罗温的一次讨论中，当一位英国人鼓吹教皇至上论时，他愤慨不已：竟在御前如此放肆地攻击至上的王权。他因委托卡斯特缅因勋爵作为他的大使而触犯教会，该勋爵的可笑之处，不仅在于他为克里弗兰女公爵的丈夫，也因为他是这样一本书的作者，在书中他呼吁宽容，其立足点是：就如新教在法国所受的礼遇一样，英国也应善待天主教。教会很勉强地同意他的代表达阿达担当罗马教廷使节；但当詹姆斯任命耶稣教士彼得为他的私人顾问，在白厅让他住自己的寓所，并表示如果他是主教或红衣主教，他将是使节的最合适人选时，英诺森拒绝了。

彼得猛烈谴责罗马教皇的使节，而耶稣会会士们则要求将他驱逐出境。国王说，即使没有罗马法庭的裁决，他将被迫采取行动。达阿达提出的建议与奥兰治亲王如出一辙，即刑法不应再实行，而《宣誓条例》则应保留；而且他也和另一些人一样认为，当发生危机时对威廉二世用不着担心。当英诺森 1689 年死后，出现了一些变化，不过罗马却仍宣布支持效忠威廉三世。帕思 1695 年写于罗马的信说："奥兰治亲王在这里的朋友比在英国和荷兰的都要多，而国王则遭到普遍的仇视。在他们将他与那位异教徒、判逆者和巧取豪夺的暴君比较时，每每听到公开的谴责。"

基于这种 1688 年比 1695 年更强烈的感觉，威廉制定了他的计划。大权在握的路易随时阻止这种远征。他拥有一支常备军，命令这支部队进攻尼德兰，就会把威廉牢牢控制住。他倾向于进攻帝国的上莱因地区。他素怀二十余年的希望，就是由内乱而导致英国的中立化，他也很高兴当他攻击利奥波德时，荷兰予以配合。詹姆斯和威廉间的冲突不可能不使他有机可乘。开

116

始时他小心翼翼地作壁上观，静观其变。无论陆地还是海洋，都没有抵抗，证明推翻斯图亚特家族就像当初建立它一样容易。当真枪真刀的斗争在爱尔兰、苏格兰和海峡开始时，由于英国党派间的平衡缺乏真正的信任，结果使得事情沉闷下去了。苏格兰人的起义并没有延缓危机，但就嗣位协议本身而言，起义对我们说来仍是有意义的。

光荣革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它是我们历史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它也为评判威廉及其政府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他们盼望某些苏格兰人应该顽强抵抗，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榜样；他们还希望这些人最好是一群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很可能是詹姆斯党徒。斯泰尔写道："谁知道，上帝保佑，他们可能陷入错觉，以为他们会全部消亡。"四天后另一位写道："国王不在意有人这样去做，而且他可能还以他们为榜样。"据说，依国王的命令，麦克唐纳的一支部队被格伦利翁的坎贝尔所消灭。此命令确凿无疑。不过尚难断定的是，威廉是否知道那位将领信守誓言，而相关的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其中一位成为团长，另一位变成骑士，第三位青云直上为贵族，第四位则荣升为伯爵。这是威廉国王的一种方法。当德·威特的刺客使他的地位至高无上时，他离开海牙，然后目睹着刺客们遭受惩处。80年后，我们军队里的一位逃兵被判处枪决，官员下令射击队准备，另一位格伦利翁的坎贝尔上尉接到一道密令，等罪犯站到毛瑟枪队之前再行刑。在那致命的时刻，当他从衣袋中掏出密令时，手帕和命令一起掉到地上，士兵们误以为这是动手的信号，于是开了火。这位格伦利翁大叫："该死，光荣革命！"并立即离了职。

詹姆斯逃到法国后，他立马随一支法国军队跑到爱尔兰，同时一支法国船队满载着远征军正浩浩荡荡驶过英吉利海峡。詹

117

姆斯蓄谋已久要使爱尔兰摆脱英国而独立，而这在其新教徒的继任者统治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迫害天主教的有力借口。他估计独立需要5年时间准备；而蒂尔康纳伯爵也有独立的打算，如果詹姆斯死了，他就和法国人商量，请他们出兵。当詹姆斯过来时蒂尔康纳已视他为毫无希望的懦夫，遂将江山社稷送给路易十四。萨斯菲尔德痛恨他的背叛，于是邀贝里克来接管了政府。詹姆斯的法国顾问中，一位叫劳庄，是他指挥后续部队并下令焚毁都柏林，掳掠这个国门洞开的国家。另一位是大使达·阿渥克斯，他希望詹姆斯迅速解决掉这个岛国中的所有的新教徒。

詹姆斯义愤填膺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路易也拒绝了，不过并非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表现出最大的基督教国王所有的愤怒，也不是基于对这位谋士的蔑视。达·阿渥克斯在他的信件中对此作了毫无保留的阐述，该信件属于英国历史文献的珍品。它们印于外交部，从未公开出版。我所见的惟一副本，在我有幸拿到手时，竟然原封未动。

尽管有这些歧异，当一支来自布列斯特的由78艘船组成的舰队启航时，在爱尔兰的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们，又燃起了希望。罗沃斯（他的控制因这次登陆而结束）写道："如果他们刚好由迪·罗特统帅，他的事业就会有希望。"不是迪·罗特，而是托维叶在滩头阵地打败了英国和荷兰联军。联军的58只船损失了16只，法国则一只也没有毁坏。托维叶成了英吉利海峡的主宰。托林顿伯爵离开荷兰前来参战，但他尽可能远离危险的地带。他对其爱犬之死难以自抑地悲伤。有人说，狗是为一位将军而死的，将军则因狗而捡了一条命。6月30日是我们海军史上奇耻大辱的日子。 118

后来的波尼战斗赢了，胜利不是像传说所描叙的，是靠左手挥剑的威廉，或是来之于奋不顾身跳进河中哀悼阵亡将士的尚

伯格，而是仰仗小尚伯格，他快速穿插并从侧翼包围了法国人。自此以后，托维叶的胜利完全没用了。威廉颁布了一条大赦令，不过它遭到垂涎爱尔兰的英国人的阻挠。爱尔兰议会拒绝的李麦尼克投降条约，使它有了“毁约之城”的别号。

当詹姆斯从波尼逃向圣·吉曼斯时，他的统治也就接近尾声。他只是那些拒绝宣誓效忠威廉及其继承人的英国国教牧师的国王。1693年，当法国在斯汀克和兰敦取得胜利时，他怀着法国牧师是否会赞同的疑虑，发布一项宣言，对此，拒绝宣誓效忠的主教们都予以反对。他们断定，如此的退让会毁掉君主政体。克尔也持同样的看法，不过他还以为，当此宣言得以执行并恢复詹姆斯国王权力时，他也并非一定拥护他。战争对联军来说在领土上并无收益，但在海牙的胜利之后，三个帝国却免除了入侵的危机。通过这场战争我们赢得了“国债”、“英格兰银行”以及财产的增长。

不过大地产利益仍占压倒性的地位，作为统治阶级，地主们要求从威廉晋位中得到他们那份好处作为回报。其实19年前的《谷物法》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防止外国进口的保护措施很起作用，但1689年还是追加了对英国出口谷物的补贴，正是这一政策刺激了英国农业在18世纪的迅速繁荣，不过是靠牺牲没有资金的自耕农而使地主凭借雄厚的资本致富的。

我们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说实话，是我们两位伟大的作家，伯克和麦考莱，忧伤地指出，1688年的革命，算不上是革命，实是一场保守的运动，它充其量只不过是纠正了眼前的错误而回到古代的原则——其原则仍是君主制的。国王被宣称在当时的英国是必需的，共和国的观念尚未出现。这场革命主要是保守党亦即国教教徒的杰作。这里国教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相反的是他们坚定支持权威，一旦危机结束，他们就回到自己原初的

119

教义。治理国家的精英们，在1688年以后就像他们在此前所做的那样，继续统治着国家。没有出现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演变的力量。自由政府的要素，即宗教自由、全民教育、奴隶解放、贸易自由、消除贫困、出版自由、责任制内阁、公开辩论等，都没有在《协议》的条款或《权利法案》中提及。将来是属于托利党还是辉格党，还是云山雾罩，捉摸不定。

但它们是英国人所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它建立了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构建了那种违反契约就要失去王位的理论。前者见于英国的契约中，后者见于苏格兰的协议里。议会授权给国王，当然是有条件地授予；就如凌驾于立法机关一样，议会也凌驾于行政机关。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忠实仆人，而且会因自己或大臣的过错而被罢免。所有这些都不是建制，而是复旧。消极服从仍是英国的法律。有条件的服从和反抗的权力亦成为法律。权力被限制、调节和控制。辉格派的政府学说取代了托利派的主张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最大的成果是这些变革进行时没有流血，没有复仇，没有排斥所有的党派，而且没有说明被人们所接受的理论，其结果如何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诠解。法案本身是狭隘的、缺乏思想的、混乱的、单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完全吻合于阶级压迫以及政府作为阶级代表对国家的压迫，它是极其幼稚的。

在乔治统治下这些学说在逐渐成熟，正当它似乎山穷水尽之际，柳暗花明的时机到来了。正是此时另一场更伟大的革命开始影响英国和欧洲，它的理论无比明确和清晰，而且有着更强的原则性，不折中，也不妥协。

120

七、汉诺威嗣位*

首先要思考的是一个政府经过怎样的发展而成为与17世纪的英国完全不同，而且也与任何在欧洲所曾出现过的政体相殊异的政府。

旧秩序因《权利法案》和《嗣位法案》而终结；但接下来发生的则不是《法案》的延续，相反，是出现了与它对立的趋势。新的王朝伴生着新的主张。变化不受法规的制约，而是俯首于制定法律、也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力量，那就是时势与公意。根本的创新因素，如议会、内阁、政党政府，仍未合法化。《嗣位法案》迅速地瓦解。因为它从下院中驱除贪官，来使行政与立法相分离；它规定国王未经许可不得访问他的海外领地。它还要求国王要听从枢密院的建议，由此也就否定了某种联合的内阁，即一种排外的政党类型组织。那时，威廉和马尔伯勒两人都倾向于所有的领导人都应当结合在政府里。在《嗣位法案》实施前的安妮治下，出自同一党派的联合组阁观念就已流行了，不过，至少詹姆斯二世的拥戴者，是不会容忍像哈利那样的人的。如果博林布鲁克没法使乔治一世怀疑托利党人忠诚，1715年的造反对他们来说将是致命的。新王朝由辉格党控制，即由一个党、一个内阁

121 而不是由议院来掌权。国王不久明白了，不仅是英国事务，就是

---

* 首次发表于阿克顿：《现代史讲座》（伦敦，1907），第14章。

英语,他也很难驾驭。内阁独自作出决定,然后通告他。

有必要来看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古老的圭尔夫家族一支统治着汉诺威,经过机智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6块领土合并成一个重要的公国。德国皇室就是这样崛起和兴盛的。在1692年它获得了第9个有权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领地。选他来继承英国的王位是很合适的,因为首位选帝,实现了其家族的使命,娶了斯图亚特·伊丽莎白最小的女儿帕拉提纳公主。她不幸成了波西米亚的王后。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是位加尔文主义教徒,而她的丈夫则是位路德教徒。他的先父——死于1678年——曾皈依天主教。汉诺威是国家统一的中心,这里的路德教神父们受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走的比罗马教廷的《九十条教规》所规定的更远。因其对信仰体系通俗易懂和妥贴无误的解说,汉诺威的圭尔夫家族不再是新教徒象征。威廉三世心中疑虑丛生,据认为他看上去对年青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不怎么信任,而正是他后来统率着战狮。腓烈特大帝就是凭战狮获胜的。一位汉诺威王室的政客著文警告说,威廉三世似乎偏向于普鲁士王子(因为他是位新教徒)而不是汉诺威王子(他是位路德教徒)。其含意是路德教对天主教不抵抗,而事实也是,索菲娅从母系方面来说是一位斯图亚特王室的成员,她也不愿意过于张狂地否认自己不是一位正统王权的拥护者。没有一点做作和犹豫,这位选帝侯夫人竟然将事情弄成似乎是被迫接受的。这出轻喜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她的儿子从未学过英语,这后来对于英国说来,是极为有价值的一个情况。这位女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或许不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人,但是一位非常机智的人。可惜王位降临时,她已84岁了。一封来自安妮女王的不友好的信,致使她在狂怒后死去,信中揭发了她与詹姆斯党徒有关。

母亲死后两个月登上英国国王宝座的选帝侯,既不是一个

暴君，也不是一个懦夫，更不是一个傻瓜，他只是不够机智和非常自私而已。在他的女友中，有些获得了英国的封号，其德性触怒了王室中的部分成员，其恶行则惹怒了一些遗老。一位被册封为肯德尔公爵夫人的人，沃尔波尔说她才像英国的女王。不过这位夫人只想以她的影响换钱，总计达1万英镑。沃尔波尔最终向他的主人抱怨，国王面带微笑，用其洋泾滨的拉丁语回答说：不用担心，他的大臣们也从他推荐的人那里得到补偿。他的腐败名声日趋加重。他娶了其邻居和亲戚塞勒公爵惟一的女儿，从而取得他家族的继承权。她的母亲没有皇族血统，她受其丈夫和选帝侯夫人索菲娅的非人虐待，故而决意以逃跑来挣脱苦海。在绝望中她接受了坎特·康尼格斯马克的帮助，史蒂芬尼公使爱将他描述为一个行为放荡的狂妄无耻之徒。秘密已泄露，公主被休婚，在阿尔顿一间僻远的农舍里度过了漫长的余生，这间屋子属于她父亲。这件事是仅仅发生在这个充满诱惑恣意妄为的君主国许多大家族中的一桩，但这是一场天降横祸，因为坎特·康尼格斯马克从此消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作为携带公主出逃计划的组成部分，他将其服役点换到了萨克森，在那儿他被任命为将军。为此原因，也更为满足他妹妹、美丽的奥罗拉·冯·康尼格斯马克的要求，强大而又得势的选帝侯奥古斯都，下令进行调查。但一无所获。后来奥罗拉成为萨克松尼元帅的母亲，他为法国在蒂提诺打败了英国并征服了奥地利领地的荷兰。这位元帅的后人就是乔治·桑，她是上一代人中最有名的法国女人。汉诺威政府发布了一个虚假的报告，但是没作辩解。没有人怀疑弄走康尼格斯马克的主谋是英国国王，其盘算的目标也因此不是圣·詹姆斯而是纽盖特，也甚至不是纽盖特，而是特奔。这就是我们的王族所留下的特征，它也成为其政敌手中的武器。

他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威尔士王子，不是在洛林执政的斯图亚特，而是他自己的长子。因为乔治二世相信关在阿尔教狱中的囚犯，相信他母亲遭到粗暴对待、荒谬的控告以及不公平的离婚。因此，她能把他的父亲看得很透。乔治二世与其父间滋生了敌意，而反对威尔士王子，成为一种家族的传统以及宪制中一种有益的要素。

乔治一世发现，只要他尊重英国制度，他就会吉星高照，因此他无意于推翻这些制度。一位在一地名义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不可能在另一地的宪法制度下行使权力，这种担心证明是多余的。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多位欧洲大陆的谋士们的兴趣，主要都寄意于欧洲大陆。在政治理论上，他身边很长时期以来就有一位在欧洲最杰出的顾问——莱布尼茨，他也是上述那位选帝侯夫人的朋友。虽然这位伟人并未得到长久的宠爱，但仍然难以忽视他对社会生活的无处不在的深刻影响。莱布尼茨对三位顺利继承人做了很多工作。他热心于宣传宪政理论。他自我标榜是个非常好的辉格派，他认为这会使很多英国人讨厌，特别是剑桥的人，以及三一学院的大多数学者。他似乎并不清楚他的对手牛顿如他一样也是一位很好的辉格派，而且出色得多。他的看法是，人们之间的众多分歧源于无知或不能彼此沟通。借以一个更为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很多争论是可以止息的，很多对立是能够和解的。很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显示，在宗教改革中并无促使宗教分裂的真正原因，那些自以为是新教徒的人并不真懂天主教的本旨。他向天主教徒保证，《奥格斯堡忏悔》如果加以正确理解的话，完全是天主教的；他又向路德教徒保证，在特伦特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使他们有争议的内容。他遵奉的一句格言是：人们在肯定他们所肯定的东西上是对的，在否定他们所否定的东西上都是错的。他告诫说辉格学说和托利主义都同

样是真理的必要部分，它们相互补充，它们彼此需要，正确的政治哲学包括两者在内。他还说，过去是未来之师，而上帝的意志将佑助那些能够获得持久成功的事物。这是纯粹的保守主义。辉格派好高骛远。莱布尼茨的目的一直是要促进变革，因为过去基本上是托利派的天下。

这位最有智慧的德国人对于新德意志王朝的影响并不有利于政党政府。这种影响与威廉三世的制度结合得更好。他们请教了一位英国的智者，考伯勋爵起草了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指出国王应该依托辉格派；更有甚者，博林布鲁克在最后时刻，出于其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而强迫乔治一世作为一党的提名者入主英国。因为博林布鲁克的阴谋，汉诺威王室得到它最重要的东西：胜利者的名声。在回忆往事时，他欣慰地发现，虽然不可能阻止新君主的就任，但新君主很快遭人厌恶，而且解除他的王位比排斥他就任更容易，人民群众属托利派，而大多数托利派是詹姆斯二世的拥戴者。对联合王国不满，一支很小的部队已被愤愤不平的爱尔兰人牢牢控制。

疲劳困顿的路易十四，不会再冒战争的风险，不过如果他看到有机可乘，也不会放过。觊觎王位者也许得到他的兄弟贝里克亲王的怂恿，这位亲王是爱尔曼扎的胜利者。起义部队将由奥蒙德公爵率领，他接替马尔伯勒担任总司令之职。马尔伯勒自己为詹姆斯党徒提供资金，故极受那些不让他担任司令之职的大臣们的猜疑。

在采取行动的前夕，极为有利的局面却急转直下。路易十四死了，视西班牙的菲利普为对手的摄政王请求英国帮忙。两个歹徒一无所获，原来詹姆斯曾许诺，如果他们射杀国王和威尔士王子，他将付给他们两万英镑。逮捕詹姆斯党徒的一个头目——威廉·温德姆爵士，狠狠地震慑了其追随者，以致正驶向

托贝的奥蒙德,转向圣·马罗而不敢上岸。苏格兰人起义了,但他们缺乏邓迪及蒙特罗斯来帮助自己组成正规军。他们带着满腹疑虑在席瑞夫摩尔作战,而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边民,发觉在南边没有援军,就于普里斯顿投降了。当詹姆斯·斯图亚特在阿伯丁郡登陆时,战斗已告结束。卡多根出现于荷兰援军的前列,那位觊觎王位者(詹姆斯二世的儿孙)在自己战友的掩护下,从后门逃逸了,奔向格拉维兰。事实证明他适应不了那种场合,他也没有政治才能。但他曾受教于费奈隆,也曾向他学习宽容学说。

125

在英国对新秩序不满呼声最为强烈的是对爱尔兰天主教的处理,而詹姆斯把一切都看成宗教冲突。曾经压迫非国教教徒的博林布鲁克,对王子的想法也无兴趣,最后落得里外不是人。人们认为他应对失败负责,并怀疑他向那位大使——斯泰尔通风报信,意在保护他在国内的安全。他被允许回国,而他作为一个宠臣的行为远比作为一个起义组织者对汉诺威王室造成的伤害更大。

7位宗亲早就兵戎在身,而为了避免可能伤及他们的朋友,他们声称有罪,并向国王请求宽恕自己。由于他们比跟随其殉死的追随者更为罪孽深重,故不可能被宽恕。令世人惊奇的是,一些人帮助他们逃出了伦敦塔,只有两位被送上了断头台。在那最后时刻,当忏悔无效时,德温特沃特放弃在审判时曾作出的忠于王室声明,在坚定忠于斯图亚特王室的呼喊声中被处决。托利党终于垮了。他们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已土崩瓦解;残留的队伍显然令人绝望的脆弱,而对于他们名誉的最后辩辞不过表明他们根本就是叛徒,其忠诚的誓言不过出于功利和伪善。议会对王室及其大臣们表现出少有的热情,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愿为一支已组建好的1.6万人的部队提供装备,还准备加强

辉格党的安全。

基于这一情形，政府采用了7年一届的议会制。根据《三年法案》，1717年将有一次普选，但在詹姆斯二世追随者造反后就立即进行，在安全上是太成问题了。国家舆论并未在意新近的事件、稚弱的造反派、政府的绝对胜利、老朽领袖的意味深长的威胁。下院也同样如此。新政权可能不受选民欢迎，但受到议员们的支持。这种情况明白无疑，以至于司法独立和社会控制的哲学争论完全是多余的。胜利者们通过把他们的治理权从3年扩展为7年而保护其胜利果实，并维护了其权力。这一措施强化了下院的权力，并为辉格派的长期统治埋下了伏笔。资金增加了，国王乘此大好时机在汉诺威休闲了几个月。在这里他有更多的机会致力于外交事务，并召见那些能使他了解外国风土人情的英国人士。这样，当托利党臣服而辉格派一手遮天之际，在汉诺威的大臣与王国内的大臣之间渐渐出现了分歧。沃尔波尔和汤森退出了政府，斯坦荷普和森德兰组建了一个新政府，"南海泡沫"由此破灭了。一个更重大的宪法原则问题在他们和他们以前的国家之间爆发了。国王和威尔士王子之间的敌意，使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忠于父王的内阁大臣们，将会在王子掌权后被解职。要实现自己目的的乔治二世，已决心以新党更换上院。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有人提议限制增封新贵族的权力和限制增封的名额。因为《七年法案》增加了议会的权力，故《贵族法案》则将相应地扩展贵族的权力，一方面对抗国王，另一方面对抗议会。辉格党并不准备去削弱下院，也不惧怕其权力的膨胀，而准备在其腐败时揭露它，选举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由未受教育的选民进行。辉格派的代表伯内特，早就坚决反对这种限制，因为会大大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损害国王威信并污损它。

沃尔波尔击败了这一《法案》。它剥夺了政府一个极为重要

的用以扫除贵族奢望的有效的手段。他不准备失去一种合法的保护形式。他回来了，并担任公职，但不是要职。当“南海公司”承诺减少国债时，他还不是内阁成员。他们只答应八点的收益，但投机意识很强，这一坏条款被普遍地接受了。“南海公司”的股份从130增加到1000。因为有如此众多的资本寻找投资，企业开始竞争，而这些都受到“南海公司”的排挤。他们的敌意损害了其信誉，在挣到大笔钱后，也赔了一大笔。有人贫困，有人富裕。国家没遭什么损失，但内阁倒霉了。沃尔波尔承继了他们的权力，他长期执政的道路已经廓清。其时间是那样长，以至于他为建立一种新的政府体制去做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更热衷于维护其权力而非大胆地运用权力，他是好的行政官员，更是一位卓越的立法者。在他掌权的时期，立法是做得最好的，它们都是在摆脱议会干涉的情况下完成的。沃尔波尔以服从公众舆论来作为自己职责，在其掌权生涯的三个关键时期——伍德的半便士事件、征税事件以及西班牙战争——他都是一直这样做的。在本世纪，一个类似的问题呈现在一个更伟大的人面前，但处理方法却是基于相反的原则。基佐本人相信，实行一次改革议会的措施已不可避免，因为有民意支持。但议会的看法却与之对立，他宁愿和君主一同屈尊服从议会，而不是借助公众舆论来争胜。

在“伍德的半便士事件”上，沃尔波尔退却了，他可能不愿疏远那些他可以借之以统治爱尔兰的人士。这批钱币不错。它们是我们满意的金属价格的两倍，它们货真价实。签约者的好处超乎寻常。他有能力向肯德尔公爵夫人献上一份厚礼，而当协议解除时，他得到了一笔额外的赔偿。他的半便士是历史性的，因为斯威夫特对爱尔兰正怒火中烧，所运用的是革命以及民族爱国主义等词汇，而这些词以前从未听说过。另外，“征税法”将

会为国家挣得成千上万英镑的收入，而当时10万英镑比现在的100万还值钱。不过，沃尔波尔尽管得到拥护，他仍然屈从于外界的呼声。在应付西班牙战争时，他依然如法炮制，这场战争是他所面对的最后一次大危机。

掌管最高行政权力的沃尔波尔的主要想法，在其首次英王敕令中已作了宣布，即试图将国家从疯狂的投机转向谋取工业和商业的合法利润。两次工业开放是与地中海以及与西班牙属美洲做买卖。和地中海的贸易多少有些被忽视，因为政府更依赖与海盗般的阿尔及利亚的友谊，而不是牢牢控制直布罗陀和西地中海的米诺长岛。乔治一世于1721年6月1日给菲利普五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明确无误地向他保证："准备满足你的有关归还直布罗陀的要求，向你保证我将在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利用最好的时机来讨论这一问题。"英国内阁并不认为占据直布罗陀有何意义，希望在某种条件下放弃它以与西班牙做笔公平交易。确实，在1721年1月，斯坦荷普就曾对法国公使说，当英国金融状况不错而议会气氛缓和时，不出一年他们一定会放弃直布罗陀，因为有那平等交税的美梦，也因为这地方对他们只是个负担。但他们忽略了英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直布罗陀的决心。不过尽管如此，菲利普——也许是有理由的——总认为乔治一世的承诺是不错的，而认为持续不断的保护行动是种荒谬的行动。我们所说的关于直布罗陀的内容，是从《历史评论》一个新近作者那里引述的。

和南美的贸易展现出巨大的商机。但获取这一商机却要面临克服西班牙人从中作梗的困难，他们在法律上占有优势。人们认为值得为此发动一次战争，公众的狂热情绪压倒了内阁的疑虑。战争以悲剧而告结束，不过在战争结束前，沃尔波尔已被迫离职。用战争来促进繁荣并非他的政策，但在最后时刻让国

民处理自身的事务，却是他的政策，而且是决定性的政策。和平是好事，但利润也不错；但沃尔波尔尚未决定出这样一个原则：辨别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利益。

英国这场大革命的真正收获是英国选择了君主制。不过在沃尔波尔下台后，人们观察到一种新的共和热情在滋长，人民自觉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当时著名的罗宾统治的很自然的结果，但并非因为他设计了自由体制，而是因为他小心翼翼地和公众的智慧与自由相一致。他非常乐意靠代表他的自由阶级确立的富人来维持中央政府。不像他的先辈斯坦荷普，他毫不为英国的、尤其是爱尔兰的严厉法律所动。他是自由贸易之友；但是为英国独立的利益他得忍受爱尔兰的全面衰落。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依然照常，权势显赫的辉格党并未对之作一些修正和检讨，而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是博林布鲁克。在他那个时代，《刑法典》一年比一年严厉，而我毋须描述囚犯和穷人传道的细节。沃尔波尔的权力那样显赫，时间又是那样长久，故他应为所有这些近在咫尺的事负主要责任。正是基于此考虑，而不是因为他凭借施惠、金钱、绶带和贿赂来统治，我们视他为一个虚伪的辉格党人。

政党统治的政府，即由政党和议会控制的政府，形成于1714年。沃尔波尔又为之添加了首相，即执政党和议会认可的首脑。因为国王不实际理政，故执政的内阁大臣就履行了国王的很多职权。统治国家的权力已实际地转移了，权力不仅由大臣和国王分享，而且也由内阁总理和反对派领袖来分享。因为政党政治包含了执政党和在野党。无论何时多数党变化了，总有一个潜在好的内阁准备执政。沃尔波尔执政长达21年，他漠视了宪政制度的这部分内容。他从未成为一位反对党领袖，而当他辞职时，也没有出现这类事。“所有精英”都和他作对，但是

129

他们并不是一个经过组织的反对派。他们不满并痛恨辉格党，他们攻击内阁但无原则立场。不过，当普尔特尼伯爵和沃尔波尔发生争执时，普尔特尼将这种松散的反对派组织起来。他创办了《艺人》(Craftsman)杂志，上面载有不少顶呱呱的政治论文。那时博林布鲁克回到英格兰，由于他不可能从贵族院中取得席位，只能用手中的笔来找回他的权力感。由于他完全清除了自己身上的詹姆斯二世追随者的狂热，他宣扬的是一种解了毒的托利主义。他建议国家超越一切利害关系——超越诸如土地、宗教、贸易等。他向国王请求，如果这样做了，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政府就将被废除。高置国家的地位于统治阶级之上，一直是每个时代君主政体的一种做法。正是凭借此法宝，博林布鲁克改造托利党君主政体，把该党称作"国王之友"，使它在那个世纪的中叶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当时英国正失去美国并树立了一个讲英语的英国对手。皮特先生使这个党寿终正寝。随着斯图亚特王朝在1746年最终垮台——这是托利党的推动力——粗鄙的风气得到极大的遏制。麦考莱口无遮挡，大谈托利党比辉格党还要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由只是学院式的，只是柏拉图式的，故这种自由并未真正巩固宪政。

政党独占政府，内阁取代议会，由首相替代国王，在加进这些未成文的条款以后，辉格党再也发现不了需要改进的缺陷和需要发展的原则。他们变成保守主义者，满足于为新王朝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作辩护。完成他们的体系需要一种根本的变化。因为这种体系的本质是法律的目标，即自由，应高于法律的条文，即限制。它要求公共舆论应该控制立法，而缺乏新闻自由难以做到这一点；而当新闻报纸被禁止发表和讨论议会的辩论情况时，新闻也就没有自由。禁令被严格执行，在长达30年里我们主要是通过勃兰登堡的大使波内特以及奥地利公使荷夫曼

130

的报告来了解议会辩论情形的,他们告诉我们大量的故事,而这在内容空泛的《英国国会议事录》中是不会找到的。接踵而来的是约翰逊博士以及其"格伦布街"上的同僚时代。不过,直到辉格党统治结束以及议长在1761年辞去职位,辉格党都未曾允许国民知情于国会的辩论。

到了1774年,国会的辩论公开了。众所周知,1768年的不公开的国会,是第一个被作了适当报导的。演说被议会的一个成员记录下来,他是沃特帕克思的祖先卡文迪什。其中一个部分曾出版并被发表。其余残存的部分是手抄稿。其内容主要是有关埃德蒙·伯克的大约250次的演说。它对政治研究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处于巅峰时期的伯克,也正处于英国最好的时期。通过他以及通过美洲人对他的影响,沃尔波尔的辉格党市侩政治变成了一种哲学,由一种阴谋的组合,转变成一个有着一般理念的制度。

131

八、论英吉利共和国*

比塞特先生的《英吉利共和国史》第2卷，一直叙述到废除"长期国会"为止，书中特意赞许了"共和政府"，因为就在其统治的两年间，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海军强国。在查理一世被处决到护国制的开始那段时间，是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但在哈勒姆的书中只用了10页来描写，它只不过被一般性地当做克伦威尔篡权的前奏来看待的。当比塞特先生谈英国历史被忽略的篇章时，他极少铺张。在如此漫长的君主制历史中，共和的插曲在许多方面令人难以忘怀，那时热情压倒了常理，而理论家统治着时代。共和并非万能，它并没有实现国民有权希望的东西，因为给1789年的国民议会巨大支持的新思想和意志力，并未能激活颓败的议会。陈旧过时而又不协调的英国法规，并未经过理性之光的修正，而政治科学和公众利益的试金石未被运用于辨析过去文明的沉淀。以怀特洛克为领袖的律师队伍，远远强大于哲学家，不过共和政体仍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创建了英国海军，并且以《航海条例》左右了国家贸易政策数世纪之久。比塞

132 特先生几乎完全把自己局限于该主题的一个分支，局限于一个资料来源上。他参考了国会的《动议议事登记簿》，但过于粗率，

* 原题《评比塞特的〈英吉利共和国史〉》，首次发表于《编年》，1868年2月8日，第139—140页。

从中一无所获。国内的政府体制,宗教活动对政策的影响,查理一世的浪漫冒险以及克伦威尔的隐秘动作等等,他几乎毫不在意;他着急的是议会的行政部分,因为这一机构决策大事,这也使其声名远播。他是一位共和主义者,故他既反对克伦威尔,也鄙弃斯图亚特王朝。他以为亨利·范内及其同伴成功地治理了国家,如果克伦威尔没有颠覆他们,一个自由国家将会在他们手中诞生。克伦威尔的背信弃义把事情搞糟了,从而使已被赶下台的王朝得以复辟。他们比这位护国公聪明,因为他们更喜欢西班牙而不是法国,比塞特先生满怀自信地宣称,他们将在新的胜利之后以及在特朗谱死去不久与荷兰达成一个比克伦威尔所缔结的更美好的和平协议,但是他却没有比斯科特的话更好的论据。斯科特是共和国的领导之一,他意在削弱克伦威尔的名声。他确实也不更喜爱斯图亚特家族,因为他将他们描写成狒狒,并将鲁帕德说成懦夫,实际上他们是不寻常的;而且较之那个自称共和国的仆人却成为其主人的克伦威尔,他们也并不使他更感厌恶。克伦威尔的演说被指责成"黑暗王国的投影";作为一名军人他比不上兰伯特和哈里森,他的战绩较之广布莱克周围的人显得黯然失色。已经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被看成一个新的证据,即共和派准备把全部军队都上船入海,以海军的利益为自己提供一种保护,意在以此来反击军事独裁。比塞特先生追求一种类似的策略。他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荷兰战争上,而这场战争并未给军事将领们带来荣耀,他通过褒奖布莱克而拼命贬损克伦威尔。他已准备承认"长期国会"时期的政府本质上是专制的、压迫的和腐败的。他一点也不否认他们是不得人心的,也不否认他们的权力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的。可是他没有说明,为何推翻这样一个政府也会是犯罪。他的辩解实际上是他们曾勇猛顽强地与荷兰人作战。

如果比塞特先生不受偏见束缚而借鉴英国以外的专家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关于那场海战的外交历史，他会得到很多重要信息。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文献，在荷兰作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困扰比塞特先生的许多事情其实已经没有疑问。考尼留斯·德·威斯是荷兰的海军准将，布莱克曾在1652年的10月8日打败过他。在考证他是否为约翰·德·威特的兄弟时，比塞特用了很大篇幅。现在已搞清楚，这位考尼留斯·德·威斯是最为著名的荷兰海军将领之一，其生平传记的作者是迪·琼格，一位很有名气的海军史学家。如果人们不能下大力气认真研究当时的史实，就难以弄清楚他的身份。他比考尼留斯·德·威特，即那位伟人的弟弟德·威特年长24岁；正是他在1653年的夏天向荷兰王国宣布，英国是海上霸主。比塞特先生几乎未涉及1652年7月份鲱鱼船队的毁灭，他轻描淡写地说，布莱克缴获了大约100只荷兰渔船，而将其船员释放了。他似乎毫未在意这对荷兰的发展是多么致命的一击。布莱克击毁了从事捕捞渔业的3000艘船，而150万人依赖它们生活。由于只信任他的同胞，比塞特先生似乎毫不在意于如何公正看待其敌人。他认为，荷兰发动战争的动机是见不得人的，是贪婪所致。“保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研究专家，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指的是勒德洛与霍布斯。“或许荷兰人对和平所望如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法尼斯64年前曾经有过的那样真诚，而当时他们正忙于创建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或许1652年的荷兰政府决意来消火1652年的英国共和政府，就像菲利普二世决意消灭1588年的英国君主制一样。”不过对这些推测，比塞特先生既未提供证据，又未加以说明；而且更未涉及那驱使荷兰陷入一场不义和悲惨战争的国内因素。

在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后，威廉二世死于1650年的11月，他本想借此政变实现其摆脱荷兰联邦的目的。在4位王公

的领导下，君主党曾兴盛了四分之三世纪，它不仅处死了奥尔登巴内菲特，而且还流放了格劳修斯，但现在它却首次陷入了没有世袭领袖的困境。最高长官之职因无人选而空缺，最高权力机关移交给了荷兰的贵族党，在威廉二世的遗腹子重建其家族的雄风之前，他们极为出色地处理着国务。这时的共和政府立刻敞开与英国共和政府友好交往的大门。而与斯图亚特王朝联系密切的奥兰治家族的朋友们，则反对改变政策。由于相信对外宣战会巩固其一长制的集权，有助于他们的利益，而且还会防止他们彻底的毁灭，于是他们起劲地找岔和英国绝交。他们中的一位领袖写于 1652 年的下面这封信，就显示了他们的期望："Si, selon les grandes apparences, la pacience nous eschappe contre les Anglois, on en pourroit revenir plustost à nostre vieille forme de gouvernement, par où l'estat se raffermiroit et les gens de bien et d'honneur se reléveroient.（根据目前的普遍现状，如果丧失了对付英国人的耐心，那么我们还可以求助于我们古老的统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将重获稳定，高贵与正派之人将重新站立。）"特朗普属于奥兰治王党，是战是和由他说了算，是应英王的要求为共和国的光荣旗帜付出代价还是加以拒绝都由他决定。英国政府完全明白，他们的敌人是奥兰治党派，而不是荷兰共和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最初曾设想实施一项将英吉利共和国和荷兰这两个海上强国联合起来或结盟的计划来保护自己，而当这一设想泡汤时，为了达到从政府中永远排除纳塞王室的目的，他们又想迫使荷兰接受和平条约中一项秘密条款。这些谈判揭示了当此的秘密情形以及首次荷兰战争的真实面貌。这些情况在那些很有名的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论述；但很不幸，它们都未能引起比塞特先生的注意。

134

九、论伯克*

这是一本天主教徒们特别感兴趣的书，既因为其主题，也因其论述的态度和方法，因为在所有天主教教义辩护者中，伯克最为聪慧，最为真诚，也是最为公正无私的；而麦克奈特先生在他那个时代的传记作家中，也堪称极坦荡和正直。他的很多前辈，没有一个人敢说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传记是在伯克死后迅速出版的，同时推出的还有伯克的《对少数派行为的考察》。传记仅是一本只有70页的生平梗概，但它包含了丰富而准确的信息，而且也为奈特的《英国百科全书》中的一些条目提供了素材，它是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有关伯克论著中最为详细的。麦考米克的《回忆录》则是用一种不同的、革命的风格写成，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异议，是毁谤甚至完全反对伯克的大杂烩。比塞特的《伯克的生平》一书在当时是成功的，它甚至被译成了法文；虽然麦克奈特先生声称比塞特的书远不是有关此主题最差的书，但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最好，而且现在已几乎被人们所完全遗忘，就像他的《乔治三世的历史》一样。彼得·伯克先生写的一本伯克生平的书，立意公允，但价值不大。克罗利先生的《回忆录》却是值得一提的，因为他努力从这个伟大的辉格党政治家的著述中，整

---

* 原题为《评麦克奈特的〈埃德蒙·伯克的生平与时代〉》，首刊于《随笔》，1858年4月9日，第268—273页。

理出托利党的系统政治理论。最近一版普里尔的伯克传记,虽很受欢迎,但有些含糊其辞,不过其中有关伯克个人生平历史的内容,还算过得去。其主要欠缺是,对于伯克这一级别的人物,其内容还不够充分。为了充分了解他,他的生平应被视作他那 136 个时代历史的一部分;他是那个时代的骄子,曾非常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所有伟大的公众人物生活都与其时代密不可分,一本传记如果不同时是一本史书,注定是要失败的。麦克奈特的视野远比普里尔先生深远,他不仅成功地描写了乔治三世的历史,而且他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收集伯克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材料。例如,他驳斥了有关伯克的这样一则记载:他曾在格拉斯哥竞争逻辑学教授职位时败下阵来;此外他还热心地为传主的品德进行辩护,否认传主与著名的佩格(玛格丽特)·沃芬顿有染。在诸如此类细枝末节上的较真以及没大必要的大量考证,再加之对伯克以任何形式与之有过接触人士都详细叙述的写作习惯,使得本书过分的拖沓、累赘。如果可以对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传记篇幅有所抱怨的话,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欠缺。书中对诸如查尔姆斯博士、汉纳·穆尔之流的生平记叙就显然过于冗长了。对书中的夸夸其谈,对那些谬误的品评,我们当然也感到遗憾,而对他这样一位老道的作家来说,出这样的错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对于好几种尚未公认为伯克的著作,麦克奈特先生以极大的耐性进行甄别确认。他认为《论在美洲的欧洲殖民地》完全可以肯定是伯克的作品,书中收集了伯克在美国发表的论著。当七年战争结束时,一本名叫《最近战争全史》的书出版了,其内容采自《编年史》中的6年前的史料。这毫无疑问是伯克的著作。众所周知他是《编年史》的创始人,而且担任了多年的总编辑。麦克奈特先生肯定,历史部分是他写的最重要的部分,一直写到

美国战争的结束；但和伯克同时代的麦考米克却指出，伯克与之联系一直保持到1789年，当时编书的工作移交给他的朋友劳伦斯博士和金博士。伯克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勃勃活力，使其作品的每一片断，都富有特别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帮助落实麦克奈特先生的心愿，即更多地汇集伯克的手稿、著作，在我们看来，这比精心作传要更有意义。伯克的作品肯定比现在出版的多两倍。除了从《编年史》中作了一定的选取外，各种小册子和论文尚未来得及搜集，其间应该包括所有的演说词，它们以未刊稿的

137 形式大量充斥于“议会史”和“卡文迪什争论”中。很多这些短小和篇幅不全的演说词，还有他的一些私人信件，至少是和他的那些宏篇巨制一样，展现了他的精神风貌。一些他自己没有出版的晚期演说以及出版于1844年的选集中的信件，其蕴涵的见解要比其《随想录》中的思想深刻得多。他的社会声望主要依赖那部著作，但它并没有真正展现出他的才华。这部书匠心独运，意在博得一时的轰动，就此而言，它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但是如果这部书写得更有创见和更为深刻，其反响就会平淡得多。在这些方面，伯克以后的著作要远胜过它。

麦克奈特先生自己主要是以写作小册子而著称的，但他最为关注的是伯克的政治著作，而几乎未能相应地注意其非常有名的文学论著——《英国史纲要》。这个领域所有作家中最有学问的拉贲博格在谈及这本书时说，如果伯克一直潜心致力于历史研究，英国大概会有一部可与阿提克和塔什肯历史学名篇相媲美的史学杰作。伯克停止了历史研究，那是因为休谟在探讨同一论题，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一说法的话。令人遗憾的是，情况正是如此，这位哲学家并未向这位政治家让路。我们理当拥有一部更好的英国史；因为伯克无疑是我的最伟大的政治家，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在他那部书的已完成部

分中，他以一种理性的和欣赏态度来评说中世纪的政治构架，他那个时代的天主教、新教和异教徒，几乎很难做到这一点。前一时代的伟大教会作家，诸如波修特和弗勒里，就像摩舍姆和伏尔泰一样，对中世纪冷若冰霜。只有莱布尼茨用一种今天看来不再蔑视的笔调对之进行了论述。大学者如杜坎格、玛宾、穆拉多里的卷帙浩繁的文集在大陆尚未结出果实。而在英国，距诞生一个更好的历史学家群体尚遥遥无期。好几代后人仍需从罗伯逊的《查理五世统治史》的评注本里学到有关中世纪的知识，从吉本的论著里学习中世纪历史，还要把休谟作为历史学大家来礼赞。在30岁时，伯克就证明自己摆脱了那偏狭无知的知识谱系，而那时这一谱系仍很流行，目前尚未彻底瓦解。麦克奈特先生对此书的评论，虽然难说十分中肯，但完全是自己的悟解，还是值得引证的：

138

"虽然严格说来它不是一部史学著作，但作为一种专题的研究，是非常出色的。本书写于1757年，它没有当时极为盛行的偏狭意识。举凡天主教的仪式、甚至修道院的体制等黑暗时代的文明因素，都得到充分的肯定。对僧侣没有歧视，对人民的迷信和偏见不感到伤悲，对18世纪的启蒙也不欢呼雀跃。"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如此众多的知名人物理应著史。我们的历史学家常常是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伟大的历史作家。他们的著作除了学术性之外，在其他方面都是不错的。英国人知识特征是：我们长期以来就一直没有多么清楚地研究过历史。故在我们最必不可少的素质方面我们的职业历史学家难以和其他国家相匹敌；我们无人能与尼布尔，或者赫特或者兰克相比，更不用说修昔底德或塔西陀了。在学问上，吉本、林加德、格罗特在学识上比不上现代人，休谟和麦考莱在艺术修养上逊于古人。中世纪的惊世之举是由那些不会著述的人完成的，而记述

它们的人没有见过，甚至也不理解他们。现代很多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是从远离尘世的图书馆来描写那些他们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英国历史学家的主要特征既不像修道院编年史家，也不似德国的史学教授。史书目录充斥的是大量的其他学科的名人——诸如培根、罗利、弥尔顿、克拉伦登、伯内特、斯威夫特、福克斯和麦金托什。历史研究和政治生活之间的这种联系，更有利于提高政治家的素质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涵养。我们的历史文献长期以来一直在使自己从传统的谬误中摆脱出来，而这种谬误在现代人的心灵中已经几乎不存在，因而这种研究尚未产生足够有力的积极影响，而这一影响在海外却极为突出。不过伯克既摆脱了粗鄙的偏见，也超越了故弄玄虚，而且凭借广139 博的学问、以及因个人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而培养的务实和魄力，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于研究历史了。

麦克奈特先生值得人们信赖，因为他一直在追踪伯克有关天主教思想的发展，也在于他揭示了伯克那些智慧思想的根因，正凭此伯克才卓越超群。在梳理伯克的模糊不清的远祖谱系后，他说：

伯克肯定从未忘记他的祖先是天主教徒，他从未忘记祖先信奉的宗教在他们深深挚爱的祖国遭到放逐。虽然他自己由于教育和信仰的缘故而是一位虔诚的英国国教徒，但他们珍重在他无助的孩提时代关爱他的母亲，珍重抚育他的保姆格罗迪的信仰，以及珍重他视为世上最好、最仁慈者的叔叔加列特的信仰。这种关系对他的一生有着深刻无比的影响，也就是说，若非与生俱来刻骨铭心，他的一生重大和政治生涯中的绝大部分都难以理解了。

伯克的母亲是位天主教徒，他似乎也一直在深切地眷念着母亲，即使在他与父亲疏远的日子里。还是一个孩子时，他深受

其信奉天主教的叔叔的影响。除了这些早期的熏陶外，仁慈地表现出对压迫的愤恨使他以同情之心来对待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民，这种愤恨之情后来在控告黑斯廷斯时显露出来；在晚年他之所以友善地对待被驱逐的法国牧师，毫无疑问同情心在起作用。对于他善待天主教徒之举，有很多荒唐的解释。当时纽卡斯尔公爵就怀疑他是个天主教徒，在一个很出名的每周刊出的评论中，从一则对麦克奈特先生的著作评说里我们得知，至今仍有傻得够呛的人相信这种猜测。伯克的岳父纽金特医生是位天主教徒，伯克夫人也一直被说成是天主教徒。麦克奈特先生觉得这些证据并非捕风捉影，但它却是极为脆弱的。所有这些说法都仅仅是为了解释伯克为何没有不宽容，对此，很多人仍一直闹不明白。其实毫无理由作下述这种猜测：他受某位亲人的影响而注定会善待天主教，而这位亲人并未抚育孩子信仰自己的宗教，或者说这位亲人肯定未能自发地履行其宗教职责。而怀疑伯克 140 夫人像她母亲一样是位长老会信徒，也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在伯克的观念中实有十足的天主教思想，这一点在他的主要政治理念中就表现得很清晰，而在他对待天主教徒的态度上，也有同样的流露。关于这一点我们将腾出足够的篇幅来刊登引文：

"当伯克初次努力反抗压迫时，他的愿望、思想和意图中对天主教的好感，在当时(1763 年)一直根本不被人们所理解。他晚年呼吁那些当年了解他的思想情感的人出来为他说话，当时他在爱尔兰，正值哈利法克斯勋爵当政时期，他同时还表白，他的思想情感从未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当年他的思想就如他晚年任何时期的思想一样成熟。而那时不存在天主教协会，也没有天主教的煽动者，在英国也没有政治家准备与"天主教解放宣言"作妥协。格拉顿还是个学童，威廉·皮特还只是个孩子；而查尔斯·福克斯正呆在伊顿，忙着用法语写信来吹捧布特勋爵、坎

宁尚未出世。而那时的荷兰王室并非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相反是政治腐败的罪恶之地。对这位其生平和著作是目前讨论的主题的伟人来说，是理当享有其荣誉，而且较之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或者后来的政治权贵，他以更为坚定、热情和执着的精神，坚韧不拔、持续不断地从事着他的事业。我们已经看到，他的首部有关政治实践的著作，即他关于刑罚典的未完成的手稿，中间就流露了对他的受压迫同胞的声援。我们会看到他口授的最后一封有关政治事务的信，其中也有相同的伟大情感。这封信他是躺在睡椅上，拼尽气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赶在疼痛稍止的片刻间隙写成的。”

麦克奈特先生的大著虽然是煌煌两大册，但其叙述的时空范围并不很大，它只讲到 1783 年。直到今天人们仍视伯克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一位治理社会的受欢迎的领袖　记述他的辉格党的政治生涯相对容易些，但更有趣、也更为困难的是他生平中这样一段经历：即从一位政党领袖升华为一位人类的导师。对他晚年的描叙应超越党派政见的偏狭，为了平实地记述其思想言论，传记作者应抛开一切政党偏见，领悟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对这一理念伯克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令人信服地予以了论证，而这一理念本身也引发了他 1791 年的隐退。

十、对18世纪观念的反叛*

141

文学史中经常出现根据不同的目的对同一题材一再耕耘的情况。学术史在此方面不同于事件,它必须把一般的历史与个人生活经历结合起来。至今还没有作者成功地将两者统一于一本书中,对两者进行分别讨论的想法,既很自然,也切实可行。对黑格尔学派来说,这是特别惬意的。从他们自己的意识深处引申出历史,是黑格尔派作家的骄傲;他们认为事物的永恒性质与这种意识是相符的。对他们来说道德就如物质世界一样,也充分地显示了设计的特征,其组成部分是如此完美和谐,必然而又智性的法则是如此不变地发挥作用,以致在他们的体系中,有关法则的知识产生有关事实的知识,思辨的力量与实在同在,故哲学家可帮助天文学家预知其观察的结果,也可揭示那些支配历史法则的必然性来为历史学家帮忙。历史的撰写开始成为哲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理念和事实的必然过程均被先验地证明。基于这种逻辑,为了弥补其论证的欠缺,或者为了在阐释其理论体系时便于用更多的实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人们被告知哲学所预言的东西对历史学家说来也已是经验的或者可从外部来感知的;于是真实的世界历史搞得如同一本数学书后面的答案索

142

* 原题为《评托马斯·阿诺德的〈英国文学手册〉》,首刊于《内外评论》,1863年第2期,第250—254页。

引。学术史当做自发内生的过程来写，因为它必然会如此发生，即便一个人不了解某位作家的某些作品或者不知其姓名，也能设想他会完全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于是设计者的功能被叠加到建筑师的功能上，学者能够洞悉其对象全部特性。这一方法的影响也见于某些杰出的论著，例如玛格的《大革命以来的法国文学史》，在伯恩哈迪讨论希腊和罗马文学的令人叫绝的论著中，都可找到这一影响的痕迹。

阿诺德先生在其英国文学史书中，出于说教和美学上的考虑，使用过那些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给他提供的方程式，但却拒绝了他们的理论旨趣本身。他分两步详细研究了其考察对象。首先按自然的历史顺序来论述那些作家，接着再依批评的顺序来讨论他们的作品；首先致力于指导记忆，然后再指导读者的趣味。就后者而言，他是一位极稳健而又智慧的引路人。对于19世纪诗人叛逆的共同品格，他的解释是：

> 这一社会运动的主要流行趋势可以说是对18世纪理念的一种反动。这些理念主要是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文学和政治两方面均是如此。例如蒲柏在文学与政治两方面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也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在其社会思想中，他不承认任何制度有理所当然的优先性，也不认为古代有什么值得尊重之处；相反，他在思想上采取的是这个态度，用合理性的标准来判别任何事物，无论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他嘲笑形式与用法的多样性，因为这些形式与用法有的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标志，而有的其意义虽曾经是清晰和真实，但因为变化的环境而失去清晰性和变得幽暗了。这些变化妨碍了他那个时代的公共生活。此外，他仍然是个政治上的形式主义者，他不希望有人为的变化，认为社会

制度应按其自身性质发挥作用。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这对他那有点自私自利的哲学来说也足够了。还有，在文学方面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形式主义者，不过这里是从其正面意义而言的。因为在文学里，也如在所有其他艺术里一样，"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摧毁性的逻辑在打破坏的形式的同时，也使他全力与好的形式保持严格一致。现在这种对18世纪理念的反叛是双重的。保守主义的反叛，在认可规则的权威同时，抨击理性的迷失，致力于揭示或者说是复兴那些植根于现实政治社会之中的那些为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破坏的观念；同时也是对这一时代僵硬的规则的反叛，这种规则——不是由蒲柏本人，而是由他的继任者们，强加于文学的。而自由主义的或者说革命的反叛，接受了18世纪的破坏性的理性主义，它蔑视18世纪软弱而混乱的政治形式主义，同时加入到反对文学领域武断和形式的统治的保守主义家族中。正是这一点一方面沟通了司各特和保守派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它又使司各特联系上科尔律治、戈德温、拜伦、雪莱以及其他的革命派。他们都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变成了一种僵死呆板之事，它顺从所有规矩和仪式，但却背离了活生生的自然和心灵的温情纯真。……已被蒲柏的继任者们弄得难以容忍、矫揉造作、呆板和一味说教的经院学派，如今都反对一个有关诗之功能的相关理论，我们可称之为"自发论"。如星星闪光、或如花吐芬香——也如夜莺不能停止歌唱，蜜蜂不能不酿蜜一样，按此理论，诗歌是美好心灵和韵律的自然流露。如果想人为构思一首好诗，则会如同一个人试图构造一棵树一样，必然会出现沉闷和僵死的结果。对一个诗人来说，人为的努力即等于犯罪，因为它意味着缺乏灵感。……一位

> 诗人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都不在于其想说什么而在于其情不自禁地一吐为快,它们有着更大的魔力——你可以称之为"自然",或者你随意称之为什么,它们经过你的嘴表达出来,就像在传达神谕。这一理论无疑有着很多长处并包含着许多真理,它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产生了新的恶果,引出了新的谬误。它未能吓住无名的诗人,但与以往有别,他们属于一个不同的等级。……很多代人却把代表最优秀诗歌荣誉的桂冠授予史诗和戏剧,但两者均未能促使我们所言及的各种诗的流派取得少许长进。这可能正是由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理论的影响所致。事实是,没有生机勃勃的才华,就写不出内容丰赡而隽永的诗篇,而才华却恰是这一理论所漠视的对象。(第211页)

144

公开评点拜伦是阿诺德先生展示自己对一位特殊作家的判断力的一个好机会。他说:

> 拜伦代表了19世纪对18世纪理念的全面反叛。我们已从司各特那里看到了他所代表的文学反叛,但拜伦的反叛更为广泛,并触及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他郁郁不乐和愤世嫉俗,拒斥其前辈的所有的思考方式;18世纪的怀疑主义及公众信仰,很难被他所认同。休谟和吉本这类的怀疑论者并不为无信仰所苦,他们的心灵转向享乐主义,感觉和知识的世界提供他们所需的巨大的满足,他们与社会秩序不发生冲突,因为此秩序保证他们平静地拥有他们日常的快乐。不过拜伦却有着一种果敢和热烈的禀性气质,虽然他受那些深邃思想的影响而一头扎进怀疑主义,但很快被其自身行为的后果所警醒而抽身退出,并深为道德的败落而

> 震惊，而怀疑主义使人生充满着这种败坏。（第224页）

阿诺德先生的书中弥漫着虔诚的宗教情愫，但它的表达却并未卓著到可以击退任何人，除了所有宗教的敌人。由于宗教不是强加的而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美学因素的保留是第二位的，因而有必要去找到其他统一的因素以及其他更有用的进步原则，以将英国文学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结合起来。阿诺德先生通过宪法观念的成长史做到了这一点。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大谈对英国自由和法律的敬意，他承认道德与政治正义相关这一真理，并以同情之心考察了英国政府制度的演变历史——从它在天主教时代的萌芽以及它曾经遭受的来自绝对主义、共和主义、英国国教和异教的危险，这些危险都曾威胁过它。政治真理在辉格主义一边，而其他派别则纠缠于各种形式的错误：菲尔默代表了保王党的托利派，霍布斯代表了哲学上的托利派，弥尔顿和悉尼代表了清教徒的辉格派，哈林顿代表了哲学上的共和主义者。将弥尔顿和悉尼从真正的辉格派阵营中排除出去，显示出阿诺德先生充分意识到具有高度建设性、积极并明确的辉格主义理论和一般自由主义原则之间的差异。他评论皮特先生说：

145

> 他的政策是纯粹辉格党的和宪政主义的，起初就像他的父亲；但在1789年以后，他被迫和法国极端的或者革命的自由主义保持接触的姿态，而逐渐改变其政府立场直至成为真正的托利党，因为在国会和民众中他得到了托利党的支持。但皮特个人仍是个真诚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第157页）

说及约翰逊时，他点明了保守主义和辉格主义：

他对英国的影响以保守主义著称，……他死后伯克继续推行他所开创的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第181页）

在将洛克置于辉格党传统一边时，他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他的政治学说在其祖国被坚定地付诸实施，即便在他死后也是如此，而近来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奉行其政治学说。其结果——至少在表面上——是明确地鼓励了这一学说。"（第149页）如今辉格主义的核心是承认神的意志具有至上地位，或者他们可以说，如果这一词按其本意来理解的话，它认为神的权利高于人的意志，无论其代表的是君主还是人民，无论是过去的习俗还是思辨理论。它绝对排斥那种蕴涵专制、任意胡来的政治学；在托利主义那里这一因素以其对权利原则的否认表现出来，而在激进主义理论中，它则以拒绝现实的权威而显露出来。它坚持国家的法律，但着意的是其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得以表达或确证的短暂的形式。塞尔登以此方式参与了大叛乱，萨默斯则为这一场革命辩护，而伯克在美国和革命战争中维护了宪法理念。但洛克则从一种自愿的契约中推导出公民社会，但由此引发的这样一种原则，其本性是恣意专横的，其在结果上对权利的危害，一如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格言。

146 我们注意到本书中有一二处较小的失误。他对罗利的《世界历史》的评论很难说准确地抓住了这本书的长处；这本书虽无什么实用价值，但也许在构思方面是一位历史学家所能设想的最好的。一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因下面这句话而遭到贬损：胡克"以其有关罗马共和国的枯燥气味的著作而继承了费格森博士的衣钵。"（第367页）费格森是一位在水平与智力上堪与休谟、斯密比肩的先生，因此有必要提及他以及其他一些被遗忘的专家们，以恢复他们在国人心目中应有的位置。阿诺德先生对

伯克的天主教倾向的一种解释是“受其信奉天主教母亲的影响”(第197页)。这一点表现在伯克给沙克里顿的信里,这封信首次登载在去年出版的《莱德贝特报》上,它还披露伯克的妻子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关于皮特先生“有点木讷”的说法,我们实在难以理解(第194页);而在对厄斯金的注解里,他对其口才却不置一词,这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第156页上的一段,会引导读者产生这样一个判断:查塔姆伯爵活到了亲眼目睹英国承认美国的那一天。除此而外,书中其他一些失误也令人失望。不过此书的目的并非以详尽的内容或囊括所有问题来使研究者们折服,而是意在为“至少是我们的文学中最通俗的部分提供一种明智而前后一贯的解读。”就此而论阿诺德先生可谓大功告成,虽然可以说他研究得不是很透彻,但与其他任何作者相比,他的鉴别力都更为出色。

147 # 十一、违反自由精神的自由主义*

虽未自诩为历史艺术或者科学研究，但奈特先生却成功地构建了应该公正地说最为有用的英国历史。他在这最后一卷中提供的资料的肤浅性质不甚明晰；本书与和平时期英国史的多卷上乘之作无法相比。书中他煞费苦心地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和丰富的文献，但它们未被分类，不成比例，也未加分析。书中没有引人入胜的跌宕起伏的叙述，资料的运用也未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民族的这段复杂的历史进程，因为读者并未自觉准备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来读懂这段历史。奈特先生表现出了一种宽宏大量，这将使其著述很受欢迎，但这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容易犯下的最大错误。完全远离偏执与暴力，他对其从未体验过的原则和情感理解甚少。他将含义复杂的同情误解为一种慈悲为怀的温柔，这种慈悲使这位史学家对所有党派，所有意见一视同仁，作为一位意识到自己欠缺的人，他避免了诱惑——但也未能战胜它。他的公平是一种消极的中立精神，它对所有人都敬而远之，缺少"各得其所"的明智的公正；他的这种公正既源于精神力量的匮乏，也源于要做老好人的决心。

148

他看待天主教问题的态度就提供了一个实例。他理解问题

* 原文为《评奈特先生的〈通俗英国史〉(第8卷)》，首刊于《内外评论》，第2卷(1863年1月)。

的关键，他也清楚1829年议案的实情和缺陷，比大多数实施这个方案或需要这个方案的人理解得都准确。他指出那只是被作为一个权宜方案而得到认可的，这一方案是一种强制性地排除了有效的道德律令的原则，也是这样一种政治结果：当一种新的原则被允许牢牢地植根于国家生活之中时，这一政治现实就会呈现。他引用阿诺德博士的话："支持爱尔兰罗马天主教的要求，即使冒着触犯新教国教的危险，也是每个英国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因为这一要求若非无视正义则难以拒绝；认为上帝会行不义，或企图用罪来抗恶，都是缺乏对上帝的信仰，也是一种颠倒错乱。"奈特先生就此补充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在爱尔兰面临四面楚歌的危急时刻，对它的坚定的承诺会给每个有良心的政治家以鼓舞，而且还会表明正直的行动必将有好报；支持曾被亏待的爱尔兰不再会给英国添麻烦，只会分享她的自由和繁荣，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第241页）没有比这一陈述更为正确无误的了，即拒绝爱尔兰国教的行为就涉及到对宗教自由原则的承认问题。一旦放松其著名的指导原则，奈特先生就又旧病复发，陷入了一种狭隘的自由主义，就如可以想像到的一样，这种自由主义龃龉于自由精神。他写道："在偏执牧师的坚定反对下，无神论学派平安地成长起来。如在爱尔兰国立学校一样，这里的教育系统不设宗教课程。老道精明的政治家一直认为，这是缓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宗教仇恨、减少他们之间怨毒的宗教偏见的最好的办法。"（第529页）对于这位以为是相同的原则既支配着初等教育理论又支配着高等教育理论的人，我们不想停下来专门评估一下他的政治常识；对奈特先生来说，这一错误并不奇怪；而我们想要说的是，一位如此真诚和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如何会否定每一个共同体的宗教权利——远比选举立法者或否决税收议案更神圣的权利？宗教事务的处理权利，或教 149

育社区内孩子的权利，远比涉及财产和权力的事务更为重要。建立在强化彼此对立的爱尔兰人的和平忍让之上的专制统治，比那种长期以来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优势的专制主义，更加恶名昭著，对于臣民间维系着相互忠诚的状态，更加具有颠覆性。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极端主义的消极的抽象自由主义，它的不宽容的绝对主义与可恶的旧的托利党理念难分伯仲。奈特先生说得很对："不论他们如何迫切地希望享受宗教宽容，大多数英国异教徒已准备与不伦瑞克俱乐部联合起来，在没有一丁点政治危险的情形下，他们渐渐拥戴新教的至尊地位。"（第233页）不过这并不能为那些支持天主教权利的人辩护，他们在那时反对废除《宣誓与社团条例》，他们并不能像伯克早在40年前所做的那样去做，即勾勒清楚各种权利要求赖以建立的种种原则；他们害怕在爱尔兰出现骚动，他们准备做的不是传播政治哲学，而是向一个激忿的民族屈服。

如果奈特先生对政治浸润着原则这一点更为坚信不疑，他可能也就不会对韦灵顿公爵陷入英雄崇拜的境地。下面这段引文显现了这一崇拜："除了轻视民意的力量之外，他也许可以说是最好的政治家。"（第229页）但威灵顿公爵和卡斯尔雷伯爵的性格（第180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正直无私的；而在其评述麦考莱的《历史》时，我们则可看到下面这段批评文字："要转变那些深受休谟影响的少男少女，使之摆脱对已退位的斯图亚特王朝和蠢蠢欲动的詹姆斯党徒的迷恋，向他们提供伟大的自由人民配得上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不寻常的力量；而在麦考莱阿谀

150 逢迎的历史中，只有大人物的不幸，而忘记了下层人的恶行与苦难。"（第472页）描述完奥尔索普伯爵的演说后，在阐释其对1833年爆发的有关《爱尔兰强制法案》的著名争论的看法时，奈特先生说："在同一天晚上打破沉寂的是斯坦利先生的演说。"

(第 323 页)不过他省略了这一演说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正凭此斯坦利先生成为国务秘书。对于其同事的仇恨,奥尔索普勋爵易如反掌地使用了他的材料。当争论不休时,斯坦利先生躲进了图书馆,请一个朋友带给奥尔索普一个箱子,里面有几件在他看来已毫无价值的信件和报告。从这几份文献中以及在早些时候的某天晚上所说的事实中,他获得了启发并发表了一个如此雄辩有力的演说,以致听到他演说的人都说,如果他曾下令,王室将会撕碎奥康奈尔。作为这部著作杂拼性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引用奈特先生对拿破仑在滑铁卢的那天早晨所说的那句名言的译文:"他大叫道:'最终我会战胜他们!我有十分之九的成功把握。'"(第 32 页)这也就是等于说优势完全在他那一边。也就在这同一天晚上,我们拥有了永恒不朽的坎姆勃朗尼,"他奋不顾身冲击敌群,悲惨地战死。"(第 36 页)但这位有很多传说的英雄活得时间很长,最后他于 1842 年令人哀思绵绵地死去。

151

十二、麦考莱与辉格党理论的两个传统*

避开其文学传记撰著麦考莱勋爵的政治生涯，这个想法极不明智：试图这样做的阿诺德先生，即便有能力显示胜任这一工作，也一定会因其考虑欠妥而告失败。麦考莱勋爵的政治事业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取得了巨大的业绩，或者推行了一项伟大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作为现代最清醒、最执着、最有才华的思想家之一，出色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人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行动而是他的思想。部分来自麦考莱勋爵的影响，那些思想是如此缜密详尽，如此富有启发性，对当今年轻一代人的精神呈现出如此强有力的作用，以致追溯这些思想的影响和变化即从他离开剑桥到论述皮特的著作发 152 表为止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这项工作需要一种分析能力，但阿诺德先生并未表现出拥有这种能力；而且这项工作也要求就像仔细研究他的个别政治演说一样，细心考察麦考莱先生的文学著作，但眼前这本书却将这些排除在外。不过虽然拙于想像，写得也不太好，但阿诺德先生的这本书仍有某些价值，因为本书搜罗了很多与选举、公共宴会以及其他一些不值得人们记住的事件的信件与演讲，此外本书还包含了麦考莱对著名的《印度法

---

* 原题为《评弗雷德里克·阿诺德的〈麦考莱勋爵的政治生涯〉》，首刊于《内外评论》，第2卷（1863年1月），第257—260页。

典》的大量阐释，它们虽然实际上谬误百出，也没什么价值，但却包含了麦考莱勋爵思想重要的努力。关于这位著者的风格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正面的例子："实际上我们的政府不仅废除了奴隶制，而且也禁止了苦役。在牙买加所发生的事情，在英国一天也不会被容忍。在英国劳动是义务，从而受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督促。如果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男人拒绝劳作，我们会将他送进监狱，并罚他做有一定强度的苦力，不过这与奴隶的劳动仍有区别。……还必须采取一些渐进的步骤，以防止黑奴逃避神意的服从；神意要求他们以汗水换取面包。"（第 162 页）关于爱尔兰的英国国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愚蠢的话："我将大胆地提及一本毫无价值的小册子，即戈德温·史密斯教授的《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而且我还冒昧地以为，史密斯先生对此复杂论题的精心剖析，其所得出的结论，我坚信，和麦考莱先生的看法大异其趣。"（第 294 页）如果阿诺德先生读过他评论的这本小册子的话，他就不会不知道，本书正意在反复阐述麦考莱尊重爱尔兰国教的那些看法。当他写道"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布鲁厄姆勋爵的演说远达不到麦考莱勋爵的水平"（第 27 页）；此时他或许没意识到，曾听过自格拉顿以来每位演说大师演讲的麦考莱勋爵，他自己认为布鲁厄姆勋爵是他曾听过的最有雄辩能力的人，坎宁先生、普伦基特勋爵和格拉斯顿先生皆不能与他相比。

麦考莱勋爵从其精神气质上就不喜欢精微的政治思辨。没有任何学说能左右他，或者妨碍他服从一种坚毅而真诚的常识。因此之故他的判断从不会出错，他的思考从不深奥，他以讲究实际的政治家的厌恶避开讨论的深度。所以他对所有公共问题的见解摆脱了绝对自由主义的夸张，但他却未能看清那些谬误的思辨根源，或者说未能弄清必须运用的第一原理。在他看来，最

153

贴近、最简单的理由是最好的；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论证应该深深植根于玄奥的哲学之中。因此，在描述不同学派的学术理论之时，他并非总是正确的，他与这些理论的关系也不总是一致的。他所属的党派有两个渊源，其中一支由福克斯、悉尼、弥尔顿而通向“圆颅党”，而另一支则由伯克、萨默斯、塞尔登而通向古老的英国法学家。这两个党派之间的纠葛在内战时期较在克伦威尔和查理国王之间那段时间更甚。任何导致专制权力的两种理论体系间的差异，都不可能比上述两支中任何一支与主张王权服从法律的理论体系间的分歧更大，当弗克兰和塞尔登，一为国务秘书、一为皮姆的同僚时，他们所共享的原则甚至多于福克斯和伯克共事时共享的原则。

有一种理论认为，国王像人民一样都得服从法律，双方都必须防止和惩罚另一方对宪法的违背。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不仅仅是人民有权保卫的一项特权，同时也是人们有责任加以维护的最高的道德目标。如果人民忽视职责，他们就不可能是公正的；除非君主违反了根本法，否则人们蔑视或者反对君主，就是犯下了大罪。老一代的宪法学家对此有透彻的理解。“我们的王公和我们一样受法律约束，而且还有特别的理由全力维护它，因为如果他们践踏法律，也就是同时在毁灭自己，即破坏其王族荣耀和君王权力的根基。也因此，我们的政府不是专制的而是法治的；不是专横的而是讲道理的，我们的君主不会变得专权、无法无天、成为一个暴君；因为他们没有破坏其神圣权力的根本条件，故而也就能保有其王族尊严。上述神圣权力是按照国家现行法律和古代习惯来运作的。“(《萨默斯短论集》，第 10 卷，第 154 263 页)萨谢弗雷尔案件的一位主审者说：“法律的统治在两个方面，即对国王的权力和忠顺的臣民都实行同一标准。……人民不仅仅有权继承自由并以此来确认自身的权力，他们也同时

有义务将同一制度传给其后代。……在此意义上人民不仅有反抗的权力和权利，而且也有绝对的义务去这样做。"(《国家审判》，第15卷，第61页)

另一派的人士则主张相反的原则，即人民有选择、因此变更其统治者的权利。不仅一场革命，而且国王一个不受欢迎的举动也会动摇他的宝座。反抗是否合法不仅要受这块土地上法律的检验，而且还要得到人民的认可；证明起义为正当的原因并不在于对已确立的或公认的权利的恣意侵犯，而在于反对恣意妄为和反复无常。我们被告知(第21页)麦考莱开始时是一名托利党，他的改变是受到其著名朋友的影响。当时社会盛行的辉格主义，是荷兰王室的辉格主义，即格雷勋爵和罗素勋爵的福克斯派思想。他一直承认自己属于该派。他将"以不可动摇的精神至死捍卫弥尔顿和洛克的高贵精神"。(第206页)"在他们看来，一切政府成立的目的恰恰在于社会的幸福。"(《英国史》，第5卷，第75页)功利主义的政府理念在其著作中反复出现，这位作者就像悉尼、潘恩、罗素勋爵一样，真诚地相信人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说："辉格党的政府理论是，国王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说国王的权利是神圣的，也只不过是等于说一份议员的权利，以及一位法官、陪审员、市长和最初级警官的权利是神圣的。"(《英国史》，第4卷、第2页)这表明他从未抓住辉格党和其他党派之间差异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所有这些论述中他忽略了主权与权威的基本区别，忽略了在权力范围意义上权利与包含责任在内的权利之间的差异。他不熟悉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著作，较之他喜欢引证的那些人，他可从这些著作中发现更多的辉格派的主张。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原则的肤浅论述有很多错误，这从他一直在吹捧伯克的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从他的朋友麦金托什的例子就可以说明， 155

他从未弄明白前述两个学派的差异有多大，而对此两个学派他也未曾试着来区分，这真令人吃惊。麦金托什在使自己成为伯克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一举成名后，于1804年宣布，在各个方面伯克都是最杰出、最智慧的，他为自己曾著文反对他而深深后悔。

十三、利物浦伯爵的平庸*

156

查尔斯·扬先生的《利物浦伯爵二世的生平》一书，以有很多有趣的文章著称，故而在有关英国政治家的杰出传记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把他的英雄描写为最后一位施行自己政策的首相，他没有使自己的政府跟在反对派后面亦步亦趋。他说，自由大业未曾得到更为坚定地维护，因此，利物浦勋爵是一位伟人和一位杰出的首相。这不仅是个误解，而且错误之极。利物浦勋爵的生平之所以吸引人去研究，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能人，确切说来情况恰恰相反。他自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很有限的，但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却竟然如此长期的占据要职，实是英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怪事之一。他是一位高贵、温和与富有耐心的人，并具有处理繁杂公共事务的丰富经验，其思想执著不为人所动。"经验证明财富和贸易本身会适应哪怕是错误和有缺陷的法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立法动摇不定只会导致混乱和毁灭。"这些话不是引自罗德的演说，而是出自利物浦勋爵在1820年的一次演说。它们极具特征性。在有关《选举法修正案》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也有出色的论述。"那么我要说，给予工业城市居民的选举权，是可能采用的下下策。它首先将把巨大的恶带给这些城市；

---

* 原题为"评查尔斯·扬的《利物浦伯爵二世的生平与统治》"，首刊于《北方不列颠人评论》，第51卷(1869年10月)，第264—265页。

它将致使这些城市里的人民耽于奔走游说,而这将或多或少地损害他们的勤劳习性,并在人群中培养出长盛不衰的蛮横气习和永不知足的贪婪。我坚信,对于这一举措所有最尊敬的市民们将会发出抗议。"类似的可笑的笔触充斥于全书。对于《谷物法》,约克公爵只作过一次评论,他说:"整个国家的农业利益和新提议的法规是多么相左,它们特别是和那些政府主要支持者的大地主的利益背道而驰。"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又得知:"对大势所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爱尔兰人竟默默接受了,而在一群激动的、非理性的和牢骚满腹的人中间,是多么易于滋生激愤。除非不可抗拒的原因,一般情况下都应及时地提交给全民进行讨论。"不过这些不是利物浦勋爵的思想,而是其传记作者的见解。

利物浦勋爵是在最危急的战争期间治理英国的,并经历了艰难的 12 年和平岁月。不是人民、而是地主们选择了他。英国的绅士们对现有秩序感到满意,凭此他们已享受了一又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和特权。因为不希望变革,他们对思想也就没有渴望。他们理解利物浦勋爵自鸣得意的特性,也懂得如何评价其贫瘠的思想。他之所以和诸如格伦维尔、威灵顿和坎宁等政治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不仅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时代要求一个低能者掌权。他的平庸正是他的长处。他的政策的长处在于没有长处。花了 6 年时间他的政府战胜了神圣同盟,再过 5 年使自由主义运动传遍全球。这位首相不解其间的奥妙。正是他依托国王来压服坎宁。正是基于这一心态,他希望他的政府既包括那些赞成天主教的人士,也包括那些反对天主教人士。他的政治生涯展示的不是偏爱保守、惧怕观念的偶然的结合,而是它们之间自然的亲合。

十四、女王日志*

158

这个国家有一个可诅咒的宪法，还有一个托利党的内阁以及被阴谋笼罩的社会。国家正趋向一场巨大而带有实验色彩的变革。政府体制已威风扫地，这一方面因其未触动专制的一根毫毛，在另一方面则是因其极其无能。长期以来一直不习惯于强大王权的人民，几乎没有感觉到国王的治理或统治。这类情形迫使人们反思：君主政体是否失去其古代对臣民习俗和好恶的控制力，是否上位的继任者力有不逮？由此就可以毫无疑问地推断，在此情形下应当将王权面对国人的注视和思索，阿尔伯特亲王的传记受到喜爱，启发人们想出版《女王陛下起居记》。家居生活亲情洋溢，将会有助于产生一种至今尚未认真培育过的影响。王朝在某种程度上退隐，家庭则浮现了，这很好。大的损失可由细节来弥补，在忠诚已倾圮的地方，又开掘出了新的忠君思想的渊源。如果起自温莎的乔治三世的后宫的家居生活能帮助汉诺威王室植根于英国人心中，那么其秘密就要从他的孙女的高贵、纯洁的气质中去寻找。这些看法可能被认为是要为一个实在大胆的建议作论证，这种建议在通常情形下是没有人会冒险提出的。很明显，如果人们认为它意在利用民众的好奇

---

* 原题为《评〈维多利亚女王1848—1861年日志〉》(阿瑟·赫尔普斯编，伦敦，1868)，首刊于《编年》，1868年1月18日，第65—66页。

心，或者利用善良大众的良好意愿，那么这本不错的著作就将受159 到损害。而如果本书的记叙过于琐碎，也会引起麻烦，《陛下起居记》所经历的选材过程，是其他类似著述不可比拟的。所有政治方面的东西——因此所有关涉到国家利益的东西——必须省略掉，我们看到的不是公共事务，而是一般的泛泛之事；不是政治家，而是出身苏格兰高地的随从故事。

编者已预见到了会有批评，所以在序言中突出了本书的特征，但他不可能点破其间的真正意义。失望的公众会以闲聊来自娱；对女王隐居的失望的情绪，在《英国喜剧史》的笑谈中比在女王陛下的这本严肃冷静的编年史中可以找到更适当的发泄途径。赫尔普斯先生为了说明女王的仁慈之心和关心自己周围的仆人的习惯而经常提及巴尔姆勒的谦卑成员。这本日志的更大优点是详备，以至于它没有为添油加醋的杜撰留下多少空间，也制止了历史的虚构，使讹误无处藏身。最突出的例子是他赋予约翰·布朗的名士称号，其性格如一条注释中所描述，在最后的两星期里连篇累牍地复述了上百遍。除此条注释外，书中关于他还有大量的记述。我们读到他是如何评说国王的，他是如何换盘子的，又是如何为女王擦靴子的，他是怎样穿着皇家格子花呢的，他走路又是多么快，他欢呼时又是多么响亮！在涉水过河遇到点小麻烦时，女王又是多么信任他而超过奥瑟勒公爵。如果大众对之不感兴趣的话，所有这些细枝末节将不会受欢迎。如果偏厢房里的仆人家眷或者巴尔姆勒的房东，在起居日志中不合理地占据了太多的篇幅，那是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谈话的内容太多了。在他处将会引起批评的东西，在这里被发现是使之沉默的最好方法。

毫无疑问，这里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领域之间没什么密切的联系——比起乔治四世来，乔治三世也不是个好国王，而当

举世欢庆女王朴实的禀性和慈祥的品质时，国王获益很少 尊贵和庄重的宫廷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赞美的主题。而这本苏格兰高地人的日志直接揭示了国家和女王在政治禀赋上的特性——率直、忠于朋友、真诚信任身边的人，关心他们，对他们仁慈和宽宏。忠心和友谊的表白随处可见，但它并非显示强烈的政治热情与力量，而是展示一种热爱——不是对社会或者国家的——而是对女王个人的。通过如此众多的事例和如此大量的礼仪琐事，这种新奇的印象和个人感受能在最非个人化的王国政府中保留下来，这也许是该书让我们了解的最令人称道的特色。悠闲的谈话和豁达的风格无与伦比，对于许多公开的怀疑、编辑们对是否向它们发起挑战犹豫不决。这儿所谓的疑问，我们特别意指女王陛下对那位莱思的漂亮渔妇的信赖。惟一政治上有牵连的是记述爱尔兰的那部分内容。女王首次访问爱尔兰是在 1849 年的 8 月，当时这个国家刚刚经受过一场最为深重的灾难，还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 这是其他现代文明国度都曾遇到过的 这会使人猜想手稿遭到广大幅度的删减。公开出版的部分虽然记载了伦敦战利侯爵对两个重要仆人间的争执大为不满，不过其所描写的愉快的场景，并不含有一种悲剧性的暗示。书中有几处内容，天主教徒尤其是南方的天主教徒将会乐意看到，因为天主教徒从女王谈及穆莱博士和丹渥博士时的方式以及她所认可国家警察的好处，会感到高兴；而作为明斯特的男人，很满意女王陛下认为三分之一的科克女人很可爱，而在贝尔法斯特，"漂亮的女人几乎消失了。"有关政治方面的一个特别看法是由女王访问都柏林的一所"模范学校"引起的，"可允许孩子有任何信仰，如果孩子们希望的话，父母可分别教给他们不同的教义。但惟一必须强制教育的是福音书的真理，是爱和仁慈。这是真正的基督徒，在任何地方都应如此宣扬。……从这儿我

160

们访问了三一学院，爱尔兰的这所大学；它虽尚未引入如此自由的制度，但罗马天主教徒是允许入学的。”当然，在已出版的日志中寻找政治意向是毫无道理的，在此意义上它们成功也不能证明其重复累赘的合理。这类出版物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希望过高，反而会失望。要使旧闻产生新意，那么需要求助的不是可敬的忠诚，而是骄傲且自由的英国人的特殊弱点。

161

在罗马最后一次围攻期间，一位亲眼目睹教皇的马被套在共和派大炮上的牧师听到呼喊："问问尊敬的骑手！"我们的君主制度未受到那种有害迷信的束缚，它不是建基于虚幻的慈悲之上，它周围也没有虔诚的神秘精神缠绕。王权陷入泥淖也只不过是一代人以前，但一个能赢得民意的人又使它重新振兴，"女王日志"是其安然无恙的一个标志。只要君权存在，大不列颠就将仍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在海上的霸权丧失以前，在海上战争打碎那维系了许多政治共同体的纽带以前，对于很多自治的英联邦成员，王权仍是必需的权力中枢。此后虽然只是消极存在，它仍能享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并帮助维持一种组织结构，惟有奠基于此方可获得人民的尊重。即使有堕落和愚蠢的君主，君主政体仍将继续存在。伟大而自由的英国所依据的社会秩序，需要君主对公众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也是种政治需要。女王陛下日志，将会增加王权的影响，并扩大女王在其统治期间已聚积起来的影响与支持。

十五、妥协是政治的灵魂*

162

加菲尔德将军在其日记中写道："在最近的百年间，没有任何国家像英勇的英国那样，克服巨大的障碍而取得令人骄傲的进步。"与此同时，格莱奇也论述了一个民族从卑俗的肉欲转向对几个世纪的失误教训进行总结这个令人称道的变化。就在这时，面对同样的情况，普雷沃斯特·帕拉多尔说道：人民在什么样的生存阶段才开始感到悔恨，安于他们自己的事务，并努力弥补自己的过错？布赖特博士目睹了这一切，并从中察觉了女王统治期的主弦律。他以那个时代的变革的思想和同情心，以饱满的民族热情，以对是非的明察秋毫来写成的英国历史，若以挑剔的眼光来看，是自作多情的、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的和笨拙的。他揭示了这个民族、这个体制和帝国是如何形成的，但他的心思却不在充满斗争和曲折的过去，不在阿斯凯龙和巴黎的加冕典礼；他不在意于德雷克和克莱夫，而在意于那些行使将所承继来的权力和责任、宝贵的经验和严肃的艺术服务于3亿人民的需要和要求的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和关注现实的历史学家。他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所表现的对职责和困难的敏锐意识，使他的这本书比其以前的著作更生动更感人，尽管它涉及的不是重大

---

* 原题为《评布赖特的〈1837—1880年英国史〉》，首刊于《英国历史评论》，第3卷(1888)，第472—490页。

的题材。我们不用拼命盯着已不再有军队的杰拉拉巴德堡垒，163 而当奥康奈尔因一个疏忽而得救时，我们实不知失误让法务官员、法官、爱尔兰律师以及狡猾的犯人自己逃脱之传说是如何被与此毫无关系的一位伦敦的年青律师所察觉的，他的幸运导致了这天的结局。

格内斯特乐意为我们描叙在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动荡不安。他所谓的"Uebergang in das Jahrhundert der Socialreformen und der Socialbills(社会改革与社会立法一百年)"，布赖特博士称之为民主的时代。而要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时代，则似乎是设法使一个政党获胜。我们必须对自由作出限定，它就像骆驼，享有比自然中其他任何东西更多的定义。民主制，如果不是最科学的概念，也是我们大家看法歧异最少的概念之一。民主与自由这两个概念并非总是不相关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们与阶级统治、平等、帝国主义、教育、宽容、奴隶制、民族性、联邦主义、征服、少数人权利以及宪法统治的关系。泽勒曾认为《哲学史大全》中历史应该解释与描述并重，这个劝告对于他是有益的。这一提议并不是向大学的导师们讲的，他们深谙很多政治影响是非政治原因造成的，并总是力求那些空洞争论表面深处的原因——即使不是事情的根源。但他的理论从不走极端，也很少有党派教条主义。当他询问政教分离是否继续时，他的表现就像基布尔一样显得是一位党派倾向很强的人，或者像魁奈那样，"Quand on parle pour la raison et la justice, on a bien plus d'amis qu'on ne croit.(当人们为理性与正义说话时，就会有许多朋友。)"他应得到这样高度的评价：他从不满足于让自己的心灵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思想停留在低劣的水平。为此真诚的自由，他饱尝了沉重的教训，真诚意味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重任与方向，他满腔热情思行合一献身于此。结果，他会称赞一位哲学家

的说法，自由主义将失去印度，以及普鲁士部长对我们国民的演讲："在你有时间把手插进裤子口袋之前，你们的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他避免了刺眼的对比和过细的界说，并断然拒绝了政客们的私人意见。牛津运动是保守主义运动，一位自由党人被臆想成教会的敌人，一个想整顿教会秩序的人，一位科伦索的追随者。有的人如红衣主教纽曼和圣保罗学院院长这样的人，一直在那一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概念，而德国的路德教派，出于其体制上的原因，也是这样。布赖特博士接受了牛津运动发起者的概念而未加甄别，不考虑有些人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立场，有些 164 人坚信劳德的学说是针对那些把天堂与地狱等同的布拉德洛信徒的，他仍然赞美把主教送进伦敦塔而将无神论请进议会的天意。他喜欢有条件地议论一下其他国家，"无论怎样都会令人想起这场'政变'的政治面貌"，这就是他对事情的看法。这样缺乏鲜明的立场使布拉格的一位诗人很有感触，他曾于 1847 年去看望布莱根，并不得不回答一些问题。如布拉格是在匈牙利还是在波兰？两个都不是。波西米亚是在奥地利还是在德国？既在奥地利，也在德国。俄罗斯君主国的政体是独裁的还是宪政的？部分是独裁，部分是宪政。最后布莱根失去了耐心，他喊道："法国人喜欢事情清楚，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法国的。"这类不可靠、不真实和想像的历史故事，将不会被写入简编法国史纲要之中。

在涉及到这些事务时，所有的谨慎都消失了，这些事务暴露了这个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受制于那些我们必然要作出的考虑——人应该对人负责的考虑。"英国在印度所具有地位的自然结果就是这种事务之一，该地位的正当性理所当然会遭到质询。……无论何时都不能说他们以更为残酷的方式显示了对自己、对他们事业的正义性的坚定执着，不能说他们不理解反对者的理由与情感，……争论似乎存在于两个未开化的种族之间，他

们无视一切正义和仁慈,以至于什么也不想,只想灭绝他们的敌人。"欢呼喝彩乃至狂喜的权利,被慷慨的诚实所辩护。诸如此类的更高格调的历史书尚未写成;在加富尔死时都丹写道:"Ceux qui l'appellent un scélérat ne savent guère de quel bois se sont chauffés la plupart des libérateurs des nations.(那些称他为无赖的人,几乎不知道绝大多数民族解放者是如何发家的。)"布赖特博士对此十分清楚,他对判决进行报复的严重性丝毫没有减轻。如果还有例外的话,就是对克里米亚战争表示满意,与我们共享对法国的不信任 他追随着金莱克亦步亦趋,而在其品评帕斯克维奇计划时——这一计划在西里西特里亚酿成了那场大灾难——忘记了其通过维也纳而去君士坦丁堡的真正的历史165 性建议。但当金莱克配给盟军的军队至少比敌军多 2.4 万名时,他却认为只需不超过 5000 名就行了。在英克曼,一支不怎么稳固的法国部队的防线,受到英勇无畏的英国军队援助。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在欢迎法国士兵的演讲中,那位军官的口气就不会是这样的了:"你们难道不记得了,我们看到他们刚度过难关?"

威灵顿公爵 1852 年去世并得到颂扬,他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着时代所赋予的力量、忠诚、值得信赖,是个非常好的人;而用五彩斑斓的故事来文饰伊丽莎白苍白形象的机会已经失去。从他对费迪南七世的鼓励,从他拒绝同意对奥尔良王室的提升,从他对查理十世和普里格那克所抱的幻想,从他反对波兰的宪政政府——他基于当时的形势认为这一政府会危及欧洲的稳定,而在 1814 年 9 月的欧洲,到处都充斥着自由主义——等等方面来看,我们对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品格必须给予适当评价。当坎宁在加紧动员一切资源来防止西班牙的入侵时,这位公爵由劝勉法国政府大胆前进和不要管他而显示了作

为同事的忠贞；而他向公共教育迟疑地迈出第一步时，威灵顿用一句格言对狭隘的党派意识展现了他的超越姿态："钱不应向人民征收，也无须议会批准，因为其目的意在用罗马天主教教义、用一神论思想、用那些再洗礼派学说，用那些和英国国教不同的教派主张，而非用英国国教的教义来教育人民。"在皮尔的伟大政府里——它之所以伟大，因为它包容了十位这样地位显赫、财力雄厚的人物——他的话不再被采纳了，人们对他敬而远之。

类似皮尔和帕默斯顿这样的圆滑的政治老手，正适合于做为所有读者写作的这位政治史学家的对象。作为一位中庸的英国人，帕默斯顿勋爵在他笔下受到良好待遇。帕默斯顿认为有关他的评论、有关他的材料、有关他的那些显眼的战争评论是在兜售"一种有害的毒药"，统统是对他的陷害。严正的道德和世俗的爱国主义处于冲突之中。对于篡改了的葡萄牙和阿富汗的公文，他碰都没碰过。只是从 1835 年后作者才将帕默斯顿勋爵突出到我们外交政策的杰出主管人的位置。"从 1830 年 1 月到 1834 年的秋天这段时间，是由其后的首相格雷勋爵掌权的。"当金莱克这样写时，还有几位见证人健在，他们以为它们不仅正确，而且还相当到位。关于英国在那个秋天的胜利以及穆罕穆 166 德·阿里的投降，被大肆渲染。最为夸张的是他在被苏丹解职后，又正式官复原职，甚至于还被埃及的帕夏封为世袭官员。到目前为止，基佐领导的法国恢复了她的影响。伊莎贝拉女王的婚姻几乎没怎么激怒法国人，要不是路易·菲利普和帕默斯顿勋爵之间早先就有的敌意，这一婚姻也几乎不造成严重的对立。布赖特博士一直上溯到四国争议，其日期是由利奥波德国王于 1840 年写的一份文件论定的。"Seit er vor vier Jahren in der spanischen Frage einen ihm empfindlichen Widerspruch von Seiten des Königs Louis Philippe erfuhr, ist er noch nicht versöhnt,

und aus Rachsucht geneigt, Frankreich schonungslos zu behandeln.(自从他四年前与路易·菲利普国王在西班牙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来,他仍然无法原谅他,并倾向于毫不留情地报复法国。)"他们俩在年轻时就彼此有了恶意,而在一张暴怒无礼的便条中,帕默斯顿为其对政变的态度作辩护,以表达其胸中积蓄已久的不满。

在对西班牙人的婚姻问题上,说帕默斯顿勋爵的态度是严厉的,这种处理是友善的;不过说如此败坏道德的事极少发生,而王后注定是命运多舛,则太过分了。最后的选择落在了两个兄弟之间。而"改良主义者"的弟弟却被英国看中。法国的意见占上风。他们还希望王后的妹妹嫁给迪·蒙蓬斯尔公爵,对此英国也认可,但要求第二个婚姻应推迟。法国想方设法让两个婚姻同步进行。事情已发展到了这一步,即破裂的信任将会危及西方的联盟。西班牙女王不会嫁给法国王子,在向英国做出这种让步后,法国坚持至少嫁给一个波旁家族,并通知英国议会,如果女方不是菲利普五世的女儿,他们自己将废除条约。这一警告很快传送给阿伯丁伯爵,当时他正和其对手科布里的利奥波德进行谈判。这一威胁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阿伯丁伯爵则威胁要召回我们在马德里的大臣,帕默斯顿则对西班牙的自由党以及他们的候选人顿·埃里克有所承诺。因其坚守了承诺,所以他们有权要法国人也履行有关协议。而法国人能够回答:亨利·布尔沃爵士对利奥波德王子负责;如果不是内阁的话,则是王室关注他的成功;葡萄牙和比利时的国王支持他。历经3个月的犹豫后,帕默斯顿引诱阿尔伯特王子倾向于克里斯廷王后的提议,而法国则非常巧妙地运用了其宣传材料,以致使这两代人都相信,他那个事实上已放弃的计划正是他自己想要的;而拖到7月份,M.迪·马扎德写到,帕默斯顿勋爵最为关心的1846

167

自由史论

年的就职,使利奥波德恢复了候选丈夫的资格。相反,恩斯特公爵则发誓他不能隐藏倾向于科布里王室的计划。不是法国而是英国反对出身该王室家庭的一位王子,他是最佳的候选人,受到西班牙王后的偏爱;这一反对把英国和德国之间就自由国家里君主制作用之不同观念的争论公开了,而这在王国的文献中已有表露。布赖特博士对阿尔伯特王子在该国的行动无条件认同,他忽视科布里公爵新披露的暗示其兄弟失败的东西:"Ob Prinz Albert in seinem Verkehr mit dieser Nation gleich von vornherein den richtigen Ton zu treffen wusste, will ich nicht entscheiden. Ich habe über diesen Punkt oft in aller Liebe mit meinem Bruder gehadert und immer die. Empfindung gehabt, dass ihn ein sehweres Loos getroffen, sich dem grossen Inselvolke verständnissvoll einfügen zu müssen.... Man hätte streben müssen ihn freundlicher zu stimmen....Die grösste Wärme and opferfähigste Neigung vermochten sich zuweilen in schmerzliche Kälte zu verwandeln, und oftmals sah man ihn an jener Grenze, die für Mächtige und Hochgestellte so verführerisch sein mag, in Urtheilen und Anschauungen sich gefallen, die einem gewissen Hange zur Menschenverachtung entspringen.... Es war eine ewige Gedankengährung in ihm, darauf gerichtet, die Menschen zu beglücken, und er konnte gegen den Menschen sich so hart wie möglich zeigen.... Man steigerte sich in abfalliger Beurtheilung der vornehmen, sowie der niedern politischen Halbwelt, welche sich vermass zu praktiziren und in das Leben einzugreifen.(我不能肯定阿尔伯特亲王是否开始就以正确的语调和这个民族进行交往。关于这一点,我常以充分的善意与我的兄弟展开辩论。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他必须以一种适合于伟大岛民可理解

的方式来会晤厉害的洛斯。……人们必须努力使他自己变得更好。……那些伟大的温情与奉献的渴望很快就可能转变为激烈的争吵。人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边缘情境中，它对于强大且高贵阶层的人如此有吸引力，使他们陷入这种判断与直觉中，即对人性中卑劣冲动的突然爆发也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担忧。……在他身上有一种永恒的思维倾向，即要么尽力取悦于人们，要么尽可能地反对人们。……一旦这个低贱的奢靡进入政治世界，实践与生活日益陷入粗陋与无个性之中，人们对他们的偏见就会加剧。)"最后一句出自斯托马克的颂词。

来自哈威德的拉斯金先生高兴地宣布，他发现了伟人格拉斯顿的秘密。对此布赖特博士不怎么相信，他推测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幻觉，他自己的关键做法是同化作用，他认为格拉斯顿先生沉浸于公众幻觉的阴影之中，而这种幻觉他能给以科学的揭示。结果他也在处理一封信时遇上了一些困难并显得迟疑不决，这封信我猜测是写给汉纳博士的，这封信被引证来表明他是这样的变幻莫测，以至于难说他是一位主张废除国教者。这一变化既非是突然的，亦非由外因引起。我没必要来证明，因为塞尔勃尼勋爵知道得更多。牛津运动的支持者理应在1863年受到警告，辉格党人早在1864年4月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不用预卜也能知道未来很多年里这个政党的前途。我甚至于还提出了谨慎的疑问：在1873年，政府是否意识到了其权力的衰颓。在教会和土地之后，一位对见血封喉极权极感兴趣的大臣说："现在是教育问题，它会很快让我们出局。"按布赖特博士的解释，托利党在其胜利后错误地拒绝了掌权。在治理之前是否应该考虑反对，统治还是防范失误，行使权力还是控制权力，这些可能都还是个问题。尽管他对迪斯雷利先生有点严厉，但他在攻击皮尔后提及迪斯雷利先生时还带有敬意。在说到乔治·本廷克勋

168

爵之后，他补充道："那凶狠、恶毒和严厉的议会政策是其幕后追随者支持的结果。"这些坏话说的是另一个政治家，如果他在某个政治领域没几个朋友，就会在公众方面赢得高度的评价，那么他就会比阿伯兰特更有权利说，宁当祖先，不当后裔。有一个妇孺皆知的传说，即皮尔意欲向迪斯雷利发起挑战，他的暴怒是由于他的政治才能被令人难以置信地疏忽了，他的妻子是这样回答米尔恩斯的安慰的："小人终究是小人。"他确实拒绝了体贴和同情，不过布赖特博士将之夸大了，因为他喜欢激化对抗并将之描述得活灵活现。当朋友是敌人时，他反对仍儒雅地说什么"我正直而高贵的朋友"，他坚决地抨击诺思科特的不忠实的朋友。他担心繁文缛节会提醒读者，不影响交情的也就不影响品格，而议会的争论被夸张了，而且也是不真实的。《英国史》中的好意调和，并非他的本意。

实际上书中错误很少而且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在好几处很令人起疑的地方，作者所点出的看法，由于未加评论、也未做出结论，故是值得注意的。在1841年福蒂斯丘伯爵尚不是爱尔兰的宫廷侍卫官，但书中的宫廷侍卫官却变成了福蒂斯丘伯爵；柏尼先生是爱德华·贝恩斯爵士；德奥玛勒公爵是第四子并不是长子；在俄国并不存在"大公"称号；迪·格拉蒙特公爵不是国防部长，除非是在比喻的意义上；1850年的黑塞的候选人，在反叛的枪声打响时并未逃跑；"保罗的幼子"应该是"弗朗西斯科·迪·保拉的幼子"；1866年的条约是于4月8日在柏林签署的，而不是在3月27日。当读到1871年"格利维被选为总统，梯也尔则被任命为总理"时，这段文字简直匪夷所思。一位是议会的首领，另一位是政府的首脑。约翰·海爵士的怒斥并不准确地代表关于帕默斯顿的大部分意见，因为这位愤慨的演说家有迫使人们注意的个人动机。1859年关于改革的争论是让人难忘的，因

169

为布尔沃和凯恩斯的演说因其特长都很精彩。他们的辩论都很服人，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并由于某些原因他失败了，但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败。在次年的4月26日，布尔沃自我超越，他当时深信打动了对手，以至于阿尔顿自发地向在贝内尔·奥斯勃尼说，这是一次他们听到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最好演说。休·凯恩斯从未在两院中得到如此的声望和权威，这些对他来说是从上院或下院获得的辉煌的礼物，也是他充满智慧演说的回报；议员们说，凯恩斯死后，从曼斯菲尔德和查塔姆伯爵传下的伟大传统也就终结了，而供求法则也似乎未得以振兴。

一段有争议的文字是布赖特博士用来指涉女王婚姻的。他赞扬了墨尔本勋爵，因为他促成了这样一件事情，它牵涉到他辞职，且因此使他在婚姻推迟二年的安排中没有任何事情好做。他说根据布拉格协议普鲁士获得了它想获得的一切，因此他拒绝这样的说法，即国王想以几百万人生命为代价得到更多的东西，但受到其儿子的温和节制。有种推测说，竭力为普罗姆必里斯会议说话的罗素勋爵，从都灵那儿所得到的是无效的保证，并将它们误传给了议会。很清楚，布赖特博士并不相信它。在肯定我们的中立和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同盟倾向时，他不承认罗素勋爵作为路易生前领导的内阁全权发言人在宣布我们中立与反抗拿破仑三世的结盟倾向时言不由衷。他甚至不以为在亚拉巴马号事件本可以避免的延误上英国有过错。因此，在有关美国的思考中，他遗漏了好多人物。对那些同情美国南方的英国人，他有些鄙视。他这样评论中产阶级："基于其通常对于这个词正确意义的误解，他们以为南方人比他们的北方兄弟更接近于一般的绅士定义。"迪瓦茨也许可以回敬说，他只是采用了伯克的一个说法，我想平克尼曾在国会引用过；而且他也会在最近的阿诺德批评北方的发言中找到共鸣，即差别只和权势有关而与真

170

正的平等无涉。设想人们过于愚昧以至于当他们看到一位绅士时也辨别不出来，这个解释是行不通的。至少麦考莱不是一位贵族。在世界文学史上，为宣传自由主义信念，他做的比任何作家都多。他不仅是最伟大的，而且他活着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人。在1856年麦考莱还作了这样重要的预言：联盟的存在不会超过10年，它会因其奴隶制而解体，并分解成好几个各不相同的专制政府。

1860年至1870年之间的3次战争导致了英国的孤立，还产生了沙文主义；虽然每个参与角逐的政党都可以对一个词的含义有所增减，但布赖特博士尽可能以一些周全的表述来公正明智地阐述问题。他厌恨奴隶制，但也不是根本不认同奥利芬特先生的名言：有主人的狗和没主人的狗一样好。他认为废奴主义者是狂热的，但他也拥有联邦制的观点，这一观点布坎南总统有过这样的表述："那导致我们未来所有麻烦的原因，植根于北方废奴主义者长期、积极和顽固的敌意之中，他们在国会内、外反对南方的奴隶制，直到他们的事业取得最终的胜利——选出林肯总统。"但他几乎不认可林肯总统关于废奴主义呼吁的重要性，也不愿确认难以言说的教条所隐含的阴暗面是潜藏的严重政治问题。这个国家的人民享有一种最终的理由，凭此就如反对议会一样，他们也同样可以反对华盛顿，它自身具有一定的独立力量；享有很大权力的北方政治家支持它，卡尔霍恩和史蒂芬斯的成功阐述，就如卢梭或者杰斐逊一样，构成了民主思想发展的核心环节，但这一理论却未加广泛宣传。联盟由那些有某种政治倾向的人所代表，因为这一倾向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和情感之需要。但除此之外，退出联邦的直接原因、战争的长短、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性的业绩等，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四五个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使军事行动处于法律的严格控制之下，

171

并忠于职守。对于不成文法的威力，对于那大公无私的观念的神圣力量，为此人们在万能的美元和拜物(cotton Ring)的环境下带着圣洁的微笑为它献出生命。正义是无用的。这使得冲突更趋严重，欧洲的情形更为错综复杂。这并非是奴隶主的策划，而是那些主张州权而非奴隶权利至上的人造成的。他们为了获得独立将以解放的手段给予奴隶以自由。很多正直的官员，在签署他们的委任令以前，用道格拉斯的话说，在整理行李并拿好直通票以前，就如李和A.S.约翰斯通那样仍犹豫不决。约翰斯通写道："我估计现在的困难将要用剑来对付。据我浅陋的判断，这也不是个办法。"3年里，从"七日之战"到阿波玛托克斯之战，保卫首都的战斗都是依赖于李的，虽然麦克莱伦相信自己从内心了解他。南方有优秀的战士，故若没有李，则失败将会在1862年或1863年降临，这完全就像倘若没有波拿巴和马森娜，1796年或者1799年就会爆发革命战争一样。李将军发表了如下的看法："解放制度的采纳除了导致我们的失败这个政治优势以外，还对我们的全部黑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英国史》没打算评价这种政治意义。但如果在里士满采用的联邦宪法修正案，及时采取他的建议而适时颁布的话，这种政治意义就会凸现。但应当看到的是，较之幻想和狂想，以及相对于地方上的骄傲和人们的贪婪，还有很多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议会拒绝考虑领土变化，奥地利在1860年迈出了走向战争的步伐，这在法律规则的严格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不过拒绝的条件尚不是最高的命令，曼斯多弗伯爵为它附加了生效的条件："qu'on exclura des délibérations toute combinaison qui tendrait à donner à un des états invités aujourd'hui à la réunion un agrandissement territorial ou un accroissement de puissance. Sans cette garanti préalable qui écarte les prétentions ambitieuses et ne

172

laisse plus de place qu'à des arrangements équitables pour tous au même degré, il nous paraîtrait impossible de compter sur une heureuse issue des délibérations proposées.（我们必须在讨论中排除企图给应邀的任何国家扩大领土与权力扩张的可能，如果野心受到预先的排除，只可能有各国在同等条件下的安排。如果没有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不可能指望协商出与会国都能接受的效果。）"但谨慎的语言并不阻止交易，因为奥地利早就想以威尼斯来换取意大利的中立，还附带考虑对西里西亚的赔偿。但太迟了。布赖特博士怀疑，俾斯麦是否无耻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这些公国完全作为与奥地利争斗的工具。这位政客以其令人称道的率直对哥大涅将军谈及了他的目的，其间就提及将上莱因割让给科布伦次。在欧洲人看来，意大利公国基础过于薄弱而难以赢得一场大战，但他们有法子来激怒威廉国王并使之失去合法性："Chiamare l'Austria a parte della guerra danese e vedere di cementare così l'alleanza austro-prussiana. Questa esperienza essere completamente fallita, o direi piuttosto completamente riuscita, . . . e l'esperienza avere guarito il rè e molte persone sull'alleanza austriaca.（我们呼吁奥地利参战，并看普奥如何结盟，这种经验是完全失败的。我宁可说它是完全成功的。这一经验治好了国王和奥地利联盟中的许多人。）"拉·马莫拉公布处死哥大涅将军消息，并向远方的马基雅维里的同胞们建议对此消息作适当修饰："in politica come in tutte le faccende della vita, il migliore modo di essere furbo è di non recorrere mai alle così dette furberrie.（在政治上，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聪明的做法是永远不求助于此类伎俩。）"

1870 年的战争理论完全不像 1866 年的。法国的激动被说成是一种粗野的爱国主义，其意在保护软弱的邻邦和妒恨强大，

如梯也尔反对意大利的统一，除了奥利维尔，法国每个政治家也都担心德国的统一。霍亨索伦王朝的王子候选人资格，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他既然是穆拉特的孙子，宾哈赖的孙子，就比普鲁士人更近于法国王室。德国痛恨这种狂妄自大的说法，法国大使对此说法则笼统地予以接受。尽管有此种种波折，但这两个大国的交往却显得高雅而有理性。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是一个普鲁士的官员，他作为普鲁士王室的一位王子而获得身份确认。其父新近曾担任过普鲁士国王的首相，他作为国王信赖的近臣，有功于俾斯麦的提升。法国争辩说，在西班牙的边陲有这样一个人，莱因地区一旦有战争，他们就将不得不保卫比利牛斯山。他们要求他退出王位继承，并表达了这样一个希望：他应以其自身的行动来阻止冲突。当法国政府宣布，他们自动收回他的一
173 切要求之后，而那位王子却根据普鲁士建议，拒绝出让他的王位。埃米利·奥利维尔立即宣布，一切都风平浪静了。这个宪法帝国赢得了一场巨大的外交胜利，而且是在这个专制帝国忍受了10年的失败羞辱之后取得的。这种光明与和平的政治家的胜利，是对帝国传统的一个遏制，对那些期望拿破仑的权力在人们争执不休的情形下应完完全全地传给他的儿子的人说来也是一个遏制。如果没有他的智慧，此类问题又会冒出来。而当奥利维尔自己宣布已满意时，格拉蒙特却得寸进尺。霍亨索伦的候选人，众所周知为法国人所不容，他已经上上下下有1年又4个月了，并暗中准备就绪。他们要求确保王子不再动摇、不再变卦了，因为他的念头长期摇摆不定，又反复无常。他们推动欧洲和他们一道来反对他的当选，即便在了解了德国的主张和打算之时——这归功于他们的代表干得不错。穆勒对沃瑟男爵所说的话，40年后又再向他的儿子复述："La guerre est au bout de mes paroles.（战争是谈判破裂的结果。）"但直到给贝尼德提·弗

朗斯发出公文以前，他仍没有下决心参战。

普鲁士并未固守敌意立场。当法国官员的秘密情报正在送往威赫姆斯恰斯的途中，政府就不可能忽视法国正和奥地利商讨兵员集结的地点。与此同时，一位极富政治经验和智慧的老人——他虽已退职，但又受到热情礼聘——却未赶上柏林的茶会，他正在进行半岛之游 西班牙国王品性温文尔雅，即使面对做蠢事的要求也不会立马发作。举止稳妥的普鲁士开门欢迎那位装模作样的公使，他显然属于平庸之辈，人们只在这里见过他。含糊其词的《公报》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它立即被怒斥为是蓄意侮辱法国："Die fortgesetzte Insolenz hatte endlich die allerderbste Zurüskweisung erfahren. Die bisher erlittenen Beleidigungen waren reichlich wettgemacht.（持续的傲慢最后受到生硬的驳回。这种一直承受到现在的侮辱得到了丰厚的补偿。）"在埃姆斯或者柏林，需要的不是自制，也不是完全沉着冷静的思考能力，因为这会引发敌意，即便是二流的政治家也不会否定他的政绩。在敌人正面进攻时平静地规避，是初级政治中的一课，而且没有一个文明政府发现它难学。当英国容忍罢免克莱帕 174 敦，美国同意引渡囚犯，法国不承认多罗·德·罗哈斯，德国北部自己忙于扫平列克谢伯格时，普鲁士大概可以接受她的外交失败了，不过要求对格拉蒙特的傲慢语言作出解释的民族义愤依然存在。他们不会放过受抨击的有利形势。欧洲中立的确立，全德军队的统一，就是代价。电文表明，贝尼德提的拒绝，使他们在巴黎不用冒险作出温和反应。当受陆军上校们支持的帕默斯顿对瓦伦斯维克的抱怨不予理睬时，布赖特博士论述了这对帕默斯顿将意味着什么；如果德国公开侮辱的消息，布赖特可以指出奥里维尔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抗议说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上都不无过失。

他认为战争期间由于我们的举动失去了在法国的土地，而且很不公正。如果因为我们没有阻止或者没有减少敌意，或者因为我们的中立政策而使得自己没有朋友而指责我们，实是我们咎由自取。这不足以防止激烈的攻击。甚至在经验科学的时代，理性统率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历史则因进一步萎缩而牺牲自己。我们向历史学家求教什么是合理；激情、愚蠢和罪恶，我们最好还是从诗词中寻找 对梯也尔的冷遇或者向法国出售武器，仅是外交辞令，而非真正的抱怨。不过对于"公民投票"后装载的两火车军火，我们却未加注意，而且我们情报人员尚未确定神秘使者——勒勃朗、伯恩哈迪和萨拉扎携带了什么方案。因此，当危机降临时，我们出谋划策的能力，就像观戏者，其眼睛却望着窗外。决定性的时刻乃是皇帝要求安全保障并反对霍亨索伦王朝复辟。早在四天前格拉蒙特向我们保证法国将满足于自动的放弃，并要求得到我们的帮助；当做到这一点时，他却宣布这毫无意义，并公开地发出了一个硬邦邦的抗议。莱昂斯勋爵只是照会他，虽然我们有点失望，还有受蒙蔽、受轻视的感觉，但它并无重大差别，也因此他可以为了莱因奋战而无破坏我们友谊的危险。还有，费拉里之后，当大量的事务需要冷静、沉着、精确以及政府的稳固需要贤明之士时，我们的大使离任了。

175

纵观此 570 页的书，字里行间牢骚抱怨随处可见。问题在于这是否为最好的——以隐晦的手法，凭借个人的性格、阶级利益和反复无常的舆论，或者是一定形式的思想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来撰写历史。当我们在克伦威尔时代懂得了加尔文主义者的含意，明白了阿米尼乌斯教派、长老派、独立派、礼会、索齐礼派是什么时，我们也就开始看见了曙光。那一定是珍贵的时刻，即如果有人因暴力和软弱、愚蠢和罪恶的无尽循环，而揭示那促动了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动力，那把议会一分为三并制定了好几种

宪法的独特制度，那将是灿烂的时刻：18世纪的自然法、美国人权、英国议会制度、孟德斯鸠的抽象宪政理论、伏尔泰的人权法典、新教的宽容、詹森派的政教理论、百科全书学派的至善论、霍尔巴赫的辉格主义、爱尔维修的平等学说、卢梭的民主、马布利的社会主义、杜尔哥的政治经济学、《国富论》中的大胆议论给了普罗旺斯教士推翻路易十四专制政府的动力、马拉把有条件契约变形为屠杀理论、影响米拉波的四个日内瓦人的政论等等；如果我们不指手划脚，而凭历史学家的解释事实实际上怎样，一位保守主义者与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区别在哪里，在什么意义上自由主义与辉格派和激进主义划清了界线，如何从经济激进主义中辨析出其哲学理由，或者分清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民主开始了，民主如何与社会主义联姻，为什么某些社会主义者主张自由主义和某些民主主义者又是托利党人，如果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时代的混乱就会有所减少。公正无私将稳定不变，因为必须予以阐明的是，这种理论的力量乃在于或接近客观真理；其错误也因其后果和衍变而为人所知。困难的是政治符号主义包含了象征符号，一个政党很少制定或者服从其章程。既没有任何声明或者竞选纲要拥有"教理问答"那样的明确权威；在此意义上政治教师不像哈蒙德或者奇林沃思、巴克斯特或贝克利那样有代表性。神学分化趋于排他，而政治则向包容和有亲和力的方向发展。沿着平坦道路运动的人如西华德和凯斯提勒，常常不是那种经常最有效率的人；将梯也尔、俾斯麦和费里·奥本揉和到一个公式中，就似布尔沃的法国烹调师将普里茨·德哈姆置入润发油帽之下，已是一种失传的艺术。历史不能任意炮制，而是需要积极的整合；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说不是其全部的话。偶尔的一致实际上最接近经典，进步则是条斜线。1776年以来的箴言不同于以前之处在于其国际性。 176

有关犯罪的、仁爱的和土地方面的立法在很多国家都同时获得进展;《改革法案》叫响于巴黎的街头,曼兹和色当之间都有其回声。较之于习惯、利益和偏见,纯粹的对话和双边协议的约束力更小。德国人喜爱抽象而法国人则偏好精确,不过他们都厌恶前后矛盾和不讲逻辑。而在德国仍被人们阅读的最早期的历史是这样开始的:"曾经有一位伯爵";而兰克总是现实的,难得为命运或贸易平衡苦恼。在法国几乎惟一成功地写作历史的是一位学者米兰人费拉里;即使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索雷尔,也没有采用那种教条主义方法,而如果勒南要求广大读者搞懂诺斯替教,他就有可能失去他们。

然而,即使对那位最冷静和最谨慎的作者说来,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危险的。他未能看出,1874 年预算最好不要提前中止,他视投票为根治腐败而不是减轻那可怕压力的灵丹妙药,这一压力迫使人们投票反对自己的信仰,而其中常包含着谎言;对于自卫支出与出于侵略的国防支出间的差别,他未能清晰地予以区分。对这位学者来说危险是政治思想中的道德平庸;列龙·波留曾含蓄地指出,这种平庸既是一种好东西,也是一个坏东西:"Cette sorte de scepticisme, d'athéisme politique, est le grand péril, la grande difficulté de tous nos gouvernements, et en même temps c'en est le principal point d'appui: c'est à la fois le mal et le remède du mal.(这种政治怀疑论和无神论是我们政府的巨大危险和困难,同时也是我们政府的支撑点。它既是疾病,又是药方。)"

十六、殖民地*

先生：最近出版的马歇尔先生和戈德温·史密斯先生的信，就我们的殖民帝国提出了很多思考，并引导我们探寻我们的殖民地制度之宗教特性。

首先，我们可以推测（作为全部宗教史中之经济部分），基督教势力对世界的征服，是向其皈依的第一步。在异教和异端中，存在着将宗教与民族相等同并要求国家支持宗教这样一种民族的和政治的特性。宗教是国家的生活，也是人民的骄傲。全部政府系统、整个社会环境以及文学、教育和语言都渗透了宗教精神。

教会不能立即就找到突破口。如果这个民族是文明开化的，这个民族的宗教首先必须减弱其势头，这个民族的信仰首先肯定会遭到弱化，寻找新事物的热情必然要首先被唤醒。不过，如果这个种族是没落的，必须培植新精神以做好迎接基督教会的准备工作。基督教会不可能同时既在文明之都、又在未开化之地取得胜利。

在罗马世界，宗教的民族性遭到破坏，异教的力量已耗尽以为基督教开辟道路。哪儿的变化搞的不彻底，哪儿的民族异教自身就会一直保持活力，基督教就会遭到拒绝。日耳曼人的皈

* 首刊于《随笔》，1862年3月6日，第391—400页。

依类似于罗马人：他们的国家将要崩溃，他们本民族的传统已遭破坏，他们是在迁徙和殖民的情况下被迫皈依的。[1]

178 很难想像其余的异教世界能以其他方式转变其信仰。为使野蛮与文明两个极端都接受基督教，同样的手段仍是必需的，即欧洲列强的征服。它能摧毁旧制度、社会分工、道德习俗和政治习惯之种种顽疾，也只有它能将先进文明的好处赠与野蛮种族。

起源于世界帝国的教会，它仍然坚持并珍视人类政治联盟的观念。在发生了下述种种事件后，这一观念依然永葆青春：西方的覆灭；东方帝国的衰颓；查理曼大帝的创造；十字军东征（他们由希尔德布拉德所策划）；葡萄牙的亚洲帝国和西班牙属下的美洲帝国开始成为分割世界的子午线。但殖民比征服更接近于实现该理想。

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殖民地，是两个最伟大的工具，借此上述理想已部分地变成了现实。两组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对比，即一个应付的是文明程度很低的民族，而另一则对付开化的民族。西班牙人主要和未开化的民族进行了接触，他们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接受基督教；而英国人则和这样的种族开始了交往：他们的信仰转变不得不以局部的毁灭为条件，而阻碍其信仰转变的大障碍存在于其社会生活结构之中；对他们而言基督教的先锋是士兵而不是传教士。

前一种情况天主教能单独发挥积极作用。就后者而论天主教首先并非是必需的。假设他受基督教文明普遍意识鼓舞的话，破坏者的宗教如何并不重要。但只有教会能承担对野蛮人的精神关怀，并保护他们免受入侵者的掳掠。因为她不只是入侵者的教会，她属于双方，因而对双方都有责任；对她而言转变

[1] 在萨克森尼，灭绝战和改宗代替了迁徙。

异教徒就如保护其信仰一样，责任重大。她不能容忍土著遭到压制，她更不能容许他们被遗忘或被漠视。从她对国家、对法律以及对牧师的影响而言，她不同于新教；而且她在地方议会上也拥有立法手段来帮助不开化的土著。

当文明的欧洲与未开化的民族接触时，所有这些都是特别的优势；而那些未开化的人们必须来学习基督教信仰乃至基本的道德准则。不过在和印度或者日本文明打交道时，这些信念都不管用了

179

基督教的这些特性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作用可在这样一些国家发现，在那里欧洲人可以不工作，土著人不勤劳，没有牛群和羊群，生活依靠耕作，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结果是，土著居民立刻屈服于入侵者，并被迫按照新主人的命令去工作。虽然非洲人的进口使他们获得了一些实惠；由于拉斯·卡拉斯的仁慈，他们大体上都适应了为了西班牙人利益而干活的劳动条件。种族间牢固的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需要教会来加以引导，以符合弱者的利益。西班牙人是粗暴和残忍的主人；他们的种族骄傲，他们对外国人和异教徒的轻蔑，就如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一样强烈，也如希腊人在野蛮民族面前洋洋自得一样，再加之其民族的懒惰，这一切都使他们比任何欧洲殖民主义者更苛刻、更严厉。征服者所犯下的恐怖罪恶惟有基督教会和西班牙王室在引入秩序以及新移民和土著的幸福的奇迹可以弥补。

英国在美洲大陆的历史却有些不同。他们面对的土著人主要是游牧的民族(南、北美人全部过着贫困的放牧生活)。也因此他们不可能变成煤矿工人，或者去耕种、做庄稼活。也因此英国人的目标是要摆脱他们，虽然总的说来实现这一点并不需暴力或者粗鲁不公，但是红种人对更高的基督教文明的权利要求

仍然被忽视。他们在这些殖民地里不可能被当做基督徒；而在殖民地之外，他们更不可能停止流浪生活而成为基督徒，即使在英国的殖民地里他们也无安身之地。殖民者至少是自由的，较之国内的同胞，他们享受了更多的自由。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180 一个落后的种族不可能和他们平等共存。这样的种族将会很快沦落到贫穷状态，会沦为奴隶，并遭受十分粗暴的凌辱，因为不像那些西班牙的殖民地，英国殖民地没有国内君主那种最高统治权力的保护。

在一个由好几个种族组成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定的专制，统治权力就难以在此社会中行使。最高的政治权力不应受制于社会的利益和影响。它只应认同于国家，它应该控制那些推动社会的力量以及指导这些力量的动机。因为社会是实现个人目的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手段；而政府旨在实现公众目的，所以它不同于或在相当程度上不特别关心任何个人、阶级或者其他成份，例如宗教或者资本的特殊利益。当自治流行之时，没有超极权力把彼此排斥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只有平等的个体间的平等的关系。因此，在一个有着好几个不平等种族的共和国里，种族对种族的统治肯定会发生。种族统治自身就是一种邪恶和政治暴行。故而许多种族都要求有一种超级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多种权利。缺乏这一超级力量的控制，自治就会游离于多个种族之外，而这将导向专制。在南美，若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级权力控制，政府就不会成功。缺乏这种力量的地方，就会发生流血的战争。好的政府是那些拥有完美的专断权力的政府，亦即那里政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好政府在所有试行的地方都失败了，但在英国的殖民地，却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排挤红种人在北美却获得了安全，而只有引入黑人才不会形成致命的罪恶，因为他们是奴隶。如果他们获得了自由，那么

对他们和对白人双方来说，都意味着自由的终结。不过这种排挤只有新教徒会做出来，基督教一定会反对这种政策，如果这样，这些殖民地就有可能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比较我们的殖民地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时，北方的气候所恩赐予我们的好处一定不能忽视；而适量提供的自然产品是一种大实惠，因为这类产品的使用不需要什么技艺，如今这一技艺太过复杂而使人殊感不便。这些是真正有益的产品，它们推动 181 和鼓舞了劳动，但在它们被利用以前，也需要一定的技艺

不论我们是否从宗教体系或者从某种政治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殖民制度，在我看来，我们应主要辨析清楚的是这样两种殖民地：我们的侨民组成民族真正殖民地以及我们在亚洲的属地，在后者那里我们统治着外族。在服从的人口被征服种族统治的地方，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依赖于它的持续性，因此其长处尚未被人们所看到。在亚洲，新社会的崛起不是以打碎旧制度为前提的。这一过程我们也才刚刚开始。这些属地迟早将会对祖国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

但现在要找出我们的印度属地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将是困难的。我们的国内政策并未受东印度公司的影响，这个公司所致富的阶级、最富强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羽翼丰满，但并非是英国社会或政治中的积极因素。因此这也为我们持久统治印度提供了可能，没有这一点对印度人民也将不利或者说没什么好处。

因公司废除而引起的印度政府中央集权，这必然会产生新的局势。首先将会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政权；其次则是一个权力无限的、规模也大为扩张的议会。这可能有助于这个社会自身的健康。同一个议会绝对地统治一个地方，而又宪政地统治另一个地方，这种反常现象不可能持久。其合法性和宪政特

征将会被恣意妄为的权力所破坏。一位君主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因为他能把几个政府部门分成不同的部分，一个只对他负责就像塞维利亚的东印度群岛委员会，另一个也对国家负责，就像我们的议会。在法国，议会与省议会之间就有这种区别。不过一个立法机构难以如此分割其权力。此事的不合理提供了最初的救弊要求，并出现了好的征兆；下院根本不听印度的争论，而是他们自己在喋喋不休。议院常常是空的。也许最终得为我们管理的印度的独立自治设计某个计划，它将解除我们的立法提案权，只是当"解围之神"，除了出现一种"*dignus vindice nodus*"（解决此问题必须此人）要求干预的情况外，否则不应干涉。

182

无论发生什么，也无论这一问题——协调那居住着不同种姓和野蛮民族的政府与自由的关系——是多么难上加难，但它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必然希望的是我们国家的东方事业理应超越对东方政治的破坏，甚至超越对东方社会的解构。

就我们真正的殖民地而言，其情形正好相反，这儿主要居住着我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的自由阻碍他们为异教徒的皈依或野蛮生活的改善做更多的工作。因为自由是所有政府的条件和目标，但并非是其原则和基础。它应该萌生于国家的基础之中，并随着其成长而成长壮大。好政府的标准是自由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它所取得的政绩。自由必然要和社会的状况，和各个阶级的彼此关系以及和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习惯和法律同步发展。

在我们和别的种族的关系中，我们必须自我调节以适应不同的社会。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成熟社会与他们的不成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他们的交往不能离开国家的控制，就如和我们本国人民交往不能离开国家控制一样。国家应该使用我们在国内不会容忍的规则对他们进行保护。老殖民地马萨诸塞有句谚

语:"过来帮帮我们吧!"我们的殖民帝国也应验这一谚语。

如何来对付野蛮民族,是非常难以决策的。他们如果维持着狩猎和捕鱼的生活方式,那么随着我们的文明的推进他们就会逐渐消亡;因为当新居民将他们从自己的家园中赶出去时,他们只得侵占其他种族的地盘,结果是相互残杀。而如果他们挨着我们定居和耕作土地,那么我们的优势会使他们陷入贫困。惟有西班牙的那种制度能够救他们,这一制度严格规定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免于陷入禽兽般的绝境。在西印度,西班牙政府寻求的是国家的利益,而英国追求的则是那些殖民者的利益;前者的目的寄意于国库,而后者则注目于商业。王国可以制定自身的法律,但商业却可以不服从独裁。没有一种保护措施可行,没有什么善举能改善野蛮疆域中我们殖民地的土著。此外,西班牙人实际地改善了土著人的境况并发挥他们的劳动才能,这 183 与英国人的理念完全相反,此即培根所深谙的原则:别无选择,只有逼迫他们,或者让他们移居不毛之地。

一旦他们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建立双方的贸易,那么商业和经济规律就足以毁掉他们。想推进我们的贸易就要求我们去激醒他们新的欲望;的确,这些新欲望却是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必然结果。他们旧式的生活方式肯定满足不了这些新理念——谋利的精神、武器、火药、家养动物和医药。作为猎手他们积累不起财富。且不论他们的粗卑和暴戾的性格,仅就其对新的日用百货的渴望,他们就一定会逐渐陷入困境。所以传教士们就是担心我们间的这种接触。但是若没有城市力量的支持并与之建立紧密无间的联盟,这种情况就不可能预防。不过商人又如何能忍受这种限制,或者牧师们又如何能挺身而出反对商人?昆士兰长官鲍恩·乔治说:"初次看到马队及其骑手,似乎使黑人极为好奇,他们还没有怀着奇异的恐怖想到白人的存在。但深重

的敌意很快战胜了无知的恐惧。民族间彼此的争斗导致了相互的报复。土著勇士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精神，在欧洲人的先进武器和技术面前消沉了，要不就被逼入了蛮荒的愚昧之地。那种温顺的自然本性很久以前就沦落为殖民者无衣食之虑的追随者了。”(《关于昆士兰事务的论文》，第28页)

不论其对土著人是多么不人道，殖民地对其母邦一直有着巨大的好处。所有殖民地都加强了他们必须产生的那些因素；在西班牙是王权；在英国是中产阶级。因此，就前者的情形而言，其影响是君主制，而后者的影响则是自由。这就是这些殖民地生活的自然特性。因为在殖民地中，个人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而社会权力很少有效建立，劳动分工也不发达，结果个人比其母国成为一种更大的实体，成为群体中一种更重要的要素。这也是殖民地为何要求当地居民有独立和自决、自治的习惯；这也是为什么相关的习惯，即所有事情都仰仗政府，把自己作为总体之一员，对于殖民地来说是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德国成功了，而法国却失败了的原因。但法裔加拿大人是个例外，他们那时即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繁荣了。法国人是如此缺乏独立性，又是这样的富有社会性，以至于他们同在一个野蛮国家生活时也将自己同化于其他社会所处的发展水准。所以法国的殖民者从未开辟新社区而只龟缩在老城里。

另外，旧的统摄力量和传统，在殖民地中是不复存在了，而民族的性格则受到新环境的熏染，于是他们就和呆在国内的人大不相同，尤其是那些融入了其他种族性格的人，更有显著差异。因此像保守、幻想以及虔诚等国内社会的精神就不存在了。在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各种习惯、风俗、法律以及种种制度和政治形式，当它们刚出现时，其本源是清楚的，但现在则被人们遗忘了。因此诸如此类的习俗，看上去有了变异，已没有理由来

184

显现自己，而只有通过习性来继续存在。在殖民地没有这种东西。对人们亲睹其起源且帮助其建立的制度，人们是没有敬畏的。成文法清楚明白，而内部习惯法也明明白白。一切事物都有其摆得上桌的目的和理由。故而若从法律的精神基础来设计出一种普遍的法律，一种确定的理性主义，一定会被一个缺乏某种共同的民族天性，缺乏原始的习惯、成见、迷信和信仰的社会所抛弃。

也因此殖民地本性上是自由的。而如果他们最初不是这样的话，也会由于种族的大融合而很快被纳入这一趋势中。这一汇合交融的产物，常常是殖民社会中的破坏和动荡的因素。后来扩张到西班牙的革命，正肇始于西班牙美洲属地。它爆发于伊斯拉·德·隆(加的斯)的一支军队中。当时这些士兵因殖民地的裁减兵员正要乘船离去，故而他们将革命带回了西班牙。在西班牙美洲，特别是在墨西哥，杂交混血儿常领头反对纯种西班牙人。

一块殖民地也能如母邦那样施行同样的政治哲学，不同的只是更为迅速和更为彻底；这是因为最为极端的民主和专制形态，在这样的地方会获得最为显著和彻底的发展：这儿没有漫长的习惯法传统，没有阶级特权、没有社会影响、没有历史的包袱来反抗和消解民主与专制。也因此贵族政治是与殖民地的生活本性相矛盾的。在本质上它与专制主义、与平等、与均平，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与企业精神都是对立的，因为它欲避免财富的发展，而且可能还要消解投机买卖和交易的影响。故而英国在创立一个殖民地里的贵族政治方面，从未成功过。然而伯克提到过，对于加拿大此类的贵族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它聚合了社会，相当于组织，它是一种强大的保守力量——它维护尊严、体面、谦虚的美德以及服从的道德；它也是所有道德训诫的守护者，这 185

些训诫为政治社会所提倡，即一位牧师对家乡的热爱，家庭对其成员的契约式影响，以及对祖先荣誉的尊重；它也是无形的社会力量的宝库，因此，它恰巧能弥补殖民社会的不足——它改善其品质并延长它们的存在时间。

而殖民地缺乏贵族政治使我们从中获益匪浅。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他们进展神速，胜过那些古老的国家，发展出我们因自然障碍而无所作为的一些原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我们梦寐以求的远景，实现了这里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和北美的交往与我们的工业发展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坚实的至少是外在的联系。北美最终影响了我们的民主进程，至少在自由贸易方面如此。美洲战争和爱尔兰的解放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志愿军正是从这场战争中出现的，因为他们古老的专制体制首次遭到了冲击。当然，在其他方面还有大量的重要联系。

我们在殖民地初次学习了如何宽容天主教；而加拿大的征服，则第一次在我们的刑法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里有大量的法国人口，作为刚被征服的人民，其忠实性存有疑问，而在宗教问题上对他们施压将会很糟糕。所以给加拿大人宗教自由；而当两年后所有美洲的殖民地都造起反来，这群我们待之以宽容的被征服的人民，一直似忠心耿耿。爱尔兰和英国立即随之出现了最初的缓和。毫无疑问，殖民地生活对宗教自由的自然影响，是其最伟大的成果。这一影响至今犹存，只是它自身几近式微了。只要他们对帝国政府的所做所为被人所关注，殖民地就已做了我们外行所能做的一切事情。

也因此我们也没什么大的理由来悲叹两个法律的存在，其内容是殖民史，它似乎揭示了殖民地的渐进的解放和过早的衰落。我们的殖民活动始于詹姆斯一世时期。当时我们的国力很弱；因耕地变成牧场，人口大量过剩；因为贵金属贬值，当时我们

186

的工资降至很低；而其时国内的宗教压迫却是最强烈的。殖民地和宗主国一齐发展，它对后者的发展贡献很大。从罗利和培根时代起，他们就具有了商业禀赋；不像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只是为了找金子而移民的；他们移民和发展都是为了应付经济方面的压力和考虑——去获得新的良田，新的交换对象，新的市场，增加海上航运和贸易，并为过剩的人口找到了出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支配了他们的全部命运，也是在预测将来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航海条例》的最初文本在"长期议会"获得通过，其目的是与荷兰作对，保护与鼓励英国和其殖民地的海上贸易。这是一个民族的自我征税，是事后的利益补偿。为了发展教育和扶植贸易这类保护是盼望已久的。就眼前而言有损失，但在将来会很容易得到补偿。它播下了收获的希望。约翰·德·威特预见到这将使很多荷兰人的贸易落入英国之手。[②]查尔德称《航海条例》为《大宪章》，称安德森为帕拉狄昂保护女神，他视他们为我们英国海军的强人。为了补偿英国在殖民地的支出而制定出新的规则，不过它主要是在1688年完成的，而且这一规则是自然的，因为议会比关注君主制的政府更会冷漠无情地奉行功利主义等，尤其在它为确保得到既得利益阶级的自私支持时。一般说来较之在国内，在绝对专制下属地反而更幸福一些，因为权力在施行到他们以前，必然会被分割和遭到阻遏。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和西班牙的西印度，情形正是如此。因此毫不奇怪，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美洲的殖民地兴旺昌盛而忠心耿耿。

② 请允许我让你注意很远的过去——注意到《航海条例》，这个国家有关其殖民地的基石性政策。先生，这个政策在开始时是纯粹商业性的；而且商业体系全然是限制性的。它是个垄断的体系。……《航海条例》抚育着殖民地的童年和青年，增强它们的力量……人类历史上不再有类似于他们的进步。"（伯克：《论美国税收的演讲》，见《伯克全集》，第3卷，第193—194页。）

而他们身居祖国时，他们时常为压迫而苦恼不已，他们在乔治统187 治下，并不怎么幸福，而当时我们在国内有个好政府保护。当这两种坏的因素汇合到一起时，当立宪君主政体能够成为任意专断的权力，殖民者的造反是自然的；而这种转变是以腐败为中介的，乔治三世和诺思勋爵通过它服从一个有益而无所不能的议会。

只要特殊的保护状态积极地维持，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就会一直保持着。《航海条例》有时推动了我们的贸易，但有时却妨碍了它，即中止了我们的商人和外国商业机构的联系。美洲一经发现保持附属身份不再有利时，就抛弃了其忠顺之心，而亚当·斯密放弃了自由贸易学说，鼓吹起殖民地的解放；而谴责美洲要求的塔克，也为了英国的利益而认可这种解放。大约与此同时，旅行家汤森向西班牙提出了相同的建议；阿瑟·扬则向法国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他认为，如果将花在殖民地上的钱用于开发本土，其产出的效益将多出十倍以上。

我们感激殖民地的地方：(1)发展我们的贸易，(2)建立我们的海上霸权，(3)产生正确的政治经济概念，(4)自由意识的确立。不过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的也就没有必要去保留。所有这些都未受到失去它们的影响，虽然对他们而言都不存在了。我们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而欣慰，而废除奴隶制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是废除保护制度，必然会导致殖民地的逐渐分离。就我们目前的政策而言，我们难以长期给殖民地以任何商业特权；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毫无作为，我们也就不能对他们还有任何要求。"总而言之她在分离之后能平等分享商业利益，除了昔日的'威望'，英国从其属地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不过上述的'很少'也远远大于其所付出的，而四处开辟殖民地，需要有自己的

海军和军事力量。"[3]

但事情的性质不可能是我们仅从自己的情感出发来解放他们。或许在任何情况下他们自己都会采取行动。但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并没有长久或非常光明的未来。他们比其祖国更迅速地积累了政治资本，因为他们并非一切从零开始；他们是从其民族生命非常旺盛的时期开始的，其政治生命力已经有了可观的成长；他们成长迅速，因为他们兴旺茂盛；他们从不迟疑，从不左顾右盼，也从不抑制他们身上自有的强者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延长了那些古老国家的生命。在殖民地政治和社会的衰落比在宗主国的更为迅速，但它们还保留着殖民地的特性，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是古老民族的一部分。 188

他们所面临的全部自然生活并有一种新的进展，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性格，必须通过种族的混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然后他们才能生长出民族和政治生活的自然形式，并历经从幼稚到成熟的自然阶段。这一新的民族形式只在加利福尼亚和美国东部各州才有所表现。在我们的殖民地中总的说来只有很少几个接受了它；西班牙的殖民地曾有过尝试，但失败了。

但无论其未来命运如何，欧洲的殖民者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督教人口大增，是他们打破了欧洲的偏狭。而未来宗教利益则主要集中于我们的亚洲帝国。

---

[3] J.S.密尔：《代议制政府》，第325页。

189

十七、美国革命*

18世纪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启蒙，对人类福祉有极大贡献，但在推进自由的保障上，却收效甚微。权力比过去运用得更好些，但它并未受到约束。

在英国，这个政治上最先进的国家，优越的政治优势，革命给予进步的动力已经耗尽，人们开始议论，既然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么曾使人们相互残杀的党派之间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存在了。辉格派哲学的发展遭到了现实的妥协趋势的遏制。妥协区分了辉格党和圆颅党、成功者和失败者、文明世界的政治教师和那些在“坦普尔神殿”审判中掉脑袋的人。

“七年战争”以将美国引入欧洲的视线而重新开始了被中断的进程，并诱使殖民者起而反对其母国。这一结果是随着对加拿大的征服以及乔治三世的继位而来的。这两件事接踵而至，引发了美洲问题。一位前些年访问过美国的旅游者报道说：那儿充斥着不满，而分离则是向往已久的了。当一支庞大的军队坚守着加拿大时，这种不满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于和英国关系的不和，有两种考虑安抚了殖民主义者。英国舰队吓阻了海盗，保卫了海上的安全；英国军队抵御了法国的进攻，从而保全了领土不丢失。前者是渴望已久的，而后者对其存在来说则是

---

* 原刊于阿克顿的《现代史讲演集》（伦敦，1907），第19章。

至关重要的。当来自法国方面的威胁消失后，亚特兰大的童子军是否值得美国为其付出代价，就变得很不确定了。因此，孟泰卡预言，如果他们征服了法国的殖民地，英国将会失去自己的殖民地。很多法国人乐观其成，而这种可能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英国人也看得明明白白。以新的安全措施来加强其地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以代替他们因在魁北克的胜利而失去了的霸权。获得了大片土地的这场胜利，如果它松动了对亚特兰大殖民地的控制，就不会增加帝国的力量。因此，当时的政策就是强化已有的要求并毫不含糊地承认英国的主权。实现这一点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加大税收，而比较起建立一无可争议的权威和绝对的服从威信，税收就是件简易的小事了。如果从安全方面考虑，税收就可能是轻微的。在一个疆域从哈得逊湾延伸至墨西哥湾的广袤帝国，征税的方法和途径不会缺少。而这一刻需要的是联合而不是金钱。对于一个突然来到的扩张时代，由皮特的行动所引起的问题对于东方和西方而言都是新的，而皮特又不再从政，必须寻找解决的方法 190

在日趋衰落和遭人侧目的辉格党中，有些人早已清楚帝国在那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之意义。他们是亚当·斯密，汀·塔克，埃德蒙·伯克。但绝大多数群众却不能先知，仍坚信政治的目标是权力，而统治愈是扩张，则愈需要权力来加以维持。为何自由贸易要先于强权统治，其原因是深藏于经济学家胸中的难以说清楚的秘密。

正当把法国从其大西洋彼岸的帝国驱逐出去之际，新王朝立即遇到了新困难。寻找走私者的房屋与船只的权力，是由称之为《援助诏令》的法规所允许的，它要求毋须专门的任命，也不需宣誓和证词，就可让晚上或白天来的不速之客付费。查理二世统治下引人了这些做法，而在他让出王位的6个月里，这些做

法又必须加以修改。最后的修改正是乔治二世驾崩之时，现在人们期望它应用之有效，应该保护国家的税收而杜绝走私。1727年到1761年之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殖民地变得富裕起来，更为自信、更为自尊，他们要求将疆域扩展到密西西比河地区，而且在国土四周不存在法国或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实际上，环视四周，只有英国人的殖民地，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这些均是英国人做梦都没想到过的。法律条文以及最近一代人的实践，都对后继者的无边财富和权力不持异议，也确实没有使他们相信，他们应当因支持反对法国而失去什么。而美国法律学家所辩称，在英国法律看来是好的，但是并非照搬过来在美国就能运用，因为这儿不存在同等的法律保障体制——这儿的案件不用陪审团就可以被审结，而法官本身也可以被随意地解雇，这些法官的酬劳要依赖于官方的罚没收入，因此他们倾向于反对美国的进口而支持税收。这没有超出传统思想的藩篱，每个律师都明白这是种技术性的单调的议论。

191

后来詹姆斯·奥蒂斯说话了，将此问题提到一个特别的层次，在政治史上他的这次讲话是有重要意义的。假设——当然是不会有的——波士顿海关官员的行为合法，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那么他认为，法规就是错的。他们的行动可以由议会授权，但若如此，议会就超越其权限范围了，就如查理二世的"船费"、詹姆斯二世权利免除一样。这儿的规则无视惯例。英国的法律也许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但存在着制约这些法律的更高的原则。

法庭决定支持英国规定的有效性；聆听判决的约翰·亚当斯，在很久以后写道，就在那个时刻"独立"的新生儿诞生了。英国的主张在当时获得了胜利，执政官写信回家说不满的情绪很快就会平息。各州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全美国都拒绝普遍的保证，因为自从1717年以来他们就一直认同于英国的法律。也因

此在这一点上殖民地是正确的。

接踵而至的是更大的税收问题。合法的海外贸易是允许的。英国在海上巡逻并保护美国使其免受走私犯和海盗的袭扰，故他们要求付给一定的报酬也是合理的，但是它应以一种不妨碍和不阻挡财富增长的方式来收取。对工业和贸易的限制，不管怎样都是从维护英国的利益而设计的，因而导致对殖民地利益的损害。他们要求从他们的共同利益出发来制定协议。但他们也并未过分地要求协议只考虑他们的利益而无视我们的好处，目前我们的殖民地政策也是这种思路。前进的要求并非原本就是过分的。只是这场争论臭名昭著，即双方都是为了争那不光彩的利益。更深入的了解后我们要说，其动机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而另一方面则是自治的，这也是一个自由和专制、民选政府和强权政府、国家统治国民和自由国民统治国家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地提出过，而在英国这一问题早已被列上议事日程了。研究的结论是，立法机关只要不违反任何伦理的准则或宪法，只要没有滥用权力或亲自造反，就能够为英国宗教或英国贸易的利益制定有客观基础的法律。如果那种法律原则在美国被否决，那么它在爱尔兰也不会得到很好的遵守，绿色的旗帜或许会飘扬在都柏林城堡上空。

192

这并非是黑暗时代的遗存。压迫爱尔兰和美国是现代派的杰作，是那些处决了一个国王并赶走了另一个国王的那些先生们干的。它也是议会的杰作，是克伦威尔和乔治三世时的议员先生们的杰作。而议会不大情愿放弃其自身的特别政策以及其征税的权力。王室、牧师和贵族，都对美国人民有敌意，但真正厉害的仇恨来自下议院。旧的欧洲安全堡垒的好政府已被发现在抵御议会的压迫方面是难以胜任的了。通过其代表来治理的民族自身，已不得不屈从于控制，新世界提出的问题比旧世界适

今为止应付的单纯问题要复杂得多。有必要退回到政治发展的潮流中去，即对政府加以限制、约束和限定，而这一潮流则是现代人的骄傲。这是政治发展史上的新局面。美国革命深化了英国革命，因为英国革命引入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政治学。那里没有令人痛恨的专制。比起国内的英国人，殖民地的人民在很多方面更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受刻薄偏见的熏染。这一问题的核心是非常微妙的和精细的，而要形成无味的争吵则需要大量的误解。

踌躇满志的英国政治家们变换着他们的立场。他们设法颁 193 行了《印花税条例》，接着又是茶叶税以及其他好几种税法；后来又减缩为只有茶叶税，到最后剩下的税则比茶叶税还轻了。但在一件事情上他们坚定不移：他们从未放弃加税的权力。受帕特里克·亨利的煽动，殖民地的人民抵制使用印花税时，皮特却兴高采烈于他们的抵制，在此特别的问题上议会让了步，并宣布它保留这一有争议的权力。汤森带来了一系列的进口税方案，它产生了大约300镑的效益，诺思勋爵使它有所下降。接着又出笼了一个更为别出心裁的方案，它将加强税收的权力，但它触及不到美国人的财富，而只会增加他们的财富，当然是以贿赂的形式。东部印第安人被允许不向英国人交通行税而将茶叶带到美洲人管理的港口。《航海法》被搁置起来，结果使新英格兰人民可以喝到便宜的茶而不必靠走私。英国的税则是每镑抽1先令，而美国的税则是每磅3便士。减轻了1个先令的税，所以殖民地的人民只需交3便士的税而不是15便士。波士顿的饮茶人可以喝到比布里斯托茶客便宜的茶。这种税收也付出了代价，它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以安抚不满的殖民地。如果它是抱怨为了一种商品花了更多的钱，那么又怎么可能抱怨为同样的商品付更少的钱呢？为了使这味苦药更甜，有建议提出在英国的

港口也征税，以使美国人发觉除了那件赠礼外一无所有，除了他们的茶叶便宜些的可人事实外，他们沾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说。不过这将打乱全盘计划，政府也不会接受这一提案。美国可以得到便宜的茶，但要接受税率。在我们这一边这一不光彩的目的被放弃了，只保留了宪政思想，因为人们坚信这一肮脏的东西只会留存于殖民地地区。

3便士税收打碎了英帝国。12年里争论迭出，在不同的大臣执政时只是变换其花样；这种争论表明，伟大祖国的思想已经形成，而各种各样的党派只是种幻想。当美国人清除掉卑污的利益问题时，他们变得越来越坚定，而他们却是从此态度鲜明的。起初他们曾认可《航海法》所规定的征税条例，现在他们却予以拒绝。停泊于波士顿避风港的一艘茶叶船，在码头被强行占领，船上整箱的茶叶被抛入大西洋中。这就是那场最伟大革命的温和序幕，而这场革命在文明人中早已爆发了。争论已被缩减为最简单的表述，变成一个纯粹的原则问题。来自"宪章"的争论，源自"宪法"的争议，都偃旗息鼓了。情况成为依据自然法、更准确些说依据神圣权利而战。在1773年12月16日的晚上，它首次成为历史上的统治力量。根据权利条例，英国有着更好的原因，该条例直到那时仍被遵守。根据那时新诞生的原则，英国是错的，未来属于殖民地人民。 194

这种革命精神通过殖民地宪章而源自于17世纪的教派。早在1638年，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讲道者说："根据上帝自己的谕旨，人民有权选择地方官员。有权任命官员和地方长官的人民，也有权给他们的权力设置约束和界域，他们必须按人民的意志行事。"在罗得岛，《皇室宪章》是如此富有自由精神以至于它存续到1842年，它年年规定所有权力都属于人民，统治权必须经重新选择的确认。康涅狄格州拥有一套如此完善的城市自

治制度，以致成为联邦宪法的典范。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管理自己的事务，而没有特权、没有不宽容、没有奴役，也没有压迫。这并非意味着不效仿英国就会进入蛮荒状态。好几个殖民地在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其母国，而议会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范内，就是在新英格兰接受教育的。

在波士顿湾里"达特茅斯"号船上的暴行发生以后，政府决意对马萨诸塞人民实行强制，而大陆会议则开会讨论建立自己的保护措施。国王的军队被派来摧毁设于康可德的军火库；在莱克星顿，在进攻和撤退时，他们都受到民兵的攻击。1775 年 4 月 19 日发生在莱克星顿的事件，成为独立战争的开端，也开始了波士顿的围攻。两个月后首次战役发生于布里德或说是巴恩克，这座山较低，但可俯瞰全城，结果殖民地人民遭创，并小有损失。

接踵而来的就是战争，而且持续了 6 年之久。这场战争在军事编年史上并不著名，令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其结果。首战之后，殖民地就宣布自己独立了。完全是出于为自身考虑的弗吉尼亚，成为这一独立的领头羊。接着那位最伟大的革命者、弗吉尼亚人的领袖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它被现有的各州所拥护。宣言热情澎湃而缺乏科学性，但它引用了争论所凸显的一系列观念。

195

3 万大部分来自赫塞·卡塞尔的德国士兵前来增援，开始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因为他们有舰队的火力支援，而江河使舰队深入到内陆。不过欧洲军队没有占到便宜，事态恶化了。美国人进攻加拿大，并希望此举会受到法国居民的欢迎，他们刚刚才转为英国的属民。不过进攻在蒙哥马利元帅死后突然停止了，他是饿死在魁北克城墙下的，而法国殖民地的人民则维持对英国的忠诚。但在伯戈因将军的错误领导下，一支来自加拿大的

远征军向纽约进发。当他在萨拉托加被迫投降时，他差不多已逼近了哈得逊。无力采取行动的英国议会，希望投降之事秘而不宣，5000 名英国和德国俘虏被囚禁起来而不是放回家，一直到他们可以被用来交换时，再放他们回国。华盛顿和他的同僚宣布，如果事情是如此的话，他们将辞职。

英国在萨拉托加的战败，决定了这场冲突的性质。它结束了法国的犹豫。法国政府必须收回在上次战争中丢掉的重地，并重新注意着事件的进展，即观察美国的抵抗并未失败的证据。在 1777 年岁末，萨拉托加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志愿军被允许派了过来，大量的军备物资通过一位喜剧诗人的代理而提供。现在一个联盟条约缔结了，一支小部队从海上派出；在 1778 年 3 月英国获悉，法国将对她开战。紧随法国后面的是西班牙，再后面是荷兰。

很显然，一开始这个联盟就非英国所能对付。诺思勋爵立即让步。他提出要设法满足美洲的要求，并请求查塔姆伯爵来处理此事。不过打这一刻起，他的宿敌法兰西就跳上了前台，指责查塔姆伯爵是个战争狂人。国王同意接受他加入内阁，但拒绝接见他。美洲为了她与法国的和约拒绝英国的提议。和查塔姆的谈判已变得不可能。这并没有什么可悲的，因为数周以后他就死了，政府和反对派两方面都发布了消息

接下来战事连绵，在此期间法国海军包括位于英吉利海峡由迪奥维利尔率领的舰队，东方由萨弗兰率领的舰队，西方由迪爱斯坦宁和迪·格拉塞统率的舰队，以其实力证实法国的海军，已与英国海军并驾齐驱。正是依赖海上的舰队而非陆军，美国才赢得了独立。不过也正是通过军队，美国的理想被输入到法国，这些理想足以颠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当德·格拉塞指挥英国舰队驶离弗吉尼亚小城时，康威利斯在约克郡的南方军队投 196

了降，就像伯戈恩在萨拉托加向北方军队投诚一样。

辉格党政府上台后承认这块殖民地的独立，如诺思四年前所做的那样。在法国干涉时和欧洲列强签订的《和平条约》，由于罗德尼在多米尼加和艾略特在直不罗陀的最后的胜利而更受欢迎；英国好战的名声，降到自英国革命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人想进而形成自己的宪法，欲以此来更紧密地聚合全国人民，而此前是由统率他们赢得战争的大陆会议来担当此任的。1787年夏季在费城，为了这一目的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难办的是要找到某种宗教来联合三个大州——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后者是最小的一个州，但它包含了纽约。这几个大州不同意和其他小州平分秋色地享有权力；而较小的州也不愿仅由于规模上的差异而使自己吃亏。因此，众议院的议席是按人口比例来决定，而参议院则基于平等的准则来给各州分配名额。每个市民都是联邦政府的主人，就如他是其州政府的主人一样。各州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有限的。这样，各州和联邦之间就可以彼此制约。分权原则是业已设计出来的对民主制的最有效的限制。制宪会议之保守气质一如《独立宣言》之革命气质。

《联邦宪法》未涉及宗教自由问题。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规则证明是个失败。奴隶制受到批评，遭到抨击，但得到了保留。而对州权未加明确的界定，导致了现代史上最为酷烈的内战。若以自由主义的天平来衡量，该文件则是一个极大的谬误 随着联邦主义的发展，它终于产生了一个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见的任何国家都更强大、更繁荣、更文明也更自由的社会。

197

十八、美国的影响*

198

萌生于法国，并迅速融入革命进程的好几种政治思想构架，对那场革命的爆发并不负有直接责任。这些思想就好像浮在天空中的乌云，在路易十五统治的关键时候，人们感觉到一场大灾难将要降临。到了路易十五继任者时期，当愤怒的情绪稍有缓和时，灾难终于来到了，而将思想变成行动的火花，正是美国《独立宣言》提供的。这是一种超越国境的普世的辉格派思想体系，其简约、严密远胜于英国的榜样。它也大大优于巴黎和日内瓦的所有思辨，因为它历经了实践的考验，而它的成功也是人们所经历的最令人难忘的事。

美国殖民地将会分离出去的预言，早已成为历史。一个世纪前，哈林顿写道："他们仍然还是婴儿，没有母亲乳汁的哺育，他们难以活下去；如我们臆测，他们成人后，仍不会自觉离开这种乳汁，我担心王国的财富就会这样被榨干。"老米拉波在1759年也看出了这一点，他的意思是：征服加拿大将免不了会失去美国，因为只要法国人落在后面，那些殖民者就会跟着英国佬不再回来。他说得几乎很准，因为在加拿大的战争已经发出了信号。英国殖民者早已计划好来吞并法国的这块属地，因此他们抱怨

* 首刊于阿克顿：《法国革命讲演集》（伦敦，1910），重印于阿克顿：《自由主义的历史解释》，第378—395页。

王国政府策划这场远征，致使他们失去了采取联合行动的机会。50年以后亚当斯总统说，大不列颠对待美国官员的态度，令他热血沸腾。

199 骚动出现于1761年，这是由于来自海外的改革观念的激荡所致，它的重要性堪与《宣言》本身或宪法大讨论相比。在自由制度方面，殖民地已大大领先于大不列颠，只是有些情况存在，殖民地也才能摆脱母国的种种弊端。他们没有需要保护或者需要反对的封建主义传统。他们拥有成文的宪法，其中某些内容显然是独创的。这种宪法为未来的无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乔治三世为自己将成为像罗得岛那样的民主地区的统治者感到新奇；在罗得岛，一切权力年年都要交还给人民，领导人必须重新选举。康涅狄格从斯图亚特王朝得到一个如此自由的宪章，并制定出如此完善的一个地方自治纲要，它为未来的联邦宪制建立了基础。贵格会有一种基于平权、没有压迫、没有特权、没有不宽容、更没有奴隶制的设想。他们宣称如果这一设想不能提供某些真正优于英国的东西，那么他们的神圣实验也就是不值一提的。正是为了享受自由和心灵的解放以及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他们来到了这片粗犷荒凉的土地上。基于这些信念他们期盼着一种更为开明的民主学说，因为他们建立政府不是基于惯例而是基于神圣的权利，他们有权宣称自己是正确的。康涅狄格的一位牧师在1638年说："依据上帝的旨意，这样政府官员的权力属于人民。他们有权来任命政府公务员和要员，他们也有权限定并制约他们的权力，一直到他们满意为止。"下面这段写于1736年的文字，引自于弗兰克林的著作："全体人民的，尤其是自由人民的判断，看来是不会错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人们处在合适的地位，就会公正无私，也不会被阴谋家的伎俩所蒙骗。这种环境下的人民在任何重大的问题上

都不会出偏差，因为如果他们决定为自身谋福利时——这是极为自然的，他们的决定就是公正的，因为能增进他们的利益，也就意味着带来普遍的利益，意味着增进公共的福祉。"一位时事评论家进而指出，人民对他们自己真正利益的把握与追求不可能出错，这样一种观念在殖民地甚为流行，而在美国独立之后，这一观念在各州也着实时髦了一阵。 200

尽管他们有着民主精神，但这些政治共同体仍然同意使其贸易规范化并加以限制，这既是为了弥补其损失，也为了照顾英国商人的利益。他们曾抗议过，但最终却放弃了。现在亚当·斯密说，禁止一个伟大的人民制造他们能够制造的产品，或者禁止人民以他们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即使用自己的原料和工业，显然是对最为神圣的人权的侵犯。还有一个潜在意义的伤害这时也暴露出来，除了对贸易自由的干涉外，英国还实施了征税权。一位美国人后来写道："导致这场革命的不满与真正起因是大不列颠从1750年开始竭力阻止行业的多样化、不遗余力地抨击制造业和机械技术的进步；而不问青红皂白就企图征税的最终原因在于想努力推进航海法。"当英国争辩说规范的难度可能比征税更大些，而那些遵守某一规则的人，在原则上也服从了另一个时，弗兰克林则回答说，美国可不这样看，但一旦面临这样两个问题，他们会主动两个都拒绝。但无论如何，他明白他的同胞们采取的立场过于偏狭。他在写给法国经济学家莫莱的信中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你论述得更好了。你对自由贸易、垦殖和生产等等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对公民自由的热爱，其所受影响很小，但另一些则影响很大。"

美国独立的这些早期鼓吹者们，一般都很欣赏英国宪法。在把这一宪法作为国家的理想标志而加以神圣化和大力张扬上，他们胜过伯克。约翰·亚当斯在1766年写道："不列颠宪法

和其他的政府机制有所区别，即自由就是这一宪法的目的，是其作用和追求，也是其意义和寄意所在，这就像碾谷物正是磨坊的作用一样。"另一位著名的波士顿人士将此宪法等同于自然法，就如孟德斯鸠称之为民法一样，它由理性而写成。他说："他们的宪法构筑于永恒的自然法基础之上，这是英国王室的骄傲和他的子民的幸福；而且就如最高行政机关一样，最高立法机关也从此宪法中获得自身的权力，应该说，没有任何法律能在与自然法的精义相对立的情形下被制定、被执行。"这番话的作者詹姆斯·奥蒂斯是革命学说的创始者。在评论他的一本小册子时，第二任总统说："注意《权利宣言》以及1774年议会指出的错误；请再看看1776年的《独立宣言》；注意普赖斯博士和普里斯特利博士的著作，以及所有的法国政府宪法；再深入地往下看看托马斯·潘恩先生的《常识》、《危机》和《人权》。你所发现的不是代议制理由中所含有的固定模式。"当这些先生们发现对这一法律和宪法的吁求对自己不利时，当他们发现以人民的钱来贿赂人民代表的国王有能力来强化自己的意志时，他们就着手寻找更神圣的法庭，于是就从英国法驶向自然法，从英格兰国王转向王中之王。奥蒂斯在1762、1764和1765年说："大多数政府事实上是专制的，最终给人性带来了灾难和扭曲；而且也没有一个政府正确地使用了权力。根据神的和自然的法律，没有人民或者他们的代表的认可，政府不能对人民的财产课税。没有任何法则古老得足以取代自然法和全能上帝的恩赐，把自由赐予人类所有的人。即使一个人没什么财产需要保护和防御，但他的生命和自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大约在同一时间，加慈登也写道："我们作为英国人，基本和共同的权利可以从宪章中得到明确而充分的保护，但一味依赖于这些契约，则是致命的。我们应立足于那些自然权利的共同而广泛的基础之上，作为人以及作为英

国人的子孙，我们都应感受到并知道这些权利。"

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开始更倾心于抽象的道德原则而不是成文法和宪法精神，而且他们走的更远。他们的怒火不仅难以用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衡量，而且其内容也过于琐碎。英国的权利要求并未遭到明确的反驳；即便它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实际上也并非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服从所引发的不幸较之反抗所导致的不幸，绝对要少得多，而且它也更加不确定和更加遥远。功利主义见解赞成服从和忠诚。不过如果以利益为一边，那么在另一边就会有一个详明的原则——原则是那样神圣与明晰，以至于不得不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和未来去实现它。他们决定放弃一切，不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压迫，而是为向一个尚未法典化的箴言表示敬意。那是大西洋彼岸在政治义务理论上的发现，是从海那边射过来的曙光。它所 202 带来的自由并非只是摆脱专制，而是如此神圣的一种东西，以至于社会的存在必须这样界定，即防止对其至上权利哪怕是最微小的侵犯。迪金森说："至于那些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而设立的制度，对其无论是形式上抑或实质上的变化之萌芽，自由的人民既难以迅速的觉察，也不会坚决的予以反对。最早发生的变化形态会影响到以后。对被统治者权利的侵犯通常是在某种幌子下进行的，而且在开始时是很少的、细微的；在悄无声息地触及个人权益时，这类侵害就会迅速扩散开来。每个自由的州都始终关注着，并对制定任何附加的、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力随时发出警报。"谁是自由的人？不是那些有合理而公正的政府但却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而是那些生活在这样一种政府管理下的人，政府在制度上受到制约和控制，为此制定适当的规定，并反对其在其他方面滥用。竞争显然是原则的竞争，而且完全受双方的原则控制。最伟大的宪法学家马歇尔说："提议扩大的税额过于

微小，以致与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关系不大。"丹尼尔·韦伯，这一宪法卓越的阐释者，也是美国最伟大的雄辩家，在政治上也仅次于伯克。我乐于引述他下面这段话："大不列颠议会要求有权在任何情形下对殖民地征税，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使美国革命的轮子转动。税额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一要求本身与自由相冲突，而这在那里的人民看来也是忍无可忍的。它反对的是将它说成是国会的一项法案，而不是实施该法案所带来的损失。他们拿起了武器。他们直接走向战争。为了一个宣言，他们打了7年仗。在不列颠议会的权利要求中，他们看到了苦难的祸根和暴政的雏形。"

这些先生们的目标是自由而不是独立。杰伊在向大不列颠人民的致辞中，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感情。他说："请准许我们像你们一样自由，而对于与你们的联盟，我们深感无尚光荣和无比幸福。"1775年以前是没有分离问题的。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亚当斯宣布，他保证会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以前的状况；而杰斐逊和麦迪逊也在英国内阁面前表态同意，两院中的一些席位将本着解决全部问题的设想来安排。

203 在诉诸更高法律的过程中，美国人转向了最纯粹的辉格主义，而且他们还声称他们对抗下议院和威斯敏斯特的司法程序，只会加剧辉格派和托利派无休止的冲突。据他们更进一步的分析以及勇敢的逻辑推论，他们修改了理论并改造了辉格党。那被放逐的辉格党人，远离其经典和先例，远离其主要的学派和历史条件而展现了新的品质；妥协的时代让位于一个道义的时代。当法国外交官在追查波士顿茶叶暴乱中英国作梗的情况时，查塔姆和卡姆登都觉察到了迪金森和奥蒂斯的影响——他们不承认两者间有何差异。查塔姆1775年的一次演说中，有段话表明了这一点："可以预料你们专横的税收制度将遭到普遍反对。从

事情的本质、从人的本性、归根结底,从人的固定的思想习惯,从盛行于美国的辉格主义的精神来看,这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现在流行于美国的精神,就是以前在这个国家反对借贷、仁慈和船税的同一精神,也是唤醒全英格兰投身于革命实践之中的同一精神。正是它在那个伟人的宪政格言(即不得对英格兰人民征税除非得到他的同意)基础之上建立了你们意义深远的自由时代。努力维持这一原则是大西洋彼岸和此岸的辉格派的共同事业。它是上帝和自然的联盟,像日月星辰一样,恒常、不变和不朽。只要是正义的,那么反抗你们的行为是必要的;你们的全能议会的空洞的宣言,你们关于必须服从的傲慢学说,在说服或者奴役你们的美洲朋友时,将会被发现同样软弱无力。"

美国对欧洲影响最有力的例证是埃德蒙·伯克。我们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拒绝所有的原则和抽象命题,并变成了一个最为勤勉、也甚为保守的人。当和殖民地的争吵持续不断时,情况有所变化,伯克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像华盛顿一样的革命者。不一致并非看上去那么糟。他深受那个行为谨慎、态度持中的政党的触动,这个党善于妥协又思想开放。他声称有征税权,但拒绝使用它。当他竭力强调每一情境和每一问题的差异以及回避其共同背景和根本原则时就和其朋友步调一致了。 204
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娶了个有爱尔兰天主教背景的女人,可以想像他不会采信不适用于爱尔兰的美国理论。他把政党作为一种近乎神圣的教义来指教政府,而政党又把抗议当成违法来禁止。他的迟疑和抗议以及他对理论的蔑视,表明他是一个意识到限制,而不能完全自由地行使权力的人,而这权力又使他远高于他温顺的环境之上。随着斗争的深入以及美国的让步,伯克被推动并阐述了一些他并未彻底放弃的观点,但它们很难与那些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所写的很多东西相吻合。

他在向殖民地人民演讲时说："在一心和特许权作斗争时，我们确实难以安抚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而此特许我们曾认为是我们的幸福和光荣所在，这真是不光彩而无味之举。与此相反，我们高度尊敬你们的行动原则。我们非常乐意于看到你们完全存在于这个王国，而不愿意看到你们以那样一种非常不自然的方式加入，使自由和奴役混于一体。我们是依据自由原则来看待英国殖民地的建立的，因为它会给王国的未来带来光荣。有鉴于此，我们将我们好战的先辈或者我们这一代的胜利和征服视作残暴和粗鲁的象征；而那些我们从瞧不上眼的民族，即使不说远胜过我们的话，也是和我们平等的。而对于那些拥有或者坚持共同的自由理念的人们，不论是从你们这边来看还是从大洋彼岸的人们来看，我们都视之为真正的、惟一真正的英国人。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的人，一旦抛弃了这一原则，就会堕落、变质并完全背离其最初的阶级立场和基本价值。他们是对英国公正的法制和君主制的真正造反者。因为与国家政府长期开战，也许不过是你们之中的一系列战争与竞争的征兆，它最终（这样的情况常常是最终）会在种种耻辱的屈服中打上休止符；内讧和纷繁的战事只意味着未来的灾难，即使停下来，也会气馁和沮丧。我们同意，当理性的自由危如累卵之时，如我们眼下坦承和哀叹的情形那样，即使是恶魔，也值得拿人的尊严来冒险一搏。"

在另一场合他又说："即将撼动地球的真正的激荡，会使欧洲各个国家重建于自由之上，也正有赖于此他们曾那样出类拔萃。西方世界是自由的摇篮。直到另一个更为西方化的大陆被发现，因此当自由在其他地区被击溃时，这儿或许就是它的庇护地。幸运的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人类仍拥有一块庇护地。如果爱尔兰抗议威廉国王，他们就会以英国与苏格兰反对詹姆斯国

205

王相同的原则来抵御他。如果爱尔兰天主教徒未曾支持那位受到攻击的王子,不是出于他们的宗教与自由的理念,而只是为特别偏袒他们自己的宗派,那么他们肯定是最为恶劣的,是违背人性的谋反。而王公们即使有功但侵犯了人民的自由,因而应被合法地罢黜。我知道没有人能超越法律。我将议会视作国王的好法官,因而他们服从议会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违反人们的意愿,就不可能控制人们的全部身心。无论何时,他们的感觉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基督教显然同情最底层的人民,并坚定地以此作为指导原则,即以他们的利益为所有政府的目标。"

"在一切形式的政府中,人民是真正的立法者。人民的认可是最为长远和有效的动因,不论是在表面的还是潜在的意义上,这种认可是政府权威的绝对的关键所在。辉格主义并不支持议会的权力或任何其他的权力,但却支持人民的权利。如果议会变成一种侵害人民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是坏的,而且较之于任何其他的专制权力工具,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坏。那些呼吁你们完全站到人民立场的人,实际上也是希望你忠于自己的祖国,担当起你的责任,不辜负过去光荣的人。议会中的众议员们集合在一起就等于是大多数平民百姓聚集在一起。在我看来,在议员们中间没有其他方法来维持对公众利益的适当关注、大多数人民自身得失除外。无论何时,那些议员在越过法律的藩篱进入专制权力时,都会伴随着某些臭名昭著的行动,以及作一些重大的革新。这种干预是种最令人不快的补救,不过如果它是合法的,那么就期望在某种情况下运用之——只有当情况很明显,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来维护宪法的正确原则时才将其运用。 206 因为议会秩序仅靠议院自己是难以做到补救的,确实,几乎不可能从这儿开始,因此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不可能构成一位众议员的独特品格,它均匀地体现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种形式中。

下议院的特性、精神和本质，在于其表达了民族的情感。其构成不是为了控制人民，其设计旨在服从人民的控制。国王的特权和议会的特权是惟一的特权，只要它们的运用是为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声音是必须倾听的声音，而不是投票和下议院的决议。他应该彻底维护人民的每一个特权，因为这一权力是众所周知并载明于国家法律中的；而且他应该支持这一权力，不仅仅是针对王权或者是贵族政治，而且也针对人民代表本身而言。这不是一种政府工具，如果两百个贵族拥有的权力能够否定英格兰人民所做所为，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出于促进公正和理性指导的目的，我已介入了政治联合和政治争论；为了那重大而根本性的目的本身，我希望我从不偏爱于这些手段，或使用这些手段的感觉，超过那伟大的实质性目的本身。立法者能为律师所不能为，因为除了理性、公平的基本原则以及人类一般意识的约束，没有其他原则来限制他们。所有人类的律法，恰当地说，只是宣言性的，它们或许会改变形式和应用，但无力来改变实质与原初的公正。稳健而安全地享有我们的天赋权利，是文明社会最大和最终目的。那让一种压迫进入这个世界的大通道是一个人自称能决定别人的幸福。我将揭示一种充分的公民保护，包括排除一切公共宗教崇拜的烦扰，在学校执教以及在圣殿面对犹太人，穆斯林异教徒的布道的权利。基督教诞生时并没有获得统治地位，甚至没有被宽容，它自己的教理也受到不宽容的对待。它征服了所有黑暗时代的所有权力，它征服了世界上的所有权力。就在这时它开始离开了这些教义，它将国教变成暴政；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其基础受到了毁坏。只有政府的权力能阻止邪恶，而它却做得很少，也许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不仅仅政府和政客如此，而且所有阶级和富人们都是这样。他们是穷人的寄生者，用他们提供的奢侈品而养尊处优。他们绝对地，世

207

世代代和不可更改地依赖于那些劳作并被蔑称为穷人的人。那称作富人的寄生者阶级，是如此的稀少以至于如果他们禁食，分配好他们在一年内的消费，也不会给那些劳动者的晚餐多一点面包和奶酪。正是劳动者们既养活了自己也抚养了寄生的人。这并没有破坏商业法，这种法是一种自然法，归根结底是上帝的律法，也正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减缓天怨神怒。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之法。"

我难以反对上述诸节引文中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又是伯克1770年以后受其他人的影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其著名老师，即1688年的辉格党人们造就的。如果我们在一位后来文饰旧秩序并在宽容和奴隶贸易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先生那里，发现一种奇异的思想形态，我们也许就可推测同样的原因也会在法国起作用。

当《一位宾夕法尼亚农夫的来信》传遍欧洲时，狄德罗说，让法国人读到这些东西就会发疯，因为他们若不陶醉迷狂或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就不会这样干。较之其伴随的文字效应，该事件对法国的触动更大。较之于最初的反抗情绪，美国很平和地取得了自身的独立，而法国政府早就宣称她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为此而投入了战争。如果国王在美国问题上是正确的，那么他在国内问题上就彻底错了；就法国自身而言，而如果美国的行动是正确的，其思想就会更强有力，其事业更好出百倍。所有支持独立的人都谴责他们法国盟友政府。根据基本原则，未经授权的税收即为抢劫，那么再也没有像路易十六那样无法无天的专制者了。示范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在英国失败之处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在大革命之初，英国的主张被抛弃了，而美国的思想则被采纳了。法国从美国学到的是他们的革命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府理论——是他们的大砍刀而不是他们的针线活。很多 208

法国贵族参予了这场战争，回国后变成了真诚的共和派者甚至民主主义者。正是美国促使贵族政治改变为改革的政治，并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领导人。华盛顿说："美国革命，或者说这一时代的耀眼曙光，似乎惊醒了欧洲各个民族，而平等的自由精神看来也日益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当法国官员准备撤退时，波士顿的库柏对他们发出警告说："不要让你们的希望被我们在这块处女地上的胜利所点燃。你们应听听我们的意见，但是如果你们试图在一个已腐败了数世纪的国家里培植这些思想，你们将遭遇到比我们更大的困难。我们的自由是用鲜血换来的，而在自由得以在旧世界生根以前，你们也将在疾风暴雨中为之流血。"亚当斯在成为美国总统后，对使他们独立的这场革命感到遗憾，因为它为法国树立了榜样，尽管他也相信他们的原则与自己的并非完全相同。

相反，肯定没有什么比美国的原则更为深刻地影响到法国并决定了革命的进程。拉法夷特是从美国学到了那造成了当时一场起义的格言，反抗是最神圣的天职。那里也有这样一种政治政府：政治权力来之于其所运用的人民，并依赖于他们的意志；故此，任何不是这样建立的政治权力都是非法的，也是不牢固的；历史不是范例而是借鉴；地球属于生活其上的人民，而不属于地下的长眠者。这些均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共同的特征。

有一次那位法国人引用并欢迎美国这样一种思想：政府的目的在于自由而不是幸福、繁荣、权力，不是保护历史遗产，也不是按本民族的特性而定造法律，不是为了启蒙的进步和道德提升；个人不应感受到公共权力的压抑，个人应凭自己的内在意志而不是身外的指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美国输入法国的还有另一种政治学说。在旧的殖民地时

代，行政权和司法权属于海外的宗主国，这样安排的共同目的是要削弱这两项权力。立法议会在其起源与根本特性上是人民的，而任何扩张其权威的做法，都似乎增加了权利的保障。詹姆斯·威尔逊是一位权威的宪法评论家，他告诉我们："在革命时期，存在和流行同样的偏好和同样的厌恶。执政者、司法者以及立法者，现在都是人民之子，但对前两者人民的表现却像一位后母。立法机关仍一直受到过分的偏爱。"这种选择是历史的但并非合理的，它自然会导致一院制。美国人民及他们在国会的代表都有一种看法，一个单独的议会就有足够的办法来处理联邦事务。当参议院建立起来时，弗兰克林予以强烈的反对。他写道："至于这两个议院，我同意你的看法，即只有一个最好；但我亲爱的朋友，在人类事务和计划中，是找不着尽善尽美的，这大概也就是我们的看法。" 209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既是一位最保守的美国政治家，也是一位最有才能的人。他渴望君主制，而且他也热切期待建立一个全民政府并取消州的权力。至于渗透于法国的美国精神，没有比他描述的更好的了："我觉得公民自由在真正纯粹意义上是人间的至福。我深信全部人类有此天赋权利，人间最黑暗和最丑陋的犯罪即同剥夺自由联系在一起。人类的神圣权利不能到文献中寻找。在人性的全部历史画卷中，它犹如灿烂的霞光，由上帝自己亲手织成，人间的力量不可能毁灭它、遮蔽它。"

不过当我们只是概略地提起美国革命时，我们将两种不同乃至对立的事情整合起来了。从 1761 年的初次鼓动到《独立宣言》，再到 1782 年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其语言中显得更具攻击性、狂傲不羁，偏好抽象观念以及各种普遍有效和具有普遍毁灭力的理论。正是这些早期出现的理论吸引了法国人，这些理论是由拉法夷特、诺里斯、拉麦斯以及那些曾去约克郡亲眼目睹英

国国旗下降全过程的未来革命领导人引入的。他们经验中的美国是詹姆斯·奥蒂斯、杰斐逊和《人权论》的美国。

后来在1787年出现了变化，当时制宪议会起草了宪法。这 210 是一个属于建设的时期，人们想方设法，做出了种种努力，发明了种种计谋，试图遏制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在总体上议会的那些成员们，都是些极为谨慎和明智的人；他们并非是些杰出的人士，汉密尔顿的精神就未完全能打动他们。他们中最有价值的一些创见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且也是不成熟的，是相互退让的产物。西华德早已指出过革命的时代与其后的宪政时代之差异。他说："我们祖先维护的权利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最寻常不过的，这些也都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宪法建立的基础远比上层建筑更为宽广，今天的利益冲突和偏见左右着上层建筑的形成。联邦政府的宪法和法律实际并未涉及那些贯穿于政府新制度中的原则，但在《独立宣言》中却作了清晰的宣示。"

现在虽然法国深深地卷入了美国革命，但她却未受美国宪法的影响。她承受了令人骚动不安的影响，但不是保守主义的影响。

这部形成于1787年的宪法，生效于1789年的3月。当法国陷入危机时，没人知道它如何运作。各种意图和组织所引起的争论，对这个世界来说仍是一个隐秘的谜。而宪法本身已具有了比最初的文本更多的意义。除了修正案外，它也被法院添加了解释，也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故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悄悄地有所更改。美国宪法中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就以这种方式得以确证，而当法国人急不可待地需要他人经验的指导时，这些价值尚未显现出来。对统治权力的某些限制，尚未充分建立起来。

这些限制中最为重要的是最高法院取消违宪法律的行动。

威灵顿公爵对邦森说，仅凭这一制度安排，美利坚合众国就可以弥补其政府的所有缺陷。因为大法官马歇尔拥有巨大的司法权威，杰斐逊以及其他人对此都觉得是违宪的，因为宪法本身并没有赋予这种权力。我以为这主要是在弗吉尼亚发展起来的。1782年在里士满，威瑟法官说："暴政已被推翻，政府受到了限制，公民得到了保护，普遍自由得到促进。而这一不错的结果获得了更为圆满的发展。而当时那些拥有武力和金钱的人，要求享有特权，而一无所有的法官，则被要求在他们之间公平地行使法律。如果整个立法机构——在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上——试图逾越人民为之划定的界线，作为国家司法统帅的我，将会在我的法庭席位上面对这一同流合污的权力；我将指着宪法对他们说：'这是你们权力的限制；你们可向这儿走，但不能过。'"弗吉尼亚的立法机关让步了，并废止了该法案。 211

在起草好宪法后，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八篇中提出：权力属于法官。但在1801年以前法官的权力仍未获得宪法上的肯定。麦迪逊说："这使司法部门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这是人们从未料想的，也不可能是合适的。一个政府最有效的原则就是责任，从来不会允许立法和行政机关要完全服从司法机关，如果这样政府的职能就模糊不清了。"威尔逊从另一方面论证了在更高法律原则基础上的实践："毫无疑问，议会要受自然法或成文法的制约，而这些法律源自神的权威。不正是这至上的权威维系了法庭的公正吗？当公正的法庭服从了这一至上的权威，则不能说上级权力控制了下级权力，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人们只能宣称——就如他有责任表明的那样——低级权力受其他权力的制约。他们并没有废除议会的某项决议，他们只是宣布它是无效的，因为它与根本大法相抵触。"因此司法的功能是民主的一种障碍，这按照托克维尔的见解，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在同样的意义上，宗教自由——它与美国非常一致——则是一种逐步发展的事物，将来成文法也不会予以干预。

联邦制是对绝对民主真实而自然的限制。它以有保留的权力制约着中央政府，以它们所让与的权力制约州政府。这是美国对政治科学的一个不朽贡献，因为州权同时是民主的实现和保障。早于伯尔·兰几个月以前，一位官员就这样写道："南方的212 人民公然认同这样的观点：奴隶制在现时代岌岌可危，而欲改变这种观点也是没用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建立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当民意已定，我们的政府也就无能为力了。"这些话是舍曼说的，正是他挺进佐治亚，这使"南方联盟"分为两半。与此同时林肯自己也写道："我宣布保持州权不可侵犯，尤其是各州按照其自身的独立判断来组织和控制其自己的内部事务，更是神圣的，这对维持权力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政治完善性和持久性正赖于此。"正是这一力量在战争的前夜使政府权力控制住了废奴主义者的思想，而这场战争也把他们击垮。

在美国革命中有许多法国人参加了，他们以为联邦主义是惟一能统一自由和民主的方法，也是能将政府建基于契约之上，以及挽救国家于溃败的巴黎及巴黎市民群众之中的惟一方法。这里我不是意指吉伦特派，而是指与他们的见解相左的米拉波。他试图分开地方各省与暴乱的首都以挽救王权，为此他宣布，在任何伟大的帝国中惟有联邦制度方可有可能保持自由。这一观念并非来自美国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比拉法夷特更反对它了，而美国革命的见证者莫里斯则声称，对法国而言，联邦制是危险的。

除宪法外，美国政治思想对法国的影响仅次于法国自己，并非是思辨，而是一种人们愿为之献身的制度，它经过考验而证明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在欧洲的支持和鼓励下，它强大得足以粉

粹任何抵抗。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它都为法国树立了一个完美的革命榜样，并揭示了旧世界中那些看上去已穷途末路并已没落的东西，可以同好的明智的政府和谐相处，并尊重社会秩序，保持民族性格和习惯　这些吸引并激励着法国人民的思想，因为绝大部分正是为他们准备的，许多今天你们已耳熟能详，许多我已向你们指出的思想与制度并非来自法国，这些思想和制度会以老面孔在下周再和我们见面，届时我们将谈谈法国议会。

213

十九、论汉密尔顿*

里特缪勒先生有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美国极其著名的政治家的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的大著，堪与德·威特关于他的成功竞争者杰斐逊的出色传记相提并论。在政治事务方面，没有外国论者的研究可与英国人的相比，因为没有人能忍受我们的政府在极端时期的原则，或者能将此原则在一个与我们的情况有很大区别的社会使用。孟德斯鸠、伯克等欧洲思想家，对历史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拥有的资源也更为广泛；但不见有同样天才的哲学家来主持一个伟大政治社会的构建，或者有这等机敏来察觉这一社会最初的萌芽。其他先生们的智慧则源之于社会发展到成熟时的长期经验，这种成熟或许已开始走向衰退。没有一位大哲学家以梭伦时代为镜，或者是以古罗马"十六执政官"时代、或查理曼时代、阿尔弗雷德时代为镜。智慧而有观察力的亚加人，敏锐地察觉出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国家向普遍帝国的转变。有些人如波大利斯和费维，他们考察了革命后法国的重建之路，这与汉密尔顿对美国政治所做的几乎相同。到达一

214 定的文明高度后，那些诊断社会病因的人所教诲的所有知识，对教导其他一些在国家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进行学习的人而言没什

---

* 原题为《评里特缪勒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同代人〉》，首刊于《内外评论》，第4卷（1864年4月），第718—719页。

么特别的价值。

汉密尔顿比皮特稍年长一点，却早亡，他在历史上享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他将自己分得很清楚：独立战争期间是一位战士，战后则是在纽约开业的律师。他在形成美国宪法的制宪会议上代表纽约州。里特缪勒先生并未冒险紧跟柯蒂斯先生而进入那次历史性的伟大的立法会议之细节。就如在别的地方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超出那本普通的书之外作进一步的研究，而美国人对这本书很熟悉。不过他对这一时期的汉密尔顿的主要影响的叙述是错误的。汉密尔顿没有参加大部分的审议；他提出他的计划，遭到了拒绝，但这种拒绝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无人在才能上能和他并驾齐驱，但有些人却手握大权。他并不像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认为共和政府只能存在于美国。除了政治特权的继承问题外，在所有事情上他都设法介绍英国的宪法架构；他的政治制度构想虽然在政治的内容方面有缺陷，但却包含了君主政体的核心。他的支持导致了对1789年协议的认可，可是，虽然为捍卫它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但他却对其生命力有所怀疑，他就像路德·马丁一样意识到自己作品的欠缺，希望人们反驳它。历史表明：对人民意志的恣意妄为，没有任何安全机制能加以约束；在联邦政府中有很好的中央管辖权和地方权力，对人民的专横意志，也最束手无策。中央与地方司法权限的规定，这个联邦政府的敏感问题，归根结底失败了。

在推测汉密尔顿在当时争论中的意图时，里特缪勒先生断定，他会同意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而且还主张："一个以暴力维系的共和国已不是真正的共和国了。"（第440页）一个作这样论断的先生并未弄懂这位伟大的美国人的政治哲学。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加断然地拒绝这一理论：联邦就是相互分离、彼此独立的各州之间的联盟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统一体。这种理论正是南

方的捍卫者们所一直主张的。南方各州的行为对他说来不是符合宪法的举措，但却是一种合法化的革命。这一行动把他参与

215 其间的伟大事业推到顶峰。南方国会所设立的政府形式会适合他的精神气质，以社会道德问题决定政治权利这个专制的革命主义之本质将遭到他的拒斥。但由于他过分尊崇法律，过于厌恶大众言行的飘忽不定，因此他不能否定共和国的宪法就像任何国王的王冠一样是神圣的并有武力保护之价值。

二十、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因[*]

216

在雅典式民主处于极度衰落之时，当亚吉留斯(Arginusas)的统帅们被不合宪法的法令所罢黜时，只有苏格拉底维护着宪法的神圣性，据色诺芬说，人们喊出不让他们做乐意做的事是极其荒唐的。[①]几年后，欧儿里德时代的执政官恢复了旧的宪法，由此，雅典人的自由而不是权力得到了复兴并且延续了几代；这个新秩序的守护神是：不允许任何委员会或任何人的命令超越现存的法律。[②]

每个民主社会的命运，每个基于人民主权的政府的命运，都取决于它在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所做的选择：即一方面是绝对权力，另一方面是对法律约束和传统权威。根据它的选择它会进行下列的原则取舍：赋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还是赋予人的意志以最高权威；形成一个通过义务维持的道义团体，还是形成一个通过暴力维持的自然团体。共和制在这方面与各种君主类似：既是绝对的，又是有机的；既是法制的，因而是立宪的，又是由不受法律约束的人的意志统治的，它是法律的源泉，不受法律管辖，因而是专制的。但在发展方式和方向上，它们彼此是完全 217

---

* 发表于《随笔》，第5卷(1861年5月)，第17－61页

① *Hellen*. i. 7, 12.

② Andocides, *de Myst*. (Or. Att. ed. Dobson, i. 259)

相反的。民主制往往自然地实现其原则——人民主权，并祛除对行使人民主权的一切限制和条件；而君主制往往屈从于这些条件。一方面是力量屈从于权利，另一方面力量压倒了法律。君主的反抗逐步被那些反对并谋求分享其权力的人所击败；而民主制中，权力已经在那些谋求推翻或废除法律的人手中。废除法律的过程因而是无抵抗而迅速的。

两者不仅发展方向上不同，而且发展的原则也不同。君主立宪制组织是相互对立的力量、利益和舆论的产物，由此，君主被剥夺了其独占权威，王权受政治制度约束和保护。在一个纯粹的民选政府中，这种力量的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权力都统一于相同的主权，臣民与公民合而为一，不存在外部的权力来迫使最高权威的一个部分屈服，或建立一种防范机制来对付最高权威的滥用 这些组织因素不是自生的。如果一开始就不能得到，它们就不会自然生长出来。在民主政府体系中这些因素没有胚芽。君主制根据其生存法则会变得更自由；而民主制则是更加武断。人民比君主更不容易被诱导放弃广泛的权力，因为权力不仅存在于人民之中，而且这种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拥有，和没有更高的权利的拥有者。民主体制所产生的惟一冲突是主权共同体内各竞争派别与利益的冲突，因为主权共同体存在的条件是它应该是同构的。这些不同的利益只有通过服从于多数的权力才能保护自己；对此，多数不能被迫使或不断地被劝说同意。它是人民直接权力的一种让渡，一种原则(即在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权威必须是与权力相当)的放弃。

Infirma minoris
Vox cedat numeri, parvaque in parte quiescat.

帕斯卡尔说："La pluralité est la meilleure voie, parcequ'elle es visible, et qu'elle a la force pour se faire obéir; cependant c'est l'ave des moins habiles.（通过民众是最好的途径，而且有力量让别人遵从；但这又是最不聪明的见解。）"当少数派面对占优势的多数派，或面对多数派控制的政府，没有永久的安全时，分权就到了让位于屈服的时刻。在组成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各阶级不是以地域特征来划分，但他们却在全国范围内杂居在一起的地方，迁徙在其中起了弥合作用，许多古地中海国家与美利坚主要殖民地就是由此兴起的。但当敌对利益结合在一起，进而导致政治上和地理上的分裂，这将随之产生领土的分裂，在这种分裂过程中，必然很快地在社会出现一定的地域性自治组织。从长远看，这是多数派不可能阻止的事情，它将来会有许多随形势而产生的少数派，他们私下同情分离者，且不愿强迫他们留下来，因为他们害怕多数派专制的永久化。所以，严格的人民主权原则必然导致采纳这一原则的国家毁灭，除非通过让步牺牲这一原则本身 218

所有现代共和国中最伟大的国家成了这一真理最彻底的典范。绝对权力与有限权力，集中与自治之争论，就像英格兰的公民权与王权之争论一样，一直是美国宪法史的要义。正是这种争论在从 1787 年制宪会议到 1861 年戴维斯先生当选南部邦联总统这段期间给予了美国一个几乎史诗般的一致性。正是这一问题推动了美国的政治进步，构成了已经搅动美国所有大问题的基础，并且把宪法的重要性赋予了所有人。这种争论以许多形式不断出现，但每一次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案，都回避了对此做出裁断。因此美国政府只是称之为妥协体制，就是说是一个不连续的体制。它既不像欧洲的古老政府一样是建立在传统之上，也不像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政府一样建立在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相互让步和暂时搁置对立原则的敌对基础上。

随着美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口分布的不断扩散，随着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各党派力量的上升，随着新的地区（由于自然的影响和社会的条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它们在所有问题上彼此反差很大）成为美国的州，冲突在规模和强度上都变得更大，每一种观点都变得更加固执和执着，妥协变得更加困难，美国面临的危险增大了。

从近来的事件看，美国的历史是易于理解和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因为联盟的解体不是偶然的、草率的或暴力的过程，而是一种长期事态发展的正常而必然的结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宪法本身。在那儿我们能找到分裂的胚芽，它历经 70 年才成熟；我们还找到对抗的源头，它以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并且从没有和解过，直至分歧扩大到分裂。

1787 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目的是用一部永久宪法代替邦联制，该邦联是在抵抗英国武装中产生的，但在以后和平年间出现了问题。这次制宪会议参加者不多，但它包括了美国最杰出的人物，他们在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以及更重要的政治远见是令人惊讶的。弗兰克林在这群人中似乎显得是惟一一个十分笨的人，他的同事们似乎也意识到了。华盛顿主持会议，但他对会议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会议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亚当斯和杰斐逊远在欧洲，后者的缺席在辩论以及由之而来的引人注目的工作中显得引人注目，因为最为惊人的是纯民主的观点（我们习惯于把它们与美国政治联系在一起）几乎没有在这次会议上体现出来。美国的宪法远不是民主革命和反对英国体制的产物，而是对民主强烈反作用的结果，并且倾向于母国的传统。在这一点几乎主要政治家都同意，对于下面这样的演说，也没有人反驳。麦迪逊说："在所有多数派是由共同利益或热情团结起来的情况下，少数派的权利就处于危

险之中。限制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呢？经验证明个人和社会团体很少谨慎地关注这一格言——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对人的尊重总是按照人得到指责或赞扬数量的分化而弱化。良知这一惟一尚存的纽带，众所周知在个人中间是有所不足的，而对于大量的人，更不要期望过大。"[3] 220

舍曼先生反对人民进行选举："坚持由州立法机构进行选举。人民应该立即少去参与政府事务。"

格里先生说："我们经历的弊端来自于过度的民主。人民不想要美德，仅仅是装模作样爱国者的受骗人。……以前他是很倾向共和主义的；现在尽管仍倾向共和主义，但经验已经告诉了他这种平等精神的危险。"梅森先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但现在我担心我们不留意落入了它的反面。"伦道夫先生说："总体目标是提供一种疗法，去医治美国遭受的魔疫；在追溯这些魔疫的根源时，每一个人都会在民主的动荡和蠢事中找到它；所以应该寻找某种制约来对付我们政府的这种倾向。"[4]

威尔逊先生在1787年所说的话好像已有了以后70年的经验似的，他说："专制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间，有时是以行政的专制，有时是以军事的专制，难道就没有议会的专制吗？理论与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立法不能受到限制，就既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稳定。"[5] "不论立法权力是如何形成的，"戈文纳·莫里斯，这位制宪会议上的最保守的人说，"如果是专制的，它也会毁了国家。"[6]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话更强烈："如果政府控制在少数人

---

③ 《麦迪逊报告》，第162页。
④ 同上，第135、138页。
⑤ 同上，第196页。
⑥ 同上，第433页。

手中，他们将对多数人施行专制；如果政府控制在多数人手中，他们会对少数人施行专制。政府应该在两者手中，应该把它们分开。这种分开应该是永久的。仅有代表制是不起作用的；蛊惑人心者一般总是能占上风的；如果政府把它们分开，它们需要一种相互制约。这种制约是一个帝王。……这个帝王必须有一221 定的力量。他应该是世袭的，并且他拥有了很多权力以至不需要冒更大的风险去获得更多的权力。……那些打算建立一个牢固共和政府的人应当着手对其他政府的限制。……但是我们如果太倾向于民主制，我们不久就会落入君主制。"[7] "他承认他本人不太倾向共和制，但他对那些倾向于共和制的人发表演说，为了说服他们，他尽可能地为他们赞成的政府模式唱高调。"[8]不久，在通过这部宪法的纽约会议上，他说："一直有人认为，纯民主制，如果可行的话，是最完美的政府。经验证明，没有比这更错的政治立场了。古代民主制，尽管人民可以进行辩论，但从没有具备好政府的特征。专制才是它们的特征。"[9]

汉密尔顿的观点倾向于君主制，虽然他为没有把这一制度引入美国感到绝望。他不断地举出英国宪法作为惟一的指南与典范；杰斐逊记下他的说话，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信念是多么的强烈。亚当斯曾说，英国政府，如果进行改革的话，会变得优秀；汉密尔顿停了一下接着说："清除英国政府的腐败，而赋予它代表平民家庭的特性，它会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政府；事实上现在，尽管有各种弱点，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最完美的政府。"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杰斐逊说："我承认我的观点是：现在的政府不能

---

⑦ 《汉密尔顿著作集》，第2卷，第413—417页
⑧ 《麦迪逊报告》，第244页。
⑨ 《汉密尔顿著作集》，第2卷，第440页。

满足社会的需要，产生稳定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可能最好的做法是模仿英国的形式。"[10]

在他关于宪法的伟大演说中，他以同样的决心说（麦迪逊记述）道："由于他的观点受到许多贤哲之人的支持，他毫无顾虑地宣称，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他怀疑缺乏这种政府的美国是否能做好任何事。……至于行政部门，似乎应承认不可能在共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机构。难道不应该放弃这一质疑吗？因为没有好的行政机构会有一个好政府吗？在这一问题上英国模式是惟一的好模式。……为了获得持久的稳定，我们应该像共和原则所允许的那样做得更富有成效。"[11] 222

迪金森"希望参议院由最杰出的人物构成——在生活地位上和财产上杰出——并且尽可能地与英国的上院相似。"[12]

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先生说："对英国宪法已经谈得很多了。我承认我认为它是目前最好的宪法，但同时，我坚信它在几个世纪内不会也不可能引入到美国。"[13]

真正使宪法制定者产生分歧，并由此使美国分裂，至少是分化的问题是：州权在联邦权力中有多大？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独立？这个问题主要来自全国的国会如何选举。如果组成人员是由选举人数或选区决定，人口少的州必定完全受到削弱。如果国会代表的是州而不是人口，必要的统一就不能保证，过去邦联的所有弊端将长期存在下去。麦迪逊1831年写道："症结是大州与小州在选举规则上有不同意见。"

较小的州一般认为它们会不得不屈从于其他州。没有大的

---

[10] 雷纳：《杰斐逊生平》，第268页。
[11] 《麦迪逊报告》，第202页。
[12] 同上，第166页。
[13] 同上，第234页。

具体的分歧分裂各州；因为尽管后来商业规范与奴隶问题重新引起这种争论，但利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非常分散，所以后来的争议，除了在原则上外，与以前争议很少有相似之处；当初在总体原则上的争议从此由于涉及其中的巨大利益和热情而加剧了。南卡罗来纳，当时正期望通过移民来迅速扩大223 规模，与代表中央权力的较大的州站在一起；查尔斯·平克尼提出一个宪法草案，它与最终通过的宪法非常相似。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由埃德蒙·伦道夫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它与由新泽西州这样的小州提出的建立在离心或州权原则基础上的方案截然相反。这一方案的目标是确保几个州权的主权，尽可能少地向联邦政府让渡权力。这种感情由贝德福德先生表达出来："难道没有利益差别，没有商业竞争和产品竞争吗？当小州妨碍了处于利益驱使下的雄心勃勃的大州时，它们难道不会碾碎小州？"[14]

梅森上校说："州立法机构应该具备一些手段，来防止中央政府侵犯其权利。在其他部门我们应该尽力为它的自我防卫提供便利。难道我们该扔下这些州，使它们得不到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吗？"[15]

这些发言者或许是优秀或糟糕的政治家，但他们肯定是好的预言家。他们与集权派在人数上大致相同，在能力上集权派较强。当时处于汉密尔顿的有力影响之下的麦迪逊，后来被杰斐逊拉入了民主党的阵营。他当时是联邦党人，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中间立场。一个保留在华盛顿速写记录中的一个便条中写道："麦迪逊先生认为各州的独立是与它们整体的主权完全不相调和的，但又认为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单一共和国既是不适宜

⑭ 《麦迪逊报告》，第173页。

⑮ 同上，第170页。

的也是无法实现的。"[16]

在会议上,他说:"美国用武力来对付不符合宪法程序的州的行为,这就像国会的统治一样,都是行不通的和荒谬的。"[17]

执着的联邦党人走的更远,里德先生说:"对州政府依恋得太多了。我们应该超过它们的这种延续,一个中央政府不久就会把它们全都吞掉,这是必然的。"[18]

这次制宪会议前两年,即1785年,杰伊,这位典型的联邦党人写道:"我的首要希望是看到美国承担起和称得上一个大国角色,它的领土只是为了统治便利而划分为不同的州。" 22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比他的所有同事都走得更远。他没有参加早期的争论,后来他拿出他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特征是:州政府将完全被替代;州长由中央政府任命,中央政府对所有州法律有否决权,总统之职由良好品行的人担任,行政首脑可以终身连选连任,但对个人负责。这非常接近一个选举君主制,他所设计的这种完全君主制式的宪法就是为了摧毁各州的独立。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为讨论的基础。约翰逊说:"人人都赞扬他,但没有一个支持他。"汉密尔顿的演说记录十分不完整,但他本人的草稿、讲演用的便条都保留下来了,其思想的深度与创造性都超过了我们所曾听到或读到的美国人的演讲。他不久离开了费城,缺席会议几个星期,但毫无疑问他演说中的精神大大影响了后来的讨论。"他相信,不改动邦联,可能符合让各州自己拥有主权的目的。……中央政府,不论它是何种形式的,如果它要保留自己,就必须吞掉各州权力。……州权力从任何商

[16] 《威廉斯政治家手册》,第268页。
[17] 《麦迪逊报告》,第171页。
[18] 《麦迪逊报告》,第163页。

业、税收或农业的目的来看都是不必要的。他意识到从属性权威是必要的，必须要有专门的法庭、地方自治组织。……由于州的废除，他认为就不要划分国家与州的立法机构之间的界限，认为前者应该有无限的权威。如果它受限制，各州之间的竞争将逐步推翻它。……他认为，作为州它们应该被废除。但是他承认，留给它们从属的管辖权是必要的。”[19]

这种政策只有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即所有州的权力都在中央政府前消失，宪法制定者对此争论不休的民主原则将被完全克服。但是此时汉密尔顿的希望是不能实现的。民主的原则获得了新力量，制宪会议的精神没能长久下去，一个强大的联邦权威是他倡导的观点与体制的最大危险。它会形成民粹意志而没有阻碍，构成一个专断权力机构而不是防范它的安全屏障。在汉密尔顿的体系内存在着根本的错误与矛盾。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完美的，但他所用来实现它的手段根本是错的，必然要毁掉它们所服务的事业。为了给美国一个最好的政府，摧毁或忽视现存的权威是必要的。人民要回到政治的自然状态之中，不管已经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人民要执掌起原属于合法统治者的权力，在这个权力下有一个合乎宪法的管理者。不必要用现实去迎合理想，它们要求为这一新的设想贡献一切。在这样一个方案生效前，所有政治权利、权威和权力必须归还大众。对最保守和最反民主的政府来说，这就是最革命的基础。这些反面意见都是马里兰司法部长路德·马丁提出的，他极力反对与各州独立相悖的所有方案。

“他相信，各州的人民已经赋予了他们的立法机构以权力，在其政府没有解体情况下是不会收回的。……求助于民众来批

[19] 《麦迪逊报告》，第201、212页。

准一个新政府将使人民回到自然状态之中；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州政府的解体；没有那些人民把州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人的同意，人民就无权做到这一点。”[20] 在他对马里兰制宪会议汇报宪法产生的程序的报告中，他说：“如果我们违背我们所受托的使命，认为自己是建筑大师，骄傲得不能修改我们最初的政府，而是彻底毁掉它，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那么短期内社会就会发现这个新体系与旧体系一样是有缺陷的，恐怕缺陷更多。如果制宪会议会再一次认为是必要的，如果这里的人们，按照同样原则行事，不是去改正这些缺点，而是彻底地废除它，并推出第三个体系，不久又发现没有过去的两个好；这样我们总是使政府处于更新之中，总是受到一个得不到改正的不完美体系之缺陷的困扰。”[21] 226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领导下，联邦党人为最坚定和最明智的目标，鼓吹着今后对美国至关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赋予了民主党一个无法抵御的工具和后来是无法抵御的诱惑；而马丁却支持一个实际上是保守得多的政策，虽然他的观点是较革命的，并且引证像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这样的政治权威作家。这个争论，虽然实质上与后来毁了美国的那个争论一样，但形式上以及后来的影响却与之完全不同，争论各方的立场随着其利益与原则占主导地位都发生了逆转。这场宪法辩论的结果是各州作为一个单位在参议院中成为代表，人民根据其人数在众议院中代表。这是三项重大妥协中的第一项。其他两项是：商业管理的立法权属于中央权力，奴隶贸易仅再被容忍20年。在这两个问题上，即商业管理权与奴隶制延长上，

---

[20] 《麦迪逊报告》，第218、248页。

[21] 艾略特：《辩论》，第1卷，第350页。

利益后来变得更加分化，而且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不时使美国的存续发生危机。杰伊一开始还没有被觉察到，当时还写道："上帝乐于赐予这个连在一起的国家一个团结的民族；这个民族来自同一的祖先，操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系于同样的政府原则之下，具有非常相似的风俗习惯。"[22] 所有这些维系国家的契约的削弱逐步带来了灾难，麦迪逊在同一本书的其他部分对这些灾难做了描述。

"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在形成壮大，并且使之划分成不同阶级，受不同的情感与观点刺激。管理这些多样的但又是相互交叉的利益集团构成了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会把党派精神与竞争带到政府的必要和日常的活动中去。……当多数人卷入竞争之中，民众政府的形式能使之为了统治利益与感情而牺牲公共利益与其他公民的权利。……一个共和国最伟大之处不仅在于能保护社会不受其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能保护其一部分成员免受另一部分成员的不公正。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在一种共同利益下联合起来，少数人的利益就没有了保障。只有两种方法可以防止这种弊端：一是在共同体中创造一种独立多数的意志，也就是独立于社会的意志；二是(如果不是难以做到的话)让在社会中包容许多不同特点的公民以使多数的不公正的联合极不可能，在一个自由政府里，保障公民权必须与保障宗教权一样。在一种情况下，它取决于利益多元化，在另一种情况下，取决于派别的多样化。"[23] 麦迪逊通过推荐它的原因和他拼命表明的观点好像为在新宪法中

227

㉒ 《联邦党人文集》，第2页。

㉓ 《联邦党人文集》，第10、51页。

建立保障提出了一种十分荒唐的理由。汉密尔顿一直虔诚地致力于建立一种权利保障机制，麦迪逊认为这是专属于君主制的，一种不应该是多数派工具的权威。“在一个共同体中有一种永久的意志是不可或缺的。……建立的原则主要就是这个，即必须要有一个永久的意志。……政府中应该存在可以抵抗民众潮流的原则。”[24]

这正是法官斯托里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说：“我要说在一个共和制政府中基本的真理是：少数有不可争议的和不可分离的权利，多数不是一切，少数不是一无所有，人们不能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韦伯斯特也有同感，但他对现实采取了乐观的观点，他说：“另一个原则是人民经常要自我限制，这同样也是真实的和明确的，根据我的判断，这同样也是重要的。他们要为自己的权力设定限制。他们要进行选择来保证他们所建立起来的防范多数派突然冲动的制度。”[25] 228

钱宁的观点更接近这个真理，他写道：“多数统治的原则作为一种感悟是具有多面性的，并且他们从没有想到这一原则在实际过程中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修正，这一原则的应用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其他原则的约束。”[26]

事实上，应把法律置于人民的随意裁决意志之上，并阻止其成为主权，这样的条件是完全缺乏的，这导致参加这次会议的伟大的政治家对他们工作成功的永久性感到绝望。杰斐逊告诉我们，华盛顿也是如此，“华盛顿对我们政府的持久性没有坚定的

---

[24] 《汉密尔顿著作集》，第2卷，第414、415页。

[25] 同上，第4卷，第225页。

[26] 《回忆录》，第417页。

信心。华盛顿在这样的信念影响下，认为我们最后必须制定出类似于英国宪法那样的东西。”

汉密尔顿，因其作品比任何人对宪法的制定贡献都大，在这次制宪会议上宣称：“没有什么人的意见比他本人和我更远离那种方案。”他解释他对已经获得某种保障机制的看法：“先生们说，我们需要从民主中被挽救，但提出什么手段了？一个民选的议会要受到一个民选的参议院制约，而这两者都要受到一个民选大法官的制约。”[27]

汉密尔顿说：“一个大而组织良好的共和国与无政府的共和国相比，很少会出于别的理由丧失自由。蔑视法律则是通往这一状态的捷径。……对宪法的神圣尊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是一个自由政府永恒能量之所在。……政府必须要用的工具要么是法律的权威，要么是强制。如果第一个被摧毁了，后一个就要取而代之，当强制成为政府常用的工具时，自由就由此终结了。”[28]

他的预见也许集中在下面的文字中：“一个好的政府当局应赢得人民的信心和感情，能使政府比起一个拟议的似乎承诺建立伟大国家的宪法获得更大的持久性。它可能彻底战胜州政府，把大州划分为小州，并使之完全附属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后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治权力范围之争，大州在这种权力之争中将导致联邦解体。毕竟，这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最坏之处在于，中央政府严重依赖于各州的立法机构，严重受其偏见的约束，为使其开心而过分地巴结它们；各州把一切权力都揽在手中，不断侵犯中央权威，直到联邦被削弱和解体。”[29]

229

---

[27] 《汉密尔顿著作集》，第2卷，第415页

[28] 同上，第7卷，第164页。

[29] 同上，第2卷，第421、450页。

结果已经证实汉密尔顿担心的正确性，后来的事态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曾极力与之斗争的民主党人观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迅速获得了支持。杰斐逊，这位在独立宣言（这是他的作品）时期拥有与卢梭和潘恩相似的观点，一位在抽象人权中追求自由源泉的人，从法国回来后，满脑子是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教义。当亚当斯竞选总统失败后，他把这些原则带到了权力之中，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性质。当联邦党人解释与执行宪法时，即华盛顿和亚当斯执政时期，行政首脑的权力正像汉密尔顿打算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优于民众意志的。面对这种优势，州立法机构是惟一的平衡力，并且相应地民主党——杰斐逊的产物，也在极力保护这种权力作为把权力赋予人民的一种手段。当杰斐逊当选总统后，恰恰是他拒绝州权控制行政首脑，这与直接人民主权的理论显然构成了矛盾，而实际是与过去的行政优先相一致的。对于总统作为一个具有决断力的权力代表，他承认不对其权力行使有什么限制。他使自己受制于公意，即使违背其观点他也限制自己遵从于人民意见，不允许其他对人民权力的抵制。他充当多数派无望的工具，少数派的专制统治者，但又被剥夺了自由的意志。

就这样一种革命原则，托克维尔说："它所建立的政府更加脆弱，的确，但又比它所推翻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强大百倍；脆弱和强大基于同样的原因。"[30] 230

因此，杰斐逊坚定地反对任何一种反对或限制人民主权意志的权威，特别是州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谈到法官独立行事的情形，希尔德雷斯说："杰斐逊对于此种事件感到非常恼怒，这的确有助于确定他强烈的反法官与法庭的偏见。对他来说，它

---

[30]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3页。

们，作为联邦党人手中的专制工具和对他行使权力的障碍，是两个仇视的目标。"[31]

杰斐逊的政府观包含在一篇论文中，该文印在他的雷纳生平[32]之中。"政府只有体现人民的意志，执行人民的意志才是共和制的。……每一代都不受前一代的束缚，因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与以前不同了。他们，与其前辈一样，有权力为自己选择他们认为是最能促进其幸福的政府形式。……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利益，每隔19或20年，宪法都应该提供一次实现这种目的的机会。……死人没有权利。……物质世界和物质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目前活着的这一代的居民。……多数有权力委派参加一个制宪会议的代表并制定出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宪法。……独立只能委托给人民大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由于这些信条，杰斐逊推翻了美国的共和主义，其后来的影响达到了推翻共和国本身。

1801年希尔德雷斯是这样描绘在杰斐逊当权时两种体系之争的："从党的路线明确确定时起，反对派一直拥有人数上的多数；反对它的只有具有超群能力、机智和经验技巧的联邦党人，联邦党人还得到具有巨大和令人尊敬的名望和很大影响力的华盛顿的支持；这使双方可以进行8年艰苦而难以预料的斗争。联邦党，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领导下，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经验、谨慎、实践智慧、纪律、保守的理智和天性。反对派在杰斐逊领导下，表现的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意愿、热忱而不切实际的理论，特别是它的激情、爱憎以及对约束的不耐烦。联邦党人在窄小的地区里拥有力量，在那里集中的人口已经产生和有助于维持复杂的体制，那里存在着对社会秩序的尊重，这按照与此相

231

[30] 《美国史》，第7卷，第70页
[32] 《杰斐逊生平》，第378页

联系人口的比例更有绝对的存在必要。反对派的极端民主思想在那些较广袤地区占主导地位。在这些地区人口分散，个人被赋予对奴隶家庭的专制权威，这些都使得社会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33]

在多数派没有责任、少数派没有权力的原则下，什么事情都可能是合法的，预料会出现一些措施来极其专制地反对联邦的一些局部的权利和利益就在预料之中了，因为对它们没有任何保障与补救。联邦党人充分理解这一点，汉密尔顿 1804 年写道：“杰斐逊的错误观点，和对弗吉尼亚野心的妒忌，并非对这个国家（新英格兰）好的原则只是微不足道的支持，但这些事情将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观点：联邦的解体是有利的。”[34]

杰斐逊已经为这样的危险树立了榜样，在与伯尔上校竞选总统时，他的当选就得益于这些危险。1801 年 2 月 5 日他写信给门罗说：“如果他们能被允许通过这样一个法律，即把政府置于一个官员手中，他们肯定会阻止这场选举。但是我们认为最好公开、坚决而彻底地宣布，这一法律通过之时就是中部各州武装之日，这样侵犯权利的法律那怕只施行一天也不允许。”

不久相关的事件就发生了，在这事件中，杰斐逊把他的原则付诸实施，这大大地加剧了东北部各州的恐惧。由于拿破仑柏林敕令和英国议会条令，杰斐逊决定要求对所有美国船只实行禁运。他给国会送去一封急信，参院经过 4 小时秘密辩论通过了这一提案。众院的辩论也是秘密的，但持续了 7 天，辩论经常延续到夜里，希望禁运能有所区别。这个法案 1807 年 12 月 22 日通过。公众对此没有发表意见，那些受这一措施严重影响的 232

---

[33] 《美国史》，第 7 卷，第 70 页；第 5 卷，第 414 页。

[34] 《汉密尔顿著作集》，第 7 卷，第 852 页。

人非常惊讶，这为政府秘密和果断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突出事例，因为它并不以这些性质著称。

禁运对新英格兰拥有船舶的州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其他州则受影响较小。汉密尔顿说："这个国家的自然状况似乎把它的利益分为了不同的阶级，航海州和非航海州。北方是航海州，南方显然既不拥有航海手段也不拥有航海精神。自然状况的不同自然地产生了利益和尊重对外商贸的观点的不同。"[35]

由此这个法律在某些州激起了义愤。马萨诸塞的昆西在众院宣称："采取措施不让新英格兰人下海，就像不让河流进入大海一样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不相信这种法律合乎宪法。他可能被告之法庭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法庭解决是一回事，在人民面前决定是另一回事。"[36]

即使从司法的观点看制定这种法律也是令人怀疑的。斯托里在这时开始介入公共事务，他说："我一直认为禁运是一个对在宪法下立法权力的极限性法案。它处在宪法的最边缘。"[37]

州权或州的拒绝执行权的原则——后来在南方派手中成为主要工具——此时明显是代表北方提出的。康涅狄格的特朗布尔州长召集州议会开会，会上的开幕辞中，他表明，在十分紧急时期，此时国家的立法已经过多地践踏了州的宪法权力，州有权利与责任"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与中央政府的所谓权力之间介入保护屏。"[38]

他们更进一步，准备退出联邦，做出了后来反对派以相似的理由效法的样板。伦道夫警告行政当局，它们正在重蹈诺思勋

---

[35] 《汉密尔顿著作集》，第7卷，第433页。

[36] 希尔德雷斯：《美国史》，第6卷，第100页。

[37] 《生平》，第1卷，第185页。

[38] 《美国史》，第6卷，第120页。

爵的覆辙。[39]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国会中宣称出现一种退出的决心。"他极力申言禁运再进行下去肯定会受到武力抵制，这种抵制受到州议会的支持，很可能还有州司法机构的支持。……过去几年来他们的目标一直是联邦解体，另建立一个邦联。"20 年后，当亚当斯成为总统后，这项声明的真理性受到了指责。此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南方否认国会仅为东北州独占性利益制定法律的权力，而这时，北方由于利益上得到好处正极力支持联邦当局。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自己口里说的东西，他们反对的原则没有被他们自己所表达确立下来。亚当斯 1828 年 10 月 21 日发表声明，重申了他原先的声明："由于联邦在美国地方法院的神圣裁决中被认为不符合宪法，人民不断地被煽动去反对联邦，一个又一个的陪审团对冒犯联邦的罪犯宣判无罪。分裂联邦在公共媒体中公开地被鼓动，新英格兰各州的制宪代表会议已被酝酿在纽黑文召开。"这一切在他当时写给斯托里的信函中得到确证："我很满意，这种发展不会也不可能产生于新英格兰，这种发展会导致一个直接的反叛。……这里一直在传播马萨诸塞的反叛。我的印象是，秘密团体会煽动反叛，如果他们敢的话；但他们不会成功。……各州间的分裂正在酝酿，但我怀疑公众是否能被大大地激发起来。……我不安地听到马萨诸塞的不满情绪上升到如此高的地步，我担心一小撮野心家们极力煽动联邦解体。……当我感到公共媒体公开地鼓吹诉诸武力冲击着商业的窘困时，我有了担忧。"[40] 234

主要是由于斯托里的影响，禁运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尽管

[39] 《美国史》，第 6 卷，第 117 页。

[40] 《生平》，第 1 卷，第 187 页。

总统对此非常不愿意和强烈反对。他说："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假共和党人斯托里。"[41] 对此，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的斯托里说："在杰斐逊先生的眼里，我和任何人一样当然肯定是一个假共和党人，是一个敢于怀疑他一贯正确的人。"[42] 实际上，杰斐逊指的是，一个人如果让少数派的利益凌驾于多数派意愿之上就不是一个共和党人。他的虔诚崇拜者，塔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公正而明确描述了他的政策："如果他长期违背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商业阶层的意愿和利益，禁运政策似乎与这里声称的自决的价值相抵触。那么回答是，他在此要实现的是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这里社会的部分会受到损伤，这种损伤对一个共和主义的政府所具有的伟大价值——多数人的意志必须占主导地位——必然是相对不重要的。"[43]

我们已经看到在禁运事件上，一旦按这种民主理论行事，就会相应地引发少数派退出权利，民主的原则被迫让步。但是退出不是宪法中的理论，而是一个针对宪法中邪恶理论的补救。一个更健全的理论本应避免民主党人的专制和退出的必要性。下一个重大的争论也出现在这个方面。它展现了制定一个防范政府专断意志的法律的尝试，一个避开多数专制的尝试，和一种并不比这种弊病更好的补救。汉密尔顿已经勾画了这种理想："应该特别关注的是思考国家与州政府之间的平衡，因为它具有至高无尚的重要性。它对人民构成了双重保护。如果一个政府侵犯了人民的利益，人民会在另一个政府中找到有力的保护。235 的确，两者都会由于永远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某种竞争而不能超

[41] 《通信集》，第 4 卷，第 148 页
[42] 《生平》，第 1 卷，第 185 页。
[43] 《杰斐逊生平》，第 322 页。

越宪法的限制。”[44] 这也是迪金森先生 1787 年在制宪会议谈话中所期待的，他说：“稳定的一个源泉是立法的双重性。国家分为不同的州构成了稳定的另一个主要来源。”[45]

与英国的战争，以及随后的与英国的长期商业中断，建立了美国制造业利益的基础。制造业开始在宾夕法尼亚生长，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则较慢。1816 年关税被提了出来，但保护主义的色彩不重，因为有必要使战时的禁令适用于和平时代。它与其说是保护新兴工业不如说是便利于过渡期；这种利益还很微弱，还不太受关税的影响，但当时马萨诸塞的众议员韦伯斯特投了反对票。它是由克莱与南卡罗来纳的政治家朗兹和卡尔霍恩联合提出的，这场投票后来却成了攻击两人的最好的武器。在以后的数年内，棉花种植业和制造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使南方与北方的巨大利益分歧发展到了一个的新层面。汉密尔顿早就说过：“财富的分歧在我们中已经很大了。商业与工业还在加剧这种分歧。你们的政府必须应付这些事态，否则，随着时间的发展，分歧的增加将毁了你们的体制。”[46]

新英格兰制造商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保护他们的产品的好处。在对塞伦国际贸易批发商人的回忆中，斯托里 1820 年写道：“再明确不过的是，许多制造商和他们的朋友，通过建立在利益政策、或错误热情、或非常短视观点基础上的荒谬声明，正在试图根除我们税收政策的一些原则。……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外国产品，我们就不能有理由认为外国会接受我们的原材料。……当他们不是卖主我们就不能迫使他们成为买主，或当 236

[44] 《著作集》，第 2 卷，第 444 页。
[45] 《麦迪逊辩论》，第 148 页。
[46] 艾略特：《辩论》，第 1 卷，第 450 页。

他们不能用他们的纺织品付款时，我们亦不能强迫他们消费我们的棉花。我们可能迫使他们用西印度群岛、或巴西、或东印度的棉花。”大约相同的时间，1820 年 5 月 20 日，他就同一问题写信给斯托厄尔男爵说：“我们也正在成为一个制造工业国；我坦率承认，但我并不对在我国人为地去刺激建立这些工业的做法感到十分高兴。……你们大型的制造业城市——显然是大恶之源和政治动荡之源——的榜样没有为政治家、或爱国者们、或自由的朋友们提供十分适宜的思考。”[47]

1824 年制造商获得了新的关税，1828 年国会又以多数通过新的关税，1832 年又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新的关税。正是 1828 年的关税，提出了对进口品平均征收价值近 50% 的关税，它对宪法在最重要的立场观点上影响很深。卡尔霍恩先生的传记作家说：“就我们的国内事务而言，在从那时起我们政治史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可能追溯到它。”[48]

这时南方与北方的利益是完全不同了。南方农产品充裕，欧洲对其产品有巨大需求，而北方的工业由于无法与欧洲制造商竞争，企图取得国内市场的垄断。与英国的相同争论过程不同，农业生产者(至少是棉花种植者)渴望自由贸易，因为他们是出口者；制造商希望保护，因为他们不能应付竞争。卡尔霍恩说：“这个问题事实上是这个国家出口与非出口利益之间的问题。”出口利益要求最大限度的进口自由，以便不在劣势下进行物物交换。“他肯定不清楚商业的首要原则、欧洲的政策，特别是英国的政策，他没有看到这样大规模的贸易，只能以易货贸易为基础，如果它不能推行，就不可能长期地被容忍。……我们伟

[47] 《生平》，第 1 卷，第 385 页。
[48] 《卡尔霍恩生平》，第 34 页。

大的曾经繁荣的农业的最后硕果肯定要在这场冲突中被消灭。首先，我们将依赖国内市场，它不能消费我们四分之一的产品；由于不能像自由贸易所做的那样把产品供给世界，我们应放弃我们现有种植物的四分之三，接受制造商们——那时的政策将因全部占有我们的市场而告成功——可能留下的剩余产品。”[49] 这似乎应验了朗兹先生的这一预言，此人40年前在南卡罗来纳抵御新宪法，他宣称：“当这个新宪法被接纳时，南方州的太阳就会落下，再也不会升起。……北方州的利益将会占统治地位，从而使我们失去在共和国名义下的任何保护。”[50] 科贝特当时比任何英国人都了解美国，在其1833年《政治纪事》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些敌对利益的立场：“所有南部州和西部州，从商业上说，都与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利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与北部没有这种联系，没有什么纽带把它们维系在一起，只有政治本性除外。……这里的利益是一种天然划分，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做任何事都不能阻止。国会对英国制造品所课的重税正好与它一年从南部和西部州拿走给予北方州的数百万相等。”[51]

在英国，贸易保护以牺牲一部分人口为代价而使另一部分人口受益；在美国为了国家一部分地区的利益而使其他地区的利益受损。卡尔霍恩说：“政府亵渎其崇高的职责，成为社会一部分人的代理者，在保护的名义下去索取另一部分人的贡品。”[52]

这样的争论也在同一州内对立阶层中进行，争斗的暴力可

[49]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6卷，第12页。
[50] 艾略特：《辩论》，第4卷，第272页。
[51] 《政治著作选》，第6卷，第662页。
[52]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4卷，第181页

能使政府处于危险之中，但他们没有使州分裂。但当被压迫的一方是一个主权州时，暴力变得越大，越会更敏锐地感觉到不公正，抵制手段越会变得合法化和合乎宪法。

南方有理由最大限度地抵制对它们形成很大伤害的措施，这既符合它们的政治利益也符合它们的金融利益。就关税而言，它使它们贫困，却使政府富了，用大量的黄金充实国库。南方的政治家总是反对中央权威的支配地位，特别是这个权威提出了使它们遭殃的政策后尤其如此。他们有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它的理由。政府的税收超过了日常的需要而使其手中有了诱惑性和危险性的影响工具。必须想出手段来使用这笔钱，而鼓吹限制贸易的人所采纳的手段是搞公共工程，通过贿赂各州人民，使之支持中央政府。所以保护关税以及国际收支的改善是亨利·克莱领导的政党的政策的关键点，它谋求以州为代价加强联邦。南部反对其政策，认为它损坏它们的利益又不符合宪法。卡尔霍恩在1831年就关税写道："试图掩盖这样的事实是徒劳的：它已经把国家分成两个巨大的地理区域，使它们在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金融上、商业上和工业上，如果不是利益上彼此对立话，至少在观点上是对立的。……这种危险冲突的后果没有到此结束。它不仅在已经阐述的重要问题上分裂成两派，而且在更深和更危险的问题上——保护关税的合乎宪法性和宪法本身的总原则和理论上——也是如此：强州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性，加强这个工具的建设，其他州认为它会把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强大的但不负责的、彻底毁了自由的政府。"[③]"在最关键问题上——美国的工业问题上，它包含几乎每一方的利益——两大派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我们想要自由贸易，他们想要限制；我

---

③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6卷，第77、78页。

们想要温和的税收、政府的俭朴、经济、责任性，严格地把公共资金用于债务的支付和用于宪法授权的目标。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如果通过经验来判断，他们的利益观都是完全相反的。”[34] 1828年他在谈及保护体制时说：“任何一种体制都不能更有效地建立一个金融寡头统治。”这里他又一次得到了科贝特的支持。科贝特在5年后有关美国的著名谈话中说：“在所有寡头政体中，金融寡头体制是最糟糕的一个。”南卡罗来纳率先抵制引人关税保护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投票失败后，它坚定地利用各主权州合乎宪法的权利通过否决来阻止一种对其具体利益构成侵害的全国性立法。卡尔霍恩说：“美国现在比1824年更为分裂，而那时又比1816年更分裂。多数派可能人数上增加了，但反对方，在辩论之外，比起过去更加有决心、更加激昂。过去这种体制只是作为不适宜加以反对，但现在则作为不合法、不平等、不公正和具有压迫性加以反对。过去主要从中央政府寻找缓解，但现在许多被逼绝望的人把其眼光放到了保留着的州主权，把它作为庇护所。”[35]卡尔霍恩此时是美国的副总统，但不在国会中担任职务。保卫宪法理论的工作便移交给了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海恩将军；随之在1830年1月海恩与韦伯斯特之间的一场辩论被美国人认为是美国议会史上最具纪念性的。海恩宣称，他不仅为革命权利斗争，而且在为合乎宪法的抵制而斗争，在回答韦伯斯特的保卫最高权力言论中，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民众的看法，它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因为所有州在这里都有代表，没有任何与多数意志不相一致的东西能占主导，‘多数人统治’据认为是共和主义的一个格言。……如果国会的多数意志要成为这个国

239

[34]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6卷，第31页。

[35] 同上，第80页。

家的最高法律的话，显然宪法是一纸空文，并且已经在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保护少数的权利——上完全无效。……我们之间的全部分歧在于此——先生们要使武力成为所有州与联邦政府间摩擦问题的惟一仲裁者，我要诉诸和平的补救方法。"[56]

两年后卡尔霍恩先生接替海恩担任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新的斗争又开始了。1828年后，弗吉尼亚、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加入到承认州拒绝执行权原则的行列中。当1832年关税被通过后，南卡罗来纳宣布该州将抵制征收关税。卡尔霍恩在参院捍卫这一宣布税法无效的法令，在演说中和文章中为这种拒绝权辩护，声称它具有政治真理的完美性，把现代民主现实与中世纪自由理论与保障结合起来。他说："自由实质包含了理解力的思想——那些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应该受到他们操纵的人的控制，即被统治者应该统治。……任何一个建立在这种赤裸裸的多数统治原则基础上的政府——不论这句格言在适当意义上和适当限制条件下是多么真实——都不能保证甚至一代人的自由。所有的历史都是相同的——暴力、不公正、无政府状态、一个人的政府或一些人的政府（在这种政府中人民寻求庇护是为了逃避多数人的更压制性的专制）相更替，……剥去这个赤裸裸的伪装，问题是我们政府是联邦政府还是邦联政府，是宪法政府还是专制政府；还是一个最终建立州主权坚实基础上的政府，不受限制的多数意志基础上的政府；还是一种同与所有其他不受限制的政府一样的，不公正、暴力和犯罪必然最终占主导的政府。永远不要忘记：当多数人统治没有限制时，少数就是臣民。……与一个联邦组织不能使各地区相互尊重权利相比，投票权更不能必然地使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　它要求双方统一

240

[56] 艾略特：《辩论》，第4卷，第498页。

的行动去阻止权力的滥用和压制，去真正地建立一个宪法政府。两者中任何一个被取代，事实上——不论它的理论是什么——都会把政府变成一个专制的政府。”[52]

在研究政府的论文中，卡尔霍恩提出了他的宪法理论，这个理论非常深刻，并且非常适用于今天的政治，遗憾的是我们在此只能通过一点摘要来让读者对其见解略见一斑。

“为了压制暴力与保持秩序，政府必须要拥有权力，但权力不可能自我行使。权力必须由人来行使，但任何人都一样，都擅长于处理个人而不是社会感情。因此为了阻止对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和压制而授予的权力，如果不受监督，将会被行使它们的人变成压迫社会其余部分人的工具。宪法——不论它叫什么名称——在最广泛意义上讲，适用于政府时，它所要做的是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宪法起源于我们人性中相同的原则，宪法对于政府就像政府对于社会一样；没有了政府，确定政府存在的目的就会消失，同样没有了宪法，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政府存在的目的也会消失。……宪法是人的设计，而政府是神意的安排……权力只能受权力限制，倾向只能受倾向的抵消……我称普选权是不可或缺的首要原则，因为假设像许多人所认为的一样，本身足以建立一个宪法政府，这是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错误。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建立宪法政府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为什么在这些少数中只有很小的部分长期存在下去，这种错误观点可以找到其原因之一。……建立宪法政府远远是不够的——不论它受到怎样的保护，不论人民是多么开明——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帮助，这会使政府像在少数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一样专制，至少具有同样强的压制与权力滥用的倾向。……过程可

241

52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6卷，第32页。

能是慢的，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形成一个严密的、有组织的多数；但甚至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筹划，只要保证那个原则或我们的天性——政府本身起源于此——有效运作，它就会适时地形成。……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有时会像没有普选权下的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一样有压制和滥用权力的倾向。凡是可用来说明为什么后者会滥用权力的理由，没有一条不同样适用于前者。……少数有时像在贵族统治或君主制下的臣民那样成为被统治者或臣民。……掌握权力时间的长短或不确定性并不能抵消政府内在的压制与滥用权力的倾向。相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加之在这种政府下总是出现在政党变更之前的暴力的党派之争，往往是加强而不是减少压制的倾向。……显然，必须要有一种准备，防止任何一个利益或利益群体用政府权力以其他利益为代价来扩充自己。……这也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实现，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政府组织——如果必要的话，通过社会的组织——才能实现，即通过政府的分权，通过适当的机构，给予各阶层或各个利益集团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有同等的裁定权，或给予他们在执行法律时有否决权。……这样的组织，加上投票权事实上构成了宪法政府的组成要素。……一方面，通过使得制定与执行法律的人对其管理者负责，能防止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另一方面，通过使得任何一种利益或利益组合，或一个阶级，或一种秩序，或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可能取得独占性控制，能防止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正是这种消极的权力，即防止或阻止政府行为的权力——不论它被称之为否决权、异议权、拒绝执行权或权力的制衡——事实上构成了宪法。……正是消极权构成了宪法，积极权构成了政府……由此必然推导出：多数是政府的惟一控制者则没有宪政；因为宪法包含着约束与限制。……因此多数，如果没有了具有同等权力的裁决者，必然在任何情况

242

下都会形成专制政府。宪法政府,不论什么形式,它们之间在结构上和性质上与本阶级的专制政府相比更为相似。……因此,政府之间——不论是一个人的政府,还是少数的政府或多数的政府——最大和最广泛的区别是,宪法政府与专制政府的区别。有共同裁决权的政府比多数的政府——它强烈地展现了它们的更广泛的民粹性质——具有的其他优点是,它们放心地承认更大范围的普选权 它可能使这样的政府安全地延展到普遍政治参与,即扩大到除个别之外的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但多数的普选权,如果它最终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社会就不可能不受较无知或依附群体的控制。因为,随着社会变得人口众多、富裕、高雅和高度文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会变得更加突出,无知和附依者的人数会超过其他社会层次的人数。……有共同裁决权的政府往往是要把社会统一,让利益永远多元化或对立;而多数派的政府往往(由于把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各部分都有相同的利益)必然通过运作,把社会分为两个敌对的部分,双方在合法的名义下进行永无休止的对抗。……把平等理解为自由的本质要素,将会毁掉自由与进步。……正是这种在前进过程中高低阶层之间的条件不平等才对前者保持他们的地位,对后者提高其有强烈的促进作用。……这对进步是一个极大的促进。……那个巨大而危险的错误来自于这个流行的观点:人生而自由、平等,没有什么比起它来更虚幻,更荒谬。在一个绝对的民主制中,多数与少数之间党派冲突……很少会以妥协而告终。处于反对地位的少数的目标是要把多数驱逐出权力,多数是要保持住权力。这是一场双方之间的为整体而进行的斗争,一场必须决定谁是执政党谁是服从党的斗争。……因此,加上其他的原因,贵族制与君主制比起专制的民粹政府更容易采

243

取一种宪法的形式。"[38]

这是在卡尔霍恩生前的最后一年写的，出版于他死后；但其思想——尽管是在一连串的关于奴隶制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在早期的使州拒绝执行权发展退出联邦的斗争中，在1828年到1833年的关税之争中，支配着他。许多与他观点不同的人都广泛认为，他的抗争由于北方自私的、无所顾忌的政策而变得有道理了。美国政治家中的最有成就的学者，后来当过大律师长的勒加莱，1833年骚动的高潮中，在南卡罗来纳7月4日所作演说中谈到："政策的制定者们间接地对事态的这种可悲状态负责，对所有的产生于它的后果负责。他们犯有不可饶恕的侵害国家罪。他们发现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他们就使之分裂。他们发现各州的联盟是一个热烈的仁爱与尊重宗教的产物，他们甚至就使国家的作用变成了开明人士之间争论的目标。……我对税收负担在目前还不繁荣的州和人民中激起的愤怒并不奇怪。……伟大的国家不可能在统一的政府下被专制的权力结合在任何一种关税保护体制之下，如果国家任何一部分为了争取永久的特权与保护而反对另一部分的话。"[39]

布朗森，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记者，也是卡尔霍恩忠实的党徒，1844年为卡尔霍恩竞选总统鼓动。我们相信，如果他当选的话，布朗森会入阁。在他最早期为著名的《评论》所写的大量文章中的一篇中，他写道："即使卡尔霍恩先生的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是真正的联邦宪法的理论，但也是不充分的。……事实上它没有阻止联邦政府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措施。南卡罗来纳1833年迫使其做了妥协；但1842年这种可憎的政策又复活了，

[38]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1卷，第7—83页

[39] 《勒加莱著作集》，第1卷，第272页。

现在成功地执行着，并没有一个州再一次尝试州的异议权。……州，如果它认为是适当的，有主权在它的领域把这个可憎的关税抛在一边，禁止其臣民或公民遵守它。……契约中的各方是平等的，通常没有仲裁者，事实上，每一方都是自己判断是否违背契约，判断如何和怎样弥补。"[60]

杰克逊总统十分反感卡尔霍恩的理论和人品。他曾发誓要控告他犯叛国罪，并把他吊死在比海曼的绞架还高的绞架上。他的副总统关于州拒绝执行权的一个声明在深夜传到他那里时，在一阵狂喜之下，他把政府的法律官员从床上叫了起来，询问最终这事是否够得上绞死。他发表声明谴责州拒绝权原则和南卡罗来纳的行为，这个声明是由利文斯顿起草的，此人是国务卿，在立法史上由于是路易斯安那法典的制定者而闻名。韦伯斯特，当时的第一流的演说家，尽管当时不是行政当局的支持者，在参院中回击了卡尔霍恩；他从寓所中被叫来，这次乘的是总统的马车去了议会。他的这次演说被认为是他的最好的演说，并被联邦的朋友认为是对州权带有总结性的反击。麦迪逊此时快结束其长期的职业生涯，写信向韦伯斯特表示祝贺，但语气中带有一种警告。他写道："演说击碎了州拒绝权，并且必然促进了抛弃退出联邦的主张。但由于把随意退出与由于不可容忍的压迫性退出混淆在一起，这种主张避开了问题。"

退出只是异议权的选择。异议权原则在宪法上站不住脚，剥夺了南方惟一可能的免受不断增加的多数专制的保护，因为州拒绝权的失败此时伴随着纯粹民主观的最终胜利；少数派的权利从此没有了保障，多派的权力没有了约束。卡尔霍恩精心炮制的理论是真诚的，它试图从宪法的缺陷中挽救联盟。根据

245

[60] 《评论季刊》，第2卷，第522页。

宪法的文字，探究联盟在法律上是否正确是徒劳的，因为从杰斐逊时代以来联盟已经增大了，它肯定与宪法的精神存在着矛盾。韦伯斯特或许是这个法律最忠实的解释者；卡尔霍恩是联邦的真正保护者。即使联邦主义者做出危险的准入许可，有些情况下，在没有法律昭示的补救条件下，退出是完全合理的。利文斯顿说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法案实际上达不到提到最高法院的多数，从州的观点看，如果这一法案证明了退出联盟冒险合理的话，这种最后的极端方式可能立即会被采用。"[61]

克莱的传记作者展示州拒绝权与退出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他没有看到一个权利不是另一个权利结果而是替代。他写道："州拒绝权最初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仅限于州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拒绝或使联邦的法律无效，而没有考虑绝对的独立。然而，既然州拒绝权在实际过程中很难阻止退出，这个最初而有限意义的原则的倡导者以后就逐步大胆地提出退出权。"[62]

246

实际上，尽管南卡罗来纳的要求被拒绝，但它胜利了。关税提案被撤销，克莱这个主要的保护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妥协法案。由于它被认为做出了巨大让步，卡尔霍恩接受了；虽然韦伯斯特反对，但这个法案通过了。然而，糟糕的日子，即最终的危机，只是被推迟了。国家的精神已经选择了道路，它不可能永久地受到阻碍；必然有新的机会确认无所不在的民众意志，展现行政当局的对它的彻底屈服。[63]新的争论已经开始了，从此笼罩着美国，并使 1828 年至 1833 年间冲击美国的争论失色。商业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经济对抗和北方扩大其优势的决心，在《克莱

---

[61] 艾略特：《辩论》，第 4 卷，第 519 页。

[62] 考尔顿：《克莱生平》，第 5 卷，第 392 页。

[63] Xenophon，*Athen*. *Repb*.，i，8.

妥协法案》到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期间没有减弱；1837年在杰克逊所做的告别演说中，他把这一与他名字相联系的时期描绘成阴郁和沮丧的。"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断地努力对商业抽取重税，增加超过公共实际需要的财政收入；国家已经感到了它们共同影响所造成的不公正的后果。他们成功地征收对社会中的农业和劳动阶级具有巨大的压迫性影响的关税，创造了一个不可能在国会授权范围内有效使用的财政收入；为了笼住人民，这个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关税体系，过度地改善了国家计划，各方面都发展到了乱花资金、贿买支持的地步。……由于它的存在，获取过度的收入和使你的税收负担超过国家的经济需要的方案至今还没有被放弃。各种为了征收高关税和建立充盈的国库，利益集团聚在一起，其势力是太强了，而且利益也太大了，不会在斗争中投降。那些从事大型制造业的公司与富人渴望有高关税来增加他们的收益。有所打算的政客们支持它，以讨好他们，获得大量的资金，从而能在其他地区购买影响。……由于你们之中和内部的贪婪、腐败、令人失望的野心造成了内讧和危害了自由。"[14]

247

杰克逊本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可憎东西负有一定责任。开始于杰斐逊时期的民主化倾向在杰克逊总统时期达到了顶峰。只要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显示这方面的重大变化。纯粹的民主要求尽快地进行官员轮换，不要求有长期的经历(雅典就是这样广泛地分配官职)，因为每个人对权力与利益拥有同样的权利，据认为同样有资格胜任之，绝大多数公民应该轮流参加进行政当局。这会减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国家与社会的差别，增加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性。起初这种做法没有被考虑。

14 《政治家手册》，第953—960页。

华盛顿8年只解除8名官员的职务，亚当斯只解除10名，麦迪逊是5名，门罗是9名，约翰·昆西·亚当斯因为具体的不胜任原因只解除2人的官职。杰斐逊天然地赞成轮流当官，但当他解除35名官员的职务以为他的支持者提供空缺时，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杰克逊继任小亚当斯职务后，立即做出176个职务调整，在其当政的第一年内有491个邮政局局长失去了职务。埃弗里特先生说得真切："决定性地削弱对宪法限制的尊重可能是这一时期普遍的政治倾向。一方面行政当局自主决定的混乱思想战胜了宪法的解释，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民主权解释，即由绝对多数的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代表，也压倒了宪法的解释。"[65]

在托克维尔访问时期，他得到了下面的判断："当一个人或政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他能向谁求助？是公众舆论？正是它形成了多数。是立法机构？它代表多数，且盲目地服从于它。是行政当局？它由多数任命，是它的被动工具。是政府军队？它只是武装起来的多数。是陪审团？它是一个被赋予了宣判权的多数。法官在美国的一些州是由多数选举出来的。因此，不论你受到的对待是多么不公正、不合理，你都得服从它们。"[66]一些杰出的美国人[67]非常同意托克维尔对事实的批评，但这种事实很久以前已经被人们认识到了。1818年斯托里写道："一种新人正在崛起并统治着国家；他们都追逐受大众欢迎的人、具有野心的人、不注重当官的荣誉而注重当官好处的

248

[65] 《折伯斯特回忆录》，第101页。

[66] 《美国的民主》，第2卷，第7章。

[67] 在斯托里信札中有一段关于托克维尔这部名著的引人注目的文字："托克维尔的著作在海外有影响，部分是由于他们没有发现，他从美国人的作品中借用了大量的思想，只有一点点是来自于他的观察。他的主要素材都可以在《联邦人文集》和斯托里的《评论》中发现。"（《斯托里生平》，第2卷，第330页。）

人——没有什么原则的鼓惑人心者，他们不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更多地追求暂时而粗俗的掌声。最大的危险是这些人会盗取大众的好感而统治国家；如果这样，我们还可能活着看到我们最好的制度灰飞烟灭。"[68]

下面是他的《宪法评论》的结语："忧人的各种主张的影响——它们不止一次地在制宪会议中使联盟濒于分裂——已经大大地加强了其集中性和能力……如果在这些情况下，美国一旦分裂，不可能有一个能涵盖到整个国家的宪法。我们将分裂成为几个国家或邦联，成为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者，彼此骄傲得容不得伤害，气量小得锱铢必较。"1834 年 2 月 18 日，他谈到了杰克逊行政当局时写道："我对这样的不能掩盖的事实感到羞耻：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个人的专制统治之下。"几年后，1837 年 11 月 3 日，他告诉一直对美国怀有好感的马丁诺小姐说："你忽视了腐败的任人惟亲的可怕影响，和官员任命上独断专行制度，它们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是毁灭我们公民自由的保障的威胁。……我想你应知道，共和制可能也有专制主义，它和任何形式的君主制中专制主义一样是难以抵御的和具有破坏性的。"

249

南方主要的政治家与这位新英格兰的法官想法一样。卡尔霍恩说："我不关心什么形式的政府；如果政府是专制的，不论它不受限制地是个人的，还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它都一文不值。……当法律破坏了两派之间的平衡，政府的行为就会导致政府性质的变化，把该体系的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曾经是宪法的联邦共和国事实上就会变成像俄国那样的寡头专制政府，变成和任何专制政府一样越来越专横……政府权力的

[68] 《生平》，第 1 卷，第 311 页。

不断集中，以及北方对所有政府部分的控制不断加强，都适用于这种状况。这使许多人有一个印象，政府要做什么是没有什么约束的。"[69] 同一时期，或许时间更早一点，科贝特写道："我在宾夕法尼亚共和党政府下生活了8年，并且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腐败和最专制的政府……由于看穿了共和党政府，我相信它的名字只是徒有其表。"[70] 钱宁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即欧洲自由主义对美国共和主义的影响，他说："自从革命以来，我们有许多人，他们需要的是对自由体制的信念，却看到了在我们几乎不受限制的公民普选权发展中存在着动荡和毁灭的隐患。当鼓惑人心者成功影响了愚昧的多数，并获得官职和权力时，这种反民众的党派努力就上升了；而在好的时代，它的势力就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欧洲自由派的错误和犯罪而加剧的。我在各种场合都强烈反对这种观念：劳动阶级不适合做政治权力的保管人。然而，我承认，作为真理我要说，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公民普选权发展得太快了。"[71]

1841年他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后来证明是致命的危险。他说："我们体制面临的巨大危险——它已经使最保守分子感到了恐慌——恐怕史密斯先生还没有注意到它。它是党政组织的危险，这种组织非常微妙和强大，可以使少数领导垄断政府，并保证行政权力像君主制那样几乎定期地传承下去。……这种危险毫无疑问是确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得既要提防专制，同时也要甚至更要提防无政府状态。"[72] 在这个问题上，布朗森博士的话是最强烈的，也是最具有权威的。他说："我们的政府从其起源

250

[69] 《卡尔霍恩著作集》，第4卷，第351、550、553页。

[70] 同上，第6卷，第683页。

[71] 《钱宁回忆录》，第418、419页。

[72] 《钱宁回忆录》，第421页。

和宪法形式上都不是民主的,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一个有限的选举的寡头专制政府。……我们父辈建立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只徒留虚名。它的原始特征已经或正在快速消失。除了规定了选举的方式、多数统治、官职的分配和任期、政府功能的集中与分散之外,宪法成为了一个僵死的条文。从1828年起它实际上已经或现在实质变成一个纯民主制,没有有效的宪法,只有暂时的多数意志。……宪法实际上已被废除,并且我们的政府从目的上讲,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完全成为一个纯民主制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不遵从暂时控制它的利益集团。"[39] 在他改变信仰前不久,他写道:"看看我们开始是怎样,现在是怎样,有理由怀疑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像我们一样如此迅速地失去了坚定而严格的美德,失去了崇高而果敢的对稳定和建立明智的民选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重要的行为准则。……我国已经确定的政府秩序不是民主的;任何一种按其解释的原则来进行民主的尝试都是一种革命中才有的尝试,都将会受到抵制。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种政府秩序,如果它能称之为秩序(尽管现在不存在)的话,在这种秩序下,不论民众处于何种使之组成国家的权威下,民众总体上被认为是国家所有合法权力的来源。"[40]

民主专制主义者在关税问题上反对州权,并引发我们已经看到的不愉快的结果和悲叹。他们已经关注另一个检验其原则的议题、废奴问题,这个开始时是从属性的,从属于保护关税问题,当其他问题不引人注意时进入了前台,但暂时地由于《妥协法案》而搁置。它的作用是唤起对革命的更大的同情,而非在利 251

---

[39] 布朗森:《评论季刊》,第2卷(1844),第515、523页。

[40] 布朗森:《评论季刊》,第1卷,第84、19页。

润计较中获胜。一种慈善外表修饰了贪婪。但两种动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一个是某种借口，并且有助于掩饰另一个。他们同样用来作为建立专制民主最高权威性的手段，只是一个动机是要得到报偿；另一个显然不是一个金钱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显示其较高政治优势的问题。一个受质疑的权力，不论它多么真实，如果它要持续下去，就必须证明自己。当抵制联邦的州权被拒绝后，尽管引起这个争论的问题被友善地解决了，但为了使这个令人怀疑的胜利用一个战利品来纪念，必然要出现另一个问题引起争论。

奴隶制问题大约在1828年开始作为一个宪法难题出现了，但这个争论因密苏里妥协案而解决。即使在早期，一些具有洞察力的人已经看到了该问题后果的整体严重性。杰斐逊写道："这个重要问题，像夜里的火球，惊醒了我，并使我充满恐惧。我立即认为它是联邦的丧钟。它暂时没有敲响，但这只是暂停执行，而不是一个最终判决。"

1828年，当南卡罗来纳宣布了否决权，几个南部州响应后，废奴问题作为一种报复它们的强制手段，作为一个党派战争的有力工具，在北方提了出来。钱宁1828年5月14日写信给韦伯斯特："就在此前，巴尔的摩的伦迪先生，这位《普遍解放精神报》编辑，来鼓动我们去为废除南方的奴隶制而战，目的是要为此组织社团。……我对我们反对奴隶制的担心，由于挑起一部分人来支持废奴引发自豪和热情会把事情搞糟，我担心的是，我们只会使国家分裂成两大部分，这会动摇政府的基础。"

当杰克逊行政当局就银行问题和否决权问题争议正酣时，252 奴隶制问题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但当民主的中央权力胜利后，当银行问题解决后，且再也没有机会讨论州权后，那个对宪法解释的观点占上风的政党决心利用这一优势状况进行废奴。

因此，从1835年起，废奴问题成了主要问题，它是以一种裁断权与自治原则之间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每一片新的领土上，在每一个新加入的州中，这个问题一直在产生危机；后来在《流亡奴隶法案》中，最终在共和党形成和1860年大选中共和党胜利等问题上，奴隶制问题一直在产生着危机。废奴成为一个政治派别问题所产生的首要效应——这其中体现着曾经就关税问题威胁过联邦生存的巨大的宪法争议——证实了钱宁的预见。韦伯斯特，这个曾经在关税问题上最坚决的州拒绝权的反对者，也坚持认为退出甚至是由非常愚蠢的北方入侵者挑起的。在他最后的一篇演说，即著名的1850年5月7日为联邦而做的演说中，他谴责了废奴主义者的政策，他说："不想把这些大动机归咎于这些社团的领导人，但我不能对过程产生的结果视而不见。我不得不正视他们干预南方事务所造成的灾难。它对每一个人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让在这一点上持怀疑态度的绅士回想一下1832年在弗吉尼亚代表会议进行的辩论，他会看到，伦道夫先生所提出的逐步废奴的提议在那个会议上是怎样被自由地讨论的。……公众舆论在弗吉尼亚曾显示出反对奴隶问题，后又开禁讨论这个问题，但又退了回去，把自己关在城堡中。……我们都知道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原因，那些激动的人们所做的一切不会扩大只会限制南方奴隶的自由，不会释放而会更加缚紧他们。"[22]

豪，这位弗吉尼亚历史学家，也是个原则上而不是政策上的废奴主义者说："废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较早的时期开始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或许大一点，如果今后哪一天舆论变得可靠的话，它似乎更有可能成功；但实际上明显存在着使废奴主 253

[22] 《著作集》，第5卷，第357页。

义者的朋友们发生了分裂的原因，它已经使得这个问题上的各种鼓动安静下来。北部和东部的废奴主义者，由于逐步地加强了力量，越来越提高谴责奴隶制调子，并在攻击南方的宪法权利上变得越来越不慎重了。”[76]

斯托里在1839年1月19日写道：“奴隶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如果它的影响继续扩大的话，将会导致联邦的分裂。至少我们许多理智的政治家把这看成是很可能的事态。”[77]

当时废奴主义者一方还处于婴儿时期，还没有成功地把各种敌视南方的利益集合成一个单一政党。卡莱尔伯爵描述他在1841年与当时的国务卿西华德的谈话时说：“我发现我当时注意到，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轻视废奴主义者的人，他认为他们正逐步地获得支持。”[78]

但在以后一年，废奴主义者的政策迅速地对联邦构成了重大威胁，而曾是对手的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在其生命结束之前联合起来反对这个政策。从商业上讲，北方不一定从废奴中获得好处。通过鼓励白人从北方移民，可能会扩大南方市场；但新英格兰的商业严重依赖棉花种植，并且新英格兰的商人不赞成废奴。卡尔霍恩没有把这一运动归咎于利益的欲望，他说：“反对我们民主体制的宗教征服并没有来源于利益的敌对。……狂热的信徒把奴隶制视为罪恶，所以认为摧毁它是他们崇高的职责，即使是毁了宪法和联邦也在所不惜。”[79]

正是这种观点，他受到了韦伯斯特的全力支持。“在普遍自由的要求下，和在其他的要求下，即公众政府和私人政府要遵守

[76] 《弗吉尼亚历史文集》，第128页。
[77] 《生平》，第2卷，第307页。
[78] 《美国讲演录》，第27页。
[79] 《著作集》，第4卷，第386页。

对美国的构成具有更高义务的规则下，几个州颁布法律阻止和击败了国会在这个问题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权力的法案……我怀疑所有这些胡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慈善，它由于加剧了人们对虚无飘渺问题的想像，扰乱现在的一切，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如此。"[59] 254

韦伯斯特公正地认为，宪法真正的敌人是废奴主义者，而不是威胁要退出联邦的奴隶主们。从宪法上升到更高的法律，谴斥它所公开认可的体制是罪恶的，违反天然权利的，是一个明显的对联邦本身的攻击。南方有其自己赞同的法律与精神。固执的废奴主义者肯定是要为了他们的理论来牺牲联邦。如果反对奴隶制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是优于所有政治权利和利益的，那么废奴就是一个必须优先履行的义务，而联邦本身，因为它的法律是与强制性废奴相反的，就必须放弃。这使人想起西华德，在攻击奴隶制和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制度时，他攻击了使他在国会拥有席位的法律。韦伯斯特说："没有人能自由地，或装模作样地，在尊重他人(由于他人不同于本人)公民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上，建立自己的符合上述法则的良知。"[60]

布朗森博士作为惟一的一个天主教徒说得很有道理："当政府的秩序与个人对上帝法律的信念不一致时，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不遵守秩序，那么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都不能生存，甚至难以想像它能生存。……从政府上升到私人判断是把个人判断置于公共权威之上，是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61]

卡尔霍恩说得对，在这些趋势面前，"保守权力是在蓄奴州

---

[59] 《著作集》，第6卷，第556、561页。

[60] 《著作集》，第6卷，第578页。

[61] 《论集与评论》，第357、359页

手中。它们是美国的保守部分。"[83]

他自己的政治信念，正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证实了这种观点。但南方保守的反革命性更多是依赖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它主人的思想。奴隶制本身与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是相矛盾的。奴隶主没有资格词义连贯地解释这个文件，因为它与他们的利益和日常生活经历相矛盾。但南方和北方一样都有进步的民主党人，并且他们都长期反对北方的政治家，通过利用北方人对富裕的资本家的妒忌和反对寡头专制的现象，找到了摆脱这种尴尬的手段。非洲人天然地劣于其他人种的理论为此提供了帮助，因为他们引用了美国最伟大的自然学家的权威。阿加西斯说："我研究的成果是，黑人在智力上是儿童，在体力上是最差人种之一；这包括其他黑人在内，特别是南海黑人，大部分黑人都属于猴类，尽管个别存在着向人的形态发展的趋势。这个观点我已经重复过多次，但决不会从中得出相反的东西，除非我恐怕，有色人种——所有黑人是最不可能的——与我们有共同渊源。"如果这个理论不是欧洲伪科学的产物的话，有人认为这肯定是为美国人发明的，它非常适合于美国人。

韦伯斯特极力反对北方的计划，他说："一派不断地反对另一派，以致它的权利受侵犯，它的荣誉受侮辱，它的性格受攻击，它的正当的政治参与权被排斥。明智的人从这一切中不得不怀疑，是否想要做的比承认的还要多；是否在心底，为了说出来或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或者为了得到补偿或没有得到补偿的不满，要分裂美国。"

在南方，各州与联邦的分离已经公开在立法大厅和法律权威召集各种会议上，绝对地或有条件地得到承认、讨论和推荐

[83] 《著作集》，第4卷，第360页

在北方，州政府还没有如此过分，推翻政府的目的较明确地从个人自愿参加的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中表现出来，它谴责土地法，宣称坚决不遵守它。……显然，如果这种精神得不到抑制的话，将会危及政府；如果它广泛地传播的话，它会推翻政府。"[64]

卡尔霍恩这一时期所说的话与韦伯斯特是相同的："这个危险具有一种不能有效地被改变的特点，不论我们关注安全还是关注联邦的保留，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不能迅速而有效地应付的话，当我们，作为两者中的较弱的一个，除了割断政治关系，或屈尊于可悲的服从外没有选择时，联邦的两个部分将彻底地疏远。"[65] 256

1850 年在他死前的最后一次伟大的演说中，他是这样开头的："从一开始我就相信，奴隶制问题所产生的动荡，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效地阻止的话，将会以国家分裂而告终。"然后，他继续说道："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它的话，南方将被迫在废奴与退出之间做出选择。的确，随着事态现在的发展，要使合众国不解体，就不要南方的退出。"[66]

这些杰出的人士所一致担心和尽力避免的灾难在他们死后由共和党——它在目标与原则上都是革命的，它不仅与联邦的存在不一致而且从开始就准备放弃它——兴起而产生了。新英格兰哲学家爱默森说："我不明白一个野蛮的社会与一个文明的社会怎么组成的一个国家。"要评估该党宣言的夸张性，我们只要引用一下两个不同寻常的见证人的话，两人访问南方时有大

---

[64] 《著作集》，第 6 卷，第 567、582 页。
[65] 《著作集》，第 4 卷，第 359 页。
[66] 《著作集》，第 4 卷，第 542、556 页。

约40岁的差距，一个是波士顿的神父，一个是热情的废奴主义者。"这与我们北方风格是多么不同啊！那里20岁人的贪婪和墨守成规把老年人的冷漠和没有感情嫁接到了年轻人无私的热心上。当我把北方佬自私的谨慎与弗吉尼亚人慷慨的自信比较时，我为我的人民而感到惭愧。在这儿我发现了巨大的罪恶，但也发现了我身后的巨大美德。除了新英格兰的所有美德外，惟一把我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民联系起来的是，他们比我们更爱钱。"[87] 卡莱尔伯爵在已经提到的演说中说："老实说南方州的种植园主在其交往风格与方式上比其他阶级的同胞更像英国的乡村绅士。"[88]

257

爱默森的话表达了狂热的废奴主义者准备走多远。在宣布联邦政府致力于南方利益、不赞成北方的原则后，他们公开蔑视联邦政府。分裂团体为了分裂在北方开始行动起来了。几个州通过了反对南方和宪法的法律，并强烈要求分裂。这是北方在选举皮尔斯总统继任者的选举中的打算。北方威胁要断绝关系，并且如果北方的候选人当选的话，它要威胁南方的体制。南方宣布如果弗雷蒙特当选的话它们就退出联邦，并威胁要向华盛顿进军，烧毁联邦档案。布坎南的当选使南方平息下来；但从共和党力量的不断壮大看，显然这是南方的最后胜利。它们因此利用其当官的朋友，利用留给它们的时间为下一次选举作准备。在1856年共和党人展示其力量时起南方就下决心准备着退出。尽管美国的奴隶制存在着种种恐怖，但我们不可能同情西华德领导的那个党。他的政治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侵略性的。他不仅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也是一个兼并者。在1853年1

[87] 《钱宁回忆录》，第43页。
[88] 《卡莱尔生平》，第35页。

月 26 日演说中，他说了下列的话："商业与政治事态的发展趋势促使美国在这个半球的国家中承担并发挥至高无上的影响；即成为一个西方列强并保持着这一地位，使自己保持平衡以反对欧洲可能的联合。美国发展到这种地位构成了所谓的'进步'，并且这种状况本身同样地被称之为'天定的命运'。"[29]

当卡斯提出决议就古巴问题重申门罗宣言时，西华德支持这一决议，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一致的决议。西华德谈及它时说："它没有充分表达但暗含了对加拿大也要有像在古巴的主要决议中所具有的同样政策。"[30] 他的野心也没有范围。他对他的同胞说："你们已经是美洲大陆的大国。但你们对此满意吗？我相信你们不满意。你想世界商业，它是一个世界帝国。"[31]

258

当科索斯访问参院时，西华德介绍了他，因为西华德的欧洲政策和他的美洲政策一样，都是明确的而且当做令人尊敬的政策到处传播。1851 年 12 月在谈到匈牙利时，西华德写道："我相信政府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在不损害美国的和平与繁荣的条件下，去促进强烈吸引我们利益和同情的事业，即在欧洲准备建立共和制的国家建立共和制。"[32] 两天后，他又写道："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在专制者和为不可剥夺和不可废止的独立与自治权而斗争的州的冲突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当专制者联合起来时，自由州可以合法地联合起来。"

从宗教上讲，不可能同情绝对禁止奴隶制，同样，从政治上讲，也不可能同情废奴主义者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问

---

[29] 《著作集》，第 3 卷，第 609 页。
[30] 《著作集》，第 609 页。
[31] 《著作集》，第 618 页。
[32] 《著作集》，第 505 页。

题一样，他们表现了同样抽象的、理想的绝对主义，它同样与天主教和英国的精神相敌对。他们的民主体制毒化了它所影响的一切。所有宪法问题都提到了人民主权的基本精神，但没有考虑政策和权宜性。1853年马萨诸塞制宪会议上，一个最著名的美国人提出，由于司法机构对执行公正的影响，是不能讨论司法机构的选举问题的，因为这是与宪法理论一致的。《北美评论》[33]说："政府在行政与司法机构中比起在立法机构中拥有什么样的更大的剥夺人民代表权的权利呢?"在声称绝对的自由中，他们创造了绝对的权力，而我们已经从中世纪继承这样的概念：自由和权威都必须是有限制的和有条件的。不能容忍限制与义务，不愿承认人民的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神圣权利的存在，259 都破坏了政府与自由的概念。这些抽象推理的习惯影响——我们把它归功于欧洲革命——使所有事情都变成了原则与抽象法律的问题。原则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迎合利益或需要的，其结果是错误和专断的政治体系产生出错误和专断的伦理规范，废奴理论与自由理论一样都是错误的。

教会在努力改造人的方式上是非常不同的，它把现实融入理想，使自己适应于时代与环境。它的基督教自由的体系根本上与奴隶制不相容，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是腐败与罪恶的权力，它严重阻碍了它的进步。然而基督教信徒们甚至在基督教的范围内都从没有谴责过奴隶制。与基督教一起来到世界的，也是它的主张之一的公民自由从没有要求废除奴隶制。如果由于人是按照上帝意念创造出来因而是自由的话，他们对上帝意念认识的大小将是其自由的尺度。因此，圣保罗要求基督徒的奴隶

---

[33] 《北美评论》，第86卷，第477页

继续对他的状况保持满意。[91]

因为总是在把美国革命与理论和同时期困扰欧洲的事件相类比，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美国革命的原因与独特性。再深入讨论另一个观点——一个极有启示性的观点，已经是晚了一点。退出运动不只是由奴隶主担心财产而引起的，因为当林肯当选总统时，奴隶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而是由北方的政治优势引起的；南方普通白人与拥有奴隶的人一样都迫切想分离。因为他们担心共和党人在宣布解放的过程中会把他们与黑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废除。同时，奴隶们没有表现出帮助共和党人和把其地位提高到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想法。这种担心的一个正当理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共和国人民必须是同质的。公民平等必须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上，建立在民族和地理统一基础上。这一直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力量。纯粹民主是政府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社区是主权性的，因而，在这种形式下，国家几乎是与社会统一的。但社会为保护利益而存在；州为实现权利而存在——"concilia coetusque hominum *jure* sociati, quae civitates appellantur.（一切称为国家的由法律联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92]国家制定一个道义的、客观的法律，并且追求一个不同于社会目的的共同目标。这基本是与民主相冲突的，民主只承认社区的利益和权利，因而与国家概念中所含有加强权威是不一致的。它反对社会的社区发展成为道义的社区。所以，如果民主包括了不同利益或具有劣根性的人，它就会对他们施以专制。在部分与整体之间 260

---

[91] 《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1节。在新教评论家中普遍的解释是与第20节、第24节不一致的，与希腊教父的传统也是不一致的。

[92] 西塞罗：*Somnium Scipionis*，3.

没有中介；因而，阶级、财富、种族的差别是不能存在的；平等对一个纯粹民主所追求的自由是必要的。

如果社会是在无条件平等或种族团结条件下组成的，如果存在着阶级和民族多样性，他们就需要一个以政府形式出现的保护者——这个政府应该是独立的和超越于每一个阶级的，不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就需要一个以代表国家而不是社会的任何一部分的权威的形式出现的保护者。这只能通过君主制来提供；并且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公平地说，宪法政府，即和利益区分开来的法律权威，只能存在于一个国王之下。这也是为什么甚至专制君主制比一个民选政府拥有更好的从属地的总督的原因。在一种情况下，他们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被统治着，在另一种情况下，没有统治阶级，在国家的名义下被统治着。共和国下与帝国下的罗马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最突出的例子。但共和国的专制在出现种族差别加上阶级差别时是最严重的。因此，只要西班牙国王作为各种族的中介人，南美就是一个繁荣而兴旺的国度；当君主制得以保存时，它依然繁荣 而随着鲜血分裂了阶级，共和制在这些国家建立后，这些国家就出现了无望的悲惨状况和无序，不断地求助于独裁来逃避无政府与专制。民主不可避免地提高社会低层次人群的声音，并且，如果存在巨大分歧时，降低社会高层次人群的声音。奴隶制只是被用来防范这种倾向的保障，并且迄今为止奴隶制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社会的组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美国人承认印第安人、中国人、黑人的权利——他们很羡慕欧洲移民被承认具有这些权利，美国就会变得无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美国就堕落成一个野蛮的种族。因此，"无知党"由于反对外来人口流入的民主原则揭竿而起。红种印第安人正是在开拓者面前隐退，并会在几代开拓者面前灭亡，或在沙漠中消失。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出于同

261

样的原因会产生巨大的恐惧，并打算再次乘船离开。这也是一个有利于各派的反对解放黑人的好理由。

在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统治自己的地方，这种社会民主和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在各种民主制下都能感觉到。尤其在法国，作为一种必要性，人们感到，自从旧社会垮台后，不论是在共和制下、宪制下，还是专制制下，人民主权都得到了承认。法国使欧洲发生革命的那些原则就其自身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由它们引起革命的其他国家却是极其可恶的，但它们确实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看到形式而看不到实质，认为因为法国不是一个共和国，她就不是一个民主制的，或认为她的原则会到处适用。这是欧洲民族原则力量存在的原因。平等的结果对人民的概念和对权力来源一样是重要的。在存在贵族制的地方，一般贵族制比起与其他国家更能得到外国贵族的同情与联系。阶级的纽带比起民族的纽带更强。在消除阶级的过程中，民主制必须要促使民族团结。

这是我们从思考我们正在见到的事件所经过的过程中已经学到的一些政治教训。我们可以咨询美利坚联邦的历史以理解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历史和歪曲它的危险。正是法国革命的假民主，通过瓦解残留的英国传统与习惯，毁了合众国。所有大的争论——在禁运、贸易限制、国内福利改善、银行章程、新州的加入、新领土的获得、废奴问题争论上——都是这种巨大变化的一个阶段，都是从按照英国模式制定宪法发展到模仿法国体制过程的一个阶段。南方各州的分离，作为对革命原则的一种抗议和反动，作为一种对欧洲变革方向的对立运动，在政治指导意义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改变了奴隶的条件，它对非洲种族孕育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唤醒了更强烈的征服欲，对美国也孕育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对欧洲民主的反应，对欧洲孕育着深远影 262

响;尤其是由于一时威胁了她的社会存在的支柱之一,但更由于她的权力的巨大增加,美国过去对此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限制,对英国孕育深远的影响。

二十一、美国内战的历史地位*

263

内战爆发前许多年，美国一直是许多人焦虑和妒忌的目标，是人类诧异和好奇的焦点。它的繁荣——众多的恩泽与美国的繁荣联系在一起——似乎是更光芒四射和稳定可靠的。它迅速增长的人口中集中了兰开夏郡和澳大利亚的奇迹；它创造了众多城市，流动的人口居住在广袤土地上。和欧洲一样富人也在急剧增加，同时由于人口非常分散，贫穷与懒惰简直不为人所知。新世界拥有数十倍的旧世界所享有的全部农业和矿产品资源，并且这些资源没有因为限制商业企业活动的政治原因而流失。因此，从非生产性的浪费中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教育并使教育平等化。

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人们希望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得到适当的教育，但这个国家没有阶级差别，孩子的出身不是由父母的身份决定的，他们都不受限制地拥有通过思想与劳动赢得奖励的权利。正是遵循了平等的理论才限制了困扰它的理由，给了每个年轻人几乎平等的生活起点。每个美国人都是自立的，他们不愿意在孩提时代就被剥夺任何竞争的手段。所以在一些州引入一个教育体系，使得每个小学生都可以 264

---

* 1866年1月18日在布里奇诺思文学与科学研究所的演讲，发表于《布里奇诺思杂志》，1866年1月20日。重印于阿克顿：《历史论集》，第123—142页。

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使他们能在不花一分钱的条件下就能为自己将来从事有知识的职业做准备。税收负担很少，因为没有常备陆军，只有一个对财政影响很轻的海军，一个不算庞大的公共债务。没有邻国有力量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没有什么国内的不满扰乱依法的平静统治。这种物质进步的取得，尽管受到了一些严重缺陷的限制，但没有以牺牲较高的文明作为代价。

在文学上，至少我完全不能同意不把美国人放在与欧洲人同等的荣誉地位的观点。美国没有一流的诗人或画家，美国人在学术上和创造古老传统上建树不多，这可能是事实。但对我来说，否认他们在政治雄辩和哲学上与我们并驾齐驱，否认他们作为大陆历史和统治艺术的作家超过我们，似乎是不公正的。在实践政治生活中，美国人令人惊异地、无与伦比地解决了至今仍破坏大多数文明国家能力的两个问题：他们设计了一个既大大地增加中央权力又尊重地方自由与权威的联邦政府；他们把它建立在平等的原则上，但又没有让渡对财产与自由的保障。我称美国人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而是因为它的确代表了美国宪法史的独特性，代表了它对我们的特殊意义。

这使我想起了那个明智而健康的规定，它使我在此有义务不谈那些可能造成混乱的题目。要从性质和原因上估价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主题，我们必须接受处于平静区域而远离党派观点之争的政治科学的指导；一种其原则是清楚、明确、肯定，不比道德规范更难适用的科学的指导。我要谈的这种精神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具有典范价值。先例在政治上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因为政治计算太复杂了，如果不以经验来证明，我们就不可能相信理论。

美国人的经历对英国人来说必然是印象深刻的一课。我们

的体制和我们的民族性格同出一根，他们所遇到的幸运必然像灯塔一样指导着我们，或作为一种警示使我们远离。世界还从 265 没有关注过把如此发达的文明与如此广袤的领土结合起来的民主制度。民主同最大的社会与知识精英共存，但那时他们不能克服空间上的困难。那些扩展其主权的人在无政府与专制政治的同样危险之间被毁灭。毕竟，民主制还从没有尝试过要采纳代议制政府——它是英国君主制最重要的和特有的发明——的体系。不能做古罗马与现代法国曾尝试但没有成功的事；民主是与自由相一致的，但必须依赖于融合，并且与其他限制性条件相结合才能存在下去；完全的平等是对自由的毁灭，是对社会、文明、宗教这些最有价值的文明利益严重的偏见；这些几乎已经成为政治学中的公理。这一直是历史的判决，只是在一代人前，美国人的行动才开始改变这一判决。人类再也没有做出什么比这更有纪念意义的尝试。如果他们成功地进行了重大的抗辩，如果他们通过实验证明一个巨大的社会——其富饶、智慧、文明与受古老半球积累出来的经验指导因而没有特殊的困难、偏见和危险的欧洲社会一样——能够受纯粹民主的原则指导而不必牺牲其政治形态所要求的更高目标，他们必然对欧洲古老的社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它们能显示这可能注定是一个奇迹，因为它与历史的经验相矛盾；如果它们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所要实现的目标能被更多的人享受而且不必受到欧洲一直在遭受的那种惩罚——由于不负责任的权威、血腥的战争、粗暴的伤害而导致的不公正和苦难，阶级的、种族的和宗教的压迫，即出于国家的宗教狂热的原因，由于血统高贵或有钱人或有实力者盲目的、无节制的行为所导致的对弱者进行精心的、有计划的和有目的的迫害；如果它们能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国家能像俄国那样辽阔，能像法国那样安全得不受侵略，能像德国那样

睿智，能像大不列颠那样自由和遵守法律，不受对个人自由限制266之苦，没有舰队或陆军，没有贫困或国债；总之，如果美国能放射出没有政治生活阴影的光线，那么欧洲国家受人尊重的体制将会在那种无敌的论调前垮台。

那些体制已经变得古老了，但它们的古老性却是有活力的，因为我们自信它们将经受得住好与坏和正确与否的考验，因为它们对创造整体的优势是必要的或者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美国破坏了为这种体制而进行的有效性辩护的东西，那么使人类忍受强加于我们社会体系的弊端与不公正的动机将是一个短命的实力论。有许多人相信实力问题已经解决了，相信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但是这种信念已经对欧洲事务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历史学家坚信法国革命部分是由美国所由之建立的革命所引起的。如果它实现的仅仅是独立，如果美国的宪法只是开始了它宏大的事业，那么，通过其持久的成功便可轻而易举地评估出其影响的增加。因此美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巨大的移民并不仅是这种吸引力的主要信号。数百万以上的人漂过大洋，并召唤着数百万把心与希望都系于美国的人，数百万认为太阳从西方升起的人，数百万在遥远的磁石吸引下进行迁移的人，尽管美国没有拉他们出走。

所有人现在都认为这些判断是不成熟的。5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曾忠实地所描绘过的、在皮尔斯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在现在这种恶劣现实下已经不可能实现了。现在美国所承受的税收负担已经超过了英国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的税收负担，但美国并没有驱逐或打败国家的敌人，而是屠杀自己的公民，而是对着自己的玉米田和家宅放火舞剑。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失去的人口比拿破仑皇帝与沙皇亚历山大时代还多。他们的监狱住着不满的公民。他们的一些土地已经荒芜，因为

那些耕种土地的人已经被战争带走，部分是因为军队使土地荒废。通过人民的忠诚而建立和维护的联邦已经被实力所恢复。267 宪法，这个美国人之崇拜物，被数百万屈辱和愤怒的人所遵守着；他们的家庭成员已被暴力杀死了十分之一，他们的财产已被暴力劫掠，他们的希望已经永远被毁灭了。

毫无疑问，在这场政治危机中，国家已经展示了许多高尚的品性：爱国主义、逆境中的坚忍、尊重权威，和某种程度下服从与遵守纪律的艰难艺术。市民权力没有因平民将领的抗拒而受到威胁或削弱；社会身份的差异没有干扰军队的组织；军阶没有扰乱表面的正常生活，军官与士兵都是平静的公民。大量的领导人都是由于高超的能力而提升上来的，至少在不朽英名中使自己有一席之地。尽管如此，但批评美国的观点也不是不当的。这样的灾难来自同样重要的原因，不可能是短时期内或少数人的产物。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解释却是相互矛盾的。有些人说错误在于奴隶制，另一些人则指责北方的专制。美国内战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引人注意的是宪法的制定者中最聪明和最有影响力的人对宪法没有多大的信赖和敬重，最严厉和最令人心灰意冷的批评来自于那些被尊为国父的人们。华盛顿在一次由杰斐逊记录的谈话中解释他对新政府形式的未来感到担心。他说在讨论宪法时宪法还是符合他的理想的，但在制宪会议的最后几天里他所满意的原则已经大大地变化了。他想要的宪法是，要求所有对各州利益产生不同影响的议案都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这个条款——会对少数形成保护——在南部与东部州的联合下被撤销了，南方要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东部要维护商业与制造商的利益。他说："他不喜欢把太多的东西放到民主派手中；如果他们不想做宪法要求他们做的事，政府就会终结，并且必须换一种

268 形式。"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杰斐逊后来说："我保持沉默，看看他是否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说下去，或补充一些限制性的东西去缓和一下他曾说过的话。但是他都没有。"在那些包围着华盛顿的政治家中有一个优于他的人，那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的预言更暗淡。他说："我的观点是，现在的政府不是那种会满足社会要求、能保持稳定和保护各种权利的政府。采取英国政府的形式可能是个办法。""联邦似乎很可能解体。"在他的晚年，他称宪法是脆弱的和不值钱的纤维、暂时的纽带。华盛顿后的第一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说："他看不到联邦继续的可能性；它的解体必然会发生。"在另一个场合，他指出了出现他预见到危险的地区。他说："任何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参议院，没有一个强大得足以抵御所有民众风暴和热情的参议院，是不能永远存在下去的。至于那个保持我们自由的众议院，它最多只是一个想像出来的怪物；除了他们自己的意志外，他们的决定没有任何约束。"

如果我继续摘录的话，我能更清楚地显示：历史上民主党最出名的作家认为，最难克服的困难，也是威胁其社会稳定的困难，是民主原则本身。由于民主的原则，共和政府的建立就不是出于理论，而是出于必需。他们没有寡头政治，没有国王，但他们却继承了我们英国的法律，并且努力尽可能忠实地使之适应于由不同血统的人组成的社会。宪法和法律的最早解释者努力要使之受英国先例的指导，尽可能与英国的模式相接近。汉密尔顿是这些思想的主要支持者，他说："显然一个纯民主政府，如果行得通的话，是一个最好的政府。经验证明在政治上没有比这个更错误的立场。古代民主制中——人民在这种制度中可以进行辩论——从没有一个好的政府。专制正是它们的特点，畸形是它们的形式。如果我们太倾向于民主，我们不久就会落入

君主制。那些打算建立坚固的共和政府的人应该进入另一种政府范围。在关键时刻抛弃多数民众形成的意见可能既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能够抵御民众潮流的政府应该有一条原则，这个要建立的原则是：必须有一个永恒的意志。” 269

这些不是个人的观点。它们是一个监护着摇篮并指导着共和国走出最初步伐的那个强大政党的观点，这些观点显示出节制的、智慧的和英国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指导着早期的委员会。这些因素中存在着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要发展。英国的法律不是来自一个原则，它们是众多影响的产物，它们认可权威和传统，以一组利益平衡另一组利益，致力于维护各种权利，受许多适宜性的考虑所决定。所有想像的事情中最不融于其精神的是牺牲任何一些特定的利益或特定的权利以满足某种模糊抽象物的要求。但是诺曼国王和封建议会不是按照满足美国社会需要的方式进行立法的。这就需要调整，这些调整自然在呼唤调整的新因素指导下进行，即在纯民主原则指导下进行。

这个原则的最杰出的鼓吹者——托克维尔称他为民主制最有力的信徒——是杰斐逊。从他的作品中选出三言两语就能为当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倾向提供最有力的证明，这两种倾向都在为主宰权相互斗争。这种斗争形成了历史并决定了美国宪法的命运。杰斐逊说：“他的目标是使行政管理受制于共和制形式和原则，不允许把宪法搞成一个君主制的宪法，不允许它扭曲为包含他们所钟爱的英国模式的一切原则和缺点的宪法。每个民族都能按照他们的喜好建立政府的形式；民族的意志是惟一重要的东西。我把这个原则归纳为：多数人忠实表达的意志应该产生法律。我认为地球属于人类是不言自明的，死人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权利。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制定永恒的宪法和永恒

270 的法律。地球永远属于活着的一代。每一部宪法和每一部法律自然会在34年后到期。”在这种革命原则与来自英国的思想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使杰斐逊不能忍受的是一代人的工作要束缚另一代人，任何权利都注定是神圣的，不能由多数的投票来取消。他希望法律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每一次变化都实现更多当时人们的希望。所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利益能获得反抗民众感情的保障，并且人要永远地既为影响而斗争也为安全而斗争。

然而杰斐逊本人就是对联邦表示绝望的人之一。当扩大奴隶制的巨大争论开始出现时，他写信给他的私人朋友道：“我立即想到它是联邦的丧钟。暂时安静下来，但这只是暂缓执行，而不是最终的判决。地理线与明确的原则——不论是道义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由人愤怒的热情所想像出来和坚持的——决不会被抹掉，并且每一次愤怒将使之变得更深更深。”

但我似乎很清楚：如果奴隶制从不存在，由这些如此对立的原则——就像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原则的对立一样——所分裂的社会也将因他们之间的对抗而分裂，直到某一方占上风为止；把自由与权利——做任何你有真正权力去做的事情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和通过某些不可更改的权利保证自由，将自由建立在人既不能发明也不能放弃的真理基础上的理论，不可能构成同一部宪法的决定性原则。绝对的权力和对这种权力行使的限制不可能一同存在。它只是自由与专制这一古老斗争在一种最巧妙伪装下的新表现。我经常追忆这个场景，因为这对我来说包含了以后发生的事件的关键。我有时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宪法辩论会，这个会议是时隔30年后为设计这个最开明州的宪法而召开的。会上讨论了政治上的一些首要原则，问题之一是如何任命司法机构。法官应该是独立的，免于受执法者和

公众的好恶的影响，这是一个粗浅的真理。但一个杰出的、有高度修养的演说家，现在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恐怕在欧洲声誉也是第一流的，却赞成法官的短期任期——我想是一年——和人民选举法官。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法律要由独立的法官正直而忠实地执行。但他坚持一致性比正义更好，坚持人民作为一切权威的来源应该控制他们所授权的任何人，坚持任何权宜性的理由都不允许破坏民主原则的应用。我不禁想起世界上还有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原则，它使得国王成为惟一的权力来源，使得司法机构成为王室的代理机关。现代文明引以为自豪的是搁置了这种体系并用一个实践证明是最有利于公正的体系来替代它。但是民主制和君主制的专制主义者都把政府的原则放在比社会与文明的目的具有更高的价值上，都想创造一个他们准备为此牺牲保护财产、维护美德、私人生活的神圣性等价值的崇拜物。所有在单一原则所支配下的政府都会由于夸大这个原则而堕落。统一的君主制会产生单一意志的专制主义，少数统治的贵族制往往要把少数限制为寡头统治。在纯粹民主制中，可能会遵循相同的道路，多数支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地得到确认并且越来越受不到抵制。我们理解自由取决于免受控制，在美国它已经意味着行使控制的权利。 271

为了描述这种不自由和专制的侵害，必须对最后70年的全部历史进行回顾。我只想通过由一些杰出的美国人曾使用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麦迪逊总统写道："当多数卷入一场内讧时，民选政府的形式能使多数派为了统治热情或利益去牺牲公众的善或其他公民的权利。如果一个多数由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的话，少数的权利将得不到保障。"斯托里法官说，必须提醒公众，在共和政府中有基本的真理，即"少数具有不可争议和不可分离的权利，多数不是一切，少数不是一无所有；公众不能高兴

做什么就做什么。"钱宁说:"多数统治的原则作为一个直觉带有多方面的意思,但人们从没有想在实践中它应该怎样调整,它的应用应该怎样受其他原则的约束。"最后让我引用一个最新出版物中的一段话,该书出自舍曼的参谋长,因而不能认为这是一个蠢人之作。"在一个有普选权的政府下革命怎么会有合理性呢?就我而言,我要说,有思想的人怎么可能长期忍受一种既是压制的又是十分愚蠢的体制呢?"

272

我们必须记住欧洲与美国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差异,美国是一个不受古老文明的传统与影响控制的社会。西欧国家因为其渊源、紧密的相互交往、相似的社会利益和性质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因而有一个广泛的超越国界的公众舆论,在每个国家都保持着共同的习惯、思想和习俗。欧洲的舆论会倾向于这些传统与思想而强烈反对拒绝它们的欧洲国家。但美国没有这种保护性的影响,得不到民众支持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是安全的。过去几代人和当代文明人的思想都不允许分享或限制当前的绝对权威。杰斐逊引人的革命原则就像大西洋一样把他们完全阻隔了。欧洲文明之声,同样也是历史之声,从另一个世界传到了他们这里。历史充满了由滥用权力引起的反抗记录。但在旧世界人们找出了弥补的方法,而美国人却使之成为疾病的根源。公众不向自己滥用权力。经过多年来的人民的意志应该成为法律的教育后,公众已不可能懂得自我克制,不可能放弃行使他们享有的权力。所以,政治作家提出一个普遍的原则:一个堕落的共和主义必然以自由的一部分丧失而告终。许多人已经预言,这将导致美利坚共和国的终结。

但一个邦联拥有一种防范这种灾难的资源,这种资源在单一州中是没有的。集中化在一些州政府那里找到一种天然的障碍。汉密尔顿说:"这种中央与州政府间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

它对人民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保护。如果一个政府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另一个政府找到保护。"这的确是美国体制独特的优点；它改变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它给了州反抗集中的自由，而集中对联邦体系是有价值的辅助，但它不能决定这个问题。咄咄逼人的、绝对的精神——它是纯民主的毒瘤——不久在某些州比在另一些州更为盛行，并且盛行的州努力要使之成为联邦政府的最高指南。他们不承认国家的一些地区可以免受他们所服从的一种权力的约束。但是一旦不同的州支持相反的政府原则，联邦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273

现在有一条更广泛的界线划在各州之间，既使它们在政治原则上也使它们在金融利益上相互分裂，同时还有气候和耕作方式的差异，以及早就存在的种族差异。当然，我指的是，后来革命的直接原因——即你会说，我很长时期没有看到——是蓄奴州与北方州的分歧。

如果目前我的主题是一般性的奴隶制问题，我会努力表明它不仅仅是维护罪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一个维护符合天意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工具。万能的上帝，以其神奇的方式，即使通过奴役也赐福于人类，一方面唤醒了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唤醒了仁爱精神。但美国的黑人奴隶制有其自己的特征，其特征之明显不允许一般性地描述。争论已经在平和中进行，已经出版的小说证明了事实上的巨大苦难。出于目前我的目的，我要求你们接受的观点既不是建立在巨大的滥用权力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国王或基督教的主人之上，而是建立在奴役性的条款基础上。我要引用来说明黑人个性思想的最具启示意义的法律是，如果奴隶的生命由于这个法律夺去，奴隶的主人可以从国库中得到与奴隶等值的金钱补偿。任何奴隶都不能签定有效契约；因而奴隶不能有合法的婚姻，即使得到其主人同意。所有对美

德的维护，对违反婚姻法或违反人类立法前就有的法律的惩罚都不能适用于黑人家庭。我保证自然与天性的声音会不断地放松这块土地上法律的严厉性，但可以肯定，南方法律体系否认黑人受与我们同样的道义规范的约束。退出运动的领导人都相信这一点

274

在这个运动开始时的一次演说中，史蒂芬斯先生，邦联的副总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新政府的基石依靠这些真理：黑人不能和白人平等；奴隶从属于于优等种族，是自然的和正常的状况。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这样伟大体质、哲学和道义真理基础上的政府。"这是一个把不平等当做其基础——一个比封建时代更是由贵族所组成——的社会，而不是把不平等当做是财产、血派和美德的自然产物的社会。南方奴隶主在对待使北方州的民主充满活力的两个原则上是矛盾的。他们否认所有在人具有公民权方面绝对平等；他们否认少数没有一切的原则的正义性，因为他们知道这与国内的体制——对他们来说这个体制与财产权一样是神圣的——是不匹配的。因此，正是他们社会体制的弱点使他们在那些改造了北方共和国最初性质的政治错误中保存了下来。民主的腐化在南方由于奴隶制的间接影响而停止了

所出现的问题是，南方为了保护自己而谋求限制中央权力，而北方希望使中央权力超越一切限制。对一方来说它是矛，对另一方来说它是盾。因而出现了这种情况：南方在华盛顿长期政治统治（直到 1860 年）下没有发生决裂，因为他们希望自治，而不是帝国；而林肯当选使北方获得选举的胜利立即出现了联邦分裂的信号。宪法不能阻止这种结局，可以预料，这种结局在特性、物质利益和政治精神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一些州疏远是必然要出现的。因此，某些州勉强接受了宪法，并有条件地——认

为讨价还价不太好——加入了联邦。弗吉尼亚在批准宪法时宣称,"宪法赋予的权力来自于美国各州的人民,当它变成对人民的伤害或压制时,可以由人民收回。"纽约与罗得岛也说了同样的话。时不时出现这种担心,并且一些州从中穿梭要撤销联邦的法令。最终保护东部制造商的某些法令引起了农业州的联合反对,因为农业州要为另一些州的利益付出代价。这是风暴的第一次威胁,但这场风暴在30年内没有爆发。

275

两个伟大的人物作为两个伟大事业的倡导者站到了前列,并且这场斗争使这两个斗士的杰出能力都转化成个人斗争的利益。南方的哲学家卡尔霍恩先生的影响被人这样描述:一旦他拿出一撮灯花,所有南卡罗来纳人都要打喷嚏。他提出了被称之为州拒绝执行的理论。他坚持,如果利益驱使下的多数通过一个伤害某些州既定利益的法律,该州有权进行否决。他受到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挑战。韦伯斯特这位美国的顶尖雄辩家坚决维护一个能代表所有人的立法机构的绝对权利——为所有人制定法律。当时卡尔霍恩坚持,如果一个州不能阻止注定的不合宪法的和具有伤害性的法律的执行,它有权退出它有条件加入的联邦。

北方从挑起这种极端中退缩了,做出了安抚南方的让步。但同时韦伯斯特在其不朽的演说中认定,联邦不是各州间的契约,而是一个不再屈从各州选择的基本法律,各州都由在法律上不能松弛的绳索拴在了一起。后来韦伯斯特的观点在美国法学家中占了上风。补偿权从南方那里拿走了,北方共和党人,利用这种宪法上的胜利,从事暴力事业,这些事业在合众国不再容忍那些反对它们的人后才结束。在此时废奴主义者开始了其征讨,这种征讨既针对合众国——他们把它斥责为与地狱的协议以及与死人的盟约,也反对奴隶制本身。南北方不能继续在一

起成了他们间一个确定的原则。《先驱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先生说:"不值得支持合众国与南方的联系。"共和党中强硬分子决心使自己成为政府的主人,以此迫使南方服从他们政治观点。马萨诸塞州副州长承认:"要实现的目标是,自由州占据政府。"

276

他们打算发扬的精神由该州在国会中的代表用一种具有典型的美国式力量和坦率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当我们选出一个总统时,它不会是一个党的总统或一个地区总统,而是人民的护民官,在我们消灭了北方一些亲南方的议员后,那时来自奴隶州的参议员如果没有让位的话,我们将把他碾死在我们的动力磨石机上。"一本在国会广泛传阅的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教奴隶们烧毁其主人的房屋,杀死牲畜,藏起和毁掉耕作工具,在播种和收获时不干活,让作物死去。"1859年蔡斯先生说:"我希望解放奴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恨他的主人。"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说得更真切:"现在北方与南方已经实际上没有任何联合了,地球上两个民族所具有的深仇大恨也比不过共和国的两个民族。"

在这种公共感情与政治分裂状态下,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了总统。4年前,前总统菲尔莫尔先生已经预见将会出现这种灾难,他说:"我看到一个政党提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都是在自由州选出的,它明确是要通过合众国一部分的普选权来使这些候选人当选以统治整个美国。难道从事这种行动的这些人不认真地思考一下一旦成功后不可避免地所发生的事吗?难道只有疯子和傻子才会相信我们的南方兄弟会服从于这种大法官的统治吗?"

在随后发生革命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必须受导致革命的事件的影响,而不受领导人的动机的影响。事实上他们和合众国一样是因奴隶问题而分裂。对一方来说,它是战争的真正目

的;他们相信,在北方政治家的攻击下奴隶制不可能是有保障的,不论联邦政府做出什么保证。另一方,为了在一个北方不赞 277 同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众国,则希望退出。他们之间的重大问题是奴隶的武装。那些认为独立的代价太高的人直到里士满陷落前夕才成功地阻止了它。当通过本可以使黑人获得好处而不会有解放的危险的法律时,已经太晚了,战争即将结束了。

奴隶制不是退出的理由,而是它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地区,消灭奴役的时刻都已经到来了。同样的问题迟早会压在许多政府头上,所有人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施加他们最大的立法技巧,以免在被迫的而且必然是费力的医治弊端过程中,产生另一种不可救药的弊端。他们至少试图缓和突然的无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试图挽救那些由于毁灭而受到掠夺的人和那些从匮乏中解放出来的人。在美国似乎没有这样的负责解放工作的计划。它是一个战争行为,而不是统治行为或人性行为。他们把奴隶主当做敌人,用奴隶作为毁灭奴隶主的工具。他们不从野蛮人的报复中保护白人,也不从一个自私文明的冷漠残酷中保护黑人。

当时,如果奴隶制是判断内战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我们的判断我想应该是:国家一部分地区要保护它,而另一部分地区要消除它。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来研究退出运动的价值,我们的意见必然是不同的。当南方邦联依据退出权建立时,承认这种权利就意味着再没有机会行使退出权。用这种具体的偶然性来证明分离是合理的,就等于说邦联政府受某些限制、某些条件和某些法律的约束。这明显地推翻了这样的原则:少数没有权利行使权利,多数不会干错事。这像是一个能干的专制者的支配权发展成了一个合乎宪法的国王统治权。

再者,必须有明确的保障措施来防范削弱合众国自由权力

的滥用。这种权力的滥用之一是以牺牲某一些州为代价进行偏
278 向于另一些州的征税。所以"不予财政补贴,也不征收旨在促进或支持某一行业的进口税"的规定被颁布了。过去,把影响力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改善国内福利。现在规定邦联政府无论何时不得执行这些政策。最后,任人惟亲为总统提供了腐败的机会,我已经听到,随着官员任期结束,人员变动之频繁达到了6000多个。现在规定,除了内阁部长外,在没有把去职原因提交到参议院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应失去职位
这些是南方邦联的政治观点,我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因为历史显示:共和党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努力来保证弥补这种政府形式存在的缺陷。如果他们采纳了这些确保成功并证明成功是合理的手段的话,如果他们要求黑人与他们一起面对战争的危险和共享胜利的果实的话,我相信慷慨的解决方案在未来会带给人类不可估量的福音

他们今后会为倡导自由提供一种无双的模式。他们会实现其朋友的理想并解除敌人的抵抗。胜利的原因来自于与被革新的力量的冲突,并且这个原因已使人确信那些在世界其他国家必然导致危险反应的原则。美国虚伪的自由要受到双重诅咒,因为它欺骗了它所吸引和排斥的人。通过展示了人民拥有自由的奇迹——但实质上它对自由的爱意味着对不平等的恨,意味着对权力限制的不满,意味着依靠国家作为塑造和控制社会的工具,它要求它的崇拜者去憎恨贵族并教它的敌人去害怕人民
北方已用民主的原则毁灭了自治。南方用有条件联邦的原则去医治弊病,去纠正对民主错误解释所产生的错误。

一篇演说在赞扬了李将军这位天才后,是这样结束的:只有高尚的目光才能鉴赏这位伟大的将军,这位华盛顿的伟大同胞,
279 他力劝人民服从其征服者,并树立了平静隐退和服从的样板

但同样只有高尚的目光才能看到这个伟大而得胜的民族将军是如何没有经过训练而成为伟人的，是如何从裁缝铺出道而名声显赫的；他身居高位时却没有因为醉人的胜利和可怕的犯罪而声名狼藉。他阻止了报复的毒手，免除了惩罚，遣散了军队，并平等对待一直是、并且直到最后仍是最恐怖的敌人，平等对待那些其杰出才干使国家在人力、物力和名声遭受巨大损失的人。对一个尤其有这样的领导人的社会感到绝望不是为时太早了吗？

280

二十二、美国内战记*

1861 年 3 月

美国北部联盟

近几年几乎所有考查和研究美国的人对联盟都留有权力下降和政治智慧衰退的印象，并且相信这个联盟迟早会解体为三部分：一个大西洋邦联；一个海湾国家邦联以及一个以加利弗尼亚为中心的邦联。南部与北部冲突的到来比人们所预料的更快，不久西线发展成为分裂的第一个条件。对联邦不忠的传闻来自圣弗兰西斯科，那个地方因为从中国引进劳动力，所以对它是奴隶制州和自由人州有不同立场，但是这些传闻没有至关重要的根据。

正如西华德先生在 12 月 23 日的一个公开宴会上所说，很明显政治隶属和稳定的首要条件是需要一个选举内阁总理的国家：

281

"很自然，没有哪个州，能采用一个超过 25 年以上的宪法而不被修改或重新审议，在我们自己的州，我们 20 年前采用的宪

* 选自阿克顿投稿的《随笔》"热门事件"章节，1861 年 3 月，第 429—432 页；1861 年 9 月，第 424—432 页；1862 年 6 月，第 280—292 页；《国内外评论》，1862 年 7 月，第 278—288 页；1862 年 10 月，第 598—608 页；1863 年 4 月，第 713—716 页；1863 年 7 月，第 401—405 页；1863 年 10 月，第 763—768 页。

法包含这样一个条款:第二年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制宪大会必须在纽约州召开并制定一部新宪法。"

出自一个大演说家之口的这个声明不如对方查尔斯顿的一个爱国者所说更显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后者讲到这个联邦的权力:"事实上,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实际上它从来都不过是一个代理机构。让它拥有一个欧洲旧政府所拥有的权限并且谈论叛国,都是一种狂妄之举。"

这就是领袖人物们对宪法的意见,最近几次事件中没有任何使我们吃惊的东西;比较独特的事情是布坎南内阁中分裂党的势力很大,加上卡斯将军的退役使他们在政府中有了一种优势。在这样不团结的委员会中,总统无法积极实施挽救联盟的步骤,而且布坎南先生还明确表示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不做任何事。他在12月14日的文件中指定1月4日为禁食日和保留联盟的祈祷日。他向人们生动地描述了分裂威胁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灾难。

"州联盟在当前被惊恐和即刻的危险所威胁;惊慌和可怕的痛苦充斥着这个大陆,我们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丧失获取面包的手段。事实上,人的希望破灭,各阶层的人都生活在混乱和沮丧之中,圣贤之人最明智的忠告统统被忽视。"

在日期为1月8日的一个报告中他说:

"这种恐慌所产生的必然后果是最悲惨的,在我们的商业历史上进口前所未有地下降,仅次于战争年代。国库券留下来已没有多少意义,而它过去是合理筹集以应付公共支出的 贸易 282 瘫痪了,工业停滞了,最好的股票在市场上突然跌下去,所有的财产也都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数以千计依靠劳动换取面包的穷人失业了。……当不流血的解决希望慢慢消失的时候,民众的痛苦就会越来越重。

“如果政治斗争以内战为结果，我坚定的决心就是不去管它，也不通过任何官方的举动为别人提供借口。我的主张仍然不变，正义和稳健的政策要求我们仍然要寻求南北争端的和平解决。怀有这样的信心，我避免给安德生少校派援军，直到万不得已。他控制着查尔斯顿海港的要塞，这是他们都很清楚的事，否则这会被看做是以军队的高压统治来胁迫，由此向对方挑衅或至少是给南卡罗来纳州一方爆发的借口。”

这样一个无为的方针在年底有了结果。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12月17日召开，19日在一个有169人的房间以全票废除了这个州加入联邦的协定。稍后，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他们用北方诸州的行动为他们的分离作如下辩解：

“那些州已经承担了决定我们内部制度的正当性的权利、否认了在15个州中建立并被宪法承认的财产权。他们抨击奴隶制度的深重罪孽，他们允许被认定妨碍其他州公民和平以及繁荣的企业正常营业；他们鼓励和帮助数以千计的奴隶离开他们的家园，剩余的人也被密使、书籍和图片所煽动进行模仿式的反抗。”

对于新总统，他们说：

“他信任共同政府的管理，因为他声明‘政府不可能永远容忍一半的奴隶和一半的自由人’，声明公众的头脑必须坚信奴隶制度正处在最终消灭之中。……这一制度的宪法保障将不再存

283 在；各州平等的权利没有了；拥有奴隶的州不再有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的权力，并且联邦政府将成为他们的敌人。”

这时，南卡罗来纳州向准备和它一道分裂出去的州推荐美国联邦政府作为他们未来邦联的模式，并且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设立一个南方州国会。来自其他蓄奴州的大多数官方祝贺抵达查尔斯顿。很多州召开集会，所有南方人开始武装起来，

这些政府掌握着联合政府的军械和库存物资，他们开始增加贷款、禁止现金支付以便所有在银行的硬通货在需要时能控制在手上。

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1月10日宣布脱离，亚拉巴马州1月11日脱离，就连人们预料会阻止此项运动的佐治亚州也在1月19日以208票对89票的压倒性多数宣布脱离，反对者在这次行动结束的有效期内也默许了。北卡罗来纳州以全票通过如果正准备脱离的州不愿意继续下去，他们将全力支持这些人。但是南卡罗来纳州声明脱离是最终结局且不可改变，拒绝考虑任何让步的企图和妥协的方案。

路易斯安那州以113票对17票于1月26日脱离联邦政府，得克萨斯州以154票对6票于2月4日宣布脱离。

与此同时，边境上的一些州，由于他们不要求奴隶为自己工作，仅仅是向南方提供奴隶，是不依靠奴隶劳动而靠奴隶贸易形成的一个团体，因此，他们作为生产者与产棉州，作为消费者，对奴隶制都很感兴趣。他们承认被迫与南方有着许多联系，但对分裂不感兴趣并努力加以阻止。这种情况来自他们，更来自弗吉尼亚州和堪萨斯州，并且这种折中的尝试已经开始。

蓄奴州的行动没有遭到阻止，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暴力，没有任何保护这个联盟权力和财产的事发生。在南方没有合众国的军队，但是在作为分裂运动的心脏和中心的查尔斯顿当地，好像会在某个时刻发生冲突。

12月26日，作为美国驻地军官的安德生少校，他用他的军队控制着萨姆特要塞，这是通往海港的入口。同时，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专员正着手应付总统关于向合众国交出所有军需物资的决定。在华盛顿他们认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地方长官皮肯斯已经报复性地在军械库和其他要塞升起了蒲葵旗，安德生少 284

校拆掉了它们，而且迅速进入防御状态。

12月27日。国防部长弗罗伊德向内阁建议召回安德生少校，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争斗行动。弗罗伊德在华盛顿是为南方各州分裂出去指引道路的人之一，在他的部门最近有大量的计谋被暴露，虽然没有追究到他，但表明他有加大分裂党势力的企图。弗罗伊德的主意在内阁中以平票被拒绝，29日他提出辞职。安德生没有被撤换，同时布坎南先生也没应他迫切的要求增派援军，布坎南断绝了与南方委员们的谈判。

安德生少校所处的位置相当危险，他在查尔斯顿海港的入口只有很小的一支军队，而且知道不会有增加。地方官皮肯斯虽然没有针对萨姆特要塞驻军采取敌对行动，对安德生上校举止也很客气，但查尔斯顿政府已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他们施加各种影响阻止总统派驻军队。但最终一个秘密先遣队被组织起来，司各脱将军派一艘船给萨姆特要塞部队以示安慰。内政部长汤普森先生因此于1月8日辞职。

与此同时，来自每个州的一个由23人组成的委员会被任命去设计一个挽救联邦的方案。12月8日肯塔基州的克里腾登先生对宪法提出修正，他建议采纳以老密苏里河中央——36°30′为分界线，在线以北禁止奴隶制度，同时剥夺国会在对分界线以南地区奴隶问题的所有权力。明尼苏达州的赖斯先生对这个计划提出了修改，他希望联合分界线北方的所有地区成立自由人州，边界以南的为奴隶制州，随后再细分他们自己的权力。12月24日，道格拉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计划，主要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黑人的殖民地化的计划。三十三人委员会多数投票通过了一份报告，南方各州的声明被承认。但是他们的决议受到了谴责。北方成员采纳了一个少数人报告，完全谴责南方，而南方的另一些成员要求召开全体会议，并采纳克里腾登先

285

生的计划。一个成员自己报告说没能扩大奴隶制范围，所以没有什么事值得高兴。随后，边界州又有一个计划，它限定奴隶制度在密苏里线以南的州，让形成于这一区域的未来州自己决定采用还是拒绝奴隶制。这个计划要求国会为了他们在奴隶出口方面形成垄断而禁止外国奴隶贸易。

1月24日。前总统泰勒给布坎南先生带来了弗吉尼亚立法会的决议，在密苏里分界线的基础上计划了一个协定，保留奴隶制度在被这个州认定的那条线以南的地区出现。这个计划克里腾登先生接受了，布坎南先生也在一个报告中做了推荐，并且他命名一个委员会来寻找维护和平的途径。

很多南方政治家在国会中的消失使华盛顿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一个促使南方对北方更彻底的经济依赖的法案提出来了。南方港口查尔斯顿、莫比尔、新奥尔良的贸易被中止了，共和党人希望南方挨饿直到投降。他们借口要征税，封锁这些港口，强迫棉花由铁路运到北方；通过为外国糖免税停掉生产蔗糖的蓄奴州的主要市场。这是整个革命的开始。它也使南方有了在商业上把自己从北方解放出来的一个企图。

一个新奥尔良的演说家在1855年说："该是我们考虑自己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明白同北方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从在南方出生的小孩被保姆逗耳朵听力用的吱吱作响的玩具到覆盖在死者身上的寿衣，什么东西都来自北方。清晨从来自北方织布机上的床单和北方羽毛做成的枕头上起来，用产自北方的脸盆，用北方的毛巾弄干我们的胡须，穿北方织布机织成的外套，用产自北方的盘子和碗吃饭，我们的房间用北方的刷子打扫，我们的花园用北方的铲子翻土，我们的面包用北方的木制品和锡器盛在托盘或碟子中揉捏，甚至生火的木材是用北方的斧头所砍，它的手柄是用山核桃木做成，买自康涅狄格和纽约。" 286

一份查尔斯顿的报纸说：

“我们周围有的是未加工的原材料，又不需支付通往北方城市的交通费用，因此，南方的工厂不仅应该竞争，而且要成功地跃上一个比单纯棉花种植更高的层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1855年南方贸易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大会倡导南方的每个州鼓励他们和欧洲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对进口商品免税；或者允许以进口商品税率等值物的方式退税或补贴等其他诸如此类的多种方式，这对于各自州的立法委员们是最有利的。”

看起来最好的模式是分裂，因为日益高涨的奴隶制改革和对释放劳动者的鼓励，给奴隶所有者带来了极其巨大和实际的困难，令他们处处感到不是滋味。他们基于棉花万能原则的考虑是欧洲人会对与他们获得直接贸易自由感兴趣。依靠直接税他们对欧洲商业贸易开放他们的港口，并因此使英国产生向他们开放和逃掉联邦关税的兴趣。

在蒙哥马利议会中曾是皮尔斯总统的部长之一的杰斐逊·戴维斯当选为南部邦联的总统。

1861年9月
美国内战

林肯先生在华盛顿就职后的6个星期里，南方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否可能完成分离是让人怀疑的。边界各州，尤其是弗吉尼亚，在为维护和平积极进行工作，联邦政府没有准备对这287个开历史先例的偶然事件制定政策。但是分离的州丝毫不动摇决心，他们要从北方分离出来，拒绝任何妥协的条件，不寻求伤害的补偿或法律的变更。当萨姆特要塞的供给开始短缺，联邦做出一个企图向驻军提供补给的决定，以示不屈服于暴行和不

让步自己的权利。当联邦舰队出现时，南部邦联开始了对要塞的炮击。因为华盛顿政府没有决定交战，它的舰队没有进行防御，4月13日安德生投降了。

4月15日。林肯先生颁布通告召集7.5万名男子组成的国民军去收回要塞和合众国的财产，并且在南方“镇压联合”。同时，7月4日他召集了一个非常国会。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个交战宣言，但要求军队来完成镇压南方各州的任务很明显是不恰当的。总统几乎不知道他正在从事的这个工作的严重性。他没有预见到萨姆特要塞的失守对这些州的影响应验了这一切。对男子征兵的需求被送达所有地方，每个州不得不做出决定。在高压政策下，原先不倾向加入这个大种植园政府的一些重要的蓄奴州转而公开表示反对联邦。密苏里拒绝提供军队，肯塔基州也是这样并宣布中立；阿肯色、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州相继加入南部邦联，尤其是在南北两边曾一度保持平衡并且是谈判总部的州，因为不可避免地成为交战地区也宣布反对联邦，他们关闭了在诺克福的海军造船厂，扣押了在哈珀海湾的合众国军械库。只有弗吉尼亚自己分裂了，这个州的西部对奴隶贸易不感兴趣并且几乎被联邦的州所包围，这增强了它跟北方走的动机。当抉择的时刻到了，政策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西部许多地区宣布他们不跟随这个州剩余的部分。因此，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情势下，以若干州的主权统一为名义进行的变革，在一个明显事例中，甚至导致了每一党派向每一州承诺的主权与领土的统一。在弗吉尼亚，这种不和的观点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热衷于在对立党派之间调和，阻止其破裂。实际上马里兰的位置更独特。马里兰在历史上作为天主教的殖民地而著称，在现代它又是宗教自由第一个建立的地方，它是最偏向南方的蓄奴州，对于奴隶劳动力它既不是大的生产者也不是大的消费者，因此 288

对于站在南方那些州的立场它没有多少兴趣。但是所有的奴隶所有者的天性是反对废奴主义者政府的，马里兰政治上同情的是反对民主专制主义者的。因此巴尔的摩，这个最靠近首都的美国大城市，为各种对立观点的聚集所困扰。虽然这个州实际上以多数措施支持联邦，但同时热切呼吁总统停止强制性的措施。巴尔的摩自己的情感是强力反对中央政府的，行进于这个城市的联邦军队受到攻击，鲜血洒落，桥梁被人弄断，铁路也被掐断。一段时间，军队只能绕过巴尔的摩从费城到华盛顿。极度的不安使当局为反对分离主义提出一个严厉的措施并建立了一个军事化的政府。当大批军队集中在华盛顿周围时，虽然马里兰这个城市是平静的，但其对于联邦的忠诚却越来越叫人怀疑。

不过，西北部各州强烈响应总统的号召。马萨诸塞，空谈的、教条化的废奴主义者之乡，它曾数度通过其伟大的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成为集权主义原则的最坚定倡导者，如今却迅速地派了许多团来保卫首都。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用了30个团紧随其后。纽约犹豫了片刻，它怀疑出口利益是否不受棉花的势力影响，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纽约这个帝国之州，凭借其近400万人口和巨大财富的资源，热心支持联邦政府，直到赌注在激烈的争论中被遗忘，利益被热情制服。纽约成为站在联邦一边的中心，这个富裕和强大到足够控制联邦的大城市，如果将来不能成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会叫人觉得不可思议。华盛顿是一个人工化和感情用事的创造，它从来没有兴旺过，好像是在一个不安全的边境上形成的一个边界小镇，四周充满了危险，在长期的内战中，它将是军事行动最糟糕的基地。如果联邦最终分裂，它将无法忍受来自从前较大联邦首都的联邦制拥护者们来掌握北方的一半。无论战争的军事结果是什么，但它的宪法后果是不容怀疑的。跟随在林肯先生、西华德先生以及斯科特将

289

军其后的人,其权威作用范围可能不如从前那样广大,当然,他们在办公室有比他们前任大得多的权力。已经展开战争的政府要求一个50万人组成的军队;要开征一系列沉重的直接税;创造了与全欧洲相等的外债。这样的权力与令人嫉妒地授予华盛顿的权力已经全然不属于一个范畴,而与华盛顿的权力相比,布坎南乃至他的后继者不过平添腐败与卑躬而已。中央权力的增长将导致纯粹的民主制原则和人民的绝对至上地位,这是南北争端的问题所在。所以权力的增长要求更多的控制,允许国家自身与民族相分离,政府必须拥有不同于人民的意志的意志,这些与民主制原则——这场战争的主要产物——是不相容的。迄今为止通过选举权人民行使他们高于行政权的权利。但是他们选择这个人来继续他们政策机构的可靠性取决于这个人能力的平庸和再次改选的希望。但这种最后的可靠性也让位于共同的同意,就如我们在布坎南先生的克己宣言和蒙哥马利宪法条款中看到的那样。总统居住在白宫期间他的确是神圣的和不受控制的;但在他权力荒凉时暴民几乎不受宪法的约束;而在公众意见的疏远之中又会产生专制和多疑。不通过首府行使统治已经成为欧洲专制主义特征之一,除非这个政府是一个军事独裁政府。爱斯库拉、凡尔赛和波茨坦都是这个普遍真理的共同表现,当人们把路易十六带到巴黎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 290 民主制中,像美国政府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在未来进程中是不能看到或达到真正治理的。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首都将是这些大城市中的一个,难以想像任何一个城市能与纽约争夺这一殊荣,它大得让嫉妒者们哑口无言而且没有表现出有任何特殊利益;它支持联邦的力量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它拥有大批的爱尔兰人口,他们是正规军的最佳人选。

蓄奴州拒绝提供他们的分遣队,这迫使政府要求那些一直

忠实的州分摊更多的男子数额。获得他们并不困难，自愿者们立刻纷纷组成许多团，他们服役3个月。4月中旬入伍，他们服役期满在7月，这段时间里他们被要求充当正规军。强大的正规军是与民主制的本质相对立的，对于拥有独立主权的人们，无论从政治原则上，还是在要让具有个人主权的个人矛盾地服从于严厉的纪律方面，仅有的策略就是由若干自愿者组成一个在很有限的时段内服役的军队。但是不守纪律降低了自愿者的效能，华盛顿的指挥官也不太信任他们。当战争开始，邦联的军队占领了波克马特一线，首都一度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幸好最近组建的兵团快速赶到。但是他们不足以应付这场内战。5月3日林肯总统又募集2.3万名男子加入到正规军中，斯科特将军在组织一支强大的正规军　以前不希望侵入南方，当初激动人心的那批召入军队的自愿者不久也返回了他们的家乡。

同时南方议会4月29日在蒙哥马利开会，为完成南方独立的目的进行了选举。它证明在对帮助他们政府准备防卫措施方面非常有用。戴维斯先生在他的咨文中要求5000万美元的贷款，并重复卡尔霍恩的老观点来证明分离是宪法权利。那时戴维斯先生宣布正式接受弗吉尼亚，同时不久在进入危险关头时，6个主要的蓄奴州从北方分离出来，这证明了他的政策的明智。当萨姆特要塞被攻占后，戴维斯先生是7个州的统领者，面积有56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宣战的结果是从联邦中又分离出6个州，面积有31.5万平方公里，人口650万。随着事态的发展，政府所在地被宣布移到里士满。委员们奔赴欧洲，向大国、特别是法国介绍新邦联的利益。

舆论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北方的人民把分离看做是谋反，期望英国在这场斗争能以同情表示支持，他们想像不干涉政策不会妨碍我们施以有利于北方的道德影响。对于这场争论的实

质，英国表现出许多疑问、犹豫以及相当的无知。我们对绝对的君主制的反感不会延伸到绝对民主制，而英国的庸俗和肤浅的自由主义是站在北方一边的。英国政府成功地阻止了南方党派一再要求的讨论，他们承认南方作为交战国的权利，在5月13日宣布保持完全的中立 不用怀疑这是一个审慎的政策，没有给联邦主义者们针对英国强烈的憎恶留下任何借口。和英国交战也许比保护联邦更能引发人们强烈的感情，同时绝大多数的分离主义者们也会在遇到外敌时投身到他们的麾下。因此，反对偏向南方的干涉，有两个决定性的理由：一个是确实的战争，一个是抑制分离的危险 因为毋庸置疑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政治原则是站在南方一边的，这是大臣们了解的，而且他们相信分离主义者们对宪法的解释是对的——仅有一点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这并不重要。奴隶问题的最大困难是表达态度时持极端谨慎立场的原因，但是公平地说，这个政府没有被众人的呐喊失去自制力，他们在美国的代言人乐于与约翰·罗素勋爵向意大利的使者定下的原则相抵触 292

5月的第一个星期，针对邦联在任何情况下发起的攻击，华盛顿是安全的，但是南方军队出现在哈珀渡口，占领与首都正好相对的高地，却是一个不变的威胁。对于北方的荣誉以及政府所在地的永久安全来说，把敌人从波托马克线上赶走是必要的。于是，在5月23日联邦主义者们占领了右岸，分离主义者们退了回去，但仍占据哈珀湖的渡口。随后联邦军在这个要点逐渐包围了他们，同时小冲突在前哨一线连续不断地发生。与此同时第一次严峻的会战发生在靠近里士满的大礼拜教堂，6月9日以联邦主义者的溃退告终。16日哈珀渡口的军队被撤走了

7月4日 在华盛顿召开的国会期间收到了总统的咨文，在这个温和的且没有什么技巧的文件中，林肯先生回顾了他的

政府机关的许多事件并为他的政策加以辩护。他起初打算用不强制的方法反对分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想法被粉碎了。他"在寻求保存政府还没有被夺取的财产和公众地位,依靠剩下来的人修改税收、讨论和投票"。萨姆特要塞在供给被用完之前是得不到给养的,但是如果失掉这个守卫部队对于联邦的主张和地位都是致命的,所以只能用补充给养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没等这个决心被宣布且执行之前,这个要塞就失守了,这下迫使联邦尝试以武力解决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命运,还关系人类大家庭中是立宪共和国或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由同样的人民组成的人民的政府——能不能够反击它国内的敌人而保持其领土完整的问题。……它迫使我们发出疑问:'在所有的共和国里都存在这种固有的、致命的弱点吗?'我们所需要的政府是一个强大得足以保护其人民的自由,还是弱小到无力保持其存在?"在此,我们对处于危机中的美国统治者的政治洞察力有了衡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新教最先提出的。

293 林肯先生继续提出了他的宪法理论,当然是一个允许更好防御的宪法理论。按照上一任总统的说法,联邦优先于组成它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组成联邦,联邦又将它们转变为许多州并赋予它们独立与自由。这种整体创立部分,整体是部分的绝对主人之说,是十分符合民主原则逻辑的结果的。在这个学说面前,很明显,州权是自由的惟一保证,南方州为他们的分离辩护,必须承认林肯对原初宪法的真实解释。这个咨文的结论是要求增加 40 万名男子和 4 亿美元。国会立刻批准了 50 万男子(其中 4 万为正规军)和 5 亿美元。同时政府努力通过预备行动与执政党的要求保持一致,他们挫败了以肯塔基州的布雷肯里奇为首的西部 10 个也许 11 个参议员的反对,他们的态度违背了

所在州保持中立的真实本质。与此同时，散布在密苏里流域的小分队共同作战，没有流多少血便赢得了各式各样的胜利。所以美国军队下定决心动摇联盟主义者的忠诚，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对分离主义者的行动。

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平行的阿勒格尼和蓝山之间横穿弗吉尼亚州，阿勒格尼山在它们的西北面是斜向的，它逐渐向俄亥俄州地区倾斜，是西弗吉尼亚农业发达的地区。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而然地卷入这场冲突之中。贝弗利在这个地区。蓝山与阿勒格尼山平行，在哈珀渡口离开弗吉尼亚，波托马克在它与谢南多厄河的汇合处。这两座山之间是弗吉尼亚的最大的山谷地区，在这里从贝弗利到哈珀渡口的路上是温彻斯特小镇；在蓝山的东面，从哈珀渡口到里士满一线是温彻斯特铁路的交汇点，靠近马纳萨斯山堑，距华盛顿30公里。控制着波托马克河的两岸的联邦主义者被山的走向分开，在三个地方活动。战略上南方位置的关键是在马纳萨斯汇合处，来自南方的军队很容易从这儿倾泻而入，所以他们已经在浓密的树林之间修筑了防御工事，在他们的前面还有一条深河。在温彻斯特控制着军团的约翰斯顿将军已经撤出哈珀渡口，在阿勒格尼附近驻扎有两三个团。联邦主义者的任务是清除西弗吉尼亚的这些军队，提回约翰斯顿，然后在马纳萨斯袭击敌人。7月12日和13日麦克莱伦将军向贝弗利附近的分离主义者发动了进攻，在几乎没有什么阻力的情况下击退了他们，使自己成了弗吉尼亚西北部的主人。但这次决定性胜利的军事重要性已经被在温彻斯特南方军队的全面撤退的事实显得渺小了。17日在哈珀渡口指挥着2万联邦军队的帕特森将军向弗吉尼亚区域开进，威胁要消灭来自马纳萨斯的约翰斯顿将军，与此同时在麦克道尔将军领导下的主要军队从华盛顿对面的高地位置向前挺进，所到之处大肆抢劫

294

和破坏:"这是每一位正直的人所痛恨的地方,"这位将军非常出人意料地说,"一些房子被砸开,还有一些被烧了,他们来到这里保护受压迫的人,并且把这个地区从令人憎恨的党派手中解放出来,以行动来显示他们的忠诚。"18 日,这位将军和敌人在布尔河有了第一次遭遇,河水淹没了敌人所处的位置,他的军队击退了。死亡和受伤使休战旗子举了起来,但是南方的军官们不容许进入他们的防线。这时总统强迫斯科特将军给麦克道尔下命令进攻,20 日,敌人的位置被侦察到了,据说全天有许多的火车驶进马纳萨斯地界。联邦的领导人知道 18 日的遭遇已经给了他们一个警告,知道约翰斯顿没有放一枪就从帕特森那逃跑了,并影响博勒加德与李的会合,帕特森将军不能向他发起进攻,因为在那个非常时刻他的 15 个团宣布他们的服役期已满并拒绝再投入战斗。同样的原因使麦克道尔的进攻也不成功。他于 7 月 21 日早晨使部队向敌人左侧推进,敌人出阵迎战。交战两个小时自愿者团开始撤离,因为他们服役期已满,但麦克道尔仍然坚持战斗,直到后来他的部队溃散与逃跑。该战损失不足 1500 人 因为有一些欧洲军队的兵种在后方掩护,所以没被追击。指挥官做了两次徒劳的尝试想重新召回这支部队。到了295 晚上 11 点钟,华盛顿挤满了来自 30 公里外交战地的逃亡者。南方没有乘胜进攻,南方的将军们似乎对成功很茫然。国会紧急投票决定增派 8 万名男子,由此带来了释放奴隶的威胁。当数以千计的男子在 3 个月期满离开时,这种可预见的失败将严重损伤北方的地位。相反,南方军队会坚持服役直至战争结束。新闻中的这类不同特征的报道形成了反差 北方人反唇相讥,格外的激动和异常的夸张。前进的责任被总司令拒绝了,他自己的可实施计划已被公布,他设想花一个夏季使军队的效率提高,然后在密西西比一线袭击南方,同时用舰队来实施严格的封锁。但

是他的意图没能容许实现，他说："在内阁中有一些绅士，他们对于战争比我知道得更多，他们对作战计划的影响比我更远大……无论我被要求做什么，我将去做或者说是去努力尝试，但是他们不能不负责任地支配我。……我生活了这么多年，知道人类的仇恨对于公众政策是非常糟糕的。"麦克道尔在麦克莱伦的指挥下，帕特森在班克斯的领导下都表现得很出色，在西弗吉尼亚，罗斯克兰斯推进着麦克莱伦的胜利，与此同时在宾夕法尼亚被解散的国民军中出现了一种难以平静的焦虑和不安。

南部邦联的总统在战斗当天离开里士满及时赶到并负责这个中心的指挥。在一份电文中，他宣布了一场苦战的胜利。电文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既无凯旋也无欢庆，它被里士满的立法机关在相同的气氛中收到。南卡罗来纳的梅明杰先生在读到这次胜利声明后说："但这也是有代价的，它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悲伤，滚烫的泪水沾满了寡妇和孤儿们的脸颊，给许多幸福的家庭带来了灾难和凄凉。我推测，先生，邦联国会面对这种情况会没有心思继续他们的日常事务。"然后他转向三个提议，第一，"我们要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手，它是国王中的国王、勋爵中的勋爵，这个光荣的胜利是他裁决给我们在马纳萨斯的士兵的；要请求邦联州的人民在接下来几个安息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显示出他们对这一有力裁决的共同感恩和祈祷。"第二，"我们要深切哀悼无数把鲜血洒到我们祖国大地上的高尚的孩子们；要向他们可敬的亲友致以我们最温暖与最深切的同情。"第三个提议是赡养伤员、国会延期。所有我们关心的与南方各州有关的信息都来自北方，这是远远不够的，不用怀疑这对南方是不利的。 296

邦联的自然沿革很少有人知道，通过回忆几年前发生在瑞士各行政区类似运动的特点有助于理解美国的一些事件。瑞士的激进分子，像美国的共和党人一样，在每个独立的行政区和所

有的法人单位实行绝对多数权利原则。但少数人没有多数人不能侵犯或不能废止的权利，这个理论事实上和强力的权利是等同的。因此，当法定的多数的意志反对他们时，按他们的原则，他们就有理由拒绝：他们可以用他们赋予的法律的权威请求投票；当投票结果反对他们，他们就制造骚乱推翻政府以实现他们的计划。散兵游勇的有组织的暴动相应地成了瑞士现存宪法的正规制度，并且革命是政府的一个工具。天主教会遭到这种党的仇视，因为它不只聚集了德国最能干的无神论者斯特劳斯和泽勒，还鼓动他们去大学里做教授。教会有神圣的权利，她教导人们应有尊重其他人权利的道德责任。出于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她的存在对于那些激进分子是无法忍受的。在阿拉贡的天主教徒受到压迫，来自伯尔尼的强大力量镇压了他们的反抗，在这些强大的激进分子的军队面前，废除僧侣的决定被颁布了。尽管议会宣布这个行动是违法的，但胜利者们十分强大并不屈服。在这个进程的另一面，热情的卢塞恩的天主教徒们也召集耶稣会信徒。这个稳健的党驳回了敌对意见，这个命令在1844年月10月24日开始实施。尽管有国务卿的警告，这个人因为接着发生的事件印证了他的预言而遭流放，他在巴赫男爵年代297 行使权力，当时在维也纳国内的内阁受强大的天主教徒的影响很深。他说："你们正在人民中间点燃一把火，这火不会熄灭，将成为政治阴谋的诱因，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不安的动荡。如果引进耶稣会信徒，你们对我们的敌人开放了一块也许他们永远不会得到的有利地形，在那儿我们不得不总是以武力来对付他们，并且不能指望我们的政治伙伴给予我们支持。"在这个运动中，欧洲大国支持天主教行政区，英国威胁瑞士如果有人打破天主教徒诉诸的协定，他们将改变其中立的立场。梅特涅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将尽他所能保护耶稣会信徒的利益。"反对他们的鼓

动,"他说:"是其他目的一个托词,它将在内战中结束。"卢塞恩的极端组织领导人约瑟夫·卢是一个果断的人,他说:"这些激进分子喜爱邪恶和憎恨美德,他们最恨耶稣会信徒,所以没有什么比我们派他们去更合适的了。"

卢在他的床上被暗杀前不久,一个自由小分队向卢塞恩行进。当时住在这个小镇上的一个著名的瑞士官员描述在进行一系列交涉时的感受。"我没有跟随这个团体的偏见,我认为大委员会允许他们进入卢塞恩地区的命令是不合适宜和不明智的。……耶稣会信徒不是目标,它仅是进攻瑞士中心的好机会,但是由于准许进入,对激进主义而言它可能会在全体新教徒中间唤起相当的狂热情绪来反对其他温和的公民。给敌人一个重振旗鼓的机会太轻率了。……我不是卢塞恩人,没有相应的义务束缚,我的生活、我的军队声誉、我家庭的生存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很疑惑这种牺牲是否是徒劳的,但站在哪边是对的?当多数人是激进的时候少数人必须服从,这个理论是毫无疑问的,与此同时在相反情况下,当少数人是激进的时候,他们仍能拿起武器——这些理论对我来说太赤裸裸了。"

接着这位正直的士兵接到了一个命令,挽救了卢塞恩。这下我们不该有什么误解了,耶稣会信徒在天主教徒和激进的瑞士人之间的争端中同奴隶制度在北美的争端中扮演的是同样的角色。耶稣会信徒已经在弗里堡被接纳,对卢塞恩的号召有响应的人也只是做做姿态而已。不过南方的自治州和天主教徒的自治行政区却都值得像汉普登先生那样为20先令而战。 298

柏拉图说:"当法律在那个国家毫无权威地被废除,我相信不久国家就会被推翻;但是在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是法律仆人的地方,我看是很安全的,在这些国家上帝赋予它们所有的善事。"(《法律篇》,第4卷,第7章)

议会结束时同意对僧侣们的镇压，当自由兵团宣布再次侵入时，7个天主教行政区威胁说将脱离联邦并在他们自己中间建立一个同盟，以保护他们的领土和联邦权利不受侵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如在美国一样，议会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能说它是没有效的。当所有一切都没能说服天主教徒时，他们便在帕默斯顿勋爵和英国代办罗伯特·皮尔的鼓动下由杜佛将军指挥，派一个1万人的军队来对付天主教徒们，他是古老帝国的一个指挥官，也是路易·拿破仑的朋友。《日内瓦日报》说："我们可尊敬的公民杜佛长官，被任命为联邦部队的将军，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职位，他和我们一样对这场战争不赞成采取行动，他在任命前后对每个人都这样说。但是作为一个士兵和这个联邦的雇员，他好像又要服从这个命令，来制造这种惨无人道的牺牲。"

一个短暂的战役之后，天主教徒被击退了，他们的同盟也打散了。虽然双方在原则上异常接近，但必须注意到商德同盟和分离主义者在政策上是不同的。只要其权利得到保障，前者就准备屈服；后者寻求无条件的独立出去，而不选择补偿。这个事件不久，一个政客，即孟泰伦波伯爵，从来没有背离他所热爱的自由，尽管不善言辞，在皮尔的内阁里，针对瑞士问题发表了最具说服力的演讲。

"瑞士的战斗不是支持或反对耶稣会的，也不是支持或反对民族主权的，而是针对你们的。这是一场野蛮、狭隘、不合法的自由对抗宽容、秩序、合法自由的战斗，对后一种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是防卫者和代表。……我以前说过社会的、规矩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代表者在瑞士将会失败，整个欧洲将会遭受野蛮人新的入侵的威胁……去年，专制君主曾犯下罪行；今年，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犯下了罪，他们是更糟的暴君。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通过残酷和无信仰的暴力、忠诚誓言的违背、

299

教条化的人数至上论和以谎言作武器对暴力进行修饰，我们看到了武力的滥用、自由和权利的镇压。……去年的罪行（Cracow的合并）是武力犯罪，以力量的名义犯罪；今年是独裁罪，加进了一些伪善，以自由的名义犯罪。”

1862 年 1 月

美国

整个秋天，事件的进展证实了夏季灾难所造成的观念，压倒南方的反抗是北方力所不能及的，北方没有取得一点决定性的优势。10 月 21 日他们在李斯堡遇上了血腥还击，接下来在波托马克的联邦炮兵连最终结束了战斗。西线的联邦军队也没有什么进展，10 月 29 日，一个海上先遣队出发，11 月 8 日占领了罗亚尔要塞的入口，1.5 万人登陆，没什么可观的成果。同样，即使已经获得了军事胜利也无法拯救联邦。强迫这些分离州回到他们 1787 年宪法原有位置的可能性要依靠南方一个联邦党派的出现。最初，有许多南方人不同意这些年中这个党派为了蓄奴州的分离而采取的一些极端措施。他们想接受北方的条件。杰斐逊·戴维斯的态度中和了这种趋势，他迫使他的党不仅放弃敌对，还要积极地促进他大胆计划的成功，俨然一个成功政治家的样子。作为南方的温和派，他突然呈现出的立场提出这样的条件使北方不可能从安全利益方面考虑加以接受。从最初开始，他宣布分裂是不可改变的，他军队的成功不久让联邦攻克萨姆特要塞的愿望落空。没有资金、没有来自北方政策或内战进展强化的对立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不积极支持分离的政客获得了高官；没有使用应急的措施；法律还未被中止；巨大的牺牲被兴高采烈地制造着；没有一个人被强迫入伍。 300

从纳什维尔离开南方的佩伊顿先生，在 10 月 26 日根据真

实现状描述了公众的感受：

"在北卡罗来纳不存在什么不满。……北卡的人民是团结的，而且决心支持邦联政府，义无反顾地备战直到邦联的独立被我们的敌人所认可。在这个州脱离之前，它也像所有南方州以及所有得民心的政府一样，存在着分裂的公众情绪；这种情绪对于最明智的抚慰政策的实施是必要的，需要抚慰的不幸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但是，林肯先生征召7.5万人的布告违背了所有的法律和权威，宣布'控制、占领和拥有'几个要塞和在哈珀渡口的一个兵工厂——军事力量与所宣布目标如此不均衡——唤起了所有人民的危险意识。这时，《分离条例》被州议会全票通过，并很快被代表人民主权的州大会所批准。这个行动发生在4月底，从那时起在我和人民的密切联系中我再也没听过一点带有反对意见的情绪；相反地，在它的适当性、公正性和必要性方面有一种普遍的认同。

"在我离开美国以前，弗吉尼亚已被推到战争的位置，全副武装并配备了3.3万人的自愿者队伍，有步兵团以及编号为1094的杰出的骑兵团。有6000人驻扎在这个州的沿岸地带，301 指挥营地建在罗利、里奇书和凯里斯堡，源源不断的志愿者人数非常之多，作为州指挥官统领马丁将军在州长阁下的命令下发出布告，通知人们军队不需要更多的人了。"

一个英国旅行家作出极其相似的证明：

"时常会听到在邦联中有高压统治的言辞，但大量的事实让我彻底否认了，这里非但没有高压统治，而且我可以作证从来没有这么团结的人民，每个人都有无比坚定的信心来成就他们的独立事业。路易斯安那的一位绅士对我说：'北方人不知道他们已经干了些什么，如果继续下去，那不仅是所有男人，也是所有妇女和孩子都消灭的一场战争'。约翰逊先生在提及这些州的

一致情感时说，只要从它们中走过，你就会感受到。要求脱离的旗帜从他们的房子中挂出来，女人和孩子们向装满士兵的列车挥动着旗子、衣服和物品从四面八方送给部队中的亲戚和朋友。我和一位绅士一起旅行，他为来自亚拉巴马的一个团包了100个车箱。我自己知道所有的铁路仓库都被相似的捐献塞满。这些不是奢侈品，只是真正家中做的必需品，比如编织品、家里纺织的衣服。在这里这些有爱心的工作被大多数的南方妇女所承担。

"关于不存在高压统治以及人民对邦联政府的信心，没有比邦联的纸币以相同的票面价值在全邦联流通的事实更好的证明了。约翰逊先生最好拿它与华盛顿银行拒绝北方国库券——据报道它因此作为不忠诚机构被暂停业务——相对比。

"北方政府中止了《人身保护法》，压制陪审团的审判，以特权和强迫来干涉，而且广泛拘禁有政治过失或有嫌疑的男人和女人；而南方坚持《人身保护法》和陪审团的审判。……行进于这些州的人不承认他们尊敬的法律及分离以来他们所维护的政府是不可能的，或者对这样的人民不抱同情是不可能的，他们彻底断绝、或几乎断绝外国财力的支持，仅靠自己的活力和愿望成功地维持他们决心成就的独立抵抗直到今天。 302

"凭着这些感觉，我深深地为这场斗争的继续感到悲哀，它对参战者蕴涵着灾难，对整个世界也是损失和灾难。遗憾的是北方仍然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南方仍然存在强烈的联邦情绪。唉，他们的希望和那些没有根据的想法与事实相差得太远了。只要到那里，就会发现联邦的情绪已经不复存在，它已被我不能相信、同时我个人也无法信服的一些仇恨与苦难代替了。

"还有一个同样荒谬的幻觉，换句不坏的话说，北方指望会

有不满情绪在奴隶人口内部产生。可事实相反，奴隶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平和。白人人门全被卷入战争而这个地区的所有的耕种及收获不被间断，由此证明奴隶是一种力量，而非缺陷。南方的局限不是士兵人数，而是他们的装备。……一个南方政府的官员对我说：'我们原指望英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工场和我们的运送者，制造业和海上实力不是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很惊讶，在民族独立的这些日子里，你们没给我们勇气去完成我们的事业，尽管那样对你们将有巨大的好处。'"

在南卡罗来纳博福特附近，先遣队的登陆和对哈特勒斯海峡沿岸空白地带的占领没有唤起北方的任何同情，11 月末纽约一个很明智的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我认为这个运动还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以失败告终。我已经判断出北方不会发现在那个地区有任何的联邦因素，预计这次远征的后果是增加和恶化这个国家不团结的成份。在我看来，北方对从那个地区来的黑人以及除此之外几百名劳工获得任何力量和援助都会感到失望。我认为对北方来说如果黑人大量拥人，这个黑人因素相反地会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和障碍，他们必须要吃饭和被管理，但我怀疑没有奴隶制度，他们能否被养活或被管理。我们好像看到了这个格言的真实——如果北方消灭了奴隶制度，那么他还将会被重新建立起来。我认为对南方的入侵是一个军事错误"

华盛顿政府最终发现基于同情的愿望是无用的，进而这些既没有政治也没有军事上胜利前景的讨论也是令人沮丧的。这种确信迫使他们从其他方面来寻求获得利益的方式，或至少从内战以外的荣誉。有两条路线显现在他们面前，它们既决定性地分裂了联邦主义者，又决定性地团结了分离主义者。

共和党由两个十分接近的部分组成——想把英国从大陆排

挤出去的天定命运者和废奴主义者，他们联合的立足点是中央集权理论，认为公众意志的代理机关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是首尾一贯的民主派，因为他们不容忍对统治权力设置障碍，坚持人民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体现在它自己政府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中。这种体制厌恶分权、中间物的权威、精神上的统一、法人团体、地方权力、参与权以及对少数派的保护等等。它使中央权力绝对高于各州，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引发出许多令人恼火和爱管闲事的措施，这些与我们自治和自由的观念是很不一致的。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政权中仅有俄国接受北方、为什么在英国的民主派是它的朋友、为什么它仰仗法兰西同情的原因。

在政府的基本原则方面，南方显示出最强烈的反差，它的中央政府比旧的联邦政府更强大，因为它不是绝对的，它的权力是明确和有限的，但在有限之中它独立于大众的好恶。各州的权利、不同阶层和利益不受邦联政府的控制，但邦联也不是一个人民共同愿望的玩具或机器。总统选举有一个更长的任期，而不是虚设的一个党派的创造物或者是一种妥协的牺牲品。最能干 304 和最坚定的公众人物被选出来，他很明显地用强烈的意志来管理他的国家。南方这种较高层次也较自由的体制并不是它的领导人的功劳，而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南方邦联的分界线精确地画在奴隶制度和自由的限制上，不是因为奴隶制度的保护处在危险之中，而是因为奴隶制度造成了这些州必须以蒙哥马利而不是华盛顿的政治原则来构建社会模式。奴隶制度是反对民主制的，首先因为它在人类当中建立不平等；其次，因为它使一些人习惯去统治无法支配自己的另一些人。它产生专制，这是普遍真理。但是在当前冲突中奴隶制展现出他们在公众事件中的有益的影响。在这些人口中的阶级——奴隶主即白人和奴

隶——的变化,很快使社会变成了贵族制。

除了奴隶制度以外,在南部邦联和英国之间有天然的姻亲关系,而北方的绝对民主制与他们两者在本质上是敌对的,它有吞并英国属地和释放黑人的双重倾向。不过两个原则在某个方面是互相抵触的。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应该使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某个特殊部分形成联盟。因此,共和党人在这点上有了点分歧。优越于美国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领导的一个党派,热衷于英国公众人物的友谊,坚持废奴运动的原则,明显以内战为目标并且毫无疑问地继续争取欧洲人最强烈的同情。另一派以国务卿为代表,期望反对南方不要走极端,而要将它们带到美国光荣和自由目标的前景中。这种分歧波及到政府,使总统分心,不能平衡如此险恶形势,使政府陷人瘫痪,并且公众的情绪被新激情的兴奋所转移。萨姆纳先生在纽约发表的演讲中对此有一个清晰的描述,在那里他说:

"你们意识中对军队有一个好的理想,但到目前离这个目标还远,因为在这些天内,优势还不在我们这边,这很容易解释,叛乱者在本乡本土战斗,奴隶制增强了他们也使他们发狂,奴隶制是他们的同盟与狂热。他们比我们更自由地使用上帝和自然赋予他们手中的资源——往往将其运用至极限,不仅针对我们所有的白人,也把印第安人卷人内战行列,他们用海盗船航行在海上掠夺我们的贸易,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征用我们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同时他们家乡 400 万的未被干扰的奴隶正自在地贡献他们的劳动以支持这场内战,没有这些奴隶制南方很快就会完蛋。这些促使我们以优于叛乱者自身的军事力量更冷静和镇定地对付他们。但这还不仅仅是钱和人的问题。我们的军队必须得到观念的增援,我们必须直接打击叛乱的发源地和主要动因。我现在还说不出用什么方式或在什么范围,但是我们必须出击。

305

也许是马萨诸塞的将军巴特勒的体系，也许是弗雷蒙特的体系，或许还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更宏大的体系。在这个策略中理性和感性同时存在，只不过要遵照人类最普遍的指导原则，这是一个代价小效果大的方法。对于敌人来说这是可怕的打击，对于好人来说这是一种鼓励，而对于那些关注这场战争的外族人来说是超过纯粹的战斗庆功宴的某种预示。有这样一种呐喊'打到里士满去'，还有一种糟糕的'打到英国去'，较好的一种是'为自由而战'。听听你们这些士兵的声音。是的，让它在政府的意志中回响，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被这种景象征服，我现在严肃地宣布这种呐喊最终被政府采纳。你们将会在国防部长的命令中发现它，预计战争部在 1861 年 10 月 14 号递交给指挥在南卡罗来纳登陆中夺取胜利的部队的将军。在那上面有句重要的话：'无论如何，在多数情况下你们要利用所有人的贡献，无论逃亡者是否来自劳工，只要能为本民族的政府做出贡献，你就可以雇用他们做适合他们的任何事，或者是普通的雇用，或者在特殊情况发生时要求用这样的组织发挥另一方面的作用，班、连或其他什么你认为最有益的贡献。当然，它们不是为军事服务的正规武装，但你们要坚信国会这个十分忠实的主人对于受雇的这些人服役中的损失将会予以适当的补偿。'这些话不是以布告的确定形式出现的，但分析一下，你们会发现它充满着意味深长的含义。首先，由于指派给这个将军处理权的权力来自法律而不是来自于最近的《国会征用条例》，据此这个军事法则被宣布了。其次，逃亡的奴隶不被交出来。第三，所有来的奴隶在阵营内被当做自由人对待。第四，他们可以被雇用去做适合他们的事情。第五，以班、连或其他什么组织有个惟一的限制，那就是'不意味'为军事服务而组成的正规武装。还有第六，对主人，当然不是反叛的主人而是忠诚的主人，国会将予以补偿。所有这些几

306

予不逊于一个解放宣言。……同样，我把它称做最重要的内战事件没错——更重要的因为明摆着这是由总统和陆军部长仔细核准的并且记录于行政机关的政策中的。这个政策被首先应用在南卡罗来纳是恰当的，因为最大的反叛开始于这个州，理应得到最好地矫正。"

对这个演说的最好评论来自于它最热情的英国支持者对联邦给予的建议。

"如果邦联政府把他们自己摆到公正的位置并且果断地支持这个联邦的完整，我们认为……，慢慢地最终会宣布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改革运动，它将号召所有州的黑人加入它的旗下。作为他们结盟之回报，就是立即的和不可更改的自由。……联邦军队在几乎所有的关键地方无为和不成功，它暴露的不仅是准备的不充足，而且是分裂委员会的瘫痪和茫然。因为禁止使用他们最自然与最有效的辅助力量，指挥官们害怕行动。"

弗雷蒙特将军和内阁中的陆军部长在这一领域代表这种政策。前者1856年作为废奴主义者的候选人对于分裂运动已经有过最初的冲动，并且当他获得密西西比军队的指挥权时，他以一个废奴主义宣言确定了他自己的权威，但被总统否决了，这使他下决心摆脱这个行动不便的将军位置。他的阵地在西部，加307 上他在这个地区受欢迎，尤其是和他的军队在一起，在指挥中继续对不情愿走上不可挽回的解放黑人道路的政府实施威胁。各种不顺从的指控和军队的无能停止了总统对这个企图的支持。陆军部长访问西线部队，将军的副手卓拟了一个关于弗雷蒙特行为的报告，证明他的免职的正当性，这个报告被公开了 将军在11月2日收到这个东西，他的前哨部队像炸开了锅，军官们周围的激动情绪很大，表明出支持弗雷蒙特反对联邦政府的倾向。将军否决了这个提案，但他所做的好像没能缓和这种亢奋，

也没有损伤任何一部分对他个人的友谊，假使共和党的对立面之间出现了危机，也许还会用得上他。他退休在纽约，被他的朋友们簇拥着，据说对当局的任何举措都表示不满。

不管怎样，没有任何事能阻止他西部党羽的热情。在圣路易斯一份推荐书被表决，并且发布了一份公告，上面宣称："自由民族崇高的卫士顷刻间成为腐败集团自私阴谋的牺牲品。一个疲软的政府已经把英勇开拓者手中的剑柄扯断了，至今什么也没有。……取而代之必须由人民把别的剑放在他手上，使他为消除谎言和阴谋，为伟大而自由的国家重建而挥舞。"似乎没有要人认为这次行动很重要，只是在弗雷蒙特的号召24天后，辛辛那提德国人的一个重要会议上，康韦牧师使用了强烈的语言：

"我当然感到了奴隶制度的重拳足以让我认识到这个政府不够强大，既不能保护这个联邦，也不能保护非洲的奴隶；同时这个政府正在迫使自己做那些难以忍受和不受欢迎的工作，人们在这场斗争中像古老的伊索寓言，一个强壮的驴蹲在两个负重物之间——一边是虚弱的政府，另一边是巨人般的反叛者。……现在自由的标准已经被弗雷蒙特超越竞争党派地展示出来——比星条旗或勋章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被那个离开了政府温暖翅膀的矮个子将军表述得多么可怜和卑鄙！……你认为在怀斯行政区以南的美国南部各州，宣称他们的军队在严 308 格的命令之下保卫着奴隶制度，对于拒绝加入他们行列的谋反地区，那些黑人棉花制造者和建筑施工者是属于叛国者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些声称逃亡的奴隶是反对我们的间谍的人是在下流无耻地撒谎，那么这个人应该尽快被安置在位于南方末端的白痴收容所。……因此，美国用声名狼藉缓慢前进的卑微政策来替代弗雷蒙特为了这个伟大的民族所发出的令人振奋的口号。"

康韦先生然后进一步说明："对保持奴隶制的南方的军事征服，对于北方就像对于南方一样，是一种抑制。由此，他宣布这个民族必须放弃它命定的和平进程，坐视这些叛乱的州，主导奴隶制度的庞然大物变成一个军政府，看到它不再伸出那丑陋的头去纠缠北方。"

哈勒克将军，作为弗雷蒙特的接班人，发布了一个命令——对南方来说是个好事——奴隶不允许进入军营，因为有人发现他们带走有价值的情报给他们的主人。

信心被萨姆纳的演讲所坚定，很明显这位陆军部长被内阁中的两位部长所支持，同时还有西华德先生。在所有专制政府中，多数的部长均由国家元首提名，他们既没有团结的纽带，也没有留任的条件。在立宪的政府，部长则必须是多数党的领导人，他们因在国会的重要性而不是管理技能和经验而执政，所以他们一起升降，共同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部长负责制原则促成这种必需，麦考莱所说的凭辞令的政府的性质也促成这种必需。一个首相只能为他信任的这些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专制政府，最高统治者不受部长负责制这道屏障的保护，他自己承担他手下人错误的后果。在君主政体中他会失去公众意见的支持，而在美国总统自己应受到弹劾。华盛顿、巴黎和圣彼得堡在这方面十分一致，而在柏林，这种模式是大不一样的。在维也纳，针对部长负责制的法律难以实施以至于内阁不能和他们自己的总统形成一个委员会，设立一个大公来负责的权宜之计不过是延长这种转变。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英国自由党的大臣自然来自议会的名人。1812年，辉格党拒绝与韦尔斯利勋爵和坎宁先生合并，尽管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因为政府成员必须由一党提名，而另一党提名一部分则没有先例，因此就和议会主人应该是内阁主人的原则格格不入了。另一方面，托利党

309

对于独立政府意见的严厉措辞不太敏感，已经在行政机关不断地超越对手，他们按业务而不是按议会上的表现选任高级官员。在其他政府中这种不同还产生更大的差别，不是完全由同一派系组成一个部门，但办公室中的主要人员不可避免地来自获胜的那个党，不依据这一法律的州领导人被诱导从极端相反意见的人中选择部长。通过这种方式他使各种类别的党派都感到满意，因为在它们中间他把他的提升归功于它们，也许他希望以最大热情去讨好它们；同时，平衡一个党与另外一些党的敌对，主持分开的委员会，保护他自身的独立，避免来自天才们占主导地位的影响 因此华盛顿最能干的政府机关中，在全美最让人熟悉的是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两位政治家在政见上彼此广泛针锋相对超过了在英国公众生活中的任何两个人 他们争论的日记已经在杰斐逊文章中出版(这种轻率的做法让我们拥有了最有趣和最富建设性的启示) 显而易见，总统很乐意他们之间的彼此厌恶，几乎他们的能力成了他权力衰退中的最可靠支持。在当前事态中，似乎西华德先生和卡梅伦先生的分歧给了林肯先生一个重要的机会，他担负起这个疲软政府的管理，不情愿站在任何一方也不足为奇。

就在弗雷蒙特回召的同时，麦克莱伦击败了斯科特将军当上了总司令，他在一封致费城公民的信中说，战争不会很长，但也许是极其残酷的。卡梅伦先生在纽约演讲中也用了同样有希望的口吻。托马斯将军说："我们现在所控制的一支军队——我们已经用军事的眼光审视了它的每个地方——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这个军队是不可抵抗的，它所到之处将会像海水一样吞没整个南方。" 310

当弗雷蒙特回召问题解决时，西华德先生努力转换冲突的政策——看样子不可能胜利而且相当尴尬——已经处在支配地

位。利用美国人的心烦意乱，欧洲大国已经决心在墨西哥进行一次干预。在那里他们的臣民被虐待，无政府状态因有美国的支持，自由党的胜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0 月 31 日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大家许诺除了恢复秩序和获得补偿外不寻求获得领土。在这种情况下，邀请华盛顿政府加入这个远征简直是一种侮辱，整个夏天针对英国的敌对情绪在没道理地高涨。英国公众的普遍的观点是南方的分裂是不合理的，北方也正在浪费人力和财力试图去征服南方。这里仍有一种误解，一个畅销的美国杂志说："如果英国人的意见决定了我们的民族今后会分裂，那么它好像也在暗示我们应该按照分裂者口述的条件去分割。"

更严重的是英国保守势力的幽灵，英国民主制的败北唤起了托利党更乐观的期望。托利党在斯坦利勋爵的演说中被指责过，这个演说到目前为止已被我们证明是他天才的最好展现，只是由于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更高的权威，它被非常草率地公布了。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猜测南方的分裂将使北方进攻实力变小，民主党人的第一次失败使它让利于托利党。最后的希望已311 经破灭，这个国家中的衰弱的激进主义者需要给自由党一个广阔坚实的基础。他们掌权依赖美国赞美者和法国的追随者，这是他们的衰弱所在，也是他们对手的希望所在。迪斯雷利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熟练地击中的这个大污点一旦除去，反对派将会失去最好的机会，而且，它已经在评论对俄战争不同的精神中培养了对政府的爱国式的支持。北方的攻击已经反驳了它衰弱的想法，霍斯曼先生在斯特劳德的演讲中非常公正地说：

"分裂将给北方各州以力量，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当前时期的不幸已经让他们对宪法中不稳定的因素睁大了眼睛，当法律不是美国法律而是老英国法律的时候，当很少人管理、许

多人服从代替每个人管理、没有人服从的时候，他们将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政府。”

西华德先生竭力呼吁人们支持他的计划。同族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是没有胜利可言的，加拿大的报酬更叫人动心。从一开始，合并这个大属国就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传统，只是要避免它的解放罗马天主教的政策。该政策在我们殖民地中是个文明举措。任何州在没有其他大多数州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加入联邦，但加拿大的位置已被预留了。当南方要离开时，南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想要；当军队的立足点在于除了保护联邦没有其他目标可选择的时候，军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得通。南方的战争提供了征战的手段，而征战也是弥补南方人损失的方法。冬天的几个月里加拿大从英国人手上是难以得到的。自拿破仑亲王访问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北方在巴黎发现了一个更强大的同情者。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将是法兰西帝国实施雄心勃勃计划的最可能的机会。

大约9月初，两个英国臣民被怀疑是叛徒遭逮捕，但不久又被释放了。西华德先生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边界州的政府针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加紧防御工事。但是这些地方长官们不执行他的命令。

10月14日莱昂斯勋爵写信给西华德先生，埋怨那次拘捕。这封写自家中、既不恰当也不合时宜的信是这样写的：

“贵国政府，美国国务卿在对两个报道说是间谍和告密者的英国国民行使权力时，剥夺他们的自由，或把他们关进监狱中或释放他们，全凭他个人的意愿和高兴。 312

“贵国政府必然把这个霸道和恣意的权力看做是与美国宪法不一致的，是与两个民族之间友好相处协定不相容的，或趋向于制止英国国民出于贸易和工业目的来到美国的手段。

"我不得不向贵国政府抗议这种不合常规的事件，国会必须对英国国民遭任意逮捕监禁的事件作出解释。"

西华德先生回应说：

"英国政府在抗议中也坦白地承认，人民曾引人注目地享受那么长久的个人自由的国家，在战争尤其是内战时，也不能仅仅用在和平时期合理保护公众秩序的内政法律的规定来慢慢调理。叛逆者如果可能的话总是以叫人惊讶的方式进行活动，如果真的实施的话，那么审慎和博爱同样要求这个秘密策划的暴力能被不寻常和有力的预防所制止。我充分意识到这种预防行动所产生的不便、对社会生活中的公众的为难，以及对外国民族的贸易和交流的影响。但是美国人民，为避免内战尝试了各种方式后，已经最终视其为必需。在它实施期间，主要利益不是社会的愉悦和贸易的好处，而是民族生活的挽救。民族生命被挽救后，其他与之相关的好事就会稳定归还，与以往相比并有更大的保障。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全体人民的安全已经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律；只要危险存在，社会平等的所有阶层——外籍居民和本国公民——会愉快地接受这个法律允许的措施。"

这个毋庸置疑的外交胜利鼓舞了美国政府的士气，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在英国，封锁的效果开始构成威胁；贸易共同体渐渐变得不耐烦了；美国的愤怒激起了普遍的义愤；有一个普遍的感觉，那就是弥补过去耻辱、重新获得尊严，我们与美国交往中长期希望的自力更生的时候到了。民众的感情状况就是如此，他们第一个错误的步骤是想当然地在商业阶层中制造煽动，由于所有的贵族和国家的爱国情绪支持，没有政府能控制得住。常常遭美国伤害的民族自豪感憎恨任何侮辱，不管这种侮辱是故意的，还是官方许可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必然表现为对北方的仇恨与蔑视，虽然北方并未违反国际法。英国会热情地为她

313

的荣誉复仇并捍卫她的权利。

11 月 27 日西印度洋上的普拉塔汽船带来了关于美国已经做这做那的传闻。美国护卫舰圣哈辛托的指挥官在哈瓦那遇到了两名南方的特使，从他们那里确定他们正准备把消息送给开往圣托马斯的皇家邮政汽船特伦特号。11 月 8 日特伦特号被圣哈辛托停在了巴哈马海峡，并且两个特使梅森和斯莱德尔先生被强制带到美国的船上，投入波士顿的监狱中。他们的信件被隐藏起来，想找到它们也是徒劳。

宣布逮捕的电报正像人们猜测的，使利物浦的愤怒沸腾起来。同一天召开了一个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要求赔款以维护英国国旗尊严是政府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被敦促，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违犯了法律，但受辱感淹没了法律的考虑。对事实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地方长官没有将船带到港口来审判的扣押行动做辩护，并且即使这艘船被带到港口，这种扣押仍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一个外国杂志受一个最活跃的法学家的指导，陈述了这个不需要引证我们公众人物和最合法权威人士意见的案子，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美国搜查特伦特号的战时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它也不违反关于和敌人联系中任何武器或使者被扣押的国际法。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抓获在邦联服役的官兵。但是国际法中没有一个条款涉及到对于政治谈判者可以实施同样扣押。也的确如此。如果必须在事件的损害人物中查实违禁内容的话，那么就很容易承认，一方的谈判者不应作为必然为害另一方的人而被逮捕。他们两个也许是这样的人，但这件事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被放入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中。他们的目标可能与战争无关，也许，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做爱好和平的第三种调停力量。因此，接受这样的特使一般被看做是中立者的合法权利，对 314

特使应有的保护失效是在他们所派到这个州的敌对特征已经完全被建立起来之后。举个例子，如果特伦特号被带到美国港口，只要英国保持她的中立，美国法院就不会给这艘船定罪。但像这样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权利和公正，以至于在普遍公平的原则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坚持要求最彻底的赔偿。另一方面，我们不认为美国政府会在普遍公平的原则下拒绝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他们可能感觉到了，但只是宣布圣哈辛托船的船长是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行动的，那些犯人将被自由释放并为他们旅途的中断得到适当的补偿。即便破裂暂被避免，但已存在于英美之间长期的敌意仍从这一事件中产生出新的养料，并在将来有可能导致可悲的后果。”

布赖特先生12月4日在罗奇代尔的讲话中谴责这个扣押既无礼又糟糕，不能捍卫它的公正合法；美国作者们提出的辩护是如此彻底地失败，以至于西华德先生的朋友们宣称这个举动没有按规则去做，也没有经过批准。这一切说明在我们有极端海上优势和自以为是的时期，当我们的主张和我们的暴行很快将我们卷入战争时，我们永远不要像我们现在那样暴怒。

315 我们的政府很快要求华盛顿政府交出梅森和斯蒂德尔先生；发表声明禁止出口火药、武器和战争物资，命令1.2万人到加拿大，并且靠保留的水手强烈的意愿支持，开始对舰队进行装备

在美国，圣哈辛托船的指挥官威尔克斯船长的这次行动受到热烈喝彩，人们认为在展示如此精神的时候他没有超越法律，人们期望在非常不明确的情况下英国不要倾向于打仗。威尔克斯船长自己也坚称已仔细考虑了局势，了解国际法的精神，所以要求为很有节制地扣押了那两个政府特派员所乘的那艘船而得到荣誉。但在一次公开宴会上冒险提出这种合法性时，他仍受

到了一个波士顿法官的指责。"当一个人不想从法律书中寻求忠告或者也不与法官协商他的职责时，有一种情况会发生，"比格罗法官说，"他的心、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继续说对于这个案件的法律价值他不发表意见；但是它们不能影响到这个指挥官的功绩，或剥夺国家对他的认可。在美国这样一种情绪状态下，政府不会丢弃这个没有巨大危险的行动的责任。在国会召开的时候，他们投票通过感谢威尔克斯船长；并且海军部长接着作报告说：

"威尔克斯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应该得到这个部门的隆重赞扬；他在是否扣押这艘载有叛乱敌人的船时表现得过于节制，鉴于当时特殊的情况和爱国的动机可以被赦免，但是决不能为将来对待任何类似案件开一个先例，这些人通过外国船从事商业或运输贸易，违反中立国的责任。"

杰斐逊·戴维斯先生 11 月 18 日在南方国会致辞，下面的话说出了他的思路和立场：

"很高的生产量回报了农业劳动力，同时邦联的制造工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时代的需要带来了制造业新型分支的出现，它给军事行动的活跃提供了新鲜的养料。随着冲突的继续，邦联各州在制造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使他们自己生活舒适的物品的手段增加了。为了提供这些在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军事储备和军需品，我们已经逐渐自给。……战争进行了 7 个月后，敌人不仅在向我们领土延伸其占领方面失败了，而且新的州和版图也加入到我们的邦联中；与此同时代替他们未加抑制的恐怖的占领步伐，他们不止在一个要点上呈现防御姿态，交战双方在人力、军事手段和财政状况方面的公平比较，邦联相对战斗刚开始时现在更强大一些。 316

"因为你们体会，密苏里人民在面对几乎空前困难的情况

下,用他们自己的精神和适时的胜利以及他们斗争的伟大目标来引导这场战争。从那以后,肯塔基也成了敌对的活跃舞台,联邦军队不仅无视这个州作为中立州的权利,还坚持把她纳入战争的一方,而且为了进攻邦联的目的已经侵占了她。……只要敌对势力继续存在,邦联就将呈现出稳定的增长能力来提供军队食物、衣服和武器。如果他们不得不放弃许多奢侈和一些安逸的生活,他们至少能有些安慰地知道他们正因此一天天地不依赖于别的世界。这一进程中,如果邦联的劳动逐渐把给人类商业带来生机的大量南方的土特产品转移到其他渠道上,使他们用有竞争力的产品来代替赚钱的传统行业,那么通过这样的变化他们就不再是工业方面的主要的失败者。

"南方诸州提供的棉花因为我们社会模式的破坏而完全削减,这是事实,很明显这个阻碍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劳动力和资本在向其他行业转移和投资。但是这样减少供应会使所有依赖这些原料的外国人的利益受到打击。"

英国特使的逮捕与囚禁增强了南方总统的信心。林肯先生签发于 12 月 3 日的咨文,没有提到他们。下面的话是直接针对英国的:

317 "一个忍受国内派系分裂的民族到处不会受人尊重,而且如果不是两个党,那么起码一个党迟早会请求外国干预的。如此诱发干预的民族总是不能抵制可能是私利也可能是心胸狭窄者野心的劝告,虽然在这种影响下采纳的方法不常失败,但这对于接受它们的这些人来说是不幸的和受伤害的。……因为无论如何,正如在其他各州一样,外国的危险必然伴随着国内的困难,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我建议采纳适当的和有充足理由的方法以维持每一方的公共防御,同时,在这个一般忠告下,为防御我们的海岸线轻易地被占领而准备对策。同样在这点上我也请求

国会注意我们的河流和湖泊、一些防御工事和武器弹药的仓库，以及在海港和航海上选择好的方向加以改进，这对于民族的防御和保护是极其重要的。”

当以法律的频繁修改为主要原则的国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时，紧接着的建议显示民主制中的专制特征：

“我从一些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中了解到，现在国会关于军事上的所有永久的和一般性质的条例将被修订和重新改写，以便包含在一册里，或最多是普通和适当大小的两册。我谦恭地劝告国会重视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建议被采纳，并且来设计一些计划，那么他们的明智会因为最终目标的取得而显得非常地恰当。”他接着说：“我们有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州出于联邦利益的民众运动的总体报告。”很明显他对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争端问题被着重和真实地作了如下描述：

“需要继续强调的是这场叛乱主要地，如果不是根本地，是反对人民政府第一条原则——人民的权利的战争。在非常庄重和经过充分考虑的公开文件中，在叛乱者的一般思想中，都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发现现存的选举权受到限制，除了立法机关外，人民选举公务员的权利受到根本否定，极力证明人民对政府的严厉控制是所有政治不幸的源泉。君主制本身有时候被暗示是逃避人民权力的避难所。按我现在的立场，如果我对这种倒退到专制主义的企图不发出警告，那肯定是不合情理的。” 318

在同一时间，陆军部长控制一支 66 万人的部队；海军部长宣称已有 264 艘船配备 2577 支枪和 2.2 万士兵；财政部长估算到 1862 年 7 月底这年的开支为 10.9 亿英镑：其中 2600 万英镑出自税金；4000 万英镑为已有借贷；还有 4300 万英镑仍要借贷。

自差异出现以来，美国受到了拿破仑亲王的鼓舞，而法国舆论界不祥地偏向于英国的主张。在民主党的胜利使普鲁士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匈牙利被武力压服，意大利准备进攻提亚的时候，两国间的交战为占领莱茵河开辟了道路。这一年是在所有国家的悲观的期望中结束的。与此同时，在家乡，阿尔伯特亲王在这个需要的时代辞世，恐怖和灾难的交织增强了这个民族对女王的热爱。

1862 年 7 月

北美各州

华盛顿政府在秋季与冬季所积聚的军备及在 5 个月之前重新开战以来所取得的节节胜利并没有挫伤南方的锐气，也没有破坏人们所给予的同情，更没有使这场斗争能早日结束。在面临英国政府干预的希望破灭、首府被敌人攻占等种种挫折的时刻，南方人所表现出的姿态证明，联邦永远不能靠武力来恢复；这种信念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 毫无疑问，这种如此坚定的共同信念是由多种动机促成的。即使是正义的事业，也要通过付出必要的代价获取那些对此事业并无信念或并不理解的人的支持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承认这种力量比调查赋予这些实施蓄奴州的爱国心如此巨大力量与持久力的根源更为重要。我们的判断可能会取决于所争论的问题的种种考虑，尽管争论的双方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整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与我们对特殊措施或人物所形成的看法完全无关。南方人的事业是与保障奴隶主的利益的法制相连结在一起的；而这一法制是声名狼藉的、不道德的。联邦的保卫者受正义而又崇高的忧虑所驱使，为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权力与名声。但北方的理论强调代表民众意志的政府具有绝对

319

的权威，使宪法始终与权利原则相抵触并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体制。假如卡尔崔恩能成功地用一种政治与宪法的秩序来取代这种民主的专制，美国的自由与伟大也许会被保存下来。但是，专制主义的解释战胜了他，宪法变得与自由格格不入。除非独立，否则就无法获得自治。南方各州的奴隶体制与政治道德主要原则的抵触程度与北方的自由思想相比显得更轻。此外，奴隶制的保存对于南方来说并非是惟一选择，其自由的制度为北方所蓄意摒弃。人压迫人与社会的性质相矛盾，那只是一种暂时的然而又是合法的生活状况，作为国家应该对其进行治理。国家对于奴隶主与奴隶实施同样的管理，保护一方免受压迫，且保护另一方免受报复。使个人绝对受制于国家是与政治伦理法则及政体理念相违背的，不存在任何第三种力量可以保护权利免受暴力的侵犯，可以声称拥有免受利益与激情诱惑的责任。含有奴隶的社会可能比容忍专制主权的社会培育更为完全的政治自由。因而，美国独立战争中使所有其他因素相形见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保卫自治的权利，而排斥（国家）必须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可违抗的且不负责任的权力的理论。忠实于我们自己的体制的精神应该决定部分英国人接受这样一场论战。

南部邦联政府曾指望棉花生产的灾情、特伦特船上所发生的暴行以及加拿大的惊恐会使其获得英国对其政府的承认，但此指望落空了。我们怀着成为本世纪奇迹之一的耐心忍受了北美洲人的污辱与挑衅以及工业人口所遇到的贫困，致使那些成为我们不共戴天的敌手的人，靠地位、靠脾气、靠背叛我们体制的精神（共和国的早期政治家们所敬重的）而实力大增。来自它的历史传统的势力比其他任何别的国家更敌视我们，这国家已习惯于冒犯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进攻我们的殖民地，以它的影响向世界证明它在这方面洗刷了英国人带来的耻辱和影响。那些 320

在政治上同情我们的人，在商业利益上与我们无法分割的人，指望我们拯救其命运的人惨遭它的征服与蹂躏。我们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因为他们独立的代价及独立后对于英国所怀的感情将取决于英国在他们绝境中所做努力的程度。为了他们政治上的见解，她应该把他们从牺牲社会的福利、国家的繁荣与民主的幸福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直到他们为自由而付的代价超过自由本身的价值，直至他们认识到这种令人战栗的胆怯（我们观察他们的结果）是他们几代人所承受灾难的根源。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干预所无法避免的，而且它不取决于战争问题：不管北方政府成败如何，其性质已被改变，其实力已永远极大地增长了。单单自由州本身从此便成为比美利坚合众国任何时候都更具攻击性的邻居。不管他们在此冲突中有什么样的损失，他们已获得了远远超出仅靠地域或人口范围构成各州力量的巨大实力，这就是统治权力的集中与解放——一支强大的陆军、一支吸纳了几乎整个商船队伍的海军、庞大的军备物资、军事管制法令、国债、苛重的税赋、数额巨大的应付账款，所有这些，所有立宪政治家们长期以来竭力防止的现象，在没有受到阻力的情况下被建立起来并改变了政府。在和平时期要放弃这场战争所授予总统的专制权力已经不可能了。行政机构的主动性、普天下百姓保护者与财务总管的职能、威慑、胁迫与腐败的根源、背离既定的法规而讨好时下公众利益的习惯、为在内战的硝烟中所熏陶的全国士兵逐渐返回和平生活所担负的责任、公共信贷、庞大的预算——所有这些将保留在未来的联邦政府中，并使其更接近于帝国而不是共和式的民主制。因为人们很少会满足于在内战中所获得的荣耀，所以新的野心将被激发去满足他们的虚荣。这是一种我们无法避免的危险，但防止这样的危险，我们应该在建立另一个我们的盟友、自然会反对它的大国那里找到一种安全感。

321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强有力的进行干预的诱惑因素，尽管有国内的压力以及处于危险之中的巨大的帝国利益，英国表现出了一种克制；而这种克制对于北美人来说应该是一种警告。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紧迫感、忧虑与妒忌，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相信南方邦联势必会获得独立。激起联邦分子无比愤慨的这一想法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成了英国恪守中立的一种方式。南方邦联一开始获得胜利时是这样，在斯蒂德尔先生与梅森先生投降以后遇到挫折以及华盛顿政府完成规模巨大的准备工作以示重新开始其敌对行动时证明也是这样。

北方战争行动的长期延续激起了巨大的不满情绪，并威胁到麦克莱伦将军的声誉，以至于怀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否由于军方处置不公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政府所签订的合约书并对整个问题进行了披露。1月13日，道斯先生在国会中对此进行了谴责并披露了日益激发公众不耐烦情绪的事实。他说："早在6个月之前，上帝就要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否则上帝就要我们完蛋。每天要花费200万美元才能养活战场上的部队，自从我们在12月22日开会以来已经开支了1亿美元。而在整个这段时间中，军队都在休息。……这种状况再拖60天，我们将会造成非此即彼的结果，除非我们设法使国家的声望得以维护，并使从这个大厅中的人到全国的人民都维护这样的信念，否则就必须接受不光彩的和平。我们不仅将那些在沙场上我们所面对的勇敢而又像男子汉的那些人，而且将那些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中偷偷吮吸我们鲜血的人都视为叛徒。"为了平抑这一演讲中所表露的情绪，就需要作出某种让步。陆军部长卡梅伦先生辞职，由斯坦顿先生继任。他的任命受到人们的欢迎，而且很快就发起了新的攻势。斯坦顿先生事先就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使部长的权力超越将军与公众，不管这

322

在军事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它反映出中央政府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通过把军队划分成不同的指挥系统，军事上的最高控制转移到了位于华盛顿的文职官员手中。所有共和国都将曾经立了赫赫战功的将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特别重要的是，共和国都在为生存而斗争。雅典通过贝壳放逐法来保住自己，也许后来威尼斯采用了同样的计谋，威尼斯靠暗杀、流放或禁闭那些曾拯救过她的军官并将其公民从意大利的指挥岗位上清除出去来保全自己。这是违背普天之下的法规所采取的暴力性措施，这样的措施曾经缔造了苏拉与恺撒、奥兰治皇族、克伦威尔与拿破仑的辉煌业绩。这使华盛顿受到人们的怀疑，并导致弗雷蒙特的回召。未经政府允许不得发布军事情报的禁令不仅在于控制公众舆论，而且是遏制野心和在若干位指挥官中分散名誉的措施。根据新的安排，亨特将军接过了南方战区的指挥权；哈勒克将军指挥密西西比战区。弗雷蒙特在幕后指挥西弗吉尼亚的山地战区；而波托马克地区的军队西线由麦克莱伦指挥，中线则由麦克道尔指挥；班克斯则负责蓝山与由弗雷蒙特设防的地区之间的谢南多厄峡谷。这是在3月份所作出的最后安排。进军南方的伟大计划在年初就已开始实施。

第一个战役就发生在肯塔基的米尔斯普林。1月10日，联邦军取得了一个胜利。接着是进军田纳西。田纳西河与坎伯兰两条河流向北流向联邦领土，为战舰驶向该州的心脏地区打开了通道。第一个据点是由福特·亨利防守的，最后一个据点是由福特·唐纳尔逊防守的。2月初，联邦军进占田纳西；福特·亨利在2月6日向战舰投降。2月13日，福特·唐纳尔逊受到由格兰特将军指挥的4万人的攻击。[323] 经过3天的顽抗，部分守军突围，其余守军大约有1.2万人被俘。在此之后，战斗在肯塔基与田纳西持续了8个星期。联邦军致力于夺取密西西比河与大西

洋沿岸的重镇。南方军在整个冬季都滞留在华盛顿州的前线，想在联邦军的后方获取一个据点再发起攻击。

1月11日与12日，125条战舰满载由伯恩赛德将军指挥的大军从汉普顿罗兹启航开始大型的远征，大军直到2月6日才到达北卡罗来纳海岸附近的目的地。2月8日占领了罗阿诺克岛，一支南方军的舰队被摧毁，伊丽莎白城在2月10日失陷。一个月过去，没有任何行动，但在3月14日，伯恩赛德将军在纽伯恩取得了一个胜利并占领了博福特。他所指挥的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于，南方军从其战争一开始就在马纳塞斯与波托马克河下游地区所占据的阵地上撤退了。

在远西部地区，他们已经从密苏里州撤退，被柯蒂斯与西格尔将军追赶进了阿肯色州。南方军的范多恩将军于3月6日在皮山挑起战斗。第二天，硝烟又起，他被击败，有1400人沦为战俘，联邦军损失了1350人。在这一战役中，有许多印第安人在南方军中参战，但所起作用甚微。北方军则大多由来自西北地区的德国人组成。

在形势发生这些逆转的过程中，杰斐逊·戴维斯先生于2月22日在里士满就任南方邦联总统并向南方邦联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事件表明，南方邦联政府所谋求的努力超过了其所拥有的能力。因而，在用武力保卫南方邦联整个领土的过程中，不管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我们最近已暴露于敌人面前以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南方邦联从成立之初便缺乏兵员来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战争，业已竭尽人力与远见之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很可能，战争会继续若干年。士兵到处在重返军营，新征集的兵员与重新入伍的士兵在30天内也许会作好战斗的准备。目前的兵员一般来说可以装备400个步兵师与相应比例的骑兵。上个月由于休假与兵员的重新配备削弱了成功进行防御 324

作战的战斗力。”

两个星期之后，即3月6日，林肯先生在北方国会发表咨文，计划取消奴隶制度。他提议通过一项决议，与承诺逐步取消奴隶制的任何一个州进行合作，办法是拨出一笔款项补偿私人所造成的损失与公众由于改革将会造成的不便。这一建议的目的在于把边界州和联邦联成一片，从而打消南方得到这些州的希望。林肯先生说：“打消他们的这一希望，实质上就可以结束叛乱，解放计划的开启对于所有开始这样做的州来说就可以彻底打消他们的这一希望。问题不在于凡是容忍奴隶制的所有州很快开始解放工作，而在于如果所有的州作出同样承诺的话，更多的北方州通过开始这样的奴隶解放就会使更多的南方州相信，北方州绝不会加入南方所提议的邦联。我说‘启动解放’，因为根据我的判断，逐步解放而不是突然解放对于大家来说都更好。单从财政或金钱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位国会议员，只要他面前有统计表与财政报告的话，都会亲眼看到这一战争的目前开支，要不了多久就能以公平的价格购买被点名州的所有的奴隶。”在众议院中，这一提案以88对31票的多数被通过，在参议院中以32对10票的结果获得通过。但边界州的议员们都投了反对票，随之而产生的结果则是蓄奴州对联邦增大了不信任感。随后在哥伦比亚地区采取的一项废除奴隶制的措施更进一步激发这种不信任感。尽管声明所进行的战争不在于废奴，但这些行动证明了政府准备采用博爱与奴隶战争的恐怖来作为征服的工具。

激烈的冲突暂停了一段时间。当战事出现时，它证实了戴维斯先生的预言：“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相信，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水域遏制自以为了不起的敌人。”铁甲战舰“梅里马克”号于3月9日从诺福克启航并攻击了位于汉普顿罗兹的联邦军舰队。

其中4艘战舰有2艘被摧毁、1艘搁浅，联邦军的炮舰"监视者"号转移了南方军舰的注意并拯救了舰队的其余战舰。"梅里马克号返回诺福克，它的战绩就此结束，但它所造成的恐怖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使联邦军在这些水域备受骚扰。在获取辉煌胜利的时刻南方军选择从马纳萨斯撤退，其总统在咨文中已经宣布赞成集中更大的兵力，因为联邦军在如此多的海岸地区发动进攻使他们有必要更集中兵力于中心地区。首府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需要由能够守护的部队来防御不管在哪一方向受到的攻击。这一富有战斗力的调动导致南方军的兵力更加集中，而使联邦军的兵力分散。在华盛顿，3月10日，人们就知道位于马纳萨斯的阵地被放弃了，北方军的指挥员下令波托马克的一支部队向前推进。他们发现道路几乎无法通行，桥梁被摧毁了，仓库迁移了，人畜均无粮草。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在如此困难的乡间带着自己的辎重行进肯定十分缓慢，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于是决定从水路将部队运送到里士满的邻近地区，那儿有河面宽阔的支流，可以使舰队与陆军协同动作，同时确信那里南方军队没有防御。因此麦克莱伦将军带领他的大部分部队回到华盛顿，让麦克道尔将军去追击敌人。部队人数如此之少，他的追击行动肯定是小心翼翼而又没有成效的。在他的右翼，即蓝山的另一侧，班克斯将军于3月23日在温彻斯特附近受到南方军杰克逊将军的攻击。联邦军兵力强大，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325

4月5日，麦克莱伦率领联邦军的主力部队从詹姆斯河河口进发至约克城，发现自己受到遍布整个半岛的一支精锐部队的阻止。从麦克道尔将军那儿得来了援军，他便开始了常规的包围战。在长达4周的时间内，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在攻陷唐奈森要塞之后，格兰特将军所率领的联邦军从田

326 纳西进攻到密西西比州的前沿阵地，而在此处，由约翰斯顿将军与博勒加德将军指挥的南方军在科林斯占据了一个重要阵地，控制了铁路线。两军相距 25 英里。第二支联邦军部队正在格兰特将军的后方行进。4 月 6 日，南方军在夏洛向他发起攻击，将他从所占据的阵地驱赶到河边。在联邦军炮舰火力的掩护之下，他们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可是到了第二天，当比尔将军出现在战场时，他们撤退到了科林斯。联邦军被击败，死 1735 人，伤 7882 人，4044 人被俘，损失了 36 门大炮。南方军的约翰斯顿将军阵亡，死 1700 人，伤 8000 人，1000 人失踪。这一场大战的战果是，两军继续占据各自的阵地达 10 周之久，但他们很快都得到了增援。哈勒克将军统领联邦军，米切尔将军则在东部的铁路线上对博勒加德将军构成威胁；而南方军在密西西比遭遇的巨大挫折使其能够在科林斯集中了大量的兵力。

当联邦军的将领在田纳西受到博勒加德将军的攻击时，他们正在等待攻陷密西西比河上新马德里附近第 10 岛上一个要塞，它与科林斯的阵地联成一线。3 月 15 日，炮火攻击开始，一直延续了三个星期而没有奏效。联邦军挖一条长达 12 英里的地道才成功地占据这一个无法扼守的阵地。南方守军于 4 月 8 日投降，人数为 6000 人。三天之后，大西洋沿岸的珀拉斯凯要塞投降，萨凡纳受到了威胁。从密西西比到新奥尔良的通道仍然受到像被巧妙攻占第 10 岛这样的障碍所困扰；而至新奥尔良的海上通道被强大的工事与一支铁甲战舰所封闭。联邦军在 4 月 13 日向他们发起攻击，在摧毁了南方军的舰队之后才于 25 日向前挺进。这些要塞离城 25 英里，无法防守，2.5 万人的强大南方军已从那儿后撤，与位于科林斯的博勒加德部队会合。由巴特勒将军指挥的联邦军攻占了新奥尔良，实施了军事管制法，这样就形成了包围圈。正是遭遇了这一重大的打击之后，南

方人民的决心才以最为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看出，他们对联邦已没有任何感情，对于贸易活动的开放及贫困的终结没有表现出任何欢乐。在新奥尔良，以及在密西西比河上，联邦军所能到达的每一个地方，棉花都被毁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驻华盛顿的法国公使麦西尔先生访问了里士满，很显然是作为交战国之间的一位非授权的谈判者进行这样访问的。联邦政府尽力将他的旅行说成是在达成谅解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不是执行来自法国的命令。 327

5月4日，南方军从约克城全线撤退。71门重炮落入紧紧追赶的联邦军的手中。5日，在威廉斯堡发生了战斗，后卫部队在使追击者损失了2000人之后继续撤退。在西线，联邦军在5月7日遭到反击，但得到了炮舰的支援。麦克莱伦将军向里士满缓慢挺进，其右翼与麦克道尔相沟通。麦克道尔有两个月时间按兵不动，在波托马克与拉帕汉诺克之间安营扎寨。5月11日，南方军炸毁了梅里马克号并在摧毁了海军码头之后放弃了诺福克。5月20日，联邦军在詹姆斯河的挺进受到南方军炮火的阻击，这儿离里士满只有8英里。陆军在向里士满挺进时每天的行进速度不过一英里左右。5月31日，向奈克哈默尼的挺进受到南方军的猛烈攻击，联邦军的阵地被攻占，但在第二天被收复。他们在两天的战斗中死890人，伤3627人，失踪1222人，并损失了19门大炮。

与此同时，南方军在谢南多厄山峡地区打了一个大胜仗；班克斯将军带领一支4000人的部队驻守在温彻斯特与弗兰特罗亚尔城之间的地区，马纳萨斯铁路穿过蓝山的隘口。5月24日，杰克逊将军包围了弗兰特罗亚尔驻守的一个团。第二天，他以优势兵力将联邦军的大部分人员逐出温彻斯特，班克斯撤退到马里兰。获胜的南方军追近华盛顿，只差两步之遥。联邦政

府恐慌万分，东北各州受令紧急征兵以救援首都。危险的程度被夸大，恐慌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麦克道尔与弗雷蒙特分别从东面与西面合围杰克逊的部队。班克斯重新进入了弗吉尼亚，南方军撤退了，在哈里森堡附近使弗雷蒙特将军遭受重创之后实现了他们的逃窜。

328

由博勒加德所率领的西部大军于5月29日从科林斯撤退，其行军的神秘程度使敌军无法搞清其撤退的方向，在他们自夏洛战役以来所打的仅有的一次战役中，在法明顿击败波普将军，他们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以致哈勒克将军不敢攻击他们。但由于联邦军的舰队在密西西比河上挺进，南方军的阵地相继丢失，直至6月6日，孟斐斯在烧毁了大量棉花与甘蔗之后投降。

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亨特将军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与佛罗里达解放奴隶的声明对奴隶人口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却在边界各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这些原因，加之这是一种非法盗用最高权力的行为，这个声明被总统宣布作废。但是巴特勒将军在新奥尔良的声明尽管给北方军的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却没有被宣布作废。该声明用其士兵的残暴行为来威胁南方的妇女并以此来惩罚任何违抗性的示威活动，它增加了欧洲人对于干预的期待心理，可是英国政府坚持他们拒绝任何调停的立场。

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刻，无论缘于政治公正或国家利益，这样的中立已不再有正当理由了。黑人的命运已不再取决于战争的争端，而是取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方式。尽管它不是一场废奴的战争，尽管无法正当地指责北方公开宣称的一种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最糟糕的恐怖斗争原则，但联邦恢复的基础仍只能通过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制造一种永久仇恨的方式，或者通过延长奴隶制的妥协方式来赎买南方的屈服。同样南方获胜的话

也会促成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南方的政治家们也会采取措施来防止他们的邻居通过阴谋诡计来取得他们用武力所无法取得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留给他们自己来处理，他们会修改他们的财富所赖以存在的体制。这是他们获取独立的机会，在他们的财富发生危机时他们不会干对他们自己不利的任何事情。欧洲列强也许会防止南北这两种恶劣后果并通过这样的行动来获取南方的自由与奴隶的实际解放。他们能够防止奴隶制的延长与永久化；能够废除使道德沦丧的罪恶法则，获得公民所依赖的安全措施；并制定保护与改善奴隶人口的法规。奴隶的福利与社会的安定相协调的、有保留而又有条件的解放，不能指望欧洲之外任何其他的影响。南方邦联必须同意任何合理的条件以作为承认他们独立的交换条件。多少年来都没有出现解决如此巨大社会问题的机会，而抓住目前的机会则是英国而不是所有其他国家的责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体与南方想要建立的民主制之间存在政治上的亲缘性。南方邦联已通过其宪法的精神、通过在欧洲最开明的美国人的朋友证实，在《独立宣言》发布那年前所发表言论的真实性，那就是伯克在提到南方各省时所说："但是，根据我的看法，在这些殖民地存在比自由精神对于北方来说更重要且没受重视的情况，那就是在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拥有的大量奴隶。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情况亦同样如此，自由的人深深地以他们的自由为自豪并最为珍惜他们的自由，自由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享受，而且是一种身份与特权。如果不认识到，自由在一个共同鼓励的国家中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它与繁重的劳役、无尽的苦难及奴役的种种表现相联系在一起，自由看起来就像是某种高贵与随心所欲的东西。……我们古老的联邦是这样，我们哥特人祖先是这样，当今的波兰是这样，所有的奴隶主而不是奴隶本身也将是这样。在

329

这样一个民族中，统治的高贵与自由的精神相结合在一起，强化这种精神并使其战无不胜。"

1862年10月

北美各州

330 6月中旬，夏季的炎热告示南方军与联邦军不要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人们预期会有一段比较太平的日子。联邦仍然在期待扩大自科林斯与温彻斯特暂时中断的胜利成果。一支大军遍布田纳西的南部边境；弗吉尼亚的峡谷被重新征服；围困里士满的军队正在等待增援以及向前挺进。南方邦联的海岸线被联邦军占领；他们的炮舰控制了所有可通航的河道。从新奥尔良与孟斐斯发起的联合攻势是为了占领维克斯堡，这样就可以使北方军成为整个密西西比的主人。北方人民受到他们军队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丰富的资源的鼓舞，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们对于事业的正义性与自己无处不在的进取精神几乎是乐不可支，因而兴高采烈地忍受着沉重的负担、日复一日的不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出于爱国心而作出的巨大牺牲看来与其所奋斗的目标是正当和认同的。在一场反对奴隶制卫道士的战争中，野心、骄傲、复仇和对权力的贪欲似乎不会起任何作用，而在战争的支持者之中却激发了如此大量的无私奉献。

南方邦联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能够阻缓麦克莱伦的增援部队直至能够集结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首府。博勒加德的部队从西部匆匆赶来；杰克逊突然出现在谢南多厄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麦克道尔的前进，并在里士满之前阻止他与主力军的联系，直至南方的全部军力能够团结起来将其击溃。南方邦联赖以修补他们的损失并获取独立的计划由许多天才制定，而且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战果因而将永远名垂战史。在博勒加德从科林斯消失

的4个月中，杰克逊到达了波托马克，于是开始了集中兵力的运动与旨在分散敌人兵力的佯攻。弗吉尼亚的入侵者被赶走，联邦军被逐出里士满，并一直被赶到华盛顿要塞的掩体之中。 331

局面的改观出现在6月16日。在那一天，联邦军攻击了掩护查尔斯顿的工事，但在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被击败了。6月13日，南方军的一支飞行军穿过麦克莱伦将军的右翼与帕芒基之间的地带到达联邦军的后方，在重创敌人、令一方士气大振而使对方闻风丧胆之后平安回到里士满。麦克莱伦认识到自己的部队无力拿下战事，于是要求增援。但到达的增援无法弥补由于处境不利及士兵思乡而不断造成的损失。杰克逊的部队突然与班克斯的部队短兵相接，且兵员可利用铁路从里士满运送至弗吉尼亚的山谷，这样就使政府方面不情愿地让华盛顿的进出通道被暴露了。杰克逊利用他在撤退之后所继续制造的恐怖达成了他在这一短期战役之中的目的。

林肯总统与效忠的各州州长们磋商，征得他们的赞同后召集了30万志愿军。他与在西线的斯科特将军商议，在其返回华盛顿时让波普将军统领弗吉尼亚的联军，联军由弗雷蒙特、班克斯与麦克道尔的部队所组成，共7.5万人之众。作这样的部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波普可以加入对里士满的进攻；而麦克道尔的一部分部队则向拉帕汉诺克进发。

在弗吉尼亚的部队与波托马克的部队会合之前，南方邦联已经在决战点集中了他们的兵力。整整一个月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为集中兵力赢得时间。从完成这一举动之时起，他们的战术就随之作了改变。他们从防御改为进攻，通过大胆而又快捷的动作获取已经延误的收获。星期三，即6月25日，杰克逊将军以优势兵力出现在联邦军右翼的后方。麦克莱伦将军发现自己两翼被包围于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战线而撤回到奈克哈默

332 尼，但受到敌人的追击。6 月 27 日傍晚，在河岸两侧附近的盖恩丘陵发生了最为激烈的战斗。联邦军在夜晚过了河，破坏了河上的桥梁，而在此之前已经死伤 8000 多人，死者的尸体与伤员均落在胜利者的手中。在此同时奈克哈默尼的地形掩护了麦克莱伦的军队并使其免受攻击，他派遣他的先头部队占据了詹姆斯河上一个阵地，接着运来了部队的辎重，而部队的主力在 28 日那天仍然留在奈克哈默尼的右岸。一大片称为白橡树沼泽横卧在两条河流中间的地带，那儿只有一条退路可供联邦军使用。他们行军肯定是缓慢的，队伍拉得很长。29 日深夜，南方军兜了很大一个圈子，目的是为了找到一座跨过奈克哈默尼河的桥梁，于是来到了他们的后方。6 月 30 日，联邦军已经到达詹姆斯河，而其后卫部队则在白橡树沼泽与南方军短兵相接。南方军在其他阵地上重新发起了攻击，但联邦军的阵地受到炮舰的火力支援无法攻克。麦克莱伦终于在哈里森码头找到了立足点，这儿离他所包围的城市相距 25 英里。他已经损失了 1.5 万人与 53 门大炮，他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在面临一支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时，他把他的部队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绕过沼泽地、穿过树林，他成功的撤退说明他没有丧失信心，同时也说明南方舆论界对他们的将领动作迟缓感到失望，他们在 28 日的延误才使其得以逃生。

当这些灾难性的战斗的详细情况以及部队的状况为公众所知时，北方人民感到极为沮丧。人们发现，使他们历尽磨难与屈辱的爱国心已失去了张力。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围困里士满之前给麦克莱伦率领的部队派送了 15.8 万人，但到了 6 月底只有不到 10 万人参加了战斗。北方的新兵中有百分之十的人被发现无法参战，在到达战场之前便已拖垮了。与陆军部长向报刊提供的数据相比，战场上指挥官所实际收到的兵员要少 5.8 万

人。军队中的志愿兵只是短期服役，不计服役期满所造成的损失，就需要12.3万的补充兵员来弥补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其中，填补逃兵的空缺就需要3.4万人。在此同时，麦克莱伦的军队中因病而造成的兵员损失大于战地阵亡的损失。此外，夏季中期所需要的30万一年期兵员没有兑现。政府应允每位志愿兵发给8镑的津贴，后来又由于公众的捐款而增加到50镑，可是到了7月底，只有不到2万人得以兑现。政府的信心与为事业而奋斗的热情被军队受到的挫折与苦难所动摇。从劳动大军中已经抽走了70万人之多，而为了军需供应所需的劳动力却在增加。劳动力中几乎有一半人是爱尔兰人与德国人，他们都属于劳动阶级，而他们对战事的情感是出于利益，而不是出于爱国心。人们指望他们在新招募的兵员中至少会占到四分之三的比例。工资的急剧增长、即将来临的收获季节与对战争愈益增加的恐惧最终超过了他们对联邦的忠诚，政府最终不得不采用威胁手段来征集兵员。政府部门宣称，8月15日将从民兵中征集30万人。期限后来定在9月1日。有迹象表明，尽管对外国定居者服役将支付报酬，但他们对兵役感到厌恶。7月份，在圣路易斯，南方邦联的一个阴谋计划被发现，迫使州长动员民兵，大量爱尔兰人声称自己是英国公民而要求豁免，并要求我们的领事馆提供保护。当征集令颁布时，数以千计的人早已逃之夭夭。尽管像马尔与考科兰一类受欢迎的官员运用他们的影响，但爱尔兰人还是利用他们是外国人的权利而逃到了英国租界。爱尔兰人中的革命党因而宣称："我们确信，在要求英国政府保护且最近才登记爱尔兰的人，大多数事实上是英国人和爱尔兰奥兰治人，他们比英国人更为英国化；而其余的人，尽管是爱尔兰的子孙，不过是英国犯罪分子与匪徒的孽种，他们时不时在爱尔兰居住，取了爱尔兰人的名字以掩盖他们的罪恶和卑贱的血统。" 333

但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他们这个权利被否决了；并已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防止已列入兵员名单的人员逃跑。马里兰几乎有一半应召兵员逃跑；在西部地区出现了难以对付的民众骚动；在印第安那与密苏里州，民众决心逃避兵役，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就抵制兵员的征集。华盛顿政府因为 Vendée 的危险退缩了。对于征兵制度的恐惧刺激了志愿兵员的征集，陆军部长终于宣布已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兵员且不会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自里士满战役以来所征集的兵员总数估计在 20 万人左右。

针对南方胜利真正有意义的反响并不在物资方面的准备，而在于北方的舆论动员。共和党总统的政府站在废奴派与民主派之间，而且不得不向两派都作出姿态，逐步赎回奴隶的建议对于两党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个总统告诉边境州的人们这个提议已提交给他们，而且告诉他们谁来掌握这场战争的关键。虽然这不是强制性的措施，但对于解除他所受到的来自废奴论派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是必要的。来自弗吉尼亚、肯塔基、马里兰与密苏里的 20 位代表回答说，他们确实决心拥护联邦，但是要把通过脱离就能溜掉的说法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为了废奴主义敌人的缘故而掠夺他们是不公正的。他们拒绝考虑任何解放奴隶的计划直至国会投票表决为此而拨出款项，他们没有这个提议。但他们并不坚持保存奴隶制的必要性，他们谴责敦促奴隶起来与叛乱者作斗争的计划，他们还声称废奴主义者的狂热才是脱离联邦的真实原因。“满足南方人民的要求，不要对他们的财产与权利宣战，他们就会重新对联邦效忠如初。”肯塔基州的时任州长召开了州议会来考虑国会关于奴隶制的法规，前任州长威克利夫公开宣称，联邦只有通过剥夺废奴论派的职权并放弃解放奴隶与没收财产的政策才会得以保存。怀着这样的情感，边界州自然就在供应志愿兵员的问题上采取消极怠慢的态

度，特拉华、肯塔基、密苏里与马里兰都不愿意参与兵员的志愿性或强制性的征集。民主党人曾希望从大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那儿获得支持并准备为此而作出大量的让步，这一举动在废奴论派人士中所引起的反响从北方一位作家的言论中即可看出。"至于在对待黑人种族问题上的错误，我们无须作任何辩护，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对待黑人最残酷无情的人是爱尔兰人，但北方的民主党领导人在未来的选举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正是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这些领导人为了迎合我所提及的卑鄙的偏见正在竭尽全力。"另一位记者说："废奴主义者绝大部分是一神教派的教徒与长老会教友。无论是从教义或是从慈善目的而言，罗马天主教的教士都不会与他们站在同一个讲台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美国人对于黑人的偏见、以及在工资问题上爱尔兰工人对于黑人所持的社会性憎恶。"

335

出于同样的原因，爱尔兰人痛恨奴隶制，但也憎恶黑人。他们被奴隶排除在可以通过劳动来获利的市场上；在他们与北方有自由人身份的黑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几乎会爆发一场种族战争。对于奴隶制的痛恨使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渴望战争。除此之外，他们对联邦政府所提供的保护表示感激，而对其作为英国的敌手又有一种依恋。明智的民众专制政治之中似乎有某种可以吸引他们的成分，这是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在他们国内所希望建立的政府模式，使他们过渡到一种可以将民主的形式转变为压迫的工具的体制。对于那些憎恨英国的情绪占主导地位的人来说，联邦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事业。另一方面，教会的影响势必会使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的情感发生变化，正如教会在南方遏制了奴隶制的罪恶。加入废奴运动的呼声将在联邦中倡导一次反对教会权力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徒可能会满怀热情加入北方的政治论战，但他们不会站在任何极端的党派一边。

他们并没谴责这场战争；作为一个团体没参与任何过激的行为，这就是他们之中的首要人物——纽约大主教的行为准则。7月底当他在爱尔兰时，他对每一位爱尔兰人都可能参与的叛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对其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主要条件，除了现实的压制，就是成功的前景。因而，如果爱尔兰有取得叛乱成功的适当可能性，那就很难指责南方各州为解散联邦而作的、会取得成功的努力。通过对为防止联邦解体所进行的战争的最为重要的支持，大主教小心翼翼地消除了这一理论的实际影响。

336

边界各州不再是总统不得不讨好的联邦的惟一部分，也不再能容忍挑衅性或威胁性的语言。如果奴隶制问题把他们置于对美国政府异常的立场的话，财政问题在西部几乎会同样程度地发生。当南方为了在奴隶制与税收问题上为保护州权独立而战时，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边界各州在这个动机上怀有同样浓厚的兴趣。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大片玉米田为了出口的需要动用大陆所能提供的水上交通设施来运送。一方拥有湖泊与圣劳伦斯河；另一方拥有密西西比河；每一方都有自由贸易。北方答应更换并提供保护性的关税。尽管它们的物质利益使它们各有所求，就像北方与他们所憎恨的奴隶制的南方那样。麦克莱伦的失败使这一分歧格外强烈地摆在了它们面前。衣阿华州议会民主党在西部的复兴表现得十分明显，州议会谴责关税与税收法案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它们要求可以用它们的农产品与英国的产品进行自由交换；它们谴责废奴主义者的努力是引起战争的真正根源，并声称美国的宪法是为白人制定的。它们进而声明，这个部长的强制性措施是违法的，人民的法定权利决不应该被中止，政府致力于挽救联邦所采取的措施危害了公民的自由。伊利诺斯州形成了一个秘密社团以抵制对于权利的侵犯，并且

它在西部迅速蔓延开来。这样，西部与边界州地区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充分地一致了。在东北各州的民主党无法以同样的口径来发表他们的观点，监狱中关满了由于被怀疑对联邦不忠而遭关押的人；政府对反对派的每一个迹象都采用高压的手段。可是，由于民主党随着战事的起伏而强大起来，最终决定将矛头对准共和党人的战争政策，建立有组织的抵抗。8月23日，在费城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民众集会，对政府与战争政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英格索尔先生是会上发言最激烈的人，他被逮捕入狱。尽管言论自由的权利被证明是正当的，且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的存在已成为公开而又确定无疑的事实。

观点的发表激怒了受到抨击的政党。改变了北方一如既往团结的军事上的挫折，迫使他们反对极端，这使奴隶制的绝对反对者深感痛苦，同时对战争的政治鼓吹者更倾向于采用调和的措施。从英国最高资格的牧师杂志常驻费城的一位记者的语言中可以推测出废奴主义者的普遍论调："巴特勒将军同时以坚定与智慧统治着新奥尔良。他的严厉程度恰到好处，并没有因为对人民生活缺乏尊重而阻碍他履行自己在城市中维护国家管理的职责。……对于巴特勒将军在新奥尔良所实施的统治，国家感到非常满意。……巴特勒既有良好的脾气，同时又有决断，且精力旺盛，没有任何人更适合于这个职位。"(《日报》，7月9日和16日)

宣告奴隶解放现在已成了一个大党的希望。与此同时，一些人在敦促总统采取这一步骤，另一些人则在指责他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后者的这一观点强烈地表现在废奴论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浦斯所发表的激烈言辞之中，他在庆祝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一周年时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政府是在为保存奴隶制而战斗，因而这场斗争是枉然的。林肯先生是在进行一场政治

战争。林肯先生以及他的将军们的每一项行动中所体现的都是政治。……目前所进行的毫无目标的战争纯粹是耗费人民的鲜血与金钱,南方最好今天就离开,而不要再在现存的可憎政策上浪费更多的生命以延长战争。……通过耳朵我们知道南方的存在,我们既不能容忍它,又无法赶它走。如果让他明天再走,你们将不会得到安宁。……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前,我们决不会得到安宁。杰斐逊·戴维斯的成功远远大于他自己的期待。假如他能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成功,而且能使自己熬到1863年3月4日的话,英国将如所应该的那样承认南方邦联。……以上帝的名义,让这个联邦解体吧,一块新的奠基石将会埋下,在这块基石上永远铭刻着这样的字句:'人在政治上平等'。肯塔基的威克利夫与戴维斯可以拿定主意对总统说,'就这么干,否则边界州就会离你而去';不过,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人会拿定主意说,'就这么干,否则北方就会离你而去'。……上帝已将奴隶制的雷电放在林肯总统的手里以粉碎这场叛乱,但他不愿意使用。"

338

这位演讲者随后称赞了法国革命的例子,在那儿国家有权实施自己的意愿而无须听取相反的意见。这是一贯的狂热语言。菲利浦斯先生认为粉碎奴隶制的道义责任高于国家的政治目标,因而乐于牺牲联邦而谋求奴隶的解放。

8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用的措辞尽管并非夸张,但更为激烈,在这次会议上总统为斯坦顿先生与麦克莱伦将军辩护。会上通过了如下决议:"让联邦保存下来,否则这个国家将成为一片沙漠。……如果目前忠实于联邦的各个州的人民依然对为国家的理想献身或贡献其财产还有任何犹豫的话,那是因为对实施这场战争的方式表示忧虑,并且负责指挥军事行动的人,不管是在内阁之中还是在战场上面,有没有准备好立

即运用国家的所有力量——人人都知道这种力量可以压倒一切——这一切也在忧虑之中。

"我们因而敦促总统采取措施向人民保证,他决心在国家资源所及的规模上进行这场战争。我们兴高采烈地为最近实施征兵的命令而欢呼。我们相信,叛乱的首领决不会再次效忠于联邦,因而他们应被视为不可救药的叛徒来进行处置,应该剥夺他们的财产与生存的权利,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

在纽约,重要的市民集会通过了决议,声称该死的应该是每一位叛乱分子,而不是任何一位忠于联邦的人。他们强烈要求颁布一项奴隶解放的法律。他们说:"这样会把许多叛军的官员与士兵召回去保卫自己的家园,从而使叛军的队伍分崩离析,自由州与整个文明世界将会为解放宣言而欢呼。"

必须记住,令人尊敬的林肯先生,他从没有让自己成为他身 339 边任何派别的工具,他也没有忘记政策与职责的使命,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旧宪法时代的联邦。那一部宪法并没有为人民的自由或奴隶的解放提供足够的保障,共和国为了证明民主的理论的正当需要实施巨大的改革。一位天才也许会想出那些改革的方案,然而方案的实施是否会一帆风顺则是令人怀疑的。林肯先生尚不至于具有那样的雄图大略,假如说他还不能重订法典的话,他已经尽其所能维护法典了。为了回敬霍勒斯·格里利的指责,他在 8 月 22 日写下了如下有意义的话:"至于我'看来正在执行的政策',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让任何人存有任何疑虑。我将挽救联邦。我将在宪法所允许的条件下采用最便捷的方式来挽救它。国家的权威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联邦原先的样子'。如果有人不乐意挽救联邦除非同时可以保全奴隶制,我不会赞成他们的意见;如果有人不乐意挽救联邦除非同时可以摧毁奴隶制,我也不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我在这场斗

争中的首要目标是要挽救联邦，既不是要保全也不是要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挽救联邦而没有解放任何奴隶的话，我会这样干的；如果我能通过解放所有的奴隶来挽救联邦的话，我会这样干的；如果我能通过解放某些奴隶而暂且不管别的奴隶来挽救联邦的话，我也会那样干的。至于我为奴隶制与有色人种做些事情，那是由于我相信这样会有助于挽救这个联邦；至于我没做什么，那是因为我相信我不做也会有助于挽救联邦。无论何时当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会伤害这个事业，我就会少干那样的事情；无论何时当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会有助于这个事业，我就会多干那样的事情。当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我就会尽力纠正错误；同时我会采纳新的观点，只要它们看来是正确的观点。"

在那些准备牺牲联邦来结束奴隶制的人与那些放掉叛乱分子来挽救北方事业的人之间，存在着第三种观点的空间。不惜任何代价来挽救联邦的想法不过是民主党人党纲之外的一个步骤。对于那些既不是废奴主义者又不是共和党的人以及对政府的政策怀有敌意的人来说，可以肯定，他们仅仅是为挽救联邦而斗争，他们惟一目标就是美国的强大；他们正在维护的国家目标既不是特定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特定的政府政策。他们也许会同意维持奴隶制度；他们也许会接受对州权的要求，来做为对超级权威和君主意志的有益限制；他们也许会乐意牺牲林肯先生的政府。在这样一种人的心目中，当军事上的热情处于低潮，或出现失望情绪的反响时，有这样的想法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还会有一种办法来恢复各州的联邦，甚至会远远超过往日的繁荣与辉煌。对于一位是爱国者而不是政客的美国人来说，北方大量浪费其资源；而南方的政治家则处心积虑地创造与使用他们的物资，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肯定会令人怀疑究竟哪一方才是最佳的领导人，对于未来的共和国来说谁才

340

是最能干的指挥者。南方的政治家不仅在他们的政策中展示了他们最罕见的智慧，而且他们纠正了联邦宪法中某些业已为人所承认的缺陷，同时他们已经改善了宪法的精神而不是更改宪法的条文。如果他们的胜利不仅仅导致对于他们的承认，而且导致在有限度的中央集权基础上联邦的恢复，如果在若干州中这样的独立权利将防止工业或农业利益为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作出牺牲的话，那么，北方人也许会乐意承认杰斐逊·戴维斯先生是继承华盛顿事业的接班人。某些迹象已经表明这种观念已经为人所认识。被击溃的联邦士兵在阿灵顿为"老杰夫·戴维斯"欢呼；在北方的城市中，斯通沃尔·杰克逊成了民族英雄。如果他们在胜利时表现出克制如同在失败时表现出恒心，并证明自己在胜利时作为入侵者而显得慷慨恰如在守卫自己家园时那样英勇不屈的话，南方邦联也许会将羡慕转化为热情并卓有成效地利用那样的情感来建立独立并限定他们的权力。

8月18日南方邦联的国会在里士满举行会议；总统的咨文所包含的某些段落有背叛他的政府的某种特性：

"你们上一届所通过的法规旨在通过全民性的征集兵员来维护公开抵抗，并制定统一的管理作战部队的规章制度，这些导致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批评，令人感到十分遗憾。……

"为了整合不同的观点，如果有任何立法在你们看来是需要 341 的话，我很乐意合作筹划关于公开抵抗的关注与国家权力的特别尊重之间调和的任何举措，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财政部长的报告将详细地展示他那个部门的运行情况。你们将会满意地看到，政府债券仍然保持良好的信用。尽管有大量的军事行动，所积存的债务相对而言是很少量的，完全可以证明这样的信贷规模是正当的。……

"就这个问题来说，我认为，一旦出现目前尚未预计到的紧

急情况，由于军队的扩充，某些给养问题需要给予审慎的考虑。美国总统最近往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这样今后就需要扩大征兵法的有关规定以使年龄在35至45岁的人包含在内。目前我们这支军队所具有的活力与效能，他们的状况以及军队领导人所拥有的突出才能使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尚无必要超前一步扩充兵员；但明智的远见则要求，如果在国会的休会期间突然出现某种增加我们的国防力量的需要，这就意味着可以征召这样的军队投入战场而无须等待政府的立法部门重新召集会议。在临时组建部队官员的选拔与任命方面，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各个级别上都会选用一些缺乏能力的官员投入现役。由于缺乏经验，同时也缺乏可靠的选拔标准，行政性的任命与选举有时会出现一些不幸的事例。军队与国家的利益都要求采取某种措施以便撤换不称职的现役军官。我相信，你们会找到可以解除军队中这类官员而较之军事法庭的判决更为便捷、对情感的损伤较小的措施。……

"我十分愉快地告诉你们，尽管美国政府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进行阿谀奉迎与恫吓威胁，南方邦联内部的印第安人依然忠心耿耿并严格遵守与政府签订的条约义务。他们的忠诚亦没有为以下的事实所动摇：某些代理人与督导官员的办公机构出现空缺，但他们在缴纳应该支付的年金与津贴方面却没有延误的现象。"

342

若干议案立即付诸讨论。其中一份议案将征兵法的年龄从35岁延长到45岁；另一份议案则规定，凡率领奴隶的白人军官在被俘时一律处以绞刑或枪毙，并将其奴隶返回其原先的主人；还有一份议案则授权政府征集25万兵员。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南方邦联政府就可以为北方军近期要求增兵30万人的举措进行准备。但他们仍然再次借助于在北方完成战斗准备或组建

新军之前发动强大的战役来赢得胜利。

在7月炎热的天气中，联邦军在战场上并不显得活跃。7月24日，宣布哈勒克将军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23日，波普将军下达命令，要对所有不忠的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此后不久，他便与一支由伯恩赛德将军从弗雷德里克斯堡纽的波特纽斯赶来增援的部队交火。联邦军占据了拉帕汉诺克一线，其南面包括著名的马纳萨斯高地。8月5日，麦克莱伦将军向里士满方向采取了与此同步的行动。波普将军沿着南方军仍然坚守的里士满与弗吉尼亚中部交通的铁路线布防。麦克莱伦在莫尔文山所发动的反击终于结束了他那场不光彩的战役。接连几天时间，波普调动部队向南方军发起攻击；南方军则渡过拉皮丹河向他迎战。9日，班克斯将军在锡达山被击败，损失1500人。

8月16日，麦克莱伦将军从他设在哈里森河湾地区的阵地上撤退，并开始将他的军队运送到艾克奎亚小溪以便与波普和伯恩赛德相会合加入从北方发起的攻击。没有受到敌人的骚扰的这次行动，花费了一些时间。部队刚从半岛上撤出，南方军就立即向波普的部队扑去，希望能在麦克莱伦到达之前将其消灭。8月17与18日，波普成功地将其全军撤出并渡过了拉帕汉诺克河。有好几天时间，两军在15英里长的战线上隔岸对峙，都向对手隐蔽了自己的调动部署。李将军在正面与联邦军交手，而杰克逊穿过山脉于8月29日迂回到了波普的侧翼。这儿是布尔河战役的老战场，联邦军再次被击败。第二天，即8月30日，波普与李之间在森特维尔发生激战，南方军的这位将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9月2日，整个联邦军伤亡惨重，溃退到华盛顿的要塞之后。 343

在西线，南方同样也取得了几乎相同的成功。范多恩迫使敌人解除了对维克斯堡的包围，而布雷肯里奇攻占了巴吞鲁日，

密西西比河再度回到南方军的控制之中。在肯塔基，整个夏季进行了一场游击战，直至南方军协同作战在这个州西北边境里士满取得了一场胜利，并接近了这个州的北部边界，从而威胁到路易斯维尔与辛辛那提等大城市。联邦的领土因此向波托马克与俄亥俄方向的入侵者敞开。

9月5日，杰克逊将军的军队大举进入里斯堡附近的马里兰，位于华盛顿与哈珀河渡口之间，并占领了弗雷德里克。他又沿着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上蓝山的东坡向北挺进。9月7日，他的部队到达威斯敏斯特。他们在所到之处都受到良好的接待，这儿的人都对南方怀有好感，只是长期受压而没有表现出来。士兵们纪律良好，发现当地虽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物资却十分丰富，军官下令凡是购物一律得付款，使南方军简直就像救星一样。麦克莱伦将军已取代哈勒克执掌最高指挥权，统领联邦所有的军事力量与杰克逊作战，一场为争夺马里兰的新战役打响了。

1863年4月

北美各州

1862年9月13日，南方邦联的军队在李将军的率领下驻扎在黑格斯顿，14日，他们被麦克莱伦击败，随后他们就向南撤退。15日，他们的指挥部设在安蒂特姆小溪西岸的夏普斯堡。17日，麦克莱伦又在这儿再次向他们发起了攻击。随后所发生的战斗是最为血腥的战斗之一，同时也是这场战争中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战役。联邦军从两处越过这条小河；但战斗的主要交锋是由胡克将军的师所承担的。他的部队组成了联邦军的右翼。由伯恩赛德指挥的左翼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渡河成功。但两翼都守住了他们的阵地。联邦军声称获得了胜利。第二

344

天，南方军撤出阵地，重新渡过波托马克河。他们的渡河行动未受到任何阻击，归功于14日联邦军1万名官兵在哈珀河渡口向杰克逊将军率领的南方军投降，这样就使他们的撤退畅通无阻。而在此同时，杰克逊就有充裕的时间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前与李将军重新会合。然后南方军挺进到谢南多厄的山谷地带，而麦克莱伦则小心翼翼地率领他的军队从哈珀河渡口推进到马纳萨斯汇流处，他的前方有两个方位点，蓝山位于他与敌人之间；华盛顿处在他的后方。然而，在11月初，麦克莱伦被解职，由伯恩赛德执掌帅印。在此同时，李已经越过蓝山，置身于拉帕汉诺克右岸的里士满与驻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联邦军之间。这时，伯恩赛德立即转移他的军队，但直到12月4日才过了河。13日，联邦军向南方军发起了攻击，南方军固守在城南的高地上，他们的阵地具有极为有利的优势，因而联邦军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试图彻底失败了，进攻者带着巨大的伤亡被迫后撤。15日晚，伯恩赛德重新渡过了河而没有遇到阻碍，从那时起，驻守在波托马克的军队已几乎是不动弹了。伯恩赛德在2月初辞去了他的指挥职务，胡克将军受命接替他的职务。另外两个具有军事意义的战略要地是田纳西与密西西比。在田纳西，罗斯克兰斯将军在布拉格将军的指挥下与南方军作战，地点在默夫里斯伯勒，离纳什威尔东北约40英里，从12月31日开始交火，战斗大约持续了3天时间，伤亡十分惨重，战斗的结果直到1月4日清晨才变得明朗，那时发现南方军已经撤退。联邦军占领了默夫里斯伯勒，从那日起就没敢有任何进攻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在舍曼将军的指挥下组织了一次进攻维克斯堡的远征，舍曼让他的部队在亚祖河的左岸登陆，逐渐向前推进，一路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战斗，从12月27日一直打到1月2日。然而，就在这最后一天，他受到在约翰斯顿将军领导下的南方军

345

的攻击，并被完全击败。守卫不久，麦克伦南将军接替了他指挥这次远征。一个月后，他与格兰特将军指挥的、来自北密西西比的部队会师。在最后的两个月中，联邦军致力于开挖一条穿越维克斯堡地峡的运河以使密西西比河的河道分流并使这儿不再靠河流来设防。半岛只有一英里宽，但土质坚硬，使工程变得非常艰巨。

在最后这6个月中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远比军事行动更为重要。1862年9月22日，总统放弃了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这场战争的企图，发布了一项公告。宣称在1863年1月1日"凡是任何一个州或其属地范围内被拘为奴隶的人，只要加入(反对)反叛合众国的斗争便可从那时起永远获得自由"；1月1日，通过另一项公告，行政当局划定当时有反叛行动的州。随之在元旦那一天，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与其相邻地区除外)、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除外)与当时在联邦军控制下的县均在被划定的地区之内，那儿的奴隶被宣布获得自由。联邦行政当局受命承认并维护他们的自由身份。公告受到废奴主义者的欢迎，他们认识到在书面上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总统有此权力，但情况却依然如故。民主党谴责这项公告是违反宪法的，并图谋为联邦的恢复制造更多的困难，最大的可能性是提升下次国会民主党占大多数的反响。至于为改善奴隶的状况所作出的更为切实的步骤，我们得看一下南方的情况。南方邦联各州的圣公会主教在主要集会上所散发的公开信中，奴隶主们就其应尽的义务而受到告诫："作为基督教徒，本教会宗旨在于告诫会友不要违犯上帝所创建的那些神圣的关系，人无法废除这样的关系，这与基督教徒的义务是相一致的。欧洲所流行的劳动制度，就许多方面而言，比我们的制

346

度要严厉得多，但其安排的方式是为了防止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分离。就我们这方面来说，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摆脱掉可能是我们自己培植的国民生活特征的模式。……我们十分高兴地能够这样说，公众的情绪在这些问题上正很快变得完善；邦联中若干州的立法机构已经为这一问题的终结采取了措施。"由于缺乏来自南方的信息，这些措施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我们并不清楚。仅仅更改南方奴隶制中的这些特点将使这一制度中许多最糟糕的部分保持原封不动。但是，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一旦承认奴隶享有权利，而不管所承认的权利是多么不完善，奴隶主就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秋季的选举结果使民主党人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民主党人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与印第安那都取得了成功，在纽约州被选为州长，国会的18名议员中民主党占了15位，州参议院有一半席位属于民主党人。这些选举所涉及的问题并非如何进行这场战争的政策（这在联邦各州中还不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而是总统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新当选的纽约州长西摩先生在他的就职演说词中说："我否认这场叛乱可以剥夺忠于联邦的州人民的任何一项权利，我谴责南方的内战会减弱忠诚的北方公民自由原则信念的说法。"林肯总统的行动公开违背了两个原则。首先，是对于宪法保留给政府的立法和司法机构的行政权力。根据他于1862年9月24日所颁布的公告，不仅"所有的叛乱分子、造反者及其帮凶与唆使者"，而且"凡是阻碍志愿征兵、抵制民兵征集或是犯有任何不忠行为的人"，均不受普通法庭的司法管辖，"均交军法处理，由军事法庭或军事委员会加以审理与惩罚。"这些军事法庭亦由"一个法官组成并宣判构成不忠行为"，因为"人身保护令对所有被捕的人或现在或发生叛乱后被任何军事机构或根据任何军事法庭或任 347

何军事委员会而关押在任何要塞、军火库、军事监狱或任何其他拘留场所的人均已停止适用。"这样，根据这两项条款的合并，总统根据其个人的判断可以设定若干为法律所不知的新罪名——这是立法权的滥用——并将违法者的审理不委托给普通法官，而是交由他任命的法庭——这是对司法权的侵犯。其次，可能是宪法根本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以联邦权力。"解放公告所要涉及的对象，根据其居住地所在州的法律要继续服役，它是通过州权力制定的，在我们的政府体制之下，这是明晰而又毫无疑义的，正如任何一个州对任何问题所通过的任何法律那样"。[①] 因而，如果这项公告是有效的话，那么决策与执行林肯先生不妥当地以军事需要为借口在判断力上的错误并没有侮辱州的权力。国会在 3 月 3 日闭幕，却在上述这些问题上犯下了进一步的错误，使他完全得以解脱。根据上个星期通过的法案，总统被授权在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可以中止人身保护法的施行。根据第二项法案，他被授权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征集兵员扩充其军队，而无视任何州的边界所在，或不受任何州政府的任何干扰。这样，在其向宪法发起的第二次攻击中，他已能够将国会变为他的同348 谋。民主党无力就任何这些措施作出任何认真的抵制，部分原因是由于害怕消极对待战争的实施而丧失民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屈从于南方的胁迫而从早先不干预州权利的立场上退缩了。

1863 年 7 月

北美各州

在前三个月中，美国有三个具有军事意义的中心，即查尔斯顿、拉帕汉诺克与维克斯堡。查尔斯顿位于一个狭长海湾的末

① 《行政权》，柯蒂斯法官著。

端，大约五六英里长，不过一英里宽，与两个岛屿隔海相望，北面是沙利文岛，南面是莫里斯岛，相互紧挨在一起。这两处地方都已有强固的工事设防。萨姆特要塞就位于两者中途的一个人工岛上。从那儿到沙利文岛的莫尔特利要塞南方邦联布下了一条粗钢绳，靠浮桶浮在海面上，钢绳上挂有网具、拉网、电缆和鱼雷。联邦军的远征军由 9 艘铁甲船与 5 艘炮艇组成，于 4 月 5 日星期天从南卡罗来纳的海岸上的北埃迪斯托河口出发，于星期一早晨越过了查尔斯顿港的关卡。大约在星期二即 3 月 7 日的中午，发出了攻击的信号。威霍肯号上有一只筏可以发射鱼雷；由它率领的这支舰队包围了莫里斯岛而没遇到抵抗。萨姆特要塞与莫尔特利要塞开火了，威霍肯号被钢绳缠住，无法动弹，然后舰队就试图从萨姆特要塞与莫里斯岛之间通过。可是，这一通道被三排木桩堵住了。木桩高出水面 100 英尺，中间只有一只狭窄的开口，还装备了鱼雷供防守之用，后面还有南方邦联的铁甲船。艾恩赛兹号旗舰当时正从萨姆特要塞驶过，但由于海潮缘故无法正常航行，只得弃其他两艘船只不顾。有半个小时的光景，舰队遭到 5 个强大的炮兵阵地炮火的联合攻击，大约有 300 门最大口径的火炮参战。其中一艘铁甲船已处于被击沉的状态，另外几艘铁甲船遭到重创。海军上将杜邦发出退出战斗的信号。

4 月 27 日，驻守在波托马克河的军队，自去年 12 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以来一直按兵不动，终于开始它已延误了很长时间的攻击。胡克将军的目标是拖住李将军的左翼，并切断他与里士满的联系。为此目的，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较大的一部分由四个军团组成。他让部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上游 10 到 20 英里的地方通过各个浅滩越过拉帕汉诺克河，和由斯通曼将军率领的骑兵分开后，摧毁了南方军后方的桥梁，并向城里进

349

发。而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指挥下的南方军撤出了他们的驻地并慢慢地向西行进直到钱塞勒维尔与弗雷德克斯堡之间的一半路程为止。李将军构筑了工事，挡住了联邦军的进攻。胡克将军此时返回钱塞勒维尔一幢位于两条道路交叉口的独立砖瓦房。联邦军在这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前面有伐木，后面有大炮。5月2日，李将军脱离杰克逊与联邦军的右翼交战，大约在下午4时，他的部队全线开火。两个小时后，杰克逊攻击了位于后方的胡克部队的极右翼并全歼一个军，但他的手臂中了他自己人发射的枪弹，使他无法完成最后的胜利。第二天，李将军攻击了联邦军的正面，摧毁了他们的工事，并把他们赶到了屋子的后面。与此同时，塞奇威克将军带领联邦军编制较小的一个师团在弗雷德克斯堡稍下游的地方越过了拉帕汉诺克，占领了马雅高地，然后沿着道路向钱塞勒维尔进发。他在那儿遇到由李将军派出的师团，吃了大败仗之后不得不再次过河。在星期一，即4日那天，联邦军不愿意再次交火。倾盆大雨使李将军在5日那天无法对他们发起攻击。6日清晨，发现胡克已经撤退，他带领他的残部在大雨与夜幕的掩护下已成功地来到拉帕汉诺克河的左岸。杰克逊将军受了伤，使南方军无法组织进攻，也使他们的胜利染上了悲痛的色彩。他被发现需要截肢，由于手术的影响，加上他又患有肺炎，他逐渐支撑不住，于5月9日，就在他取得最后的也许是最伟大的胜利的一个星期之后与世长辞。

在联邦军一系列的灾难之中，对维克斯堡的包围最终成为是一个部分的例外。在联邦军曾多次试图采用远征的方法烧毁亚祖河下游的后方失败之后，格兰特将军将其部队集中在密西西比靠路易斯安那一侧米利肯的河湾一带，离维克斯堡的上游方向有几英里的路程。4月24日，他从那儿出发，沿着河的右岸向前挺进直至来到格兰德海湾的对面。南方军设在这儿的炮

350

兵阵地已在4月29日被联邦军的炮艇攻占，这些炮艇在夜晚成功地越过了维克斯堡，30日，部队就跨过了河。5月1日，格兰特将军在吉布森港击败了由鲍恩将军率领的南方军，然后沿着大黑河向前挺进，5万人分成三个纵队，分别由舍曼将军、麦克弗森将军与麦克伦南将军指挥。彭伯顿将军从维克斯堡进军，试图与约翰斯顿将军会师。但在4月12日，他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计划，他的一部分部队在雷蒙德受到麦克弗森的攻击并被击败。而舍曼则向杰克逊挺进，在那儿约翰斯顿的部队只有9000人，因而迫使他朝北面25英里的坎顿撤退。联邦军随即朝杰克逊与维克斯堡的方向推进。16日，他们在爱德华车站与彭伯顿的部队遭遇，这儿正位于杰克逊与维克斯堡的中间；他们将彭伯顿击败并迫使他的一部分部队向南溃退。17日，彭伯顿烧毁了大黑河上的桥梁，成功地让部队撤回到了维克斯堡。18日，海军上将波特指挥下的炮艇攻占了位于维克斯堡后方的亚祖河畔海恩斯布拉夫炮兵阵地。同一天，这座城市被重兵围困，其右侧是由舍曼将军率领的以密西西比与亚祖河为依托的联邦军，现在已完成了作战基地的修建。这一方的防御工事由一系列的碉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挖得很深的壕沟相通，绵延长达好几英里，工事的防御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不过，约翰斯顿将军答应只要彭伯顿能坚持15天时间的话，就提供增援。格兰特决心试试采用突袭方式的运气。20日，后来又在22日，炮兵连续受到袭击。但在两天时间中，进攻者被击退了，伤亡惨重，格兰特不得不将他的部队前方与后方用战壕围绕，指望通过通常的围困战术缩小地盘。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因为敌人正在他的后方集结兵力。

林肯总统的反奴隶制政策引起了普遍的不满，随后民主党在秋季的选举中又获得了成功，这就迫使共和党人试图在一种

351 新的、较少令人憎恶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政党。忠实于联邦的种种社团已经在大多数北方城市建立，所遵循的原则，不管是立宪的还是废奴的，一概予以排除在外；无条件恢复联邦——奴隶制与宪法自由都是次要的——是所有爱国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组建这些社团是一个成功，维护国家的"权力、荣誉与完整"通过为全党的战斗口号，许多赞成这场战争的民主党人被争取过来并加入这些新的组织。对于南方的镇压被理解成为包括采用最简单的方式使奴隶获得解放；奴隶主的消灭；废奴论派的首领们在党内重新获得他们的位置。在这些社团的集会上，有人作了言辞极为激烈的演讲，其中特别是由废奴论派的牧师发表的演说。政府对这项新的运动的态度体现在允许或许鼓励部队举行军团大会并在会上通过政治性的决议。即使哈勒克将军亦毫无顾忌地预言，在南方被镇压之后，联邦军将"用他们的双脚踩扁北方那些偷偷摸摸做叛徒的人的头颅"。统率着弗吉尼亚军队的米尔罗伊将军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必要的话，武装部队"将消灭北方的叛逆，"哪儿发现有叛徒，就用哪儿叛徒的血"来祭奠和平与自由的恢复。

面对这样的反对力量，民主党采用了更为大胆的论调。在3月18日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新泽西的立法机构郑重声明反对一伙人发动的战争是为了"镇压叛乱的州；反对超越军事界限以军事需要为借口；反对任意逮捕人的行为；反对违宪设置新的州；反对由总统施行解放黑人的权力；全面反对联邦政府运用联邦宪法所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每一项权力——重申'宪法没有授予合众国这种权力，宪法不禁止授予各个州、由各个州或由人民自己所保留的权力'"。在几天后举行的纽约民主党总务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还使用了更为直率的语言。会上通过

352 了决议，声明合众国是"称之为州的、最初的、不可摧毁的、享有

主权的政治社团的联邦";同时声明,人民的自由"正受联邦篡权行为的威胁,只能通过州权力的强有力的行动来予以保护",把战争说成是"现代最无必要的、最无效能的、最具有摧毁性又最为残酷"的行为,而且"受到已经觉醒的基督教徒与文明人民最强烈的谴责"。委员会然后要求如宪法所规定的那样召开制宪会议,凡是 1860 年 11 月 1 日加入联邦的所有州均应受邀请选派代表出席会议以寻求"美国联邦重建与恢复和平"的措施;谴责征兵法案、新的金融体制以及授权总统中止《人身保护法》为违宪,特别是前面一项被说成是"直接违背纽约作为一个主权州加入联邦时就其民兵控制问题所制定的那些明确无误的条件与保留条款,侵犯了州政府的权利,其目的在于将州政府沦为其附属物或下属的省份,让其在庞大的、巩固的、篡权的中央专制主义的制度下接受军事总督的统治"。委员会在结束时向全联邦的民主党保证,"纽约人并非是要消灭白人、妇女与儿童与解放黑人的疯子;他们不是荒唐的流血者,而是上帝和福音的和平的信仰者;他们希望和平,为和平而祈祷,渴望和平,不管任何时候举行选举活动的话,他们会以最强烈的方式投和平的票。"

3 月 28 日,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曾任驻华公使的里德先生发表了讲话,敦促和平的必要性,"即使我担心,但同情的纽带,无可挽回的被切断了";并以南方邦联几乎难以超过的大胆语言宣称州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他的看法,费城的下一次政治较量将"主要围绕地方的主权与国家的巩固这一重大的问题"。抵抗日益增长的联邦侵略的惟一保障在于"若干州的主权与权力";他又补充说:"如果让我在没有联邦的州与没有州的联邦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坚持要我的州。"这一赤裸裸的语言与 1862 年 11 月民主党领导人在接受莱昂斯勋爵的私人采访时的审慎语调形 353

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人谈论和平，除非是在提到联邦的恢复时顺便说起；如果有任何与此相反的暗示，在秋季选举的前夕就有人会郑重其事地不承认其政党表达过任何这类观点。共和党运用其竞选策略在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开展选举活动，他们在罗得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康涅狄格，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州长、4 位国会议员中的 3 位以及州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在后面这个州，两个党都倾尽全力，但共和党具有利用政府影响、特工经费以及波托马克军队中共和党士兵参加投票的优势，这些士兵获准返回家乡参加选举。伯恩赛德将军使民主党的耐心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在辛辛那提颁发的第 38 号通令中，他声明他意欲禁止所有的人对南方的反叛表示或表达任何同情心理。随后不久在俄亥俄州的芒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国会议员、州长候选人瓦兰迪加姆先生以激烈的言辞反对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第 15 俄亥俄志愿军团的两位官员应他的请求"身穿便衣"去参加会议，他们把他的发言报告了伯恩赛德将军。瓦兰迪加姆先生于当日深夜被一连士兵软禁在自己家中，作为囚犯发配到辛辛那提并受到军事法庭的秘密审讯，被查出有不忠于联邦的行为并在战争期间被判刑入狱，关押在沃伦要塞中。该判决是经伯恩赛德批准的，瓦兰迪加姆先生然后上诉到巡回法院申请《人身保护法》。伯恩赛德将军对法院的干预提出了抗议，其理由是他有义务制止旨在削弱政府与军队权威的激烈言论，法官拒绝签发《人身保护法》。林肯先生后来将判决减免为流放到南方邦联管辖下的州。瓦兰迪加姆先生于是乘坐悬挂了停战旗的交通工具被送到南方邦联的班轮上。戴维斯总统允许他途经海岸线以便可能的话前往拿骚。整个北方州到处都举行了无数的民主党集会抗议这些专制的行为，瓦兰迪加姆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民主党在他那个州的州长候选人。如

354

果他当选的话,州权与联邦的篡权也许会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

1863年10月

北美各州

钱塞勒维尔的胜利使这位南方指挥官与他所率领的军队的声誉达到了一个他们所无法保持的高度,并使南方的事业罩上了一种让人昏昏欲醉的成功的光环。尽管在维克斯堡与哈得逊港口进行了英勇的防御战,里士满政府预见到了密西西比很可能会陷落。当布拉格将军受到驻守在田纳西由罗斯克兰斯将军指挥的一支有优势兵力的部队威胁时,长期以来被视为美洲最有才干的将军约翰斯顿却在杰克逊的邻近地区按兵不动,因而决定军队将再次挥师北上。希望某种大的动作将使联邦的人民感到恐怖,这些人一直是躲在安全的地方看着雇佣军走上战场,他们向世界证明,9月份所没有达成的目标不会再超出南方的智谋。敌对的力量仍然聚集在里士满的附近,而且无法将其赶走;新的意图是针对查尔斯顿的,有可能腾出兵力来进行远征,但李将军发动了一场很少有成功把握的战役。6月12日,他撤出了他设在拉帕汉诺克的营地,将他的部队调进了从山之中。他留下部分兵力来观察胡克的动静,同时由尤厄尔率领杰克逊过去的师进入谢南多厄的山谷地带。13日,尤厄尔在温彻斯特突袭米尔罗伊并捉了许多俘虏。15日,先头卫队在哈珀河渡口以北越过了波托马克河,所处的位置有可能使他们在同一天到达宾夕法尼亚并占领钱伯斯堡。18日,部队的主力部分也接着过了河,其余人员在26日过了河。胡克对渡河一事按兵不动,未加任何阻拦,他立刻返回华盛顿,28日,他的部队抵达弗雷德里克。在此同时,李将军出现在宾夕法尼亚的部队之中,威胁着哈里森堡,并向他的士兵们大量提供所缺乏的物资。他在那儿 355

呆了两个星期,既没有受骚扰,也没有受到追击。

28日,米德将军在弗雷德里克就任联邦军的最高统帅,他曾在钱塞勒维尔战役中掩护胡克的部队撤退,他立即发兵与南方军作战。李将军很快在莫诺凯萨河的源头地区葛提斯堡附近收编各个军团的残部,他所处的位置可以使他向黑格斯顿与波托马克的撤退受到南方山的掩护,而且可以占据通往费城与巴尔的摩的铁路线。但他还没来得及集中他的部队,便于7月1日在葛提斯堡以北遇到了米德将军的先头部队,联邦军扑向其主力部分。第二天,米德依托坚固的阵地主动挑起了战斗,下午晚些时候,他受到南方军的攻击。3日,朗斯特里特与尤厄尔再次进行攻击,但他们遭到反击,伤亡惨重。就在同一天夜晚,李将军开始撤退,将4000名俘虏留在了敌人的手里,但他仍然带走了大量的俘虏与一长列的火车车厢。波托马克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留下的废墟使河道无法通航,他在黑格斯顿的南部呆了一周的时间,始终处于守势,有两次给冒冒失失进犯他右翼的联邦军造成了重创。米德缓慢地跟随着,收编了大量未经战斗考验的部队作为自己的增援,他带领这些部队匆匆发起攻击。在7月11日至14日之间,李将军带着他的火炮、伤员与辎重平安进入了弗吉尼亚。

南方主力军在一名将军手下失败,几周之前一位出色的法官曾写道,这位将军"毫无疑问应被列入最伟大的现代战略家之中"。南方主力的失败宣告南方邦联已经竭尽了全力,并且预示其他地区的一系列灾难。在这些地区,他们仍在激战,但胜算很少。7月4日,维克斯堡经过48天的包围之后被格兰特将军攻陷,在此过程中,围城者需要加固自己的阵地以防备威胁其后方的约翰斯顿将军。4天之后,当消息传到哈得逊港的守备部队那儿时,他们也向班克斯将军投降了。从圣路易斯驶向新奥尔

良的船只表明，南方军在河上已没有剩下什么据点了。南方军在18日放弃了密西西比的首府杰克逊，联邦军占领了这座城市，发现了杰斐逊·戴维斯先生的私人信件，但联邦军不久便撤出了这座城市，也并没有去追击正在向东后退的约翰斯顿。布拉格将军已经从田纳西撤退，在查塔努加占据了一个坚固的阵地以保卫亚拉巴马，他在那儿被罗斯克兰斯将军慢慢地追赶着，因为罗斯克兰斯是联邦军中最小心谨慎的军官之一。正当南方军从密西西比、田纳西、肯塔基节节败退的时候，摩根将军越过了俄亥俄到印第安那实施袭击，在辛辛那提引起一片惊慌。但他很快就陷入了灾难之中，他被追逐、击败并成了俘虏。当时，美国人长期的注意力一直是在维克斯堡，现在转移到了查尔斯顿，博勒加德正在这儿进行整个战争中最为科学的防御战，以防吉尔摩与达尔格伦所率领的部队从陆上与海上发起攻击，因为这两位将军所配备的是最新型与最富有摧毁力的武器。从7月中旬以来的两个多月中，萨姆特、瓦格纳和莫尔特里要塞都受到来自海岸与铁甲船的攻击，火炮的威力超出了欧洲火炮专家所知道的程度。北方人不断为收到的胜利捷报感到欢欣鼓舞，直到9月6日，守备部队才放弃了莫里斯岛。

不过，除了对查尔斯顿的围困之外，联邦军似乎一下子全都丧失了向前推进的干劲。米德在波普、伯恩赛德及胡克都曾呆过的拉帕汉诺克按兵不动，格兰特从一开始就没有进一步扩大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征服者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林肯先生下令征集30万兵员以便加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队，这一措施又再一次把政治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当李将军在萨斯奎汉纳的时候，是政府不倦的努力与驻守波托马克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挽救了联邦。在宾夕法尼亚，人们感到的与其说是惊慌还不如说是沮丧。民主党在与

其相邻的俄亥俄与纽约州都拥有优势，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胜于对敌人的憎恨。麦肯齐要塞的大炮正指向巴尔的摩，因为担心发生倾向于分裂的叛乱。一个来自纽约的通讯记者写道："公众的情绪似乎全变了。假如李将军再能干一点，进而拿下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并让希尔、朗斯特里特及尤厄尔将军来掌管这些城市再向纽约进军的话，人人都会感到高兴。6个月之前一口咬定北方决不会同意分裂的人们现在已只好接受这场灾难了；在此同时，许多认为联邦可以恢复的人则认为李将军比林肯先生更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征兵的前景反而激发这样的感情。7月13日，纽约发生了骚乱，直到第4天才被完全镇压下去。这场骚动主要是针对废奴主义者的。那座城市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特别是爱尔兰人，把憎恨都发泄在黑人身上，他们把黑人看成是造成如此多人流血的根源，因而对黑人发起了全面的攻击，许多人被杀害。休斯大主教对爱尔兰人发表了讲话，但似乎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也许讲话的当时只有少数骚动者在场，也许他在讲话中没有针对造成骚动的真正根源。然而，有一大群暴徒主要是由爱尔兰人所组成的，却仅由于一位牧师的几句话造成了误解而发生了意外的事情。2.5万名联邦士兵被派往纽约以强化征兵工作。名单预先准备好了，就像华沙宣读放逐令那样。这样，仅在一个地区就有1.4万人被怀疑存有不满情绪而被征召，超过了原有的限额。西摩州长迫使政府对名单作了更正，这个草案被执行，没有再引起新的骚动。兵员的征集在别的州，例如缅因州、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与马里兰州，也遇到了抵制，有好几千人当了逃兵。

这就是胜利所造成的后果。南方邦联在遭到挫折之后便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北卡罗来纳州在一开始就不怎么乐意加入分裂的行动，第一个表露了沮丧与不满。那儿的人很快就从布拉

格与李的军队中逃跑。总统向部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可以设想他是以其通常富有男子汉气概与通情达理的口吻演讲的；李发布了简短而又有说服力的命令，其内容对于败军之将来说堪称典范；副总统开始到内地游说，以胁迫的口吻要求人民不要汛丧，而要站在南方邦联政府一边。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向自己或向整个国家掩饰业已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巨大灾难，他们在想方设法重整已经遭到失败的军队。命令已经下达，让所有能 358 拿起武器的人全都征集入伍，有许多人用金钱购买替代者入伍，这样的人数量很大，被召到这个军旗之下。这是在最后危机时刻得以维持的一个方法。这的确是可靠的，但庄园主不期望这样，除非他们濒临绝境——奴隶的武装。

在围攻哈得逊港与查尔斯顿的时刻，联邦军曾采用由逃跑奴隶组建的团队，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极勇猛，且伤亡人数的比例很小。在路易斯安那，班克斯将军曾让从庄园中强制征集的黑人加入军队。在新奥尔良，脱离联邦的居民完全听凭刚才在河边杀死他们同胞的黑人士兵摆布。里士满政府试图停止这种给他们造成巨大威胁的做法，并声明他们将拒绝为带有黑人的军官提供住房；黑人俘虏将交给他们原先所属的州处理。林肯先生回答说，他有义务向联邦的所有士兵提供同样的保护，并将对南方邦联的俘虏进行同样的报复。当葛提斯堡与维克斯堡出现灾难的非常时刻，史蒂芬斯先生试图前往华盛顿以取得在这个问题上的谅解，但没有被允许。自从格兰特与班克斯取得胜利以来，所有州的奴隶几乎都在联邦军的掌握之中，联邦军也决心利用这些奴隶。仅密西西比与路易斯安那就有 75 万奴隶，可以为黑人部队提供全部的兵员。并非黑人对奴隶主的憎恨使前景令人可怕，而是他们很容易接受军队的纪律教育，也很容易被鼓动起来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并以让慈善家与牧师激起情感的烈

焰去重创敌人，因为他们不可能指望对其施行玷污海地革命那样的肢解暴行。

隐隐约约的传闻说南方的政治家们已经在考虑这一可怖的危机，以及针对这个结果的更多疑虑，证明其决心是多么巨大。没有任何条件会使奴隶勇敢地为奴隶主斗争，除非是为整个奴隶人口的彻底解放。奴隶主最终会丧失他几乎全部的家产，但至今还没有找到以什么样的方式使自由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州得359 以运行的模式。除了对私人利益要明确的考虑之外，奴隶制对于南方的爱国者来说除了已成为某种独立与自治的象征，还如中世纪大论战中的竞技场与主教牧杖一样。日益受到抨击的这一制度对庄园主来说已变得格外宝贵，这并非出于固执与仇恨，而是因为它已被看做与整个权利系统一样了，正如自由贸易问题或银行问题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为奴隶制而战，因为如果同意解放奴隶，也许会让他们的大部分敌人高兴。

迟早会战胜反对势力，这个动机的力度很容易让人理解。在奴隶主之中大量的现实状况激励了他们的物质牺牲精神，家园被摧毁、亲属遭到杀害、已不再有奢侈的生活、日用品严重缺乏、成千上万的家庭毁于战火——所有这一切使许多人对更多的牺牲有了情绪，也许预期还会有更多的其他的损失。棉花已经失去了优势，因为英国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不再受棉花短缺的胁迫。每一片田地都改种了玉米，这就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曾几何时，南方决不屈服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很难相信为了独立的缘故会拒绝作出任何牺牲。除非返回联邦而挽救奴隶制度，我们很难怀疑南方邦联将会付出奴隶解放的代价来选择自由。

在北方始终有一个大党，它宁可放弃联邦而决意使美洲摆脱奴隶制的祸根。政府以专制的手段来进行这场战争以满足这

个政党的要求，却激发了另一个政党更加重视州权与自治。两党都耗尽了全力来维持如此巨大的斗争，可能会使南北之间差异的根源消失，并在北方发展一种与南方友好与结盟的原则。解放法令会让严厉的废奴主义者乃至整个民主党与戴维斯先生的关系较之其与林肯先生、共和党的关系更为密切。让奴隶参军的决定将给以前的南方政治家们带来他们漠视的问题，即按他们自己的政治原则来恢复联邦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超越军 360 事专制主义的自治的胜利及超越奴隶制度的自由的胜利。在旧联邦的基础上不带有华盛顿普遍专制主义或里士满奴隶制的邦联，给分裂的领导人提供一个不应该完全去批判的前景，它将补救美国民主政体最大的弱点，构筑世界上一个最为自由和强大有力的民族。

二十三、阿克顿—李将军通信*

致阿克顿夫人

莱克星顿，1866年3月1日

亲爱的阿克顿夫人，我利用给予我的特权，想让您知道通过您亲切的来信我多么高兴地听到了在母国对于我们至少还有些可贵的精神同情。

您可以了解所有或者至少一半我们已经忍受的委屈吗？也许只有你丈夫有说服力的笔才能描绘出了令他的读者震惊的事件景象。我们就最好把它们忘掉。

我把自投降以来出现的一些诗句封入信封，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它们非常令人感动，在李将军这个名字受到尊敬的国家，在这个家族真正起源的地方，它们也许能被赏识。

我冒昧把一部像是李将军在战争期间的手稿寄给您，希望您确实能收到，我们认为它比目前面世的作品更好。再次邀您光临我们这个现在并不愉快的国家，我们非常高兴欢迎您到我们的坐落在山区的寓所。

---

* 李夫人给阿克顿夫人的信出版在阿克顿：《往来信件》，第302页；阿克顿勋爵给李将军的信出版在道格拉斯·弗里曼：《R.E.李》，第4卷（纽约和伦敦，1935），第515—517页；李将军给阿克顿的信出版在阿克顿：《往来信件》，第302—305页。

最忠实和尊敬您的，

玛丽·卡斯蒂斯·李

伯罗格纳，1866年11月4日　362

先生：

去年冬天李夫人写给我妻子一封亲切的来信使我鼓足勇气给您写信，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冒昧，但愿您不会把对您荣誉与力量充满敬意的人的来信当做是一种冒犯。

新年伊始，《每周评论》的总编要求我对美国事务提供个人意见。这家刊物受格拉斯顿先生同道的指导。你知道，毫无疑问，格拉斯顿先生在帕默斯顿勋爵内阁中是少数，在美国战争中他希望接受法兰西皇帝的调停建议。

在我的建议中显示出来的信心仅仅缘于我曾经旅美这一事实，后来，我尽可能去接近并敏锐地捕捉这4年争论的发展，来处理我们面临的不完全和不真实的消息。自从您插剑入鞘以后，在已经上升为重大的问题上，我力图使我的决断符合您个人，并且我从有关您的报告中，从很高兴能和您说上话的极少的英国旅行者中得到确证，特别是从博勒加德将军那儿，正如我了解的，他说您的情感，也说他自己（我的美国旅行没超过马里兰南部）。因为我能够求助的几个朋友都是北方人，大部分在怀伯斯特学校。

鉴于美国争端问题的重要性和我们两国间公众舆论有误导的危险，我决定这次特殊之行。我于是求助于南方当局，斗胆去了总部。

先生，如果您同意接受我的请求，并且告诉我您希望近期美

国政治被理解的立场，我可以保证新的《评论》将跟随您指示的路线；我会在任何与您可能给我带来荣耀的交往中保持最坚定的信心，并珍视交往中的一切。纵然您因缺乏正当性而回拒我的要求，我相信您会将它作为打破错误报道和误解的尝试而保留在您的记忆中。这种误解挡住了我的同胞的视线。

363

英国对于南方的许多善意不可能避开您，如果它仅仅是对您的战绩的惊异和羡慕，那么它既不公正，也不真诚。它部分出自对民主制度的内在衰落和毁灭的乐观信念，部分出自美国将因分离而削弱的期望，还有就是对法拉格特出现在英吉利海峡、舍曼登陆爱尔兰的遥远前景的恐惧。

我相信您会把正在引导着我的笔端的、对您的成就与生涯的敬意，与那种徒劳且一文不值的同情区分开来。

不敢冒昧解决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且很明显，从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著作中，我知道宪法之父们不会同意这种解决；我把州权视为主权意志的专制主义的惟一可行的制约手段，而分离之所以是我希望所系，不在于它是民主的毁灭，而在于它是民主的拯救。您的共和制度在旧世界没有产生本应具有的有益和解放性的影响，那是因为共和原则的缺陷与滥用之故，而这种缺陷与滥用，正是邦联宪法急迫而明智地要治疗的病症。我相信通过涤荡共和制固有的危险和失序，以那个伟大的变革为范例的自由的建立，将是全人类的福祉。因此我认为您是在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进步和我们的文明而战；里士满所失带给我的悲伤远甚于滑铁卢所得带给我的快乐。

博勒加德将军向我证实这些文章中的一则报道，说您正准备记述您的战斗经历。我衷心希望这是真的，也希望里士满清城时您所说的资料的散轶不会使您缺少必需的资料。欧洲作家正在试图用单方面收集来的资料重建那段可怕的历史。我手头

有一本普鲁士官员桑德写的一本精细的书。未来的出版物不太可能像这本书那样对您的军队和您自己的声誉赞赏有加。他的情感是强烈地亲联邦的，他的数据，特别是估计您的军队时用的数据，是来自北方杂志的，但他书的结尾成了对您军事技巧的热情颂歌。它会使您对这位作家产生良好印象。他熟知细节，对于您 1863 年秋天朗斯特里特不在的情况下对米德的作战部署，觉得是一种艺术的快感。 364

但是我也听到第一流的普鲁士军事评论家对他们缺少确切的资料表示遗憾，而这些资料对于科学地评析您的战略是必不可少的。肯定地，那些归于您手下指挥官的荣誉，只有您的手才能分配和保证其公正。

如果您屈尊回信，来信请寄罗马[塞瑞?]宾馆 J. 阿克顿先生收。先生，我对您的敬意无法言表。

您的忠实的仆人

约翰·道伯格·阿克顿

弗吉尼亚，莱克星顿

1866 年 12 月 15 日

先生——尽管您上月 4 日的信我这么些天还没有回复，但我希望您不认为我对于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来信太多，实在一时来不及回。作为南方的公民，对于您对它的事业表明的同情和在我与它的联系中你们对于我个人的善意评价，我感到深深地蒙恩，我意识到我欠您的情。欧洲的流行意见对美国当前政治的影响总是有益的，现在美国发生争端问题的重要性不仅涉及这个国家的宪法自由和立宪政府，而且涉及全人类的自由和文明的进步，这使您的主张具有特殊的价值。您为正确地引导舆论所作的努力，将使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心存感激。

在两个国家冲突的声明和意见中，揭露被党派热情所掩盖的真理，或使之从大量偏见和激情中解脱出来，不是一桩简单的任务。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过誉，您希望我表达意见，作为检查美国政治的一个角度；我纵然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参与由宪法的创始者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讨论。我只能说，虽然我认为一般政府的宪法权力的保护是国内外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我仍然相信365 权利和威信的维护要靠国家和人民，这不仅对一般体系的调整和平衡是必需的，而且对自由政府的持续也是一种保障，我把它看做是我们政治体系保持稳定的主要源泉。若干国家合并成为一个庞大的、对外有侵略性对内是专制统治的共和政体，肯定是治服所有先于它的东西的前兆。您是研究美国历史的，所以我不需要多提到您也很熟悉的人如华盛顿和杰斐逊的官方文件，他们是联邦和民主党的代表，谴责权力的合并和中央集权会破坏州政府和趋向于专制主义。新英格兰的公民是南方最凶猛的对手，他们一直没有公开声明他们现在拥护的观点。路易斯安那州是杰斐逊购买的，因此他们通过其卓越人物主张州有脱离权利。在1814年哈特福德制宪会议上，他们威胁要瓦解联邦，除非停止战争。当他们的政党衰弱的时候，这种权利便被政治家们重新肯定。在敌对南方中居领导地位的马萨诸塞州，在她的宪法序言中宣布，该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自由的独立主权国家有单独和惟一管理他们自己的权利，应该这样并将永远是这样行使和享有一切权力，包括司法权和那些现在不是、但今后有可能通过其参加美国国会的代表来表达的权利。"这些话基本上是其他州政府的声音，并且这样的说法被近70年来的国家领导人所倡导。蔡斯法官，美国当前的大法官，据报道直到1850年他在参议院（他是其一员）还作如下陈述："如果拒绝州履行它的约定的权利，那就知道已无可救药了。"为此他承认州行为的

主权和独立。我不想用这个毫无益处的争论困扰你。它之所以毫无益处是因为理智的判断被战争的专断所取代，而战争的目的变为公开坚持各个州的统一。如果战争的结果是事先确定好的，即在宪法保护下的州的统一是神圣和永久的，那么接下来的自然是，不论总体政府通过排除一个州来损害它的完整性，还是州通过脱离来损害完整性，都一样是不合适的；而且根据宪法，州的存在和权利就和联邦本身一样是不容破坏的。合法的结果最后一定是所有州权的高度平等；排除各州在宪法制定的规则下管理国内事务的权利，以及他们自己规定选举资格的权利。南方仅仅在为宪法的至高无上而斗争，而且法律的行政机构也在跟着这么做。弗吉尼亚到最后还在为挽救联邦而做出巨大努力，竭力主张调和与和解。参议员道格拉斯在对 1861 年由 13 个委员会推荐的妥协议案所作的评论中指出，作为论战的最终解决，来自南方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图姆斯和戴维斯两位，都表达了自己接受来自肯塔基的参议员克里腾登建议的意愿。如果这个方案被共和党准许，那么仅有的困难就是和共和党作友善的协调。谁最后会对战争负责？尽管南方宁愿要体面的妥协而不要已经发生的同族相残的战争，但她现在诚心诚意地接受宪法的结果，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已经被写到宪法中的对奴隶制度废止的修订。这是个长期寻求的结果，虽然途径不同，而且没有人能比弗吉尼亚的公民更对这种结果表示真诚的需要。另一方面，我相信宪法不会遭受什么改变，它仅以我们从祖先那里接受的形式传给成功的下一代。我觉得南方各州应该拥有我所认为的善意的立场，对此我与您一样抱有期望。这个愿望使我的评论比原来打算的扩展了许多，我担心它太打扰您了。如果我所说的能够提供一些对美国政治有用的信息，能让您为了这个破碎国家的真正利益去启发公众立场的话，我希望您能原

366

谅这冗长的陈述。

关于您说我正着手准备弗吉尼亚的战事记叙，我很遗憾地说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收集必要文件的进程很缓慢，我明显地感觉到官方在这些战役中伤亡损失的数字报告小了些，我还没有看过您提到的那个普鲁士军官写的作品，因此我不能说他在这方面的准确性。再次表达对您的深深的敬意。

367

您的忠实的仆人

R.E.李

二十四、奴隶制与自由*

368

《第二次独立战争》由前美国驻德使馆一位大使所写，是一部乐观和坚定的分裂主义作品。虽然公众对他的论据都十分熟悉，但他的推论很有警示意义。他估算整个南方的人口有1225万，北方人口有1914万 当然，尽管"在分离州中，如在密苏里、肯塔基、马里兰以及在田纳西和弗吉尼亚的少部分地区，的确有一部分对南方不满的人口充当了北方军的补充兵援"（第108页），但他用另一些因素的比较更有利于他自己的结论。"在北方能够拿枪的绝大多数男子为了种植土地必须呆在家乡，而在南方这样的工作几乎全由奴隶来完成，在那儿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可以空出来去参战。"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女奴和孩子在田间工作，而北方的女人呆在家里，孩子去学校读书。"很显然，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南方由400万奴隶所做的农业劳动总量比在北方由同样白人人口所做的工作要多得多。因此，来自两个区域各自预备役人数差异，并不像人口数量的不均衡那么明显，以至于一眼就能看出来。"（第109页）北方的军队不是从农业人口中征募来的，他们能成为最好的士兵。"在战争期间，农业产品的自然趋势是越来越贵，农业变得更有利，农业劳

369

---

* 原题为《评赫德森的〈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首刊于《内外评论》，第2卷（1863年4月），第656—658页。

动力的价格因此升高。……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的供给不足和产品市场疲软，工厂被迫解雇许多工人。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失业阶层流落在北方，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由它构成。在城市，贸易的萎缩也产生了许多过剩的劳动力。为了不挨饿，这两个阶层的大量人口只好加入军队以求生存。"（第114页）"推论南方受饥饿威胁是不合理的；虽然产品的出口停止了，但它们的质量提高了，战争对正常的工作体系几乎没有太大影响。"（第119页）"南方的士兵仅要求武器和给养，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拒绝接受政府的薪水，同时成千上万的富裕军官和个人联合起来，支持整个陆军团的所有组织与给养支出。"（第121页）"在被攻克之前的10月份，光来自新奥尔良的捐献，就达到了20万英镑。……全部用于弗吉尼亚军队，而且每一笔捐款都在20英镑以上。"（第122页）"南方想采取征直接税的方法筹措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经费。南方人很快地服从了，因为他们生产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能够支持一个比北方高得多的税率"。（第124页）

为英国公众写书的赫德森先生，在奴隶制的认识上，没有向欧洲感情让步。他引述了北方政府关于解放了的黑奴状况的报告。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相信"这个州的黑奴是一个堕落的阶层，由于解放而更加恶化"；他非常满意的是"奴隶制所有局限的消除，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状况下强迫劳动的刺激的消失，实质性地导致了他们状况的恶化。"在新泽西，"州监狱中四分之一的犯人是有色人种，而他们的人口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赫德森先生估计所有奴隶的价值在5亿英镑。"北方人民通过自己征税到这个数额，这样的观点能足以说明是出于对黑人的热爱吗？在北方自由的黑人受到的待遇将提供最好的回答。如果南方奴隶劳动被废除，那么变得贬值或不上算的地产损失估计达奴隶价值的一半之多。"（第174页）反对解放的可能性的争论是有力

370

的，但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也许会迅速同意结尾出现的两个句子："奴隶劳动对文明进步和世界繁荣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所有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人民不适合自由，他们就会呆在奴役状态下。"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奴隶制在一些情况下伤害文明和阻碍进步与它在另一种情况下促进文明与进步做得一样多；后一半句适用于民族而非个体。现在这些奴隶除了数量外，只是一个个体的聚合。他们没有民族统一的条件——既没有共同的情感、同一脉血缘，也没有伙伴间的友情。但在圣·多明哥则是另一种情况。在一个受限制的地区交流还是方便的，所有的人被囊括于一个观念之下并受其影响。黑人的血统因为奴隶进口而不断地被补充，这样非洲人种的特性得到了保存。但是纯种和混血这两个不同的种族仍彼此怀着强烈的怨恨，从而导致了狂热的战争、残酷的专制主义、革命以及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结局的变化。而且，自由的潜能是相对的。条件之一是适合做下命令的主人，这和政治制度是相联系的。法国民主制的建立推翻了桑托·多明哥在法兰西的统治。而在北方绝对的民主党也不适合做奴隶的主人，这一戏剧性的伟大事实就是，奴隶制驱使南方建立一个更为明智的政府体系。

可能这本书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由波普·A.博林先生写的导言。其中有很长的篇幅用于讨论棉花；但是它的开头是关于分离的政治评论，以非常不同于我们经常在美国政治家中发现的精神撰写。其中欧洲的革命民主使美国宪法民主的腐败和堕落的观点非常具有真理性。"在来自欧洲的无法无天的因素影响下，北方普遍流行极端民主观念，普选权失去了尊严，政治权力落入那些不会很好使用它的人手中。……联邦衰落使革命党对来自那一地区强有力外援的希望破灭了，因为排除最后的限制要依靠普遍平等理论。"（第 xvii 页）"这个理论最适用于美

371

国,因为政治体系很快腐蚀了人民;惟一的希望是建立两个政府借以在那块大陆上产生力量的平衡,使之具有更加保守的政治趋势。"(第 xx 页)美国是绝不可能完成拯救民主于无法无天之耻辱状态的使命的,而这种无法无天在欧洲大陆已根深蒂固。他们不能阻止武断化的权力,不能保护联邦体系。受经验的引导,得习惯化的服从与命令的援助,南方刷新了这个问题。如果它能够成功地转换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欠缺和邪恶之名,它就会削弱欧洲观念中作为专制主义最有力支持的民主的力量。当触及到英国政策问题时,波普先生有一个正确的建议:"很明显地,自由贸易是邦联的兴趣所在,但是有理由担心,如果战争继续,邦联将由于执行这个政策而遭遇极大的困难,因为封锁已强迫南方自己生产。大量的资本被迫进入这一渠道,一旦战争停止,这些资本将会因没有保护而全部失去。"(第 xxiv 页)

二十五、分离运动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阶段[*] 372

美国的战争史所伴随的政治斗争史已经由亨瑞奇·布兰肯伯格公开发表了，他的关于1866年战斗的著作被广泛地阅读。虽然作者以前在普鲁士参谋机构工作，但他花更多的精力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他对战争作了远距离的鸟瞰，且利用大量的德国报纸而不是美国多卷本文献资料。他认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和他的国民一样，他是北方派，但在军事上同情南方。他提醒他的德国读者，他们所憎恶的这个分离运动的领袖，过去参与了联邦的创立，并且在联邦赢得自由派欧洲钦佩的年月里治理着它。他欢庆共和党人的胜利，但谴责他们的政策，正是他们先是为宪法奋斗，后来又自己推翻了宪法。作者把英国对南方的同情完全归结为那里盛产棉花，这就难以解释相反动机——这种动机使极端托利党人和坚定的自由派论调统一——的奇怪关联。前者希望分离之战能毁掉民主制，后者则相信民主会因南方的独立而得以净化和获救。他 373 们羡慕邦联宪法，因为它能够治疗美国民主制的缺陷，正是这种武断的民主制的缺陷，严重地威胁着欧洲自由的典范。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希望惊人地落空后，他们并不担心，它们应该被牢

---

* 原题为《评布兰肯伯格的〈北美联邦的内部冲突〉》，首刊于《北不列颠评论》，第51卷(1869)，第274页。

记以反对这些缺陷。对于邦联的湮没已经出现了必要的反省与忏悔。但是分离战争形成英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值得记忆的、具有指导性的阶段，这种自由主义乃是欧洲大陆公正无私的史家应该好好保存的。

二十六、内战史评论*

374

美国内战史的书比那些真实资料的出版物成功得更快。吉尔摩将军的《围攻查尔斯顿》是惟一一部细微描述一系列战斗的书，它通过展示每一场战斗中将军的运筹帷幄，能使遥远的观察者体会到将军们的机智和才能。希望别人的回忆录将弥补那些肯定是仍倾向于北方的信息的不足。博勒加德将军保卫查尔斯顿时的日记保留了下来，但是给征服者拿走了。李将军的文件在里士满的大火中部分被焚毁了；但是据说他准备写北方弗吉尼亚军队史。这些著作对军事科学十分重要，因为使南方能够如此长时期地维持一种不对等的战争的地方，正是南方工程师的技能。港口的堡垒、查特卢加到亚特兰大的工事链和 1864 年弗吉尼亚军队的堑壕都是南方邦联重要的军事辉煌。这样的工事只能由那些设计和保卫它们的人来解释。描述 1859 年伦巴第战役的一部匿名小说成为战争文学的经典。但是那场战争中 375 没有工程师参加，它很可能是一个独特的战例，而描述这次战役的史学家是一个比那些所有参加战役的人更具才能的军官。在克里格拉兹战役后的数星期，一个旅行者对一个胜利者谈及这次胜利。对 1859 年战争中贝内德克在圣马蒂诺所用战术的敬

---

* 原题为《桑德的〈四年内战史〉评论》，首刊于《编年》，1867 年 3 月 30 日，第 19—20 页。

佩，莫尔特克将军表达了他对对手宽厚的同情，并且声称他本人相信部分由于贝内德克的巨大名誉，因而，对他的任命导致了他最后的灾难性指挥。然而，能干的南方领导人的名誉不可能被任何出版社提高。退守亚特兰大——它破坏了约翰斯顿的指挥——已经被汉姆莱上校分析成防御战略的典范。普鲁士战争史学家桑德上尉——他只抱着科学的目的进行战史写作——最初是宣扬北方的原则的，最后却赞扬李。他的书在写战争开始上是有缺陷的。他是分开写这场战争的开始的，在他看来，战争的开始与后来北方力量的推进和服从最优秀的将军——舍曼和格兰特——指挥相比并不重要。他的一些材料在英国几乎不为人所知；他极力追求准确。出于教学的目的，他不断地指出许多成功的军官受训于西点军校，并且详细说明新的战争武器。他详细叙述了多次没有重大行动就结束的战斗，所以这使得记者和大多数读者不感兴趣——尤其像 1863 年 11 月李在朗斯特里特不在时阻击米德的行动。他认为博勒加德是最早的现代工程师之一，这将很可能会得到时间的确认。但桑德上尉把决定性的葛提斯堡战役描述成一个溃退而不是一场失败，这显然是受了李撤退成功和米德拒绝在跨过波托马克河前再次投入战斗的欺骗。最初，来自欧洲的军官普遍地低估美国军队的团结和军事能力，切斯内在他关于弗吉尼亚战争的书中也有这种倾向。战争持续到第三年时，一位据认为作为军事作家不比莫尔特克差的军官认为 3 万名欧洲正规军人从美国的一方转到了另一方。桑德上尉很可能是出于信念而留了下来，因为他仔细研究了使格兰特军队丧失 10.8 万人的战役，并且没有任何的动摇。在好的军官进行指挥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灾难的。对团结的最好考验是在一次重大损失后准备进行新的一次有疑问的战斗。在柯林斯的博勒加德军队主要是由范多恩训练的组织很差

376

的军团。在一次不成功的战斗后的第二天他就退休了。这次战役他的军队3.2万人中死伤1.1万人，约为百分之三十三。在1864年5月5日、6日和7日的战斗中，第一密歇根军团只剩下100人。8日再次投入战斗，撤出战斗时只有25人没有伤亡。

二十七、美国的媒体、大学与国会*

377

塞奇威克先生对我的旅行做了许多建议，并允诺写信把我介绍给查尔斯顿的许多人。他让我得到马奇太太的推荐，这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老夫人，她住在这里并在南卡罗来纳有一大片种植园，在那儿奴隶受到善待。他向我承诺给费尔顿写信，费尔顿是一位哈佛希腊语教授，一位伟大的日尔曼人。利文斯顿先生也承诺为我给南方写信。弗吉尼亚没有种植园；它是一个小麦国家，让它成为一个蓄奴州是非常错误的。然而，有许多白人劳工，他们替代了黑人劳工。白人将会比黑人干得更出色。有一些关于南方奴隶的观点从没有表达出来。斯托夫人有史以来给黑人生活做了最好的描述。

378

在美国没有长子继承权——这是受到严格禁止的。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留下财产，每人都可以立遗嘱。对此没有任何限制。如果没有遗嘱，财产将在儿女们之间平分。这样就不存在大的土地不动产。沃兹沃思先生据认为在北方有一笔不动产，但这每年不会给他带来超过4000镑的收入。同时他不会平分他的不动产，根本不会，因为他的儿子们一般都通过从事不同的职业来谋生。因此美国不会出现法国那样的财产细小的再划

* 原题为《阿克顿1853年游美日记选》，首刊于《双周评论》，第110—112卷（1921年11月、12月，1922年1月）

分。美国有一批拥有200或300亩土地的独立的小地主,这些人和技术工人一起构成了美国人的核心与基础。他们聪明、诚实、勤奋,比德国和爱尔兰移民更适于自治。但从塞奇威克带有厌恶门气的话中,他们好像对国家是有害似的。

克莱在公众心目中仅次于华盛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名望大大下降了,但他仍是最杰出的人。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他是令人尊敬的。韦伯斯特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不太迷人、不太受人欢迎 只是到了后来二流人物才被选为总统。亚当斯和杰斐逊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流人材,麦迪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非常想知道这种变化的原因

辉格党是反对保持州独立权而谋求加强中央政府的老联邦党人的继承者。这种差异存在于所有政党的深层,它不会明显地出现在表面。在它有全盛影响时它所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杰克逊时代的银行问题,该党把银行当做不适当地加强中央政府的手段毁掉了。

格里利的报纸《纽约论坛报》,是一份辉格党人报,尽管不是民主党的,但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持极端民主派的观点。格里利有许多癖好,如戒酒,他把这些癖好推到极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其观点,他真诚,尽管受到了许多怀疑,因为他虽似疯狂但颇有办法,这使得他像个无赖。《纽约先驱报》尽管规模上略逊一点,但与《纽约时报》是相对应的。它会发现公众舆论转向何处,并且通过扭转其方向从而似乎引导了公众舆论的走向。 379 这份报纸总是问:这条消息受公众欢迎吗? 如果是,就写它;如果不是,就攻击它或掩盖它,或用冷淡的赞扬来贬损它。这与格里利的报纸不同。格里利的报纸会毫无原则地维护格里利的不得人心的观点。贝内特是《先驱报》的主编,一名苏格兰的冒险家,他从编辑一份低级报纸起家,由此使自己名声狼藉。现在,

他不在时韩德逊先生同样成功地指导着这份报纸。同时它不是一份可收买的报纸。我想知道其他报纸是否这样。

展览馆是非常漂亮的建筑。尽管地点不好，靠近大水库并远离城镇，但空间是宝贵的。它占地 5 亩，并且显然也十分先进。因为展位不够，所以展品要经过严格挑选。他们希望这个展馆在培养人民艺术审美方面能起到好的作用，他们现在只知道实用美术。他们的租期是 5 年。最初他们受到很多的反对与嘲笑。

……在这之后，我们走上百老汇大街并上了马车。百老汇大街是主干道并且是交通中心。街两边主要是商店和旅馆。有的建筑物很小，比牛津大街上的还破旧；但有的却很宏伟，尽管没有什么建筑美感。街上有许多建筑物正在建造，给人一种未完工的感觉，而且十分不协调。拆掉旧房子建造新房子好像很随意。大人物不住在百老汇。它有很大空间供人们四下散步。过去女士们经常在此走动，但交通的进步使她们不再这样了。街上马车特别多。大人物都住在第五大街，这里优雅而宁静。纽约没有可看的；它不是优雅的城市。它正在向北扩展，直到岛上，这个地区两边有很多好的私人房子。这些房子很规则，以标号而不是人名命名。在建筑中热衷于规则和正确的角度在大多数美国城市很流行。这似乎与美国人的独立性不吻合，但这种倾向发展到布鲁克林的地图是这一地区实际面积的 4 倍，因为在地图所找到的很规则的街道实际上一百年来根本不存在并且至今没有一间房子。我估计，随着城市的扩大，这种规划要被实施，因为现在完成的部分完全与之吻合。很少的一些教堂打破了光秃秃的土地所带来的单调；因为没有高低层次，没有什么风景优美的地方。有些地方非常糟糕，去那儿不安全。百老汇没有什么时髦东西可看。有许多很窄、轮子分得很开的两轮马车。

380

也没有任何马夫。

我认识许多真正的有典型脸型的美国佬。那么多脸就像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这些不是十分聪明的脸，而是自私的脸。他们一般不胖，并且头发早白，这恐怕部分由于喝酒过多并且出汗太多的原因。他们一般身材不好，但个子高。他们喜欢把头发留到颏处，或者留着山羊胡。不论何种情况他们都喜欢把头发留至嘴角。在情侣们经常光顾的旅馆我发现他们的衣着没有什么可赞之处。在这一方面似乎十分一致。当然各地没有什么民族服装。夏天戴草帽或白帽子十分普遍。抽烟也很普遍。恐怕由于这种情况我一点也不对纽约的嚼烟和吐痰感到吃惊，因为我以前在别处也看到这种状况。街上看不到警察。从身上带星的人中可以辨认出来是警察，但不多，他们不久要进一步组织起来。

……我去了克拉伦顿看望了查尔斯·莱尔爵士，他给了我一封致普里斯科特的信。他以敬重的口气谈到了波士顿的学校，那里最穷的爱尔兰孩子都认字很多。他说斯托夫人已经很好地描述了黑人，尽管她的书不公平。他认为教化南方黑人比教化北方穷人要做更多的事。他们从这样低下和屈辱的状态下生长，有许多迷信和恐怖。把这与他们现在的状况相比，他认为要长期地为他们做许多事。尽管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的孩子一般可以看到与主人的孩子一起读书，因为他们的主人认为这将使他们仆人变好。查尔斯爵士认为，在英国我们可能要向美国人学习，并且没有什么障碍把他们好的东西溶入我们的体制中。他告诉我，如果他研究数千年前发生的事的话，他认为思考美国政治状况是最有趣和有启发性的事。必须停下来回头看看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决不认为联邦党人加强中央的计划是最安全的；因为西部州的变大，他们会派代表，并且由于他们都是十 381

分民主的，他们的影响力会对国会里的合众国十分有害。如果州独立权得到保留的话，差州对好州将没有影响力。我对与查尔斯·莱尔爵士谈话感到很愉快。他十分敏锐和幽默。我不知道他的地质研究是否给他一种从大的范围和通过肯定有用的地质时期来看待事物的哲学方法。

波士顿，7月6日

……23号[22号]，星期三上午，我乘车去坎布里奇。我们得走很长的路，在那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刚刚被烧掉的几间房子的残骸。我们在两边是房子和花园的、没有人烟的路上继续走了大约两英里到了哈佛学院。坎布里奇是一个大镇，但很分散，没有什么可称之为街的路。

在一些树的周围有几个十分破旧的红砖建筑和两个小石头建筑。这就是哈佛学院，美国最老、最重要的大学，它建于查理一世国王时代。当我跨过树下的草地时，几乎看不到人。我在一个砖建筑中找到蔡尔德先生的住所。他是一个瘦小而白净的人，戴着眼镜，一个标准的日耳曼人长相。他大约28岁。他出生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但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受到公立学校的校长们的注意，他们使他得到较好的教育。他在哈佛学习过，后来在哥廷根呆了一年后被任命为这里的修辞学教授。他正在听一个孩子讲课文，他对这个孩子似乎很亲切，因为我认为这个孩子十分呆板。我们谈了一小时的大学、德国等问题。他的薪水是一年350镑，并不算高，因为美国的物价水平较高。他解释了学校的性质，我因而收集到了更多的资料。哈佛学院在其办学之初就以一个开明的慈善家的名字命名。它完全受私人资助。州不但不给资助，反而每年征税700美元。考虑到这个学校不到200年的历史这个税收是相对高了。没有足够的资金建

一个好图书馆，付给教授高报酬，也不能使文学成为一个赢利的手段。在德国被称为哲学系的系这里也有，但不完善。附属于这个学院且构成大学的是三个系：法律、医学和神学。学生大约600人。他们每年交费80美元，并且主要住在镇里。他们被看做美国最放荡的学生。他们在这里要呆上4年。

在头两年内他们是一、二年级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第一年他们读一些经典作家著作选，一点西塞罗和贺拉斯的作品。数学入学时就学习他们杰出的教授皮尔斯的著作。历史学习阿诺德的后期罗马史。下一年：两本荷马史诗，两或三部戏剧，和一些贺拉斯与西塞罗的作品。只在头两年中有一学期学历史。修辞现在学得很多，科学也是这样。第三年学习里德作品，史密斯的讲演和一些科学课。现在有一些选修课。它们是数学、古典作品、现代语言和一些科学课；必须选两门语言课或科学课。拉丁语和希腊语如果要选的话也在后两年内选。要学两部希腊喜剧、两部拉丁喜剧、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塔西陀的《编年史》、桂冠演说和卢克莱修……等等。就哲学而言，斯图尔特、惠特利、威惠尔、派莱和巴特勒代替了里德。历史总共学两学期。也开设一些次要科目的讲座，但并不成功。

学习不是仅仅为了学习，而是为了使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修辞是要培养的，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求说话，并且很可能经常不被要求也要说话。要学数学和某些科学，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注重实用的特点是相对应的。对学拉丁语和希腊语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这两种语言的书没有多少人读，并且这两种语言作为不太重要的选修课。历史课用的是沃塞斯特的手册，他们能告诉我这书用处不大。史密斯的演说是主要的学习内容；哈勒姆的作品是深奥的，恐怕吉本的作品处于为学生最长远发展所列书单中的末位。整个学习体系介于德国与英国之间。这里的 383

研究既像英国一样不活跃,这里的学科也像德国一样是松散的。这是体制的结果和这个国家的特点决定的。学习在这里有时可能是令人向往的;我不想知道是否这是出于空虚;是否是更多人有闲暇时间,能够使自己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现在情况很少是这样,因为钱是生活的重要目标。大学的人都清楚这些缺点,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德国学习过。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中在波士顿发展出来,因为它部分是由年轻人构成,这些年轻人都在坎布里奇学习。进步文学可以影响他们,我期望这将迫使自卫的大学尽力使自己不落伍。这至少部分创造出对高级学问的需求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是一个文学协会。然而没有州里的支持什么也干不成。这种不尽人意的环境显示文学是多么廉价。所以经常出现一个人被任命为某学科的教授,但他对此却一窍不通,并且后来被送出国去学习使之胜任。

校长是沃克尔,他们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埃弗里特过去干校长是不成功的。斯帕克斯介于两者之间。他也是历史教授,但为了做他的美国史研究他已经辞职。他非常了解革命时期。他正在出版那个时期的信函。我有他的关于华盛顿的生平的书。但枯燥又很厚重,不全面又不完整,除烦琐外没有其他特点。这是斯帕克斯最大的优点。他缺乏天分、勤奋和诚实,但他的研究不同于德国人的研究。他的编辑原则招致对他批评。据说他已编错了华盛顿的信。但有两个不一致的抄本,他的选本是最好的。总体上他在这方面不享有重要名望。

……当12点时我们失望地听到德语考试即将开始。我被引见给朗费罗,他是现代语言教授,由他主持考试。我得到了他很好的接待,并且拿着一本书坐在考试委员会成员中。大约有20名学生参加考试。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其他学生没有选择德语。考题是《威廉·退尔》,每个学生大约翻译一页。德语

教师是罗克尔，他高大，满脸大胡子，不喜欢德国，因为德国不自由，没有砍掉专制者们的头。学生们德语发音都很糟。有时翻译得也很雅。有时他们翻出词完全是错的。但经常还是通过或改正。考试既不隆重也不草草了事。一个小时后另一班接着考，我告辞了，因为朗费罗邀请我2点吃饭。

在约定的时间蔡尔德和我去小旅馆，这个旅馆是新建的，是为了吸引学生的朋友才建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学院大厅，它有时是用来开音乐会的。这是一个老式的房子，用柱子支撑着。实际上这里的一切都不老。历史古籍才有100年。这里有许多我乐意看的肖像画。有几幅是林德豪斯勋爵父亲画的，其中的一两幅要好于其他的。

在旅馆我们和朗费罗与委员会成员会合。多数人都是老态龙钟的绅士，不属于大学。其中一位说话冗长乏味，装腔作势。朗费罗主持，我坐在他的右手，蔡尔德挨着我坐。学院不允许喝酒。饭与其说好不如说丰富。朗费罗的讲话没有我期待得有趣。他谈了现代诗。他喜欢卢凯特和其他一些健在的德国诗人的关于枪骑兵的诗。他不喜欢《浮士德》的朦胧。但他肯定《浮士德》有较高的伦理倾向。我认为蔡尔德成功地反驳了这个观点。为了为自己辩护，朗费罗说，一个女士曾宣称不能理解丁尼森的一些诗句，他背诵了这些诗句，并说这些诗句对他非常浅显，思想是不能表达在如此有智慧的语言中的。我和这位女士一样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句子。他似乎不太愿意有人说歌德比席勒强。他对德国谈了许多。他邀请我和蔡尔德去他的房子喝咖啡。他的房子很好，曾是华盛顿的总部。由于他的教授地位和他妻子的财产，他很富裕。朗费罗妻子坐在一个装修很好的书房里。她的确漂亮，但不活跃。朗费罗的第一位妻子死于海德堡。现任妻子是波士顿一位大富豪的女儿，据说她拥有500 385

万，他可能得到了百分之六。我看到她的两个大约7岁的男孩，长相不好看。朗费罗给我看了他的艾尔斯米尔勋爵诗集，他赞扬了《浮士德》的翻译，因为它有绅士般的语言。我们在花园中坐了半小时，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抽烟。没有谈什么有趣的东西。我从朗费罗的谈话中受益很少。回车站时大约是5点，我们通过一片榆树林，此树拥有华盛顿在树下挥剑的美名。我们去了书店，但蔡尔德没有对我多谈那儿的书籍。我同意星期五再来，那天有毕业联欢会，有许多典礼。

……星期六上午大约10点，诺顿带我和麦克莱根先生去了制宪会议大楼。这个组织在1820年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它是由州人民选举出来进行宪法改革的。每次会议都必须是通向更完全民主的步骤。尽管这一过程受到了保守党人的谴责，但制宪会议一致相信改革是必要的。州议会有400个代表席位。诺顿叫出了达纳，即《两年水手生涯》的作者。他让我们坐在代表席的低位席上。代表座位呈逐步上升的半圆形，所以，我们坐得靠近主席。达纳向我们讲解。他瘦小，约35岁，长长的头发和尖长的大胡子，有点像马姆斯伯里勋爵，但长得精明，戴一副眼镜。他对我非常友好。他十分了解英国，对格兰维尔勋爵称赞不已，但并不知道我与格兰维尔勋爵的关系。他是一个自由土地支持者，因而是废奴主义者，但否认自己是一个民主派。代表中大约有270名农民，律师很多，神父不多，还有一些医生。他们中有能力的人不多，只有少数人显得有些聪明。他们都岁数较大，不太鼓掌。许多人在读文件。两个衣着破烂而谨慎的男孩在跑上跑下传递纸条 座位占的空间较大。如果领导人得到的位置不好，他们可以从乡巴佬手中买好的位置，或者他们党内一个人放弃位置。主席大约35岁，刚刚被选入国会中；他是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其外表就不同一般。问题是代表权问题。

即代表是由各镇还是由全体居民选举出来。显然,按人数选举的体系对波士顿产生了重要影响,该城是保守的,但民主派支持 386 市自治会,这似乎令人奇怪。40 人已经在辩论中发过言了。我听了 12 人的发言。发言都不长,一小时是最长的时间限度。没有一个演说可以说是好的。一个老农民在发言,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十字脸型的、严厉的老者。达纳说他很可能是自己与几个下人一起耕作,这些人和他的家庭一起用餐。他说,正是这些人制造了革命。人们在注意地听一个据说赚了 10 万美元的鞋匠的演说,尽管他是一个糟糕的演说者,他作为一个商人有一定的影响,他简直像个疯子高声演讲,要求一切平等。另一个人高声地发表演说。他是格林先生,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相可怕,他正给达纳看他从译本中抄下来的亚里斯多德关于奴隶制的有关的言论。他宣扬妇女参加选举等类问题。我见到了希拉德先生,据说他是一个好的、用词华美的演说者;他是一个有一定名气的文化人,并且一直为媒体写意大利问题(他在欧洲呆过一年)的文章。巴特勒先生是来自洛韦尔的绅士,一直在从事宣扬鼓动工作。他高挑、精瘦、果敢,是民主派的领导人之一,并且是一个难以战胜的个人对手。达纳说只有礼貌才会使他安静下来。演说都十分糟糕,但是我还是有兴趣知道这样的议会是怎样构成的,他们是怎样行使权力的。他们所有的决议都公开通过。他们打算进行的惟一变革是使法官选举产生,因为任命的法官都成了党派成员。这里的政治标准比英国低,或者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低;因为没有一个欧洲议会民主的决议是没有审议就通过的。它使我想起了瑞士议会,但它的演说不是这么糟,也没有这么充满火药味。有大量的礼仪,但没有装腔作势。没有什么人像绅士。党派之间不太严格,就像在国会中一样,没有公认的领导人。我惊奇地看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抽

象的原则。很难想在这个主要由没有文化、讲究实际的人构成的议会是这样的。达纳说,这里的民主非常特别,不同于欧洲。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纳税。他认为革命没有改变这里的什么。旧制度在继续,只是没有国王。旧的宪章是共和制的。我想在他的话里有一些真理性的东西。革命之后的确是这样。但387 从那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变。达纳是一个牛津主义者,他的姐姐是一个天主教徒。他的父亲是美国杰出的学者。达纳似乎很乐观。这个议会有很大的独立性;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认识或参照。据我的总体观察美国对英国很了解。英国的政治家、作家、法官在这里都家喻户晓,人人都会谈到他们。特别不借鉴历史,至少是革命以前的历史。

我把信给了萨姆纳,并且他走过来与我谈了起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双红眼睛,这使他不太好看。他的谈话是在这里我听到的最好的,尽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脱离美国主义。我想他的天分很高。他相当喜欢抽象理论。他推行他的废奴主义思想,以至于他被波士顿一些最好的社区所排斥。对我来说这对他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他知识渊博、高雅而不深奥。他周游过欧洲并在英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卡莱尔勋爵曾告诉我说,他是他所知道的美国最能干的人。他们的共同看法肯定部分地导致了这个判断。我想同样的原因使得萨姆纳在这儿不受欢迎,并且在此受评价不高。他在波士顿是不受欢迎的,这里棉花种植园主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嫉恨从事生产的奴隶。这些人的影响在议会中是最大的。那里的律师——通过棉花诉讼来养活自己——都为这一利益集团说话以讨好他们。萨姆纳不是一个牛津主义者,但他的朋友是一个大主教,他竭力让他来忏悔,希望他改变宗教信仰。他们曾经同乘一条来自纽约的船,睡觉时,主教对他说:"我们这种位置的许多人没有活着离开他们的铺位,

如果发生什么,请记住我的铺位是这个号码。”萨姆纳大为吃惊,忙跟着他去确认号码。他是一个好律师并已经当选美国的参议员。当我坐在他和达纳中间时,达纳只顾一个人说话。我相信他们不是好朋友。萨姆纳对卡莱尔勋爵大加赞扬。他告诉我撒克里在美国时没有观察美国,并且他把他带到国会一次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了。

这个场景是我在美国见到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它留给一种我至今都无法想起的印象,在 12 天后所写的东西已经消失了。

1 点,我在里特尔—布朗出版公司——英语书最大的进口商,与诺顿安排会面。他们有你在英国书店能找到的一切书。388 诺顿给了一本他刚刚出版的小书《近代社会理论》。我认为这书很好。格调高雅,风格优美。我不可能与书中的结论争论,但是我认为,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更难理解这些理论。布朗森对此书较为青睐,但直到我告诉他之前,他一直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在伯恩汉姆的书店——最大的旧书店,停了一会。他收藏许多书并且都较便宜,但没有书目。他是一个完全不信教的人。我想要一本厄伯姆的《美国的巫术》,这是达纳作为一本最好的作品介绍给我的。厄伯姆曾是沙莱姆市长并且参加了制宪会议。我没能得到这一本书,因为它印数很少。诺顿对帕克曼的《印第安战争史》评价甚高。帕克曼是他的大学同学,并且一直对历史研究很喜欢。他后来与印第安人生活了一段时间,由此写出此书。我以前曾去过伯恩汉姆书店,并且在那儿买过斯帕克斯的《华盛顿》和格里斯沃尔德的《美国作家》。

389

二十八、美国英语*

书目中的百科全书和字典已经很多了，因而写一本新的不再是困难的事。只需要从已有的书中精选一些条目就可以了，稍做一些增减就会很容易地使之满足当地的需要。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属于公共财产。许多主要的内容从一本书抄到另一本书上；并且许多首次出现在著名的《书目大全》中的错误被新编的书忠实地抄录下来。这本百科全书必然有非常多的读者，并且同时它是许多人的共同作品。它被认为代表着某种知识和适用于许多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的观点；后者比前者更明显。其精神比起内容更令人尊敬。它完全改变了我们在学校所学的那句古老格言：*non multum, sed multa*（求多不求精）。我们本以为在一本有20多卷的著作中所收入的各门学科的最重要的条目是会经过全面而令人满意地选择的，本以为在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上，美国科学与知识界能极力与欧洲竞争一番。可情况并非如此。受欢迎成了重要标准。精心撰写的文章都是那些关于美国主题的。例如，安德烈少校条目和解剖学条目占了一样大的篇幅。条目"无烟煤"又一次是"人类学"的一半长。安东博士比圣·安东尼占的篇幅还大；亚历山大大帝比亚历山大·汉弗莱只多占了半栏。然而，这些大块东西是要送到公众（该书就是为其

390

---

* 原题为《评〈新美国百科全书〉》，首刊于《随笔》，1858年7月10日，第65—68页。

而作的)门上的。作者们力求在政治与宗教上保持严格的中立这一点他们非常令人信服地做到了;但有一点负面的优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增添了一些平淡和含糊。"作为一种投机,很有必要不冒犯任何政党和挑起纷争 甚至这就是特点。在英国,对某些重要观点不作审查本身就可能造成很多的冒犯。这本书中关于政治的主要条目是亚当斯家族。必须承认它们没有摆脱变质的民主精神,它后来威胁要把高贵的宪法贬低到欧洲革命民主制的水平之下;那种只有中国人才可与他们一争高下的可笑的自我炫耀,并没有损坏他的名声。在宗教问题上有着同样的保留。如关于安塞伦条目和阿奎那条目中没有一句批评性的语言。最棘手的条目不可回避地以一种塔西陀的风格加以处理。所以,在关于安塞伦与威廉和亨利的辩论条目中,我们得到这样有趣的信息:他"与英国国王的斗争与联盟交替进行。"这种规则的严格性在"Achilli"这个条目上最明显。它成为这位无教皇制英雄的真实作品的标志是令人怀疑的;但它以一种无害的方式使他令人感兴趣,没有解释那些指责——这些指责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已经成功地被人驳倒,也甚至一点都没有详细说明教会的腐败。古典条目并不是没有创造的,下面对埃斯库罗斯的评论具有的独创性必须得到承认:"不出色,但他比索福克利斯杰出;和身着铜铠甲带着法国路易十五的小管家的安纳克的儿子相比,他更不能与女里女气的、世故的和不信宗教的欧里庇德斯相比。"美国有一些注解学者,他们毫无疑问对这本百科全书做了贡献。然而,显然他们的追求使他们与他们同胞的行动割离开来,因为在美国特有的思维特征中他们对待古籍的态度是有缺陷的。明显的美国人一般对这种研究不感兴趣,不 391 太关心把其聪明放在这种过时的领域中。在"Aëtius"条目中我们读到:"几天后在查农发生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战争,两方都死

伤了30万人。"我们可以把这种故事不必担心真伪和荒唐地告诉人民,人民完全可以不关心受到这种古老故事的欺骗。我们怀疑是否同样风格的当代轶事也会从那个不轻信的种族的眼中找到赞扬。历史欺骗与人的欺骗一样,在欧洲被认破后,还是可能有机会进行欺骗的;并且可能在大西洋之外开创新的声誉。以解释阿提拉神一样的方式,解释了阿加迈农神:"阿加迈农与阿基里斯之间的争吵构成了特洛伊战争中最有趣的特点。他在洗浴后正在穿衬衫时被其妻子杀死",如此等等。欧洲学者会毫不费力告诉我们"哥特人与条顿人的法律是十分相同的"。美国的学者很可能也是这样。但不给任何文字注释,也不引导读者去读其他作品。显然不要期望他们把研究发展到这本书之外。的确,我们可能得到的是从下面对一个冒险家的科学定义中而来的公众风格:"在《大卫·科珀菲尔》中,如果麦考珀尔不是命里注定成为一个伟大的麦考珀尔的话,他本应是一个伟大的冒险家了。他总在等什么东西出现。这个特别的期待状态事实上是一个冒险家思想的正常状态。"

但是所有条目中最奇怪和最有提示性的是关于"美国英语"的。首先——我们相信这不是个别现象——这些作者们由于不完整地和武断地理解英语单词的用法而对他们的同胞不公正。他们告诉我们,venison"在美国指的是鹿肉;在英国一般指野味"。裤子意思的pantaloon很少是真正的美国词。我们失望地发现真正的美国女裤是"pantalet"。真正的美国词是"pants"(一般指男子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Koolsla"在英国很少用来表示卷心菜;我们愿意把"gallowses"当成裤子的背带(braces)的同义词;我们也很少把"pipeclaying"和"gerrymander"用作粗俗的政治词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目的作者,在解释美国英语的词存在是多么的自然后,极力很少使用这些词并为

使用它们进行辩护。"有把握地说,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比英国人英语说得好。"尽管如此,"英国有学问和受过教育的人使用语言仍是正确语言的标准"。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一点上往往比美国人对我们更大度。没有发展什么都不能生存。发展是生命的根本。所以没有生命力的语言就会没有活力,或者独立于说它的民族。这种进步在不同的环境、地点和时间是不同的;它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它所表达思想与感情的民族特性和使自己牢固地与结合在一起。古代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曾说:"οἷος ὁ βίος, τοιοῦτος ὁ λόγος."塞尼卡说过相同的话:"Talis hominibus fuit oratio, qualis vita: quemadmodum autem uniuscujusque actio dicenti similis est, sic genus dicendi aliquando imitatur publicos mores."(《书信集》,第114篇)现在,在美利坚民族兴起的同时,一个民族特性也形成了,它正迅速变得更加明确和有别于我们的民族特性;它已经强大到能吸收和同化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国外的因素。他们的体制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的有许多大城镇的社会不同于我们的社会,更不同于大多数的大陆的社会。我们不期望牛津和剑桥的语言在美国丛林和平原的文明生活范围内一成不变。口语是不可能与书面语有太大区别的,媒体虽然掌握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手中,但它们几乎总是说给大众听的。我们的语言如果失去了统一性必然要在普遍性上受到惩罚。作为一种口语,没有其他的语言经历了这样大的变化和适应世界各个地区的人的思想和法律。到目前为止,英语的灵活性是相当突出的,库珀笔下的红种人说一种英语,斯托夫人笔下的黑人说另一种英语。《时代》的记者使我们熟悉了香港的英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英语出现在悉尼·史密斯所说地球的第五或小偷地区。同样,许多好的小说是由(现在尤为显著)匈牙利式拉丁语写的。但帝国文学中古拉丁语的衰落与英语在美国所发生

393

的变化十分相似。用鼻音唱歌和美国演说中的用词华丽，借塞尼卡斥责其同胞的一段话来描述是再适当不过的："ut aliquando inflata explicatio vigeret, aliquando infracta, et in morem cantici ducta."对词韵辞典的蔑视——因而美国人读"epicurēan"、"territōry"、"lēgīslătive"重音是不同的——是一种后罗马时代的常见的法语风格。奥森尼尔斯按节奏吟诵 cithēron、Phēaces；西多尼尔斯对六步韵诗出现起了作用，

Quicquid Pxthagoras, Democritus, Heraclitusque.

尤其是所有罗马行省人中的非洲人，他们的拉丁风格使我们想起美国英语。早在 2 世纪，他们的语言就很独特了。维维斯说：特塔利恩是 *perturbatissime loquitur, ut Afer*；他谈及圣·奥古斯丁时说：*Multum habet Africitatis in contextu dictionis, non perinde in verbis*。在美国人口中常见的夸张的最高级可以在非洲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如 *minimissimus*, *postremissimus*, *poenissime* 这些词。美国人乐意把"ate"作为动词的结尾，如 *locate*, *eventuate*, *approbate*, *obligate*, *necessitate*, *captivate*，而非洲人乐意把"are"作为动词的结尾，如 *latinrare*, *inducare*, *mediare* 等等都是他们的发明。即使像 *salvagerous*, *cantankerous* 这样的恼人形式在阿非利加的 Apulejus 中的 *famigerabilis*, *congermanescere* 等词中也发现同样的现象。

《中世纪拉丁词汇》中毫无疑问包含了许多可能使西塞罗感到恐怖的词，就像它们使 16 世纪的西塞罗主义者感到恐怖一样。然而中世纪的拉丁语是一个变化的环境和新要求下的十分自然和合法的产物。对形式的轻视自然是由于主题具有引人入胜的重要性。新的思想领域要求适合的表达形式。中世纪哲学家的语言与古罗马诗人和法律家的语言一样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个不合理的重要位置。那些复活书信体，回到古典形式，并把自

己束缚在自己的范围内的名人，说真话，并没有说出什么。仅以他们所写的内容而言他们可能没有得到什么声誉。显然很快黄金时代的拉丁语必须为基督教思想作出牺牲，16 世纪的思想由于古拉丁语的原因必须放弃。旧瓶不能装新酒。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没有一个时代的学者，向西塞罗主义的迷信让步。394 所以，我们不会否认美国人扩大其词汇的创造性有其自己的适当性和价值——*abundant dulcibus vitiis*。我们不太倾向否认它们具有的适用范围，并要利用他们甚至是最幸福的发明。《阿提拉夜话》中一句话很符合这一意思：*vive moribus praeteritis, loquere verbis praesentibus*.

395

二十九、公正对待保守主义*

《美国联邦》删掉了培根用来告诫有书生气的政治家的那句斯卡利哲的名言："Nec ego nec alius doctus possumus scribere in politicis."这本书最重要之处是它给美国领导人留下印记的力量。布赖斯先生比其他哲学家更有资格说另一句名言："Ich hoffe, wir werden uns recht gut verständigen können; und wenn auch keiner den andern ganz versteht, wird doch jeder dem andern dazu helfen, dass er sich selbst besser verstehe.(我希望,我们之间能真正达到沟通理解,即使一方不能完全理解另一方,每个人也要帮助对方,使对方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他写的那么亲切,带有感情——既有民族、政治的,又有社会的同情心,并且很真诚——以致一定程度上带有无声的指责。其完美的语气足以使一剂药吃下去不觉得苦并宜于下咽,这是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任何一个药品商开出的使天真者忏悔的药都做不到的。事实而非评论传递了教训;并且我知道没有更好句子来展示一句新的名言："Si un livre porte un enseignement, ce doit être malgré son auteur, par la force même des faits qu'il raconte.(如果一本书有意义的话,也许这并不是作者有心,但从他所讲述的事实的力

---

* 原题为《布赖斯〈美国联邦〉评论》,首刊于《英国历史评论》,第4卷(1889),第388—396页。

量中就可以体会得到。)"

如果我们这位同胞没有其法国前辈冷静的格言、灵巧的智慧和超脱的思想的话,他会对现实生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比较政治和欧洲人输入的跨大西洋经验的研究。他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少数命题之一,也是下决心挑毛病者要验证的少数命题之一。因为两者都说两院制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公理。我承认潘恩、弗兰克林和萨缪尔·亚当斯的原则——宾夕法尼亚人的榜样和杜尔哥的权威使之在法国颇受欢迎——已经被拉勒雷的观点驳倒了,拉勒雷说:"La division du corps législatif est une condition essentielle de la liberté. C'est la seule garantie qui assure la nation contre l'usurpation de ses mandataires.(立法机构的分离是自由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是确保国家不被代理人窃取的惟一条件。)"但是可能要记住,受到争论的真理不是一个公理;严肃的人还要考虑事物的这个状态:一个没有分歧的立法机构一定会反对一个太强大的行政机构;而两院制能相互制约和中和。托克维尔和图果据说对这一点都摇摆不定。 396

据说托克维尔从没理解联邦宪法。直到他的最后一版书中,他还相信他的第一部分所说的开场白,"在此得到的一切立法权"意味着"众议院决定所有立法权。"斯托里认为"他对美国作品(指的是他自己和拉门尔的作品)进行思考并从中借用了很大一部分,而他自己的观察很少"。法国驻华盛顿公使认为这本书"有趣但不准确";甚至《民族》也说它"耀眼、肤浅和吸引人"。布赖斯先生可能从未被指责过知识不完善或打动人心、不适当地借用别人的作品,或为了某种目的在写作时有意拔高什么。他的缺点在其他方面。这位学者,不仅作为一个成功的历史题材作家而出名,而且常常据说,作为一个受过训练并坦率的历史学家而出名。这是少有的,他完全不愿受《历史评论》的管辖。

他的抗拒明确地出现在他的文字中："我反对另一种诱惑，偏离正确方法地研究历史的诱惑。"三大卷书告诉人们事物是怎样的，但没有告诉人们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不是因为偶尔地看看过去；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历史十分明显地和个人化地隐藏在大人物和大流派背后的哲学中，我本没有权利把它们放在这种审判台前。

归咎于没有历史头脑是一个好的借口。托克维尔的美国成为林肯的美国这种发展过程后来已经被没有一个欧洲人能比得上的全面的知识描述了。那些希望了解全面历史的读者可能埋头于霍尔斯特的《宪法史》数千页的巨著中艰难地阅读，结果是接受这种劳动分工而不是像近来一部著作所做的那样立场鲜明。这部著作尽管设计或编撰者不好，但由于用了权威性资料选，仍是一本关于联邦民主自然发展史中最有启发意义的著作。397 该作者曾花了20年时间研究美国的辩论与报纸，并且在萨多瓦和沃思战役之间开始写作，这时德国正处于建立帝国的政治集中前的阵痛之中。他自得地解释了另一场无法压制的中央与地方冲突是怎样发生的，解释了力量的集中而不是力量平衡或分散是怎样有助于人类战争。和格内斯特与托克维尔一样，他在谈论一国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了比较；他不知道在展示个人观点时运用含蓄或节约；他没有像布赖斯先生那样高兴地放任愚蠢和错误。当他拒绝花6个月时间来研究加利福尼亚新闻资料后，他离开了他所在的领域的德国老师。

布赖斯先生只顾及实际存在的东西，因而他对民主的特殊性和战时美国几乎没置一词；也没有认真地看看南方邦联的政府计划。一个北方作家谈到这一计划时说："所列的没有价值的改革应该被美国采纳，不论退出的州是否重新统一，都要尽早地采纳。"有必要从飞逝的时间阴影中使一些真相显露出来。在分

赃制一章中，没有谈到这种思想是来自乔治三世的大臣们，提到了汉密尔顿反对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联邦党人文集》的纽约版中一条注释，上面写到“汉密尔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改变了他的宪法观”。法国人的投机和抢劫战被提及了；为了把荣誉放在该放的地方，它应该加上这是美国人的建议。1790 年 5 月，莫里斯写信给他的两个巴黎朋友说：“我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们摆脱麻烦，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使你们陷入更大的（我指的是一场战争）中。你们应该自己制造一场人的战争，对你们的邻国制造一场金钱战争。……我听到你们在贼金融状况很糟。这不应该是障碍。我认为战争时期比和平时期它们更可能恢复。你们想一些东西使人们注意力从不满意中转移开。”尽管对像现在仍存在的议会腐败进行了长期的公正的调查，但人们希望听到对在美国历史的一些转折点上金钱占了上风的报告做出一种良好的评判；对由年轻的亚当斯对他的最能干的同代人所做的诋毁做出 398 良好的评判；对另一位总统谈及的 233 个众议员在与杰克逊斗争期间每人从银行得到 1000 镑资助的故事做出良好的评断。

火车时代的人了解的美国和历史上看到的美国不总是相同的。我们知道美国最佳能力已受到了政治的抑制，并且出现了爱默森称之为慈悲心从社会组织中逐步消退的现象，因此众议员才接近选民。只有在政治学中美国才占了第一位。有 6 位美国人与最杰出的欧洲人，即斯密和杜尔哥、密尔和洪堡，是同层次的。其中的 5 个是国务卿，1 个是财政部长。我们还听说今天的美国人用一种有时是可笑的自信来看待国家体制。但这也是一种情绪，它不是来自华盛顿和杰斐逊，而是来自格兰特和舍曼。这些耀眼的开国之父们不以他们的成就而自豪；像克莱和亚当斯这些人一直在使第二和第三代人失望。我们得区分这个民族什么地方归功于麦迪逊和马歇尔，什么地方归功于波托马

克河的军队；因为人们对宪法感到不安直到经过内战的考验和牺牲将其牢固为止。甚至声称美国是人类幽默制造者，对我来说也同样是不完全的。人们过去知道华盛顿在战争中是怎样经常地或很少大笑，但谁又数过林肯的笑话呢？

尽管布赖斯先生很圆滑，没有在批评其政府中自由地谈论美国人本身，他坚持美国人有一个他们没有充分承认的缺点，即根据法律或习惯没有一个人能代表他所居住的以外地区。如果10个政治家住在同一街道，9个人将不能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这可能不是纯政治问题）即使在那个他相信他没有得到州的朋友的支持的批评中，布赖斯先生也不比聪明的美国人在他面前说得更多。很巧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是他的州长，另一个是在前言引用过的被告无罪的证人。两人都强烈相信该习俗是一个迫切的弊端；另一些——我要增加上——有不同判断，认为它作为针对布朗基主义——通过限制同一个候选人所代表的选区数来实现的一种目标——的安全保障是有价值的。两位一致说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是属于自然历史的美国总统提出了布赖斯先生希望回避的难题。他倾向于处于两者之间，把基本原则变成随机应变，变成可能性和程度性的问题："最聪明的政治家是那些最好地在自由与秩序间保持平衡的政治家。"这种感情几乎是克罗克尔和德·昆西的感情，作者明显要抛弃自由是政府之目的、在政治中事物的价值在于对自由的保障之类粗俗的定义。当他谈到法国与美国革命没有共同之处时，当他把1688年革命颂扬为真正的复兴——伯克和麦考莱对此用了最好的赞颂时，他是以约翰·亚当斯的精神来写的。他所引用的麦考莱法官的一段话在他的书的简短摘要中："美国既不是自由的榜样，又不是一个契约的、持久的安全保障的榜样，这种保障目的是要防止自由权堕落成特许状，是要建立一种仁慈

的政府下的信任和依赖感，这种政府其杰出之处——尽管十分明显的自由——是更突出地为永久的稳定谨慎地提供条件。"布赖斯先生在下面一段重要的话中宣布了他的观点："1787 年的精神是英国的精神，因而也是一种保守的精神。……美国的宪法对这样的规则并不例外，即有权赢得人们服从与尊敬的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过去，一个体制发展得越慢，就可能证明越持久。……在人性中存在一种充斥在 1787 年文件中的虔诚的清教徒主义。……没有人比美国革命的英雄缺乏革命的精神。他们以《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的名义制造了革命。"我发现迷茫的辉格党出现在第 3 卷中，他们对前辈的智慧、伯克的《感想录》、杜特(Dort)的 18 条禁规和一种不断发展的信念——鬼的作用是为生者立法——有着虔诚的敬佩。

当绝望的瓦洛伊向他快死的母亲咨询时，她告诉他任何人都可能走投无路，但能绝路逢生是一个后天得到的艺术。布赖斯先生十分同情那些做凯瑟琳认为是极其困难的事的人，他在他这本非常无个性的论著中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做了一段称赞。*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赞语微不足道）。但他的优 400 点几乎没有充分地说出来。塔列朗向蒂克纳保证他从不知道他的相提并论者是谁，西华德称他是"在组织和建立合众国过程中最有能力和最有效的政治家"；麦克马斯特，这个反偶像崇拜者，他和霍尔斯特尽管都没有得到太多的赞誉，但众口一辞地说他是新世界公共人物中最杰出的人；基佐告诉拉什《联邦党人文集》是他知道的最伟大的作品，它把政府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实际的公共管理之中；但他又支持政治腐败的矛盾之处——这与这个最忠实人的性格很难一致起来——被尼布尔逐字重复。在评价汉密尔顿时我们要记住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宪法的作者。在制宪会议上他是受孤立的，他的计划没有被人接受。在《联邦

党人文集》——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中，他要求建立一种他不相信和不喜欢的政府形式。他并不是不与占主流的精神心心相印，并且他不是真正的那种事业的代表，就像麦迪逊一样。麦迪逊谈到他时说："如果他的政府偏离了共和的标准，他会坦率地承认；并且他最大的优点是在培养和支持一种并不是他的选择的体系中忠实地合作。"宪法的制定，尽管是沿着他的路线继续下去的，但它是马歇尔作品——再版的《宪法评论》中的摘要使很少的一些人知道这是马歇尔作品。斯托里说："《联邦党人文集》只是声明了这些权力与职务的目标和总体意义。大法官的大师般的推理已使它们贯彻到底，达到最终结果和限度，精确而明了地尽可能地接近数学的演示。"莫里斯——强烈地与汉密尔顿一样站在联邦党人一边——作证强烈地反对他作为领导人："理论强于实践，他自己不充分相信一个体系可能本身就是好，但与特定的环境联系在一起时就是坏的；他十分了解他所向往的政府形式是不可能采纳的，除非内战；我怀疑他对他称之为接近危机的东西的相信来自于一个信念，即他认为最适合这个辽阔国家的政府形式是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建立的。……他还相信，随着时间和机会的变化我们应该卷入战争，这会加强我们的联合和激励行政当局。他是最慎重的人。他知道有限的君主制，即使建立起来，在这个国家也不可能保留下来。……他在任何场合都不停地鼓吹君主政府的好处并承认他致力于这种政府。……所以，用意很好，但他的行为不好，他还探讨了他所担心的弊端，十分关注如何使弊端远离他们。"亚当斯的语言更为严厉，但亚当斯是一个论敌。据说"他希望好人——正像所称的那样的——来统治；指的是富人、出身高贵的、社会上是杰出的人。"联邦党人似乎已经从这种指责中遭了殃；因为针对任何声称服务于这种旗帜下的集团的偏见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之一。"Les honnêtes

401

gens ont toujours peur: c'est leur nature(正直的人都会害怕:这是他们的天性)",这是夏多布里昂的格言。一个与他最有分歧和最不喜欢他的人,门诺,也得出相同的结论:"En révolution il ne faut jamais se mettre du côté des honnêtes gens: ils sont toujours balayés."(在革命中,千万不要站在正直的人一边:他们总会被肃清。)罗耶·克拉德用只有在描述朋友时才有的坦率说:"C'est le parti des honnêtes gens qui est le moins honnête de tous les partis. Tout le monde, même dans ses erreurs, etait honnête à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excepté le côté droit.(这是正直人的党,但这个党是所有党派中最不正直的。所有人,即使犯了错误,在制宪会议上也是诚实的,除了右派。)"汉尔密顿作为一个哲学家比作为一个美国党派中一员站得更高。欧洲人往往视不自由为自由,为了要保留的东西而保守;并且在除了推理之处的其他动机中我们常常不能排除纯粹的没有利益的保守主义。我们考虑的是土地与资本、传统和习俗、贵族和仆人、皇冠和圣坛。汉密尔顿的特别超人之处是他十分焦虑消除离心力量的极端困难性,并且没有其他类似和相同的力量来分散他的执着或干扰他的观点。所以他是保守思想家中最科学的一个,并且没有一个人非常有益地研究了这个原则:倾向于船而不是船员。

在考虑公正对待保守主义原则时,布赖斯先生引用了坎宁致克罗克尔信中的一段话,尽管它不能充分代表这位部长的观点。"我能理解成当时你认为国王完全是受托利党贵族控制和受他父亲的控制,或就像乔治二世受辉格党控制一样吗?如果是这样,乔治三世统治和皮特(父子)先生领导的行政部分都是虚的。当王权提出自己的力量时我更倾向于王权的真正力量,并且我不是一点不借助人民的力量。"英国几代保守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精华不总是十分忠实于君主传统的,并且在与托利主 402

义的许多辩论家谈话时，坎宁装得更好一些。他 1823 年与马赛拉斯的谈话表明了他的不虔诚的本性。他说："Le système britannique n'est que le butin longues victories remportées par les sujets contre le monarque. Oubliez-vous que les rois ne doivent pas donner des institutions, mais que les institutions seules doivent donner des rois?... Connaissez-vous un roi qui mérite d'être libre, dans le sens implicite du mot?... Et George IV, croyez-vous que je serais son ministre, s'il avait été libre de choisir?... Quand un roi dénie au peuple les institutions dont le peuple a besoin, quel le procédé de l'Angleterre? Elle expulse ce roi, et met à sa place un roi d'une famille alliée sans doute, mais qui se trouve ainsi, non plus un fils de la royauté, confiant dans le droit de ses ancêtres, mais le fils des institutions nationales, tirant tous ses droits de cette seule origine.... Le gouvernment representatif est encore bon à une chose que sa majesté a oubliée. Il fait que des ministres essuient sans répliquer les épigrammes d'un roi qui cherche à se venger ainsi de son impuissance.(不列颠体制只是国民反对君主的长期斗争的战利品。难道你忘了不应该是国王创造制度，而应该是制度创造国王吗？……你知道一个国王对自由有贡献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吗？……乔治四世，你相信如果他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我会成为他的大臣吗？……当一个国王拒绝给予人民所想要的制度时，英国的历史进程会是怎样？她赶走了这个国王，换上一个来自有关家族的国王，它不再是君主政体的产物，但仍享有祖先的权利，因而这是国民制度的产物，不能仅仅由于他的血统而获得所有的权利。……代议制政府有助于君主忘记这个东西。大臣们可以忍受一个无力复仇的国王所说的挖苦话而不必反击。)"

布赖斯先生的著作在其适当的范围内是受到热忱欢迎的，并且我知道任何一个评论家都不怀疑这位具有永恒信念的虔诚作者是否说得对或说得全面。从另一角度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权力来源和伟大政体都放射出不同的光辉。韦伯斯特和托克维尔最喜欢的说法是信徒的信仰激发了革命，其他人认为革命是远洋动物(pelagianism)的胜利；而J. Q. 亚当斯确信"在激励1643年清教徒的动机中没有一个动机对1774年的邦联产生丝毫的影响。"荷兰政治家霍根多珀在1784年回国后曾和他的最高行政官进行了这样的交谈："La religion, monseigneur, a moins d'influence que jamais sur les esprits. . . . Il y a toute une province de quakers?. . . Depuis la révolution il semble que ces sortes de différences s'évanouissent. . . . Les Bostoniens ne sont-ils pas fort dévots?. . . Ils l'étaient, monseigneur, mais à lire les descriptions faites il y a vingt ou même dix ans, on ne les reconnaît pas de ce côté-là.(大人，宗教比以往任何时候对国家的影响都要小得多。……一个省会全是公谊会教徒吗?……自从大革命以来，这些宗教的区别似乎已经消失了。……波士顿人难道不是十分虔诚吗?他们是很虔诚的，大人，但读一读二十年或十年来描述他们的书，我们再也发现不了这一点了。)"不像赫劳·德塞修宪法，联邦宪法没有提及上帝；总统宣誓中也没有；1796年正式宣布美国政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政府，这一切已经不是新闻了。弗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比任何三个人都与新秩序有更大的关系。弗兰克林没有宗教的论调以至于他的著作像边沁的一样现在都受到压制。亚当斯称基督教信念是一个可怕诅咒。我们可以保证杰斐逊，如果不是一个绝对无神论者的话，也不会相信来世的存在；并且他希望法国军队"尽力要把国王、贵族和教士都推上他们长期以来使人民血流成河的绞架。"如果加尔文推动了革命，那是在他与汤姆·潘恩接触时体验到痛苦

403

之后；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影响，这些影响在那一代已经把世界扰得天翻地覆了。它是一个基佐所说意义上的世俗信仰时代，基佐说："C'était un siècle ardent et sincère, un siècle plein de foi et d'enthousiasme. Il a eu foi dans la vérité, car il lui a reconnu le droit de régner.（这是一个火热而真诚的时代，一个充满信仰和热情的时代。它拥有对真理的信仰，因为这让他意识到通过信仰统治的力量。）"

在原则与政策评价上，布赖斯先生用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天平，并且使他书里的法官戴着思辨政治家的面具。我不把他作为一个政治理性者或生活观察者来谈，而只是谈他所要极力回避扮演的角色。如果他对自己担任的历史教师的角色保护得不够的话，如果他留下空间来让人拾起被忽视的线索的话，他可能会展现无限的创新和美国独立所产生的深不可测的海湾；也不会出现杰斐逊主义与这个伟大法官针锋相对的内容。我的担忧与里尔和晚年的切尔布利兹这些杰出的保守人物的思想是一致的。里尔写到："Die Extreme, nicht deren Vermittelungen und Abschwächungen, ducten die Zukunft vor.（极端，而不是调和与抑制，对未来更具影响。）"加尔文派教徒也说过同样的话："Les ides n'ont jamais plus de puissance que sous leur forme la plus abstraite. Les idées abstraites ont plus remué le monde, elles ont causé plus de révolutions et laissé plus de traces durables que les idées pratiques.（观念只有在最抽象的形式下才有更大的力量。抽象的观念更能震动世界，她们比具体的思想引起更多的革命，留下更长久的印象。）"拉塞尔曾说："Kein Einzelner denkt mit der Consequenz eines Volksgeistes.（没有一个民族能用一致的民族精神去思考问题。）"谢林的话可能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不同的方面："Der erzeugte Gedanke ist eine unabhängige Macht, für

sich fortwirkend, ja, in der menschlichen Seele, so anwachsend, dass er seine eigene Mutter bezwingt und unterwrift.(思想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本身具有深远的影响,是的,它可以在人的灵魂深处深深扎根,以至于征服它自己的母体。)”在这个哲学家的话后,让我们用一个神学家的话来总结:“C'est de révolte en révolte, si l'on veut employer ce mot, que les sociétés se perfectionnent, que la civilisation s'établit, que la justice règne, que la vérité fleurit.(这是从反抗到反抗,如果我们不想用这个词,就用社会不断进步,文明建立,正义主宰,真理盛行。)”

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情绪属于1787年,而不是属于1776年。另一因素过去曾起过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别的因素,它是新的、有效的、有特点的因素,并永久地放人到世界的经历之中。造反的殖民地给我首要的和最深刻的印象是最大程度地证明了反抗的法则,是它的最纯洁和最完善形式的抽象革命。造反者是最自由的,他们推翻的政府是压迫性的。那些认为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是忠诚的人可能把这句话应用到一些欧洲政治家身上。他们的榜样代表着一种苦恼,而不是一种慰藉,它对现存所有的政治形式都构成威胁,除了可怀疑的1874年联邦宪法之外。它告诉人们,人应该武装起来反对甚至是一种遥远的有建设性的对自由的威胁;即使阴云比人的手还小,人们有权利与义务为民族生存下赌注,牺牲生命与财产,用血海来淹没国家,打碎皇冠与权杖和把议会抛人大海。在这个颠覆原则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美国联邦,并且由于它的优点使世界从它的轨道中提升起来,赋予它新的历史轨迹。不论何地我们都有被挣断的锁链,被否定的过去、先例和被不成文法替代的法令,后辈都比前辈聪明,思想总是植根于未来,理性总是像阿罗波神一样洞察一切。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教我们从事物本来面目中看待事

404

物，教我们从事件中崇拜上帝："Il faut toujours être content de l'ordre du passé, parce qu'il est conforme à la volonté de Dieu absolue, qu'on connoît par l'évènement.（应该对过去的秩序感到满意，因为它与上帝的意愿是相同的，我们从结果中可以知道。）"与此相反的是爱默森的话："制度不是天生的，尽管它在我们出生前就已存在，它们并不优于公民。每个法律及其运用都是人适时用来处理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制定好的法律，也可以制定更好的法律。"西华德的话对此进一步补充："我们前辈确认的权利不只是针对他们本身的，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权利。宪法的基础是建筑在远比那种由冲突的利益和当前的偏见所构筑的上层建筑更广泛的基础上的。联邦宪法和法律实际上没有把这些原则扩展到新的政府体系中去；但是这些原则在独立宣言中已经明明白白地宣布了。充分地发展这些原则并使之用于实际操作构成了所有自由主义政治家都渴望促进的进步，这些进步的终结将是我们实现了完全的政治平等，将是我们相似的体制在整个世界得到了发展与完善。"汉密尔顿的编辑所选的作为他的体系的基调的一段话可以充分地表达革命的精神："人类神圣的权利不是从旧的羊皮纸或发霉的记录本中查抄来的，它们像阳光一样，是用整个人性书写出来的，是用上帝的手写出来的，是不能被置人于死地的权力所抹杀的或模糊的。我认为公民自由从真正的、不含糊的意义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幸福。我相信整个人类都有权享有它，如果不是罪大恶极是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权利的。"那也是一个哲学家把政府分成两种时代：好的和坏的，即已经存在的和还不存在的；那是一个倾向于早期自由主义的伯克宣称革命只是惟一一个使世界变好的事物的时代，伯克说："什么都比不上一个会使地球从中心都震动的动荡更能使欧洲国家恢复那种曾使它们非常卓越的自由。"

405

第三部分

自由与现代民族国家

三十、民族性*

409

无论何时，伟大的智力孕育总是与不幸相关的，而不幸又是与对人的状况进行剧烈改变分不开的；因为这些不幸在实践上是无法消除的，思辨的或者想像的天才便在理想社会的沉思中寻找治疗，或至少寻找安慰。诗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种观念，在遥远的过去或遥远的地方，在新大西岛或阿卡德地区，居住着纯朴而富足的人们，这些人远离腐败与市民生活的压制，实现着黄金时代的传说。诗人的职责几乎没有变化，他们的理想社会的特征也大体相似；但是当哲学家试图通过想像状态的设计来规劝或改造人类时，他们的动机是更确定与直接的，他们的国家既是一种讽刺对象，又是一个理想模式。柏拉图和普罗提诺、莫尔和康普内拉，都用那些现实共同体的社会织体中不存在的材料来建构他们想像的社会，他们为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所激发 《理想国》、《乌托邦》和《太阳城》既是作者们对自身经历的状况的抗议，也是他们逃避现实、在对立的极端中寻求慰藉的避难所。这些著作仍然没有影响，从未由文学领域进入政治史，因为要使一种政治观念控制住大众，除了不满和沉思的天才以外，还需要有别的东西。哲学家的构想只能导致狂热分子而不是民族的实际忠诚；而且虽然压迫会导致暴虐和一再的冲突，就像一个人被痛

---

* 首刊于《内外评论》，第1卷(1862年7月)，第1—25页。

410 苦缠绕那样，但是它不能培育一种稳固的目标和革新计划，除非一种新的幸福观念与现实罪恶的意义产生了关联。

宗教史提供了完整的例证。在中古晚期的教派与新教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别比在那些被称做是宗教改革之前兆的体系中发现的类似点更为重要，也足以解释新教与其他教派相比的活力。虽然威克里夫和胡斯在天主教的特殊教义的理解上相互矛盾，但路德拒绝教会的权威，给个人良心以独立的地位，这必然导致连续不断的抵抗。在以尼德兰起义、大叛乱、独立战争和巴拉班暴动为一方，法国革命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差异。在1789年之前，叛乱者被特殊的错误所挑激，实实在在的不满以及所有人都认同的原则给他们的行为以合理性；新的理论在争论的起因中被推进，但它们是偶发的，反对暴政的大辩论忠于古代的法律。虽然变化由法国革命引起，但那些由社会状态的罪恶与缺陷所唤起的热忱在所有文明的世界成了永久性的和猛烈的力量。它们是自发的、攻击性的、没有预兆的和没有战士保护的，也是大众的、非理性的和几乎无法抗拒的。大革命影响了这种变化，部分是因为它的学说，部分是因为事情的间接影响。它教导人们把自己的愿望与要求作为对错的最高标准。权力更迭无常，结果每一党派都把大众的欢心作为成功的裁判，屈服于既反复无常又桀骜不驯的大众。政权常垮台，领土常易主，这种状况剥夺了永久的尊严所定下的一切。传统与惯例已不再是权威的保卫者；而出自革命、战争的获胜者与和平条约的安排，同样无视先在的权利。义务与权利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各民族也就拒不接受对之不予保护的法律的控制。

在这样一种世界条件下，理论与行动紧密相随，实际的恶行很容易导致相反体系的产生。在自由意志的领域，极端间的消

解保存着自然进程的调节作用。反动的冲动把人们从一个极端 411
推向另一个极端。追求遥远而理想的对象,这个对象,因为它的耀眼的光芒捕获了人的想像,因为它的简单性俘获了人的理性,唤起了合理而可行的目标——这种目标因为受许多敌对的要求的限制,被限定在合理、可行而又公正的范围内——所不能产生的热诚。一种极端或过度可以通过另一个极端与过度而矫正,就大众而言,只好通过错误与错误的相互抵消来促进真理。少数人没有单枪匹马达到剧变的力量,多数人又没有受动于纯粹真理之智慧。在多种疾患缠身的地方,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只有抽象观念或理想状态,才有笼络那些寻求多种疾患的普遍良药和适用于所有状态的回春之药的群氓之共同行动的吸引力。于是既符合于人类的好的志向,又符合于人类的坏的志向的错误原则,成了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正常而必然的因素。

这类理论,就其产生于确定无疑的罪恶而言,是公正的,并且在清除这些恶行时起到了作用。在反对对现存事物的随意改变方面,在对错行保持清醒的意识方面,作为一种提醒或威胁,它们是有用的。它们不能充当重建市民社会的基础,正如药物不能当饭吃一样;但是它们可能有影响社会重建的优势,因为它们虽然没给出良策,但为所需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它们所反对的事物秩序,是由统治阶级的自私与粗暴地滥用权力导致的,也是对世界的那种既无理想因素,又无道德目的的自然过程进行人为限制导致的。实践的极端与它们所激起的理论的极端不同,因为前者是武断而暴虐的,而后者虽然也是革命性的,但同时也是治疗性的。在有些场合错误是自发的,而在有些场合,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现存秩序与否认其合法性的颠覆性理论之间发生冲突时的一般情况。有三种主要的颠覆理论,对现存的

权力、财产与领土的分配进行抨击，并分别向贵族、中等阶级与主权发出攻击。它们是平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理论。虽然有共同的根源，反对相同的罪恶，并在若干方面互有关联，但是它们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卢梭主张第一种，巴贝夫主张第二种，马志尼主张第三种；而第三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目前是最有吸引力的，而且在获得未来力量方面，也是最有指望的。

412

在旧的欧洲体系中，民族的权利既不为政府承认，也不受人民肯定。是王公贵族的利益，而不是民族的利益在调节着边界；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也从不顾及大众的欲望。在所有自由权被压制的地方，民族独立的主张必然被忽视，而公主们，用费奈隆的话，便把一个王国当做嫁妆。在 18 世纪欧洲大陆，这种对集团性的权利的淡忘被默认了，因为君主专制主义者只关心国家，而自由主义者只关心个人。教会、贵族、民族在那个时代的流行理论中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它们也没有作出任何防御性的措施，因为它们也未受到公开的攻击。贵族还保有其特权，教会还保有其土地，而压制着民族的自然倾向也摧毁其独立性的王朝的利益，无论如何，依然保持其完整性。民族情感在其最敏感的地方也没有受到伤害。剥夺一个君主的王位继承权，使其领土变为附庸，可能被视为伤害了所有的国王，并为其自己的臣民提供一个危险的、对王权的不可侵犯性提出挑战的榜样。在战争年代，正如没有势如累卵的民族原因一样，也不存在唤起民族情感的企图。统治者之间彼此礼遇与下等人的彼此蔑视形成对照。交战军队的司令官之间相互致意；没有讥讽，也没有激怒；战斗伴有盛大骄傲的阅兵式。战争的艺术成了一个缓慢而有教养的游戏。王国间的团结不仅因为自然的利益共同体，更因为家族忠诚。一项婚姻缔结有时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的信号，而家族的联姻又常常为野心设置障碍。当宗教战争在 1648 年结束的

时候，剩下的战争就只有为了遗产与属地而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反对那些政府体系不符合王朝国家公法的国家——这使得它们不但得不到保护，而且处于被憎恨的状态——间的战争。这些国家有英国和荷兰，直到荷兰不再是共和国，在英国，只到1745年詹姆斯党人不再为王位斗争为止。不过，直到那时仍然还有一个国家例外；还有一个其地位不被相互礼让的国王们承认的君主。 413

波兰便不具有由王朝联姻与合法性理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种理论认为王位之获得只能通过联姻或者继承。在王朝的专制主义时代，没有皇族血统的君主，仅由民族赋予的王位是不正常的和触犯众怒的。这个国家因为其制度的性质被排斥于欧洲体系之外。它激起了一种无法获得满足的贪婪。它使欧洲皇室家族通过统治者的联姻永久性地增强自身，或者通过馈赠或继承获得它的希望落空了。哈布斯堡家族曾经与法国的波旁家族就西班牙领地及西印度群岛征战，与西班牙波旁家族就意大利征战，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就帝国征战，就西里西亚与霍亨索伦家族征战。围绕分割意大利与德意志的领土问题，就曾经有敌对家族的数次战斗。但是没有一个家族希望在一个联姻与体面无效的国家中要求弥补损失或增强权力。在那里他们无法永久性地继承他们在每一次选亲中通过阴谋所达成的东西，而在支持他们的傀儡候选人的斗争过后，波兰的这些邻居们最终达成了彻底瓜分这个国家的条约。到此为止，还没有一个民族被基督教国家剥夺了政治上的存在，而且，不管民族利益与民族共感(sympathies)多么被忽视，它们仍然用虚伪的法律滥用掩盖了错行。但是瓜分波兰是个放纵暴力的行为，不仅是对大众情感的公然挑战，也是对公法的公开挑战。在现代史上一个大国第一次被压迫，整个民族被其敌人瓜分。

这个恶名昭彰的举措，旧的专制主义的最革命性的行动，在欧洲唤起了民族性理论，处于沉睡中的权利变为一种热望，一种情绪变成一种政治要求。“没有一个明智或诚实的人，”埃德蒙·伯克写道：“会赞同那种瓜分，在思索它的时候不预示在可见的未来从中产生的巨大的灾难会波及所有国家。”[①] 从此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要求被统一于一个国家的民族——一个四处游荡借尸还魂的幽灵；并且第一次听到了国家的安排是不公正的——它们的限制是反自然的——呼声，整个民族被剥夺了组成一个独立共同体的呼声。在这种要求能够被有效地陈述出来以反对它的敌人的无所不在的权力之前——在其最后的瓜分后获得其力量以克服长期的服从习惯的影响之前，在消除原先失序带给波兰的处于被蔑视地位之前——欧洲的旧体系毁灭了，而新世界在其废墟上兴起了。

使波兰成为其掠食对象的旧的残暴政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英国的自由精神，一个是以其自己的武器摧毁法国君主制的革命学说；二者各以其相对立的方式与民族不具集体性的权利的理论相冲突。在今天，民族性的理论不仅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辅佐，在最近三年的运动中，也构成其实际本质。不过，这种晚近的联合，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尚未为人所知。现在的民族性理论之兴起，部分是法国革命的合法后果，部分则是其反动。当无视民族差别的体系遭到英法两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时，抵抗这两种运动的体系也就从两个相互有别的根源中开出，并展示出1688年与1789年的特征。当法国人扫除了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权威并成为自己的主人时，法国便处于解体的危险之中：因为大众意志是难以确定的，也是难以达成共识的。“法律，”在

① E.伯克：《考察少数派行为》，见《全集》，第5卷，第112页。

处决国王的辩论中维尔尼奥说，"只有建立在人民的意志的基础上才是有强制力的，而且人民仍然保有同意或否决它们的权利。当人民在公民大会上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国民代表与法律必须立即消失。"这个学说把社会分解为它的自然因素，并威胁要把国家分解为与公社一样多的共和国。因为真正的共和主义，坚持的是部分与整体全都自治的原则。在一个广袤的国家，只有当若干独立的共同体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联邦中时，如希腊、瑞士、尼德兰和美国，共和主义才能真正流行；所以，那些不是建立在联邦制原则上的大的共和国必然导致一个单一的城邦政府，如罗马和巴黎，或者，在更小的范围内，如雅典、伯尔尼和阿姆斯特丹；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大的民主国家，要么为统一而牺牲自治，要么通过建立联邦制而保持民主。 415

法国的历史和经若干世纪成长起来的法国国家一起倒下。旧的统治权被摧毁了。地方当局被厌恶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新的中央权威需要建立在新的统一原则基础之上。自然的、作为理想社会的国家应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整齐划一取代了传统；法国人民被视为生理的产物：一个种族的而非历史的单元。人们认为统一体的存在可以脱离代表制与政府，完全独立于过去，且能够在任何时刻表达或变更其思想。用西耶士的话来说，它不再是法国，而是某种这个民族可以托付的未知的国家。中央权力拥有权威，因为它服从整体，而且与普遍情绪有分歧是不允许的。这种赋有意志力的权力，在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学说中人格化了。"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名称指示，部分不可能代表整体或不可能以整体的名义行事——存在着一种高居于国家之上的至上权力，它有别于、独立于它的成员；在历史上，它第一次表达了作为抽象物的民族性的观念。以这种方式不受过去控制的人民主权的观念，孕育了独立于历史的、政治

的存在的民族性观念。它起源于对两种权威,即国家的权威与传统的权威的反抗。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法兰西王国是一长串事件的结果,那些构筑了国家的力量同样构筑了领土。革命则既无视法兰西的疆土所由形成的机构,也无视它的政府所由形成的机构。民族历史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被小心翼翼地祛除——行政体系、国家的地理区分、社会阶级、法人、度量衡、日历。法兰西不再受其可诅咒的历史影响所形成的限制的束缚;它只承认自然所建立的东西。对民族的定义借自自然界,而且,为了避免领土的损失,它不仅是个抽象物,更是个虚构之物。

民族性原则就存在于这个运动的种族学特征中,这个特征 416 是通常所观察到的现象,即天主教国家比新教国家更常发生革命的根据。实际上,革命在拉丁语国家比在条顿语国家更常见,因为它部分依赖于一种民族的冲动,这种冲动只有在存在着一种外来的因素,即外国统治的痕迹需要扫除的地方才会被唤起。西欧经受过两次征服,一次是罗马人,一次是日耳曼人,并两度接受入侵者的法律。每一次它都兴起反对获胜种族的斗争;而两个伟大的反动,虽然因两个征服者的特征而不同,却共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倾向。罗马共和国忙于将臣服的民族挤压到一个同质的和屈服性的大众中;但是在颠覆共和政府过程中总督所获得的权力越大,行省对罗马的反抗就越有助于帝国的建立。恺撒体系给臣服者前所未有的自由,并把他们上升到平等的公民地位,这种平等的地位结束了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君主制作为一种避难所受到高傲而贪婪的罗马人的欢迎;而由罗马人培植起来的爱平等、恨贵族、容独裁的性格,至少在高卢,成为民族的主要特征。但是在其活力被严厉的共和国打碎的民族中,不止一个保留着享受独立或发展新历史所必需的素质。把国家组织在道德秩序内,将社会建立

在道德秩序之上的政治能量消耗完了，基督教的医生们徒劳地检查着废墟上的人民。借助于他们，教会有可能在堕落的罗马帝国中生存下来。民族生活的新因素因毁灭者的到来而在衰败的世界中复苏。蛮族的大洪水一度淹没了它，而当洪水退去文明的地平线再次出现的时候，沃土便饱含着养分与再生之力，洪水的泛滥为未来的国家与新社会播下了种子。政治的意义和力量与新血统同时到来，并在年轻的种族对衰老的种族的强势(power)中，在自由的逐渐建立过程中展示出来。代替普遍的平等权利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权利的实际享有必然视力量(power)而定、与力量相称，人们的权利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首要的是财产的分配。市民社会变成一个有差别的机体，而不是一个无形式的原子的聚合。封建的体系逐渐产生了。 417

罗马高卢在恺撒与克洛维之间的5个世纪里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与无差别的平等观念，以至于人民已经无法与新体系协调。封建主义仍然是个舶来品，封建贵族是个外来的种族，法兰西普通大众既在罗马的司法制度下又在王冠下寻求保护。绝对君主制在民主的协助下发展起来，这乃是法国历史的一个恒久的特征。虽然压制贵族制度，清除中间权威如此特别地成为一种民族目标，以至于王权在败落后反而受到更强有力的追求；但是，封建的，先是受到特权阶层与大臣限制的王权，当其越来越不受限制时，反而变得越来越受到爱戴。从13世纪起便忙于抑制贵族的君主制，最终被民主制扫到一旁，因为它在那项工作中太自我膨胀了，不仅无力否定自己的起源，而且实际上摧毁了培育自身的阶级。所有这些组成法国革命的怪异特征的事情——要求平等、仇视贵族与封建主义、仇视与前二者相联系的教会、永远把异端作为典范来追随、新法典、与传统决裂、用理想的制度取代以往在种族混合与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任何事物——都表

示出对法兰克人侵后果作出反动的通常类型。对于王族的仇恨小于对于贵族的仇恨；特权的专制更受憎恶；国王之被处死不是因为滥用权力，而是因为他的权力的起源。君主制与贵族制的分裂在法国变得受欢迎，甚至在最失控的时候也是如此；而恢复王位努力，用它的贵族来限制与保护它的努力被摧毁了，因为王位所依赖的条顿因素——血统、贵族、长子继承和特权——已不再被容忍。1789年观念的实质并不是最高权力的限制，而是中间权力的废除。这些权力，与享受它们的阶级一起，在拉丁语的欧洲起源于蛮族；而自称为自由主义的运动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如果它的目标是自由，那么它的手段就应该是建立并非起源于国家的伟大权威，而它的榜样就应该是英格兰。但是它的目标是平等；而且就像法国在1789年所做的那样，它试图清除由条顿种族带来的不平等因素。这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共通的地方，并由此形成拉丁民族的自然联盟。

418

这场运动中的民族因素没有被它的领袖们理解。首先，他们的学说看起来是完全与民族性观念相对立的。他们教导说政府的某些普遍原则在所有国家都是绝对正确的；他们在理论上肯定个人的无限制的自由，肯定意志高于所有外在必然性与义务。这很明显是与民族理论相矛盾的，民族理论说某些自然力量应该决定国家的特征、形式与政策，根据这种理论，命运代替了自由的地位。因此，当解放的企图被吸收进征服的欲望中，共和为帝制所取代时，民族情绪并没有从它所卷入的革命中直接发展，而首先在对革命的抗拒中表现出来。拿破仑在攻击俄国的民族性中呼唤一种新的权力，把这种权力引入意大利，并用它在西班牙和德国进行带有蔑视性的统治。这些国家的国王被驱逐或废黜；起源于法国，带着法国的精神与手段的管理体制被引入。人们抗拒变化。反对这种变化的运动自然发生并受到拥护，因为

统治者缺位或孤立无援；它是民族性的，因为它直接反抗外国的制度。在蒂罗尔，在西班牙，后来在普鲁士，人民不接受政府的建议而自愿地起来驱逐革命法国的军队与观念。人们开始从革命的征服性而不是它的起源上意识到革命的民族因素。拿破仑帝国公开压迫的三件事情——宗教、独立与政治自由——联合在一个短暂的同盟中以激起推翻拿破仑的大暴动。在那个难忘的联合的影响下，在大陆产生了一种政治精神，它坚持自由而痛恨革命，寻求复辟、发展与改革衰败的民族制度。拥护这些观念 419 的人，斯坦因和格雷斯，洪堡、缪勒和德·迈斯特尔，②他们对波

② 在德·迈斯特尔的《国家论》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关于民族性的思想："En premier lieu les nations sont quelque chose dans le monde, il n'est pas permis de les compter pour rien, de les affliger dans leurs convenances, dans leurs affections, dans leurs intérêts les plus chers.... Or le traité du 30 mai anéantit complétement la Savoie; il divise l'indivisible; il partage en trois portions une malheureuse nation de 4000000 hommes, une par la langue, une par la religion, une par le caractère, une par l'habitude invétérée, une enfin par les limites naturelles.... L'union des nations ne souffre pas de difficultés sur la carte géographique; mais dans la réalité, c'est autre chose; il y a des nations *immiscibles*.... Je lui parlai par occasion de l'esprit italien qui s'agite dans ce moment; il (Count Nesselrode) me répondit: 'Oui, Monsieur; mais cet esprit est un grand mal, car il peut gêner les arrangements de l'Italie.'（民族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不许可在他们的习俗、情感和切身利益上伤害它们。而5月30日协议取消了萨伏依，把不可分的东西分裂了，通过语言、宗教、习俗，最终是自然分界，把一个有400万人的不幸民族分成三个部分……民族的联合不许可有地图上的难点，而在事实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存在着许多不能混同的民族，我偶尔曾对纳塞罗德伯爵谈过当前的意大利精神，他回答我说：'是的，先生，这个精神是巨大的祸害，它危害到外国对意大利的管理。'（《迈斯特尔外交通信》，第2卷，第7、8、21、25页。）"同年，1815年，格雷斯写道："In Italien wie allerwarts ist das Volk geweckt; es will etwas grossartiges, es will Ideen haben, die, wenn es sie auch nicht ganz begreift, doch einen freien unendlichen Gesichtskreis seiner Einbildung eröffnen ... Es ist reiner Naturtrieb, dass ein Volk, also scharf und deutlich in seine natürlichen Gränzen eingeschlossen, aus der Zerstreuung in die Einheit sich zu sammeln sucht.（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一样，人民的构成也在变化，它也许指卓越的一部分，也许指一个观念，一个虽然没有被充分理

拿巴主义与旧制度的专制主义一样怀有敌意，他们坚持民族权利，这些权利是受到波拿巴主义与专制主义侵犯的，也是他们希望通过摧毁法国的至上性所恢复的。由于那个在滑铁卢中获得成功的原因，革命的朋友没有得到同情，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将他们的学说与法国的目的等同起来。英格兰的荷兰王室的辉格党，西班牙的亲法分子，意大利的穆拉派党人，以及莱因同盟的支持者们，将爱国主义融人于他们的革命情感中，对法国力量的衰落深表遗憾，警惕地注视着解放战争(War of Deliverance)唤起的新的和未知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法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国的至上性都是威胁。

但是民族和大众权利的新希望在复辟中被粉碎。这时候的自由党人关心自由，不是以民族独立为形式的自由，而是以法国的体制为模式的自由；他们联合反对具有建立政府志向的民族。他们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牺牲民族性，就像神圣同盟为了专制主义的利益牺牲民族性一样。塔列朗的确在维也纳说波兰问题必须先于任何其他问题来解决，因为波兰的瓜分是欧洲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灾难之源；但是王朝的利益还是压倒性的。所有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国王都恢复了他们的领土，除了萨克森国王以外，他因忠于拿破仑而受到惩罚；但是在当政的王族中没有代表权的国家——波兰、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领土没有恢复，甚至教皇在收复奥地利掌握中的公使馆时也遇到大麻烦。旧制度所忽视、革命与拿破仑所凌辱的民族性，在其第一次公开的示威之后，在维也纳和会上受到重创。产生于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原则，革命给了它一个理论基础，拿破仑的挑动又使它成为

420

解但却开启了一个自由、拥有无限疆域的形象化的理念。……一个包括在简洁、清晰的自然界限内的民族有一种单纯的自然倾向，即从山河破碎中寻求统一。)”(*Werke*, ii.20).

短暂的骚动力量;这个原则因为复辟的长久的错误而成长为永久性的教条,欧洲的形势既给予它滋养又为它辩护。

神圣同盟中的政府同时致力于镇压对它们形成过威胁的革命精神,以及它们所由之恢复的民族精神。奥地利根本就不承认民族运动,在1809年以后曾经阻止过民族运动的复兴,在镇压过程中自然处于领导地位。对1815年最终决定表示任何不安情绪,任何变化或改革的渴望,都被指责为煽动叛乱。这个体系用那个时代的邪恶趋势来压制美德;而它在从复辟到梅特涅垮台这段时间,以及从由施瓦曾伯格开始到巴赫与曼陀菲尔结束的反动时期所激起的抗拒,源自自由主义的对立形式的各种各样的结合。在这场斗争的后面阶段,民族权利高于所有其他权利的观念在革命的代理者中逐渐取得了它今天所具有的支配地位。

第一个自由主义运动,南欧的烧炭党运动,没有特别的民族特征,但是受到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波拿巴分子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与1813年相对立的各种观念走到前台,而一种在许多方面敌视革命原则的革命运动,开始捍卫自由、宗教与民族性。所有这些原因都结合在爱尔兰人鼓动中,以及希腊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的革命中。这些受拿破仑侮辱并曾经起来反对他的情绪,开始反对复辟的政府。它们先是被刀剑制服,然后被条约制服。民族原则将力量而不是公正加到这个运动中。这场运动除了波兰,在各地都获得了成功　在这场运动的后起阶段,它 421 堕落成一种纯粹的民族观念,如鼓动废止继起的解放,以及东正教会赞助下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泛希腊主义的兴起。这是对于维也纳安排的反抗的第三阶段,这种安排是虚弱的,因为它不能满足民族的或宪法的渴望,这两种渴望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对另一种形成保护,若非因为大众的理由,也是因为道德的理由。首

先,在1813年,人民起来反抗入侵者,保护自己的合法的统治者。他们拒不接受篡位者的统治。在1825到1831年这段时间,他们决意反对外来者的不当治理。法国的管理机构常常好于被它取代的机构,但是存在着比法国人更优先的权威诉求者,而民族的竞争首先是合法性的竞争。而在第二阶段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没被剥夺王位的人领导希腊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土耳其人、荷兰人和俄国人之被攻击,不是因为他们是篡位者,而是因为他们是压迫者——因为他们管理不善,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种族。接下来的时代主题明确:民族不能为外来者所统治。合法获得并审慎行使的权力被宣布为无效。和宗教一样,民族权利在以往的组合中,曾被认为是负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也起到辅助作用,但现在民族性变成一种最高的要求,一种只肯定自身的要求,可以拿出来作为争取统治者的权利、人民的自由、宗教安全借口的权利,但是这种要求,如果不能与这些东西形成这样结合,往往以牺牲民族的任何其他目标为代价。

梅特涅是仅次于拿破仑的这种理论的主要促进者;因为复辟的反民族特征在奥地利最明显,但也正是在与奥地利政府的对立中,民族性成长为一种体系。拿破仑相信自己的军队,在政治中轻视道德,却被道德力量的兴起所推翻。奥地利在它的意大利属地的治理中犯了同样的错误。意大利王国曾把半岛北部的所有地方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法国人在各处压制的民族情感被培育起来用以保卫意大利与波兰人的自己权力。当胜利的潮流转变时,奥地利用它们所培育出来的情感来反抗法国。纽金特在他对意大利人的宣言中说,他们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同样的精神服务于不同的主人,先用来摧毁旧的国家,次用来驱逐法国人,最后,在查理·阿尔伯特之下,用于掀起新的革命。它以最矛盾的政府原则的名义被诉求着,满足所有的需要,

422

因为它是可以联合所有东西的事物。起源于对种族统治的抗议，这是它的最温和也是最不发达的形式，它成长为对所有多民族国家的诅咒，最后变成民族与国家必须是个共存体的最完整、最一贯的理论。"一般说来，"密尔先生说，"它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政府的界线大体上必须与它的民族界线相一致。"[5]

从模糊不定的志向到政治体系的基石，这个观念表面的历史进展，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平中得到描述；这个给了此种观念持久的生命力的人就是马志尼。他发现烧炭党在反对政府的政策上软弱无力，便决意在民族性的基础上给自由主义运动灌注新的生命力。流放是民族性的温床，正如压迫是自由主义的学校；当马志尼是马赛的一名难民时，他便构思了"青年意大利"的观念。同样，波兰的流放者们是每一个民族性运动的翘楚。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政治权利都被纳入独立的观念中，尽管他们彼此相异，但是这个观念却是激励他们的一个共同志向。到了1830年，文学也助长了民族性的观念。"这是一个浪漫派与古典派大冲突的时代，"马志尼说，"这种冲突也可以称作权威派与自由派的冲突。"浪漫派在意大利是异端，就像天主教在德意志是异端一样；但是在这两个地方，在鼓励民族史与民族文学方面，它们却具有共同的影响，而但丁既是意大利民主派的权威，也是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中世纪复兴派领袖的权威。但不管是流放者，还是新的诗歌与批评学派，他们的影响力都没有扩展至大众。它们是不受大众同情与支持的宗派，一个不是建立在世间疾苦之上而是建立在教义之上的密谋团体；而1834年，当萨伏依在"统一、独立、上帝与人道"的旗帜下企图起事的时候，人民对其目标感到疑惑，且冷漠地对待其失败。但是马志尼继 423

[5] 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98页。

续其宣传，并将其“青年意大利”发展为“青年欧罗巴”，并于1847年建立国际民族联盟。“人民，”他在其开幕辞中说，“只能为一个观念所打动，那就是统一与民族性的观念。……政府的形式不是世界性问题，只有民族问题才是世界性的问题。”

1848年革命在其民族目标方面的挫折，以两种方式为后来民族性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第一条是带着新的、更有活力的中央集权特征的奥地利权力在意大利的复辟，它对于自由毫无妥协余地。虽然这个体系获胜了，但是正义在民族渴望这一方，这些渴望通过曼宁以更完全、更有教养的形式得到了复兴。奥地利政府10年内的政策反动，没有能变武力的占有为公正的占有，把建立自由制度作为效忠的条件。这种政策从反向支持了民族性理论。在1859年，这种政策使弗朗茨·约瑟夫失去所有的主动的支持与同情，因为他在其行为方面的错误比其敌人在教义上的错误更为明显。然而，民族理论所获得的活力，它的真正原因是民主原则在法国的胜利，以及欧洲大国对它的承认。民族理论包含在主权是普遍意志的民主理论中。“人类中的任何一群人，如果还未决定应属于哪一种集体组织，那么人们很难知道他们还必须自由地去做什么。”[4] 正是因为这个行为，民族组成自身。要拥有集体意志，统一就是必需的；要肯定集体意志，独立则是先决条件。与君王的废黜、法律的废止相比，统一与民族性依然是主权概念的较为根本的因素。法律废除或君王废黜方面的武断之举可能受到人民的幸福或君王的名声所阻止，但是被民主观念激起的民族不可能依然允许它自己的一部分属于外国，或者不能允许整体被分裂为若干自然的国家（*native State*）。因此，民族性理论既出自把政治世界从无视其要求

---

④ 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96页。

的正统中分离出来的原则，又出自假定这些原则的革命；因为同样的理由，它是后者反对前者的一个主要武器。

为了追踪民族理论的外表的和可见的成长，我们准备对它的政治特征与价值作一检查。创造出民族理论的专制主义既否定作为民主的一个产物的民族统一体的绝对权利，又否定本属于自由理论的民族自由的主张。这两种分别与法国与英国的体系相对应的民族性观点，仅仅在名义上相互关联，而实际上是政治思想的两个对立极端。在一种场合，民族性建立在集体意志的永恒至上性之上，民族统一体只是集体意志的必要条件，其他任何影响都必须于服从它，而反对它的东西都没有权威性，所有抗拒都是暴虐的。在这里，民族是个建立在种族之上的理想的单元，而无视外部原因、传统与现存权利的限制作用。它君临居民的权利与要求，在它的虚构的统一体中吸收了他们的有分歧的利益；为了民族的更高要求而牺牲他们的多种倾向与责任，为了它自己的自明的目的，它压垮所有的自然权利与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由。[5]无论何时只要单一而确定的目标被提出来作为国家的最高目的，不管它是阶级利益、国家的安全或权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还是支持任何一个玄思的观念，这时国家就无可避免地变为绝对之物。自由仅仅为了实现自身便要求限制公共权威，因为自由不分彼此地施惠于所有人，而不会激起

424

⑤ "Le sentiment d'indépendance nationale est encore plus général et plus profondement gravé dans le coeur des peuples que l'amour d'une liberté constitutionnelle. Les nations les plus soumises au despotisme éprouvent ce sentiment avec autant de vivacité que les nations libres; les peuples les plus barbares le sentent même encore plus vivement que les nations policées（民族独立的情感比对宪法自由的热爱更普遍、更深地刻在人们心中。最屈服于专制的民族和自由的民族一样强烈感受到这种情感，最野蛮的民族甚至比文明民族还要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情感。）"（*L'Italie au Dix-neuvième Siecle*, p.148, Paris, 1821.）

诚实的反对。为了主张民族统一的权利，政府纵然没有丝毫缺点，其政策纵然是仁慈而公正的也必须被颠覆；必须强迫臣民将其忠诚转移给一个他们不曾有过依附情感的（新）权威，纵然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外国控制的权威。除了对绝对国家的共有的敌意以外，第二种理论与第一种没有共同之处，它视民族性为组成国家形式的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因素。它与前者不同，因为它倾向于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因为它的目标不是一种武断的变革，而是对于现存的政治生活的一种谨慎的敬意，因为它服从法律与历史的结果，而不是服从于对理想未来的渴望。当统一体的理论弄得民族成为专制与革命之源时，自由权理论则视其为自治的堡垒，以及对于国家的过度权力的最重要的限制。那些要求为统一体贡献出去的私人权利，在民族的联合中得到了保持。除了这种共同体——它是一个国家所能包含的最大的事物，它加给它的成员身上的是在特征、利益与意见上的恒常的相似性，它通过分立的爱国精神（*divided patriotism*）的影响来抑制统治者——以外，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像它那样对集中化、腐败与专制的倾向进行如此有效的抵制。同一个主权国家中出现不同的民族所起的效果与国家中教会的独立相类似，通过利益的平衡、结社的增进以及通过公开舆论给予臣民的约束与支持，它能够预防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盛行的奴性。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形成确定的公共舆论群体、给予政治情感以巨大的资源与中心，以及并非源自统治者意志的责任观念，它可以促进独立。自由激发多样化，而多样化通过提供组织的手段保存自由。所有那些管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调节社会生活的法律，都是民族习俗的多样化的结果，是私人社会的产物。因而，在这些事物当中，若干个民族可以彼此相异；因为是民族自己创造了这些法律，它们并不将这些东西归于统

425

治它们所有人的国家。同一国家内的这种多样性对于越过对任何人都是公共的(*common to all*)政治领域侵入在立法之外受自然自发的法则统治的社会领域(*social department*),是一个坚实的障碍。对社会的干涉是专制政府的特征,它肯定会导致反动并最终导致矫正。专制主义的那种对于社会自由之自然的不宽容,在民族的多样性中肯定会发现纠正物,这是别的力量不能如此有效地提供的。同一国家内的多民族的共存既是其自由的检验,也是其自由的最好保证。它也是文明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这种手段,它处于自然的和禀承天意的秩序之中,比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理想的民族一体化更体现一种进步的状态。

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是文明的生活条件之必需,也是人结合于社会之必需。低下的种族可以通过与智力上优越的种族共同生活在政治联盟中而得到提升。虚弱而衰老的民族可以通过与年轻而有活力的民族的接触而得到新生。组织因素与管理能力或者因为独裁主义的堕落影响,或者因为民主的离心性行为而失落的民族,可以在一个更强壮与较少腐败的种族的约束下恢复与更新。这种孕育与再生的过程,只有在一个政府中才有可能。正是在国家的大熔炉中,融合才有可能,据此,人类一部分人的活力、知识与能力才能与另一部分人交流。在政治的与民族的界线重合的地方,社会将会停止前进,民族将会回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两个互有差异的民族不仅通过为生活在一起的人带来利益而把人类联合起来,而且因为它用政治的或民族的纽带把社会联合起来。因为它们同属于一个政府,或者因为它们同属于一个种族,使得每一个人在他的邻居那里都有利益;从而人性、文明与宗教的利益都得到促进。

426

正如异教自我认同其种族差异一样,基督教对种族的混合表示欣喜,因为真理是普遍的,而错误则是多种多样的和特殊

的。在古代世界，偶像崇拜和民族性走到一起，圣经用同一个词语来表示两者。教会的使命就是克服民族差异。在它的无可争辩的权威时期，整个西欧服从同样的法律，所有文学包含在同一种语言中。基督教王国的政治统一体在一个单一的统治者身上得到了人格化，而它的精神的统一在每一所大学中都得到体现。正如罗马人的征服在消灭了被征服民族诸神过程中得到完成一样，查理曼仅仅通过强力毁灭萨克森人的异教仪式就制服了他们的民族抵抗。出了中世纪以后，日耳曼种族与教会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体系与一种新的民族概念。自然属性在民族中正如在个人中一样受到克服。在异教与未开化的时代，民族因其极端广泛的差异而彼此有别，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习俗、427 语言与性格上。在新的法律下，他们共有了好多事情；将他们隔离的屏障被清除了，基督教所强化的新的自治原则使他们能够既在同一个权威下共同生活，又不失去他们的纯洁的习性、风俗或法律。新的自由观念使得不同的种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成为可能。民族不再是它在古代世界的那个样子——一个相同祖先的子裔，或者特殊地域的土著居民——而是一个道德的与政治的存在；不再是地理学或生理学单元的产物，而是在通过国家的活动所开始的历史进行中得以发展。它源自国家，而不高居于其之上。国家在一个时期有可能产生民族性；但是民族性能组成一个国家是有悖于现代文明的本性的。民族的权利与权力起源于以前独立的回忆。

在这方面教会赞同政治进步的倾向，而尽可能抑制民族间的隔阂；劝他们履行彼此的责任，视征服与封爵为将野蛮与没落民族向高层次提升的自然手段。虽然它并没有把民族独立归结为一种不受封建法律、世袭权利与遗嘱安排的偶然结果，但是它受一种完善的利益共同体的精神所激发，保护民族权利反对齐

一化与集权化。因为同样的敌人威胁到两者;而勉强容忍差异的国家为了公正对待各种各样种族的特殊性,出于同样的原因必须干涉宗教的内部管理。宗教自由与波兰、爱尔兰的解放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地方原因的偶然结果;奥地利臣民统一协定的失败是那种不愿保护行省的多样性与自治、通过小恩小惠而不是增强其独立性来贿赂教会政策的自然结果。在现代史上,爱国主义的一种新的定义从宗教的影响中发展出来了。

民族性与国家的差别在爱国情感的性质中有所展示。我们与种族的联系仅仅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而我们对于政治民族的义务则是道德上的。一个是在野蛮生活中具有无比重要性且强有力的情感与本能共同体,但它更多地属于动物而非属于人类。而另一个则是权威,这个权威通过法律治理,强化责任,赋予社会自然关系一种道德的力量与特征。政治生活中爱国主义一如宗教中的信仰,它防范家庭情感和思乡情一如信仰防范狂热与迷信。它具有源自私人生活与自然的一面,因为它是一种家庭情感的延伸,正如部落是家庭的一种延伸。但是在它的真实的政治特征中,爱国主义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向可能涉及自我牺牲的道德责任的发展。自我保存既是本能又是责任,从某一个方面,是自然的和自发的,但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义务。在第一方面,它产生了家庭,在第二方面,它产生了国家。如果民族可以脱离国家而存在,仅仅服从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它将无力否定、控制或牺牲自身;它将变为一个目的,一个自己统治自己的统治者。但是在政治秩序中,道德目的将被实现,公共目标将被追求,而对于它们来说,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存必须被牺牲。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伟大标志,是自私向牺牲的发展,这乃是政治生活的产物。出自于种族的责任感无法完全与其自私的和本能的基础分离;而国家之爱正如婚姻之爱一样,同时建立在物质与道德

428

的基础之上。爱国主义者必须在他奉献的两种目标或对象中作出区分。只对祖国产生依附感就如只服从国家一样，仅仅是对强力的服从。一个将国家放在责任首位的人与其权利完全服从于国家的人再现的是同一种精神，他们全都否定权利原是高于权威的。

用伯克的话来说，还存在着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国家，以区别于地理学的、可能与道德—政治国家相冲突的国家。那些持枪反对公民大会的法国人与那些持枪反对查理一世的英国人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承认在服从在位的统治者之上还有更高的责任。“谈到法国，”伯克说，“在讨论对付它时，或者在考虑所有与之相关的计划时，我们指的不可能仅是地理学上的法国，我们所指的始终必须是道德与政治上的国家。……真理是，法国已经超出其自身——道德的法兰西已经与地理的法兰西相分离。主人已经被赶走，而强盗占据了房屋。如果我们寻找作为共同体的法国人民、寻找在公共法律的眼光与含义下的共同体（共同体，我的意思是指他们能自由地慎思与做决定，有谈判与缔约的能力），他们是佛兰德斯与德意志的法国人，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与英国的法国人那里也能发现他们。那里全都存在着世袭的君主，全都存在着国家的秩序，全都存在着王国的议会。……我敢肯定如果这些东西有一半被逐出这个国家，则很难再留下我们必须称之为英格兰人民的任何东西。”[⑤] 卢梭在我们偶然所属的国家与履行国家的政治功能的国家之间作了几乎相同的区分。在《爱弥尔》中有一句很难翻译的话表达了这种观点：“*Qui n'a pas une patrie a du moins un pas*.（没有国家的人，哪来的祖国。）”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中，他

⑤ 伯克：《盟国政策评论》，见《全集》，第5卷，第26、29、30页。

写道："如果国家对于它的人民就如对待外国人那样，仅仅赋予人民以肯定国家一切的权利，那么人民怎么可能爱他们的国家？"他接下来说，"*La patrie ne peut subsister sans la liberté*.（没有自由，何谈祖国。）"⑦

于是由国家塑成的民族性，是惟一一个我们对之负有政治责任的东西，因此，它也是惟一一个拥有政治权利的东西。瑞士人从人种学上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或德意志人；但是除了瑞士的纯粹政治的民族性以外，民族性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哪怕是微小的影响。托斯卡纳或那不勒斯国家形成一个民族，但是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公民彼此并无政治的共同体。还存在着其他的国家，它们要么没有能够将不同的种族纳入同一个政治的民族中来，要么没有能够将特殊的区域从更大的民族中分离出去。奥地利与墨西哥是第一方面的例子，帕尔马和巴登是第二方面的例子。文明的进步极少涉及国家的最后特征。为了保证其统一，它们必须通过联邦或联盟，使自己依附于更强大的国家，从而失去它们的某些独立性。它们的趋向是孤立他们，430 切断居民间的联系，使他们变得目光短浅，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他们观念的发育。在如此小的地域内，公共舆论不能保持其自由和纯洁，而来自更大的共同体的潮流席卷收缩的领土。在稀少

⑦ 《全集》，第1卷，第593、595页；第2卷，第717页，波修特在一篇论国家之爱的宏文中，并未想对这个词下一个政治上的定义："La société humaine demande qu'on aime la terre où l'on habite ensemble, on la regarde comme une mère et une nourrice commune. . . . Les hommes en effet se sentent liés par quelque chose de fort, lorsqu'ils songent, que la même terre qui les a portes et nourris étant vivants, les recevra dans son sein quand ils seront morts."（人类社会要求人们热爱人所共居的大地，或视其为母亲和共同养母。在人们想到，当他们活着的时候这块土地承载着他们养活他们，在他们死去的时候又接纳他们于自己的怀抱，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被某种强有力的东西维系着。）["Politique tirée de l'Ecriture Sainte", *Oeuvres*, x. 317.]

而同质的人口内,很难为社会的自然分工留有空间,或者很难为那些对统治者的权力形成限制的小的利益团体留下空间。政府与臣民用借来的武器相互讨伐。一方的资源与另一方的灵感均出自某些外在的根源,结果国家变成了工具,变成了它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争斗舞台。这些国家,就像中世纪的小共同体,在构成大国的一部分并能保证自治的时候,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的;但是,它们是社会进步的阻碍,而社会的进步是依赖于同一政府下的种族的共存的。

不是建立在政治传统之上,而是单纯建立在种族之上的虚荣而危险的民族权利要求,出现在墨西哥。在那里,种族因血统而分裂,没有在不同的地域内结合在一起。因而,既不可能将他们统一为一个国家,又不可能把他们转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的构成因素。他们是流动的、无形的、没有联系的,无法沉淀或形成政治制度的基础。就像他们不能为国家所用一样,他们也无法为国家所承认;他们的特殊品质、能力、激情和依附感是没有用途因而也是得不到尊敬的。他们必然被忽视,因此永远被凌辱。种族困难加上没有政治地位的政治自负,使得东部世界被遗忘在政治等级之外。哪里只存在着两个种族,奴隶制的根源就存在在哪里;但是当不同的种族居住在由若干小国组成的一个帝国的不同地区的时候,则极有可能出现那种对高度发达的自由系统之建立最有裨益的安排。在奥地利,虽然存在给问题增加难度的两个事件,但是它的重要性也增加了。不同的种族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水平,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民族,它如此占有支配地位以至于压倒或同化其他民族。这些条件是只有政府能够获得的最高程度的组织化所必需的。它们提供最大量的智力资源;提供进步的永久性动力(这种进步并不仅仅由竞争提431 供,还由更进步的人民的状况所提供);提供自治的最充分的要

素(这种要素与国家不可能按照它自己的意志统治一切密切相关);提供地方风俗与古代权利最充分的保护。在这样的国家,自由将结出其最绚丽的果实,而集权与专制将被毁灭。

因为必须承认民族权利,奥地利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比英国政府要大多了。当它视民族的统一为先决条件时,议会制是无法提供这些权利的。因此,在那些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国家中,议会制不仅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被视为自由的一种不完善的形式。所显示出来的差异总比它所能承认的更大,结果,它继续着旧的专制主义的工作,成为集权的新阶段。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帝国议会的权力就如皇帝的权力一样被嫉妒性地限制,它的许多功能必须被省议会和更下一级的地方当局所履行。

民族因素在国家内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政治能力的基础这一事实。民族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形式与活力。某些政治观念与习惯属于特殊的民族,并随民族的历史过程而发生变化。刚刚告别野蛮状态的人民,与过度奢华的文明中的人民,都没有治理自己的手段;致力于平等或绝对君主制的人民,无法产生贵族制;反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人民是缺少自由的第一因素。所有这些人民只有通过与高等种族的接触,才能变为自由共同体的有效成员。国家未来之繁荣就掌握在这些高等种族的手中。无视这些事实且不在人民的性格与资质上寻求支持的制度,不能指望他们的人民必须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只能想像他们只是简单地服从最高层的指示。因此,否定民族性意味着否定政治权利。

民族权利的最大的敌人是现代民族性理论。因为在理论上将民族与国家等量齐观,这种理论在实践上将地域内的所有其他民族置于隶属状态。它不承认这些民族与构成国家的统治民 432

族处于平等状态，因为若是那样，国家有可能不再是民族国家并有可能与它的生存原则相矛盾了。因此，在那个支持性的、主张共同体的全部权利的政治体内，根据强势民族人性化与文明化的程度，弱势的民族将灭绝，或降低为奴役状态，或被置于依附状态。

如果我们把自由权的建立视为道德责任的实现，而道德责任的实现又是市民社会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那些像英国与奥地利帝国那样包容许多相互有别的民族而又不压迫它们的国家，实质上是最完美的。那些在其内没发生种族混合的国家，实则是不完美的；而那些在其中种族混合的效果已经失去的国家则是衰落的。不能满足不同种族要求的国家处于自我谴责状态；忙于中立、同化或驱逐不同种族的国家将毁灭自己的活力；不包容不同种族的国家是在拆除自治的主要基础。因此，民族性理论，是历史的退步。它是革命的最先进的形式，必须将其力量保持到宣布这种观念的革命时代的终结。它的历史重要性有赖于两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它是个怪胎。它所谋求的解决方式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它永远不能被满足也永远不能被耗尽，而只会不停地肯定自己。它甚至阻止政府回复到激起其产生的状态。这种危险太大了，对人心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致没有任何制度能容忍这种为民族抗拒进行辩护的东西。因此，它必须能促进它在理论上谴责的东西的获得，即作为一个主权共同体之成员的不同民族的自由权。这是一个没有其他力量能完成的工作；因为它既是绝对君主制、民主制和宪政主义的矫正，也是这三者所共有的集权的矫正——无论是君主制的、革命的，还是议会制的体系，都做不到这一点；而所有在以往激起巨大热诚的观念，除了民族以外，都无力实现这个目的。

第二，民族理论标志着革命学说的结束和它的逻辑枯竭。在民族权利至上的高喊中，民主的平等制度走出了它自己的界限，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在革命的民主阶段和民族阶段，社会主义曾经卷了进来，并曾经将该学说的结论推到荒谬地步。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了。革命的后裔保存下来了，并产生了更长远的后果。民族性比社会主义更先进，因为它是一个更恣意的体系。社会主义理论试图对重压——现代社会累加于劳动者身上的可怕负担——下的个体生存提供帮助。这不仅仅指发展了一种平等的观念，更指摆脱现实的不幸与饥饿的方法。解救方案不管多么荒谬，受苦者必须从毁灭中得救，却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而且如果国家的自由必须为个人的安全作出牺牲，那么至少从理论上，更多的中间性的事物就应该存在。民族性的目标则既非自由也非繁荣，而是让二者为把民族塑造为国家的模型与尺度这种强制性的需求作出牺牲。为了让一个新的发明胜过上帝的作品与人类的利益，这个进程将标志着物质与道德的毁灭。没有一种变革原则，没有一种可以接受的政治思考的方面，比它更包罗万象、更具颠覆性或更武断。它是对民主的驳斥，因为它为大众意志的运作设下了界线，而代之以一个更高的原则。它既阻止国家的分裂又阻止国家的扩展，制止通过征服而结束战争，制止为了和平而获得安全。因此，使个体屈服于集体的意志以后，革命的制度又将集体意志服从于独立于这种意志、拒绝所有法律而仅仅受偶然性控制的条件。 433

因此，虽然民族性理论比社会主义理论更荒谬和更具犯罪性，但它在世界上有更重要的使命，并标志着作为公民自由的最凶恶敌人的两种力量——绝对君主制与革命——最后的冲突与结果。

三十一、加富尔*

加富尔是意大利最彻底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的生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观念或党派;不是因为他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的技巧。他的权力既不受公共热潮的影响,不受他所接受的意见之能量的影响,也不受追随大众之个人情感的影响。他不是思想领域的代表性的人物,不是行动领域的党派领袖,不是在鼓动术上训练有素的大众的宠儿,他也不是靠巨大成就的名声所支撑的人。但是他的确获得并保持了那些在天赋、性格或口才上比他稍胜一筹的人物——如巴尔博、吉奥贝第、阿兹格里奥——所达不到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那些被视为意大利爱国主义的主要回忆与希望的人物——曼宁、马米阿尼、法里尼·拉·法里那——都满意于做他的下属与助手;在这个地位上,他的所有的对手为了增加他的权力和声望,都牺牲或搁置他们自己的原则、敌意与志向。这个能够混合这些材料,使它们成为他的巨大的手段;能够同时顶住奥地利的敌意与法国的野心;能够既迅速抑制他所伤害与羞辱的天主教徒又迅速抑制他所谴责的共和派;能够在如此有力的敌人与如此居心不良的盟国之间站立,几乎在明乔河完成意大

* 发表于《随笔》,第5卷(1861年7月),第141—165页。重印于阿克顿:《历史论集》,第174—203页。

利的统一，使他的国王的领土增加四倍的政治家，必然会一直保持着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地位，就像他在他的国家的历史上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样。

他与萨里斯的圣弗兰西斯家族有着血统上的联系。他母亲属于日内瓦显贵家族，开始是个新教徒，而且是日内瓦的老式的政治上的加尔文教徒，这种塑造了基佐的性格的新教传统，从很早时候起就对加富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他的家族地位有关的事件激起了他对神职人员的早熟性的憎恶；虽然他的哥哥马奎斯·古斯塔夫·德·加富尔成长为宗教的一名热心的保卫者，但加米罗，虽然当局对他的怀疑部分因为他的聪明和易怒性格，却受到他父亲，一个旧学校的政治家的不友善的对待。这种情况对于有他这样性情的人是不能忍受的，他刚刚能自立的时候就带着老早就深扎于心灵中两种情绪——对天主教等级制的敌意，和对与此相关的尊重人民、仇恨自由派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离开了他的国家。时间与经验似乎对这些好恶的评价没有产生影响。他满足于自己对天主教的甚至并不需要展示抛弃信仰的复仇心理，他甚至没有接受革命的学说就开创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是在他的顶峰时期内，他承认在他的整个生涯中，他的政策的动力来自个人的动机而不是公共的原则。 435

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意见在他进入公共生活的时间内变得成熟与和谐了。他在法国与英国呆了若干年，留心实际的物质利益方面的事情，在他的世界主义的性格中加进了对两个国家的社会中的事物的温和的欣赏与同情。他于1842年返回都灵，在那里，政府的精神使他远离公共事务。他致力于通过由他帮助建立与指导的农业协会使国家得到繁荣。就像其他国家的类似的协会一样，乐于施惠的政府用它来作为打探公共舆论的代用品，而人民用秘密会社的眼光来看待它。在那里，因为没有自

由，所以每一个被承认的协会都带上政治的性质，结果农业协会从其组织时起，就成为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与手段。当意大利运动开始时，它就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以及，"伯劳菲里奥在其传记中说，"在若干次伐木的讨论中，被生吞活剥地理解的民主的酵母就开始显露自身。"

除了在协会上发表农业与经济问题的文章外，在这些年中，436 加富尔还发表了若干篇政治题材的文章，写得不是很杰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思想的把握，是他在以后生涯中指导行为的观念的生动纪录。在论共产主义理论的文章中，有一段对配第的评论与麦考莱的评论很相似，有些笔触可以运用到加富尔自己身上。"他不属于那些试图借助普遍的、博爱的理论来从根本上建构社会的人。一个冷漠的、深沉知识分子，不带偏见，只为荣誉之爱与国家之爱所鼓舞。"这篇文章结尾有一段话可以很方便地将他与现代经济学家——他们的僵硬的抽象观念很容易给共产主义一个胜机——区别开来：

> 每个人各司其职。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冷僻的研究中反驳共产主义的谬误；但是他们的劳作是无效的，除非人们实践了仁爱广施的伟大原则并按良心行事，就像科学对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慈善家和经济学家彼此谴责对方的努力中和睦相处的时候，在他们二者似乎都忘记这个事实——即讲授仁爱训令的那同一门神圣的学说，通过重新计算诸如富者的仁慈责任和贫者的勤劳自立之类，为经济学奠定基础；"因为贫穷是免不了的，"但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时候，把政治经济学既理解为伦理的科学又理解为物质的科学，的确是个不小的功绩。

在1847年，庇护九世的改革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对专制主义的反动，皮埃蒙特不久就感受到了；9月，查理·阿尔伯特开始追随教皇的足迹，在国内作出一些让步。在那年年底，加富尔与巴尔博及其他人协力，乘着出版自由之风创办了报纸《复兴运动》，他以巨大的能力指导着它。在别人要求改革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坚持宪法的人，在1848年1月他向国王发出"消除争论，把危险的非法鼓动角斗场变为合法、和平与定期讨论的论坛"的请愿。2月5日，他的朋友桑塔·罗莎在都灵市政议会提出一个相同的议案；7日，一部以法国1814年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得到国王批准。加富尔一开始并未当选；当他在议院中获得席位时，他的朋友巴尔博和邦坎佩尼当了部长，他加入了右翼。以意大利的自由为条件的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由内阁承担。法国此时是共和国，它的援助，依查理·阿尔伯特的御前顾问的理解，有可能导致米兰或其他地方的共和国取得胜利，并剥夺撒丁尼亚君主在各个地方的优势。在巴黎的大使马奎斯·布里格诺里作了后来事件使之更加显著的口头宣言： 437

> 激荡着意大利运动的、不同于以往所有运动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目标首先是成为意大利人。每个党派都相信自己被召唤去指挥这个运动，把所有分散无效的努力最后一次集中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希望由法国取代奥地利。有必要使法国清楚地了解，如果共和国的军队不是因为情势、利益与请求之需而穿过阿尔卑斯山，那么法国以及法国观念在意大利的影响将在很长时间内失去。整个北部意大利，就如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除了米兰共和国以外的所有地方，他们全将不需要法国军队的援助，除非有一天巨大的失败证明意大利的确无力独自将奥地利驱逐出阿尔卑

斯山外。

加富尔受到亲法的共和派的反对，但是他谴责 *L'Italia farà da sè* 极端政策。“共和派，”他说，“往往追求自私的政策，而从来不是文明的促进者。”他的希望是像英国那样。“我对英国抱有信心，比较信赖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诚实性格——信赖约翰·罗素勋爵和帕默斯顿勋爵。罗素勋爵，我将公开地说，冒着越来越被称作盎格鲁狂人的风险，的确是欧洲最自由主义的大臣。”随着战争的继续，民主党获得权力，加富尔在 1849 年 1 月的选举中落选。是年 12 月他重获议席。阿兹格里奥是首相，加富尔支持他，与他的老领袖巴尔博越来越疏远。这个大人物反对西卡迪提出的神职人员市民条件的法律，而加富尔在一次讲话中支持这个法律。这次讲话使他名声大振，也使其更接近于中左派拉塔齐党，而不是他的早先朋友。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走到前台。革命的时代没有为像他这样 438 的人提供机会。他太远离保守派了，以至于不能加入到他们的抗拒之中，又太远离民主派了，以至于不能加入到他们的运动之中。极端化在革命中盛行，而加富尔对这两个极端都表示厌恶。但是新的控制权为中间派开辟了新事业，当巴尔博被革命、吉奥贝第被反动扫到一旁以后，新党领袖的人选就落到阿兹格里奥和加富尔身上了。在政治和教会权利上，两人不像保守派那么小心谨慎，但却坚决反对民主与无序，他们虽然在性格上相去甚远，但是在观点上却近乎一致。精力充沛、大胆而又雄心勃勃的加富尔必然胜出他的矜持、粗心又有点懒惰的对手。1850 年 10 月他就任商业部长，1851 年 4 月任财政部长。他的第一个行政措施主要致力于财政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常常使他带有政治家的品格。“一个民族的政治新生，”他说，“离不开它的经济新

生。这两方面进步条件是相同的。"

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商业改革引起他的深厚兴趣与羡慕，他曾经写过一篇讨论这些改革可能对意大利产生何种影响的文章。他所学到的教训与皮尔的最有能力的弟子自从它们在英国实践以后所得到的是相同的——使经济学的法则服务于政策的考虑。因此，他缔结了许多商业条约，有的是出于财政的考虑，有的是出于与在其他公国的撒丁尼亚人搞好关系的目的。在某个方面，他的地位与格拉斯顿先生的地位有着引人注目的差异。他的商业改革的主要反对者是民主党。在皮埃蒙特，财政是达到民主目标的手段；在英国，财政培育了民主

因而，政府由于它的教会立法的后果，受到极左派与极右派两派的反对。阿兹格里奥依赖于中右派的支持，并通过教会事务的改革寻求与左派的和解。拉塔齐领导的中左派对内部改革的兴趣没有对对外扩张的兴趣大；他们是议会中的挑衅性的党派。1848 年战争时拉塔齐在位，他要求中止对自由的所有保障措施，说没有这些法律比有这些法律反而更不会有滥用权力的 439 的危险。在那时，加富尔曾断言左派想像尼古拉统治彼得堡那样统治皮埃蒙特。但当他获得领袖地位时，左派的这些人的原则刚好适合他的大胆和主动的思想。一个渴望权力正准备牺牲自由的政党，正好是那个怀有用冒险手段获取权力野心的政治家的天然盟友。阿兹格里奥只有用教会法来牺牲它们；加富尔用无视国际法来对其作出牺牲，他们得到了更大的回报。因此，在阿兹格里奥任期内，宗教改革是今天的问题；在加富尔的任期内，宗教改革就成了第二位的，而且成了民族扩张的辅助手段。联盟在 *coup d'état*（政变）中结束。新的专制主义似乎吓倒了它的软弱的邻居，一项出版特许的法律被都灵政府提出。

"撒丁尼亚,"首相说,"已经获得很大的声望;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使它不要太张扬。……我们从睡狮身旁经过,必须小心谨慎。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拒不采取谨慎态度,我们必须使他沉默;如果狮子攻击我们,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右派想比大臣们走得更远——想于12月2日在皮埃蒙特引入一种剥夺自由、改变选举法、取消国民卫队的制度。这些事件使加富尔下决心与反动派决裂并与拉塔齐结盟——这种结盟与英国的辉格党从改革法案以后为获得多数而进行的结盟很相似。2月5日,没有与他的同事商量,加富尔在一个讲话中为他们的主张辩护,公开邀请拉塔齐加入,以一项民族政策的许诺作为回报。兴奋是异常的。而且直到5月11日加富尔提议并支持拉塔齐作为内阁主席的选举之前,决裂也没有发生。

他因为这个策略而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党派的领袖,但是他失去了在政府中的位置。阿兹格里奥撇开他另组了新政府。他后来说,他的公共生涯中没有比这件事更使他感到自豪。

只要法国仍然是个共和国,只要那个民族的命运似乎还不确定,革命的幽灵还没被扑灭,我就可以肯定内部的反动力量根本无法毁灭我们的宪法自由。但是当12月2日法国消除了动乱的危险,红色幽灵消失以后,我考虑到从今以后那个党派(右派)对宪法的威胁要比以前革命派对它的威胁更为严重。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组成更大的自由党不仅是正确的,更是必要的和根本的;为了这个目的我请求所有认同伟大的进步与自由原则而仅仅在支节问题上互有分歧的爱国主义者的支持。

440

他以前因为在出版自由讨论中的行为，也曾经得到过拿破仑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好感。在他退出内阁的时候，他访问了巴黎，与拉塔齐一起出现在杜伊勒里宫。这是设计民族政策的两个朋友间的联盟的开始，也是他将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得益的联合的开始。加富尔对与法兰西共和国结盟的恐惧不适用于与法兰西帝国间的结盟。原则的差异消失了。与此同时阿兹格里奥试图通过新的教会改革、通过引进新的婚姻法来延长他的任期；但是将加富尔免职使他失去了激进派的强有力的支持，也使他无法在反对教皇与天主教党的反抗中获胜。甚至当撒丁尼亚在罗马使节来到都灵还没离开时，他就固执地向内阁施压，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政策。最后，在10月26日，他辞职了。新内阁即位条件是改变对罗马的态度。热那亚红衣主教彭瓦茨得到教皇的全面授意，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是国王的主要顾问。他希望巴尔博继阿兹格里奥的位，而当这种希望落空时，阿佛雷里·迪·索斯特根努又作了一次毫无结果的努力。于是加富尔的机会来了。他做的第一个努力就是促成他与主教的相互理解。这个努力失败了，危机的难关似乎无法克服。但是加富尔是能驾驭局势的，在11月4日，他成立了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行政机关，12个月以后，拉塔齐也加入进来了。这个著名内阁计划利用意大利复兴运动与拿破仑三世的友善为撒丁尼亚谋利。根据在实施这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出现的紧急情况，阿兹格里奥与西卡迪的教会政策既可能被继续，也可能被搁置。实际上，在向外扩张与压制教会之间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而在加富尔 441 的心目中，就如在许多意大利人的心目中一样，罗马教皇辖地与奥地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盟。从内阁成员的讲话与文章中，我们可以领会在他的政策中这二者是如何联系的。

他的一个传记作者和仰慕者证实加富尔的政府与自由观念

是英国式的而不是法国式的；但是他补充说他从来没有在其政策中展示这些观念，因为环境不允许他把这些政策推进到财政问题之外——*quantunque le quistioni ora di finanze, ora di politica gli abbiano preoccupato l'animo, ed impedito di attuario in altro che nelle sue consequenze economiche*. 说实在的，他的政策目标是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的自由；他寻求的是与君主立宪制的维持相一致的权力的最大化，而不是与民族独立相适应的自由的最大化。对于国家问题，这个 *ragion di stato*（国家利益），除了国家形式以外，什么都可以牺牲。

托克维尔已经表明，法国革命并非与古老国家的政治精神相对立，而是用一种更加猛烈的力量贯彻同样的原则。国家在以往是绝对的，现在仍然是绝对的，对于独裁权力的行使，大众意志的机关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动力。这不是恐怖统治（1791—1793 年雅客宾派专制）和动乱时期的成果，而是 1789 年观念——这些观念被吸收进 1791 年宪法中，这部宪法直到奥地利回到由英国独自保存的中古的原本为止，成为其后 70 年间所有外国宪法的蓝本。受那种模式的框定，大陆所有政府的目标不是人民必须安全地获得自由权，而是参与权力。分享权威的人数的增长助长了这种权威，使之变得无法抗拒；正因权力与财富是相关的，那些对增加权力感兴趣的人便不可能对减少支出感兴趣：因此议会制政府导致一种改革了的行政与增加了的资源，但是也增加了国家的压力与支出。所有这些在加富尔的皮埃蒙特的政府中得到异常的验证。

与绝大多数大陆自由派一样，也与绝大多数非宗教的人士一样，他所考虑的国家是被赋予无限制的权力的，而个人权利是附属于国家的最高权威的；虽然他像法国革命者一样接受旧制度留下来的专制主义的遗产，并试图在相反的形式中保持它的

442

力量。[政治]社会实际上不是被分成君主制与共和制,而是被分成民主制与贵族制;不管政府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只存在两种社会类型,有机型与原子型,这两种形式的最通常与可见的标志是平等或不平等。不平等的真正基础是与整体的权利相对立的部分的特权,而它的最简单的原初形式,不是阶级的特权,而是年龄的特权,也就是长子继承权。没有什么东西是贵族制必需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造就贵族制。加富尔虽然是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敌人,却是民主的根本原则的一个关键的维护者。他在 *Il Risorgimento*(《复兴运动》)中写道:"市民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伟大原则。"成文法赋予国王参议员的提名权;他却希望他们是选举产生的。"经常被指责为盲目模仿英格兰和在我们当中秘密抱有引入他们制度中的贵族比例的罪恶设计,"他大声地宣称:

> 在这种情况下模仿大不列颠将是个致命的错误,将在宪法中为未来的革命埋下确定无疑的种子。试图建立类似于英国的贵族制是愚蠢至极的。

另一方面,他反对扣押教会财产;因为他从拉蒙纳尔的理论,或从他研究过的国家的经验中得知,依靠百姓支持的牧师是不受国家影响,直接服从于教皇权威的。他要求宗教自由必须是宪法的一个基础;在这方面,他接近于法国的而不是英国的模式,因为他所理解的宗教权利并不是说一种宗教必须被偏信而其他宗教必须被宽容,而是说国家对宗教争端必须保持中立。

通过改变权威的地位与分配,宪法反映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必须经受修正,必须有本民族的共识来保障。专制主义国家向宪政主义国家的通道包含着国家对教会态度的

一个重大改变，宗教权利之被尊重的方式是我们确定这种宪法迈向自由的步骤，还是专制主义的新的和大众形式的试金石。因为宗教不受政府形式的影响，但受政府原则的影响。它对君443 主制还是共和制不感兴趣，但对反抗专制主义的自由与安全感兴趣 它所坚持的权利与义务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既不能屈服于多数派的表决，也不能屈服于暴君的法令。在许多场合，宪法是宗教反抗暴政的卫士，在许多场合，宪法强加了一个新的暴政。紧接着1848年革命的时代充满着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因为对革命所寻求的自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天主教徒从中看到宗教自由的胜利和教会的独立，而自由派在绝大多数场合，把它视为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的工具。对这次运动及其制度的这些相反的解释之间，贯常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奥地利、荷兰和符滕堡，天主教的观念占了上风。在巴登和皮埃蒙特，革命只加强了国家的权力。自由的理论坚持教会的独立；自由主义的理论则坚持作为大众意志机器的全能国家。因此，阿兹格里奥不久就断言：没有必要考虑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在整个市民改革中变得越来越必需的教会改革，排他性地属于市民权力中的司法领域。他把古代只有教会才有权力决定所有接近良心与宗教生活的事务的理论整个颠倒过来了，声称只有国家才能确定影响市民社会的所有问题。继起的争吵在改革的解释方面没有在改革所由指导的原则方面那么厉害。教会也没有像抵制武断的权威原则那样抵制所发生变化。但是在阿兹格里奥内阁所提出的法律中，有一项是引入市民婚姻(introducing civil marriage)的，当政府易人的时候受到了讨论。加富尔一直就不坚持这条措施，所以当参议院表决要修改这条法案时，他就同意将其撤回。关于教会的立法精神在都灵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教会改革也不再是新内阁首当其冲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对于自由党，

他们已经有更诱人的饵了。

对于1848年的保守的爱国主义者来说，与奥地利的战争是解放之战，而不是原则之战。巴尔博希望将奥地利人逐出，不是因为恨他们，而是因为意大利本身的缘故；他希望奥地利必须获 444 得下多瑙河与在土耳其的领土以作为失去意大利行省的补偿。对于加富尔来说，爱国的目标成了政治原则的敌人。奥地利的制度与他的观念格格不入，不仅因为在梅特涅统治下它是高压性的，而是因为由孔科达特开始，美化由莎美林在《帝国宪法》中得以实现的那些剧烈的内部变化。奥地利方式的对自由的理解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一样使他充满仇恨；而当皇帝推进他的改革时，他的仇恨变得强烈了。1856年5月6日他在议会中说道："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维克多·伊曼努尔大王引入与坚持的，也是你们支持的，因为这个制度，我们与奥地利越来越远。"与巴尔博政策相对立，他倾向于多瑙河行省的联盟，他写道：

> 奥地利的眼睛老早就盯着多瑙河两岸了。……人们能相信两个因分裂而虚弱的小国能够抵抗它的野心勃勃而又侵略性的政策吗？维也纳的内阁将在行省，特别是在布加勒斯特产生类似于在意大利的二等公国所展示的同样的影响。

奥地利与皮埃蒙特的关系越来越不友好，双方越来越怀有仇恨，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西方大国对于奥地利军队的支持已经变得极端忧虑。在谈判过程中，奥地利的盟国定下的条件是，虽然奥地利的军队参加了反对俄国的战斗，但是它在意大利领土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撒丁尼亚必须因此蒙受损失；克拉伦登勋爵的撒丁尼亚必须加入西方大国的建议，受到热烈欢迎。

对奥地利的安排在1854年12月22日结束；对撒丁尼亚的安排于1855年1月26日结束。帕默斯顿说，西方盟国因而形成了反对暴政的一个联盟。第一项建议出自大国，皮埃蒙特虽然没有指望直接获利，但可以为了以后的报酬制定策略性的条约。赋予奥地利的同样的条件也赋予撒丁尼亚，因此，一个防御性的联盟形成了。

这项野心勃勃的政策加大了财政的紧张，与这种紧张直接相关的，是教阶制(religous Orders)的世俗化。争论开始于1855年1月9日，与西方大国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财政预算，"加富尔说，"不能再向宗教提供支持了。"财政原因使得一项极端措施势在必行，为了使国家的支出减少而使其财源增加，虽然大批贫穷而有活力的神职人员如果没有无用的教阶制财产，没有富裕牧师的超流动性可能会更加富裕。这也是个危险的时刻，因为民主派与保守派联合起来反对克里米亚战争。伯劳菲里奥声称他们自己情愿与俄国结盟，因为它是惟一一个代表民族独立的欧洲大国。掠夺行为是反对这个联盟的手段。

445

> "如果我们提不出一个为大多数公共舆论所要求的措施，"这位部长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将既失去自由派的支持又失去反动派的支持。推迟这项措施使我们与自由派疏远而又不能与反动派和解。提出这项法律，我们就能保证得到自由派的支持，而这个国家就会统一并有能力经受每一种考验。"

很明显，不管相同的事态会不会一再发生，但是反对教会财产的政策将会被继续。1855年5月25日，该项法案变为法律；6月26日，教皇宣布所有提出、赞同与批准它的人都将被开除

教籍。加富尔的理想是法国式的，教会体系依赖于国家作为它的发薪者。他与国王一起在萨伏依旅行，当时查布里主教在一次讲话中以这些字句结束：

> 陛下在法国目睹了当局与教会间紧密一致的高贵范例，我们相信你的国家将因为结束了政府对教会的迫害而获益无穷。

维克多·伊曼努尔利用了这个轻率的讲话之机：

> 在援引法国作为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范例方面，你是对的。我对它是如此信服，以至于我决心使我的王国的神职人员们得到与法国的神职人员同样的支持。

教会问题与奥地利问题的结合在《奥地利协定》的结语部分更加接近。皮埃蒙特受压迫的神职人员视奥地利为教会的同盟，因而视之为皮埃蒙特的双倍的敌人。另一方面，政府相信因其最近的胜利而得到增强的教皇，不会表示出一点向皮埃蒙特让步的迹象，而只会比以往更加缺少妥协。因此，虽然维也纳放弃了约瑟芬体系，加深了与步约瑟夫二世后尘的政府的裂痕，但同时也加重了都灵与罗马之间的敌意。邦坎佩尼带着阻止缔结《托斯坎协定》的使命出使佛罗伦萨，支持恢复利奥波德法律。加富尔说： 446

> 我们必须等待罗马政府的一种改善来使民心与他们的国家主权相一致，国家主权是以教会作为喉舌的大众舆论所讨厌的。这些舆论也是法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些杰出人物

所共有的，他们以往谴责，现在则赞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有这种结果我们得感谢《奥地利协定》，也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举动。

罗马那人的不满转移了与罗马的竞争。这种不满在巴黎议会(the Congress of Paris)被聪明地利用。撒丁尼亚的全权代表没有参加和平谈判；他等待机会获得他因参加战争而获得的报酬。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只与罗马那公国讨论。那是教皇与奥地利双方利益联合之所在，也是他可以对他的敌人一箭双雕的地方。明格第从波洛尼亚送给他有关他的备忘录的材料，在其中，他所建议的事情都是法国的耳朵最爱听的：世俗的政府、征兵制和《拿破仑法典》。在当时必须记住的是，这是一个在罗马那人中已经深入人心、为加富尔的知情者所分享的信念，而且它不久就有可能并入奥地利领地。在他回都灵的途中，他说到自己的巴黎之行：

> 我们应该为这个结果而高兴。意大利问题在将来将变成一个欧洲问题。意大利的目标不是防范煽动者、革命者和帮派，而是在和会中被大国的全权代表所讨论。

马米亚尼宣布神圣同盟终结，意大利民族得到了承认，作为意大利国家的部长，为意大利呼吁的声音在和会中响起。

虽然奥地利的改革增加了皮埃蒙特的自由派部长们的怨恨，但是他们与俄国的态度变得极端友善。那时候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任何不和谐的政治观念。高尔察柯夫亲王对奥地利的强烈仇恨使得他被都灵内阁视为盟友；和约以后，莫斯科对撒丁尼亚人的考虑与他们以往的地位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

447

与他们的英国和法国的同事相比也是明显的。当然，在莫斯科眼中，对奥地利的忿恨并不是皮埃蒙特的惟一可取之处。

巴黎和会以后时期的重要标志是都灵天主教党力量的增强。他们在1856年5月抛出一项议案，把所有的教育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且，为了削弱他们的反对力量，拉塔齐从其职位上退下。1858年奥尔西尼案件使得加富尔出台一项"阴谋议案"，就像我们自己的这方面的法案一样，它虽然遇到了左派的抵制，但加强了与拿破仑的亲密关系。

这项措施引起了马志尼的反应，他于1858年6月致信加富尔。在这封信中，他展示了他自己的性格和体系，其真实性一如他对他的对手的性格与体系的描述。这是意大利运动的最具表现力的文献之一。

> "我很早就知道，"他这样开头，"你对皮埃蒙特君主制的渴望甚于对我们共同国家的渴望，一个视事情的结果高于任何一种神圣而永恒原则的唯物主义崇拜者，一个聪明而不是精神强大的人。……对于那个其无比的活力现在甚至你自己也承认的党，不顾你的那些每时每刻冒死肯定原则的朋友的反对，皮埃蒙特拥有它正在享受的自由，而你拥有把自己塑造成无厌而自欺欺人的意大利保护者的机会。"

迄今为止，统一意大利的观念在起源上属于马志尼，而不属于意大利自由派，这是对的；同样，自由派先支持后叛离的罗马运动的成功，给了查理·阿尔伯特改革以动力，这也是对的。加富尔在谈到罗马运动的血腥实践时的措辞，激起了他们对于其理论的一个激烈的、但却是严密的辩护：

我以前敬重你，但是现在我蔑视你。从今以后你仅仅是个敌人；现在你是我的无耻的、不要脸的敌人。……我相信从原则上说，死刑——不管被个人还是被国家运用——都是一种犯罪，如果我当政我一定会取消它。……废除极刑在自由社会里绝对是一个责任。……当然，就一个国家的自决必须是一桩神圣的事业，或者就弱者武装起来反对践踏自己的强者的暴力而言，或者就谋杀者的屠刀高举兄弟可以采取一切自卫手段而言，生命权的绝对不可侵犯是个谎言。……在你的支持者中，在那些大声呼喊反对新发明的匕首理论[即暗杀理论]的人中，我看到一些在1848年以前烧炭党的活跃的领袖。但是青年意大利反对匕首理论，甚至谴责因恐惧而为兄弟作伪证。……这里必须有法律或战争，让那些能够成为征服者的人成为征服者。在国家的、法律与人民之间的所有密切关系都断裂的地方，为了重建这种关系，不管在何处实施，也不管将采取何种手段，强制是神圣的。在个人的权力与所有人的权力失去平衡的地方，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也有使命——如果他有能力——去废除这种致命的缺陷，恢复这种平衡。在集体性的统治权面前，每一个公民虔敬地为他自己的目的辩护；在暴君面前产生弑暴君者——*divanti al tiranno sorge il tirannicida*。……在暴君和他的牺牲者之间，难道不存在着一个自然而持续的战争吗？如果人民的解放、千百万人的福祉依赖暴君之死，那么处死他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如果杀人者不抱其他任何想法而以己一命换暴君一命，那么这就是德性之举。……如果被压迫者的诅咒奇迹般地凝聚成毒药、突然地且毫无招架之机地摧毁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暴行、用母亲的泪水、用无辜者的鲜血玷污上帝给予我们的沃

448

土,那么这种诅咒是人神共准的。

暴君失去法律保护,这种理论是古老的弑君学说的一种巧妙的改编 老的弑君理论借自异教徒和古代犹太人,并在沙利兹伯里的约翰到玛丽安娜的学派中得到保存。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虽然神学家支持暴君受现存法律谴责,因而被实际的法庭审判的理论,然而根据马志尼的大众主权理论,除了个体的主观意志以外,不得诉诸任何更高一级的决定。不幸的是,犯罪行为很容易为一种晦涩的理论所辩护;克莱蒙、拉瓦拉克、盖伊·福克斯的罪行与米兰诺、皮亚诺里、奥尔西尼这些人的罪行一样可怕,而且粗俗的心灵是难以分清杀戮与谋杀,难以分清对无言者威廉或沃伦斯坦的暗杀与对亨利四世或罗西的暗杀的。这种理论至多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像马志尼所定义的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的。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可能被斩首;也可以说将篡位与暴政的罪行集于一身的统治者在与社会战争时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他必须受到公法的审判,而不是受到私人判断的审判,而审判的行为必须服从社会所由约束的法律,而不是一项武断的法令。私人 449 性的报复在未开化的共同体中是市民法律的开始;而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它却是野蛮的开始。马志尼的罪行与其说在于匕首理论,不如说在于这个理论所应用的原则。和罗伯斯庇尔一样,他因为否定对生与死拥有任何裁判权,甚至否定了他的理论的推理基础。

"维克多·伊曼努尔,"他声称,"首先受其地位保护,其次受其低微保护——*prima dallo statuto poi dalla nessuna importanza*. 纵然被你蒙骗和出卖,皮埃蒙特的自由在国

王的日子里也受到足够的保护。在真理可以在语言中自行表露，在人的责任哪怕可以通过牺牲得以实现的地方，弑君乃是罪行和蠢行。”

他以一种极端耐人寻味的方式，明确了他自己与加富尔的君主革命党之间的区别：

如果生命是神圣的，那么为什么要有战争？……难道你没有送我们2000士兵到克里米亚战场中并不属于你自己的战役中当炮灰，而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你在这种牺牲中发现了撒丁尼亚王冠在欧洲增加亮光的可能性？……只要我注视你的那些建构出来保护为了他的国家与欧洲的自由而战的人的生命的法律，保护那些将王位伸展到成千死者之上，无视被杀戮的人民的幸福与生命的法律——只要看到你在每一个其王冠是通过征服获得的罪犯面前沉默而呆滞，虽9年而未敢向罗马的入侵者进此一言：“以意大利的权利的名义，请放弃这片不属于你的土地”——我就觉得你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在10年前难道你没有以重建之名与我密谋——难道你的内阁中不是有人援引马基雅维里的话来证明政治没有原则，只有风险与机会的计算？你的党派的记者不是在背诵对暴君波拿巴的每日祝词？而在他仅仅是个王位觊觎者时他们对他尽谴责之能事？难道你不是已经准备好背叛你的国家，以南意大利向穆拉特让步，以换取皇帝保证用不属于你的土地进行补偿？机会主义的信徒，你不配谈原则，*partito d'opportunisti, voi non avete diritto d'invocare principii*，作为 *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的崇拜者，你可能不想披上道德教士的外衣。你的科学存

在于表像的世界，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你没有理想 *La vestra scienza vive sul fenomeno, sull'incidente dell'oggi; non avete ideale*（你的科学是利用今日的不幸；你没有理想）。你的盟友不是自由者，而是强者；支撑他们的不是对错的观念，而是直接的物质上的相互利用。你是个唯物主义者，上帝挂在你的嘴上，却是你心中的敌人，你假装崇拜教皇，带着增长的欲望试图打破你所依赖的 1815 年的那些协议，以此剥夺人民反抗的权利——在你我之间除了这点以外没有差异：我说，所有抗击外敌的战争是神圣的，我崇拜尝试的人，纵然他屈服了；你说，所有获胜的战争都是神圣的，你侮辱失败者。2 月 6 日你对米兰勇敢的人民充满着无礼；但是如果他们获胜了你会对他们三呼万岁 你肯定不认为屈服于外国势力的人民没有能力自我救助，而之所以不能自我救助，乃因他们手中的武器不够长。……如果意大利人民挥舞他们的刀高喊"*Viva il rè Sardo*（撒丁国王万岁）！"并且得胜，你就会像拥抱你的兄弟那样拥抱他们。纵然他们没有呼喊那个口号却得胜了，第二天你也会去拥抱他们，以窃取他们的胜利果实。

450

于是，用他那种惯常表现出来却很少如此成功地装腔作势的预言口吻，他说：

皮埃蒙特不是一个确定的、有限的、有着它自己独自的生命力的国家，它有着意大利的根源，是意大利的生命，一度集中于阿尔卑斯山脚下。……不管发生什么，意大利不会变成皮埃蒙特。民族的有机体的中枢不会陷入绝境。意大利的心脏在罗马，不在都灵。皮埃蒙特的暴君永远不可

能征服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将会把自己献给这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一个省献给意大利另外一个省的王子。君主制的原则摧毁不了教皇，也并吞不了教皇国自己的领土。

这个雄辩的演说词中甚至没有一点点真理。要说明马志尼从前提所推导出的结论错在哪里是很难的，这个前提是他与加富尔共享的。在法国革命所造成的不幸与旧的君主专制主义者造成的不幸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革命者所犯的罪恶中与正统派所犯的罪恶之间，在特征上却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性。在政治伦理上，古代君主并不比共和派站得更高，而且只有从一个服从于君主制的社会习俗与共感中，我们才能比评价复仇时期的恐怖更仁慈地评价对波兰的瓜分、耶稣会士的高压、告密信以及皇家警察——它们就像童话里的主人一样强化着法国无助阶级女儿的无穷无尽的进贡。为了让君主制代替民主制，合法的首相犯下共和派所犯的同样错误并不令人欣喜。君主制并不必然与秩序相联，正如民主制并不必然与混乱相联、宪政主义并不必然与自由相联一样。因为被我们所迷信的信念蒙骗了，我们忘记了这些事情全是一个合法的首相所为：破坏对协定的信念、消灭国家间的界限、败坏并压迫教会、兴起非正义之师、掠夺外国的领土、剥夺外国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比共和政府的建立所犯下的更大的罪恶与更大的灾难。而马志尼却看到，他要实现的目标的绝大部分，已经被那些将其诋毁为罪犯与幻想家的人实现了，而留给他自己的，除了共和理想以外，已经没有任何鼓动的手段。加富尔只要通过使其成为多余就剥夺了他的权力，用他自己的方式做成马志尼的事情而使其无事可做。在他有生之年他获胜了，因为政府就像煽动者一样腐败，因为革命是他的手段而不是他的敌人。但是他从共和制的邪恶中拯救了

451

意大利，而人们能够给他的最高的称赞就是，他与米拉波一样，与只有他才能保存的君主制共存亡。他摧毁了比君主制更宝贵的东西，他践踏了远比国王的王冠更神圣的权利。

奥尔西尼的罪恶反过来被意大利的流亡者更有技巧地解释着，这些人包围了皇帝。当他从剧院回家时，他看到了警察局长皮特里，这个人从此以后便非常有力地推进着他的意大利导师的设计。皮特里受到了极其猛烈的训斥；皇帝在危险时刻所展示的平静（当时他还在公众之中）让位于因恐怖而产生的狂怒。老阴谋家皮特里在这个不寻常的情绪中看到了他与路易·拿破仑王子以前密谋的计划得以实现的机会，这也是个使奥尔西尼引起公愤的计划。他说，除非他在意大利得到些什么，皇帝不会有安全。于是自保的本能与野心与加富尔的计划结合起来，拿破仑最后答应提供被如此长久和热切期望的援助。这位皮埃蒙特首相成功地使其国家加入拓宽其疆界的战争，也明智地使他的朋友相信法国军队开进意大利的危险可能由于英国和其他大国的牵制而得到平衡。7月份，他接受从皇帝到帕龙比雷斯的邀请，回来时，他向其国人发出行动的信号。然后在意大利中部就开始了民族统一党的巨大的密谋，通过它，大众的反抗将随战争的开始而自动组织起来，通过它，法国计划的一部分将被有效地阻止。35岁以下男子义务征入民族卫队，而且一套严格的纪律体系被引入。借克洛蒂尔达公主结婚的机会，西尼奥议员做了一个出自他的领袖人物的政治原则的声明： 452

> 在接受这个联盟的时候，古老的萨伏依王朝对于在1789年的法国被神圣化的原则抱以新的忠诚，这些原则现在构成那个民族的公共法律的基础。……让我们定查理·阿尔伯特用之统一其王朝的神圣而不可更改的协定，并用

自由与民族独立的目标来更新它。

马米亚尼说得更有暗示性：

> 如果存在挑衅，那么它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它不可能只表现在事实方面，也会表现在道德秩序方面。提西尼奥在这方面是自由；在此以外，就是奴役。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障我们国家的尊严；在那里，则是为了压迫它。那才是无法防御的真正的挑衅。

为了使自己完全把握事件进程，加富尔大权独揽；在敌意产生的时候，他是国务委员会的主席、内务部长、外交事务部部长和战争部部长。《维拉佛兰卡和平条约》以后，他辞职了，这极大地增加了他的受拥护程度，随后他重返政坛拥有双倍的权力，但是却是在困难更大的时刻。现在是完成法国未完成的事情的时候了；无视他的盟国单独完成拿破仑所允诺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他要既结束革命而又不能让在索尔佛里诺行情看好的革命党获胜；要准备注定要取代维也纳条约的苏黎世条约。

一份没有署名的文件在大国中流传，以激起它们对意大利从法国控制下独立的兴趣，为公爵的领地进行辩护。这是拯救萨伏依与尼斯的最后努力，通过大众投票决定合并的原则与民族统一的原则，作为向意大利革命要求的补偿、作为一项合理的报复，在这项作出牺牲的谈判中，内阁的行为是可耻而不诚实的，一如他们通过此种办法获得他们在意大利的野心。环境使他们的地位无望；而他们自己又使之声名狼藉。在1860年1月10日，萨伏依的新统治者得到张贝里市，并保证说"在都灵绝不可能存在萨伏依向法国投降的问题。"18日，合并主义者的机关

453

报 *Avenir de Nice*(《尼斯未来》)声明：

> 我们仍然抱有更大的信心重复：尼斯并给法国是确定的，其实现时间指日可待。

其主编被要求离境，不久便被宽恕。29 日，萨伏依的统治者说：

> 政府的政策是既定的：它从未怀有交出萨伏依的计划。至于那些提出分离问题的党派，回答他们也没有用。

2 月 3 日，詹姆斯·赫德森爵士写道：他遇见过加富尔公爵，他表示他对有关吞并萨伏依的报告非常吃惊，他说他不知道这种报告是怎么出现的。他说他奇怪萨伏依好多人的意见的变化，他们在战前希望加入法国，而现在却反对它。他坚信撒丁尼亚从未有过一点点割让、出让或交换萨伏依的意图。24 日，法国政府致信都灵，说如果撒丁尼亚合并到它在中部意大利的领土中，拥有萨伏依就成为保护法国疆界的地理上的必需。撒丁尼亚不失时机地回答说：

> 3 月 2 日：我们深切地感觉到意大利欠皇帝的是什么，不需要最真诚地考虑这样一种要求，这种要求是建立在对人民意愿的尊重这条原则之上的。在我们大声呼吁中部意大利人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的权利的时候，我们无法拒绝皇帝的阿尔卑斯山以外的臣民之自由表达其权利的意志，我们无法拒不承认他们请求的重要性，这种请求是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与议会的方向是一致的。

最后一句话被省掉了，因为法国不愿意将事情交给内阁，而加富尔视内阁为防止损失或共担谴责的最后办法。

当要求补偿的可能性向南意大利显露的时候，问题变得更加难办了。本年早些时候，马志尼向维克多·伊曼努尔建议在受到间接支援的条件下于那不勒斯领地发动起义。都灵政府没有作好招惹新战争的准备；需要时间来巩固国家和重组军队。但454是它适合于法国的政策：南部的交付不能是撒丁尼亚的事情，撒丁尼亚不得享受交付的果实（撒丁尼亚不交付）。加富尔无法抵抗受到法国纵容支持的各共和国的压力，于是他决定借助自己的优势来做这件事。他完成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无所顾忌的政治家的胜利。加里波迪继续充当一个要求意大利共和国的政党的工具，一个要求意大利联邦的权力的工具，他做了君主与统一所做的事情。当帕尔马陷落的时候，皮埃蒙特党坚持要并吞。加里波迪拒不放弃专权，因为他想完成对全意大利的征服。"加里波迪，"拉·法里那说，"希望领地在包括罗马与威尼斯在内的全意大利收复以后再交付。"他认为大权独揽可以最终强迫都灵政府跟随他反对教皇和北部四边地（Quadrilateral）；他的马志尼派同盟支持他，以保证只能用革命的方法促成交付，从此革命者就能左右意大利。拉·法里那，加里波迪那里的加富尔的代表，也是曼宁组织的、以通过非民主的方法获得统一为目标的民族党的领袖，被迫辞职。

> 我坦率地也平静地告诉将军我不满的理由。他一开始对我还好；但是他因我与加富尔的友谊、我批准中止协议、我反对他的中部意大利的构想而责备我。

加里波迪把他送到热那亚，并宣布在他的事情做完之前，如果把西西里归并给撒丁尼亚他还不如退休。"我为了意大利的目标而不是西西里的目标而战斗。"如果吞并西西里获得成功，加富尔就有可能推迟对那不勒斯的攻击，也就能推迟与罗马教皇的潜在的争吵。在那不勒斯，加里波迪完全受共和派控制，对都灵政府怀有敌意，他宣布他决意去罗马，且不顾他们的反对交付意大利——*piaccia ó non piacca ai potenti della terra*.

因为马志尼派借助他们对加里波迪的影响而控制局势，因为预见到与法国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极端的对罗马的攻击中——它不可能与天主教保和平——和极端的民主运动以及无限制的战争中，加富尔采取一种不顾一切的措施。这个措施仅次于将法国军队引入意大利，是他一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出于对所有大国的愤怒抗议以及战时状态国际法的传统与形式的无视，他命令征服罗马和那不勒斯属地。 455

> "如果我们不能先于加里波迪占领拉·卡托里卡"，他在9月11日写道，"我们就失败了；革命将蔓延整个意大利。我们被迫采取行动。"

同一天齐亚迪尼开进Marches，加富尔发现他成了意大利的最后主人，收获马志尼和拿破仑播下的种子。当加里波迪将他的相反的力量带进内阁时，这个工作就完成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对加富尔的生平作一个传记上的叙述，而是指出言词与行动是最能显示性格的。他以其完美的技巧指导着意大利革命，总的说来，他的手段比他的目的更好。对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反驳在于，他是意大利战争的始作俑者；他试图把意大利从外国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意大利的大部分统治不

良，而之所以统治不良在于奥地利人的存在。巨大的压力使得宗教与文学变得无足轻重；社会充满腐败；自治几乎不被知晓。直到1848年，这些恶果都归咎于奥地利人。他们的政策既解释意大利衰落，也解释教会受到的危险。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意大利的状况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就这点而言意大利也应该负责，因为他们拒不前进，直到奥地利让步，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848年战争没有1859年战争的道德理由。对旧制度的反叛并不能为反叛新制度提供辩解。在晚近的战争中，奥地利之所以受到攻击，不是因为统治失误，而是因为民族敌意。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者猛烈拒绝第一种托词，他们代之以绝对的革命与犯罪。当奥地利的至上性被废除，其他的王冠接二连三地落地；反对教皇政府与那不勒斯王国政府的理由，不管用得对不对，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不过把托斯坎纳和伦巴第从奥地利手中夺过来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对奥地利的真实责难在于它阻止它所影响的国家的改革；它之所以受到驱逐的主要原因是对这些国家治理不当。只有奥地利被驱逐而其他宗主国仍然存在，这件事无论对于观念的秩序还是对于事件的秩序，都是令人讨厌的。最近两年所发生的事情与意大利战争相比是次要的，既没有原则上的同等重要性，也没有使这件事在现代世界史上具有如此恶名昭著的同等的罪过。

456

但是加富尔的政策在国内外都是革命性的；正是他的政府的观念以及国家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他的雄心勃勃的政策，使他与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他并不想成为宗教迫害者，也无意成为宗教的敌人。终其一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表明他对他的基督教真诚信仰的怀疑，也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想像他在信仰上作了任何退步。吉奥贝第的著作已经显示，在天主教国家，对神职人员的极端仇恨是可以与真诚的信仰共存的。这些情绪在宗教

改革以前的岁月里，也是那些对路德的异端深怀恐惧者共有的。这个雄心勃勃、目光敏锐、仅受自己时代的观念与知识激发的政治家，感受着时代的渴望与情感；他发现在他知道他理解的所有世俗大问题上，他受到几乎所有神职人员的反对，而得到教会之外最有力者的支持；从其年轻时他便习惯于将教职与激发其公正诚实的努力的政府体系相关联——如果他不能在党派与目的之间作出区分，不能发现使好人误入歧途的大问题的真实答案，也不能说他就是个不信者。他错误地认为他能够调和宗教与现代社会而不伤害任何一个；但是他的错误远没有抛弃他的那些人的错误更严重与致命。他对宗教的无知是个很大的不幸，但是他对自由的真实本性之无知更加不幸。政治的恐怖比宗教仇恨更使教会感到害怕。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反对宗教的情感是无力的，而在没有自由的国家，宗教的危险几乎既来自其敌人又来自其朋友。对于宗教而言，如果撒丁尼亚的政治体系是合理的，整个意大利合并于撒丁尼亚的王冠之下，与其说是罪过，不如说是祝福。皮埃蒙特法律、政府与宗教自由不相容，在世俗权力丧失时，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加富尔像他自封的那样，是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罗马教廷的问题就不会如此复杂。在一个权利神圣、政教分离成为根本和基本原则、财产受到保护、政府的侵占没有社会作用的国家；在这里，一句话，主教无论是卸任还是在掌权都是安全的，既免受敌对或偏袒的统治者的侵犯，又免受反复无常的大众意志之苦；在这里宗教的领域既免遭该国立法权力又免遭其行政权力的干涉，如果这样，那么教皇就会享受完全的独立而又免遭不信影响的波及，既受到领地系统的支持，又得到欧洲公共信仰的保证。 457

但是皮埃蒙特比意大利以外的许多国家更缺少自由的品格。它的制度的精神是深刻地反教会的，它的政策比它的法律

更对它造成伤害；加富尔不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阿兹格里奥和其他人与他一样对这些法律负责。正是建立在1789年那些观念之上的外国自由派的共享性的政策，与自由及宗教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不幸的是，意大利的关注宗教利益的神职员们热切地盼望剧变，很少意识到许诺太多却极少兑现诺言的那个宪法政府的真实本性；而且遗憾的是，因为他的国内政策，加富尔偏袒天主教一个教派，而其他教派对他的宗教情感也是不公正的。

加富尔看到过神职人员与专制政府的联盟，他对于他们在国家中的影响感到恐惧。他估计奥地利的霸权与世俗权力会同生同灭，他在一击中把它们联合了起来。他对点燃他太多的国人，特别是他一直坚决反对的派别的强烈仇恨感到非常陌生。但是受不同动机的支配，追求相去甚远的目的，他的确为他们做了大量的事情。他随时准备牺牲教会的和其他人的权利，只要458 它们对他的目的之达成形成障碍。在加伦加记录他的行政时，他已经做了许多年首相：

> 因为立法权从国王手中夺过，赌博、盗窃、抢劫和其他犯罪盛行；政府玩弄着公共道德。当抢劫犯成群而不受惩罚时，内阁说警察还没有组织起来。一位部长冷静地提出牺牲肥教士省下瘦教士的方案，而把每一条神圣原则变成纯粹的财政问题。……我们的宪法受草率和不确定支配，更不要说受模糊、失望和无序支配了。

他的热心的传记作家在他的晚年写道：

> 很明确地说，内部管理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省都没有

> 有序而迅速地向前推进。肯定地说，每一部分都有新老错误需要纠正。……肯定地说，财政的衰退是令人吃惊的，在人们感受和发现利益——它是至上的——之前，他们必须牺牲自由。

那些导致太多恶行的政治观念，对于大多数自由党人和对于加富尔一样，是共同的。但是虽然很少有人拥有他的能力与勇气，他比很多人更不受激情和对那些被他扫到一旁的人的恶意影响；虽然他在追求他致力于的特定的实际目标时做得很绝，但是他不喜欢极端，也从没有在追求实现某种理论和完成某个一贯体系中失去自制力。在所有这些方面，他远胜于那些欲继承他的事业的人，因此所有党派对他都表示遗憾。革命党不得不担心心慈手软完不成民族统一的目标，而天主教徒不得不担心他所抑制的太暴烈的激情会失去控制，原则会产生它的最坏的结果——在加富尔的实用的心灵之上没有任何约束。

459

三十二、意大利的宪政精神*

法国与意大利政府为教皇的统治权相互争斗，而保护好它，*advocatio ecclesiae*（教会的使命），乃是查理曼大帝后裔们的光荣使命。庇护九世的不稳定的健康状态有可能加速事情的进程：拿破仑三世的苦工可能包围主教会议，而新的教皇可能被请求把他的皇位交付给这个国家的自由派来保护，自由派曾经保护罗马反对撒丁尼亚。对于维克多·伊曼努尔的大臣们来说，要在掠夺者与其牺牲品之间作出可能的安排，这正是提供每一种让步与承诺的时机。他们获得教皇放弃的所有领地的兴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能诚意地提出他们的条件。1848年以后都灵所采用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使皮埃蒙特成为意大利人自由的庇护所与大本营的任务，也给大臣们以必要的、获得那个地位应有成果的权力；为了使达到目标的手段不会妨碍目标的永久性保有，有些事情可以改变，有些观点可以放弃。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是，最好的政治家们相信李加索里的

460 建议是教会所能期望的最合适、最令人满意的安排。承认世俗权力的丧失将是永久性的，为了不完全牺牲撒丁尼亚的法律精神，他们只能作出让步，或者承认这些建议是与教会自由不相

---

* 原题为《当代事件报道：1862年1月》，首刊于《随笔》，第6卷（1862年1月），第277—281页

容的。我们可以肯定成千上万的宗教人士热切地期望它们会最终被接受。

李加索里男爵在他给尼格拉骑士的信中附上了他的建议，提出了拥有罗马主权和民族统一的主张，他一直指出承认那些原则的政府无法阻止大众实现这些原则的要求。

“民族统一的逻辑以及此后将充满着意大利人胸膛的情绪，不会允许统一受到这个事实的破坏，即在其心脏地带存在一个异质的、更危险的、有敌意的国家。……

“在这种事态下，考虑到作为一个民族的意大利人拥有罗马的不可拒绝的权利，考虑到迫使意大利政府去追求这个结果的责任——在一致的公共舆论面前，为了避免严重的麻烦与混乱，纵然它们被压下去或被阻止，也永远是可悲的——为了产生对教会的完全自由之基础的理解，政府现在向教皇作出公正与仁慈的最后呼吁，一方面，意大利政府与所有宗教事务相脱离，另一方面，教皇放弃世俗权力……

“也请您注意，国王的政府如果不幸地这最后一招没有成功，将会发现自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尽管它心怀好意，努力减轻罗马教廷因拒绝而产生的宗教和政治上的不幸后果，但是它可能无法阻止意大利的公共精神掀起激情的狂澜。”

条件在给教皇的信中提出来了，在其中，作者写道：

“民族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圣彼得的主教席位，根据神的许诺，也是如此。……

“如果在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中教会不能产生继起的社会生活奠基于其上的新形式，它将不是一个普遍的和永久性的制度，而仅是一个瞬息即逝的机构。上帝本质上是不动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创造新物质，产生新形式上，它显示出无限的生殖力。 461

“直至今日，在社会的每一个新的进化中，通过在与世俗世

界的每一个接触点上明智地转变自身，教会为它的繁殖力展示了光辉而丰富的证据。那些现在声称它应该不变的人难道真地胆敢肯定它在外表上或相关的形式上从未变化过？……但是当社会进入了它的更先进的阶段，当它发挥和开启了它的理性，请求牧师保护的要求停止了，那种保护的契约被打破了；人们寻求并采用文明的前一阶段的传统；他们的主教，因为他自己与这项工作相关，值得在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纪留名。……

“基督的理想不允许导致人压迫人的社会权力。它也同样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征服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为合理；因为强权不是公理。

“因此，意大利人，在主张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形成一个拥有自由制度的国度的时候，并没有违背任何一项宗教的或市民的秩序。他们发现在他们作为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的信仰中，没有一条反对他们的争取权利的事业。”

这些段落中有太多的真理，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它们中的谬误。如果宗教是公共事务中的惟一的指导，那么就难以发现受热切的爱国主义、受对某项恶行的愤慨、受对外国专制主义的仇恨所推动的一项事业的邪恶。政治性地评论这些事件会发现，这里存在着许多骗局，那些运用通常的自由主义标准的、高喊权利与自由的人士们的骗局。的确，意大利有些部分被治理得极差，而且奥地利人绝不对他们的制度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毫无疑问，作为权宜之计，这些政府应该被摧毁，而这又要求驱逐奥地利人。这正是意大利人在1848年试图去做却没有做成功的事情。在新的革命中，他们换了理由，用新的理论增强

462 他们的力量。整个意大利必须团结起来以驱逐并防御奥地利人；但是治理不善的非难只能运用于某些点，民族的理想取代了政治的理想。“没有一个民族有权统治另一个民族；每个民族对

于其整个疆域享有权利。"就是这个理论,凭借它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颠覆,历史之纽带可以被扯断——凭借它,文明有可能被剥夺最有力的武器和最辉煌的成就,它阻止欧洲的主要种族的世界使命,它就如社会主义把民族还原为人那样把民族还原为一个平等的平面,而在这个平等的平面上,所有的进步都停止了。这个理论是意大利政治家借此对抗或至少与教皇评理的根据。

在这一点上,利奥十世时代的典故是有意义的。民族理论不是一个可以广泛运用的抽象理论。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在于它的确定性。它的倡导者们并不是对所有处于分裂和被压迫状态的民族都表示同情。他们并不重申阿尔萨斯属于法国。他们嘲笑德国施莱斯维格的爱国主义,对被马札尔人统治的许多民族也不致一辞,虽然在波兰,以泛斯拉夫主义为形式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俄国人而不是对波兰人有效。它是颠覆封建主义、贵族制和不平等的法国大革命的后裔;它直接反对的是全欧洲的、其制度建立在上述三种制度之上的民族。它并不想每一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而只想那个奠定所有文明的欧洲国家的特殊的民族[法国]丧失其影响力。德国、英国与荷兰是这个法宝借以获得力量的国家——一个受长子继承权支撑的贵族制度,享受自治和豁免权的法人,受不管是暴君还是公民大会都无权回驳的法律所限制的主权,这些东西才是那些充满特别义愤者的目标,他们的原则应用于国际事务中,就产生了民族性的理论。这些特征也将蛮族的政体与得益于罗马帝国统治的西方民族的政体区别开来

意大利的宪政主义者希望回复的是古代的帝国的政治制度——前一阶段的文明传统。这种传统中,他们拥有建立在大众主权之上的立法机构;贵族没有政治影响;只要在一院制中取

463 得多数，政府就是绝对的，但是政府握有军权使其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自己成为多数；至于教会，已经被剥夺了独立。1791年法国宪法是具有诱惑力的模范，也是整个拉丁世界的理想。根据这种体系，所有统治权的原则基本上存在于民族之中；如果不是准确无误地出自于民族，没有一个人或机构能够行使任何权威；法律是公意的表达。所有权威源自人民，集中于国家。对于最高意志，既没有第二种权威来限制，也没有法律来调节。在这种武断的政府中统治国家的权力从原则上说是有害于教会的，且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对教会抱有敌意；因为它们嫉妒所有在它之外的影响力，正如它们排斥所有不是源自它们立于其上的统一原则的权威一样；而且，不管它们的意图多么讨人喜欢，但是在它们的法律中没有安全也没有稳定。不受限制的议会并不比不受限制的国王更可信赖；因为当它拥有做坏事的意志时，他们也一样拥有权力。"共享恶名，"伯克说，"也就是说，在公共行为中，乌合之众的力量其实是很小的，舆论的力量与滥用权力者的人数呈反比。他们自己对自己行为的认可使得公共判断也带上他们自己的好恶的印记。"

虽然皮埃蒙特制度的形式借自法国，但是它的精神得自奥地利；它在大众伪装之下掩盖着约瑟夫二世的开明而又残暴的自由主义。所有关于教会的立法，从驱逐耶稣会信徒开始，都是1848年以前奥地利立法的模仿。这受到加富尔的明确的赞扬；不可否认在约瑟夫和利奥十世的关于意大利的法律中，奥地利的确应该承受被推翻的命运，而且它在其本土也带来了腐败的政府和高涨的革命。在欧洲的大国中间，它负有发展更高形式的政治自由的使命，据此，不仅不同的阶级，而且不同的民族，将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受那种最复杂也最晚出的自治；负有教育意大利、匈牙利和斯拉夫种族实践条顿人特有的权利与自由的

使命。这个职责是它在自己的领地上特有的，也是它长期忽视的；对于奥地利来说，遭意大利驱逐而受的损失，大于奥地利权力的损失。因此，恰在奥地利想通过给予教会以自由来挽回它对教会伤害的时刻，它被采用它已经抛弃的政策的力量逐出了托斯坎纳和伦巴第；在匈牙利，正是它通过给予一部宪法来恢复自治的行为，被匈牙利人视为依据法律挑衅它的权威、拒绝它的自由的时机。与它自己相比，一个相对老式，一个则更具革命性。在每一场合，惩罚都紧跟着后悔 464

不管意大利政治家对教会的态度如何，不管在他们最近的提案中他们的利益如何强化他们的诚意，但是政府的性质剥夺了他们的信誉。那些自身的统治意志将变成法律的人们是不会尊敬与神订立的神圣契约的。如果它不受传统约束，也就不会受条约约束；它的诺言的实现是得不到保证的；“人们不会想到子孙，子孙也不会想到祖先。”和法国与美国一样，意大利政府具备所有无廉耻地背信弃义的特权和优势，只注重实际而既不顾忌荣誉又不顾忌保持信仰的沉重义务 在国际交往中，因为有其他的缔约方的力量，还有某种保证存在。但是在处理对这个国家的内部治理产生影响的和解方面，这种保证是看不到的。意大利人自己都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保证，而其他国家的保证对于内部法案是无效的，因为内部法案是国家法律而不是国际条约。因此，虽然这些建议的草拟得到了对大臣们抱有信心的天主教神学家的赞同，虽然，为了这个社会所渴望的和解，它们的完全执行并不是代价太高，但是除了一种诱惑外，我们无法把它视作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考虑到它们为何如此彻底地与皮埃蒙特政策相矛盾，在制度中这些法律将产生多大的反常，以及内阁对它们的一般态度是多么尖刻与敌意，那么就难以相信它们是诚实地提出来的

它的内容如下：

“第一条：教皇享有一个统治者的威严、不可侵犯性和所有其他特权，也享有由习惯建立的对国王和其他主权者的优先权。

465 “圣教会的红衣主教保有亲王的称号，以及属于亲王的荣誉。

“第二条：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不妨碍由教皇根据他作为教会至尊的神圣权利，以及根据他作为西方最高教长和意大利主教的教权所颁布的训令

“第三条：该政府承认教皇向外国政府派使节的特权，并保证他们在本国领土上的安全

“第四条：教皇拥有与主教及其会议进行交流的完全自由，相应地，不受政府的干涉。他有权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地点、采取任何形式召集会议，不管是委员会议还是教士会议。

“第五条：主教在他的教区，助理主教在他的教区，在涉及到他们的宗教服务方面，不受政府的控制。

“第六条：但是他们在触犯国家的刑律时应服从普通法律。

“第七条：国王陛下为了教会的利益放弃所有庇护权。

“第八条：意大利政府放弃任何对主教提名的干预。

“第九条：该政府承诺对圣教皇提供固定的、不可分割的资助，其额度通过协议确定。

“第十条：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为了能使所有天主教国家和民族都能支持圣教皇，将与这些国家进行适当的谈判，以确定各自在上一条款所提到的资助中的分担比例。

“第十一条：这些谈判的目的也涉及前面诸条所提到的各种必要保证的获得事宜。

“第十二条：在这种条件下，圣教皇与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当通过专门使节的媒介相互沟通。”

这个计划极少受到同情，在皮埃蒙特议院的辩论中也极少被发言者提及。议院以内阁获胜而闭会。在辩论中，李加索里作了如下的发言：

“至于罗马，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的，而是现时最重要的。法国作为意大利的朋友和天主教国家，在这个双重问题上对意大利有所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必须弃绝暴力手段；以前在政务会中做的事情现在必须面对公共舆论并受其影响。每一个明智之人现在都知道放弃世俗权力宗教并没有丧失什么。‘在自由的国家中教会是自由的’这句老话，如果以前仅仅是教条，现在则必须被发挥出来并成为理解的基础；这种基础已经在提交给议会的条款中被提出来了。它不是为了谈判用的，而是为了公共讨论用的，内阁一直在致力于这项计划。这项计划以前被称作漫长而无果之旅；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此：不过，如果，如果它是漫长的，就不会是无结果的。在一个存在了16个世纪的制度面前，我们还是不要太性急。在这项计划中，国家没有放弃它的任何一项特权；教会与国家间相互给予自由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作为天主教国王的大臣，我讲的是一个信教民族的语言；我并没有使国家蒙羞。我没有资格直接向教皇致辞；皇帝是我们的中介，他并没有声明他反对这项计划；他只是说教皇太不怀好意。文件将由在都灵的法国大臣自己送回巴黎。”

467

三十三、普鲁士改革与日耳曼政治传统*

目前普鲁士君主制的局势，在一个根本点上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国家，它们都为几乎普遍的保守主义及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冲突所困扰；如果我们运用也许适于衡量中、南欧的普通尺度来判断普鲁士，那是不太明智的。所有那些国家都臣服于拿破仑一世的无上威权，古老的政制荡然无存，事物的新秩序按照法国政府的模型而建立。这说明法兰西帝国对欧洲君主制的开战，在一般性的原则上具有重大意义。撒马丁平原南部的那些国家，在中世纪形成基督教共和国，因具有共同的历史、统一的文明、相似的民族成分和相连的宗教传统，甚至因地理分布，而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它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类似性。这种类似性，最初受到基督教教会至高无上权力的保障，后来则明确表述在国际法体系之中，由此确立了某种共同的政治原则，一定程度上协调着各民族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和动机。早期时代递传下来两样东西，一是对基督教伦理道德信条的认同，二是对合法的权威原则的认同，二者均被视作它们政治制度的基础。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拒斥大家公认的道德义务，抵制无私的法，破坏一个等级森严的、因而不平等的

468

* 原题为《当代事件报道：1862年5月，普鲁士》，首刊于《随笔》，第6卷（1862年5月），第551—557页。

贵族社会用以防范权力的滥用和不稳定的安全体制，那么，影响国内变革的动乱势必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新生事物将会和周围环境不相协调，权力的平衡、条约的信守都被打破，现在疆域的划分也将终止，国家的独立将会受到新的邻国政策的威胁，各种权威和各种制度也因它的示范作用而陷入危险的境地。

因此，整个欧洲在普鲁士最强势人物的推动下，相继结盟，携手抗击法兰西共和国。其他形式的邦联和同盟也组织起来，抵抗法国势力。这尽管不是公开地，但实质上就是对法兰西社会的宣战；这种宣战与其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满足王朝的野心，毋宁说是为了社会的原则。当革命的法兰西迫使整个欧洲认同它的原则后，法兰西帝国又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努力，拿破仑采取同化邻邦国家社会制度的办法，竭力维护和确保他创建的欧洲新秩序。在法兰西的新制度和欧洲的旧王朝之间，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欧洲旧王朝企图使法兰西社会倒转，回复到原来的状况，从而复苏与其相协调的政府和相类同的社会，但未获成功。而法兰西输出革命的新生事物，强加给其他国家，试图同化他们的制度，则持续了一段时期，结果给许多大陆国家带进了引起进一步变革的新成分，这常常震撼了末代的王权，在欧洲大陆，尤其比利时、德意志西部、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种骚乱和困境中还起了重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与法兰西边境最接近的，它们的政府被导向与法兰西社会的新秩序相一致，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央集权化和世俗化。其共同的结果是，解构了一切起协调和中介作用的权威，毁坏了作为政治力量的贵族和教会，铲除了使现代专制主义的平等政策苟延残喘的地方自治的微弱残余。因此，这些国家在自由的发展进程中，都缺乏一种延续性，都缺少自治政府组织中最重要的元素。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取消了中间性质的调解者，这种调解者存在于独裁权力和 469

非法抵抗之间，中和着主权的行使力度与效果，并且在遏止暴政、预防无政府主义、化解民众的怒气及预知暴乱等等方面均发挥作用。因此，它们实际上遭受了两大恶魔的侵害，一面是权力，另一面是自由。一方面，王朝权力不可避免地趋向恶化，君主如果失去王室宗亲及与其共存权力的支持，那么，除了依靠自己及其工具，即官僚机构，别无他办法。另一方面，议会，作为惟一的大众机构，独立于行政，倾向于吸纳和掌握各种权力，它像其他各种形式的权威一样心怀嫉妒，因为这样的权威可用作控制的武器。中央集权诅咒议会——因为它既对王党有利，又同样维护自由党的利益，同时并不主张这两党用自由原则来教育人民。

德意志所有较小的邦都由君主的大臣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没有发生民众的暴乱，普鲁士独立于这种变革。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也只有它逃脱了革命性变革的恶果。在《提尔西特和约》后的法国霸权期间，普鲁士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如果这种变革继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它早就满足了现代社会所有适当的需要，并给别的地方革命以道义上的支持，更多地是给它们提供没有法律根据的必然的借口。然而斯坦因的改革，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别的形势下，为特殊而临时的目的而进行的，就他能在仅仅一年执政时间就完成这些改革而言，他的确充满了智慧，令人仰慕。这种目的和这些情势为改革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们把改革的成功归功于这种支持；但是改革的完全成功耗尽了他们深化改革的欲望，如此顺利开始的改革工程在繁荣时代未能竣工。1806年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使普鲁士精疲力竭，财源枯竭，人口减少；它导致不同的阶级产生隔阂，使人民对掌握军队的贵族嫉妒与猜疑；它还迫使国王义务裁军至4.2万人。斯坦因和莎尔豪斯特，面对法国，着手进行国内改革，以拯

救普鲁士。为了调和各阶级的冲突，促进繁荣，鼓励发展农业，470 有必要解放农民，摧毁自由竞争的障碍，允许市民购买土地，允许贵族从事贸易。以传统为基础的省府和市府的自由制度把人民与王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军队受到条约的限制，有必要缩短实际服役的时间，以训练更多数目的军人，达到扩军的目的，这时普鲁士重新得到权利招募那些曾经受训的老兵。这就是 Landwehr（预备役）的起源，由此普鲁士在 3 年的空隙里得到一支拥有 15 万士兵的军队，而没有引起法国人的怀疑。也正因此，在 1814 年的大陆同盟中，只有普鲁士人民精神上认同其国王，最积极地参与了毁灭拿破仑的行动。

古老的普鲁士专制，一度被斯坦因改革打断，在那场拯救性战争之后又卷土重来。在政府和大学中，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占压倒优势，自由遭到拒绝，但是教育得到扩展，普鲁士王国物质上的繁荣迅速增长。普鲁士领土的重构某种程度上正给加强君主权力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新加入版图的省份带给普鲁士一种虚弱的成分，只有通过加强君主的权力才能弥补。普鲁士先前主要是新教国家，在萨克逊的选民家庭皈信之后，又成了帝国新教的保护者；而且，德国只有部分地区才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的情感纽带，军队光荣的自豪感，辉煌成就的记忆和一系列杰出帝王的人格影响，这支撑了一种政治统一感和一种旺盛的爱国主义激情。但是，这些纽带，虽在七年战争的牺牲中得到加强，却在随后发生的解放战争的获得中被削弱。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天主教徒，传统上和他们的新统治者没有任何瓜葛。莱因兰人、威斯特伐利亚人和波兰人，都需要巧妙管理。疆域如此散乱，人口如此异质，既不具地缘的联系，也不具内在的亲缘，只是通过共同效忠于同一的君主而凝聚在一起，不具有一部现代型态的宪法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没有历史传统——没有帝国政治——

没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并受平等分配的教育支持的公共舆论，来提供国民议会所需要的那种统一。统治这样一个不协调的国家，君主需要力量。然而德国古老的传统和1808年的改革，提供了一种也许已逐渐发展的自治政府制度的基础。各省至少在名义上已有讨论省级事务的地方议会；市镇享有管理本地大量财富的权力。省和社区都有充裕的物质基础，促进也许受到保障的、自由的国民代表产生的可能性。只有那些在地方管理他们本地事务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国家的议会政府。自由的习惯仅仅在教区和公社这类最小的圈子里才能养成。地方的事务与国家的事务都由接受最高权力或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来管理，地方的议员在本地养成被统治的习惯，去首都议会满足统治的欲望。他们对自由所知越少，他们所能给予的自由也就越少；通过放弃自治，他们获得了尽可能专制地统治他人的信念。那种类型的议会很可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君主的权威，在民族独立和抵制暴政上大胆放言，但是从来不会促进，甚或宽容自由和自治政府，它所做的一切是摆脱君权的影响而增加政府的权力。因此，宪法和国民代表的让步，在没有地方自治的国家中，是自由成长的最大障碍，因为无论自由的习惯，还是自由的理论，是自由的成功所必需的。代议制中内含着自治的价值。它们是权利和自治政府实践得以存在的保障，其中权威既非源自国家，也非由其大臣来行使。因此，对一个健全的宪法制度来说，没有比省、市和区议会的存在更重要的了。对实行中央集权的立宪主义来说，没有什么比地方议会更有害的了。

1815年之后，普鲁士政府应该朝地方自治方向前进。但是神圣同盟的教条阻碍这项政策的实施。官方行政机构、官僚制度组织建立起来了，在技巧、明智和公正诸方面，它均超越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国家，但它是专制的、无信仰的、爱干涉的，它窒息

人民自治的思想和习惯。这时期物质方面成果辉煌。人口从1816年的1040万增加到1858年的1774万。土地产量原先不足供应1000万人，现在则可供应1800万人的消耗且绰绰有余。教育普及，有2764691名儿童入学，只有百分之五的新兵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国家税收总额，从1821年的5000万美元增加到1861年的135341701美元。债务，战争末期总额达217845558美元，到1847年则降低为139884581美元；现在又攀升到247641481美元。

472

直到已故国王登基，宪法制度没有任何进展。这时，在拉多维茨的影响下，国王着手建立一种自由的制度，延迟自由制度的后果使他们自身也感觉出来了。受教育的知识阶级无法容忍前任国王统治时期的专制保守主义，这使得许多荒谬的自由理论大行其道，压制的极端导致了自由主义的极端。作为权利保证的责任感与作为权威支撑的君权尊崇被普遍颠倒。与此同时，对独断权力的恐惧随着基督教的衰落而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分享并行使权力的渴望。由之，随着代议制政府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自治政府的观念也就放弃了，一种抽象的立宪主义的欲望越强，使本国传统制度发育成熟的思想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人民信念的幻灭，政治功能的严重损坏，都是政府治理不力的结果，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的改革来得太晚了。他把省议会合并成柏林的中央议会，承诺逐渐修改宪法，以与时代要求相一致。但是，1848年的革命风波打断了这项事业，国王暴露了料想不到的软弱，连一部普通性质的宪法都废除了，省议会仍保留着它们以前不健全的状态。新的制度和国王的观点与信念发生冲突；他因而继续占据着一个不该占有的位置，他不堪重负，心力交瘁，撒手归天。他活着时，是曼陀菲尔内阁及其支持他的保守党官僚，阻止实际连贯的宪法制度之实现。他们被1848年的革

命事件和思想风潮所惊醒，试图作出完全的反应，就用警察的干涉和对法律的独断的解释来达到阻止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目的。这样一种政策，本质上是居心叵测和不受欢迎的，不能让人感到信心和安全；自由因对自由滥用的恐惧而遭到有意的压抑。这样的政府比具有某种信念的党派更糟。在理论上，他们能说他们抵制独裁专制和非法的权力，不管是以暴政的形式还是以革命的形式，而事实是，因为革命的危险迫在眉睫，他们的努力要直接反对革命。他们也许强调，与国家的传统及特点相应的宪法成分的最完满发展，并不会博得反对派的欢心。但实际上，他们的制度是反自由的、压抑的，与解决有关建立宪法制度的问题相背离的。因此，他们驱使了革命的真正敌人加入民主党的反对阵营，这些敌人以种种形式反对宪政，以反对君主与暴民的同样精神捍卫权利。正是由于偏离了他们常常不得不与其一起行动的人的原则，使得普鲁士天主教徒长期坚持天主教政党的必要性，维护天主教徒的利益，而不顾政治原则的公共纽带。

473

摄政时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委任的政府具有更为自由派的特征，因其外交政策，和鼓励德国统一运动而受到普遍赞誉。但是本届政府内阁不统一：一部分是贵族派的保守党；另一部分则属于自由党，支持民族主义者。国王不信任他的摄政顾问，猛烈反对 1845 年他兄弟的立宪构想，最近的《瓦恩哈根日记》对那时的努力作了不太令人愉快的披露。他一贯受到以贵族僧侣克莱采（*Kreuzzeitung*）为代表的保守党的支持；像正统派和路德教派，这些教皇世俗政权的热烈的维护者一样，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天主教徒一度倾向于联合成一体。普鲁士保守党既是德国统一的敌人，也是意大利统一的敌人，又极度敌视法兰西，而有意支持奥地利。威廉国王在柯尼斯堡的讲话，宣布他的王位只来自上帝，这与保守党观点严格保持一致。

这个著名的宣言不仅仅排斥了法兰西帝国主义思想，也是对大不列颠王权建基其上的同一原则的承认。君权神授是给权利与法律提供保障的君主的惟一解释。君主权力的稳定是对其限制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一种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威的统治不能抵挡武断的变化，那么自由的安全与尊崇是不可能存在的。要获得这种自由的保障和基础，就必须承认先于人类法律，超越于每个个体意志的、神圣而客观的权利。神权是独裁权力的惟一屏障，这种独裁权力在不同的情况下一定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可避免地盛行，或者以极端专制的暴政形式，或者以拥有无限权威的民主形式，也就是说，其中任一形式将不会受到法律控制，除了它力量有限外不受任何束缚。专制政府的任何一种形式，在积极意义上说，都是不道德的，是与基督徒的伦理原则和责任不相一致的。因为权威的限制是道德上的绝对要求。存在着这样的行为领域，它要求无条件地免除市民权力的控制；否定这个领域，必然是专制，本质上也是犯罪。没有契约或人为的势力均衡能拯救自由的原则，因为它们都暗示了绝对（专制）权力的存在，除非承认这些原则：存在着先于契约而存在的状态，存在着权力无法产生和消除的制度。世袭的君主制不是能保存权威神圣原则的惟一方式；但它是最朴素、最简易和最完美的方式，因为它是惟一由自然单独提供而没有变异的形式。由于国王是国家的代表，他被称作神恩之王，借以表达权威和权利的神圣的性质。这种权威和权利的尊崇是不可分割的。把权威单方面神圣化就会导致权力的偶像崇拜；而把自由单方面神圣化便会拒绝法律。如果把神圣的性质同等地赋予这两方面，那么在它们各自的领域都会同等蕴涵着神圣的秩序。 474

有一些事物从根本上说是中世纪的、封建的，也就是条顿人的 *Dei gratia Rex*（蒙神恩的君主）。在一个贵族社会里，国王世

袭他的领土和王位，一如贵族继承他们的财产和爵位。它们天生属于他，不是因为大众的支持，而是因为继承权。他拥有它们是根据一切财富赖以建立的同一的占有权，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贵族制的国家是君主权力能被宪法有效限制的惟一国家，

475 因为它是传统保持其权威的惟一的共同体。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国王，或至少是王朝，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人民不会同意其主权先行。权力，无论在哪里，都几乎必然是绝对的。君主的权力不可能受限制，除非人民大众的权力也受限制。如果对一方设置障碍，那么另一方也必定有障碍。要让其权力不受限制，因而其自身不受强制的人永久性地牺牲其权力，那是绝对做不到的。民主制更乐于屈从独裁，拱手把权力交给一个人，在紧急的情况下，他们能剥夺他的权力。但他们不情愿通过对其行使加以永恒的限制而损坏他的主权。然而在贵族制那里，财富、影响力和政治权力的分配都是不对等的，它们受到规定和限制，而这种限制精确地扩展到所有权威上。如果君主绝对专制，那就不可能有政治权力的分层；也就是说，不会有贵族政体。也正因此，根据贵族政治的这两方面特征，君权神授的君主制是惟一有限制的君主制。

在 1861 年 11 月选举的议会中，一场真正的宪法战斗发生在议会的中央集权派和地方权威的独立派之间。前国王原本打算推行的地方制度的发展，既缓解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冲击，又是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解毒，但为 1848 年革命所打断。新宪法阻止旧宪法的修正，在随后发生的限制议会权力的争论中，地方权威的重要性被忽略。1850 年民主党执政，执行了一条法律，所有地方自治政府遭受破坏。1856 年，这条法律废止，保守党势力占上风，公开允许地方制度的发展。然而什么也没做，问题仍置而未决，前内阁继续执政。这些省和市的议会都建立在

过去的财产制度和秩序的基础上，因此性格上相反于、精神上不同于柏林的代议制政府。他们组成一个独立于柏林议会的权力 476 集团，为君权的影响力提供基础；如果他们得以有效地重构，对民主僭位的恐惧也许完全可以解除。因此，正是省市的地方权力，是贵族政党保存王权强势影响力所依赖的，基于同样理由，激进党也希望破坏他们的保守的和市政自治体的性格，把它们作为中央议会的原子系统来进行重塑。

前政府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的法案中孕含了这个精神，由此，普鲁士的地方宪法完全被推翻。它旨在恢复这个国家自代议制宪法获准以来不再存在的和谐，恢复古老的地方制度。新宪法本身实际上存在两种成分，它仍然保持了一种传统的性格，既能和这个国家古老的法律制度保持完美的和谐，又能完全和它的历史基础分离而完全按照外国的模式。在这个大问题解决以前，3月6日，政府在第二次议会中以171票对143票落败，在一份有关预算应详细提交议会的提案中，它原则上承认，但又抵制其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政府内阁的意见不能维护，3月8日他们集体提交了辞呈。国王拒绝接受这份辞呈，3月11日他解散了议会，宗教事务大臣贝特曼—霍尔维格立即退休，不赞成这项措施，他推荐临时任命组建一个清一色保守党的内阁，这样的内阁应当乐于抵制反对派的攻击。他认为解散国会并不能加强王党的权力。这位内阁中在知识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德国最有学问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不尽责对他的同事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留下来的保守党成员，然后提出建议，在解散内阁后应当重组，填满他们自己的朋友。这项建议得到采纳，自由党内阁下台，他们的位置为保王党顽固势力所取代。国王决定表明他不会服从议会大多数。

3月22日，内政部发布有关选举的公告，告示新政府组阁

的情况。根据这份通告，政府站在宪法的立场，承认人民代表的一切权利，下决心推进自由的原则，发展立法制度。这样做之后，它吸引了这个国家所有保守成员的支持。它认为它的首要责任是努力维护君主的权利，而不容忍君主制统治受到削弱，以支持所谓的议会制政府，前者是普鲁士的繁荣与伟大所依赖的，后者则是民主党确立的目标 选举的战斗将在保王党和民主党之间进行，必须做的每一样事情是要符合选举自由的原则，确保一个内阁的大多数。可以预料，国家的所有公仆对此结果都有所贡献，普鲁士任何官员在选举中投政府的反对票，都被认为已经打破了他效忠国王的宣誓。

诚然，我们英国议会政府的思想不适用于普鲁士，而屈从一个中央政府的代表大会，实是确立了一种新的专制形式，背叛了民族的自由权。但是，让王权或君主立宪制政府为选举呐喊，使其直接与人民对抗，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新内阁已经亲自承认，把服务国家政府的整个军队用来影响选民的投票，这对选举的自由，对一切代表的制度来说，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原则性错误。然而，这是一个属于普鲁士行政制度的错误，每一届内阁都被诱使犯这样的错误。同时，为赢得广泛的支持，新内阁正作出极大的牺牲。降低赤字，裁减军队，前任内阁被击败，议会被解散，正是由于这几项举措没落实好，现政府则有所让步。新内阁有优势胜于他们的前任，他们保持了明白易晓的原则，受到有组织的政党的支持。但是，他们将不仅受到前议会中占上风的大多数的反对，而且还将受到在普鲁士内外希望使柏林成为德国首都的那种有活力又有吸引力的党派的整个势力的反对。

三十四、从保守的自由主义观点看* 478

1860年7月，议会改革

5月3日，在没有进行分组表决的情况下，经过6个晚上的争论，改革法案被第二次宣读。讨论自始至终对法案不利，它受到了政府支持者和反对党议员的抵制，帕默斯顿勋爵和他的大部分同事放弃了发言权。最激起人们兴趣和吸引注意力的演讲来自布尔沃爵士和格雷戈里先生——前者的发言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但是缺乏政治家的雄辩的力量；后者的发言富于教育意义，但几乎不可能适用于正在讨论的问题。然而，格雷戈里先生的演讲比其他任何发言更清楚地显示出下院关于该法案的立场。这个演讲是在游历美国时对美国政治考察的引人注意的和真实的表述——一个对美国式民主的警告。没有一个争论反对采纳这个国度中民主的因素，因为它们是从一个民主至高无上的以及不与其他平衡性因素相调和的国家中单独地引伸出来的。这甚至算不上对民主的抨击，因为它假定在美国没有令人烦乱的原因来解释它对古老的欧洲式的民主恶意反对。对于格 479 雷戈里先生的讲话，国会里每一角落都报以喜悦的和响亮的喝

* 原题为《时事报道，1860年7月》，首刊于《随笔》，第3卷（1860年7月），第265—288页

彩。另外，关于布赖特先生害怕和讨厌的证据，是众多自由党发言人一系列对他的攻击。

蒙克顿·米尔恩斯先生表达了该法案原则最引人注意的辩论，对它持反对立场的最出色的辩论来自罗伯特·西塞尔勋爵和麦考莱先生，他们表示在有些选区，民主的因素已经深入人心。选民资格，麦考莱先生说，是一个由各选区的社会分配所决定的局部问题。选举权，为了适应国家的实际情况，必须多样化。格拉斯顿先生对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他有效地处理了关于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正当性——尤为布莱克先生和E. 布尔沃爵士极力主张——的一般性辩论。他说："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素质低下的论调？先生，我并不认为工人作为个人不配获得其他阶级同等的选举权。"我们害怕的不是个人素质的低下而是整个阶级的数量，劳动权和财产权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工人阶级正当地要求他们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应该在政府中有所体现。危险来自于群体而非工人阶层。对这种困境的反应，格拉斯顿详尽说明最明智之举是增加伦敦区选民的数量。这是支持该法案最重要的辩论。"工人阶级是不是要占据选民最大份额？工人阶级在国家选民中的地位是什么？目前已有41万选民，再加上15万人或者最多加到20万人，这样就是66万人；一个郡已有选民53万人，有可能再另上15万人，总共68.6万人，再加上大学中的选民，英国选民总数可达134.5万人。自然，考虑到选举权重复，这个数字将大幅度地减少，我们不能计算出减少量，但可以估计总数将减少不下六分之一。最后所得到的大致结果将是：在这个拥有2000万人口和500万成年人的国家，普及代表制以后，将会拥有100—120万选民。显然，给予成年男性的四分之一以选举权，并能把有见识、谨慎的四分之一的人从总数中选出来，这个体制并不是一个十分不合理的体制。"下院中大多数发誓要改

革。反对派没有宣布他们坚决抵制该法案，只是试图尽可能推迟该法案的进程。在一个还有许多其他重要问题讨论的会议上，拖延政策有很大可能成功。《改革法案》在委员会讨论之前，这种可能性由于反对派的一个标志性胜利而大大增强了。

5月8日。在下院，废除纸浆税法案三读，并以219对210票的微弱多数通过。

5月21日。该法案在上院二读时以193对104的多数被否决。鉴于上院没有明确改变税收的先例，这项在紧急情况下被允许的创新，因其得人心而成为对政府的严重一击。

5月25日。下院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寻找贵族们所采用的步骤的先例。然而同时从中国传来的消息确定战争需要很大一笔额外款项，为拒绝该法案——它将会使本年的税收损失高达80万镑——找到了实际的理由。否决被简单地归结为宪法权利，以防止有可能产生的不满。人们一般觉得贵族对国家贡献很小，但否决的结果却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权威，降低了内阁的地位。在这种出乎意料的方式下，虽然《改革法案》在下院获得通过，它的影响——下院威胁要实施宪制平衡——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保守党的力量在国家中恢复了。

6月4日。在进入委员会之前，《改革法案》被又一次提了出来。为了赢得时间，很多说明处于零乱状态。面对拖延策略，考虑到该法案的一个重要反对是对早先分歧的恶感，约翰·罗素勋爵宣布苏格兰和爱尔兰改革法案在本次会期将不再提出。这一步被设计来使英格兰的法案今年会变成法律。对将反对派导向放弃它的费边政策，获得分组表决的机会有影响。它为试图以错误的方式否决该法案提供了第一个合情合理的时机，预计该法案的苏格兰和爱尔兰支持者将会投票反对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法案拖延。 481

6月7日。苏格兰议员詹姆斯·弗格森爵士将讨论延迟了，理由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法案被延迟的情况下，英国的法案不应纳入程序。3个法案应一起通过，他说，在明年把它们一同提出比今年通过1个而将另外2个留给下次会议更好。3个法案草拟时协调一致，互相之间有参照，在事情不确定的状况下，这将为3个地区的代理带来很大不便并且不可能如预料一样解决问题。政府中一些苏格兰、爱尔兰支持者为这次动议进行投票，结果它以269比248的多数被否决。

6月11日。政府以21票的多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考虑到会议的接下来一段议期，宣布该法案撤出。在下院影响力一点也没有损失的情况下，反对派在拖延该法案方面取得了胜利，然而却以内阁成员决定性胜利——由此他们会为公众显而易见的利益而牺牲该法案——为代价。改革法案和那个关于纸浆税的法案的失败降临到布赖特先生和他的朋友身上。但他们获得了秋季的时间煽动对权益和改革的问题。欧洲大陆收获丰盛的情形使得他们自己的与法国的条约难以成功，也使代表体制的改革在明年令人鼓舞的情况下能否获得通过——而今年在同样的情况下却失败了、保守派1860年的胜利是否会尽一切可能推迟达成协定——在某段时期认为它有危险却没有任何人敢拒绝它——成为令人焦虑的问题。"Tout obstacle," 德·迈斯特尔说，"qui n'éteint pas une force en augmente la puissance, parcequ'elle l'accumule.（任何障碍，它不是力量，但增加了力量，因为它积累了力量。）"

这次会议期间所出现的事件如此鲜明地表现两党的特征和错误以至于它们影响的减弱很可能使政府的存在产生危机。我们受到理想化的改革主义者和绝对的保守党，受到激进派和托利党的共同威胁。两党的做法从根本上是不符合宪法的，一方

482

瞄准宪法以外的结果，不和它保持一致，另一方拒绝 *nisus formativus*（指导）其生活的主要原则。每个党派都为对方的存在负起责任，在对方的极端中发现了自己的某些理由。一方面，稳定的呼声代表了那些掌握权力并期望保存它的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出现了要求所有事物适应新利益变化的渴望，想像政府组织自身是有价值的仅仅是出于政治崇拜。惯例的正当性并不适用于宪法的代表部分。没有要实现的理想状态，没有要回复的黄金时代。我们祖先的智慧约束我们的并不是它的成果，而是它的范例。我们继承祖先的还有他们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进行立法和实施统治，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得不改善和调整他们留给我们的东西。他们实践智慧的最伟大的证据，他们留给我们最伟大的教导，是他们细致地提供了他们确实感到的需要。他们生存的环境，他们的法律不再适用于变化了的时代。对任何时代都同样适合的法律和制度也就是对任何时代都没有用处的法律和制度。惯例在代表方面没有权威，而政府的功绩基于它的代表性

只有在自然界，观念才包含在现实之中，"应然"与"实然"才是同一的。在道德世界，现实并不与理想相一致，它是短暂的、临时的，我们有义务以意志的行动努力去恢复和谐与一致。在自然界，事物的联系是必然的，观念总是实现的。在那儿除了重复之外，无复其余。但是在道德世界，劳动的义务持续不断地恢复形式和质料的统一，这是永恒的活力与运动之源。理想的保守主义的原则是前进而非停滞。

民族是实体，而国家是外在形式。民族的政治方面必须与它的社会存在和惯例相一致，并且由后者所决定。不可能永远将它们分开。革命或者是试图通过暴力手段达到将其分开的目的，或者是对恢复一致的反动。政府并不是民族的自然溢出，而 483

是智慧思考的产物;政治才华是个自由反思的过程,通过它,政府和它所属的人民保持一致。但正如特定的政府出自人类的设计一样,社会则更直接地服从天意。它很少受制于人,它的受天意指导的运行步伐如此缓慢与难以觉察,以至于我们不仅无法有意识地影响它们的进程,甚至不能理解它们的方向。现在,神以不能更改和转变的、我们称之为自然法的力量指引着世界。通过观察这些法则的整齐的有规律的作用,历史哲学试图对上帝给与人的方式的合理性作出说明。政府是社会的人格化,它拥有更道德的特征,而社会拥有更生理化的特征。对政府而言,如同个人一样,它的目标是促成神意的胜利,实现天道的设计。在此过程中,我们武断的推测与政策必须最大可能地接近神圣行为的客观结果。这就是说,它必须受到尊崇法律和尊崇实际情况的限制。社会在人的设计之外独自发展,它缓慢而不断地修改和演进它的形式。这种连续不断地发展为政府提供了前进的因素,影响着社会并紧随社会的变化。政治进步是适应的过程而非玄思的结果。这把改革和革命区分开来了。一种变化是在实际情况的压力下产生的,另一种变化则是受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观念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其运作中模仿自然界的状况,以进化而非变化的方式有规则地、有机地运转。政治学是一门观察更甚于推理的科学。

社会的成长需要改变政治制度以适于自己的变化。但是人的作品是一下子被设计和制作出来的,我们不能授予它们发展和自我适应的力量。我们只能使制度依附于社会从而使修改制度的需要易于觉察,使变化尽可能符合需要。要保证这种灵活性,就要使政治组织者附着于社会的现实条件与需要,从而使政治组织不因其自我的价值或自我的力量而确立,而因其与社会之一致而确立。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是绝对正确的,而是

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与社会相适应的 只有对这个道理理解了才不会害怕变化。因为，正如它跟随社会的变化，它根源于有规则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正如成长是生命的法则，改革也是政府的法则之一 偶然的危机往往无法避免，因为没有人的感觉能倾听社会发展的脚步或看到人的成长。我们在其间隙中意识到它，那时我们突然发现外衣不再适合于时节。当这种间隔并不非常大，在局部的缺失变成普遍的不满之前受到弥补时，是幸运的 这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它不允许任何事物变得过时或腐化。

宪法也许是完美对称和自然的，但它必须适应社会的形式和紧急需要，否则便毫无用处。这是惟一需要的协调，当它存在的地方，外部的极端无规则并不是责难它的理由。要求政府修改代表制的压力，其能量来源于构成社会的那些力量的性质。不管谁，拥有了社会力量就必然要求政治权力。这是政治学的最高法则，如同万有引力是物质世界的至高法则一样。这是政治与社会构成必然联合的后果。代表制政府不应被视为政治发展的特殊形式，而是它的理想状态，其余的形式必须服从它，在事物发展进程其他形式最终倾向于它。它属于国家的最本质的理念。它不是个选择问题。当时机来临时，没有一个民族能逃脱它，尽管它会给一部分人造成伤害并给所有人带来麻烦。接受代表制，不是对一个民族健康和繁荣的检验，而是对它的成熟度的检验。因此，代议制政府并不适用于所有时期、任何地点，它是政治发展的最完美境地和终结。封建贵族制、绝对君主制、共和制同样是国家的合法形式，尽管是附属性和短暂的形式，但只有有组织性的社会才能发展出政治代表制。

政府资源使得国家中新的社会成分迅猛发展，其发展的比例与国家成功地接受它们，或把它们由社会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比例相当 如果这一点被忽视或否定，被拒绝在外的成分，

485 虽然可能是国家繁荣的巨大来源，却会成为政治衰弱的来源——是敌人而非朋友。财富和知识是获得权力的主要工具，也是政治代表制的主要要求者。政治代表制因此必须与财富与知识的增长相称或与之密不可分。正如市民社会有责任把享受知识与财富的益处扩展到更广的群体一样，国家同样有责任以同等比例扩展对政治权利的享用。政府甚至有义务来加速这一进程。通过加速这些资源向公民权的转化来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参与。整个民族需要渐进地提炼、组织、提升为一个政治的社会。在那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清除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死气沉沉的低级秩序的地方，社会资源的存在被认为是个负担。任何社会都自然是贵族化的，因为人们在对政治权力的分享上并不是等份额的。但是随着道德境界、物质福利发展，随着文明化的生活目标得到满足，贵族化的区别消失了，国家的贵族化特征褪色了。阻止统治阶级之范围不断扩大的惟一方法是小心翼翼地保存愚昧和贫困。这个政策被广泛实行。它比那些不愿承认财富的增长、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的人所奉行的政策更有合理性、更前后一致。

下面的统计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最近一段时期这个国家政治成分的发展。1818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是 11642683 人，寄宿学生 674883 人；主日学生 477225 人。1833 年，人口总数是 14386415 人；寄宿学生 1276947 人，主日学生 1548890 人。1851年人口总数是17927609人；寄宿学生2144378人，主日学生2407642人。寄宿学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1818年是1∶17.25；1833年是1∶11.27；1851年是1∶8.36。主日学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在同样年度则分别是1∶24.40；1∶9.28；1∶7.45。1832年银行储户 427473；1856 年银行储户 1331369。1832 年银行存款额是13435969镑；1859年银行存款额是38968312镑。

如果每个人都被代表，将没有任何阶级被代表。劳工阶级是土地上的力量，它的重要性必须通过其政治影响被承认。但 486 如果它的代表制的确定不是通过力量而是通过数目——是计量而非衡量，那么其他的阶级的权利和利益就将完全得不到代表。如果代表制是一个算术问题，政府也将成为一个算术问题。底层阶级应通过使他们当中最出色的、获得公民权的人而被代表。这些人比那些高等阶级中最糟糕的人更适于参与政治权力。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下层部分。一个熟练的工匠比一个低级的杂货店老板，一个富裕的商人比一个破产的贵族更有资格成为共同体信任的成员。一般来说，不害怕改革的人都没有必要害怕革命。反对选举权改革证明是对社会与国家，以及不同阶层利益之间存在的那种和谐的根本误解。毫无价值的嫉妒存在于双方，存在于两个极端之中，人们不承认以下真理：每个阶级的繁荣都以其余阶级的兴盛为条件。"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各肢体人以为是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但上帝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1—26节。）

这是我们极端的政党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站在两种理论之间，一个威胁要将国家变成顽石，一个则威胁要使国家解体。农业利益总有一种保守主义的、贵族的气质，工业利益则有一种愚蠢的民主气息，后者在最近30年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国家的兴盛依赖于在两者之间获得平衡。制造业的兴起理直气壮地要求对过去的东西重新调整，但是土地利益代表全盘拒绝了这种正当要求并寻求不公正地维持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

社会条件所不允许的。根据社会和政治成分的同一生存法则，每一方都有视自己的要求为最高，视别人的利益为从属的合法权利。在隐藏的目的中，反对党拒绝履行早先对制造业要求所作的承诺变得不再合理。重要的是从民主政党经由同一根源产生的夸大的和僭取的要求中区分出公正合理的部分。

487

像美国人一样，曼彻斯特学派并不自称为一套抽象的民主理论，而是根据我们制造业独有的某种利益建立一个前后一致的体系。这个奠基性工作构成了它的力量和弱点。虽然它给该党起初的目标和愿望提供一个合理和合法的特点，但是它导致将同一个标准运用于所有问题，为整个政策体系提供同一个构成材料的结果。没有一个体系在理论上能更彻底、更完美或更逻辑地归结为某一条原则。没有一条原则会比其实际运用更普遍。原则的迅速发展和获得令人可畏的权力，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理论真理，而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是社会中最迅猛增长的部分的利益与意见的表达与结果。曾有一段时期，农业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七，工业区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进而整个国家人口的增长也远远超过了机器引入之前。财富的年增长更快。据波特的统计，国家财富每年增加 8000 万镑，几乎可以完全归之于工业阶层。要估计产生曼彻斯特学派的阶级力量仅仅靠计算数字是荒唐的，这就像计算巴黎人在法国人口的比例来计算巴黎对法国的影响一样。这个阶级的力量因集中而变得更加强大。这个伟大的阶级的利益是清楚的、明确的和压倒性的。为了保护它，该学派的代表们并不是以理论说话，而是代表成千上万依赖商贸繁荣的人的利益说话。对他们的至高的褒奖是最高的就业机会。为此，生产成本就须尽可能低，需求就须尽可能高；这就是说，为了增加劳动，它必须尽可能低廉，商品市场必须尽可能广阔。基于这两种考虑，曼彻斯特学派希望帝国的内外

政策果断坚决。在各种问题上，他们都以此为指导，因此他们不得不像勃兴的制造商那样成为政客。30 年前，社会中这个伟大阶级在立法上没有代表；15 年前，它仍然为其他阶级盘剥。改革和废除谷物法第一次将它放到同等的基础上并使它可以在体制中发展自己的利益。为了和国外工业进行竞争，它必须以低成本生产。因此工人的食品、工业原材料必须尽可能低廉。关税改革必然紧随着对谷物法和航海法的废除。这是自由贸易的最基本的理念，但这个学派在更宽广的义蕴上理解这个理念。自由贸易是所有事物的原则，一个可以运用于所有公共问题的公式。它无非是自由生产并将所有障碍降至最低限度的原则。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础，他们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与利益的一致性的。 488

使我们的工业取得如此发展的永恒的竞争加大了制造商的每一种金融压力。他们极力缩减国家支出以及随国家支出而来的税收。因为其他人只会感觉到他们付给国库的钱数量在减少，但是加诸制造商身上的每一种负担减弱了他们的竞争力，威胁了他们的工业优势。他们倡导建立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原则上的宗教信仰上的自发体系，而反对强加于人民的机构与义务。国家存在的目的是铲除贸易和国家财富自由发展的障碍。宗教在它的范围之外。间接税是一种专制，因为它减少了消费它是对劳动的征税，增加了劳动的成本，而降低成本乃国家的惟一职能。税收惟一正当的对象是资产，而不是劳动，因此只有直接税是合法的。间接税妨碍了资产的创造，直接税则促使资产实现，一个是贫困的来源，一个是繁荣的来源。

这个物质利益的体系同时拥有一种道德尊严。制造商对增加生产与消费有兴趣，并不仅仅为自身，同时还为成千上万依赖他们的人。自然地，他们总是用许多高尚的词汇装饰他们的体

系；视自由贸易为社会和政治自由的主要原则，视他们的个人利益为仁慈的动机。这样他们成功地掩盖了他们哲学基础的物质特征。这种后果的最迷惑人之处在于要求永远而普遍的和平。489 作为消费者所有人都有共同利益，贸易给所有人带来公共的契约。欧文斯通勋爵说："这是国际商业交换的利益法则，所有贸易国的共同利益以他们邻居的发展繁荣为条件。无疑，英格兰的侵略使我们的商业繁荣遭受损失，其带来的冲击结果必然使整个商贸世界产生震荡。"蒲鲁东说：竞争意味着一个共同目标许多共同利益在许多国家的延伸是经济科学进步的一个很明显的征象 以往，大家公认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一个人所失的必然为另一个人所得。培根说，*Quicquid alicubi adjicitur alibi detrahitur*（扔出去的东西必然是从何处捡来的） 伏尔泰说，渴望我们国家强盛就是渴望我们邻居毁灭。很明显，一个国家不能获利，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有所损失 但是目前贸易竞争不再像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巴斯狄亚说，一切合法的利益都是相互协调的。当他们告诉我们征服留给我们的不是带剑的国家而是工业的市场时，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英镑、先令和便士的问题。常备军增加了税收的负担，羁绊了劳动的需求，战争中断了消费。自然地，在俄国战争一开始，我们被提醒，每一颗我们发出的子弹都会伤及英国的一个债权人或一个主顾。这是一个新的极端，利益和激情同时也是物质和道德相互冲突的一个极端反应。这些错误比曼彻斯特学派还要古老。它们自然地从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算术家时代延伸而来。因此萨伊认为所有牧师都是不务正业的人，而拿破仑是一个天才的疯子。在关于政治、经济的演讲（1826 年）中，库珀宣称：国家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无非是政治家在特定的计算中发明的像对数一样的术语。曼彻斯特学派并不是第一个在政治学中仅看到物质成分、

思考商品生产多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工作多于工作者的学派。490
但是他们是第一个将商业利益高于其他任何利益或其他任何原则的喜好发展为实用的政策体系的学派。保护这些利益的民族特性甚至民族嫉妒心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争吵总是从必然存在的利益、情感、意见的差异中产生。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说："没有什么比希腊晚期哲学中的世界主义对马其顿和罗马征服者贡献更大的了。"

实际上，劳动者利益是最高法则这条原理的实际结果是导致拒绝政治学中所有的道德影响力。《十小时法案》被视为一种道德保护主义而被拒绝。国家没有权利干预皮匠和他的雇主之间的自由契约。它的任务仅仅是阻止任何干预，消除国家的所有影响。在保护道德反对物质利益、人反对物的斗争中，政府是无力的。但是在它不得不迎合利益生产的地方，它是全能的，因为对利益的索取是至上的、权威性的。这样，自由对他们而言只是托辞，而非目标。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为最恶劣的专制行径进行辩护。他们的行为直接与他们的表白相冲突。他们仅仅把对市民自由的崇尚当做通往终点的手段。如果那些工业的权益能够通过牺牲其他权益而得到保护，他们宁愿选择专制主义。因此，法国的国王——尽自己的努力来加强那种绝对缺乏道德支持的权力的基础，比任何外国国王更卖力地促进贸易，加强思想控制——是这个党如此完美的理想形象，他们不仅称赞他的经济政策，而且确认，正如科布登已经做过的，法国最大限度地享用了真正的自由所带来的福祉。

曼彻斯特学派倡导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是改善代议制，而是破坏它。代表的责职是把所有特殊的利益结合起来纳入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和政策之中，而我们的激进的改革家期望某一种利益占绝对支配地位，使国家顺从于它。这是一个绝对君主

既成为卫士，又成为傀儡，同时又代替议会的政策，一个与真正的代议制不能和平共处的政策。

没有人能比天主教徒们在该学派的观点进一步实行时获益更多，也没有人比他们在该学院彻底获胜时损失更大。那些运491 用这个学派的成功来反对我们的敌人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反对我们自身时将会产生更致命的后果。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不仅在教会的物质利益，在道德情感，而且在更高尚的动机以及人的灵魂中神圣的痕迹的系统破坏方面遭受重创。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被迫在世俗权利与精神优势之间、在此世和彼此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我们会发现我们将是这样一个党派的最凶猛和最强有力的敌手，这个党派在一个时期是我们最大的施主，而从此以后我们与它再也无法共享一个单一而肯定性的原则。

意大利革命

革命使意大利统一进程向前推进一步。在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经人民投票，中部意大利合并于皮埃蒙特。为了继续占领新的区域，维克多·伊曼努尔在佛罗伦萨受到热情的游行群众的欢迎，在此过程中，曾被掩盖的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提亚旗帜被挥动；这证明统一工作只做了一部分，并向仍然存在于意大利的外国力量显示，他们将很快受到攻击。攻击果然在最虚弱之处开始了。

3月，从巴勒莫开始，西西里发生了暴动。它的临时领导出自1848年以来那些和政府对着干的满腹不满的贵族之中。无疑，不管意大利政府的事务带来怎样的成功——这种感动来自虚弱的奥地利和皮埃蒙特（如果不是法国）许诺的帮助。仅仅出于国内的原因，起义也会发生。

1829年4月16日，最有名的王室复辟者、时任罗马外交官

的夏多布利昂在给外务部长的信件中就那不勒斯说了如下的话："西西里两岛的政府确实已极受污辱，……他们视广泛的不满，时代的产物，新旧社会间的、衰老制度和年轻力量间的冲突为阴谋。……边境线上的海关不能再将自由从奴役中区别开来。一个人不能在河流的一边由于某些原则被吊死，而在另一边这些原则却被认为是神圣的。"在接下来的一年，已故的费迪南国王继位，路易·菲利普告诫他需要一部宪法。他回答道："自由是波旁王朝的死敌，在我这里，我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路易十六和查理十世的命运。我的人民遵守和屈从权力。……感谢上帝，我将带来繁荣和恰到好处的管理。我的人民现在连想也不用想，我将会照料他们的福利和尊严。"他为了物质利益而统治。在他登基时，领地上的道路总里程是 1506 里，他增加了 4500 里，他为改良港口、恢复土地付出了巨大劳动。尼古拉一世是他的榜样。他禁止思想，认为只有物质存在才是人的基础，在精神领域里充满了对宗教和政府的危险因素，他自己疏远了所有在好坏两方面有更多追求的人。人民被普遍有效地降低到满意这一体制的层次。那些靠日常劳动谋生的人除了考虑谋生的方法外很少为其他思想所动。如果这些方法被充裕地提供，他们没有闲暇做其他事情。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对该体制压迫特征感受最深的，主要来自受教育的阶层——贵族和教会。前者是政府主要的敌人，后者是其主要受害者。没有什么比对教会的态度更能检验政府的特性的了。新教政府会排斥它或因宗教原因迫害它。但它与天主教政府关系的变动完全依赖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从政治上说，没有理由责备天主教国家拒绝给予少数新教徒以平等的地位，或新教国家拒绝给予少数天主教徒以平等的权利。国家在宗教方面的缺陷不仅与政府的真正概念相一致，而且是它的基础，如果这些缺陷是建立在教徒

492

的人数的不对等基础上的话。例如在西班牙或瑞典，因为宗教感情或政治便利的缘故某些限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统一的宗教存在的地方，统一性的维持既是宗教责任，也是公众利益。否认这一点是荒唐的 宗教自由不是政治学原理，而是宗教差别已对政府造成威胁的政治疾病的疗法。然而，排除一个宗教或对它进行抑制是两个截然不同问题。我们不能把瑞典法律中反对天主教和瑞士新教在商德同盟时期的做法，或者尼古拉一世对立陶宛叛教者的严酷镇压等而视之。在一个全然是天主教或新教的国度里，宗教上的不宽容并不必然与国民自由不相容。在一个不同宗教信仰共存的国度，宗教的不宽容暗示了政治上的专制。但在一个全然天主教的国家，教会被剥夺独立地位则是政府的错误理论带来的确定的最明显的特征 因为绝对和教会自由对立的、必然与之相斗争的惟一体制便是武断的权力体制。天主教国家里的教会自由只有联结别的自由权才能得到肯定，而且，它仅仅对那些以相似的方式置政治独立于危险境地的政策而言才是可憎的。因此，天主教从新教那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要比从天主教政府那里受到的不公正更能忍受一些。因为在前者，至少其他方面是自由的，而在后者他们则受到整体的压制。此外，他们从宗教异端和无神论者那里受到的苦难不具有天主统治者嫉妒式的保护带来的恶劣影响。这种天主教的专制主义的恶劣影响没有比那不勒斯更致命的了；欧洲酝酿的革命中没有比反对那不勒斯王权的革命使宗教更不可能成为最终受害者。教会对革命的恐惧要比对暴政加诸的恐惧更少。然而这绝不是个衡量革命自身的合法性与公正性的争论。已发生的事必须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判断。但我们期望没有表现出允许同情政府介入好坏争论的意思。

一个远比墨西拿海峡更宽的海湾把西西里分成两块。它们

的历史很清晰。从乌特勒支和约至1734年,西西里岛属于萨伏依王朝。当法国据有那不勒斯时,它从未落入他们之手,在英国的保护下,它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为英国的属地。1809年战争之后,预料到穆拉特会侵略该岛,萨伏依宫廷向英国寻求保护。494 在此时期费迪南国王通过武断地征收新税侵犯了古老的西西里宪制,当议会抗议时,领头的5个男爵被逮捕并投入监狱。这次争吵的结果,英国政府指示它在巴勒莫的大臣威廉·本廷克勋爵发动军事行动占领该国,果断地对旧宪制加以改革。应儿子的要求,国王暂时退位。本廷克重组了西西里军队,9个月内7000士兵出发加入了我们在西班牙的部队。同时这个国家中世纪的宪制按照英国的模式进行了改革。老国王讨厌并抵制这个变化并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权力,在复辟时恢复了在大陆的领地。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了最自由主义的表述(1818年5月1日):"你们重新获得了一个坚强的、明智的、谨慎的政府,人民将是至高无上的(*il popolo sarà sovrano*),国王是法律的受托者,并将构筑一部最强大、最理想的宪法。"然而西西里议会被扔在一边,新宪法被认为不适合国情和太陈旧而被否定。在那不勒斯,国王发现所有事物都被法国在现代专制主义原则下重组了,这种专制主义对全欧洲复辟的君主们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他决意同化王国的两个部分,用那不勒斯为他准备的同一个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统治西西里。

1821年6月21日,威廉·本廷克勋爵在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的支持下把这些事件提交下院考虑。他说,至今,在英国大臣们已经履行了约定,英国军队从西西里撤出后,没有比如下内容更能灭绝权利和特权的了。……伟大的功绩已经和国王废除封建体制联系起来了。实际上,他的观点是去掉仅存的对君主无限制权力的制约。作为回应,卡斯尔雷勋爵竭力主张,与模仿

英国相比,没有一个宪法更不适合人民的才能或不能为他们更有利地工作。总的感觉是,当英国军队离开该岛时,宪制就不能维持下去。这不是夸大其辞,然而,对那不勒斯政府废除新宪法却不恢复旧宪法的政策却没有抵御措施。

495

当烧炭党在那不勒斯拥有权力时,1820年西西里人以相似的方式举行武装起义,要求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但是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就像现在一样,当国家在他们手中时,倾向于增加国家的集中性权力,而不是推进地方的独立。他们派出军队镇压起义以维护法律和行政的统一。在统一问题必须交付西西里国会讨论的条件下巴勒莫投降了。但是那不勒斯国会拒绝批准投降。这表明了至今存在的西西里运动和意大利革命之间的巨大区别。

旧的西西里宪制渐渐成长,如同英国从诺曼征服时代起一样。它带着没有变化的贵族特征,度过了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困扰和革命。甚至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它也继续得到尊敬。纵然西班牙王权下的欧洲其他独立运动经历了难以忍受的镇压,在西西里,征服者和本地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法国革命自身没有在那儿留下任何痕迹,革命的变化仅仅作为恢复王权力量的序曲。因此,当意大利人被革命的思想煽动去攻击合法的君权的时候,西西里人反对针对合法政府的革命政策,诉之于他们古老的法律——它受到许多王朝国王的尊敬。西西里1848年革命是一个民族的抗争,在它的自然的领导者指挥下,支持它的法律。它是贵族和教士而非党派的行动。因此它比意大利其余各地的运动较少暴力与活力。它没有唤起人们的激情,它是自发的、准备较少的受欢迎的起义,而不是一个密谋,对一种明确苦难的抗议,而非追求玄思的目标。它的爆发几乎独立于意大利大陆上的运动,并持续了许多周。它追随庇护九世的改革,而非

二月革命。它的集会口号是"庇护九世和宪制万岁!"意大利革命的首领们从他们自己出发自始至终强烈谴责和他们截然不同的运动。西西里人恳求加里波迪指挥他们,但遭到拒绝。他们的起义不具备意大利的任何特征,他们并不期望意大利统一,他们没有同情共和制。当就废除波旁王朝进行投票时,即刻产生的问题是:王位是交给洛林王朝的王子还是交给萨伏依王朝的王子? 和那不勒斯一样,西西里也没有中产阶级,普通人对已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根据法律——该法律把选举权限制在那些能读能写的人之中——他们被普遍排除在选举权之外。因此组成军队是困难的。那个12年前已失败的意图又回来了,这次则是彻底的胜利,高等阶层人和教士像以前一样参与进来,人民充满怒火地战斗而国外的援助决定了胜局。 496

像那不勒斯那样低级的政府能够解释发生于任何社会的起义,但却不能作为起义的合法的辩护者。西西里政府被证明是非正义的、革命的,也就是暴虐的。苦难和不满并没有赋予人民反叛的权利,因为繁荣和幸福并非是统治者应给予或一个政府必然能提供的绝对权利。政府是这样一种机构,公众和私人权利得以维持,错误受到惩处。现代流行的两个理论,即绝对君权论和民权至上论否定了这样的义务。对于这两种理论而言,主权,无论是君主或人民,都不会出错。在这两种体系中,消极的服从都是义务。两者都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偶像崇拜,都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们树起武力以取代权利,以一套新法规、新的权威基础取代了神的命令。二者都否认至上法律的存在,把公共权威提升到一个人良知之上。在这些不恭敬的体系中,基督教的政府理念很难维持自身。这种理念教导说所有权威都是神圣的,因为都是从上帝那儿过来的。专制主义者说君权才是神圣的,民主派认为只有人民的集体权威才是神圣的。但是国家并 497

非简单地是主权和臣民的对立面，它还是一种权威和服务的复杂系统。现在我们认为所有权力，而非仅仅主权来自上帝。父亲般的权威、教会的权威以及每一个自然的地方权威都同等地享受神圣的认可，每一个在其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都是对绝对的权力的限制。对这些权威的任何伤害都是罪恶的、革命的，无论它们来自其臣民，还是来自外国权威。政府的权力，就像家庭、教会、国会、市政一样，只有在自己的范围内才是至上的。所有这些权力都受政府保护，而不是受其控制。把国家的行为限制在它自己的确定领域，是它们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在这几个局部性权力之中，国家产生了。在它们存在的地方，法律和权利方能够广泛地存在，因为有维持它的机制。当它们在冷酷的专制主义面前消失时，革命的条件成熟了。这时强力成了惟一流行的东西，也成为惟一可以诉求的东西。一个被如此统治的民族不是真正的国家，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尚不能适用于它。它是个专断的、被暴力所抑制的体制——一个法律在其中沉默的体制。

因此，如果主权权力像其他权威一样受到法律的限制，它也服从于同样的责任。但是主权在维护自己权利方面诉之于国家的权力，其余的权力仅仅拥有社会的力量。一个是有组织的，另一个没有。因此，合法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最高权力来负责，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暴力特性。如果和已树立的权利相抵触，已建立的秩序只能被废除。自治是所有政府的目的，它内含着自我保护的权利。当基督教理论不仅认可国王的神圣权利，而且认可每一个有组织的权利，直到丈夫和父亲的权利时，消极服从论和民权至上论同样都是彻底革命性的。这种关于国家特征的观点和绝对政府是不一致的，而且现在就连绝对主义者对之也有很好理解。他们试图打倒那些其权利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所

有亲密与同在的力量。然而,当一种抽象的权威丧失了具体权威的工具,它是无力的;通过那些从国家延伸出来的权力的代理人,专制主义体制取代了地方的权力。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自治,国家取代机关成为一个机器。这种不自然的体制流行的国度暴露出继续革命的倾向。它和自由及自然的政治发展不相协调。像西西里这样的国度,问题只是犯哪一个错误而已。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些希望纠正错误的人有这个权利。 498

很明显,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或投降那不勒斯,西西里人不能把那不勒斯军队从岛上赶走。后者是不可能的。瑞士的已被解散的团队迅速地被外籍军团取代,整个军队处于战争边缘;王国被一个能够有效抵制的障碍从革命的意大利中分离出来。

拉莫里西雷取得了缩减了的罗马军队的领导权,梅诺德,那个在非洲为他服务的人是战争中的首领。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的明显的最大护卫者不能再继续依靠了。最后四个专制教皇表面依靠的奥地利在米兰和佛罗伦萨的领地被打破了,罗马那也丢掉了。接下来的问题产生了,当教皇因其自身原因明显能认同的权力不存在时,天主教徒自发的努力能否总体上有效地代替它;教皇的世俗王位的确立或废除是否必须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控制权相一致。一个热情的呼唤传遍了天主教世界,它发现它的第一个和最响亮的回声来自于那些教皇的而非奥地利的朋友。法国的天主教徒处在抗议的最前沿,在杜普兰罗、拉考代尔、骚伊、孟泰伦波的著作里,惹人注目的情绪自发呈现出来,教皇的事务必须与外国领地的事务区分出来;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同样是神圣的和正义的;甚至在统一的意大利,教皇也可以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法国表现出的温暖同情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更好、更积极的手段。为教皇进行了一次广泛的集聚,包括许多慷慨的有的出自寡妇的捐款,跟着的是比金钱更大方、更有价值

的援助。几千名奥地利、爱尔兰的自愿者蜂拥而入，并很快组成军队、配备武装。5月底以前拉莫里西雷成为领袖的18000名纪律严明部队在罗马和安科纳之间靠近前线的地方集中，能够挑战任何独自从自由军团而来的军事调遣。意大利南部的一个伟大的指挥者的声望严重威胁着撒丁尼亚的计划，他们加紧了计划的实施。5月初，据称加里波迪正准备向西西里进发。那不勒斯政府呼吁英国阻止。约翰·罗素勋爵写信给都灵，反对允许这次进发，写信给那不勒斯，反对国王的政策。他向下院宣布，后面的抗议，作为给那不勒斯政府地位的严重一击，通过他阻止加里波迪出发的巨大工作，是公正的和起平衡作用的。

5月7日。夜晚，加里波迪和1200人从临近的热那亚乘两艘军舰出发。热那亚的守备部队被限制在军营里以阻止大量士兵参加远征。如此履行他们与英国签订的协定，在陆地上为出发的准备，皮埃蒙特政府派出一艘战舰半路拦截加里波迪。同时他们向列强解释说他在全意大利是个太受欢迎、太有影响力的人物，要让因托斯卡纳离心离德、尼斯和萨伏依割让而虚弱，与加富尔伯爵的政府同样无力的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他的事业，乃是不可能的。很明显，他们急于采取的行动得到有明显动机的政策指示。如果拉莫里西雷加强了独断专行的王权，那不勒斯应取得了镇压西西里暴动的胜利。当国内的政府受到前进中的爱国派的猛烈冲击的时候，一个必然的反应开始来自南方，它转变为对可疑的托斯卡纳的公开反叛。事情的发展急待西西里局面的改变。

5月11日。丝毫无损地，加里波迪在马尔萨拉登陆，出现在那不勒斯和英国士兵的面前。那不勒斯本来可以阻止登陆，但英国人的出现使他们惊恐不安。在两次成功的行动后，加里波迪帮助下的起义在登陆后的第11天突然在巴勒莫达到顶点。

守备部队有2万人,但是城市不再宁静了。一支庞大的部队不带着巨大的危险是不能出发的,因为巴勒莫有近20万居民,为 500
5月16日宣布的戒严所限制。两个团因拒绝开枪而被遣往那不勒斯。甚至警察也逃跑了。战争开始后,一些载着瑞士士兵的船到达港口,士兵却没登陆。同时加里波迪获得了从热那亚和里窝那而来的新的增援武装力量。撒丁尼亚的船在夜晚忙于把军需品和弹药放到沿着海滩的岸上。

5月27日。加里波迪坚定地进入巴勒莫,在他出现时,整个城市武装起来,皇家军队撤退到堡垒中轰炸该地。休战之后,那不勒斯军官投降了。国王徒劳地诉诸列强,要求他统治地区的完整得到保证。英国拒绝调解,但运用他的影响阻止撒丁尼亚在半岛增加麻烦。国王随即正式宣布巴勒莫守备部队投降,6月9日,疏散开始,一个9000人的部队仍然占据墨西拿。

加里波迪接着以维多克·伊曼努尔的名义接管西西里,组织临时政府。极为可疑的是,在他们能够把那不勒斯人赶出墨西拿以后,西西里人是否能够容忍皮埃蒙特人政府。至今,教士没有加入反对加里波迪,现在,像1848年一样,他们等待分离。但就在这个时候,都灵政府和被兼并省份的教士之间公开的冲突开始了。比萨的红衣主教、伊莫拉和法恩扎的大主教、在波洛尼亚占据著名的红衣主教韦利亚(他死于5月15日)教职的牧师、皮亚琴察的教士以及其他权贵遭到逮捕,因为他们顺从于开除教籍的法令。同时,一种谅解必须存在于加里波迪(他的口号是"消灭教士")和西西里教士之间。这种谅解证明政治冲动怎样越出了意大利宗教感情的范围,对教会的憎恨如何取决于它的政治立场。

法国在这些事件中不是引人注意的。法国部队忙于撤离伦巴第,占领萨伏依。同时,政府声称欧洲会议批准吞并,发行半

官方手册，以准备攻打俄国和英国——就像它以前宣布和奥地利以及教皇战斗一样，它们都受同样政策的指导，是同一计划的一部分——把加里波迪送到西西里，允诺领导法国和统一的意大利的联合力量，抵抗德国和其他的联盟。

6月15日。拿破仑皇帝到达巴登会见普鲁士的摄政王、四个邦的君主以及另一些当政的君主。他在德国受到德国人的恶意接待，引发了与会国王原以为子虚乌有的、有组织的示威，并引发了摄政王和奥地利达成事先没有丝毫准备的和解协议。

西班牙

最近几个月构成西班牙宪政史的重要时段。受支持的对外战争走向胜利的终点。西班牙王室正统派的反叛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正统派的王子放弃对王位的要求，当伊莎贝拉王后看起来拥有未来时，王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我们趁此机会就这个问题提供几个例子。

得士安的陷落对摩洛哥战争而言没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促使西班牙领导人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引导摩洛哥的战争派坚持延长抵抗时间。常备军没有被征用，抵抗西班牙人的义务没有了，他们穿过了该省的大部分居住区。为了迎合这个党派，需要一场新的战争，在接受西班牙的和平条件之前，马利·阿巴斯决定为保卫丹吉尔展开另一次战斗。3月23日奥唐奈从得士安出发去丹吉尔，在同一天受到了摩尔人的攻击。虽然损失了1700人，战斗中每一次胜利都在西班牙人这边。摩尔人决定谈判。

当西班牙军队忙于非洲事务时，巴利阿里群岛的总督奥尔特加将军和他的军队在西班牙登陆，宣布自己为唐·卡洛斯。他被自己人抛弃、投入监狱并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射杀。王室正

统派长时间蓄意利用奥唐奈的困难局面试图举行新的叛乱。奥尔特加曾到达巴黎准备此事，而且孟泰莫林伯爵也从那不勒斯到那儿，试图将自己置于运动的领导者地位。当预料到和平的情势使他不受欢迎时，他期待着奥唐奈的回来。很明显，如果战争胜利的话，他就能够收获胜利果实，王室正统派便丧失了幸福的机会，因为伊莎贝拉王后的王位还没有为国外军事胜利的荣耀所巩固。奥尔特加诱使他的首领同意在奥唐奈离开非洲军队的情况下让他自己尝试一下。在正统派领袖加布雷拉和埃利欧返回伦敦后，考虑到事情将会拖延，这个决心迅速被采纳。他们在西班牙的朋友对计划变更没有丝毫准备，奥唐奈的权力在4月21日得到了巩固，孟泰莫林伯爵（唐·卡洛斯）和他的兄弟在邻近托头萨的地方被捕。 502

5月2日。孟泰莫林伯爵在监狱中签署了放弃对西班牙王位要求的法令。然而，它不包括承认王后权力的表述。西班牙觊觎王位者被严格地监管起来，不得与朋友交流。他只同意签署这些为他准备的文件，目的是救埃利欧和他的党派里其余被抓起来的人。但据条约该法令只有在他获得自由和从西班牙退位后才能生效。然而，他刚获自由就遭到王室正统派反对他退位的抗议，否认他有此权力，同时否认该法令的权威性。孟泰莫林伯爵的第二位兄弟，唐·朱安·德·巴蓬一开始反对奥尔特加的计划，但是当他听说这样做已不可阻挡时，就离开英国加入其中。然而在他到达西班牙之前，奥尔特加就被抓了起来。他回到了家中。他向王家发表了声明，反对他哥哥（唐·卡洛斯）放弃他的家族权利的行为，宣称支持他们——即使他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而非流血与战争——使西班牙人民重新回到合理的秩序之中。

西班牙宣布大赦所有宣誓拥护皇后的人。它向世界证明王 503

室正统派并不足惧,已经一落千丈。在证实这个观点时,王后5月25日对王室讲话没有暗示唐·卡洛斯退位的内容,王室决定不考虑唐·朱安的信。但是奥唐奈坚决反对废除该法令,依据该项法令,王室家族的年轻一辈要从西班牙流放。他称这会为王位和王朝会带来很大危险。

王室正统派的要求建立在极端正统派的观念之上,他视公众为私法的一部分,使西班牙的国家法律及其若干世纪的实践屈从于统治他们的国外王朝的统治习惯。在他们的理由中,没有一条权利原则,他们当中的觊觎王位者也没有人同情。但是基督党展示了现代自由主义所有丑恶特性,明确反对以前的西班牙和它的宪制中的合理部分。在加布雷拉战败后的几年,1839年,长久和解的希望几乎成为泡影,国家被敌意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敌对搞得乱七八糟,像以前被基督党和正统派搞得一团糟一样。和平并没有治愈战争的灾难。我们只要引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西班牙人在10年前对他的祖国的描述就足够了:"社会中最腐败的现象和最腐败的人出在中产阶级,我们就是他们的代表。你没有看到那些手中拥有权力的人在叫嚷欢呼吗?……偶像崇拜是大多数人的自然宗教,尤其对那些通过革命而腐败的人。不仅情感上腐败,而且观念上也堕落了,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历史没有一个时期的智能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堕落。……国家迷失了,彻底迷失了,不可挽回地迷失了,那个至今保持秩序的温和的党派,在我看来肯定已疲惫不堪,在普遍解体的运动中失去自制力。……西班牙回到了过去的路易·菲利普时代晚期,处于二月灾难的前夜"。[1]

同时,一位天才的法国经济学家布朗基在西班牙旅行,他如

---

[1] 唐纳索·科特斯:《著作集》,第1卷,第416、420页;第2卷,第140、162页。

此写道："嘘声取代了修道院，士兵取代了教士，但没有人想到劳动者和生产者，那些以前依靠宗教团体救济金而生的人现在从政府领取薪水。没有贵族，没有教士，没有第三等级。"1850年养老金为1.36亿里亚尔，1854年上升到1.62亿里亚尔。国内每个办公室都有几个名义上的占据者，苏亚雷斯、艾斯帕特罗、奥唐奈等等一连串的奴才，他们领取半份薪水。以同样的方式，每个区域都有几位军官，每人管四五个殖民地，奥唐奈自己在几个月内任命了58位准将，142个少校，238个上尉，以壮大自己的派系。 504

在西班牙实行宪政的25年里，有47位大臣会议主席，529位大臣，这种议会的无政府状况现在结束了。最近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它的力量来自领导者的精力、运气和旧派系的解散。与罗马长时间争吵的结束迎来了西班牙教会的快乐时期，所有物质部门近来取得了非凡进步。布朗基1850年写道："我确信西班牙的未来，如果不是更辉煌，至少比已逝的光荣时期更稳固，人们认为她是一个精疲力竭的破败的国家，然而那只是管理太差的缘故。"

1846年西班牙人口尚不到1200万，现在它超过1600万，1855年死亡率是1:33；现在是1:38；1768年教士人数是21万，现在是4.4万。人们的宗教秩序消失了。教士的财产曾遭到政府的没收，加起来有2400万镑。到1859年8月25日制宪大会时，教会反而有了无限制拥有财产的权利，而且保证教士每年从政府那里得到报酬。在西班牙全境，目前百分之十四的土地没有耕种，甚至现在农产品的产量也是消费量的2倍，每年酒的出口量几乎是产量的一半。农产品的出口量在1858年增加到1000万镑。1855年进口额是671993640里亚尔，出口额488690949里亚尔，1857年，出口增加到1555375013里亚尔，进

口增加到 1168584599 里亚尔。1850 年西班牙下港的军舰有 505 2567 艘,1857 年是 4719 艘。1850 年出港数是 2198 艘,1857 年是 4483 艘。1850 年外国船只入港数是 1911 艘。1857 年是 4944 艘。外国船只离港数 1850 年是 2072 艘,1857 年是 3292 艘。前者的吨位 1850 年是 303742 吨;1857 年是 429659 吨。后者 1850 年的吨位是 270232 吨,1857 年是 790333 吨。学校从 1855 年起增加了 3500 所,有一半孩子仍然因没有足够的学校而无法接受教育。

很明显,经过长时间的试行,教会很快恢复了对人民的有益影响。这在以前她最繁荣富裕时也没做到。因为她目前拥有的影响力仅属于自己。除了人民的宗教信仰之外没有其他杂质。以前这种影响部分是从财产中获得的,部分从国家的帮助中获得——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而获的报酬。唐纳索·科特斯说:"上帝使民族获救;这不是阴谋,而是真理,是治愈他们的神圣品性。"

俄国农奴解放

要把俄国政府为完成一场变革而做出的努力浓缩为明白易晓的通报且限制在我们编年史月刊的篇幅内,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变革之巨既超出西欧人的眼界,也比美国的政治利益依赖其中的废奴问题更加艰巨。它的进步只有通过收集相当长时期内的事实和事件才能理解。这次运动是缓慢的、沉默的。如果我们等待危机自身的出现,可能是白等。

在其文明之途中,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的环境下经历其奴隶制时期,俄国这一过程仍在进行。因为自由是一棵成长缓慢、成熟很晚的植物,仅仅属于那些已达到它们的黄金时期且尚未接近腐烂的民族。这个如此广泛且明显无法避免的制度,是不能

简单地视作罪恶或错误的，而且，绝对地责骂它就像抱怨儿童不能自主一样无济于事。只有对成年人来说，无助和孩子气才是可鄙的。奴隶制只有在它是人为的时候才是罪恶。在社会的特定时期，它是自然的和有益的。在文明的历史上，它标志着迈出野蛮生活的第一步。那些在最底层的奴隶没有固定资产和流动 506 资产，既没有房屋又没有土地，如同北美印第安人的猎手，战争中没有营房，保留奴隶仅仅为了折磨他们。印第安人不能保留自己的俘虏，因为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俘虏没有用处。当犯人像他的主人一样武装起来时，他实际上是自由的。如果被夺去武器，主人自己就得养活他。这些野蛮人既没有足够的财产也没有足够的人性来采纳奴隶制。在资源缺乏时，他们的女人实际上被降到奴隶的地位。因此，在文明生活的一段时期，奴隶制是最不自然和最暴虐的魔鬼，在另外一个时期，它是一种进步和幸福。

奴隶制在人们开始定居和耕地时兴起。土地是惟一的财产；一无所有者的生存依赖于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前者所有的惟一交换物是其劳动；为了养活子女，他们的束缚成为继承性的。被奴役的人耕种土地，所有者就能显示更高的关心，很好地照顾他的妻子和孩子，使他们享有同样的自由，这在文明进程中前进了一大步。奴隶制是劳动分工的开始和呈现出的第一种形态。在最初时期人们很少感觉它的压迫性，它很少被滥用，奴隶主很少具备为防御奴隶复仇的保护措施。只有当我们拥有自由意识时，我们才感受到我们不曾拥有它。当奴役变得不自然时，不满产生了。一方面的苛刻要求在另一方面唤起了补偿的愿望。接着，自由和宗教思想被唤起，人们像美国废奴主义者一样争论说奴隶制是错误的，根本不符合基督教义。当新的理论形成以适应事情的变化时，教会到9世纪才考虑这个问题。当需求增加

时，劳动的报酬越来越高，人口愈发稠密，奴隶制的优点减少了，奴隶劳动效率低，总体上不适合高级工业。哈克斯豪森说，奴隶很少被他们所有者的工厂所雇佣。他们被派出去自己找工作，向他们的地主交税(*obrok*)，这些人发现别的奴隶主的奴隶的付薪劳动比他自己奴隶的廉价劳动更有利可图。这些野蛮人的负担把奴隶提升一级，资本和机器使他总体上无用。亚里斯多德

507 说，如果梭能织布，竖琴自己弹奏，那么设计师就不需要用人，奴隶主也不需要奴隶[②]。塔克计算出，奴隶主的利益取向导致农奴解放由人口密度决定。当每平方公里有66人居住时，奴隶制就不再是一种好的经营活动。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开始于每平方公里40人。当每平方公里92人时，奴隶制终止了。在俄国这个数字仅仅是25人。在广大的无人居住区，该数字并不均等，废除农奴制存在很大困难，因为同样的措施必须在经济情况和利益差别很大、政治发展处于多个不同阶段的地区同时实行。虽然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像俄国那样具有强迫特征的农奴制，但是它的废除几乎在所有地方都需要剧烈的政治动乱为其作准备。在法国，奴隶解放是1789年的任务之一。在普鲁士，它是1806年的灾难，在奥地利，它属于1848年革命。在那些没有强大而持久的压力的地方，废奴运动总体上是失败的。在俄国，这种压力主要由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俄国农奴制是基督教世界里最后剩余的奴役情形，也是它在俄国诞生后的最新情况。

和所有的游牧部落一样，斯拉夫人最初定居在欧洲的土地上时，个人也是自由的。当农业生活开始时，在天然的进程中，较大的业主试图使那些财产较少的人依赖自己。据说对较富裕的阶层的这种倾向的第一次反抗是基督教的引入。*Krestiane*

---

② 《政治学》，第1卷，第4章。

（基督徒）仍是对远离城市的农村人的称呼。在多位留里克王朝仁慈的国王统治下，乡村社会是土地的所有者，个人是自由的。他们向贵族集中交纳贡金——这些贵族对个人要求并不严厉，当他们越出权力范围时要受到人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妨碍；后一种权利对贵族权力是很不利的，它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们，虽然它没有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从未扩展到自己的领地之外。迁徙权利被普遍推行，它成为人们防止地主权威增长的手段。沙皇在民族独立战争中获得的统一的权力建立在自由农民的忠诚基础上，他们视沙皇为反对贵族和鞑靼人的保护者。君权的力量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贵族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普通人的权益受到谨慎的尊重。留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个沙皇，尤其伊凡雷帝，是历史上记载的最残暴的君主，但是他的残忍和暴力是针对贵族的，而非针对人民，即他的工具的。贵族限制和分割了沙皇的权力。在大众传统中，伊凡雷帝就像我们的直率的哈尔大王，他是个性格开朗的王子，一个喜剧家而非令人敬畏的人物。在他的时期俄国农民大部分是不受压迫的，当留里克的最后一代去世时，贵族有了反应。贵族派将他们中的一位推上了王位。胜利的贵族的第一个法令是废除曾经是他们权力障碍的、人民自由保障的迁徙权。在1602年圣乔治日，每位农奴都被不可分离地束缚在他目前居住的地方。他们开始成为*glebae adscripti*，最温和的奴役形式，在现存社会状况下通过保证耕作使土地增值的必要条件。俄国贵族的反动在其他地方并非没有先例。在波希米亚，农奴制到14世纪彻底消失；在拉迪斯拉斯二世统治下，处在优势的贵族恢复了农奴制。在匈牙利，从12世纪早期开始废除农奴制，1352年也取消了迁徙的权利。 508

鲍里斯的法令使农民彻底依赖地主，没有任何反抗压迫的资源。但是他们的个人自由名义上被认可而且村庄继续享有它

自己的土地财产。他们建构起的一种纳贡的公社体制很少受到贵族损害。他们的体制是俄国生活的伟大特色，解释了一种沉默状况——人们与这种沉默状况一起忍受了一种严酷的暴政。个人自由、权利的观念自身甚至和文明的进步一同发展。在较低阶段上，个人很少被考虑，他们仅仅在集体的包容之中行动。国家只与团体和组织打交道。因为当国家只推行很少一些维持社会存在必需的服务时，社会被迫为此目的，在自己的等级、共509 同体、法人和其他自然组织中提供自己的工具。最高权力仅仅被用来保护国家避免外部危险，自然地，为了最大限度适应执行此种功能，君王常常是社会中最有权力的成员。超过这个功能，他只拥有很小的权威，并不干涉内部事务。很难说地方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或国家是分离的地方社会的联盟。但是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也很少实施自己的权力，为个人提供其地位的团体也就自然对个人拥有巨大权威。这是中世纪社会的特征，也是执行如此重要功能的机体要求相应权利的结果。这中间主要的是土地所有权。最直接的所有者仅仅享有它，是 *dominium utile*（领主）。当他去世时，他的地产就归公社。当游牧部落定居后，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有同样的权利，因为"公地"是公共财产，土地被共同拥有，每个人得到了分配给自己的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称这种体制为公地，在英格兰北部，在合伙保有的名义下，它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它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理解——所有斯拉夫族尚未完全拥有——通过教育、财富、劳动分工发展了的时候，虽然还有剩余未耕的土地。在这每方面，俄国仍处于发展中。这个体制显得如此自然地适合该国，对它的偏爱独立于所有选择它的国内原因，以至于德国殖民者在萨拉托夫也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自己。俄国的许多爱国者把他们对国家政治改造的希望也寄托在这种体制

上。它包括地方自治的成分，因为它的事务经长老会议选出的领导管辖——他们控制他的行为，分享他的权威，甚至有罢免他的权力。但是在这个体制中，个人自由的理念没有得到体现，除了破坏整个社会组织之外，自由是无法被承认的。它鼓励专制而不是通过使它更易被忍受，通过破坏事事依赖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而制约专制。它也是王权打破惟有贵族享有的制约王权力量的途径，是贵族使农民变为农奴，使自己有了依附性的手段。

实际上，这个社区体制经济上和政治上一样有害，当它因为财政目的而存在时，解放农奴更难获得。它和奴役制一样严厉地伤害了农业生产。因为奴隶的劳动价值上低于自由劳动，贵族土地被很糟糕地耕种；因为没有人对个人收入增加感兴趣，农庄的土地被很糟糕地耕种。没有与之相联系的希望和记忆，他的父辈累积的劳动并不属于他，无法保证他自己的土地的成果传给后代。没有个人财产，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需要严格地将农民系在土地上，因为他们的社会交往将他与土地相分离。如果前者变化了，他会对留在自己的乡村一点兴趣也没有，家乡的感情就不能来束缚他。古老的俄罗斯的祸根——曾经发达的游牧习性就会恢复，帝国主要的不发达的土地资源将会比以前生产效率更低。 510

当农民被牢固地束缚在领地上时，他无法逃脱贵族的专制，也不能制约它。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绝对严格的超级结构出现了。贵族运用他们为皇帝征收兵源和钱款的权利将农民降低到人身束缚程度，渐渐获取了支配公共土地的权利。在事情的不规则的反常情况下，彼得大帝趁机使贵族们全部对人民负责，而又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土地的贵族阶层转变为官僚等级制，贵族在取得了对农民的无限权力同时也对他们的生存负责。除了束缚在土地上之外，1723 年法令又加进了农奴对他

的主人的依附。现在地主有权利把他从当地的固定状态解放出来。农奴在向主人——现在不再向他承担责任——付了赎金之后可能被送到远方自己流动、寻找运气。这种办法叫做 *obrok*（赎身）。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措施，但它使整个体制更加低落，创造了俄国的无产者，恶化了乡村社会。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所有有本事的人都外出为他们的主人赚钱，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在家里。起初，束缚是贵族为自己的利益而引入的，但随着君权愈来愈专横，以及不断增加的对他们的勒索和逼迫，他511 们开始越来越残酷地压榨他们的农奴。农奴的奴役状况仅仅是国家专制的结果，现在到了为了专制主义的利益也要废除农奴制的时候了。所有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所做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目的都是全盘破坏贵族的社会影响

欧洲的俄国，它的领土面积有 11 个法国大，人口不足法国的 2 倍，公共税收不足法国的三分之一。虽然有丰饶的部分，国家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农奴制。农奴是坏的和懒惰的工人。伯恩斯托夫伯爵以 1.5 万镑的代价把他波兰领地中的奴隶转为雇佣农夫，他的收入在 24 年内从 450 镑上升到 4000 镑。小麦出产率从 3:1 上升至 27:1。如按同等劳动价格计算，农奴耕地的产量要低于他的劳动。也就是说，比较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耕种土地对国家而言是个损失。但是当国家因此乐于废除农奴制，贵族的安全有必要产生变化。他们的不受欢迎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许多人不敢在家中生活，每年平均有 73 个业主被他们的农奴杀害，贵族和政府因此都赞成农奴解放，但在方式上有分歧。

一排绅士列队在大街上，
吊起来照亮人类，
宅第燃烧成灰烬。

到克里米亚战争时,原先的政策问题变成刻不容缓的事情。有两年时间,贸易和商业被打断,工厂停产,土地荒芜了。人民的整体生活的变化如此之大、如此广泛以至于想要回到过去也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和平以后,一个新时代开始了,社会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根基。到1855年10月,除了东北部政府之外,所有人口都被号召武装起来,获得十字勋章的人被国内法律豁免。512 当农民的家庭被留在土地上时,地主发现无人可用,丧失了管辖权,规定人们必须服役的年限被超越了,其中包括许多尚未达到和已经超过的人们。在1855年,738955人参军,甚至在加入俄国教会时豁免兵役的犹太人——政府发现对他们的军事调遣十分成功——也丧失了这个特权。

比例方面的损失远比军备供应大。从国家的地域与气候,从作为社会状态之结果的低组织与低效率上看,这是俄国军队中经常可见的情况。补充兵源总是农奴,普通战士很少被考虑,惩罚罪犯的方式就是服兵役,加上官方世界的腐败,失败可想而知。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部队有21万人,从6月到12月失去了16.9万人。增援的1万人被派到威尔那,只有700人到达了前线。只有1.5万人通过前线追赶法国主力。1828—1829年,11.5万名俄国人侵犯土耳其,1.5万人回来。1854年战争中,俄国减少11.1万人。在4个月内,40万人死去,在西姆弗罗戈尔,10万人躺在邻国的医院中。

没有人追求和平,帝国的整个资源都花费于战争。一个文明国家不能容忍这样的防卫方式,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巨大改变,甚至俄国也不能忍受下去。封锁波罗的海联盟的胜利使它有更深的感触。俄国所有工业需要的却无法承担运输费用的原材料进口彻底停止了。许多商品的价格上升了五倍。战争开始后,税收每年减少300万英镑,而债务增加到3亿卢布。这些压力

对贵族而言最沉重，战争的持续将会导致他们彻底垮台。政府等待贵族阶层承认和平的必要性，到那时，它会卸去肩膀上承认失败带来的不受欢迎的情况。继续战争既不可能，同时贵族的悲哀和虚弱被用来完成他们以前强烈反对的改革。在巴黎带来的和平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迅速对莫斯科的贵族宣布："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不能弥补与之伴随的邪恶，它已中断了帝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贸易。无疑，没有邻近国家对过去几年政策谴责的声音，我将继续战斗。……纵然运气像在亚洲一样总是照耀着我们的军队，帝国也要因在几个地区保持大量军队而耗尽资源，尤其在士兵来自土地和工厂的情况下。即使在政府驻地莫斯科，工厂也关闭了。我宁愿要和平时期艺术的真正繁荣，也不想要战争带来的空洞的光荣。"当军队回来时，困难产生了，人们渴望用服役换取他们的自由。他们把扛枪的习惯、权利的要求和力量的感觉带回家中。担子落到贵族身上——他们必须为解散的部队提供服务。贵族变得越来越无助，越来越依赖于君主。很明显，必须为恢复被战争打散的社会秩序采取重大措施，迎合它已唤醒的渴望。官僚阶层在战争中受到的精神伤害和贵族的物质损失同样大。腐败被曝光到惊人的程度。经过严格审查，发现战争时被军队管理者窃取的款额超过 1600 万镑。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农奴的权利要求。对他们帮助最大的是财政困难。帝国需要制造新的财富来源。自然地，战后的第一个法令是宣布建设一个巨大的铁路网，第二个是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下层阶级开发工业资源，因为农奴制束缚了生产。这些措施总是被描述成为改善农业人口——他们倾向于解放自己——的生活而设计的。但是一个从未被俄国新闻界掩藏和伪装的事实是：所有这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俄国在欧洲的至上地位。

农奴解放运动在1857年12月2日由公布法令开始，在其中，沙皇授权立陶宛的贵族采取行动征询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方法。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贵族也表达了为同样的目的而听取建议的愿望，这得到政府中多数人的回应。他们征询的方式及指导他们的原则就这样确定了下来。地主收回了整块地产的所有权，农民通过购买，可以获得他的房子和花园的所有权。更有甚者，为了维持家庭生存，只要满足国家和地主的要求，农民可以如其所愿地使用土地。作为回报，他必须用金钱或用劳动来偿还地主。这就是各个政府里的贵族在紧急关头采用的原则。最初的反对意见是，当迁徙的权利恢复时，农民不能被迫耕种土地或者以金钱或劳动的方式偿还他自己的那部分。为了抗击俄国农民臭名昭著的不安分的性格，政府决定购买房屋和家宅应该强制执行。一位大臣说："目的是阻止农奴恶性的躁动和在国家中游荡。"必须在15年中用金钱或劳动偿还。然而在目前，农民视他的房子为自己仅有的财产。对农民而言，这是一个可怜的激励，让他呆在那儿整年为保证他的合法财产而努力工作，而在以往，这种财产是没有争议的。这条法令大大增加了他的负担而没有相应的利益。土地的购买是自愿的，但是房宅的购买是强迫的，没有选择余地的。结果，未来自由的不确定的前景以强迫的并即刻索取的代价被提供给不耐烦的和激动的农奴。当贵族受到损失惨重的威胁时，农民几乎不可能再期望什么了。主要是较不富裕的贵族反对该建议——他们仅仅拥有少数为他工作和偿还贡金的农奴，他们受到破产的威胁。现在，有4.5万地主拥有少于20个农奴。自然地，他们拒绝参加召集起来的会议，事情几乎没有取得一点进步。1858年2月，一个新的法令试图鼓励和推进该项事务以向贵族保证 指定用12年时间给他们审议实际结果，在彼得堡成立中心委员会。几个政

514

府委员会开始热情地工作，在这一年的开始，他们送来报告的主515要部分。没有人反对政府的建议，但所有人被警告解放农奴而没有给贵族以补偿的后果。关于尚在发展中的革命的重要性的普遍感受反映在贵族提出的要求之中，反映在他们的普遍负担上。亚历山大一世曾表达解放农奴的希望，当他被提醒他父亲去世的情形时，他就无话可说了。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解放农奴对国家生存而言是如此紧急，以至于反对派已没有力量。但是解放并未铺开，因为缺乏实施它的所有条件，而政府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就在它要宣布的时候，土地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彼得堡的贵族委员会宣布，如果对农奴的束缚是贵族的叛乱的话，那么沙皇的专制主义不仅是一个叛乱，而且是最近的一次叛乱。他们要求，作为他们将要失去的权利的等价补偿，彼得大帝以前的状况应该全面恢复，尤其是恢复杜马，这个俄国古老的贵族制的国会。几个政府中的代表在秋天集中在彼得堡，拒绝接受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罗斯托佐夫的建议，他们向沙皇要求允许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年年底，一个领头的代表贝索巴拉索夫发表了一个单独的抗议，反对任何未经贵族会议通过的解放措施。很快，他被从首都流放。所有文件中最有教育意义、使人记忆深刻的是政府第三厅的贵族报告："我们承认皇帝的计划必须实现，但是我们需要补偿，如同政府为公共福利做出的那样。因我们须有能力偿还我们以现有的财产签订的合同，至少为了我们有荣誉及良知地结束政治、道德、物质存在。因我们确信，废除农奴制后我们所处的状况将毁灭俄国的贵族，使之成为历史遗迹。"在弗拉基米尔政府中，几百名贵族签署了致皇帝的声明，作为他们的牺牲的同等补偿，要求废除爵位和世袭等级、516在法律面前所有俄国人人人平等、新闻自由、权力下放，选举政府官员、公审判决等等。

许多重要人物都确信，农奴解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在宪制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大臣主席奥洛夫亲王把此当成拖延的理由。和他争吵的结果是康士坦丁大公——农奴解放的最有力支持者——离开了中央委员会。尚在工作的、受人喜爱的领袖罗斯托采夫将军成为保守派强烈反对的目标。在他被邀请的晚餐上，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重大的责任压垮了他。在他生病期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贵族的怒火上升了。罗斯托采夫在2月18日去世。他的继任者是司法大臣潘宁伯爵，一个保守派。这个反动的任命激起了广泛的兴奋。大学成了自由派观点的中心，在沙可夫，学生们为帝国构造了一个宪法框架。激进派和保守派处于公开战争状态。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在第一个团体中没有代表的政府代表1860年9月在彼得堡集会。3月份开始，皇帝对他们作如下致辞："我希望农民的状况不是托词，而是现实，巨大的变化必须有条不紊地完成。你们不作一点牺牲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希望贵族的牺牲尽可能地少。我知道国外有荒唐的报告可能影响你们，说我对贵族丧失了信心。这是谎言和诬蔑。不要在意它，只须相信我。"在中央会议和代表之间重新开始热烈地讨论，每天延续6至8小时。潘宁不再反对所有的措施，而是焦急地通过考虑贵族权利来排除反对意见。

政府的困难不仅在于满足财产要求，而且在于维持君主的绝对权威，虽然它考虑国家一部分的利益和愿望。这就把一个新的原则引入俄国的体制。当只有贵族被征询，而人民——他们的利益大部分吉凶难卜——没有被允许参加审议时，这在程序上明显是非正义的。如果解放农奴法令能像1723年的法令——它使奴役状况合法化了——一样，是沙皇的自由决断，它就有可能善待农民并与国家的传统更一致。害怕贵族阻止和威胁使政府陷入瘫痪。正如人们能理解的，俄国社会状况的改革 517

不可分离地和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且先于它。政府折回脚步或使广泛的期望受挫是不可能的。除了政府被意见削弱的征象外,至今尚没有上述问题。只有当所有的较小的土地和农奴的所有者——反对意见就存在于这部分人之中,因为他们遭到破产的威胁——消失时,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如果小地产被售出,贵族将会获得集权——这是解放运动要破坏的政治目标,但大地产将会使土地耕作的改进更加困难。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如现在一般——将会是俄国侵略力量迅猛增加,而国内没有反抗专制的任何装置或对缺少对野心的任何限制。

三十五、官僚主义与两种政治思维*

518

当我们坦诚极端憎恨官僚主义，或者讨厌集权化政府干涉家庭和个人生活事务，同时却又竭力捍卫和支持政府对那行将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干涉的我们的教育进行检查时，我们的一些读者似乎会感到奇怪。

在此，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完全撇开政府行事，那么我们就会无限度地喜好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们当中所有最明白事理、最有头脑的人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既由于我们的贫穷和弱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和意图。因此，问题是，要尽我们所能与政府达成最好的协议；我们赞成与具有立法和行政职能的委员会合作是完全出于这种考虑。

我们认为，任何一般化的教育体制都具有危险的倾向，它向我们如此担忧和惧怕的官僚主义倾斜，鼓励或助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中的官僚主义原则。因此，官僚主义滋生于教授，不滋生于课堂。单纯的农民阶级，或地主，或商人，不可能存在官僚主义；职业的类似不足以产生官僚主义；互相依赖、互通情报的组织也不足以成为官僚主义。军人政府也不是官僚政治。官僚主义的人必定有足够的文字能力和科学文化，使其能确立对人

* 原题为《评理查德·辛普森的'官僚主义'》，首刊于《随笔》，第11卷（1859年2月），第113—125页。

生的批评与指导，因而适于指导国民的生活。官僚主义不是矫揉造作的人为之物，也不是从子虚乌有中捏造出来强加于人的东西；它是自然生成的，由一大批受教育的职员的创造和组织生产出来的。它是他们社会生活的表述。

519 也许一切政府都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可憎的专制、独裁、苛政及令人厌恶的名目繁多的滥用权力现象；但是，官僚主义思想只有在我们加入了某种宣称能指导我们生活的卖弄学问的成分时，它才算完满地实现。它知道对我们什么是最好的，它衡量我们的劳动，督促我们的学习，规定我们的意见，它向我们的一切负责，为我们包办一切，包括上床睡觉、盖好被子、戴上睡帽等等，连起居饮食都要管理。这种成分倘没有一种特别的信念作支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占有生活隐私的统治权力，它有一种囊括一切的政治科学的真实知识，它的目标是指导一切人或至少一切公民的行为。因此，任何政府都宣告是为人道至善而成立，它以此为定义，为指针，它的一切努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府往往变成官僚政府。

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有许多已变为现实或企图变为现实；律师的官僚主义、神职人员的官僚主义和生理学家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教师的、哲学家的以及家长制管理者的官僚主义等等，其中所有的官僚主义者都有他们特殊的秘方，用他们的灵丹妙药来治愈有病痛的人类，他们都深负某种强烈的使命感，以迫使人类，不管是否愿意，都顺从地接受他们所提供的一切指导和帮助。

律师的官僚主义是一切官僚主义中最为普遍的模式。法律，按照古希腊、罗马和复兴的古典定义，涉及人类的每一种行为；立法者的法定权利，与每一种可能的行为都相关；主体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受到质疑；他们也许滥用，但从来不能超越他们

的权力。这种法治的权威就其没有任何对它的界限的表述而言，是无限的。"法律不命令任何事，但它可以禁止任何事"，亚里斯多德说，"法存在于所有领域。"[1] 又说，"法律应当统治一切。"[2] 迄今，这个原则仍被法律贯彻执行，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法律，那么，据认为，是配不上"政治"(polity)这个名称的。英国在考虑一切行为的合法性、主体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时，若不能制定出一种禁止非法行为的法律，那就会被认为是野蛮的，没有政治家风度的、不科学的。在古希腊和罗马，法律是第一位的，人必须证明他的权利。在英国，人是第一位的，证明他行为非法的责任被推给了法律；没有 *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也就意味着，除了法律所给予的外，没有任何属于政府本身的权力；没有人格化的政府，也就没有固定的选举人献身于这个理想的整体。英国没有《十二铜表法》宣称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人民福利至上），但是坚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原则，*jus cujusque suprema lex*（神的正义至上）；最高法律建立在个体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假定的对政府有利的基础上。 520

然而民法把整个人类都置于它的监护之下，给自己确立世俗保护者的角色。浸透了它的精神的律师正是这种官僚主义者的化身。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比法国公民大会表现得小题大作。罗伯斯庇尔宣称："我们会有事物的秩序，这种秩序得由法律将所有卑劣的、残酷的情感用链条锁上，并唤起所有仁慈的、慷慨的感情"；圣·鞠斯特则佯称，给立法者下一剂猛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道德风貌，改革人类的心灵。

英国幸运的是没有染上这种律师官僚主义的严重瘟疫，但

---

① 《伦理学》，第5卷，第11章、第2章。

② 《政治学》，第4卷，第6章。

她却遭受了来自神职人员官僚主义的许多痛苦，诸如，刑法确定宗教有刺探人隐私的权利(espionage)；清教徒坚持政教合一，仅从《圣经》中推导出他们的"国教"统治，废除教会法、民法、大法官法和普通法及其法庭，只支持他们的较古老的律法和诉诸良心宗教法庭——企图实现宗教审判的刺探活动，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女性的饰品和男性的娱乐，最庄严的神职人员都要加以最密切的关注；查理一世在位时，连同他的大臣劳德、贾克森和斯波茨伍德，他们的高级委员会法庭和星室法院，以及他们的成百上千的政府行为，都受到他们消极地使人们安分守己的单方面愿望的驱动，使每个人保持那种惠受父母般照顾的感觉，他们能比他自己更好地判断他应当吃的、喝的和应避免的。

但是，这实际上是相当于生理学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就像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所梦想的。它足以说明，官僚主义的真正特征就是对它的指导者的亲密信任，他们所作出的规定充分涵盖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整个领域，或者至少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一切其他的规定都是多余的，如果和他们的观念相反或有害，诸如此类，都要尽可能快地予以清除，以便给再生他们有益影响的行动留下宽广的余地。因此、不宽容、独裁、侵略性是所有真正官僚主义的特征，它和粗鲁的军事暴政或警察统治有区别。官僚主义的这些特征，乍看起来，是事物外部的、显性的行为；但在完全发展后，它就用它的秘密警察搜寻人们的内心和思想。就拿战士或警察来说，教育他照管我们的道德，评论我们的意见，干涉我们的家庭安排，那么你很快就教会他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在征兵队强硬而就绪的紧急措施中，或者在新兵招募军士哄骗醉醺醺的农家孩子入伍当兵的行动中，不存在任何官僚主义。但当所有的应征者都已经登记注册，他们的职业和技能就被注意，他们的体能也受关注，他们本身也不时受到

521

征兵机构的影响，那时我们开始觉察，一种官僚机构出现了，把自己混同于家庭，指导国民的生活。

但是这种官僚主义机构只有在它进一步发展，开始干涉人们的活动、通讯、社交、意见和信仰时，才变得非常不宽容。那时它变得像家庭教师或自炫博学的学究，本来只适用于小孩子，现在却用来指导成年男女。它的整体形态是教学式的；它的权力偶像是教师。确切地说，不是过去时代的教师（私立）。那时的教师成为一帮无赖混混、破落户、眼高手低什么也做不好的一事无成者、懒惰的游手好闲者等等的寄生之所——这样一大批材料，既无组织，又无野心，更无躁动不安，因而也无官僚主义的胚芽。

可是这种类型的学监在政府的影响下很快销声匿迹；从内外两方面来考虑，现今"训导型"的教师生活不同于过去教师的生活。就以教师本身为例，教师的职业有三种要素：(1)崇高信任感——培养智慧的幼芽，引导开放的习性；(2)操作的厌烦性，令人厌倦的重复，与鲁莽学生的冲突，烦躁和失望；(3)有待加工的材料的细小琐碎性——那稚嫩的心智，不以它可亲可爱的形式，而以一种令它自己厌烦也令老师厌烦的日常机械的形式来教育——字母、基本常识、简单的思想和词语、初级算术和其他令大多数普通学生及超常学生都不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关于它的外部情况，小学教育的东西虽然细小和琐碎，但却是起步时必不可少的技能训练，这一方面使小学市场繁荣，即便它并未装备良好，但另一方面压抑那些更高层次的教师的市场价值。以 522 上所有这些事情往往降低了小学教师的平均技能；或者限定了这种职业只能属于那一类人，即使他不适合于这种工作，那么无论如何他也不适合于别的工作。在这几种要素里有一种矛盾现象：教师职业的崇高令人对之产生宗教般的信任感，这需要一种

开阔的或宗教的心灵来理解它；另一方面，心智开阔的人又太易于厌憎那种枯燥乏味的单调重复的工作和一些细小琐碎的教学，如字母、拼音和加法等；那种轻易容许自己对这些事着迷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对其职业的崇高性采取一种明智观点的。因此，好教师通常是一个高度原则性的单调无味的家伙，他努力工作是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能坚守他的工作是因为他没有灵智感觉出他日常外部环境的枯燥乏味，他注定了要做这种单调的事务性工作；而坏教师呢，如我们在上面所描述的，常常是那种破烂的家伙，他从事这个职业，却缺乏一种良知，不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只为稻粱谋，受日常所需的食和住的驱动，他之受聘是因为这个行业"容易"和"初级"的特征，只须具备必要的技能和基本常识就可开始工作。

但是，当政府开始办学，按照一种竞争性的考试成绩来付给教师薪水时，这种单调的常规学校制度就走到了尽头。这样的考试仅仅证明了教师的权力或精明，没有证明他们节制这些权力的耐心或意志。而对一个典范的小学教师来说，耐心而不是精明才是第一要素。一旦超出这个基本要素，小学教师就会失去他的学生，他必须重新开始努力。他可能有法定的机会展现他闪光的技能，但是可能性很小；不久他就会感到疲乏，烦得要死，失去耐心；然后，他开始试验新的理论、尝试新的计划，除非他用激情洋溢的沉迷此道来弥补他精神上令人厌倦的苦役；至少他拒绝了献身这种令人生厌的约束的思想；他渴望得到解放，或者提升自己，即使不在他的职业里，也至少经由他的职业而提升；他开始和其他教师交往和共事，和他们一起鼓吹那些理论和计划；他越来越远离那种用同一的要素来指导孩子们快速成功的平淡无奇、枯燥乏味的岗位和职责；他开始讨厌这种几乎神圣的使命感，这使那么多献身宗教的人过着苦行的生活、他越来越

使自己趋附于政府，这唤醒了他由竞争性考试而来的知识野心，523 这又使他坚持不懈地追寻他主要依赖的东西；然后他开始把自己作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作为一名政府的雇员，开始鄙视除奖励他的知识野心之外的一切权威。然后，这里就成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富有影响力的、自炫博学的组织机构；这里有一种政府介入一切领域的现成的工具，如果有莱德律—罗兰出现想用这种工具的话。

根据这种竞争性原则培养出来的学生构成了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另一种危险的因素。教师很自然渴望把他们的学校办成一个对其监察者来说值得信赖的学校：他尽一切可能使他的学生聪明伶俐，培养他们对文化知识的热情；结果孩子们得到一种教育的碎片，这使他们不满意从事非智力的劳动，而抱着坚定的希望要做政府的文员。有一个泥瓦匠的儿子，学习了拉丁文和地球仪的用途后，就鄙视他父亲的手工技艺，决定不走他父亲的路当一个手艺人：他寻求一些“有文化的”或政府部门的职位——书记员、店童、铁路官员、警察、邮递员等等，这些地方他的流畅的笔头和书本学习的知识也许可派上某些用场。然后，这种竞争制度本身的影响便以知识野心置换了那使老师父亲般对待学生们的令人尊重与和蔼可亲的感情，它引导学生们重视他们的知识技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任何实质性的卓越，而是为了它们能赋予胜于他人的权力，能提升他们自己超越原有的层次。而且，竞争中起作用的特殊的学科是那些自身不具有内在的市场价值的学科，不能产生衣食，只不过是未来生命事业中有益心智的准备而已。但是，这些精神性的准备迄今为止在学校被当做实质性的生命事业来对待；有实质性事业生命的地方，也即有官僚的生命。因此，竞争性的教育，正逐渐培养出一大批对官僚主义有兴趣的青年人，他们将在官僚主义的基础上重塑社会，使

官僚机构庞大，以便他们也许能用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技能来谋生。

现在，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宪法权力就是民主的成分，知识的传播持续不断地把越来越多的人带进行使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力的行列中来。一个国家中仅仅选举人的倍增就是迈向官僚政治的一步；这意味着使政府雇员倍增和增加他们刺探公民行为的权力成为必要。例如，法国大革命给了人民普选权，它当然有必要关心同一个人不应当在同一个或不同的选票箱里作伪地投几次票。因此，每一位选民——即每一位成年男性公民——都必须备有一份通行证和身份证，警察得核实所有居所的变更，最后得证明选举人所有的活动情况。选举人的基本情况在他持有的证件中作了描绘，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他可能被要求重新制作一份能说明他当时身份的文件。这里所述的令人厌恶的通行证制度，实是由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而来的一种逻辑结果；可以证明，官僚主义或官僚政治像独裁或专制政治一样，是与增加和增强社会的民主成分相伴随的自然产物。当那些在竞争性学校受教育的青年人构成为数不少的政府雇员阶层时，他们一定会成为此类学校所希望他们最终变成的那种人。临阵磨枪或填鸭式的知识，对所有科学的一知半解，是不用来作为安身立命的储备的：它的真正的结果是一种骄傲自大的无知，精于人心的普通逻辑权力，使其适应一切逻辑进程中最普通的那种进程，发展他们达到最遥远目标的那些原则，但留下来进行真正理性事业的却是十分不成熟的心智——衡量各种可能性，考虑相反原则的干扰，理解作为归纳建立基础的所有事实。青年人那种热切的未发育成熟的心智坚持先验的或演绎的原则。一方面是人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国王的神圣权利，把未定形的理智或思维能力分成两半；稍为老到的青年人即在年龄上或

判断力上较成熟，很快就发现试图用数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决伦理道德和政治的实际问题，完全徒劳无益。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演绎的方法有极大的魅力：它的不证自明、绝对正确，它的可信的普遍适用性，它完全轻视一切否定意见，它组织安排的简易流畅性，所有这一切都使青年学生着迷。这正好处在他的能力的层次上：因为逻辑极少要求外部的援助；它是内在的；它的原则是先天的；它之完美就如青春在其年龄上一样——学得快，用得轻松：如果给他一种丰产的一般性原则，那么，就像泰尔人的牛皮一样，他的逻辑很快就把它切割成许多碎条，足以环绕一个城市。但是，学习，小心翼翼，希望正确，生怕出错，每一步都通过例子和实验来验证其有效性，这样一种学习是漫长而艰难的，不令人惬意的；向青年学生推荐这样一种学习，绝无任何吸引力——它给人留下的是单调、枯燥乏味、费力的印象。 525

然而，这是一切伟大政治家的特征。塞尔登宣称他和他的助手们在制定《人权宣言》时千方百计，竭尽所能。伯克，尽管他在广阔的哲学领域很有权威，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富有才智地根据一般原则来论争，但他无疑是乏味政治的伟大预言家。所有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和律师都具有酷爱事实的特征，他们细心衡量各种权威，提出特别的诉求，他们似乎对原则的逻辑进展表现出犬儒主义的冷淡，他们不在乎辞令、哲学，对天性与情感之最崇高、最令人仰慕的爆发无动于衷。在法律和政治的领域，具有冷静的判断力和清醒理智的人会扑灭所有这样的激情。对修辞家嗤之以鼻，惟独尊重事实。

这种考察将使我们能恰如其分地理解法国人所推崇的、一切普通的心智都同意的理性主张。"我们是逻辑的，"他们说；"我们贯彻原则到极致，牺牲事实服从理性；我们是天生卓越的理性主义者"；而"英国人更为实际，较少理性，他们不思考，或者

不贯彻他们的原则；他们总是对理性体系犹豫不决，从未得出任何简明清晰的结论；幸运偏爱他们，但他们的心智低劣无序。”我们也许注意到爱尔兰人头脑中的法国特征。我们没有忘记爱尔兰人伯克是英国精神的典型代表，我们不能隐瞒在爱尔兰就像在法国一样有很多同样精神的规则，及同样的政治结果。一个民族很像另一个民族，被导向拟人化政府，把政府尊崇为一个人格化的统治者，赋予它生命活力，它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根据它自己的感情和冲动来行动，期望它指导、指引和统治一切事物。他们没有把政府当做一个临时委员会——一种民族性的教区委员会，被选来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与民族情感相应的民族事业，直到公众的脾性发生变化，用代表另一种政策、另一套班子替代他们为止——他们认为政府就是一个提供保护的、无所不能的，因而能解决一切病痛的存在物。由于政府是供给的最大主人，故他们不图其他任何东西，只求在政府里谋一个职位。民族志向就是成为一个雇员：他们不考虑，如果所有的人都被政府雇佣，期望政府供养他们，那国家将如何进行下去。他们逻辑地推论出政府的首要和最简明的观念；他们没有反思这个观念，分析它，调整他们尊重它的感情。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这就是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制度中肤浅而自炫博学的半文明状况——磨利了理智而缺乏实践的判断力；这似乎自然地适合于新闻记者、才华横溢的一边倒的撰稿人、特约通讯员、广播员、低稿酬的雇佣文人及几乎一切二流的文化的职业，但是不适合于大帝国对事物的看法，讲究命令、联合、公正及最高水平的哲学思考，直到通过艰苦的劳动和长久耐心的哲学思考，最终把缺陷完全消除为止。我们的邻居法国自吹自擂的理智的卓越才是真正低劣的，因为无文化的英国人所接受的实践的教育，其结果，比法国文化的夸夸其谈的文人要更接近于最高明的学问，法国文化仅能使一个

526

人在整体和其部分之间作逻辑一贯的推理，使他穿上半真理色彩的褴褛衣衫，而看不见他自己能力的局限。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是法国人独有的；给不具读写能力的英国人以法国文化的教育，他很快就会具有法国人的思想。

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官僚主义的最纯粹和最强烈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在那里政府机构被当做一切事物的目的——人类的至善；在那里人类仅仅是一种被统治的、可自由支配的动物，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和富有神秘性质的一系列报告、命令、告诫及警察规定打交道。那种只具理智而不懂实际的半文化人从来不知他的无知；他认为他无所不知；换句话说，他是把略微知道的东西等同于无所不知[3]。比如他略懂一点行政程序，他的想像便使这些程序肯定自我表现成世界上最庄严和最重大的事物。它们将成为他的宗教，而且远远超出于他的宗教；当他的职位还提供他衣食时，那时对利益的所有热情都要谋取此职位的支持，官员们将抱成一团，官官相护，把他们的职位提升成这个世界的伟大的先知和社会的制度。 527

如此推崇他们职位的人总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们以一种热切的、宗教般的狂热恪尽他们的职守，以确保最富激情的活动。因此，官僚主义精神获得了政府部长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发现他们的工作由于下属的热忱而变得简明和通畅。这种依附于官僚政治的车轮的轻松愉快是妙不可言的。官僚们对他们自己的部门了如指掌，这是过去时代我们蠢笨的业余教区委员、教会执事、法官、郡长和立法者们所无法领略、无法企及的。想一想

---

③ 塞尔登因此对大主教劳德的官僚主义机智地说："主教们现在'由于他们的博学'而不适合统治。他们受另一种法律制度熏育；他们探究经文，钻研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而不关心英国。这正像一个人想要一只水壶，他却不去我们的铜匠那里让他们制造——只而是去哈兰人那里制造黄铜器皿，去装饰所罗门圣殿。"

一个不太懂法的委任官如何用他的权力训责猪脑袋的监护委员给无家可归者救济，以不让这个可怜的人亡命街头 又想想他假如得到三种优势权力：高级的职位，精通法律知识，对行政实践的细节和技巧娴熟自如，那么，这时他就会像一个专家训责一群新手，像一个海员训斥一批旱鸭子，像一个旅行家训责一帮没有旅行经验的乡巴佬．每个人都有权利尊重他自己领域的事务。部门的分割使我们的官僚把他下属的各个分支的大权集于一身；他对各部门分支的大概情况了然于心；他很快和领导委员会成员，或其他一些拿薪水的终身官员达成共识，用非常少的机敏手腕就使一切事情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没有什么能阻挡他，除了时而有一些退休哲学家的深淇的科学知识使他为难外，他把所有政治部门的总的看法置诸一边，降减官僚们的自命不凡到适当的维度，他能紧紧抓住他最熟悉的方面或情况，维持他反对别人甚至精心准备的理由或论据；然后进行讨论、公之于众，对那些过时的令人生厌的行政程序作出修正。

但是，随着政府权力增大、需要被管理的阶层增多，行政机关必须同样增加，公职人员的人数也必定越来越增大，他们必须被组织起来，他们必须管理的事务一定要和他们的组织对人民的分类保持同步。每一个部分将逐渐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亲密合作的关系，询问、登记、报告：首先仅仅涉及我们纳税的能力；然后涉及我们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状况；很快我们被问及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情况——我们可以确信，他们所询问的，如果他们

528 敢，就会是对我们的干涉——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敢，他们就这样做。当士兵进入兵营，或贫民落入贫困区，或犯人投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就询问士兵的，或贫民的或犯人的宗教信仰。那人从此真正有了自由，皈信他喜爱的宗教，他享有我们的宪法和我们的法律向每个公民保证的那种自由吗？或者，他受政府职员管

理——他们迫使他安分守己，而不给他们添乱从而需要改变档案登记吗？更下等的阶层已经被官僚主义地管理起来。官僚主义无孔不入，一个异想天开的制度政治家也许某天会心血来潮，把那官僚主义的钉子楔入社会更深。

假想官僚主义制度仅仅在君主制才是可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能逐渐产生于每一种政治形式下，它提供政府专制独裁的每一种形式。一个有无上权威的人，是他所是，独意孤行，而不管他如何得到这种权威，是通过世袭的，还是受士兵的刺刀拥戴的，或是普选权选举出来的；他的晋升之路具有某种偶然性，他的职位起了积极作用，他的本质在于他是一个统治者。不论什么保护措施，对任何权威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一切权威而言是必然的，我们从民主权力的扩张中遭遇的风险绝不会少于来自君主制或贵族制的危险，这是那些喜欢干涉又尽可能联合以控制独裁权力，以便无人能干涉他们的干涉一切人的共同本性。有什么能比攫取、控制绝对权力所意味的更清楚呢？有什么比绝对权力应当积极地维护它的绝对专制更合逻辑的呢？这就是前文述及的那种半文明人崇尚的一种逻辑，他将因此把那种有名无实的权力真正落实到某个地方，将把整个的权力都堆积到人民或者君主独裁者的头上。因此，通过官僚政治，人民或者君主变得同样专制；它把专制权力拱手交给它服务的无论什么政府。瑞士共和国和德国、撒丁尼亚的宪法，他们的政府和法兰西帝国一样专制，因为所有这些政府都是官僚主义的。

官僚主义在其强有力的时候，从本质上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是逻辑性的；也就是说，因为它根据一般原则的文字上的发展前行，而不是根据经验和事实的实践之路前行，从而导致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和立法保障的人民的习惯不一致。官僚们根据变化了的利益和形势把一个阶级分离出来，然后又把其余的阶级

再分类，以不致引起太大的麻烦，同时增加对他们的责任，以便在工资及增加工资的精额上可向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它总是沿着独裁的路线，根据算术的原则，而不是人的原则，一直改变着人民，对他们进行一种人为的分类；它不考虑或不重视人民的历史和习惯——它应当知悉什么习惯和历史？它的惟一的目标，就是不断发现新的干涉人民生活的方式，为官僚提供更多的工作，从而使人民更完全地永远服从其统治。

官僚主义对政府的领导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的权力不寄存在任何个人中，而存在于制度中；官僚，这个复杂的组织，是至高无上的，它有领导与没有领导照样进行得很好；领导依赖于它，而不是它依赖于领导；他下台，另一个人就会接替他的位置；但是不管谁来接任，都必须利用这个现成的组织——他不能没有它而进行统治，但来不及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他不得不采纳这个唾手可得的官僚制度。因此，大凡领导都显现出一些憎恨改革倾向的症状，不得不担心官僚主义成为他最致命的、最革命的敌人。

那么，如何防范这邪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毒而诱人的倾向呢？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抵制政府干涉我们生活的范围，尽可能使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保持独立；绝不同意政府拥有一种凌驾于某阶级之上的权力，也不希望这种权力凌驾于另一个阶级。决不赞成一种对他者不公正的法律，以免将来某天它反转来对我们不公。对一种独立制度的必要的不完备性和滞后性保持耐心，让权力的各个部门互相牵制而保持平衡；坚持不懈地坚决反对每一种中央集权化的伟大企图，比如像低级平均主义的、监护委员会责任的保姆式中央政府，不论它也许承诺我们什么利益或便利作为交换。这一类公职人员必须减少。因此，我们对竞争性考试并不乐观，一者它鼓励我们获得的知识技能在

将来要做的工作派不上用场，二者它提供我们一种浮躁不安，分割年轻学子的身心；而古老的制度留给我们和平安宁，我们根本不必为确信没有能力了解，也无野心了解政府向我们承担的永久的日常的责任之内容而担忧。公职人员应总是服从于公众，530 对他们必须做的行政事务，每一种有损形象的无礼行为和渎职行为都要受到处罚。遇到争论时，法律，*Primâ facie*（看起来）应总是假定或预设公众人员是错的，或至少应完全公允地保持平衡。当然，他们必须对他们的上司负责，但是，无疑，应是站在他们和公众之间的上司：一旦公众无权诉讼官员或公职人员，除非得到他上司的同意，那么，一个真正的官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再者，公职人员不允许建立秘密社团性质的共济会制度，他们绝不能作恶多端；而一切反对他们的抱怨和行为必须是公开的。最后，我们若还未驱除我们公众人物中那种教条主义的或空谈理论的精神，那我们就永远不会在官僚主义制度下感到安全，这种精神支配着边沁、巴克尔和布赖特[④] 这样一些革命

④ 我们惊奇竟然无人注意到，伯克在《新辉格党致旧辉格党人书》中所引证的《1791 年英国革命俱乐部宣言》和布赖特先生《伯明翰纲领》二者之间，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奇思异想上，有绝对的一致性。俱乐部宣言声称"尽管已经谈得很多，但还没有宪法这样的事物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人民的宪法迄今尚未成形；自从威廉统治这个国家以来，还从未自我更新，因此没有一部宪法：不可能以一种鲜明的形式产生宪法的地方，不可能有任何宪法。……英国政府的一切事情都与它理应所是的样子相颠倒。……战争是参与分割和花费政府财物的最普通结果。……无论我们以前或以后，侧面或正面，隐蔽或公开如何看待贵族政体，它现在仍然是一个怪物；……世袭立法者的思想就像世袭数学家的思想一样荒唐；……长了世袭制的法律反对一切自然法，自然本身要求它的毁灭。"众议院是"愚弄、凌辱、篡夺；不是产生于人民的天赋人权，就像法国国民大会那样"——等等。确切地说，布赖特擅长的常常是他自己的那些言词。伯克则接近于蒂米，是上面那种政治理论的伟大破坏者，因此他被我们的革命作家诋毁为疯子；直到 1790 年，巴克尔先生自称他是英国曾见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从那时开始他的不朽的思想仅仅是个疯子的狂泄，他的论据是刻板者的偏执，他的政治原则是一种幻觉。

家——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从统计学的角度，总体地处理人，而不是把人作为个体来对待；或者，用算术的方法，而不是按照实际的利益来对待人。这种公式化的首要后果，正如我们去年7月在巴克尔先生的一篇评论中所看到的，就是把人抽象化了。由此对任何用加、减、乘、除、分子分母这么多计算符号来处理人的学派，我们必须深表怀疑。

索　引

（页码为边码）



自由史论

后　记

"自由史"是阿克顿的毕生研究计划。他虽然没有如愿写出大部头的自由史论著,但他毕生的讲演著作和评论,都与这个庞大的计划有关。这些自由史的著述,也就奠定了阿克顿19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的地位。

阿克顿去世以后,他的自由史论集最先出版。《自由史论》至今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07年出版的《自由史与其他论文》,第二个版本是费尔斯编的3卷本《阿克顿选集》第1卷:《自由史论》。本书根据费尔斯本译出。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陈刚:前言、一至五;胡发贵:六至十九;李滨:二十、二十一、二十六至二十九;朱珊:二十二至二十五;胡传胜:三十至三十二;张华:三十三、三十五;蒋海怒:三十四;刘芸:索引。全书由胡传胜统校。为了使阿克顿的思想更加醒目,校者对一些篇名作了改动。

刘东、彭刚先生慷慨将本书纳入"人文与社会译丛",责任编辑刘金源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陆元昶先生为我们译了不少法文,陆月宏先生为我们译了不少德文,在此表示由衷感谢。书中引用的个别希腊文、拉丁文句子,由于译者不具备相关知识,故没有处理。

译者,2001年6月